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八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的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对本室一九七九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1册）作了增补，将近年来党史研究中发掘和收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续编七册（序号12——18）；党的创立时期一册（12）；一战时期一册（13）；二战时期二册（14、15）；抗战时期二册（16、17）；三战时期一册（18）。同时，编印社会主义时期资料十四册（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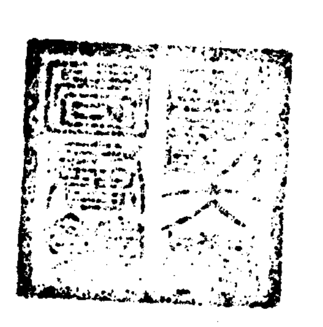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为保持文件原貌，所有资料均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曲延绩、张天荣、肖甡、胡庆云、林蕴晖、何理、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选编。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

第18册由李兴仁选编，林蕴晖、李浚统编。

资料的印制由魏政、李浚具体经办。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

（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某些有特殊情况的地方，中央已另发个别指示。

（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三）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五）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六）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八）望各地本此方针，参酌地方情况，考虑执行之。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　泽　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原载1945年8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附〕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　中　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原载1945年8月16日重庆《中央日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　泽　东未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原载1945年8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

〔附〕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　中　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1945年8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生先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　泽　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原载1945年8月26日重庆《大公报》）

〔附〕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三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　中　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原载1945年8月25日重庆《中央日报》）

〔附〕　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抗战胜利了，国内一切更复杂更麻烦的问题都来了，我们怎么办？假如我们在欢呼胜利的时候，能够更冷静一点，更理智一点，也许一切复杂的情形可能简单化；也许一切麻烦的情形可能轻松化；否则不是不可能演变得更纠纷更严重的。

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参加同盟的各党派分子和个人，我们自来的主张是很明确的，自来的态度是很客观的。我们不能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们也未尝不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情况可能在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最高原则之下，各各求得其适当的发展。

毫无问题，我们坚决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毫无问题，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的姿态和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的排除的。

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如何实现这八个字，我们有下面的主张十条，首先，我们要求全国的老百姓给我们以声援，请你们说话，我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不是正是你们所要主张的？其次，我们要求国际的朋友给我们以批评，请你们说话，我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不是你们也觉得这是中华民国可能而合理的出路？再其次，我们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时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主张给以充分的考虑，请你们说话，你们承不承认我们这些主张，正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呼声，同时值得你们的共鸣和赞许的？

我们承认国民党对抗战是尽了力的，同时我们承认共产党也尽了力，但我们痛定思痛，我们更承认这八年以来直接或间接为抗战而死了的一千万到三千万的人民，以及今日仍旧在饥饿线上嗷嗷待救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只有他们的功劳才是最主要的。今后一切的党派只有事事为着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叫出热烈的呼喊，请你们千万不要忽视。

下面便是我们具体的主张：

一、我们反对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但我们并不是在原则上不要国民大会，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在战争结束的一年内，在一切失地全部收复以后，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在全国和谐的空气中实行普选，回到南京的首都，去堂堂正正开我们全国人民所一致需要的国民大会，颁宪法，举总统，成立宪法政府！这个时期可能是明年的七七纪念日，也可能是明年的双十节，但政府一到南京，即要积极的开始筹备，并需要有全国的各方面共同参加筹备。

二、我们主张政府以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包括各党各派的公开活动，并废止一切在战时不得已妨碍人民一切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包括特务、劳动营以及一切束缚言论出版的检查条例。

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思想犯，惟贪污分子和汉奸不在释放之例。

四、我们主张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

五、我们主张在政治会议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裁军委员会，由有关各方面的高级将领充当委员，本公平的原则，将军队裁减到国防所必需的限度，过此人民即无负担的义务。并且应该以有限的财力，用于国家和平的建设。我们主张任何党派不得有党军，军事教育不能含有党化的成分，一切军队只能属于国家，只能用以保护人民，应精训精练使其名实相符的达到现代化。在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实现的条件下，一切军政令自然应该绝对的统一，但初步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我们并主张政府应该逐渐做到使军人主军，文人主政的原则。

六、我们主张在政治会议中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我们主张自省一级开始，加强各级的自

治，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均权，以促进地方事业与文化的发展。

七、我们主张切实注意经济的复员，包括迁到后方工厂的复兴与新厂的建设，确定民营国营的标准，废除战时的统制与专卖政策，代以有计划的适当措施。

八、我们主张切实对收复区人民的生活予以有效的救济，并扶助迁回收复区人民的复业。我们主张政府对各收复区在沦陷时所流通的货币，作一合理的收拾，其要点在使过去在沦陷区的人民不致陷于破产与无以为生。我们主张设立一收复区人民的产业登记委员会，对原有的业主予以切实的保障，并调解其纠纷。

九、我们主张政府在本年度准备征集的壮丁应立即停止，在战时所加于人民的过重负担，应即分别废止。

十、关于最近对日的和平谈判，我们主张政府应听取全国各方面的意见，并应邀请各抗日党派的领袖出席此次和平会议，对敌人所取得的赔偿，无论现款或实物，应全部用以救济因抗战遭受牺牲的人民，对抗属更应特别优待。

（原载1945年8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

〔附〕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

（一九四五年九月）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日前接见本报记者时，对目前国是问题，特发表谈话如下：

现在国内的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凡对国家前途具有责任感的人士或党派，都应该提出他所确定的认识和明显的主张，以求国是之早定。

中国人民因不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抗战八年，付出惨重之牺牲，博得同盟国家之协助，卒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此乃全国人民之胜利。今后民主建国的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使久经战事落后的中国，变成强大富庶，确为世界永久和平之安定因素，其所需要之奋斗与智慧，将百倍于抗战。

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即变为长期内战，民力凋丧，迄至抗战事起，一致对外，朝野党派均以抗战为主要任务。现在战争结束，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遇国人之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吾人深切希望当政十八年之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把握国家统一之重要关键，由民主大道，进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工作。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不算旧账，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利害观念，而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之进行。

目前国共两党领袖正为和平统一大计，谋初步之协商，自为国人所关心，更期待其有成，惟吾人愿以下列数事奉告：

一、吾人须明白坦率承认国民党及蒋主席担负领导抗战及领导建国之重任，但同时吾人

又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苟不如此，则领导统一建国之工作，不特无由开始，而胜利之果，可反为内争之对象。前此各在野党派曾以召开政治会议（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统一政府两大主张，谋全国之真正统一，今虽战争结束，但问题的中心仍在于此。

二、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解决，之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原则，但其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日前胡适之先生致毛泽东先生一电，其原则甚佳，但吾人亦希望国民党亦同样真正释兵权，则国家幸甚。

三、吾人对于各大友邦，自然万分感谢其在抗战中的援助。但今后吾国进入民主统一建国的阶段，吾人所希望友邦的协助不在军火的供给，而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

四、日本虽败，但报复之念甚切。所谓“勾践灭吴”之故事，日本侵略者知之甚稔，吾国人民必须警惕。吾人并要求同盟国家勿存姑息政策，应彻底毁灭其侵略的基础。至于汉奸伪军问题，尤须彻底解决，不可姑息，不可利用。凡此等人物皆民之莠者，莠如不除，良何以安？

（原载1945年9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

日寇投降后华中工作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1、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

2、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3、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

4、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5、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6、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7、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8、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9、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

*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党内指示。

全世界必须警惕蒋介石埋伏扰乱远东和平的祸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

《解放日报》社论

日寇宣布投降，但各地日军并未放下武器，特别在东北对苏联红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对中国解放区军队，还在继续进行疯狂的抵抗。日本法西斯决不会自己倒下来的，中华民族的解放决不能够安然取得的，远东的和平决不能由敌人自愿给予的。在这时候，一切抗日军队都必须继续努力给敌人以不停止的打击，根本破坏敌伪统治的法西斯秩序，迫使敌人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但是蒋介石怎样呢？他不这样做，他“命令”解放区军队要“驻防待命”，而要求敌人“维持秩序”，还有他的部下顾祝同通告“沦陷区同胞，应力持镇静，谨守秩序”，“谨守”什么“秩序”呢？那当然是敌伪的秩序。朱总司令十六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辞严义正，已指出了蒋介石这一种行动完全是背叛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应该告诉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蒋介石这一行为决不是偶然的，蒋介石从来的计划都决不是、也没有梦想过要坚决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破坏它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机构，以结束对日战争，而是准备随时随地和日本法西斯协调合作，作为“停止战争”的方式。但蒋介石所希望的这种“战争停止”决不是别的，只是为着准备新的远东大战，铺平新的战争基础、新的战争道路而已。我们是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决不是要故意危言耸听，我们的话是有根据的。本月十五日蒋介石对日人说了一大篇“仁义道德”，要敌人接受他的“三民主义”，但那决不是对日本人民说的，而是对于日本法西斯说的，人们绝不可设想一个对于自己国内人民采取无情残酷的镇压政策的大独裁者，而对于别国的人民能够有什么“仁义道德”的，他可以对于别的国家的统治者实行奴颜婢膝，但决不会对于别的国家的人民有什么“爱护”。蒋介石十五日对于敌人一大套“仁义道德”的广播，只是表示他对于日本法西斯的一种默契，一种关怀，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可解释。根据合众社重庆十五日电，敌人在华的总司令冈村宁次已经打电报给蒋介石，“他已从南京城撤到郊外，然而留下骨干军以维持城里的和平秩序，现只等待中央军（即蒋军）去接收首都”。远东战场还没有一个地方的敌军实行投降交出武器，而敌人对于蒋介石却已这样关怀备至了。难道敌人是怕蒋介石的军队吗？大家知道蒋军是在敌人面前的常败军，而且离开敌人是很远很远的，敌人怎样会怕他呢？然而敌人却留下了“骨干军”替蒋介石维持秩序以等待蒋介石，这道理何在呢？难道这不就是敌人与蒋介石互打招呼、心心相印的结果吗？这是由敌人方面直接发出来的一种证据。现在再看蒋介石新委的“南京新市长”马超俊一篇谈话吧！据合众社重庆十五日电，马超俊接见记者说：

“他所指挥的地下国民党的地下军，在南京城里完成了迎接他回来的一切准备工作，修好了“明孝陵机场”与“大操场”机场，已准备好迎接载运军队与官员的中央政府的飞机降

落”。

大家看：在敌人还没有实行投降放下武器之前，在敌人还在全副武装向中国人民作战的时候，而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城里的什么“地下国民党的地下军”的两个“地下”，已经可以公开“修好了明孝陵机场与大操场机场，准备迎接载运军队与官员的中央政府的飞机降落”，世界上那里有这样的“地下军”？这难道不就是敌伪的地下军吗？马超俊所谓“在南京城里完成了他回来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正是蒋介石集团和敌伪合流的准备工作与合作，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其它的准备工作吗？马超俊又说：我现在可以很骄傲的告诉你，我的部下在那里作了艰苦的工作，一周以前这还是秘密，而现在你可以发表了。……陈公博向最高统帅部建议，他负责保卫（妙在说是‘保卫’）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并说：“我在这地区的三十六万军队，负责保卫将国都与上海、杭州完整的归还到政府的手里，在我政权下的一百万军队，正等待着你改编的命令”。原来蒋介石正在依赖头号汉奸替他“保卫”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原来蒋介石法西斯集团的“骄傲”就是这个，原来蒋介石法西斯集团的“艰苦工作”就是这个，原来蒋介石法西斯集团一周以前还是秘密而现在可以发表的东西就是这个。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秘密归根到底就是蒋敌伪合作与合流的秘密。

同盟社南京十七日电，报告了同样的消息：“国民政府于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散该政府并设政务、治安两个委员会，担任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前维持此间的政治与治安工作”。如果不是蒋介石的要求，汉奸们何敢在那里忙着替蒋介石“维持地方的治安”？

在上述合众社同一个报导里还说：“在北平，中国领袖们组织和平维持会，在中央军及政府官员来接受之前的过渡时间执行职务”。“和平维持会”这类组织，原来是当蒋军退出给日军占领的地方，由汉奸们组织起来，以迎接日寇，执行日寇的任务的。现在这批汉奸老爷们被蒋介石集团中间称为“中国领袖们”了。他们又在组织“和平维持会”以执行迎接蒋介石，执行蒋介石的任务了，这正是蒋伪合流的一种形式。如果不经过日本法西斯的同意，汉奸们要成立这种组织是不可设想的。

根据美国新闻处旧金山十五日电：纽约先驱论坛报旧金山访员称：“各占领区的傀儡官员，正忙于想办法从日本人方面“光荣地”转到重庆方面去。”可见蒋伪走向合流，已是天下皆知的事实，而这种合流，正完全是有组织的结果。

大家继续看吧！这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痛心疾首、而却为蒋介石法西斯集团所认为“骄傲”的事情，还会不断公开出来的。

蒋、敌、伪这种合作与合流的运动，首先就是不破坏敌伪法西斯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机构及其建立的秩序，而且把这种敌伪法西斯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机构及秩序，原封不动的由蒋介石接受下来，变成蒋介石法西斯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机构，变成蒋介石统治的秩序，使敌伪法西斯势力，可以在各种掩蔽或公开的形式的掩护之下保存起来，作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挑动远东新战争的工具。

我们希望全体中国人民警惕这件大事，我们同样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警惕这件大事，当远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和日本法西斯与汉奸们，已在他们这种合作与合流的运动中埋伏着新的战争的祸根。

我们敢正告全世界，蒋、敌、伪的合作与合流，这不但是蒋介石准备向中国人民挑战，企图把中国人民抛入永无终止的内战的血海，而且对于整个远东现在与未来的和平，都是极

大的威胁。一个中世纪奴隶主和大买办的统治者，坚持其专制独裁的权力，拥有全副武装，对人民寸土必争，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而又获得敌伪残余法西斯势力的合作，内战便会成为他的终身职业，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当中进行不断的内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把远东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人民引到可怕的痛苦，而且是对于整个远东和平重新给了最大的威胁。历史的规律是这样的，一个对内好战的独裁者，必定是对外好战的阴谋家，去年美国务院致国外服务人员无线电通报的华盛顿七日电，那里说得很对："对于重庆军阀而言，他们的战争，或正是好几百次战争中的另一次而已"。我们可以断言，一旦蒋介石在国内得逞其大欲，内战的烽火由蒋介石举起而长期漫延的时候，那么不论对于任何邻邦，都将成为扰乱和平的炸药；而他现在和敌伪合作与合流的运动，正在埋伏着这种扰乱远东和平的大祸根。现在有一些外国人，正在计划帮助蒋介石以完成其大欲，但是不但为中国人民计，而且为远东有关的各国人民计，为美国人民计，都必须知道这种政策是极端危险的。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在很快的日子内，就会变成远东的大灾难。我们希望对于中国有重大关系的美国政府，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根据美国人民的利益，立即停止以武器和运输机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而且为着保卫远东的和平，必须立即援助中国人民，制止蒋介石目前与敌伪合作和合流的运动。

军委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其余则编为地方兵团。

（二）野战兵团应编为三三制的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再加以重机枪排（如无重机枪时可改为步兵连，每连三排，每排四班，即三步枪班，一火力班。）每连新增宣传员二人，其任务为在指导员指导下，进行群众工作，社会调查，增进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每连不超过一百四十二人，每旅不超过七千人。以三个至五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在华中、华东、山东已编成师者，则为三个至五个师为一个纵队）各纵队和各旅番号，暂由各战略区自定，报告军委。

（三）野战兵团装备，各地区就已有兵器，按下列标准装备之。每连步枪不少于九十支，轻机枪不少于三挺，掷弹筒不少于三个，每团配属一机炮连（迫炮四、重机三）每旅一山炮连。

（四）地方兵团仍归军区管制，其编制由各地酌定，其人数比例，不得少于全区军队五分之二，各军区并分别担负各野战兵团之兵员与物资的补充。为此各地区在人民可能负担的条件下，应迅速动员新兵入伍，其数约为各区现有兵员的三分之一，于本年底前完成。各区脱离生产之兵员，最高不超过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各地民兵及自卫军则须用大力尽量发展。

（五）野战兵团编制草案另送，作为参考。

向正规战转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大众日报》社论

我党七次大会所预见到的向正规战转变，这是在我们向大城市进军与控制交通要道的时候，就开始成为迫不容缓的必须实现的任务了。

我们过去战争长期因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虽也进行过一些运动战，但基本上仍未脱离游击战争性质，内战时期虽也积累了一些正规战运动战的经验，但在许多干部并不熟悉而且还不能适应目前新的形势的要求。因此，明确在全党全军提出向正规战转变，统一指挥，集中行动，实行正规作战，不论在目前或将来都有其重要意义。

首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适合战争需要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一切都要迅速，干脆，及时，切戒冗长，拖泥带水，要求一切行动要赶上时机，很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紧迫的形势，所以在整个组织机构上就不能不选择战争所最需要的最先成立，最先充实，主要干部，也不能不被先派，或抽派到战争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此，过去一元化统一领导下的党委会，某些军事干部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就不能不抽出一些去。为了加强前线工作及领导，某些高级干部，暂时离开原来工作甚或工作职位不比以前更高都是可能的，这样当然就会使我们的工作秩序受到一些影响，某些后方甚至可能引起一些工作秩序的混乱。尤其在我们过去许多干部的独立自主，果敢负责精神和能力都还不够的条件下，虽然大的原则总的方针和意图都已指出和确定了，仍然三番五次的问，不敢自己根据总的方针和意图，根据具体情况去自己做主，去贯彻总的方针和意图，有时负责同志已经说了，党报已经提了，还不即时去作，以致迁延时间，耽误事情，失去先机。"迟缓等于死亡"，这是我们今天应当牢记的警语，我们要在"一切服从前线胜利"之下，某些与战争关系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就要缓办一下，一时一地干部削弱，甚至影响一些次要又次要的工作，就都得暂时忍耐一下，地位观念必须打破，不难想象，当我们斤斤计较于这些细节问题的时候，一切都还死不放手，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则先机一过（先机时间往往是很短促的）大城市交通要道拿不下来，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呢？所以一切都要从整体出发，服从一个总的任务——迫敌投降，占领城市交通要道。部队如此，后方机关也是如此。

但这还只是一面（当然是重要的一面）另外一面，我们被调出去的干部或新成立的组织也决不能因此而对原来的组织和工作不闻不问。而应尽可能的关心照顾使工作协调。

其次，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全体部队和参战人员的纪律教育和政策教育问题。政策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军民关系——特别是对城市的一些发洋财观点上。我们长期处在乡村，有许多人是一辈子就在乡村，对于城市仅仅是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我军"占领城市交通要

道，才能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认识不足的。因此，再加上一个农民的报复性、狭隘性，就可能引起一些违犯纪律，不讲政策的行为。这点首先是我军政领导机关，必须加以掌握和贯彻教育的。不难想象，当今天，又是一个大发展的时候，这时候，比抗战刚开始还不同，因为是胜利，所以当我军到达之处，大批人拥进我们队伍，大量的人民眼睛注视着我们，尤其各阶层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行动，所代表的政策而是决定拥护我们与否，这点，那怕只是一个小节，也应估计到。有时因一个小节不注意，就会影响到大的问题。还可能对上打埋伏，对俘虏搜腰包，这些现象的预防，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各种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首先在干部思想中弄通，不是批评一通，打击一下，而是说服给以办法。要知道，形势变得太快了，正如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转过来一样，是一个大转变，需要费些力气。因此，一方要求作风快，一方仍要求作风扎实。

第三个重要问题，就是后方的领导问题。后方比前方更难转变——十多年，就是分散隐蔽活动的小生产方式进行工作的，一旦形势突变，就要求立即供应大兵团。事实上固然不可迟延，然而却十分需要军政领导机关的加强帮助，提高工作效率。不能象过去一样光要，我们应该认清没有后方的作战是危险的。而且要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后方，在今天交通不便利的场合下，逐渐接近前方去，尤其是医院工作，应有大批的医生护士到前线去，应在一个前线上，尽可能组成一些小型的野战医院，去接近前线，接近伤兵。这些工作搞好，不仅只是对一些伤者的问题，也是对全体正在英勇作战的将士作战的情绪的鼓励和提高问题。

与此相反的是后方秩序维持和安定，保证群众的战争动员，支持前线，防止和镇压坏分子的活动，民兵的任务就更加迫切了，领导民兵的任务也更加迫切了。但必须指出，民兵的基本特点是群众性，我们不能因为要动员民兵参战，而就也和主力一样正规起来，或只看到部分先进分子的要求，而不照顾整个群众觉悟程度，这样使民兵群众性失去意义。而走到脱离群众，影响民兵的普遍发展，这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此必须把民兵的任务明确起来，即：（一）保卫家乡，保卫物资，镇压叛乱。（二）战争动员，参战动员——支持前线。（三）看押俘虏。（四）配合主力作战。但要把这些作好，必须武委会在思想上搞通民兵的基本特点和与党、军政的正常关系，既不强调独立，又能主动配合，所谓垂直系统，只能是为了达到更好完成任务，而不是别的。

最后，我们还再三再四的提出，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解决问题迅速，因此必须大胆负责，泼辣果断的作风，因此不能在新形势下，还用旧脑筋旧作风对待和处理新问题新工作，拖拖拉拉的同志，必须立即改变——快以分秒计时间。干部，兵力使用有重点，否则，我们必失去主动，一旦我们失去主动，我们就要落后，甚至一事无成。我们的政治工作，地方工作，政权工作，当前就要保证这些具体工作的顺利完成。

中央宣传部关于配合重庆谈判的宣传方针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1、为配合重庆谈判的新形势及继续消灭敌伪，保卫解放区的任务，我们的宣传方针是：

（1）继续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批评其违反民主的各种措施，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重选国大代表，释放政治犯，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批评的态度暂时不要太尖锐。

（2）坚决要求政府，反对敌伪汉奸在签降后，仍继续进攻中国解放区及在其他各地屠杀人民，反对任何联合敌伪，利用敌伪，保存敌伪的政策。

（3）坚决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以实践政府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的诺言，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军队，是国家化与民主化的模范，民主的军队，乃是民主政府之不可分离的必要部分。这暗示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虽已作到仁至义尽的重大让步，但因国民党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但必须避免发表谈判之具体内容。

（4）希望美国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

2、望动员各级党委、各军队、各报纸、各新华分社，注意搜集调查与报告日寇投降以来，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特别在军事上对敌伪则联合利用与放纵指使，对解放区则进攻与屠杀人民，对“收复区”则镇压人民，对盟国则阴谋反苏与挑拨团结的种种事实与文件，这些材料必须有地点、时间、人名，尽量详细具体，而且十分确实，作成新闻或通讯，电告新华总社。没有新华分社之处则电告中央。揭露日寇投降以来，国民党的这种政策是不利于中国人民，不利于中华民族，不利于同盟国的。

3、赫尔利、魏特美耶是很反动的，他们的方针是纵容日本，坚决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但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我们的甚多。我们对于赫、魏等暂时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对美国情报人员、军事人员，均应采取友善态度，不要敌视他们。如有美军在解放区登陆，应以主人翁地位予以欢迎、接待，但我仍应坚持留在该地，确实掌握行政及治安之权，并十分警惕对方非法行为之可能。如有美军向我开炮进攻非法行为，或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等事，应将其地点、时间、番号情形尽量确实详细报告，以便对全世界宣布其干涉内政的行为，同时我们在行动上则是忍耐一时，目的是为了将来很有理有利的回击之。

中央关于组织东北中央局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馆卫戍司令部找司令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中央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一）东北情况及红军代表与朱总司令的谈判已告。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等）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

（二）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

（三）请山东迅速派人到沈阳找曾克林及东北局接洽，要他们派人在大连、营口、安东等地设立机关，并查明我们部队是否可在胶东放下武器脱下必要的军装，作为去东北的劳工或华北难民，到上述各口岸登陆，乘火车到沈阳再加装备，如此好处甚多，既可合法，又留下武器，冀东亦须作此种侦察和准备。

（四）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议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晋察冀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

（五）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六）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刘少奇

（一）国共谈判①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②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③、马占山④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⑤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⑥，以李富春⑦为书记，林彪⑧为司令员。罗荣桓⑨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⑩、饶漱石⑪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⑫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

*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这是根据党中央决策起草的一份党内的指示电。

注　释

① 国共谈判　指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内战危机。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是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继续谈判。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② 红军　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后，因中苏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军队。

③ 傅作义　（一八九四——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④ 马占山　（一八八七——一九五〇），吉林怀德人。当时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司令。东北挺进军当时归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

⑤ 胡宗南　（一九〇二——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里是指他的第三十四集团军，这支部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由陕西进入河北，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

⑥ 冀热辽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原称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军事领导机关称冀热辽军区，分别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因形势发生变化，并未付诸实施。十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分别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原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改为冀东区党委、冀东军区。

⑦ 李富春　（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⑧ 林彪　（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当时在派赴东北途中。

⑨ 罗荣桓　（一九〇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当时任中共山东中央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⑩ 陈毅　（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第372页。

⑪ 饶漱石　（一九〇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

⑫ 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岳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

中央书记处关于补充与扩大兵员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抗战虽已完结，但敌伪还未解除武装，为肃清敌伪力量，制止内战危机，保障战后真能实现和平民主。我八路军、新四军急需补充扩大。在日军宣布投降后我军解放百余城市，增加二千余万人口，缴枪十万余支。因此，军队的补充与扩大，也还不致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中央特决定，在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应争取补充与扩大数十万人，各区应扩大多少，由各区决定报告中央。

新兵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于民兵中的动员（可先经过动员配合作战之阶段）。新解放区内的个别扩大以及争取伪军俘虏兵参加我军。扩大的新兵主要是补充现有之主力兵团，各地现有之小团，都要争取充实为二千人以上的大团，或将原有大团分为两个团，再充实成为两个或三个大团，不必多组织新的部队，这样使部队在补充后仍然保持都是有战斗力的。适应今后斗争的需要（不是过去那样被分割为小块的分散游击战争），各个战略区域都应编整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其数量应占本区脱离生产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把他们编组为旅和纵队，准备他们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是说能调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的。这些机动兵团，须配备政治上军事上坚强的干部，因为要准备能够调离本地区行动，因此必须改变过去各区党委地委书记兼政委，或由主力部队的政委兼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制度，同时也要改变主力部队首长和司政供卫机关兼军区军分区这种机构的制度，而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加以分开。即区党委地委书记不再兼任机动兵团的政委，或政委不再兼任书记。

各战略区编好之机动兵团，须组织自己的司政供卫机关（与军区军分区的机关分开，在分开时须照顾到两方面），以后这类机动主力兵团须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不隶属于当地军区的建制，但主力的人员补充仍由原属区域军政机关负责，当该主力部队留驻该区域时的给养亦如此，所有未编入机动兵团的地方部队，均由军区军分区指挥，区党委和地委书记仍兼各军区及分区政委，以保持一元化的领导。

各大战略单位（如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晋绥、华中）仍保存现有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即中局或分局书记兼政委，或政委兼书记的制度。

目前整编与扩大军队，是各根据地最重要的工作，各根据地必须抓紧，并有计划的去完成之，并将结果电告中央。

军委关于阻敌北进之部署与战法给各地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1）抗战胜利，蒋介石独吞胜利果实，不许我军受降并令胡宗南、孙连仲、何柱国、陈大庆、李品仙等率大军，利用敌伪掩护，分由同蒲、平汉、津浦三路北进，又令傅作义沿平绥路东进，企图夺我张家口及被我包围之平津、济南，并进而控制热察两省及东北，但顽军现由徐州、新乡、运城出发，进抵平津尚有千余里，铁路被我破坏，部队多需步行，伪军虽多积极配合顽军，但日军已不甚积极，估计日军已无大举向我进攻之可能，且敌伪顽之间矛盾极多，沿途给养困难，铁路两旁广大地区我军均可自由活动。根据上述情况，我军阻止顽军北进到平津尚有可能，至少可迟滞顽军两个月以上的时间方能到达平津，在目前迟滞顽二个月的时间，使我能完全控制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一线，在冀东准备好战场，以至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

（2）为了阻止与迟滞顽军三路北进，军委提议采取下列战法：

甲、由山东及我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以冀鲁豫主力及太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汉路北上之孙连仲，以太行、太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每路主力兵团须各有三万人到五万人，组织得力的野战指挥机关与政治机关（最好伯承指挥同蒲路，李达指挥平汉路），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顽军前后左右，一直和顽军纠缠扭打到平津，最后配合我在冀东控制的部队，在冀东进行决战以保障我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安全。

乙、为实现上述战法须以我之小部队和民兵经常袭扰顽军主力，彻底破坏铁路公路，大量埋设地雷炸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长期疲劳与消耗顽军，而我之主力则应俟顽军弱点，在其弱点暴露时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或由我控制阻止铁路一段，根本阻止其北进，或仍继续与之纠缠扭打一同北进。

丙、实行上述战法如果日军不配合顽军大举向我进攻，我不易陷入被动，而顽军则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我之疲劳消耗，易于恢复补充，而顽军则因后路断绝（必须使之断绝），疲劳消耗不易取偿，如顽军被逼出而与我决战，则对我亦有利，在这种作战中我之野战军亦可借此组成，并受到锻炼，军事、政治训练亦可在作战中加强，后方勤务亦须很好组织。

（3）以我华北如此广大的解放区人民和军队阻止几路孤军深入的顽军，只要有适当的战法，适当利用各种条件，应该是完全可能的。上述战法是否适当，你们有何意见，望告。并望你们对于当前顽军的行动，迅速采取适当的对付办法。

新华社记者评美军将在天津登陆事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新华社延安电：据中央社重庆二十九日转播合众社琉球本岛二十六日电称：美特种混合舰队已自琉球本岛驶往中国沿海，俾美海军陆战队二师将于三十日在天津区登陆，盖中国军事长官定于是日接受日军投降。美军将司警卫之责，负责“接受投降之武器及军火，俟充分数日之华军开抵后，即行移交”。

新华社延安电：为美海军陆战队二个师将于天津登陆事，新华社记者顷发表评论称：美国当局过去曾经宣布中国战区解除日军武装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责，故此次美军在天津大量登陆，殊难索解。据称，美军在天津登陆目的，在于帮助中国军队解除日军武装，但尽人皆知，平津日军武装，即无美军登陆亦可顺利解除。目前日军武装之不能解除，完全不是由于中国无此力量，而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之偏见所造成。八路军既然在华北八年抗战中有功于国家民族，而敌军又完全在八路军包围之中，那末接受华北敌军投降的权利，应归八路军，自属天经地义，平津敌军的局部受降更无论矣。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不肯这样办，它宁愿要敌伪军“维持”其奴役中国人民的所谓“治安”，使华北广大人民在日寇投降后依然翻不了身，而不愿授权八路军接受日军投降，并进入平津等城市去解放那里广大人民以建立他们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关于此事，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亲到重庆同蒋委员长数度交涉，仍然毫无结果，殊为遗憾。美国当局如果要帮助中国迅速解除日军武装，只要劝告蒋委员长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处理此事，即可达到目的，远不必劳师动众将渴望回国享受和平生活之美国官兵登陆中国。新华社记者继称：或谓美军登陆天津实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再三请求所致。但如上所述，既然只要国民党当局抛弃其偏见即可顺利解决平津日军受降问题，既然国民党当局现在不愿这样做以顺利解决平津日军受降问题，那末国民党当局一再要求美军登陆平津之目的，显然不是真正为了要解除平津日军之武装，而是为了要利用登陆美军以反对八路军的占领平津更进而至于反对华北所有的八路军。是则美军之出此，不论其主观用意如何，实际上必然会干涉到中国内政，必然会帮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及一万万解放区的人民。这种干涉，显然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走向民主的和平，却反而会加深中国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但对中国人民不利，而且对美国人民也是不利的。新华社记者最后结论谓，美国政府为了远东和平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应该不是帮助中国这一党反对那一党，以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而应该是以公平合理的态度促进中国国内各党派的团结。

（原载同日《解放日报》）

中央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一、我军向各线进军，占领了许多城市与交通要道，接触了新解放区广大群众，这是我党我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广大新地区群众最好的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良好的时机，进行广泛的争取群众的工作，即使某些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只能短期的占领，亦应积极进行工作，而且更应采取有效办法把群众迅速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二、军队在进军中，除了首先以自己的英勇作战消灭敌伪解放人民外，应严整自己的政治纪律，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且在行军作战过程中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中的事迹，介绍根据地建设状况，口头上揭破国民党的反动措施。这样来给新解放区人民以良好的政治影响与初步的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然而据我们所知，由于物资条件困难，尤其由于教育督促不够，某些军队陷害群众利益与违反我军政治纪律和党的政策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不仅是对待群众的态度与打人骂人，而且发生牵老百姓牲口、拿走老百姓衣被、拿商店东西等恶劣现象。我们部队某些军事首长与政治机关则简直是采取放松不管，甚至以部队作战牺牲，对于破坏纪律可以原谅的奇怪态度，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是部队过去声誉损失，而且将养成一种坏纪律的作风。正确的态度是除了积极的可能的解决部队物质困难外，教育部队爱护人民利益，执行政策与建立自觉的模范纪律，使部队不仅是英勇杀敌的模范，而且同时是团结群众的模范，只要领导上注意做到这点，并不是困难的。

三、进入城镇以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城市政策。

（一）保护城市工商业，保护城市贫民，绝对不准侵犯城市贫民利益。

（二）不准随便没收汉奸财产，必须经过地方政权调查研究之后，才由政府确定没收，并结合当地群众意见处理其财产。

（三）对工厂企业等归由最高军事机关和政府决定处理，不得破坏和随便私人搬走。

（四）除弹药武器等军事资财由军事机关与部队直接处理外，敌人的其他物资如粮食、油、盐、布匹等，由政府接收统一处理（主要以供给部队）。攻城部队如物资困难，必须此类物资时，则由政府从此类物资中酌量批发，或提奖，必须适当注意此点，军队不得私自处理。

（五）对于剧场所、学校、交通机关、医院、仓库等，应加保护，其他文件及各种物资，须经一定的军事机关检查处理，不得破坏。

（六）为便于维持秩序，保护纪律，战斗一经结束，除预先指定之卫戍部队外，其他全部即移城外。

（七）各部队各部门互助互让不可自起纷争。

四、地方党政民，在部队进军中，在动员解放区广大民兵配合作战，担任运输等方面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地方应以极大力量配合部队，利用进攻敌伪之胜利，惩办汉奸、特务，破坏铁道、公路，拆毁城墙碉堡，救济贫民、难胞，维持革命秩序等机会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估计某些城镇与交通要道不能够去攻打，设法建立党与某群众的秘密组织，以便那里将来开展工作的基础。

五、党政、民机关对于新解放区，应即依调查研究的情况，考虑减租减息和继续发动工人、贫民的步骤，以便新的秩序初步建立之后，在适当的时机中，迅速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

六、无论部队与地方，在发动群众中，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技工、医生、专门人材来根据地和八路军中工作（可以用军政大学、建国学院、剧团、工厂招生和其他办法吸收），部队还应注意在群众工作中个别的吸收广大贫苦群众来八路军当兵，以充实我们部队。这些意见，请你们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考虑。并立即布置进行，并希望知道你们进行的具体情况。

目前的时局与任务

——聂荣臻同志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我离开边区已经两年。在这两年之中，分局、军区及全党全军各级干部在党中央与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坚持渡过了抗战的最后困难阶段，直到反攻的胜利，在各方面工作上，都获得了大的成就。

由于日寇的迅速投降，反攻阶段为时很短，但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在许多问题上，同志们的看法尚不尽一致。现在我代表中央局说明下列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时局的几个问题。

（一）苏联参战与日本迅速投降问题：苏联在战胜德国三个月后，即参加对日作战，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强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数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已处于不利的形势，加上苏联的拦腰一击，使他无法继续作战，只好迅速投降。但由于日本的迅速投降，致使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准备工作，都发生了措手不及的现象。

（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是苏联外交的必然方针。苏联在战胜希特勒后，为了继续打败日本法西斯，与在战后维持远东与世界和平，在中苏外交上，应当有所协定，而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据有合法地位，因此苏联与他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是正确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迅速打败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有利，苏联根据条约而使他在出兵区域与撤兵时间上受到限制，其目的在于避免远东重新引起冲突与争取世界和平，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但我党的政策，则决不能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约束，有些反动分子挑拨离间说，中苏条约的订立，说明苏联只帮助国民党，不帮助共产党。我想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并不是给蒋介石打天下，苏联也没有给蒋介石打天下的义务。苏联《红星报》与《消息报》，曾再三指出中国不应继续成为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并对毛主席赴渝谈判，极表关切。有些同志对苏联的要求是过高的，须知远东问题甚为复杂，与巴尔干大不相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胜利，不能依靠别人，只有我们自己有力量，有正确的方针，才能取得国际的支援，才是正确的道路。

（三）进攻大城市问题：日寇宣布投降后，我们向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举行全面反攻，这种处置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朱总司令的命令，包括了从军事上进攻与政治上进攻两方面的意义，以争取接受日军投降，夺取大城市。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垄断受降，不许我们参加，以致日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我投降，使我不能进占平津等大城市，我乃迅速转移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这种措置也是对的。国民党反动派依靠其合法地位，

垄断我中国人民八年来以无数牺牲代价所换来的抗战果实，我们的愤恨不平，是完全对的，但绝不应因之而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与曲折，正足以说明这类问题。

（四）国共谈判问题，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是目前全党最关心与全世界最注意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蒋介石在日寇投降后，曾一而再，再而三的电邀毛主席赴渝，共商团结建国大计，在此最紧张的时期，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注目于国共两党，是和平？还是内战？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虽然我在政治上有许多优势，但如果不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要处在被动地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会脱离群众，去了，则我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因此毛主席毅然决然而去，以去来争取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去，本身就是一个斗争形式。蒋介石的手段是拖延时间，谈判了一个月，尚无结果，双方距离尚远，蒋介石在政治上并未对我让步。今后谈判还可能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们一方面不应放弃谈判，主张内战，另一方面决不能以为毛主席去谈判了，便天下太平了。要使谈判有结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依靠我们的斗争和发展，有力的击破敌伪顽合流对我之阴谋，只有我们坚决的斗争，才能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

（五）美军登陆问题：美军已于九月三十日在大沽口登陆，其目的在帮助掩护运输国民党军队进到平津，以及将来进入东北。这个事件，说明蒋介石依靠外援，企图依靠美国来做斯科比，又说明平津在我包围之下，有为我夺取可能，美国不惜揭露其帝国主义面目，露骨的支持蒋介石，对抗我们。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东方斯科比的危险，认识蒋介石在美国支援下，更进一步的积极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在政治上批评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军事上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以求避免美蒋的斯科比阴谋，但如美军向我进攻，则应迅速将经过情形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他们不会赞成斯科比，他们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对于这一事件，新华社已有评论，应根据此作宣传。

以上五个问题，一方面说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和我党都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另一方面则是日寇和全世界的反动派法西斯分子还在继续挑拨反和平反民主的战争。特别在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积极准备反民主反和平的内战，要夺走中国人民抗战八年中用无数流血牺牲代价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使中国继续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下的半封建的落后的中国。

在目前时局中，我们应当怎样办？

抗战阶段已经过去，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的向我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的乐观心理，以为抗战已经胜利，我们已经拥有广大的解放区，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的关头，抗日战争结束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正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决的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必须向全党全军及每一个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原有的根据地，是我们的中心堡垒，必须固守之。但我们不仅要固守原有的解放区，还要继续扩大新解放区。我们要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热河两省，控制冀热辽全境，争取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争取绥远之大部。这就是说，我们在华北要大大的向

北发展，形成更大的民主的解放区。依靠解放区的力量，配合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来实现中国的和平与民主。抗战时期与内战时期，我们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现在我如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就能脱出全线包围，使我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

要实现这个方针，必须积极的行动，壮大自己的力量，采取攻势。反动派是会向我们进攻的，当我兵力尚未集结时，张家口的形势不是十分危险么？傅作义马占山不是迫近了柴沟堡么？抗战中他们远遁于五原、河套，现在他们又跑来“受降”了。虽然他们的爪牙已经被我斩断，但他们是决不会忘情于张家口的。我们收复了丰镇、集宁，他们又勾结日寇抢回去，他们发展土匪，到处骚扰，造成绥远民不聊生的现状。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挑起内战的祸首，因为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就必须打他们。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为他们犯我，我就必须犯他。同时我们还要准备反动派在斯科比掩护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仍在生产与战斗结合下，为和平民主而战斗。

现在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军事上的转变问题：在抗日战争中，我之战略方针，是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今天我们在对付顽伪进攻的自卫战争中，主力军必须进行运动战，配合以地方群众性的游击战。但大家必须了解，进攻我们的敌人，有强弱之分，有嫡系非嫡系之分，我们已经八年没有同他们见过面，因此对之必须有新的认识，不要固守于过去的经验。大兵团的作战必须要求在军事上统一与集中，但同时又由于根据地交通不便，又要保持各个独立作战的机能。我们要积极的集中主力，但又要使根据地拥有强大的地方武装与强大的民兵更加提高一步，使顽伪不能进入我根据地一步。如果他们敢来侵扰我们，他们就会遭受我地方军与民兵的爆炸与打击，如同过去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在统一与集中的原则下，主力军必须编整，必须正规化，脱离游击队性质，进到我现有条件下的正规性，建立各种制度，严格军风纪。

在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问题上，过去曾长期的提出与进行教育，进行过拥政爱民运动，但如真要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在我根据地中，老百姓成了主人翁，犯纪律的机会比较少些，但是一到新解放区，许多同志就把自己看成统治者，不论在城市与乡村，都障碍了我们工作的开展。军队的干部，必须了解党的主张与政策，因为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首先就要由军队的行动来表现。军队中目前打骂现象与逃亡现象还很严重，固然与新战士增多，任务繁忙有关，但首先必须解决官兵关系问题，加强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加强我军的战斗力。在这些问题上，今后要规定许多具体的要求。

（二）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及其联系问题：我们由乡村来到了城市，这是一个转变。以张家口来说，以工业上来看，已经不是个小城市了，我们入城后的工作，一般的说，还是做得好的，当然并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在农村里住惯了，对于城市中的一切，没有经验，不大习惯，需要一个时期才能转变。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缺乏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因而使工作受到了许多损失，我应很好的积累此种经验，不要把农村中的一套照旧搬运过来。在农村中我们依靠农民，在城市中我们就要依靠工人，如果解决了工人问题，城市便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但在另一方面，象张家口这样的城市，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还没有更大的城市。要巩固我们的城市，还必须依靠农村的帮助，如果城市与农村脱离，则城市是孤立的。我们要把城

市工作做好，使城市有利于乡村（例如减低工业品价格，供给农业工具，解决农民原料销售问题等），但决不能放松乡村的工作。在乡村中，我们有几十万党员，几千万农民，占我们党员与人民的绝大多数，我们决不可忘记他们，必须加强乡村的工作。到城市里来的干部，在应当回到乡村去的时候，就要回去，不要忘记乡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从那里生长起来的。目前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根据地和主要的依靠。目前在乡村中还有许多严重问题，如粮价骤跌，谷贱伤农，反攻以来干线上勤务繁多（特别在新解放区），有些同志在乡村中的抓一把现象，都需要立即解决。今年各地应积极组织群众从事秋冬生产，并准备明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要运用我们的固有经验，而且要切实的从组织生产中创造新的经验。我们要长期的依靠根据地中的几千万农民，这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与一切困难的保证。

（三）发动群众问题：反攻以来，我们解放区扩大了，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来进行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斗争与反对汉奸特务的斗争。在改善生活的斗争上，我们过去已经有了一套经验，在反汉奸特务的斗争上，必须号召人民起来控诉他们的罪行，领导群众复仇的怒潮，严惩群众所痛恨的汉奸特务，使群众在政治上能翻过身来，把汉奸特务的社会地位彻底打下去，在经济上能清算汉奸特务对他们的剥削掠夺，得到现实的经济利益。我们实行宽大政策，主要是表现在少杀人，而不是抑制群众复仇的怒火，模糊敌我的界限。在斗争中要帮助群众，提高其政治觉悟，而不是去包办、命令、恩赐。我们的党是有枪杆有政权的党，如果我们去包办代替群众的斗争，实际上必然会障碍群众的发动。工人方面，在私人工厂中，应当发动对资本家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在公营工厂中，政府与党则应处处帮助工人，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使他们了解党与政府是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分散给部队机关经营的工业，必须很好的去经营。凡是赢利的公营工厂，应当以赢利之一部用作改善工人生活，坚决反对同敌人一样的打骂工人，侮辱工人，以及对工人的残酷的殖民地和封建的剥削。我们对工人采取什么态度，是党员的阶级觉悟的最好的测验。

（四）财政问题：解放区扩大了，部队增多了，开支也增大了。老百姓渴望着抗战胜利能使他们减轻负担，但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今后财政上必须更加统一，进一步走上轨道，要励行节约，一方面要照顾战士的生活（现在战士生活还很坏），另一方面必须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浪费现象。不要以为缴获的物品都是从敌人那里得来的，我们便可以随便浪费他，要认识我们如果能节省一分，就可以减轻人民一分的负担。

目前我们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我党我军虽然已经经过了长期的考验，但历史还要继续考验我们。我们有了成绩，得到了不少胜利，但是决不应当骄傲。我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如我党我军及解放区之扩大，斗争经验之丰富等，但困难与艰苦斗争还继续存在。毛主席曾说过，革命本来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们不应当怕麻烦。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不要幻想，以为华北一下子便会完全为我们所有，我们应当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发扬长期终身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便不会产生侥幸懈怠的心理。

我们必须团结，只有团结才能胜利。尤其在困难的时期，只要我们团结，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只看自己、不看别人，只看局部、不照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各级领导机关与各部门均应检讨纠正。在目前困难时局中，只有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统一集中，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与战略方针下，大家为着全局而奋斗，则步调可以一致，任务也就更易于完成。

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加注意：

1、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2、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3、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四十三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整编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之一。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整编问题。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4、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则执行分散长期坚持计划不变。

5、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新四军发言人就撤退江南新四军发表声明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

自从江南陷入敌手以后，新四军奉命深入敌后与敌伪作战。感谢官兵的勇敢和当地人民的支持，我们能够在过去八年中打击敌伪，建立了苏南、皖南、浙东和浙西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几百万国民，实现了民主政策，并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围攻了江南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等，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

日本投降时，我军有义务解除东南各省日军的武装，并在力量充分的各大城市里接受敌人的投降。从辽远的西南大后方运输军队来接受敌人的投降，就会不必要的陷全国于困难和纷争之中。但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实现和平与团结，并且为了回答全国的要求，我们不在这些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等地，和国民党军队竞争受降，这就可以使敌人和反动集团没有借口进行挑拨内战。更进一步说，为了实现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所允诺的让步，我们驻在江南的部队，包括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等解放区的部队，即将撤退到江北去。

中共这种光明磊落的精神——中共的目的是为国家与人民服务，为和平团结而斗争——一定会为全国人民所了解。为了建立和平、民主、团结，我军现在不能不满怀痛苦，向几百万诸姑父老兄弟姊妹告别。

在告别的这天，我们怎样能不感到悲痛呢？因为八年来军队和人民相处有如鱼之与水！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八年江南人民给予我们的支持、爱护和重视。为了实现北上的命令，我们只能要求江南的男女老幼同胞，了解我们为了和平、团结所忍受的悲痛。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加强团结，保护你们已经获得的民主和经济权利，并且继续为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此外，我们希望在我军撤退之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能够真正的做到：

（一）保证我军复员士兵、受伤人员和抗日军人家属的安全，并且给他们以适当的关切；

（二）保证我军留下的机关的安全，和不能撤退的受伤人员的安全；

（三）保证人民已得到的民主设施和民主权益，保证我军撤退地区的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人士的合法地位；

（四）保证在抗战建国中曾有优越贡献的军队干部和人民的安全，希望他们不致受到歧视或恶劣的待遇；

（五）保持在执行中的民主设施（如取消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并继续不变动地执行下去。

我们非常盼望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中共的帮助之下，忠实地和真诚地迅速实现国共谈判中所采取的和平建国政策，避免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地位等国民政府所答应的诺言，以便早日达成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原载1945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

必须实现双十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解放日报》社论

和平建国，是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非常明确地揭橥和平建国的方针，并认为这个方针不是局部的、暂时的，而是整个的、长期的。在日寇投降以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对时局宣言，着重指出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宣言所提示的，就是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方针，简言之，就是和平建国的方针。除了这个方针以外，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方针呢？对于这一问题，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答复是再明确也没有了："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内战必须坚决避免。"（对路透社记者谈话）

为什么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这项方针，而不需要其他任何方针呢？

首先，我们的民族敌人——日本强盗虽已被击败，但是它正在企图用各种方法保存其军国主义，同时它正在千方百计，离间中国内部团结，挑动中国内战，以便卷土重来，再肆对华侵略。如果日寇这一阴谋得逞，中国在战后没有和平而是发生了内战，则不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无从巩固，而且将给敌人以可乘之隙，使中国有再被侵略奴役的可能。很明显的，中国如果发生内战，得到利益的一定是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中国人民。为了巩固抗战的胜利，为了杜绝日寇再肆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建国的方针，而不需要其他任何方针。

其次，中国人民在八年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牺牲，是不可胜计的。抗战胜利以后，许多被破坏的城镇亟需恢复，许多被敌人"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无人区"亟需重建，成千万的残废军人、阵亡将士家属和流离失所的难胞亟需救济安置。全国同胞急切的盼望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加紧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从贫穷落后一变而为富裕先进的国家。但是如果中国没有和平，则一切恢复与建设计划都将成为泡影，全国同胞将继续遭受无边的痛苦。为了医治八年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满目疮痍，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为了在战争废墟上建设繁荣的中国，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建国的方针，而不需要其他方针。

第三，由于全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努力，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提高，中国被列为四大强国之一，负担着和英美苏等盟邦共同巩固世界和平的责任。但是如果中国本身不能和平团结，发生分裂内战，中国便无法负担起这一重大的责任，中国的国际地位便会一落千丈。不仅如此，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如发生内战，影响所及，必然危害

到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建国的方针，而不需要任何其他方针。

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建国的方针，并不是偶然的。“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即倡导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主张。这个主张在西安事变以后得到了实现。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今年四月，为了增强国内团结，准备最后打败日寇建立新中国，毛主席在我党七次代表大会上，曾作下列的声明：“只要他们（指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抗战结束以来，中国共产党即为和平建国的方针竭尽了最大努力。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发表后两天，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即应蒋介石先生的邀请，亲自到重庆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我党不仅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明确方针，而且也提出了实现这方针所必需的具体办法，同时为了取得协议，不惜委曲求全，在实现全国和平、团结、民主的条件下，作重大的让步（例如同意缩编解放区军队，同意这些军队退出八个解放区等）。由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由于各党派及民主人士的有力声援，我党所倡导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终于获得了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等问题上获得了重要的初步协议；双十节这一天，双方在重庆签订了协定。

国共会谈的结果虽然已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总方向，但就今天的情形来看，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试就解放区来说：在抗战期间，解放区已彻底实行了民主政治。凡是今天国共会谈协议中所规定的许多民主措施，在解放区早已见诸实行。这一切进步的措施，使解放区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胜利地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战。这些措施无疑义的是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最近一月余来，被我解放区军民收复的地区，敌伪势力彻底肃清，人民正气充分发扬，民主秩序立即建立，社会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日臻繁荣。解放区军民这样的光辉建树，应该得到奖励；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应该得到承认。但是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英勇的解放区军民不被允许对敌伪受降。解放区民选的政府依然还没有被承认。尤其令人痛心的，在国共会谈中及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国民党军队对各解放区（如河南、山西、山东、浙东等地）的进攻，仍然继续进行着。解放区军民流血牺牲从敌人手中光复的城市，被国民党军队夺去的，已达三十一座。同时就大后方而言，除了新闻书报检查的废除而外，还看不见其他任何符合人民要求的民主措施。在国民党当局“收复”了的地区，卖国汉奸依然横行，广大人民依然没有得到自由，国共协议中所规定的，还没有一条成为事实。以上数端，已足以说明，虽然全中国人民迫切的要求国内和平，虽然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希望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虽然和平建国的方针经过了国共会谈，已成为举国一致的方针，可是中国反动势力仍未放弃其破坏和平的活动。这又说明了，虽然大势所趋，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前进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是有严重的困难和阻碍的。

全中国人民和各党派人士要清楚认识：要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必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必须制止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把国共会议中已获协议的文件，见诸实施，并争取尚未获得协议的问题达到圆满解决。特别是关于承认解放区的问题，是保证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重要环节。现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总方针和“积极推行地方自治”的原则既已确立，中国共产党既已在解放区及其军队的问题上作了最大的让步，今天国民党当局再没有理由可以继续不承认解放区的政策，更没有理由

去继续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我们深信，在全中国人民、各党派人士一致的努力之下，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和赞助之下，和平建国的方针终归是要实现的。

〔附〕 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情况

八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飞抵重庆。二十九日，在林园先后同蒋介石和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进行初步商谈。国民党方面除空洞表示愿意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外，提出所谓“中国没有内战”之说。对此，毛主席严正指出，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欺骗，列举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回答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

同日，蒋介石为国民党拟定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八月三十日

周恩来同志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对政治军事问题作一般性商谈。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长时间商谈。

九月一日

周恩来同志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继续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九月二日

毛泽东主席于本日上午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座。毛主席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

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接着周恩来同志同王世杰继续进行商谈。

当晚，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在蒋介石官邸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商谈。

九月三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共十一项交付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

十、军队国家化；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

至此，两党普遍交换意见告一段落。

九月四日

上午九时，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开会，听取近日以来两党双方商谈情况，商讨对付办法，正式指定张群等四人为谈判代表，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与四人，责成他们据此拟出对中共九月三日提案的复案。蒋介石所拟之四项要点略为：

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上午，周恩来同志同张治中在桂园就两党进一步举行谈判问题进行商谈。

下午，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

晚上，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

谈判开始，邵力子说，今天是谈具体问题，抑任意提出问题？周恩来同志说，任意交换意见的四天时间已过，本来昨天即应商谈具体问题，故有毛泽东同志与王雪艇（王世杰）之谈话，我党又提出了十一项具体建议。我们可否以此十一项作为根据，对其已接近者不谈，而对具体事项，不拘形迹的加以讨论？

国民党代表即以中共三日提案中第九、第十两项使政府为难，要中共重加考虑。

王若飞同志说，昨天周恩来同志所提之十一条，你们即可就此考虑，何者可以同意，何者尚须商量？便可提出讨论。

张群说：现在时机难得，我们必须拿出诚意，以达成此商谈之目的，然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由此可知我等商量之基础尚须加强，彼此了解之精神尚须增进。我以为现亟须确定者当是谈判之态度和精神。

邵力子说，看了各位的方案，觉得成见过重，根本矛盾尚未消除。方案中第一、二两条，态度甚好，不胜赞佩，然亦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故我以为彼此间之了解与互谅，尚待增进。

周恩来同志指出，具体问题之解决，不免遭遇困难，自在吾人意料之中。为求问题之解决，我等已作了尽可能之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现不能作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国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不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谈话时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判之政治基础，可保证此次谈判之成功。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等因有上述之让步，政治既可安定，各党派间亦可和平合作，毛泽东同志有此决心，毅然来渝，即在求问题之解决，如果不希望解决问题，何能远来？

张群说，恩来兄所谈之政治基础，我甚了解。感困难的即为兄等昨天所提出之第九、十两条。此两条所涉及的军队改编与解放区处置办法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倘如兄等所提承认解放区政权，重划省区而治，则根本与国家政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了。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

周恩来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提出的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我党仅为少数党；（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亦必仍限于少数党的地位，为此，我党干部之安插与党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发生问题。所以我党主张凡一省一市我党为多数者，其省政府主席与直辖市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此系为让步合作考虑，期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都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何保障，所以我们坦白提议，要求政府承认我党在地区的政治地位。我党此次所建议之办法，其目的在促成国民大会之召开；并促国民大会后全国政局之安定，使两党均可安心。此种办法，与两党所持之原则，并无不合之处。我党所争者，惟在人事与组织，即于政令统一的原则下，我党只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而决非于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体制与法令系统，我今亟待解决者，为各省、市区域与军队之数目而已。

邵力子说，兄等办法不过是相安一时之方针，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王若飞同志指出，检讨我们两党之关系，非自今日始。自抗战以来，彼此之间即存在许多问题，盖由于两党作法之不同与所处之环境各异，故我党今日始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之政

权。现在抗战已胜利结束，我们要求和平民主团结，以求中国军令政令之统一。此一原则彼此都是同意的，但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事实。我党所提建议案：其中第一、二两项即系承认国民党之政权，并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而我党今日所要求于政府者，亦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则客观上仍然存在。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周恩来同志说，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而且拥有百余万党员。此百余万党员如何安置，必须有一过渡办法，我党所以要求几个省与几个市便即为此。

王若飞同志说，我党既有百余万党员，与百数十万军队，又有许多由人民产生之解放区及政权，这一般党员官兵等皆期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到团结统一，故我党建议成立北平行营与北方政治委员会。

邵力子说，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恩来同志说，此乃名词问题，事实仍然存在。只要按事实解决问题，名称可以变更。

张群说，中共的政治地位，不必与解放区相提并论。中共不要以为有了解放区作政治基础，始有其政治地位。中共要保持并增高其政治地位，不在坚持所谓解放区之承认，而须就整个国家的组织来研究。即如蒋主席已允诺国民大会增加代表名额，中共亦有代表参加共商国是，共策大计。至于解放区取消后，一切人士中央自可于法令规章范围以内尽量设法调整。只须于国家政令之统一无妨碍，任何方式均可商量。

王若飞同志立即指出，承认中共之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之事实及其军队与人民所树立之政权等，否则恐难期问题之解决。

张治中就中共建议案中要求将中共军队编为四十八个师的问题说，前天我与周恩来兄谈及中国在此次战后，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我们必须朝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决不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求地盘。且就中共立场而言，是否必争地盘、争军队始可保证其地位？余以为不然。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我为兄等计，最好能将抗战期中所有中共之将领列名呈报中央，何者应委以实职，何者应授以勋章，编余人员应如何安插，中央会考虑全体抗战将士之功劳，必然秉公酌情办理。且余以为中共要保持如许军队，实为一累赘。抗战之后，敌人已被打倒，我们正致力于和平建设，吾人尚要保持如此庞大之军队，岂非决无意义乎？

邵力子接着说，我想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亦不能消灭他，中共军队少一点，国民党也不敢进攻他；反之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亦决不能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同志当即指出，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以为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十八年之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我们认定：打是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知中央对于此事之解决所准备之具体方案如何？

国民党代表提不出具体方案，表示下次继续商谈。谈判遂告结束。历时达三个小时。

九月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军队组

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上次商谈情况，我等已告诉毛泽东同志。我方所提十一项建议，每项之下本已附有说明，但因我党现在之地位、敌后政权与解放区军队，皆未蒙承认，故所提建议，不能获得兄等之信托，而报纸言论甚至说我们为“割据”，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则成为僵局即不能解决问题。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即不必再如今日要就个别问题来商谈。只以此项提案未曾获得政府之同意，所以这次毛泽东同志来渝，即不再谈成立联合政府，而改提目前之十一项建议。此项建议之精神，在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法统与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对于政府的要求，我方已作很大让步。其他军队驻地与省区问题，我方皆提出了切实的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尚无明确答复。究竟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如何想法，我方极愿知道。我等上次所谈皆为具体问题，如军队数目，我方所提出者既不予考虑，蒋主席所指示者——十二个师是否固定不变？其实，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而政府尚认为我们要求太多，超过之数量过大。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

张治中说，上次兄等所提之十一项建议，其中第九项关于省区问题，中共要求完全占有五个省一个边区，参加六个省与四个直辖市，犹如分割地盘，我等不敢赞同。第十项关于军队问题，中共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数字太大，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兄等要求政府答复，政府实在困难，还望兄等重新加以考虑。

对于国民党反对中共要求划分省区及参加部分省市管理及军队缩编的提议，周恩来同志说，如政府不能同意，我党现有之地区即可实行普选，如不赞成普选，又不同意我方建议，则政府尚有何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兄等固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

继而张治中对中共所提军队整编数目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一切事必须依据现代化办法办理。前年林彪来渝，中共要求十至十二个师。去年林祖涵来渝则要求六个军十五个师，时间只差一年多，已增加了四个师。此次兄等来渝，则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较之一年前更增加了三十三个师，兄等军队之扩充何如此之快？又岂是我现代化国家所应有哉！

王若飞同志说：中共抗战时期所提出的军队数目，只是解决军事问题的一部分。而中共在抗战期间与敌人作战中虽然未获国民政府接济，但仍然得到发展。现在抗战结束，国民党不但不承认中共军队，反而将中共军队裁减，既然战争结束，亦须将双方军队整个缩编。

王若飞同志进一步补充说，我等谈话，认识尚未一致。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皆有政权，而且作法不同，此事摆在面前，人所共知。但现在抗战结束，国家须要统一，不容两党从事武力内争，而且要想武力统一，也不容许。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与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始能求得问题之解决。兄等要求军队减少，地区缩小，我方皆可承认，故已由一百二十万军队缩编为四十八个师，何能谓扩充部队。解放区乃既成之事实，只求中央承认，并非要求中央另划地区。如华北五省，过去系由中共军队坚持抗战，始有今日，故要求此五省由我党负责，其他六省由我党参加，何能谓为争夺地盘。文白兄谈国家要现代化，此种理想，我也赞成，但须顾及事实。必须一方面先求

军令政令之统一，一方面彼此避免内战。然后两党问题，始可获得公平合理之解决。

张治中说，兄谓两党皆有军队，殊有未当，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而乃是国家的军队，将来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系何理由要保持一党私有的军队。

王若飞同志指出，在国民大会尚未制颁宪法，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的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

张治中说，全国各省都实行保甲制度，而解放区独异。因而要求划五省归中共，此种办法实在违反现代国家之要求。邵力子也认为此与国家之统一原则不符。

周恩来同志说，我方只是在法统不容紊乱、党治必须结束的原则之下，提此建议，即是说，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办法。我方建议，乃于盘根错节，痛定思痛中想出的办法。本来我方一贯主张普选。如今既不普选，又不迁就事实，何能走上和平建国的坦途。

邵力子说，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反之，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作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

周恩来同志说，如此我们即可依照建国大纲之规定，实施省县自治，实行普选。我方已首先承认政府法统，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而要实现国家统一，军队改编，政治普选皆需有一过程，始可达到目的。今总观我方提出的十一条建议，无一项不是本此精神，作相当让步，以期解决问题。

王若飞同志说，依照我方之建议，并非向中央作分外新的要求。如军队、各省区皆属事实已经存在，不过根据事实拟定办法，以求实现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目的。我等既已申明拥护蒋主席，亦希望蒋主席对于我方所要求者有公平的办法。

在这次商谈中国民党一直未能承认既成事实，又未提出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周恩来同志一再询问国民党谈判代表，对于我方建议究竟有何意见？张群始将一份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交给中共代表。这份答复案的要点是：

一、实行和平建国方针和三民主义，均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

二、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

四、解放区名词应成为过去，对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能力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

五、惩治汉奸必须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要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六、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七、双方停止武装冲突，中央部队不能只靠空运，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八、原则上赞成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作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

十、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职，不同意设置北平政治委员会；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酌量编置，

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放人员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行为。

九月十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中共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问题。国民党方面原则上赞成召开这样会议；但要求不用党派会议名称，而称政治协商会议为好。中共代表在会议的名称上未作过多坚持。至于政协会议的召集办法、各方参加代表人数、须要商议之事项以及政协会之权限等，虽有争议，但经协商多已接近。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方面基本上同意延期召开，但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仅表示可以在旧代表之基础上增加少数名额。中共代表表示，代表最好重选。若国民党方面认为重选有困难，以增加代表名额来补救，就应增加三分之一。国民党代表对此只作很原则的答复，未予明确拒绝。双方无大争执，亦无最后结果。

九月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及叶楚伧、张厉生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国民大会的代表及延期问题进行商谈。会上张群要张厉生、叶楚伧就国民大会及国大代表名额问题，首先说明。

张厉生说，关于这一问题，如两方面仅就相反理由发挥，决不易求得解决。故双方均应开诚布公，为国家打算，以客观的态度来讨论，庶几可以缩短彼此间之距离。我等若只谈各人方面之理由，互不相让，各执一端，则不仅意见不易一致，亦无补于问题之解决。张厉生继就国民大会之职权及旧代表问题发言说，国民大会职权依照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实不过为结束训政，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之日期而已。至于依据宪法产生政府，乃为第二次国民大会之任务。但为提早实施宪政起见，第一次国民大会除制宪外，并行使宪法赋予之职权也有可能。至于已选出之国大代表，皆依法经过一定之手续产生为合法之代表。如现时政府忽又不予承认，另行选举，不但有失政府之威信，而且已当选之代表将自行组织，另行集会。如此更增加国家之困难，不可不慎重处理。

周恩来同志提出，就各区域内代表名额再增加三分之一实为补救之办法，并问叶楚伧的意见。

叶楚伧答，此事甚为困难。

张厉生说，目前即行普选，势必使社会纷扰不宁，决非建国当务之急。

王若飞同志指出，蒋先生主张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此乃重大之措施，吾人不得不慎重从事，而求真正合乎民意，以免各方面指责与批评。现在一般人说，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故我们认为蒋先生此一重大措施，不可不慎重行之，最好能重行选举。

叶楚伧说，国民代表自当选以来，由于时局之限制，实际尚未能废弃其职务，故不得认为任期届满，仍应维持旧代表有效。

张厉生说，关于这一问题，各方面之理由皆持之有故，然实际上不过一形式问题，民主政治乃是一种形式，实际运用，在于各人之方法如何耳。如有适当之方法，必可名实兼顾，而求得合理之解决。

周恩来同志提出，国民大会之任务，不外下列三点：（一）制宪——制定妥善之宪法为全国人民所赞同；（二）行宪——乃国共两党合作而非代替包办，故大家也可同意；（三）选举总统——即一致选举蒋先生为大总统，此点毛泽东同志也同意。此乃国民大会之实际意义。至于代表之选举虽为形式，必求合乎民主，我党对于过去并非普选所选之国民代表，向未表示同意。现在如不重选，则于本党之一贯主张，殊难通过。我党对于国民党政权之拥护，阅十年如一日，而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不经普选，则我党一贯不敢苟同，故要我等承认已选之代表，殊为困难。既然如此，则不如由两党提出一联合名单，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而其它党派也各派代表若干名。

张群说，兄等已承认国民大会代表重行改选，国民党仍占多数。即以恩来兄刚才所说，提出联合名单，国民党亦为第一大党。如此则无论形式如何，而兄等所承认之事实始终未变，何必重选。且我以为即不重选，亦非无法补救，而全国普选尤非易事。故余以为吾人不如在承认原有代表的原则下，另想补救办法。此补救办法，即在二百四十名中央名额与其他四百八十名代表名额中，以求得适当之解决，均无不可。为免牵一发而动全局计，最好能在不改变法令的原则下，以协商的方式谋求补救的办法。

邵力子说，如采取此种办法，本党已作最大之让步，而同时顾到中共的主张。若必须坚持重选，则原有之代表必坚持异议。

鉴于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旧代表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同志即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周并说，我方已提出政治会议的办法，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可否由政府提出一解决方案，以便讨论。

这次会上双方对国民大会代表普选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同志提出取消特务机关问题。他说，今天趁内政部张部长在此，可否谈一谈取消特务机关问题？邵力子接着介绍了中共对于这个问题已提交的建议。张厉生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未予讨论，商谈遂告结束。

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蒋介石官邸同蒋介石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商谈。

午后三时半，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在中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进行商谈。主要议题为：（一）国民大会；（二）政治会议；（三）施政纲领；（四）各党派参加政府；（五）承认解放区。在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上，双方作了一般性的商谈。

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可新增加的代表名额有限，若重新遴选之名额中除去妇女界与新闻界及其他团体请求增加之名额外，所余者为数很少。中共代表提出两点意见：（一）国民大会势须延期召开；（二）国大代表应重选，并要求修改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实行民主自由与普选。

对于解放区问题。张厉生首先提出，在中共解放区内，各党派亦应参加地方政府。

周恩来同志说，我等本来有一民主的方案与我党主张联合政府的精神是一贯的。但因联合政府之议不为中央所采纳，而且蒋主席一再指示我等应以革命精诚坦白之精神，切实解决问题，故直率的提出有关解放区之几点。须知现在本党控制之下有十九个解放区，政治上已实行减租减息、民选政府。我们对此一事实上的问题如何解决？前次为顾及事实并本互相让步之精神提出建议，而文白兄（张治中）谓我等要求数省之主席乃为封建作法，我等实不能同意。然吾人为顾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未实行普选以前，不单独实行普选，故有此次切合实际之提案，主张某些地区已由中共负责者，即由中共推荐主席，然其他党派仍可以参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如此，则即可促成彼此之团结与国家之统一。而本党重划省区之议，亦已有此提案，不再提出讨论矣。我以为我等此一办法，极切实际，中央如能采纳，自不必形诸文字形式，要在有一致之协商与决定而已。总之，关于解放区问题，我党在尽量让步，以期依据中央统一之政令，求得问题之解决，以促成我两党之合作。

王若飞同志补充说，关于解放区问题，并非我方要求政府重划地区或分割省区，而是我方已有此种区划存在，且其所实行之减租减息与民选之制度，亦已为当地人民所拥护。故雪艇先生（王世杰）主张有功之文武人员，政府亦可以任用一点，犹不足以满足人民之期望。我等以为欲解决解放区问题，惟有两种办法：一为普选，请中央承认人民所选举之地方政府；二如中央以为不能有少数省区实行此种特殊之制度，则惟有采取我等现提之办法。

张厉生说，我以为政治是与军事相连的，一省一区之内有政治问题、亦有军事问题；倘军事问题能获解决则其他亦必可解决。唯有一重要之前提，即须我们两党有互信，对于建国前途有共同的认识。

张群说，在各收复区成立一人事整理机构，是为解决地区问题之一办法。

本日所谈五项实无进展。

九月十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的推选、军队缩编和军队驻地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

张群首先提出，今日我等商谈何事？

周恩来同志当即问道，关于省区问题，兄等有无方案提出？

张群说，今天中午在便函中曾向蒋主席请示。承示日前蒋主席与毛先生所谈者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即指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关于省县行政人员，中共可以推荐，中央当本“用人唯才”精神，予以任用）。兄等本月三日建议案内关于省区之拟议与国家政令之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我等亦想不出任何办法，不知兄等意见如何？

周恩来同志说，蒋主席所提示者，仅为一原则，具体办法如何？范围如何？仍可商量。例如遵照蒋先生之指示，或由下而上，根据民选之结果呈请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核委，二者似可择一而行。如嫌我方提案太具体，则只须两党协商即可。周恩来同志以山东中共解放区迄今收复的八十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县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为例，说明中共办法切实可行。

张群说，山东已有中央任命之省政府，中共所占各县，自亦有省府委任之县长。

王若飞同志说，中央虽委有县长，但皆未进入县境，一如过去东北四省主席远离省境，

驻在重庆者然。

周恩来同志提出，依照蒋先生所论，采用我方建议之办法则山东省府委员、厅长可由中央委派，亦可由地方推荐，使各方面皆可参加。而主席由中共人士担任，负责主持省政，此乃由上而下之办法。如此法不行，则可采用由下而上之办法，实行民选政府，呈请中央任命。周恩来同志说，我方所要求某几省由中共任主席，某几省由中共任副主席，并非一党包办，乃系与各方合作，中央固可派人参加，地方贤达亦可参与。不过由中共负主要责任而已。

国民党代表对此办法表示反对。张群说，中央政府本着国家政令统一之原则以任命省市地方行政长官，如须划定何者由中共任主席，何者由中共任副主席，此乃有悖政令之统一，政府不能接受。

王若飞同志指出，我等要求划定省区，乃就既成之事实协商解决之办法。

张群说，根据蒋主席之意见，各省地方用人，应由中央政府依照法令规章办理，即令人事上特殊情况，须予照顾，亦不能以此作为谈判条件，以此来限制政府。

周恩来同志表明，中共方面之建议案为国民大会召开以前之过渡办法，在国民大会之后，宪政实施，即可实行全国普选。

王若飞同志说，中央依据政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中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加委，并未有违政令统一之旨。我们所提之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吾人以为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须经过此必要之步骤与过程方能达到。

张群提出将中共要求之四十八个师的军队再行缩减，并问我们军队所驻扎的地方是否就是解放区？

周恩来同志表示，将来中央军如果缩编，我军自须缩编。而我党之军队，当然驻于现在之解放区，不驻他处。

王若飞同志说，我方之军队将集中于淮北和黄河以北。至于湖北、广东等地的军队，皆将撤出。

周恩来同志请问国民党代表，我们谈话已有两周，中共为谋求问题之解决一再让步，不知政府对于此事，除已提出原则外，尚有其他意见没有？

邵力子说，你们的军队问题，可否与善后复员问题合并研讨办法。现在即依中央之规定编为十二个师，其他编余人员，可以从事农垦与建设工作。如此则中央之整军工作，必可加速进行。

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方一百二十万军队，若要一旦裁减为十二个师，实不可能，故必须分期实施。我等盼望本月份内，双方谈判能将问题解决；解决之后，执行时期至少必须三个月。此三个月之过渡时间，我等如能将军队裁去一半，亦可使国内人心大安矣。果真此点能作到，则明年即可还都，召开国民大会，施行宪政，编整国军，岂不甚好。

张群说，日本投降之后，蒋主席邀毛先生来渝，其意在共商大计，解决国是。但商谈内容，在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故上月二十八日毛先生抵渝后，蒋主席即告毛先生，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两周以来，我们会谈亦是尽量听取兄等之意见，研究何者双方可以同意，何者不能同意。但兄等所提军队问题与中央规定

相距如此之远，实无法再谈。又如解放区问题，余非不了解兄等意见，然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故此两者均未获得协议。且尚有一事须为兄等告者，我等此次与兄等会商，乃奉蒋主席之指派，而蒋主席此次之所主张，尚未提经党和政府讨论。蒋主席须对党与政府负责，吾人不能不体谅其困难。兄等自谓已经让步，并声明此乃过渡之办法。然蒋主席对于各种核心重要问题，均已有明白表示。对于军队之缩编，收复区行政人员之任用，均已从宽。要贯彻政令之统一，即不能完全承认兄等所谓既成事实，盖就中央政府立场而言，凡国境以内不容有两套相反之法令制度同时并行。

周恩来同志指出，我解放区一切行政设施并未脱离三民主义之范围。就制度言，我们并未要求改变中央之制度，而依照中央之规定；就政策言，我方所推行者，都是中央过去所颁布者，其实施情形，可以派员分别考核呈报。故解放区之法规制度与中央并无不同之处，在此原则之下，由中共方面推荐人员，请中央加委，并不违背蒋先生之主张。

张群说，兄等主张凡中共建立之区域与政权皆须保留，人事不得变更，省府主席亦须由中共推荐。换言之，即中共一切制度人事与组织皆不变动，又须中央承认，而谓与中央法令并无不合之处，此我之所不解者。就制度而言，在实行县制之县固可以实行选举，然省级人员皆须由中央选择委放，但兄等现在之主张，显然欲于中央制度之外，另外规定，以拘束中央之用人，此中央所不能同意者也。至于双方现行之地方制度，大体上无甚差异，不过名称有所不同；所不同者，按中央法令规定，户长会议，每户只户长一人参加，而你们现在所实行者，一户之内凡及龄之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县以上，中央之制度为专员，而中共方面为区主任，区主任可当专员之选者，兄等亦可推荐。总之，在符合中央政令统一的原则之下，一切事情皆可以双方默契求得解决。

王若飞同志说，凡解决问题，必须承认事实。我党现在所提之办法，为由训政进入宪政，由一党专政进入自由普选之必要办法，亦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以避免内战所应采取之必要步骤。政府如能采纳，则边区可以归原省区，政令亦可统一。我以为政府之法令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为容纳事实，有时且有变更之必要。

周恩来同志强调说，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了重大让步，如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承认国民政府之统治权，国民大会代表如不重选，国民党固为第一大党，即今重选，国民党亦能得多数，故国民党前途已获保障，决无动摇。以军队而论，现在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三个师，而中共只要求四十八个师，尚不及六分之一，故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吾人深知，目前共产党固不能打倒国民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煞共产党，我们此次所提之十一项建议，仅为一过渡办法，较之八月二十五日我党所发表的六大原则已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在此，我等随时可以请示让步办法，所以会谈容易进行。

王若飞同志指出，谈判必须承认对方之地位，尊重对方之意见，始能接近。蒋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何以尚不能解决问题，乃因有事实上的困难在，如不顾此种困难，则即令我等接受，亦行不通。我中共之军队，乃历史之产物，即要裁减，亦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与步骤，且整编之后，亦非永远为中共的军队，将来全国整编军队，仍可以公平合理之原则，整编为国防军。其次，关于地区问题，我党之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之地区，乃是一大让步，现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三线之郊区等，皆有我党之军队，我们将考虑予以撤出。现我党所提十一条，实充满让步之精神。国民党对中共的忍让求全精神不予顾及，仍坚持只给十二个师的编数，自难求得问题之解决。

张群说，兄等方案提出之前，政府考虑只给几个师，今即允为十二个师，已实为顾及中共之困难。而今兄等提出仍要四十八个师，与政府相距实在太远，可否提出新的修正。

周恩来同志说，政府只准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目前甚难办到。我方所提方案，乃第一步在国民大会以前，将一百二十万军队裁减为四十八个师，将来随国军之缩编而缩编，自可再为减少。

张群又提出，可否将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合并讨论，拟定具体办法，作一次解决。现在兄等所谓淮北尚有范围，至于黄河以北，则包括之地区未免太广。故最好按军队数目之多寡以定其驻地之大小，如此则军队问题解决，政治问题亦可连带解决。

对此，中共代表表示可予考虑。

张群提出继续商谈国民大会问题。周恩来同志说，我方的主张是延期召开，重选代表。但政府的困难我方亦承认。现在且听各方面对此问题的反映如何，同时盼望政府提出具体方案讨论。

张群说，关于国民大会与政治会议问题，我等都已经详加商讨，现在可以听取各方面之反应与意见。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请兄等重加考虑，并盼转告毛先生可否提出修正案。

本次谈判至此结束。

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同志同蒋介石、赫尔利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九月十九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主要就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同志首先就上述两个问题提出方案。他说，昨晚与今日上午我和毛泽东同志讨论结果，有二事奉告：

第一，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共军队之比例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比例考虑愿让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在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为四十三个师（较九月三日所提方案让步五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如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应为十师。中央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为二十个师。

第二，关于军队、军队驻地与解放区三者，岳军先生提出此项议案一并讨论，我等亦表赞同。我等拟将海南岛、山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其专员、县长均由中共委任。

以上为我方之新方案，兄等有何意见？

对此，张群一方面说，兄等所提之新方案甚难考虑，一方面又说余等也无何意见，只等

请示蒋主席决定。接着提出发表《会谈公报》问题，要大家讨论。

接着张治中说，关于军队问题，兄等要求太过，不必讨价还价。余以为此一问题，非距离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不同的问题。中共之观点，以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谓统一亦分裂之统一。兄等试想：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即就军队数字而言，民国二十六年中共要求编为三个师……后到民国三十二年要求增为十二个师，去年要求增至十六个师，事隔一年，现在复要求增至四十八个师，较之抗战初起之三个师，已增加十六倍。兄等所要求者距离中央所能允许者如此之大，复何能讨论！

王若飞同志当即指出，现在我方官兵都极愤慨，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能生存发展。

本次会谈到此休会。

九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

张治中首先就国民党方面对我军整编及驻地问题，作了系统发言。他说，关于军事问题，我方政府各负责同志谈及兄等所提出之新方案已有所让步，对毛先生与兄等企求解决问题之苦心，以及所感受之困难，深为谅解。委座谓中共之困难，即是彼之困难，彼必须设法为之解决。其意亦谓彼之困难，亦即是中共之困难，切盼中共方面能够体谅时艰，协助政府及早促使国内真正完成统一团结。今抗战之后，军队正须整顿缩编，而中共尚要求扩充数额，政府殊难予以考虑。须知军队扩充如此之急，决非良好现象，将来宪政实施时期，亦必不能藉武力作为党派参与政治之保障。国家在和平时期不能多设常备军。敌国日本战前常备军亦只七十个师，我国战后国防常备军额最多恐亦不能超过九十或一百个师。委座现许可在军令统一原则之下，编中共军队为十二个师；并为顾及中共之困难，此数以外，尚可增加数个补充师，兄等应可满足矣。余之意见，兄等拟出军队数字，至多亦不能超过兄等去年所提出的五个军十六个师。至于前日兄等提出的按照比例数字来决定数额，无论其为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皆不适宜，且反于中共不利。故不如直截了当确定数额为愈。

其次，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北平行营之人事。即令为顾及事实，必设置行营一类之机关，亦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之名义，以便统帅指挥。

再次，关于军队驻地。兄等所希望为哪几处地方应具体而明确的提出来，中央可予考虑，而不可笼统的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至于兄等所谓“解放区”或所谓“何者应由中共推荐主席”一节，我等研究之结果，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何人堪充专员、县长，尽量开列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何人任专员、县长。前天我讲话时，曾说明我们的根本观点不相同，我今天深觉当前国家局势，急须结束军事。而最首要者在解决两党间之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又须培养信心，故兄等所提出方案，不能不使人怀疑，乃至有碍信

心之培养。即如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实际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王若飞同志说，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说，文白先生所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说明双方对于努力求得问题之解决，其态度是一致的。我方提出之建议方案即是如此；（二）彼此应互相体谅彼此之困难，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互谅之精神求问题之解决，我方亦有同感；（三）彼此根本观念之不同，此确属事实。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但吾人今日既言民主团结，彼此即应立于平等地位，若谓"我的是我的，你的亦应当给我"，此非民主。即如昨天毛泽东同志与陈立夫先生谈话，陈即以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共图新中国建设等语相告，即系完全抹煞我党之地位，而为代表国民党之观念与精神。果如陈说，则我党一切皆应当交与政府方始满足。殊不知我党所有军队、政权，并非不愿交出，倘依去年我党之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一切军队与政权皆可交与政府处理。倘能如此，而我党仍保持有一点特殊性，即为我党之不对。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全军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关于军队数目一项，如依我方所说七分之一之比例为标准，则可将最初之数字与最后之数字一次解决。且双方以此比例相约束，足资凭据。况且武器装备都操在中央政府之手，对于所编中共军队可无顾虑。力子先生谓不如先决定一最后之数字，此办法亦可考虑，但须具体制定达到此最后数字之实施步骤。如兄等承认我方提出的实施步骤，则我方考虑后，亦可提出最后的数目。北平行营已经设置，另设地方行营亦可。至于我方推荐省主席等人选由中央任用，而不必指定省区，此事与民主普选之精神不符。中共在某一省，如无集中之党员与拥护我之人民政权，仅推荐一主席殊无意义，此不过为安插干部而已，非我方提案之初意。

王若飞同志说，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国民党所谓统一即是服从，而我党则主张团结合作，平等协商，互相尊重彼此的地位，此为我党谈判应有之态度。我前天所说汉奸伪军已获得委任，而抗日军队反不获承认，对于这点大家都很愤慨。这一点，现在解放区一般干部与人民，确有此心理。他们抗战八年，守住大门，以掩护后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其地位反不如汉奸伪军，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政权，而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取回政权。要解决"解放区"问题，其合理办法，首在承认事实。如河北、山东、察哈尔、热河四省以及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完全为我中共所领导之军队与人民，此等地区早已实行民选，自乡而县皆有民选之议会与政府，省之一级亦可自下而上选举政府，此种事实如不蒙承认，可重行普选，依照三三制各党派皆可参加。选举结果再请政府委任。我方因为遵照蒋先生之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所以不提普选，而提出前次之建议。如此，我方若干边区可回复原来之省区，而在各省之内，中央仍可驻扎军队。如今日已收复之青岛、北平、天津各大城市，中央已派遣军队进入城内，由此可知我方所举各省区，并非由我党一党包办。我方提案已作很大之让步，目的无非在避免

内战。

张群说，若飞兄所说汉奸伪军已获委任，这是因为他们在抗战期间反正投降过来，将功补过抵罪，只要有利于国，何不给以自新之路。中共军队乃一整体，现在中央请兄等来协商即是要确定具体办法，加以整编，而并非不予承认。所谓蒋主席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委任，蒋主席之意见是说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政府对于中共所推荐之人员亦可任用。但并未如兄等所说规定几省区必须由中共推荐主席，此点请不可误会。我以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正是军队。就承认党派合法、平等合作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因此，我们谈到军队问题，亦不可将军队驻地与省区和省之行政混在一起。中共军队经此次协商，由政府整编之后，可以定出几个驻扎地点，但不可专划省区；否则，如将军队与省区地方行政混而为一，则对外有割据之实，将何以自解。

王若飞同志指出，你所持的观点仍然是没有承认我方的事实。你们国民党作了些什么？今日的问题，要看全国的民主实行到何程度，如能实行民主，问题即易解决。

邵力子说，兄等所说要求承认事实，我以为现在中国重大的事实就是不要打仗。兄等说“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的政权，现在政府要从人民手中取回政权”，此话殊为不当。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就是政府的人民，中华民国的土地就是政府的土地，政府职责所在，就有权治理。兄等又说，根本观念不同，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观念不可有。兄等以为只有你们才是民主，而我们政府与国民党乃非民主，这个观念我劝兄等必须改变。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省区分开，军队不干涉地方选举亦属毫无问题。但选举必须自下而上，从乡区县直至省主席，均可民选。他进一步指出，用民选方法来解决“解放区”问题，最为理想。因为蒋先生曾有中共可推荐人员由政府委任之指示，因此我方才直率的提出解决省区之办法，使上下能衔接起来，现在我等商谈，症结不在军事，而在省区问题，彼此有距离。过去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和平建国期间，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商谈不能拖延，也不容僵持。

张群说，今天谈话，可以归纳起来，关于军队问题，中共军队之应编数目以蒋主席第二次与毛先生之谈话为准，即除编十二个师以外，另增几个补充师。他强调说，这是政府可能允诺的最高限度，除此以外，别无所谓最初数字与最后数字，亦无所谓过渡办法，以比例为标准之办法也就没有必要了。

周恩来同志即指出，文白先生刚才所提之标准不是五个军十六个师吗？

张治中说，我刚才所提之数字只是说不超过去年兄等所提者，但此数字并未经过政府承认。

时邵力子提出关于发表《公告》一事，征求中共代表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商谈虽已二十余日，但并未了结。应当承认，解决问题尚有困难，但我们决不可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

张群遂将邵力子起草的《公告》文稿交与我党代表一阅，同时说要等本日午后赫尔利返渝商谈之后，方作最后决定。

此后连续几天没有再行商谈。《公告》也未发表。

九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继续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的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整编中共军队问题，商定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讨后再议。然后，张群问中共代表对解放区之解决办法有何新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答复说，我等对于这一问题先后提出过四种主张：

最先主张重划省区，即将现有之解放区使之变为行省，俾现实情形得以接近中央之法令。但我等来渝以后，蒋先生首先提出中共得推荐地方行政人员，由中央加委。我等为尊重蒋先生之意见，遂改变初衷，按各省实际情形，主张在解放区占地最广之各省，由中共担任该省主席，占地次广者，由中共推荐副主席。至于委员之人选，中央与地方人士均得参加。此一办法亦行不通，故提重行选举，由各县民选县长与县参议会，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

前天与毛泽东同志谈及，以为宪法尚未颁布，省级选举暂时不能实行，故又改变主张，暂维现状，即现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若此办法仍不得同意，只有交给政治会议解决。

张群表示，关于解放区问题，兄等前后所提之办法，均有难行之处，即如重划省区，中央决不能同意，因就面积而论，解放区在全国究为局部之问题。其次，兄等主张若干省由中共推荐主席，若干省市由中共推荐副主席与副市长，亦与中央之意见不相符合。中央对于推荐之地方行政人员，虽愿考核加委，然不能由中共指定任用之地区。至于重选加委之办法，则以现在宪法尚未颁布，省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亦未便施行；如必须行之，则法律上之根据殊为薄弱。现在兄等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余等今日之商谈正因为现状可暂维之故也。

周恩来同志当即指出，暂维现状，亦须双方商得暂行之办法。

邵力子提出，要中共注意下述几点事实。

一、山东河北一带之主要城市为济南、青岛、北平、天津等，中央军队正由空运前往受降，中共军队皆不能占领；

二、不能阻止中央在河北、山东一带驻军；

三、中共在山东、河北虽占有广大之地区，然交通线尚在日军控制之下，将来自亦归中央接收，中央必须运用。中共现对平汉、津浦、陇海三路实行破坏，此种举动，不仅使国内之民心不顺，且将使国际之观感不良。

基于以上三点，兄等实不能要求何省应完全归中共治理，即使中央勉强划归中共治理，可事实上亦必产生种种纠纷。

周恩来同志立即说，邵先生提出的"三点事实"与我等之观念颇有出入。我等对于中央此次受降区域与受降任务之规定，自始表示反对，但现在日军不向我缴械，而中央又空运部队前往受降，我虽无法阻止，然决不赞同。至于交通道路，现在虽大部分在敌人控制之下，然我方亦占领若干车站，将来商谈如有成果，我方自应维持，中央有权利用，我方也有权利用。但在商谈未获结果之前，中央除海空运输部队以外，若尚要利用铁道，则我方决不能同意。现在我方在黄河以南之部队已准备撤退，其目的即在便利复员。若胡宗南、阎锡山、李延年之部队要利用新黄河以北之铁路向前推进，我方不能不怀疑其有武力解决解放区之企

图，自然不能坐视。假若我等之商谈已获得结果，军区重新划定，我军也得参加军委会工作，则中央军队要利用铁道运输以达到规定之地位自无问题。

邵力子表示，中共在过去八年之中，与本党共同奋斗，于军事上给予敌人以打击，不能谓为无功，于解放区政治上若干之理想与成就，亦值得政府采纳。今抗战结束，为国家政令之统一，解放区问题必须解决。然中共若要求交通发达、国脉所关之山东、河北各省，完全由中共治理，此亦不可能之事，否则国家之政令即无法统一。兄等若能同意在冀鲁等省将若干大都市之交通路线交中央治理，中央则保证中共过去解放区有利于民之若干政治理想与措施仍得继续维持，则其中必可求得一解决之办法。

张群说，我以为在现存局势之下，不妨实行一暂行之办法，即解放区各县，其县政府成立已具规模，且有成绩表现者，省政府应承认之；同时，县政府亦应承认省政府，彼此互相承认，以求得行政上之协调。俟宪法颁布，省府组织与地位确定之后再行选举。兄等以为如何？

周恩来同志说，县级行政人员重选加委办法，岳军先生今已同意，现在只剩省级行政人员应否选举问题。将来蒋先生与毛泽东同志直接商谈，也许可求得解决。余以为重选加委，总不失为一民主之办法。

张治中说，真正之民主必为全国一致之民主，且必以法律之程序为根据。若以军队为政权之保障，此乃旧式之方法而非真正之民主。

周恩来同志指出，民主统一为现代国家之趋势，然吾人不能不顾及现实。余以为我等所提出之办法，乃适合中国国情之办法。我等所提暂维现状之主张不外从：（一）避免内战；（二）解决敌伪；（三）维持交通；（四）中央与边区政策之协调各点着想。兄等有何意见？

张群最后表示，讲民主当然不反对选举，然在省的制度与组织尚未确定以前，实行民选省长则法律上之根据不足，故在宪法颁布之前，暂维现状之办法，惟有如前述省与县互相承认，不使发生纠纷而已。

九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进行商谈。

商谈开始，双方互报了派出参加军队整编技术小组人员。中共方面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接着双方就召开政治会议代表人选、协议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关于政治会议之协议方式。周恩来同志提出五项原则：（一）平等的；（二）自由的；（三）一致的；（四）公开的；（五）协议之结果有最后拘束力。

张群对第三、第四两点提出异议，认为“公开的”一点不行。说，在问题之讨论未达相当阶段时，须暂缓发表，不能公开，参政会即有此例。至于“一致的”一点，张群认为，规定过于呆板，事实上恐不能成立协议。

周恩来同志回答：所谓“公开的”，当然系指原则而言。政治会议之协议如因事实之需要，何时公开，会议本身自可斟酌决定。至于“一致的”乃为协议所应遵守之原则。吾人即请各代表参加会议，自当尊重其意见，且全体参加会议之代表，必能明识大体，意见上纵有参差，经过协商终能成立协议。

在政治会议的几个原则上，虽双方意见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最后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参加，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三十七名。

十月二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就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区等问题继续进行商谈。

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现有尚未解决之问题为：（一）会员人数；（二）协议一致；（三）召集日期诸问题，希望国民党方面对此三个问题最好能提出一个具体方案。

国民党方面代表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只在出席会议之代表人数、协议一致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笼统意见。为了求得政治会议能够召开，中共代表表示：在中共代表名额上，愿由九人减至七人；在会议召开日期上，中共主张于本月十日举行。国民党代表说"恐来不及"未能同意。其他有关问题，虽有争议，但基本接近。

关于解放区问题，张群说，文白根据延安六月底之地图，解放区仅六十余县，范围甚小，问题不难解决。

周恩来同志说，我方在六月底以前所解放之区域确仅六十余县（指县城占领者言），然在敌人投降前后已增至八十余县，截至现在为止，已增至二百八十余县矣。凡此所占领之县城皆经我方长期之包围，敌人投降以后，复经过战斗，始将敌人歼灭而光复者。

张群说，此中有一区别，即六月以前兄等所光复之县城，迄今已有相当时日，一切政治建设或有相当之规模。至于六月以后占领之各县不过三个月，一切尚在军事状态之中，当然说不到建设。即以选举而论，亦非两三个月之短期内可以实行全县真正彻底之普选者。现在兄等所称解放区中，真正实行选举者，究有若干县？

周恩来同志说，若以实行选举之区域而论，则尚不止前举之数字。南起海南岛，北至北平市，凡解放区中皆已实行选举。因有若干县在其县城克复以前，广大之乡村，早已在我军控制之下，实行民选乡镇长，一旦县城光复，则全县之选举，自易办理。

会上，两党代表还就避免冲突、受降、进兵等问题有所谈及。周恩来同志提出，双方可协商规定若干大都市由中央受降，若干地区中央不再进兵。如能就此成立协议，即可接收交通线。中央如不进兵，则铁道运输之恢复甚易。张群说，中共破坏交通之目的，全在阻止中央进兵。中共代表认为非专为阻止中央进兵，还因现在敌伪常常利用交通线向中共军队进攻，故不得不予破坏。

商谈结束前，周恩来同志提出，中共拟将一个月来的谈话纪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等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

最后张群说，我们月余商谈，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问题意见亦已接近，惟解放区问题，迄无结果。兄等今日之意见，可归纳如下：中央不向若干地区进兵，以避免彼此冲突，如获得协议即可恢复交通；县以下行政人员民选，省级暂维现状。

十月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三号进行商

谈。

商谈开始，双方就政治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国民党代表问及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是否参加政治会议？周恩来同志说，关于我方参加会议人选以及在政治会议中所应讨论之宪法、军事、国大代表与组织法等问题，均要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决定。

接着，周恩来同志提出关于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张治中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用"行政专员区来解决这一问题"。张治中说，凡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联成一片者，即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

周恩来同志说，在苏北、皖北等地可以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自不可与此相提并论。

张群提出中共所指的解放区，多不能称为解放区，其一，建立时间短；其二，多属日寇宣布投降后才占领的区域。

周恩来同志指出，解放区之存在，乃一历史事实。其名义如何，并无多大关系。即称之为民选区亦无不可。岳军、文白二兄提出我方在六月以前所解放之县城仅六十余县，此固属事实。但八月十日以后所解放之各县亦皆夺自敌手，且经过战斗者，此等县城，大部分经过我方长期之包围，其乡镇之选举早已完成。故一旦县城光复，实行全县选举，即无困难。现在冀、鲁、察、热四省大部分均在我手，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我以为现在解放区问题不能解决，仍旧是心理的问题。在中央以为地方如归中共治理，而军队又驻在当地，则一切归中共包办，中央将永不能插足矣。在我方则以为解放区之成立，乃我方多年奋斗所得之结果，诸如减租减息，以及民主作风与制度规模已具，若不继续加以维持培植，而令孙舫鲁、何思源辈主持当地之行政，则未有不为其摧残者。故我主张暂维现状，而将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坦白言之，即欲请国共两方面以外之第三方面人士前往解放区实地考察，看看解放区是否真正实行民主，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则政府又何必阻止地方行政之进步。

邵力子表示，既不赞成省级政府实行民选，也不同意由政治会议派专员往冀鲁考察。他说，何思源等早在鲁境主政，这个事实中共亦应承认。

周恩来同志当即说，中央所委之省府如均在当地领导民众抗战，自无问题。无如冀察热三省之省府，抗战时期均不在省境，而何思源虽在鲁境，然其所能领导之地区极为有限，故我等遂有此主张。为求问题之解决，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再作让步。说，我方在珠江与长江流域之部队，可先行撤退，其它大城市之受降与交通线之维持，亦可规定暂行办法，双方遵守。

张治中说，解放区原是战时的产物，现在战事结束，该当取消。

王若飞同志指出，若谓解放区战后必须取消，则余不敢同意。解放区虽为战时之产物，而所实行者皆为平时之制度与建设。即以民主一点而论，解放区之民主乃以战时发其端，然吾人决不能说民主制度在战后即须取消，其它经济政治文化之措施，莫不如此，皆以民主政治之实施为依据。此乃战时军事以外最可宝贵之产物，政府不可不维持之。

张治中说，兄等现在分省而治之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兄等现在斤斤争论者，恐中央不实行民主。试问大势如此，中央能违背民主潮流乎！

周恩来同志说，中央之趋向民主，吾人固不怀疑，然道路如走得不好，必迟误许多时间，我以为中央用人，不可以党派分界。何思源、孙舫鲁可用，则中共之人又何尝不可用？

邵力子说，中日战争发生之近因，乃因日军要求华北五省之特殊化。今抗战结束，兄等又有此要求，政府将何以向国民解释。

周恩来同志严肃指出，以日本帝国主义比我中共很不适当。我党提出关于承认解放区问题与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五省特殊化问题之要求根本不同。我方所要求者，不过实行民主而已。

邵力子即表示，解放区问题可否照文白之意，以行政专员区解决之，省政府全由中央任命，但人选不拘党派，兄等以为如何？

周恩来同志鉴于再谈下去很难得出结果，表示将此意转告毛泽东同志。并对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同志来此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

张群说，俟蒋主席返渝时，当将毛先生归意及两周来之商谈情形与政治会议商谈经过一并报告。

十月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商谈。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

十月九日

毛泽东主席同蒋介石在蒋介石官邸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主席对此进行说明，不能同意。

十月十日

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进行简单商谈之后，共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晚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至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同蒋介石进行商谈。毛泽东主席提出延缓召开政治会议，于明年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回答，如政治会议能在今年十一月召开，召开国大问题可以考虑。

次日晨，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作最后商谈。蒋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为求国共两党问题之政治解决，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主席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以使《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到此，国共两党本阶段的谈判结束。

（本文根据历史档案参照有关资料整理）

中央关于目前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1、国民党已知我党在东北建立武装，因此，他急于派军队及党政人员到东北和我斗争。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2、庄河已到我军万余人，肖华部最近即可运完，林枫部、林彪、文年生、张启龙，倪志亮、周桓等部及杨国夫师、刘其人师，十天内可到山海关、锦州之线。因此，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主要的）安东二省（国民党的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为此，最近到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尽先绝大部分布置在辽宁（主要）、安东两省，立即整编三四十个团，接收所有县政权，建立民主的秩序，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准备物资，以利作战。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数人员及后到的少数部队前去开辟工作。

3、整训部队是头等重要工作，应将到达的老部队和干部分散，编入你们新发展的八万部队中去，集中在几个军事要点附近争取整训十天，二十天，另以若干经过整训的部队每县每区一连一排的分散到地方去接收政权，进行群众工作，务必在短期内完全控制辽宁、安东两省。

4、省县政权接收后，应立即宣布自己的民主纲领，颁布临时的保护劳工条例、农民土地问题的条例（减租减息），及依照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等进行工作。并立即聘请临时的参议会。并设立干部训练处招收青年学生及工人农民进行训练，分派工作。

5、立即成立工会、农会，召开各种群众大会，提出要求，进行改善生活及减租减息，控诉汉奸的运动，同时在政治上进行要求自治，反对独裁的宣传。要发展蓬蓬勃勃的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革及支持新政权。

6、财政经济，应宣布保护私人企业及一切正当营业，确定税收及货币政策等，在公营企业中劳动工人职员组织委员会管理，设法开工，军政经费的维持，暂时依靠敌产及税收，必要时可征收一部分粮食。军政工作人员的薪水，暂时一般实行解放区的制度，党外人员给以临时的薪金。

7、各项工作你们应有统一的部署，但必须有重心。必须对干部详细说清楚各种办法，使他们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现在你们的计划怎样，望将你们每日所进行的工作简单电告。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党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的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的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六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六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六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关于山东、华中作战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

（一）接陈毅、黎玉二十日电，我山东第八师占领邹县，控制铁路四十余里，歼灭顽伪二千余，并准备歼灭续进之顽。此外，我山东第三第四两师占领大汶口，控制铁路二十里。

（二）希望我新四野战军在蚌埠、徐州间扩展铁路占领区，集中主力歼灭顽军。

（三）只要我控制铁路一段，顽方是一定要进攻的，战斗将愈打愈大。因此，我军第一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第二、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我山东、华中均须以连续战斗各歼灭四万至五万顽军为目标。第三、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

（四）山西上党战役①我以三万一千主力，五万助战民兵、四十天时间，连续举行几个战斗，结果阎顽三万八千人，除逃去四千余外，被歼三万三千余人，缴获山积，可为范例。现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六万野战军，准备歼灭新乡北进八万顽军至少四万左右②。聂荣臻、贺龙集中五万野战军，正在歼灭绥东顽军五万之大部或全部③。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影响。

注　释

① 指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长治（古属上党郡）地区粉碎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一面伪装和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一面同日、伪军合流，调动大军向解放区进犯。八月下旬，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五个师共一万七千余人，在日、伪军配合下，由临汾、浮山、翼城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长治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起自卫，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个解放区的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共三万一千余人，于九月十日发起上党战役。至十九日相继收复长治外围的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四城，接着围攻长治。阎锡山急调八个师共两万余人由太原、榆次南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长治，主力秘密北上，预伏于屯留、虒亭之间地区，十月二日，对进入预伏地区的敌人突然发起攻击，经四昼夜激战，将其大部歼灭。八日，长治之敌弃城向西南逃窜，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立即追击，至十二日晨，将其聚歼于沁河东岸之将军岭、桃川地区。此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人，击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敌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② 指平汉战役。

③ 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开始举行的绥远战役。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山东军区和津浦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依靠近二百万军队，作为他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支柱，我们必须在这一军队中进行有力的系统的工作，方才能够达到战胜他的目的。中央决定在各中央局和分局之下设立国军工作部（对外秘密），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为着使这一工作有效而迅速的开展，除应抽出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主持这个部门工作外，并应调选一批与国民党各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干部，加以适当训练，分配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在这些军事组织之中，长期埋伏，交结朋友（可以而且必须个别的谨慎的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按照工作需要，在国民党军队集中地区或重要城市（如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要派出有力干部，必要时配以秘密电台，就近指导这一工作。为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各中央局分局，必须拨出一定的经费。

中央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并指定王世英同志为部长。为便利于这一工作的进行（对外接洽），并委任王世英为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各中央局、分局的国军工作部，今后应经常与军委国军工作部建立工作和指导关系。

中央关于对付华北美军活动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1、在华美军总部宣布，今后半年内，将有六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六七千陆空人员留置于华北。此项美军留置华北，其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占领各重要城市及交通线，以巩固和增强国民党在华北的地位。国民党将极力利用美军为先锋，以大城市为依据，企图控制各交通线向我各解放区进攻，与我争夺华北。因此，华北沿海沿铁道线及大城市附近之我军政机关，今后与美军人员的接触与交涉，亦将日益增多。为妥善应付此种情况，我各主要地区的军政领导机关，均须有所准备。

2、目前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下，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一贯与美方友好合作的方针，说明我军在各解放区的战绩，及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及解放区进攻的事实，与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3、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1）凡与美军人员之重要交涉，如有关占领，驻防、派遣联络人员到我军内活动等事项，各地应避免就地解决，应请美方经其总部正式向延安总部交涉，经延安总部批准。

（2）凡美军部队强行向我区推进，或协助国民党军队修筑交通，我当地军政当局应即正式通知美方，加以拒绝，同时应有武装抗击其前进之准备。如美军不听劝阻，强行推进，迫使我军不得已而需武装自卫时，我应坚守自卫立场，决不先开枪。

（3）发生此类武装冲突时，须严诫部队注意纪律，对被俘人员不得杀害或加以侮辱，不必强其进行政治性的活动（如讲演、悔过），应实施优待与感化政策。释回俘虏或交换俘虏，均须经过正式手续，妥为移交，以防国民党部队中途杀害，嫁祸于我。

（4）凡个别或小队美军人员，未经事先通知，自行进入我区者，均应询问清楚，登记姓名职务后，礼送出境。

（5）一切正式外交往来，均须注意保存证件、时间、地点、人员、姓名、部队番号，来往公函，均须登记保存，并详告军委。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尤应注意双方的伤亡，缴获武器的种类与号码，俘虏之姓名与号码，我方军民损失情形，拍制照片，作出统计，并迅速报告延安。

（6）在我解放区内的美国侨民（各国侨民也在内），应保护其生命财产，尊重其个人人格，在不妨害我军的条件下，准许其自由，并应向其说明和解释我党我军的政策，欢迎他们提出意见。

（7）在平津、山东沿海、秦皇岛、北宁线周围活动之我军，在旅级司令部内，应建立联络机关，配备少数懂英语的人员，以便随时能进行工作。

4、凡与外交有关的一切情况及活动，必须迅速报告军委。

朱总司令叶参谋长抗议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电文四通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月）

一、十八集团军为烟台美军要求登陆事致美军函

延安美军观察组叶顿上校阁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基于美军计划在烟台威海卫登陆之消息，本人曾受本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之命，经过阁下向美军总部声明下述三点意见：

（一）如美军在上述地点登陆，十八集团军将发现难于了解这一登陆的目的，因为所有这些地方均在十八集团军的控制之下，附近并无日军；

（二）如果美军事前未经与十八集团军总部作任何协商和决定，突然在上述地点登陆，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

（三）因此朱总司令希望美军不要在上述地点登陆，并请求贵军总部予以答复，迄今已经过十天，贵方迄未答复。

兹接本军烟台警备司令部来电报告，十月一日美海军海赛托尔少将之副官长舍尔托夫少校前来烟台，向我方代表声明，美舰士兵不拟在烟台登陆，仅要求允许其士兵在崆峒岛休息，当经双方议定，美军可在崆峒岛西端游息，及允其派员调查美国财产。十月二日本军烟台警备司令部又应美海军军官之请求，协同美海军人员共同勘测烟台海岸，本军均予以极友谊之协助款待。但十月四日晨五时突来美驱逐舰一只，即有美海军陆战队上校军官登陆，向本军烟台警备司令部声称：伊接获美海军上将命令，要其转告我方：

（一）美海军陆战队将在烟台登陆，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撤除沿海防务；

（二）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撤离该市；

（三）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负责有秩序地将烟台市移交美方接管。

朱总司令接获上项报告，不胜诧异，特命令我向贵方郑重声明下列意见：

（一）烟台市早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为本军部队收复，烟台市之日伪军队，早经完全解除武装，市区秩序早复常态，今美军突然要求在该处登陆，我方认为毫无必要。至要求本军部队与当地政府撤离该市，尤属无法理解。因此，请美军总部转报贵方有关司令部转令烟台海面美海军陆战队勿在烟台登陆；

（二）美军如未经与本军商妥，竟然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军方面负其全责。

以上事实经过及本军总部意见，请阁下迅速转达贵方有关司令部，并要求迅速赐复为感。

专此，即颂

军祺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

二、十八集团军为秦皇岛美军向解放区阵地推进事致美军函

叶顿上校阁下：

兹有下述信函，致送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请阁下予以转达为荷。

据冀热辽解放区我军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报告，秦皇岛一带美军向冀热辽解放区我军阵地内推进，虽经我军劝其停止，然该美军部队置之不理，仍强行前进，并强行修筑由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

根据以上报告，余受朱德总司令之命，特向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提出严重抗议：

一、秦皇岛美军对中国解放区之此种行为，若非蓄意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国民党向中国解放区特别是向驻山海关之我军实行军事压迫，即殊难理解。

二、请贵总司令立即采取有效步骤，制止秦皇岛一带美军此类行为，以符贵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历次声明。

三、贵总司令对美军上述行为，如果不加制止，容其继续，则对今后事态发展之一切严重结果，贵方须负其全般责任。

承蒙阁下帮助转达上述信函，特致谢意。

专此，即颂

勋祺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十八集团军为美军士兵进入鄂豫皖解放区事致美军函

叶顿上校勋鉴：

兹有下述关于汉口区域美军战略活动部队四人之函件，送致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请阁下代为转达为荷！

一、据鄂豫皖解放区我军报告，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我黄陂地方部队在横山之警戒部队，突闻前面有枪声，以为敌军来袭，当即派队搜索，发现美人四名及华人一名，自称乃在该地打猎。经问明确系美军人员后，当即就地将其中二美人放回，另美军少校军官一名，军曹一名，及华人一名，被请至我军司令部，使双方都能了解事实经过消除误会后，亦即送回黄陂。

二、中国解放区军队政府及人民，对于一切因正当事故前来解放区之美国人员向持友好态度，对彼等之生命财产，均曾不顾牺牲，尽全力予以保护，此次汉口区域美军战略活动部四人事件，贵总司令未经查明真相，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来函，提出强硬抗议，余深引以为憾。

三、为保证贵我双方之友好关系，及防止误会计，余特重申余之要求：由于各地日军伪军及部分国民党军队现仍不断向中国解放区侵扰（而据报某些向我进攻之国民党部队，为汉口区国防别动队〈又名正义军〉内并有美军官兵在内），愿请贵总司令通令所属，避开敌伪军队及国民党军队向中国解放区进攻之战斗场合。至于美军人员因正当事务前来解放区时，必须先行通知我方，以便连络保护，至希贵总司令了解我方维持友好关系之诚意与努力，对上述办法，予以办理，对将来工作关系，将甚有裨益。

承蒙阁下转达上述函件，特致谢意。

专此，即颂

勋祺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谨启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四、十八集团军为美军查封天津办事处及美机扫射安次军民等事致美军抗议书

致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

一、本总司令部曾接获下列关于华北美军活动之报告：

甲、据报告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全副武装之美军官兵三十余人，将本军冀中军区驻天津英租界之办事处包围搜查，捕去办事处工作人员五人，解除及没收办事处自卫手枪四支，并将办事处之房屋占据，被捕人员被带至美军兵营，由一美军将官讯问，质问该办事处侵占美军房屋（事实上办事处房屋乃在原英租界所租赁者）及秦皇岛八路军不让美军使用起泥船事。同日下午六时被捕五人被释放，但手枪四支被扣，办事处房屋仍被美方强占。当美军将办事处房屋包围进行搜捕时，美方并未出示任何负责机关之证件，亦未说明任何理由。事后该办事处即向天津美军当局提出质问，然美军参谋长拒绝答复，并拒绝退还所缴去之手枪。

乙、据另一报告称，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美军飞机十余架在河北安次县上空盘旋约一小时，当时我军及人民正在露天举行大会，美军飞机突以机枪向会场军民扫射，死伤情形待查明后，另行通知阁下。

丙、据另一报告称，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美军飞机约十架，在河北固安上空低飞，盘旋一小时，并投下一函，限该地我军于三日内退出，否则即进攻该地。

二、关于第一类甲项事件，天津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包围搜查及占据中国军事机关，解除及没收中国军人之武器，逮捕及讯问中国军人，此种行为，毫无疑问乃系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及破坏中国人民之主权者。

关于第一类乙丙两项事件，华北美军飞机扫射中国解放区之安次县城军民及投函威吓固安我军撤退，除破坏中国人民之主权外，更系公开的直接的参加中国国民党军队对中国解放区之军事进攻。对所有上述美军行为，余代表中国解放区军民向阁下提出严重抗议。

三、要求贵方立即恢复本军冀中军区天津办事处之原状，退还所没收之武器，并对华北美陆空军之上述行为，表示歉意。如果今后查明安次我方军民有被美军扫射致命受伤或受损情况时，我方保留要求贵方赔偿之权。

四、余认驻华美军之此类行为，将严重损害中美人民之传统友谊。为保持中国解放区与美国军队及人民之友好关系计，余郑重要求阁下立即采取妥善步骤，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加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解放区之行为。

专此候复　　并颂

军祺

朱　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四日于延安

（原载1945年11月8日《新华日报》）

新华社记者揭露阎锡山滔天罪行

勾结敌伪劣迹昭著之阎锡山，近竟飞往重庆，公然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捏造事端，造谣惑众，本社记者为使社会人士了解山西内情，特将阎氏保护日寇、联合敌伪进攻解放区、屠杀人民的罪行择要报道于后。

阎锡山与日寇往返由来已久，一九三九年冬即有所谓"临汾会议"，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又举行所谓"安平会议"规定"阎日合作联合剿共"等具体办法，今年四月阎氏又与敌三原司令官在克难坡协议，商讨进一步合作方案，至七月十七日敌以胜败在即，乃派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小本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长兼外务厅长苏体仁等一行二十余人，至隰县与阎氏洽商，当于二十三日签订协定，规定山西日军防务逐步交晋绥军接充，日军并抽出一部协助晋绥军"剿共"，而阎氏则保证于日寇失败时充当日寇代理人，负责保护日寇在山西之交通运输、工厂、电灯、电话、电讯事业及其他财产，在此期间晋绥军即纷纷开入离石、中阳、汾阳、孝义等十余县接防，并以四十九师、五十师等两个师全部换穿伪军服装，在同蒲路附近与日军共居，而阎氏本人亦于八月二日进入孝义，着着实行偷梁换柱把戏。

日本一宣布投降，阎氏即又以梁培璜与楚溪春为代表与临汾日军司令官三浦三郎及大同日军司令官板本分别增订所谓"妥定事项"，双方商定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由日军守备，晋绥军掩护铁路运输，并防止八路军之"侵犯"，以使日寇物资容易掩藏运走，而"肃共工作"则由两军共同负责。同时日军、伪军、汉奸，敌在晋的机关会社等即纷纷易帜，实行全面的合流。驻晋日军计划改编为两个师的"志愿师"，长期留驻山西，八月十三日，介休日军二千首先换穿阎军服装，参加晋绥军。山西全省的伪绥靖军，保安队等全部改名为山西省防军，伪绥靖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杨诚受任省防第三军军长，伪山西保安司令赵瑞受任为省防第二军军长，大汉奸温怀光、王乾元分别受任为省防第一军与第四军军长，各地伪警就地"维持治安"，许多汉奸县长如长子的杜文景等，都摇身一变成为阎家臣宰，山西省新民会原封不动只换上"解救人民奋斗团"招牌，大小汉奸封赏有加，分配到阎氏所设各种团体及宪兵队等工作。敌在山西所设之各种株式会社均仍由日人经营管理，同蒲北段及正太路沿线并由日军全副武装占领着，而太原城内竟出现所谓"大日本驻太原领事馆"，其领事近藤到处活动。阎氏在重庆恬不知耻的对人夸耀其"受降顺利，进展神速"，其实所谓"受降"云云，只是合流的别名而已，我们只要举出一个事实就足以揭穿日阎之间这出掩耳盗铃的把戏，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业已两个月有半，马尼拉签署降书亦已将届两个月，全世界各地北起库页岛，南迄新加坡，日军均已先后举行投降仪式，战犯如山下奉文且已就缚，唯独这位大名鼎鼎的阎锡山氏主持的中国第二战区日军竟连投降仪式也没举行一个，而且依然荷枪实弹，横行无忌，宁非咄咄怪事。

阎锡山对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的进攻亦是由来已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即发动围歼新军事变，以六十一军、八十三军、警卫军、十九军、三十三

3

1

军及新一旅等部队，突然攻击在隰县、孝义一带之决死二纵队，及阳城、长治一带之决死三纵队，及在其附近之八路军部队，此为阎氏在山西发动内战之“第一枪”，以后阎氏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不断进攻新军及八路军，其中大规模之进攻有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与四一年六、七月之进攻太岳区，及一九四四年一月六十一军之进攻浮山、翼城、襄陵，三月四十八师、七十二师之进攻浮山，及四月七十二师、六十九师之进攻浮山米家垣等，在抗战第八周年中(自一九四四年七七至四五年七七止)阎氏向我太岳一区千人以上兵力之大规模进攻即有十四次，其中今年四月向我浮山区之进攻所用兵力竟达十个师五个纵队之众。

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八路军即向同蒲、正太、白晋三线敌伪展开猛烈攻势，以巨大牺牲代价先后于八月十三日解放运城之盐池，十七日占领平陆、夏县，十九日占领潞城，二十一日占领襄垣，九月一日解放文水等城市，而长治、长子、屯留、壶关及山西其他许多城市在我八路军或地方部队包围与积极进攻之中，而阎氏竟乘机集中十九军之六十八师、暂三十七师、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在敌第十四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翼城等地向我上党区大举进攻，在进攻中，日阎联军使用一切残暴手段，我军损失甚重。在长子城下，阎军竟施放毒气，使我围攻长子之部队两连指战员全体中毒，我军在守城敌伪及日阎军夹击下，不得已撤围长子、长治、屯留、壶关等城，阎军并从我军手中夺去潞城、襄垣二城，日阎联军入城以后，一切伪军伪组织人员原封未动加官加委。但阎氏尤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九月二十二日命令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八十三军之暂四十九师、暂五十师、暂六十师，二十三军之暂四十师、暂四十六师、暂四十七师及伪十三集团军杨诚部两个师，由太原、榆次出发，配合已窜入上党地区之史泽波指挥部队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至此我军已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奋起应战，将两路阎伪联军击破，恢复长子、长治、潞城、壶关、屯留、襄垣等上党区城市，此为阎氏进扰太行根据地之经过，其他晋南、晋西各地阎氏联合敌伪进攻解放区之行动，不及一一叙述。阎军军行所至，奸淫焚掠，屠杀人民，罪行滔天，八月十三日阎军杨本兰部进入洪洞，竟下令士兵“自由三天”，仅士绅史宪民、常青吾两家即被抢去财物数十万元，史家父子两人且惨遭杀害。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阎部配合日伪军在太原市内先后逮捕市民达八百二十余人，至今生死不明，我地方干部、民兵、抗属之被害者尤众，长子长庄一村地方干部遭阎军之毒手者即达二十余人。山西人民自从民国以来即受尽阎氏压迫，抗战期间阎氏勾结敌伪，荼毒山西，丑史恶迹彰彰在人耳目，在抗战胜利后又复保护日寇，重用汉奸，收编伪军，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屠杀无辜人民，如此民族败类，实为国法所不容，国民政府应即将阎氏明令撤职查办，以整国家纲纪，而扬民族正气。

（新华社延安1945年11月1日电）

真和平与假和平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解放日报》社论

双十协定刚才发表，《剿匪手本》和“剿匪密令”已经从“军委会”和“委座”那里发出来，“手本”大量翻印、密令满天飞舞，不宣而战的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就此爆发起来。从这一个月来的事变中，中国人民是应该得到些宝贵的教训的。

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中国人民需要和平，渴望和平。但是和平有两种，有真和平与假和平。经过四十三天商讨而庄严签字与郑重公布的双十协定，明明写着“和平建国”是“基本方针”，明明写着“坚决避免内战”，明明写着“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些，没有表示自己的信义，自己的君子态度。这些庄严的神圣的东西，对于他们，只是一颗烟幕弹，只是一个假幌子。如果相信他们口里所说的好听字句，如果相信他们所写的白纸上的黑字，那就上了大当。现在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在十月十日所允许人民的和平乃是一个假和平。国民党当局想抵赖这一点，是再也抵赖不了的，因为这是证据确凿的事情，既有人证，又有物证。

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现在还要和平，但是，我们中国人民经过一番痛苦教训之后，要千万牢记一条真理，这条真理就是：我们不要和平则已，要和平就要一个真和平，绝对再不要一个假幌子的和平，烟幕弹的和平。我们要善于辨别真伪，我们决不可再上大当。

现在又是一种矛盾的复杂的情况涌现在我们面前：国民党一方面召集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另一方面据说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求得和平。双十协定上讲过一次然后立即又被国民党当局自己破坏了一次的和平，现在又抬出来了。我们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既然上当一次，就不免学乖一点。我们不希望别的，只希望这次得到一个真和平。为此目的，我们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做出几件事情来，让我们老百姓好相信你的话是真的，是并非烟幕弹，并非假幌子，是真正庄严的，真正郑重的，真正言不二价的，真正再不会象双十协定一样，口血未干就被撕破与违背的。孔子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句话现在对国民党也用得着，国民党当局的“言”是不能叫人相信的了，请拿些“行”出来看看，老百姓才会相信你。

为了求得真和平，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立即实行下列数点，以恢复自己的信誉：

第一、下令取消一切“剿匪”密令，收回一切《剿共手本》。

第二、停止进攻，停止占领，并将军队从许多解放区城市撤出来，退返原防。

第三、停止运兵，因为向解放区运兵，就明明白白是进攻解放区的准备。护路问题必须

公平合理的处理，国民党以前的规定，以傅作义担任平绥路，以阎锡山担任同蒲路，以胡宗南担任正太路，以孙连仲担任平汉北段，以陈大庆担任陇海东段，以李品仙担任津浦南段，以李仙洲担任津浦北段，以李延年担任胶济路，甚至吴逆化文也用来“警卫”徐州到蚌埠的铁路，日本军队也用来“保护”同蒲路和正太路，而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交通毫无护路之权，这不但是不公平，而且显然要扼住解放区的咽喉，以便消灭解放区，这是万万不行的。

第四、必须公平合理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地区。现在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解放的地区，敌军伪军百分之百缴了械；而在华北美军与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敌军缴械者仅百分之六，伪军则不但一个也没有缴械，反而加了“国军”的新番号，日军伪军都变成了“中央军”，这是不成体统的。

解铃还仗系铃人。现在的内战是国民党当局所发动的，有无诚意实现和平，要看国民党。人民是渴望和平的，但人民渴望的是真正的和平，不是假和平。人民已经又增多一次经验。如果谁在敢于再来老一套，那是不行的了。

我们对国民党当局忠告：你们现在还在骗美国政府，说中国人民没有力量，说“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消灭共军”，你们用这样的骗术来煽起美国某些人们的不顾一切的帮助，把美国拖进你们所发动的中国内战的漩涡里来，越拖越深，然后再说。你们这种办法，是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在使全世界不得安宁，不得和平建设。我们警告，你们的“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的如意算盘，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决不会让你们成功！美国广大人民和政府中的开明人士，知道你们的骗术之后，不会长久让美国上你们的当。你们所得到的结果，会是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但是，中国人民还是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尽力以求的，只是和平，和平，再一个和平！

〔附〕 国民党调动二百万大军发动全面内战的真相

本报特讯　国民党当局自日寇投降后即已开始发动的全国性大内战，迄今已达三个多月，中共方面虽竭力让步，并再三提出全面停战办法，以求和平统一的实现，始终不得解决。经过此次军事会议后，全面“清剿”计划既未停止，各路进兵又复加积极，因此，内战更有日趋扩大的可能，全国有心人士均为之忧惧不已。现在国民党各报纸及中央社正致力于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宣传，以图诿过于人。记者为使国人了解真相，特就八月以来国内军事演变的主要经过综合报道于下：

受降其名　联合敌伪其实

八月间敌人投降以后，国民党当局对于在华敌军，备极优容，尽人皆知。为了压制人民对于日军的攻击，国民党政府公然命令敌人在各地“维持治安”，受降以后，仍给予“自卫”武器。这种情形，在华北尤为严重。山西的敌军，甚至至今还没有举行过投降仪式，也

被宣布为已经“受降”完毕。华北各省敌军大部均未缴械，且受命积极进攻各省人民的抗日军。至于伪军，则长江以北黄河两岸至今没有一处被国民党政府解散过。伪军的全部首领在日本投降后都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委任，现在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李守信、王英等绝大多数的伪军首领，仍以“国军”将领资格在各地进攻解放区。阎锡山、傅作义、何思源辈，近日所称“收复”被各省人民抗日军所解放或围攻的城市，无一不是如此经过敌伪军合作而“收复”的。如果敌伪军也可以“收复失地”，则“七七”或“九一八”以来，我们就本来没有什么“失地”，又何用其“收复”？试举一个眼前的例子：在苏北的盐城，中央社近亦宣称该地“国军”被“猛犯”云云，但是中央社何以不宣布该地“国军”属于何部？原来这是宣布不得的，那里的“国军”不过是伪第二方面军孙逆良诚部伪第四军赵逆祥云的伪军罢了，而伪军为什么不应该“猛犯”？政府既拒绝承认有利用敌伪军的事实，又拒绝执行解散伪军的诺言，又让敌军继续保持武器，在人民反抗敌伪军时又宣布为“猛犯”，宁非矛盾百出？！

谈判其名“剿匪”密令其实

八月底毛泽东同志应邀来渝，与蒋主席商谈和平建国大计。在谈判期间，中共不惜再三让步，以求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实现，与解放区问题的合理解决。但是，政府方面对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原则，虽然无法反对，对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具体问题——解放区问题，却始终没有循政治方法解决的诚意，以致一面谈判，一面仍在联合敌伪进攻解放区。九月十七日，军事当局更向各地发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剿匪手本》（该书的警句是“赤匪不灭，军人之羞”，而书中所说的“剿匪”秘诀，则是实行所谓“革命军连坐法”：“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班长不退而全班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以上类推，“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作为进攻部队的教本。十月十二日，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发表，而十月十三日，军事当局竟又向全国国民党军队发出密令，说“奸匪”“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因此必须“遵照……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建功于国家者必膺懋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绳”。试问政府既视解放区军民为“奸匪”，必须“努力进剿”，否则就要执行连坐法，还有什么政治解决的诚意可言？中共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拒绝又何足怪？而且政府既视中共及解放区军民为“剿除”的对象，则所谓“会谈纪要”也者，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也者，究竟是闹的什么玩意儿，思之重思之，岂不令人不寒而栗？！

大举进攻　全国一片血海

“剿匪”命令既下，各个有关战区一齐大举出动，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内战就愈发扩大了。各个有关的主要战区及其所用兵力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十个军，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七个军，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五个军，孙蔚如的第六战区——五个军，余汉谋的第

七战区——两个军，李品仙的第十战区——三个军，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九个军，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四个军。此外，还有不属上述战区六个军，人数共达五十六个军，加上挺进部队及奉命参加内战的敌伪军五十万人，共约二百万人。现将各战区进攻方向简单介绍如下：

第一战区：该战区的第十六军与第三军攻入河北解放区，占领正太路，其十五军、九十军、三十六军、七十八军、二十七军、八十五军及第一军之一部等均在陇海路两侧及平汉路上，配合伪军进攻和“清剿”河南解放区，其三十八军现在徐州方向进攻中。

第二战区：其三十四军先后进攻山西之夏县浮山一带解放区。其十九军、六十一军、三十三军各一部及由伪军杨诚部改编的省防第三军，配合敌军曾大举进攻晋东南上党解放区，并在长子施放毒气。上述三个军的另一部则留在晋西配合日伪军与政卫二师三师进攻我军。其骑一军配合日伪军在大同附近“清剿”雁北解放区。

第三战区：其七十军、四十九军、二十八军、二十五军，分别进攻撤退中的浙江新四军“清剿”浙东与天目山解放区。

第五战区：其四十七军、五十五军、六十八军配合敌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其四十一军与六十九军进攻豫南新四军。

第六战区：其七十七军、六十六军、七十五军、七十六军、十八军正用以“清剿”整个湖北解放区及新四军部队。

第七战区：其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之大部攻占广东东江以北整个解放区，现在“清剿”南岸。其另一部分别围攻粤北始兴与粤东韩江的抗日纵队。

第十战区：其第七军与四十八军配合伪军进攻皖中的新四军，其八十四军进攻鄂东的新四军。

第十一战区：其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现已退出内战），曾配合伪军孙殿英部进攻豫北、冀南解放区。其三十二军正增援中。其骑二军及第十二军配合日伪军进攻山东解放区，进攻时并用飞机扫射。其原驻豫皖的五十一军、九十七军均在向山东北进中。第八军现正海运青岛，准备进攻胶东。

第十二战区：其三十五军、晋三军、六十七军与东北挺进军，于八九十三个月间联合敌伪进攻绥远与察哈尔解放区。

各方面军：直属中国陆军各方面军的新一军，现在与第七战区共同进攻广东东江解放区。新六军空运南京后，现在进攻苏北解放区。九十四军空运平津及十三军、五十二军海运秦皇岛后，现正在美军协助下进攻山海关。原属六战区的九十二军空运北平后，现正用以增援对山海关方面的进攻。

关于这些战区的进攻与“清剿”的计划，解放区军民现已获有丰富的实证，除一小部分已在本报发表外，其余在必要时亦将陆续发表。

停战要求政府不愿接受

对于这个二百万大军的全国大举进攻，中共方面始则隐忍退让，希望恢复和平，继而在万分不得已时，才忍痛予以自卫的回击。解放区军民究竟有什么罪呢？他们的罪，就是在八

年抗战中始终没有做汉奸当伪军，没有观战避战，日蹙百里，就是拼死命的打日本，就是实行了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罪呢？他们现在要求真正解除日伪军的武装，他们要求按照和平民主的方法实现全中国的统一，但是国民党当局在实行“爱敌人”的时候，却把他们看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不在“爱敌人”的范围以内。中共认真实践了十月十日“会谈纪要”中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却把“会谈纪要”完全丢开，好象没有这回事似的，甚至不让中共实践协议，譬如不让新四军撤退，说是新四军这个军队早就解散了，现在根本不存在。内战扩大以后，中共再三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停止进攻，国民党军从一切进占区撤回，在一切发生战争区域铁路运兵经过协议，双方军队均离开铁路线，国民党停止利用敌伪军。但是政府却拒绝了，那么很显然政府是不愿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战斗的，是不愿从进占区撤回的，是继续要利用若干铁路来进行内战的，是继续要让敌伪军手执武器进攻解放区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却口口声声责备解放区军民的“进攻”，因为解放区军民就应该束手待毙，而不该延缓他们“剿除”的计划吗！

虽然如此，中共对于和平的奋斗是决不灰心的，无论一时环境如何困难，中共深信，中国的和平统一在经过一个苦闷时期以后，仍然是要到来的。中共决心追随在全国人民与全世界关切中国和平民主的人士之后，随时追求一切恢复和平的希望，并准备战胜一切障碍，使内战制造者的幻想屈服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现实意志之下，从而让一个安定的强大的埋头于建设的中国，出现于世界。

（原载1945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国民党正以强大兵力布置进攻解放区，已到进攻准备位置者，计有四十四个军，另有若干个独立师；尚在战略开进中者，计有十个军，除伪军及独立师外，共有五十四个军。其中有三个军对陕甘宁边区，五个军对东北，五个军对豫鄂李先念区，实际进攻华北、苏北者还有四十一个军及若干个独立师，并准备空军广泛使用，企图控制所有铁道线和沿线城市，分割我解放区使我处于不利情况下，来逼迫我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一反民主、反人民、反和平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即将爆发，不粉碎国民党军这一严重的反革命军事进攻，中国的和平民主即很难实现，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的动员起来，作一切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民主，保卫人民既得利益而奋战，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2、为贯彻和平民主的方针，为揭发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必须在全党全军中，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中，广泛开展反内战运动，发动广泛深入的民主讨论，使解放区每个人民，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深切了解发动内战者是谁，从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一贯的内战反动政策，在抗战中消极等待胜利，且无数次发动内战，八路军新四军处在敌后毫无接济，坚持八年艰苦抗战，但在抗战胜利时，又不要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与进入大城市，不承认人民流血换来的解放区，不缴敌伪武装，反而集中强大兵力，使用租借物资，联合敌伪军进攻解放区，借外力并联合敌伪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3、国民党反动头子，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弄得人民饥寒交迫，士兵受冻挨饿，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势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

4、顽军在平汉、上党两役惨败教训后，今天可能避免冒进，且其主力。进攻方面是平汉、津浦两线，次要方面是同蒲、平绥、北宁各线，地形平坦多大村落，这一自然条件比较有利于顽军作战。因其素质是火力强，战斗力弱（但不是一击即溃），平原易侦察、警戒、连络与发扬火力，村落易变为堡垒，且便于大兵团行动，但他有许多不利条件，如后方不巩固，进攻的四十一个军中还需相当大的兵力担任守备，且因待遇不公，杂牌不满，纪律败坏，人民反对，补给困难，兵心不固，南人北地，地理民情不熟。而我则有广大解放区与万万以上民众作依靠，百万主力军与地方军以逸待劳，二百万以上民兵协助，补给方便等有利

条件，只要我有团结一致的决心，有很好的指导和准备，我便能粉碎其进攻，然而我装备差，火力弱，不大熟习大兵团正规战，战术素养不强。为克服我这些弱点，必须提高战术，加强相互间步炮间的协同教育，尤其夜间战与村落战的练习。在平汉津浦线我主力兵团更须特别注意，并须尽可能争取时间对主力兵团整训补充，建设必要的后方工作，军区工作，作长期打算。

5、为了粉碎国民党军这次严重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必须取得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配合，尤其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等的密切配合，除对他们一般的政治动员与军事训练外，还须着重于普遍的破袭、爆炸教育。各主力兵团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要认真去注意这一工作，准备顽军全面的大举进攻时，进行一次统一的全面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破袭，（如百团大战时之一致协同动作，时间另行电知）将所有铁道、公路桥梁电线仓库飞机场等给以广泛的摧毁，使一切交通动脉在同一时间断绝。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技术准备，各局必须通令各部队各军区，认真准备，如炸药，工具，侦察，分工，组织等。忽视这些具体工作的进行，即是空谈，并须在来年一月中旬准备完毕，同时，也不应因准备大破袭，而妨碍或放弃现在的破袭。

6、动员群众帮助运输粮食、弹药，救护伤员外，在预定顽军可能进攻地区，适当时期进行空舍清野广泛埋雷爆炸，把抗战中许多宝贵经验集中起来，普遍发扬，从反顽进攻中教育锻炼广大人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了解到战争同切身利益是一致的。

全党全军同志，紧张起来！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

——在延安"一二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陆 定 一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今天举行盛大的"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刚才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已经把开会的意义和我们的任务说得很清楚。主席要我来说几句话。我首先要向到会的各位朋友特别是代表"一二九"运动的精华的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们致敬（鼓掌）。向昆明为了反对内战与反抗国民党屠杀而罢课罢教的教授教员与同学致敬（鼓掌）。向为了和平高举义旗的高树勋将军致敬（鼓掌）。向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敬（鼓掌）。向一切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各界同胞致敬（鼓掌）。向作为和平的支柱和民主的支柱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致敬（大鼓掌）。

我还要向美国旧金山国际码头工人仓库工人职工会致敬（鼓掌）。向美国海员工会致敬（鼓掌）。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遵行罗斯福总统政策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民主人士致敬（鼓掌）。

今天开会，纪念"一二九"十周年。这个大会，是反对内战的大会，是反对武装干涉的大会。因为内战问题，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也是全国青年面前最重要的问题。而内战发生的最重要原因，除了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蓄意挑动和组织以外，还有外国的武装干涉，没有这个武装干涉，内战甚至是打不起来的。

先论内战问题。在国民党当局召集了军事会议，决定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以后，内战正处于由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间。

第一个阶段的情形是：九月十七日，正当国共谈判在重庆进行，毛主席还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就把《剿共手本》用飞机送给阎锡山（当然同时还送给全国其他一切国民党高级军官），这架飞机误落在焦作，被八路军检出了《剿共手本》和命令。九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当局通令各战区，就地翻印《剿共手本》。十月十三日，国民党当局发出"委座酉元电"叫国民党军队"剿匪"，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剿匪密令"，这个密令由胡宗南转给高树勋将军，高将军起义后就交给我们，我们已在报上发表了。以后，国民党各战区各军队都发了许多"剿匪"部署的命令，其中很多我们在报上已经发表了。这一次国民党反动派调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有正规军一百二十万，其中三十六个军约八十万人是进攻华北华中解放区的，此外，还有伪军三十五万，日军三十五万，一共一百九十余万兵力。

各路作战的情形：平绥路上，国民党军队企图攻占我军解放的张家口，受到我军坚强的

回击，没有成功。山西阎锡山用十三个师进攻我晋东南太行地区，在我军自卫下全部放下了武器，包括军长史泽波在内。平汉路方面，国民党军队联合敌军及伪庞炳勋孙殿英等部，攻占了解放区很多县城，国民党当局下令限十一月底“打通”该路，在我军自卫下，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四十军三十军全体官兵都放下了武器。津浦路，国民党军队联合敌军与伪军吴化文等部向我进攻，国民党当局亦曾下令限十一月底“打通”该路，至今没有成功。鄂豫皖解放区，国民党当局下令限十一月底“肃清”，至今还在继续进攻。山海关一路，国民党军队在我军忍让之下得寸进尺，冀热辽解放区受到了国民党军队严重的摧残。这一时期中，发生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证明甚至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反对内战的主张也得到有力的响应。

现在，第二阶段又要开始了。国民党当局在十一月十一日召开了军事会议，名为“整军复员会议”，开了四天，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接着又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倾全国兵力到华北“剿匪”。会后，南方各地的军队即再度大举北调，几十个箭头指着华北各解放区。调兵的规模，我举湖南作为一例。湖南本有四个军，现在北调的已有三个，留守的只剩一个。所谓“复员整军”，其内幕即是如此。这几天，国民党当局正在经过中央社进行其大规模的谣言攻势，主要的一点，是造谣说八路军里有日本人，甚至不惜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和日寇的朝日新闻联合起来造这种谣言。这种谣言攻势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掩盖其勾结敌伪的可耻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找大举进攻和引进武装干涉的借口。

如果对于内战危险没有有效的制止，那末，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规模的内战，是很难避免的了！

谁是内战的负责者？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曾说：《剿匪手本》是“笑话”。等到我们答应可以奉送他一本之后，吴国桢的话真正变成了笑话了。“剿共密令”，国民党当局至今连否认一下的勇气也没有，就是最善说谎的吴国桢，也只能限于闪烁其词的暗示人们怀疑它，再不敢正面的说这是“笑话”了。其他许多缴获的“剿匪”文件，我们报上虽已发表了不少，国民党宣传机关只是避而不谈，好象不算一回事。避而不谈，当然可以。但是人证物证既然都有，国民党当局对内战的责任是避不了的。

为了要打内战，国民党当局竟走得这样远：亡国大仇可以不报，民族敌人可以勾结。日寇军队，不但不缴械，而且重新武装起来，不但不惩罚，而且给以优待，和叫他们“维持秩序”甚至“收复失地”，放在“剿共”第一线。伪军呢，昨天还是背叛民族的罪人，今天就原封不动变成了“中央军”，担任“剿匪”的“神圣任务”。这种办法，岂非真正的“不择手段”么？

在我们这里，大家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谁要和平，谁反对内战，就被国民党当局指斥为“共产党”，或“阴谋分子”。国民党当局不但对要求和平的解放区军民进行内战，而且还对其统治区手无寸铁的要求和平的学生进行内战。昆明十二月一日的惨案就是例证。还有什么别的事实，更明白的说明了谁要打内战，谁反对内战么？

国民党的反动派为什么那样喜欢内战？让我们回溯到一九二七年。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十八年了，其中十六年都有内战，只有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以后，到一九三八年末武汉失守前的两年之中，没有内战。一九二七年内战，起于国民党的“清党”。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三大政策，都不要了，这还不算。所有的共产党员，不但开除国民党党籍，而且要“开除人籍”，不但共产党员要“开除人籍”，连邓演达先生杨杏佛先生等这样著名的国民党员也要

"开除人籍"。总而言之，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力统一的人，都没有民主权利，而且没有做人的权利。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被暗地捕杀的四五十万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要内战，但既然国民党反动派杀得来，而且杀了那么多，如果不是猪羊，就不能不设法自卫。

十年以前的"一二九"，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更加证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不要内战的。

但到了一九三八年底，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甚至在日寇深入中国，河山破碎的时候，还要秘密颁布《防制异党办法》，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种"磨擦仗"一直打了六年半。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是使解放区处在日寇与国民党反动派两面夹攻之中，这样来消灭解放区。

抗日战争刚才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出"剿共密令"，内战就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起来。

可以看得很明白，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要内战，从来都是反对内战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要的，不过是不要"开除人籍"，要有做人的权利，要有人所应有的权利，要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来保证这些权利。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里，发生不同的政见，那是普通得很寻常得很的，但尽可以用民主的办法，让大家自由向人民宣传自己的政见，让人民来自由投票表示他们赞成或反对那一种政见。主张既然光明正大，为什么怕民主而且怕得要死呢？不赞成民主，硬要武力统一，一切政见不同的人都要把他"开除人籍"而后快意，这岂不是因为自己企图专制独裁，有不可告人之隐么？在中国，就是这样的反动派喜欢内战，岂不很明白么？

反动派对美国人说，只要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消灭共党"。我们应该把真理告诉美国人，反动派是永远无法"消灭共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化，为了这个目的，中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一百年。

内战问题就是如此。

其次，说到武装干涉问题。

中国人民已经生长了强大的力量。如果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反动派即使要发动内战，也有很多顾虑，甚至是不敢贸然犯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动派敢于发动规模空前的内战，乃是因为美国的最顽固的帝国主义者赫尔利之流，背弃国际信义，违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反对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中民主人士的意志，公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反动派压迫人民的原故。

美国帝国主义者赫尔利之流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虚伪借口，就是所谓"解除日军武装"。

如果华北的日军，指定由八路军新四军解除武装，那末，只要十天，就可完毕。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有功，是中国最好的军队，这是全世界全中国甚至国民党也不能否认的，既然抗日有功，为什么却没有资格去受降？为什么要命令这支有功的军队"驻防待命"，反而叫日军"维持秩序"和"收复失地"呢？这是要解除谁的武装呢？

美军自九月三十日登陆塘沽以来，已经两个多月。如果美军真是为解除日军武装而来，那么不消十天也就可以解除完毕。美国舰队，一次就替国民党由广东和安南运三军到秦皇岛青岛，如果用同样的势力来运送三十五万日军回国，只消一个月就绰有余裕了。但是，现在

已经两个多月，不仅运送日军回国尚未开始，连收缴日军武装亦还未完成。最为沾污美军荣誉的，是在天津、北平、青岛和北宁路上，美军与手执武器的日军居然共同防守起来。

山海关锦州并无日军，只有八路军。如果美军帮助国民党运兵的目的，仅止于便利国民党军队去收缴日军武器，不是便利于国民党进行内战，那就绝无任何理由把国民党三个军运到秦皇岛去进攻山海关和锦州的八路军。

这些事实，以及其他许多事实，都证明所谓"收缴日军武装"，乃是赫尔利之流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他们的实在的目的，乃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以内战来完成其武力"统一"，反对民主的统一。赫尔利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军队蒙上羞耻。

赫尔利魏特梅耶一流的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包括（一）供给国民党政府以内战的军火，而且在抗战完毕之后与内战扩大之中还毫无理由的继续供给；（二）装备和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按照国民党与美国接洽中的计划，准备给与国民党三千架飞机，一千辆坦克，装备和训练七十个师，训练一万个航空人员，训练海军人员等；（三）帮助国民党的船舶及飞机运兵；（四）派大批美国军事顾问到国民党军队中，自上而下一直派到每个营，将有四千人的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到中国来；（五）护路，现在北宁路天津秦皇岛段和津浦路天津静海段已由美军护路；（六）戴笠系的特务，由美国人帮助训练和帮助技术；（七）直接参加内战，例如进攻山海关（魏特梅耶名之曰"观光"），以飞机扫射河北安次军民，通谍八路军退出烟台威海卫等。

赫尔利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动政策，促成扩大和延长中国的内战，维持和推广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打击中国的人民和民主的统一，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完全违背美故总统罗斯福的政策的。

赫尔利之流的武装干涉主义者，他们是走得太远了。

解放区军民为了顾全中美友谊，向来的做法是竭力避免和美军的冲突，对于落入解放区的美国空军人员依旧给以象盟友一样的招待。但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有力量的。赫尔利妄想破坏罗斯福政策和破坏中美友谊，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反动派赫尔利是倒台了。

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对马歇尔元帅的新命。我们希望马歇尔元帅为了中美友谊，为了美国的荣誉，不但停止赫尔利的反动政策，而且要设法弥补赫尔利所已经给与中国人民的巨大危害，和已经给与中美友谊的重大创伤。应该指出，这种危害与创伤，其中有些是要经过很大努力才能弥补过来。

"一二九"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以前，北平同学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越发觉得这个运动意义的伟大，主张的正确。"一二九"将要流芳百世，而十年前叫嚷"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派，包括大汉奸汪精卫在内，将要遗臭万年。

今天，中国青年继承"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主张"反对内战，民主建国"。中国青年的这个运动，亦将流芳百世，而发动内战反对民主屠杀青年的反动派和赫尔利干涉主义者，将要遗臭万年。全延安、全解放区、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踊跃参加这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

回顾十年，中国人民的力量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参加到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斗争中来的阶层，比之十年以前已广大得多了。我们的知识青年，常常是革命的先锋队，但为要我们的事业得到成功，必须与工农结合起来，与人民结合起来，与高树勋将军这样的军人结合起

来，与教员们教授们结合起来，与一切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人结合起来，还要与国际一切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力量结合起来，来制止反动派所策划的规模空前的大内战，来制止美国反动派的武装干涉。中国青年的队伍是强大的，虽然有困难，虽然会有曲折，但青年的主张，这就是历史必由之路。

（原载1945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

中共代表招待中外记者谈政治协商会议任务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周恩来同志等，十八日上午十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五十余人。除吴玉章同志适因事未与会外，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同志都出席参加。兹志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谈话和答复各记者所提的若干问题如下：

恩来同志首先声明说：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这许多问题是各方所关心的，也是诸位所要知道的，因此我们很愿意把与此有关的情形适时的报告诸位，今天是第一次。

我们这次来渝，抱着很大愿望，要和政府和各方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诸多重要问题。

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目前中国内战之严重，这是大家所深知的，不管用任何方法解释，武装冲突是事实，因之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用全力向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赞成，才能有效。更重要的是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能好谈一切问题。

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这个方案将包括共同纲领、政府改组、复员善后问题等。我们对于这些都有具体的意见，但仍愿征求各方意见后，再作为正式方案提出，这里所说各方也包括新闻界在内，希望诸位提出对中国以后施政纲领的意见。

其次，我们将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的改选问题，会期问题，宪法和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等问题。

最后我们将提出关于今年“国共会谈纪要”中双方获得协议，并应付诸实施的许多项目，为保障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党派合法、废除特务机关、地方自治、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政府应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对于这个协议的实施，也能加以督促。

实现上述要求，这就是我们来渝代表的共同责任，这样才能达到停止内战，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我们相信我们这种希望是符合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我们也相信在协商会议中参加的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只要能诚心诚意于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富强的中国，都会赞成我们这种意见的。

问：是否要在解决了停止内战问题之后，再开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中，首先要谈停止内战的问题？

答：停止内战问题，在会前由国共会谈，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否则，在开会时首先要谈，国共会谈与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平行进行。

问：停止内战问题，是否将在三人军事小组会议中解决？

答：不是。停止内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须先要由国共会谈和与其他各方商谈出解决方案后，再由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去讨论实现这个方案的具体问题，因为三人军事小组会只是一个讨论技术性的组织。比如由政治商谈决定了停止内战的具体方案后，三人军事小组会再根据这个方案去讨论实施的详细办法。

问：假使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仍不能停止内战，那么，这是否将造成会议的决裂呢？

答：我们不愿作此预测，我们希望在会议中能解决，而且更希望能在会前解决，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人民与同盟国政府的希望，尤其是解放区一万万人民，现在处于被进攻的状态中，更是迫切的要求停止内战。

问：贵方的建议是硬性还是有收缩性的？政治协商会议中通过的议案，对各方是否有约束性？

答：凡是建议总是要经过各方协商的。因为既是协商，总要经过双方同意，才能得出决议。一切决议对各方面都有约束性的，包括对政府党在内。

问：一、关于受降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中共是否仍要在会议中提出？二、是否将改变以前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要求？

答：一、关于受降问题，是要在停止内战的具体问题中去解决，关于解放区问题，是要在讨论全国实行地方自治问题下去解决。二、在原则上不打算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关于解放区问题，也和受降权问题一样，政府在原则上都曾答应过的，现在是如何讨论实施具体步骤问题。

问：会议中若果仍不能解决，那是否将有责任问题？

答：我们总希望能够解决，万一不能解决，我们主张再谈而求解决，无论如何要用政治解决，而不能用军事解决。至于责任问题，这抽象的说，就要诉之于舆论了，尤其是公正的舆论。这里我们要插一句，就是言论要自由，此刻重庆还没有言论自由。现在政治协商会议要开会了，重庆应该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个要求，诸位也定会赞成的。这里我想《新华日报》有权向诸位控诉，它没有得到象别的报纸一样的自由，目前它的发行遭受极大的阻碍，报童被捕被打，读者没有看报的自由，寄往外埠的成万份报被扣，整批报纸被撕毁焚毁。

问：中共对于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程序如何？

答：这个问题有过两个方案，国民党一部分人也提有一个方案，共计三个方案。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办法是行不通的，也是我们所反对的。第二个方案是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这是美满的和彻底的办法，我们坚持这主张一年多，政府未赞成，现在我们仍不放弃这个主张。第三个方案，是政治民主化做一些，军队国家化做一些，两者平行，逐渐达到一个民主宪法的政府。这个办法，从毛泽东同志来渝谈判到我上次返延时，仍未得到结果。虽然这个办法在原则上政府已经同意，但在作法上是要求

单方面对政府有利，而在另一方面是把解放区军民权利剥夺与消灭。当然我们这次来，在谈和平建国方案问题中，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求得解决。

问：中共对政府接收东北的问题的看法如何？

答：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收东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以下接着是叶参谋长谈话。他说：他这次来重庆，主要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进行国共谈判，待国共谈判与协商会议中若干重要问题有了具体决定后，他再将参加政府组织的三人军事小组会议，根据决定去讨论实现决定的细则问题。叶参谋长接着说：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战或和的问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主张和平的，主张商谈解决问题，而不主张用打仗来解决问题，我自己到重庆来商谈，就表示了我们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事实上内战在扩大着，仍不断的在进兵、进攻、进占。目前内战的最主要方向是在华北，从张家口、承德、到朝阳，东至於海。这个内战的最主要方向，若不首先停止下来，势必扩大到不可收拾。内战不仅影响及国内生活，而且已影响到远东与世界和平。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声明，首先希望中国内战的停止。因之目前是决定中国内战与和平的"转舵"时机，但这项"转舵"工作却十分沉重，这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努力，才有实现的希望。

（本记录未经周恩来与叶剑英两同志过目，如有出入，由记者负责。）

（原载1945年12月19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向邵力子表示中共希望立即停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昨（十九日）日中午，中共代表团宴请国民党邵力子、张群、王世杰三先生，因张群先生尚未来渝，王世杰先生昨赴南京，所以只到邵力子先生一人。席间曾商谈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中共希望会议能迅速开幕，盼望加紧筹备。周恩来同志特别表示中共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前，立即停止内战，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都可以在战争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中共希望双方不提任何停战前提条件，以求得立即停战。能做到使这一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内战停止下来，就可以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后，不失去他们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和信心。中共并盼望邵先生将这个意见转陈蒋主席，并望张群、王世杰两先生迅速返渝，以便国共双方会谈重新继续进行。

（原载1945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鉴于前次会谈双方关于停止内战的条件之争执，迄无结果，故中共代表于此次会谈开始，特向政府方面先行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办法三项，以副国内外人士殷切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

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原载1946年1月1日《新华日报》）

〔附〕 国民党政府代表复文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

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原载1946年1月1日《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函复反内战联合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诸先生公鉴：

拜读　先生等致毛泽东同志一函，义正情殷，实深感佩！伏念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为敝党十年来一贯主张；今年八月毛泽东同志来渝商谈，亦本此旨而努力，不意商谈纪要甫经公布，而《剿匪手令》随即密颁，利用盟军之协助，保留敌伪之武装，百数十万之大兵，纷向解放区突进。在日寇投降之后，人民复遭兵燹之惨，言之痛心！同人等此次来渝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已先向政府提出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一切争论，经由和平协商解决，以副国内人士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久仰　先生等均各界先导，德望风崇，组织反对内战联合会，大声疾呼，主持正义，促进政治协商，实现和平建国，必能有成。除将函大即转延安毛泽东同志外，先此肃复，尚望时赐教言，感甚，幸甚！专此顺颂公绥！

周恩来　董必武　王若飞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十二月二十八日

（原载1945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

〔附〕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毛泽东同志

润之先生钧鉴：

八年以来，先生领导贵党努力抗战，在敌后守土卫民，勋劳卓越，中外同钦。八月间应蒋主席电邀，翩然莅渝，共商国事，拳拳之诚，实为天下所共见。而商谈期间，复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为和平建国而努力，尤予全民以莫大之慰安。不意商谈纪要甫告发表，而内战已突然爆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余，复遭妻离子散之祸，惨痛之情，何难想见！同人等认为以政治解决政治，其势甚顺，而其道亦不甚难，凡会谈纪要中所已决定之事项，协力促其实行，其未决定之事项，由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决定，则一切纠纷即可迎刃而解。时至今日，万不宜诉诸武力，使治丝而益纷。同人等懔国亡无日之戒，爰成立本会，除已另电国民政府蒋主席有所呼吁外，特向先生请求，务希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国人幸甚，同人幸甚。

彭一湖　梁漱溟　张东荪　罗隆基　张申府　宋云彬　沈钧儒　章伯钧

章乃器　刘清扬　胡厥文　柳亚子　史　良　李公朴　蒋匀田　周鲸文

杜国庠　廖国镇　郭沫若　冯乃超　陶行知　刘王立明　曹孟君　郭思明
甘祠森　黄墨涵　何公敢　侯外庐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原载1945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报告停战命令发布情况并答复记者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今天国共双方共同公报的发表，是大家所欢迎的，公报的主要内容大家已看到了，无须多说。虽然这仅仅只是停战命令的公告，是停止内战的开始，但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中国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断续至十八年之久，其间虽因抗战而停止了冲突一个时期，但在抗战中又发生了冲突。象这次公开发表双方停战命令，还是历史上未有的事情。我想这一个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与督促，同样的应归功于同盟国人民的要求与希望。在合乎国内外人民要求之下，我们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要求，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声明，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发表了协议。同样在这基础上，我们看到了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我们看到了政府代表的努力，最后也显出了蒋主席的决心，而完成这个停战命令的颁布。

现在这个停战命令，一方面已在外国报纸公布，和中国新闻社广播，另方面政府已在正式下命令给各地军队，我们方面已经通知延安下同样的命令。所以在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日，也是联合国大会开幕之日，能做到这件事，是深值庆贺的。诸位这几个月来对这件事的关怀，以及对无条件停战呼声的赞助，我同样也很感谢诸位。因为诸位不仅报道消息，也把人民呼声告诉了我们。

我说这些就够了，留出时间待诸位提出问题：

问？执行部成立，中共打算派谁去？美方和政府方面派谁去？执行部的组织和人数？

答：中共代表是叶剑英将军，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据说是美代办罗伯逊先生和郑介民厅长。执行部将设执行组、秘书处及联络人员。参加人数，每方都有同等数目。

问：执行部何时开始工作？

答：很快，希望能在三天至五天以内。

问：公报中附加规定中的第二项所称的满洲，是否包括热河在内？

答：满洲是东北九省，并不包括热河在内。

问：停战命令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答：命令今天下了，今天就应该执行。双方已约定至迟在三天之内，一律停战。也许有些村落因命令还未送到，致尚有零星战斗。除非有些地方因没有电台，而又处在被封锁状况之中，那就要延长时日，如我们在海南岛的部队，便没有任何通讯联络。

问：执行部设立后，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否仍要召开？

答：现在是停战问题，由三人会议解决，但并不包括整军。整军问题要在政治协商会议

中讨论，三人军事小组会也将商讨。

问：东北继续运兵，是否将不受此命令限制？

答：是的，中国政府是从苏军手中接收中国主权，而不是为了进行内战，故这种运兵将不受限制。

问：监督停战的军事考察团的组织和职权是怎样的？

答：除国共双方当事人外，由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各派公正人士八人，共十六人，组成军事考察团，分赴各地考察军事冲突情形。我想军事冲突停止了，考察团也可作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希望中外记者能参加考察团同去各地视察。

问：他们将向谁作建议？考察团何时可组成出发？

答：他们可向政治协商会议，向国民参政会，向国共双方，向三人会议作建议，总之他们有他们的独立权力。可能在现在或政治协商会议开过后组成。

问：三人会议是否需要继续举行？

答：需要讨论问题时，可继续举行。

问：向东北运兵是否要向执行部报告？

答：运兵入东北照规定是要向执行部报告的。

（原载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前　言

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共同协定并经国民政府核准，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实行关于停战之协定。

任　务

军事调处执行部应实行业经商定之停战政策。本执行部为增订必需之附属协定，俾停战命令之实施更为有效，得为各种建议。此项建议，包括解除日军武装，恢复各项交通线，及配合移送日军至海岸线，以便遣返之各项措施。经三委员一致同意之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之。

组　织

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各有表决及互商权，其中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

本执行部内设立一执行组为推进工作之机构，该组包括若干军官与士兵，足资实地监督履行诸协定及呈送各项报告之用，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在执行组内，应有同等人数。

执行部应设置必需之秘书人员以资工作。

房舍与给养

国民政府以适当之居住及办公房舍，供应执行部，并供其膳食。整个执行部之安全，由当地当局负责。其办公室住所及设备之直接保护，视其需要之情形及经同意后，由双方军队各派少数警卫担任之。

地　点

军事调处执行部先设于北平。

程　序

军事调处执行部，以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执行者之地位，推动其工作。

三委员各有表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

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布必要之正式命令、指示及训令。

执行部每日应缮具报告，由各委员分送其首长。

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工作，经过执行组进行之。

执行组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之。

执行组督察向有关部队发布及传达一切命令、指示及训令。

执行组得设立分站，必要时并应派遣监察及报告小组，俾实行政策与协定。

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美国各得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在地，维持其独立之通讯线。

有 效 期 间

军事调处执行部继续存在，并执行其工作，直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经向对方作适当之通知后，废止之时为止。

张　群

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于重庆

（摘自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下简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附〕 三人会议致蒋介石备忘录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组织

关于停战的指令经阁下与毛泽东主席赞同后，致使军事调处执行部有义务立即进行工作。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方便和加速工作起见，应使其组织越小越好。

业经被任命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国委员罗勃逊先生最初不得带同四个以上的随员，即政治顾问一人，副官一人，录事一人及翻译一人。

在白鲁德上校指挥之下的执行小组，必须包括必要的人员，以便在危险地区设置各个分部，维持交通，供应必需的办公处所及室内需要等等。执行组的美国部分于开始时，计划中大约将包括美国军官二十六人，士兵六十八人及中国籍的雇员三十人。

附件即是白鲁德上校拟订的执行组美国部分的组织形式。情势紧迫，请阁下派遣一个规模相仿的组织，作为执行组的国民政府部分的人员。

白鲁德上校将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去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并集合美国方面的人员。

罗勃逊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可准备就绪，启程前往。如果国民政府方面的委员与中共方面的委员能准备同时启程，则最为便利。马歇尔将军将以其私人专用的飞机C—54供应使用。

军事调处执行部与执行组的人员，应立即组织起来。国民政府方面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员，至少在开始时，双方各不得超过军官四十人与士兵九十人。

在这些人员到达之前，准备给予适当的便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建议凡参加执行组的

人员应按照预定计划，于一月十五日开始到达北平，至少有半数人员应于一月十九日前到达北平。其余人员到达北平的日期，至晚不得迟过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同样的备忘录正在递送致毛泽东主席。

张　群

周恩来

马歇尔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于重庆

（摘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祝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新华日报》社论

经过一年以上的民意呼吁，《国共会谈纪要》的确定，以及数月来国内外人士的催促，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今天开幕。这是一个难产的会议，然而却肩负着时局转换的重任，其成败利钝，直接关系着中国民族的命运，间接关系着世界的持久和平，所以各方都寄与很大的期望。

为了实现民主团结，我们在一年以前，就主张召开党派会议，立即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跻中国于民主宪政之林。这个主张得到广大的同情拥护，却被国民党当局所拒绝。到去年九、十月间，经过四十多天的国共谈判，总算在《国共会谈纪要》中，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而三月来几经波折，迟到今天才召开，这就是由党派会议演变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发展过程。

《国共会谈纪要》规定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今天中国有什么"国是"需要协商？不言而喻的，就是究竟要采取什么途径，才能有效的以和平代内战，以民主代独裁，以团结代内讧，以统一代分裂。

我们对于这些根本问题，曾经提出许多意见，而最主要的就是：（一）认定内战必须无条件全面停止；（二）国民党当局在会谈纪要中曾经允诺的保障人民权利，如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汉奸以外一切政治犯之释放，特务权利之废止，必须立即兑现。中共代表团来渝之后，尤其全心全意为此而努力。我们认为这两件大事都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做到。只有在会前做到这两件大事，才能出现和谐气象，进一步来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经过了一切努力，这两件大事终究没有在会前做到，我们对此深表惋惜，全国人民与国际盟友，也必定与我们同感。

面对着这一现实，政治协商会议在万目睽睽之下开幕，其任务之艰巨，是很明显的。我们依然要求，在会前没有做到的事，必须在开会过程中首先求其实现。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问题，已商定的停战命令，必须立即由双方同时发布，使双方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各暂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不能再多所要求，横生枝节，而阻挠和平的实现。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会谈纪要中所曾允诺的保障人民权利，也必须立即兑现。否则，会议的空气既然无法和谐，而关系国家大计的实际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那就会使全国人民失望，使国际盟友益增焦虑。

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当然有待于代表诸先生的努力奋斗，特别有待于召集者（政府）的诚意表现。如果政府顺应大势与人心，把内战立刻无条件停止，把束缚人民自由的锁链解开，那将开始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如果依然因循敷衍，不肯以和平代内战，不肯

以民主代独裁，不肯以团结代内讧，也不肯以统一代分裂，那将遭受人民的鄙弃与正义的谴责。为功为罪，成功与失败，中国政治现在真正到了决定的关头。

今天是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一天，也是联合国大会开幕的一天，这虽然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却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联合国大会是为实现世界和平民主而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则为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而召开。世界大势可以影响中国，甚至在某种范围内决定中国命运，而中国问题能否解决或解决适当与否，亦不可避免要影响世界。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国大会在同一天开幕，其意义更加重要。

我们希望全体代表与政府当局自省责任之重大，把握时局转捩之枢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人民意志为依归，不要再失时机，不要再贻百世之羞，而要当机立断，以便转祸为福。

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致词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主席、各位先生：

适才蒋主席宣布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我谨代表中共代表团向政治协商会议致词。

政治协商会议主要的是各抗日党派的协商会议，为使会议的范围扩大，和比较完备起见，更邀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参加。这个会议是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来所期待的，经过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会谈中加以确定了，现在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并在此宣布开幕，我们愿致其庆贺之忱。

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照预先商定的会议内容，虽仅有两大项，但在此过渡期中，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宪法问题，却关系中国民族和国家今后的命运至大，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寄以极大的希望。我们中共代表团本此认识，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中国目前现况之不满人意，是毋庸讳言的，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紧接着不幸的国内战争，使中国人民，世界盟邦的政府和人民都关心此事，并要求迅速结束内争。中共是当事人的一方面，此次代表团前来陪都，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经二十多天的呼吁和奔走，经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经我们盟邦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最后赖蒋主席的远见和决心，使全中国和全世界所关心的内战，在今天双方下令停止了（大鼓掌）。十八年国内惨痛的经验，人民的痛苦，使我们今天在先烈的昭示之下，在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大鼓掌）。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并望以此努力，告慰全国人民。

军事冲突停止了，才能很好的谈到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要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国共双方在双十会谈纪要中，已经承认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并在此过渡期中，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有了和平团结的局面，有了民主统一的基础，中国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普选和民主宪政，也才能有真正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建设。

由于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运动，和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为领导的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到今天，使我们才得看见了新中国的曙光。尤其是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更有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中国抗战军人又流了血，尽了力，而全世界也正处在为人民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的历史关头。我们遭遇此千载一时的良机，只有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去掉一切落伍陈腐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和办法，信赖人民，依靠人民，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中国的民族和国家，才能在联合国中不愧为五强之一，也才能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国际合作。

我们希望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一定要使这个会议的历史任务达到成功。我们也知道在成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碰到波折，但只要我们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而奋斗，我们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而且能够克服的。

预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鼓掌）

（原载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附〕 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致开会词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各位先生：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本席代表国民政府向各位致诚挚之欢迎，同时也愿乘此时机，陈述我个人对会议的期望，至于政府的方针，我在元旦广播词中已经详尽说明，不再重述。

今天到会的各位会员，有半数以上都曾参加过历届的国民参政会，因此我在今天很自然地联想到国民参政会的成就。参政会到今天已是第四届，而民选的成分逐渐增加，现在由选举产生的参政员，已占总额三分之二。历届参政会对国家的贡献不一而足，而最重要的就是共同一致，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尽管参政员中间，在政治上的立场和见解各有不同，而对于国家民族安危存亡所系的根本大计，其主张则是全体一致，始终一贯的。我们所以能持久抗战，获得胜利，这是一种主要的力量。现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我们中国对这次世界大战中的任务，正如其他联合国一样，“要赢得胜利，并且要赢得和平。”所谓要赢得和平，就一般的说，是要确实保持胜利的成果，建立世界和平的秩序，永绝侵略战乱的根源。而在我们中国来说，尤其要紧接着抗战的胜利，以举国一致的努力，排除万难，以谋国内秩序的安定和建国工作的进行。

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度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也就是怎么样集中一切力量，增强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的问题。我们八年苦战，死者为国牺牲，生者备尝痛苦，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保障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国的障碍，以求得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现在抗战既已胜利结束，建国工作就应该立即开始。我们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已为全国所公认，中国必须成为统一民主而强盛的国家，更是世界所切望。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促成国民大会的如

期召集，民主宪政的及早实施；同时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与任务，也就在于此。

我们过去因为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抗战，一切的措置与法令都着重于适应军事的要求。抗战结束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善后为先，建设第一"，许多战时法令，已经在陆续废止或修改，今后政治上和社会上一切的设施，都要尽量纳之于正常的轨辙，加强法治的精神，以立宪政的基础。参加本会议的各位先生，对于此点，一定是具有同感的，如有意见，深望尽量陈述，政府无不可以考虑采纳；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国家社会现实的状况，总要使过渡期间不发生困难或纷乱，使国家根本不至于动摇，以期顺利推行宪政，而使建国工作得以圆满进行。

本会议虽然不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但各位先生热心国事，关切民生，一定能体察人民真正的愿望，认识人民迫切的要求。

国父有言："国家之基本在于人民"，所以人民的要求与国家的需要，必然是符合的。依本席的观察，今天我们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求安定，求复兴，求国家的统一进步与繁荣，以增进他们的生活，最低限度也要求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使他们的自由不受侵害。对于这一点，政府当然要负责尽职，以满足人民的愿望，解除人民的痛苦，保障人民的自由。同时本会议所要充分商讨的，也就要以这些最迫切的要求为基础，来确定我们当前的国是。我们必须实现民主，这是我们国民革命一贯的宗旨，也是这次艰苦抗战的目的；但在国民大会没有召集、宪政没有实施以前，人民真正的意志，还没有充分表达的途径，我们大家的责任却是十分的沉重。政府这次召集本会议，只有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绝没有自私和得失之见，政府对于本会议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裨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同时我个人在会议开始的今天，要对各位贡献下面几点的意见：

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我们这一次会议当然不是各党派解决自身问题的会议，而是为共同奠定建国基础的会议。我们各人对于国事的见解，和政治上的主张必不能绝对相同，或许是距离甚大，但是我希望各位在巩固国本的共同认识之下，都能充分坦白的提出主张，不必有所隐讳或保留。我们正可以借此热烈讨论的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见解中发现共同的途径，从相互的谅解中增进我们的合作精神。唯有坦白才见得真诚，也唯有牺牲成见，择善而从，才能成立合理而有益的决议。应主张的就积极主张，该让步的应不惜让步。我们要以这一次为民主精神的试验，也要以这一次为养成民主风度的嚆矢。我们希望本会议能始终保持谅解与和谐，不希望发生任何停顿和波折。

第二、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我们的谅解与让步，有一个共同的指归，这就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先，而党派或个人的得失为后。在国家民族整个的利益之前，所有党派或个人部分的成见，应无不可以牺牲，无不可以让步。为了成立有效的决议，有时候撤销我们的提案，比之坚持我们的主张更有伟大的价值。这样才见得我们谋国的公忠，才能使这次会议有确实的成就。

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我们在举行会议的中间，有三件事大家要牢记在心：一是抗战期中军民牺牲的壮烈；二是我们同胞流离痛苦渴望解救的迫切；三是我们国家

过去蒙受忧患的深重，和民族前途安危祸福的不可予知。所以我们这一次会议，是要集中力量，而决不可以分散力量；是要造成团结，而决不可以破坏团结；是要扶助政府，增强政府，而决不是要削弱政府；是要开辟建国的前途，促使我们国家的进步，而决不可以使国家停滞在百事落后的地位，甚而至于造成国家的退步。只要我们能认识这几个要点，而后我们国家乃可以迈进于民主建设的大道，为世界友邦所尊重。

各位先生：本席对于这一次会议，是具有充分的信心。我深感我们过去国民参政会的精诚合作，已经赢得抗战的胜利，我因此同样深信这一次会议的成就，必能推进建国的工作，保持胜利的成果，以赢得和平。世界舆论所属望人民殷切的祈求，都集中于我们这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敬以十分的诚意，祷祝本会议的成功。

现在我还要乘此机会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原载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附〕 张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致词

（由沈钧儒代读）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这不只是全国人民注意的一件事，这是全世界人士注意的一件事。这个会议的成功或失败，不止关系国家的命运，的确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前途。我们想我们今天到会的全体会员，必定一致感觉我们今天的责任是十分重大。我首先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全体出席会员向会议表示，愿以真诚坦白的态度，至公无私的决心，和衷共济的精神，来与诸位会员共同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

这个会议虽然是以党派的代表占多数，我相信各位代表都承认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党派的利益，而是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具体些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怎样谋取国家自身的和平，以保障远东以及全世界的和平；怎样建立中国国内的民主，以奠定远东及全世界的民主。今日在座全体会员，尽管政治主张各有不同，但我们的目的，我们求国内的和平，求政治的民主，这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在大目的相同之下，仍有见解的不同，所以这个会议才有他的需要与效用。因为只有政治见解的差别，而大目的仍旧一致，所以我们又相信这

个会议决定有其光明的前途

这次会议的目的，既然是国家和平与民主，我就愿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的出席会员，在这个目标上向会议贡献几点意见。和平与民主是相辅而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今天主席在致词中，首先宣布和平谈判已告成功，这真是举国欢迎的消息。我们相信这不是暂时的和平，而是中国永久的和平，和平是会议成功的先决条件，永久的和平是中国建国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请求。至于谈到民主，我们今天没有过高过远的希望，我们认为今天全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只是那些做人的起码的各项基本自由权利，不过老百姓要的不是字面上与纸面上的自由权利，他们要的是事实上真实的自由。今天听到主席在致词后的负责声明，知道最近政府既已有所决定，这是我们要致无限的欢欣的。我们相信今后人民的自由，必可得到切实的保障，以副我们人民的要求。

其次，经过这八年的抗战，老百姓是颠沛流离，是家破人亡，全国大多数的人民，今天是无饭可吃，无衣可穿，无家可归，这些问题不立求解决，我们却从事政争党争，这无论是当权或在野的党派，内心都应感觉罪过。我们认为当前复员与救济这些问题，比较制宪行宪问题还要迫切，我们愿与会员诸公共同先来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实行开放政权，订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等等问题，当然是国家走上民主正轨的许多立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对这些问题有一贯的主张，却没有任何的成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着重这几点：第一，不能违反人民普遍的愿望；第二，不可辜负盟友协助的好意；第三，方案实行的时候，必出之以至诚，守之以自信。关于解决上列问题的详细办法，我们愿本互让的原则，在会议中求得公平合理的结果。

总之，今天我们出席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不止应该向全国国民负责，并且应该向八年抗战的死难先烈负责，先烈们用鲜血性命换来的抗战胜利，换来的民族生存，换来的国家独立，我们没有摧毁他，破坏他的权利。今天我们只有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才对得起死难的先烈，对得起全国的人民。今天我们就本着这样的责任心，追随主席及会员诸公，共同努力，以求会议的成功。

（原载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有关停止军事冲突商谈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主席，各位先生：

关于商谈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一切交通的经过，刚才张岳军先生已有扼要说明，现在停战命令已下，停战问题已获解决，当已不是目前协商之主题，所以他的经过详情，毋须多作解释，假若各位先生有什么问题须要询问，我当再就所知答复。

现在想就谈判中得来的几个经验教训，略加陈说，以供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一切问题的参考：

谈判三点经验

第一个经验，商谈停战应该有条件呢？还是不应该有条件？国内的战争行动，不管其原因何在，起因何处，大家都认为是不幸的。大家公认抗战期间不应有内部冲突，抗战胜利以后，应以和平方法建国。这个，不但国内人民公意如此，即同盟国人民之瞩望也是如此。所以商谈停战，必须求其成功，欲求其成功，如果要争论条件，一定得不到解决。在初商谈时候，双方都着重争论停战条件，终至问题拖延不决。有一次民主同盟朋友，约请政府与共产党双方代表谈话时，黄任之先生说："商谈停止内战，要无条件停打"。我们听了很受感动，认为这是商谈这个问题的好途径，得到了这种启示，回到延安，获得我党中央的同意。后来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即本此方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在三人商谈中，就因此得到了结果，终于发表了停战命令。这里有一附带说明，我在三人会议中间把原来要提出的，也是应该提出的要求，一律予以保留。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我们认为合理的，无不接受，其可以考虑的，也是尽量让步。停止冲突，当然要无条件，刚才张岳军先生所报告的条件，不是停止冲突的附加，而是关于停止移动的附加。停止冲突应是全面的，没有条件。军队移动，我们认为有理由的，即同意除外，如政府要在扬子江以南一带整军，其因整军有所移动，我们可以同意。政府为派遣军队去东北接收国家主权，我们也是同意。只有第三点，关于赤峰、多伦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些地方，中共领导的军队，已在那里接收了，并已驻扎在那里。最后政府方面撤回这个要求，我们也很高兴，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经验，就是全国急迫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马上解决？还是拖延解决？我们觉得应该当机立断。例如内战问题，全国反对，世界不满，既然任何方面都承认这是不幸的事，就应该迅速解决。刚才张岳军先生已经说过，战争多延长一天，人民多痛苦一天。昨天邵明叔先生垂涕而道出人民的呼声，要求我们马上解决。这种拖延，不管其原因如何，来自何方，在解决问题上是一个教训。到昨天早上，问题是解决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我们两

方面当事人都应该认为是一个遗憾的事。

第三个经验，就是谈判方法上应该公开？还是秘密？既然一件事情关联到全国人民，关联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关联到国家的命运，甚至于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何必要秘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不靠少数代表努力，但这件事情应该公之于众。此次停战问题的解决虽然由参加商谈的两方代表来订办法，最后得到马歇尔将军的赞助促成，但是真正的力量，还是因为人民的呼声，社会的舆论督促而成的。因为有了人民的呼声，社会的舆论，引起世界的注意，以至有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三国外长会议的公告。这一切公开的责备，造成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所以我们觉得凡是一件与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关的事，能够公诸于众，就能得到公意，认识公意，就能得到解决的标准。因此，在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定的办法中，一致赞成列入第三项："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各地考察"。有人以为战已停了，好象军事考察团的作用会失了。其实正如今天许多报纸上所说的，这只是开端的第一步，要使一切军事冲突真正停下来，毫无例外，一切交通完全恢复，毫无例外，这是一件艰巨的工程。停战命令下了，到十三日一律停战。大的冲突会停下来，小的纠纷在命令没有传到的地方，有许多被封锁的地方，都需要派人去解决。所以监督一切军事冲突的停止，一切交通的恢复，有待于军事考察团诸位去考察、监督，并且能够提出意见。因此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这样的教训，凡是千万人的事情，人民的事，公之于众是有益的。

以上三点，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得来的经验教训。总括来说，假如我们都能认识无条件停战，迅速解决和公之于众的三个办法，早些求得解决，人民责备要少些，世界的非难也更会少些。这是一种不幸，很希望嗣后一切问题能够顾到这些原则，特别是第二、三两个原则是要引以为训的。这是我说的第一部分。

停战如何进行

第二部分是停战如何进行。张岳军先生说得很具体，职权方面、组织方面、范围方面都已讲了。我要补充的是几个有关问题。停战协定第四项设军事调处执行部，规定有四项任务：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一切冲突。全面的停止冲突，就是南到海南岛，北到内蒙，东到东北，西到绥远，凡是有冲突的地方，都应该停止下来，这个命令下达，不仅需电报来往，还要派人员去通知，如海南岛被封锁了七八年了，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与政府部队发生军事冲突，广东其他各地中共领导的部队和政府部队亦发生军事冲突；还有别处，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撤走了，政府军队与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发生冲突；还有政府军队开入中共活动的区域，也有冲突。这些都应该停止下来，这些地方都应该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人去监察。执行部要设许多站，许多组，到各地方去，但无论站或组，都是三方面派人，一致行动，一致协议去求解决。十三号前全部冲突停止下来的计划，可以迅速实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面代表，定本月十三号赴平，这个月内希望能派出站或组到达一切冲突地点，使一切冲突停止下来。第二，恢复一切交通，首先要恢复铁路交通，这是由于军事冲突停顿的。还有在抗战中被封锁的，不仅是走路，就是邮电被扣留的也很多，所以三人会议要恢复一切水陆空交通，邮电交通的障碍也要撤去，这才是真正恢复交通，真正交通自由，停战命令在第三项里可以看得出来。第三，执行部要执行的第三项任务，是受降问题。现在还有近二十万的

敌人没有完全解除武装，地区主要是在华北，中国东部也有一些。在政府部队地区，在中共领导的部队所包围的地区，敌人武装都要解除，这也是执行部要过问的事。第四，如何使解除武装的敌人俘虏送回本国，走那些交通线，也是执行部要过问的。这四项与停战有关，也与盟国有关，所以军事调处执行部都要过问。如此做去，不仅一切军事冲突停止了，交通恢复了，就是引起内战主因之一的受降问题，也就会不存在了。

关于执行部工作范围以外而是也有关联的事，如刚才张岳军先生所说的军事移动的除外事项，也要报告执行部，使执行部可以辨明，可以免除借口和误会，这点也要补充说明。

停战命令，是由政府授权张岳军先生，中共授权本人签字，同时对外宣布，并由蒋委员长和中共毛泽东主席双方颁布命令，昨晚张岳军先生告我说，蒋委员长已经下令通知全军，本人今晨得到延安消息，昨天晚上也已下了命令，根据我们约定时间内，一切冲突停止。

如何消弭内战

第三部分，是关于如何消弭内战。这是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主要之解决的问题，我个人愿说明一点意见。因为刚才张岳军先生提到希望在停战以后，迅速开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商谈整编问题。军队应该整编，全中国的军队应该整编，中共军队也应该整编，以求达到国家化的目的，这是已经定了的事。至于如何消弭内战，那不是包括在三人军事小组讨论范围以内。我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要讨论问题之一，我们在这方面有下列几点希望：

一、要消弭内战，要恢复交通，有一个原则，即国内各方意见的冲突，党派意见的冲突，凡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都应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决不可因此而演成军事冲突。国内问题应由政治解决，蒋主席曾经几次声明，现在世界的问题，尚且要运用政治方式解决，何况国内的问题呢？国内一切问题都要由政治方式解决，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原因。不过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既然目前国内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解决，那么，不同思想与不同意见的分子，除掉是刑事犯或违反一般法律可以依法办理外，其他不论什么政治原因，没有方法铲除或消除的，这一个原则必须确立。

二、关于军事考察团，由国民参政会及政治协商会议推选公正人士组成，这点能够做到，一定有许多宝贵意见告诉双方，告诉全国，同时对于决定怎样消弭内战的方案，一定能得到很大的帮助。

三、我们觉得对于敌人投降以后，仍旧拿着武器残杀中国人民的，应该视为战争罪犯，予以处罚。

四、我们以为对于解散伪军，应该决定具体办法，这是会谈纪要中曾经双方同意的原则，希望政府早定办法，伪军之参加内战、挑拨内战者，应予以严重的处罚。

五、整军计划关系我国的和平建国非常之大，将来可以并入和平建国方案讨论。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整军问题，有商量必要。如能得到各政党的同意，然后拟具整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之下，中共所领导的部队，定当依照计划整军。同时，中共曾答应整编为二十个师，一定可以在三人小组会议中切实商谈。这样，才能使全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道路。我可以代表中共代表团，也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保证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到。

上面这五点，是目前关于消弭内战的意见，至于根本消弭内战的办法，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范围牵涉甚广，要由政治协商会议诸位先生从长讨论。

（原载1946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附〕 政府代表张群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今天主席指定本席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商谈经过。军事上因何发生冲突？交通上因何发生阻碍？不是本席今天所报告的范围。关于商谈经过，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说。

第一、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谈时期：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政府代表向中共代表提出避免冲突恢复交通办法以后，经过几个星期的商谈，又经过几个星期的停顿。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方面提出三项办法，主张无条件停止冲突后，再讨论一切。三十一日，政府方面提出具体方案，说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原为政府一贯主张，为达此目的，必须彼此在办法上有切实之商定，否则停止冲突之商定，难期有效的实施，因此政府提出三项办法。

这个办法，与过去所提办法比较，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美军在中国协助中国战区办理受降及遣送敌俘的问题，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并作一事，作总的解决。因为冲突不停止，交通不恢复，受降及遣送敌俘的问题，无法去办，其他的耽延与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中共代表对上述办法，大体同意。又经过两次商谈，在本月五日，获得一致的协议，作如下之决定。（即“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办法”，从略）

以上说明，是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谈时期。

第二、政府代表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将军会商时期：这个商谈，称为三人会议。自本月七日起，至昨天本会议开会之前止，共开会议六次。自然是以五日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所同意的办法为根据。这个会议的成就，可于昨日上午本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会同发表之声明中，见其要点。共签定了四个文件：（1）停止冲突命令草稿，（2）了解事项（以上两件系三人共同签字的），（3）军事调处执行部，（4）共同声明（这两件是政府与中共双方代表签字的）。共同声明的内容，包括（1）（2）（3）三个文件的要点，这个声明，不仅是本会议各位先生关心，全国同胞关心，就是国际间的友邦也没有不关心的。各位先生对于上项记载，必然都已阅过，无待今天本席多说。政府方面，昨日並已发布命令，并照与中共代表所商定的时限，规定在本月十三日晚十二时以前，不分何地，一律实行。

关于设置军事调处执行部事，公告中只载其要点，现在补充说明几点如下：（1）军事调处执行部，是为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实施，和解除敌军武装及遣送敌俘的任务顺利完成而设，它的任务，规定得很明白。（2）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美国方面已指定罗勃逊代办，政府方面指定军令部郑厅长介民，中共方面指定叶参谋长剑英，后天就可以前往北平开始工作。（3）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事程序：三个委员各有一表决权，一切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对下发布必要的命令，对上报告，由所属的执行组，每日缮具，由各委员分送其首长。（4）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工作，由执行组推动之，执

行组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督察有关部队，有发布及宣达一切命令指令之权，必要地点并将设置分站，或派遣监察或报告小组。（5）军事调处执行部继续存在执行其工作，至政府或中共方面通知废止之日为止。以上各点，是公告中未提及的，为了让各位明了全貌起见，特别补充报告。

在三人会议之中，彼此都有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进行一切商谈。政府方面，只提出以下三项，不受停止冲突办法的限制，须作为例外的。第一项是关于整军的，第二项是关于接收东北各省的，第三项是关于接受赤峰、多伦的问题。关于前两项，均商得一致的同意；第三项因中共代表坚决反对，所以在九日午后会议，未能获得最后的决定。政府殷切期待此次会议的成功，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能够宣布停止冲突的命令，遂作最后的让步，将此项提议并入热察问题作整个的解决，在此次成立停止冲突协议的时候，不作为例外。当九日开会未得结果时，外间揣测政府有何新的提议，以致发生波折，即因此故。

在三人会议通过全部议案以后，本席曾经建议，依据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前经商定之三人小组，应速成立，进行中共军队的整编。因为双方军事冲突，是一件不幸的事。现在三人会议中商得停止办法，化戾气为祥和，自属佳事。但停止冲突，还未将问题真正解决，停止冲突命令发表之后，就能迅速成立三人小组，关于中共部队之整编，及其驻地之规定，从速商定具体实施办法，付诸实施，那才算是问题真正的解决。换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说现在所定执行停止冲突命令的机构及办法，不再存在，那才算是真正完成我们停止冲突的使命。当时马歇尔将军表示认为重要，愿以三人会议之一分子，作迫切的建议，三人小组应从速进行，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亦无异议。今天本席报告，想就以此为结论。因为停止冲突的命令有效的实施期间，中共部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如不迅商解决，无论复员、整军、善后，以及政治、经济的建设，均不能顺利进行，即地方人民的负担与痛苦，也无法解除。各位先生对于此问题极为关怀，应当详细报告，但一切情形及有关文件，多已发表，今天限于时间，所以只能扼要提出报告，尚请各位先生原谅。

（原载1946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报告国共会谈经过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

主席，各位先生：

关于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我本想邵先生一定会先做详细报告，今天临时要我先做报告，因为若干文件不在手头，所以我不预备多所叙述，这是要请各位原谅的。不过各位假使有所询问，我一定据所知的答复。

国共会谈的历史甚长，中间经过九年之久，九年之中，本人除去极短的一个时期以外，几全部参加。今天抗战已经胜利，和平阶段已经开始，我不想把过去抗战八年中，国共会谈情形在此报告，只想就八年国共会谈中间一些方针的问题说一说。

会谈两个时期

在抗战开始以前，民国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间，中共代表与当时的政府代表曾有会谈，所谈的中心问题，也同今天同样的是和平是民主，所不同的当时是要停止内战、团结抗战，而八年以后的今天所要求的是停止内战、团结建国。抗战以前，彼此希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目的达到了，发动了七七抗战；因此我在这个地方报告的时候，有着同样的信念，现在一定能达到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目的。九年来我参预商谈，两次提出同样的要求，都实现了停止内战，虽然一方面是感慨万端，另一方面觉得两度达到目的，首先为中国人民着想，就是个人也觉得获得一点安慰。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国家民族两度经过这样的波折，总是万分不幸。

据此，我感觉关于抗战中商谈经过的报告，只须举出一点来说明：最初商谈时的原则，既然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战，所以在抗战持久以后的商谈，便多限于局部问题的解决，如陕甘宁边区问题、敌后抗日军队的承认与编制问题，同时提出人民自由权利的要求，其时政府方面也提出一些答复，因为彼此意见距离尚远，所以没有得到解决。而最后一个时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中共方面再提出解决全局问题，即是在三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林参政员祖涵代表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参政会后又经过几度商量；在政府方面认为这种主张要动摇政府的法统，没有接受。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纠纷继续，也就伏下抗战胜利以后发生不幸的内战的根源。

抗战胜利以后，新的时机来临，蒋先生三次电邀毛先生，毛先生应邀来渝，就开始抗战

以后新的商谈。这一个时期商谈的原则，是从一般的谈到具体的问题。毛先生来渝后，政府方面指定王雪艇先生、张岳军先生、张文白先生、邵力子先生四位为代表；中共方面指定本人与王若飞同志为代表，开始商谈。中共方面提出十一项提要，然后政府代表逐项加以书面的答复，在彼此商谈中，已经得到同意的记录下来，没有得到同意的继续商谈，以后遂有双十节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签定。其中还有几个主要问题，彼此认为不必发表，因其尚未解决，要留待以后商量的，例如关于进兵问题，政府军队要求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中共方面则要求有些原来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在那里活动已经解放了的敌占地区，或已由中共领导的武装包围的敌占地区，希望在受降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部队都暂驻原地不进，因彼此未能同意，所以会谈纪要没有列入。很清楚的，会谈纪要公布后，继续冲突的扩大，其根源即在于此。

就已经公布的十二项中也可以看出：在此时期中是从一般的方针谈到具体的问题的，而一般方针的解决，我们始终认为是双十会谈纪要的主要成功。因为由抗战转入和平，两党方面都认为要确立基本方针，然后和平建国的事业才能有所遵循。所以毛先生向蒋主席陈述这个方针，得到蒋主席的同意和赞许。这个方针在会谈纪要中的第一项已经宣布了，我相信到今天还是不可更易的。也幸赖有此方针，使得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不幸冲突不能再继续下去而停止了；也因为有了一般方针的确立，进入具体问题的商谈，才能得到不少协议。如同会谈纪要第二项的政治协商会议，便已在此开会；第四、五、六、七、八五项的人民权利及地方自治等问题，前天又得到蒋主席重复一次的宣布；第九项是关于军队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关于全国军队整编的意见；同时承认中共部队整编之最低限度的数目，和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八个地区撤退，并且准备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商量整军问题；第十项是关于解放区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协议，所以决定两种办法：（一）继续商谈，（二）如商谈不决，则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第十一、第十二两项是关于奸伪和受降问题，原则上已有协议，因与进兵问题有连带关系，也就悬而未决。由此可以看出：在纪要中政治方针是确立了，人民的权利有了规定，军队国家化有了开步走的办法，只是地方政权未能得到适当解决，一直继续到去年双十节后的会谈，也依然未得到解决。

四点经验教训

从这两个时期商谈经验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来供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诸位的参考，或者比之空论过去较为有益。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

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位在抗战前半时期奔走团结而故去的国民党朋友张淮南先生，应该对他表示纪念。彼此承认不可敌视，不但两党当事人应该如此，就是两党党员也应该如此。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并不改变，举几个主要的说：（一）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所必须，我们承认，我们拥护，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为冲突而抛弃自己已经承认的信念。（二）我们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过去抗战的八年中，在抗战胜利以后仍然如此，这在民国三十一年

中共七七纪念宣言中就提到此点，这句话相隔四年多，现在证明了。（三）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始终尊重国民党在历史奋斗中得来的地位。（四）国民政府虽然是国民党一党统治，且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党的政府，但是我们既然合作，所以从民国二十五年底以来，就没有不承认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时期想推翻国民政府，而只是要求改组政府。只要看自抗战以来敌后的民主政府是地方性的，始终没有树立另外一个领导的中心政权，就可以证明。就是去年解放区筹备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只是解放区人民的联合组织。这些承认，我们认为很重要，有此承认，可以证明不是敌视，而且是建立政治解决的基础。因此，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如我们过去所常提到的，中共合法地位问题，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问题，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问题，因为承认是一事，承认了并不等于这些部队就不能整编，这些地方政府就不能改选。

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更多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我们认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希望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象今天中国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有人说：你们只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力，你们中共所领导的地区，怎么样呢？我们诚意的回答，凡是我们向政府提出的，保证在我们活动的地区，不仅是同样实行，而且愿首先实行。假如我们实行得不够，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批评，谋更好的改革。假如大家不信，我们愿意欢迎任何人去考察、参观、指教。尤其欢迎因抗战而流亡在外的人士全部回来，因为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主人。

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民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

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

回答几个问题

附带的回答几个在商谈中的问题。在过去不能每次把商谈内容公开，常受各方面询问，乃至舆论上的责难，我们完全谅解。因为我们所商谈的关系国家人民的利益，各方应该关心，不知道时应该责难；不过商谈的双方，想把事情办好，谈好才公布，不能随时公布，也是当事双方的苦心。但不能因有苦心，就不谅解各方面乃至舆论上的责难。所以今天就根据这种认识，简单的回答中共方面在抗战后的商谈中常被大家询问的事情：

第一、中共代表在商谈中是不是只管局部的事，不谈全体的事？根据我上面的报告，可以看出，在抗战中是先从全体谈到局部，再从局部谈到全体。抗战胜利以后，先谈定了方针，然后谈具体，决不敢没有方针，只谈局部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不仅中共方面如此，政府方面也是如此。

第二、是不是只谈军事，不谈政治？在会谈纪要十二项中，可以看到政治问题包括最多，军事方面仅有三项，假如不因政治部分之地方自治问题延搁下来，军事问题也许早已解决。

第三、是不是在商谈中只谈中共自己方面的事，不谈关系人民的事？我可以说不是，因为协议中许多项目，都是与人民利益有关，就是军队整编也是关系减少人民负担的一件大事，而地方自治更是有关万万以上人民的民主问题。

第四、是不是只限于国共两党？或是别的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是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五、是不是中共只向政府要求，不向自己要求？刚才的报告可以证明，凡是向政府要求的，一定要在自己区域实行，而且有许多已经实行，如果不信，愿意请大家去考察和指教。

第六、我们所谈的地方自治，是不是地方割据？过去在抗战环境中，在敌后的人民选举范围，或是程度上有些不够彻底，但的确是选举的，并且我们承认这种选举在和平时期更应求其彻底。这是人民的权利，不能说割据，因为地方自治要和军队整编分开为两件事。

第七、是不是中共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不是的，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商谈中，为求得有效的解决问题，应有步骤与程序，所以在双十会谈纪要中，把如何实行政治改革留在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并希望在和平建国方案乃至国民大会宪草中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八、政治民主化在先？还是军队国家化在先？我们回答：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例如中共说先要政治民主化，军队才能国家化；或是政府说，先要军队国家化，政治才能民主化，这样就无法解决。我们意见，认为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我们看会谈纪要第九项，已给军队国家化定了一个开端的办法，同时，该项又说政府认为各项问题未能全盘解决，则军队数目可以考虑，证明政府意见也是如此。

以上八个问题，常遇到许多方面质询，今天我在这里不仅向政治协商会议诸位先生，同时也向全国人民作这一个总的回答。

（原载1946年1月13日《新华日报》）

〔附〕 政府代表邵力子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报告国共会谈经过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

主席，各位先生：

报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的经过，本人曾想最好是请王雪艇先生担任，王先生奉命和中共商谈差不多有两年之久，但因为去年九月间开始商谈不久，王先生就到伦敦去，不能再参

加会谈。第二位最适宜作报告的是张文白先生，张先生在会谈中是很重要的一位，尤其是双十节发表会谈纪要之前的两三天，张先生努力很大，但因为张先生有很重要的任务到新疆去，当时不能预定他何时回来，以致政治协商会议也未能请他参加，这报告只好由我来担任了。我们知道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是义务不是权利，文白先生当然无所介意，但我在报告之前，不能不先特别声明文白先生对于会谈中的努力。

会谈纪要的全文早经公布，我的报告只简要的就社会各方面对于会谈中的疑问，说明几点。

第一、常常有人问起，会谈的双方究竟有没有诚意？我的答复是有诚意的。

第二、常常又有人问起，会谈没有公开，除了发表的以外，究竟还有什么秘密没有？有没有重要的问题没有发表出来？我的答复是没有。虽有一两点未包含在会谈纪要中，也并无不可告人之处，仍可以让社会人士知道的。

第三、有人看到会谈时期那么长，又没有真正能把问题解决下来，便要问是否双方代表有不尽责任之处？甚或有意把时间拖得很长？我的答复是：没有敢偷懒，更没有敢故意拖延。

第四、更或有人要问，会谈纪要发表以后，问题不能就解决，是否双方有意不肯让步，以致僵持下来？这一点我的答复是在若干点上确有不肯让步的情形，政府如此，中共也如此。这因为：（一）是多年以来的事实造成的困难；（二）是两方面的立场本不相同，各有不能让步之处。但让步的地方，也确实不少。社会各方面要问的不外这四点，以上我就在这个范围以内综合说明。

周恩来先生已说明，从抗战以来，中共一向承认实行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到今天还是如此，这是我们很钦佩的。至于政府方面，更是从抗战那一天起，就决定要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承认中共参加抗战的地位，虽然后来逐渐发生不幸的事情，蒋主席仍是一贯的决定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曾屡次向全国国民宣告这一个决定。一到抗战结束，更几次打电报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毛先生一向不出来，这次也到重庆来了，这些当然都是最有诚意的表现。毛先生来到重庆以后，蒋主席和毛先生有几次谈话，谈得很坦白，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们的会谈就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的。从毛先生来重庆到双十节发表会谈纪要止，我们的会谈约可分做四个阶段：最初四天的连续谈话，是第一阶段，当时中共方面有一个意见，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因为过去不幸的事情太多，不先有良好的情绪，就谈各种具体问题，解决一定很困难。政府的初意本希望解决愈快愈好。雪艇先生昨天说过，他曾主张在十天之内解决问题。不过另一个看法是怕欲速不达，所以先培养情绪，再谈实际问题，也是很好的办法。在那四天之内，我们充分交换了意见。

九月四日起，谈实际问题，开始就发现有很难解决的情形，也即是会谈纪要中第九第十两项问题。第十项地方政权问题，是终于未得解决的，第九项军事问题，在会谈纪要中已有决定办法，但经过的困难很多，且也尚待真正解决。从九月四日起，大家见到问题不容易解决，认为培养良好的情绪还很重要，不能急急求解决。从四日至廿一日共有八次会谈，这可说是第二阶段。有时每天都谈，有时隔一两天谈，九月十、十一、十二这三日，就每天都谈。本来二十一日可以发表公报，因为对地方政权问题，中共坚持主张，没有得到协议，结果未能发表公报。当时的情形，几乎使会谈搁浅。但是我们不愿意真的搁浅，因为这是关系

国家安危甚至世界和平的问题，所以二十七日又开始商谈，到十月五日为止，共有四次会谈，这可说是第三阶段。

在这四次商谈中，两方面又充分交换意见。但还有得不到同意的，而毛先生因耽搁的日子已相当长久，有即回延安的必要，蒋主席早曾说过，毛先生随时可以回延安，照当时的情形，公报几乎仍旧不能发布。我刚才说过，发表会谈纪要很要感谢张文白先生的最后努力。在会谈纪要公告的前几天，可以说是第四阶段。

各位先生和新闻记者，看了会谈四个阶段的经过，对于参加双方的有无诚意，可以作一个判断。参加会谈的人，没有敢偷懒，也可以看出。周先生已说到会谈中的成就，特别是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问题上，所费会谈的时间，并不算少。在我们会谈的习惯和技术上，要求速效实在不容易，不过大家都有要求问题解决的意思，所以费的时间虽然多，却并非躲懒或有意拖延。

会谈没有公开，只每天发表一个简单的消息，是双方认为有此必要，因为要在会谈中培养良好的情绪，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我们在会谈中是无话不说，有时也争到面红耳赤，甚至筋脉偾张，但不久仍能恢复到和谐的情绪。假若谈话情形公开，也许有人断章取义，骤加指摘，就会影响到会谈者的心理，在会谈时有了拘束，不敢尽量发言，所以双方约束到有结果的时候，一定将内容公布于社会，而在会谈中则暂不发表。

会谈的各项问题，可以说全在会谈纪要以内，有未发表之点亦经双方同意。我今天不妨略加说明，借以消弭某一种的误解，例如会谈纪要发表以后，军事冲突随之发生，并且日益扩大，这是不是会谈时没有考虑到呢？我要说明的，会谈纪要初稿原有十三项，最后一项的原文是"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这因为中共最初要求停止进兵，中央即明白答复中央部队为受降前进，中共不应阻止。最后纪要稿写成，上面所说的文字，到会谈纪要快发表的时候，中共主张删掉这一项，中央也表同意，当时是不愿引起全国人民心理的不安。原希望纪要发表以后，快快继续商谈，把各种问题都得到解决，军事冲突自然可以没有。后来会谈进行迟缓，军事小组更未举行，当时是没有预想到的。

会谈中间坚持的事项，亦即纪要中的第十项，我们一看就知道这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就是这一项，我们也承认中共方面有其立场与让步之点，而中央也并非完全不接受中共的意见，如各级政府民选一点，政府代表曾说过自治县到行政督察区可同意，在会谈纪要里也已写明"县级民选加委，中央可以考虑，至省级民选一点，需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以后方可实施。"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两方都有让步，同时两方各有其立场，在政府方面是军令政令统一，这一点特别不能放弃。

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主动，但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责备的。为什么政府方面不自动先提方案呢？这有很重要的理由。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先生的电报，已将政府的希望充分说明。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中共最初提出十一点意见，政府即就所提的各条逐一答复。会谈纪要发表，条目上虽稍有变更，大体是以中共最初所提的十一项为根据。从

这一点，更可以看出政府始终培养和谐空气，寻求问题解决的诚意。

讲到两方让步之点，有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在讨论实际问题开始时，周恩来先生即说明此次中共准备让步，不坚持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一月间所提条件，如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等问题，所以在政府答复十一条时，凡是政府认为应该同意应该容纳的，都立刻接受，凡是认为要再考虑的，也都坦白的说明其理由。会谈纪要已有解决办法而尚待实施的军事问题，也是双方都有让步的结果，如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双方让步的情形十分明白，中央最初允将中共部队整编为十二个师，因为在三十二年时中共只要求编十个师至十二个师，三十三年时中共也只要求编六个军十五个师，这次中共最初要求四十八个师，最后折中为二十个师，实在是双方让步的明证。

中央坚决希望做到的，也是国人共认为必要的，就是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问题。只要军令政令统一，一切问题都可商量解决。本人始终相信双方都有诚意解决问题，其尚未能让步之点，因各有其不能让步的立场，但决非始终不能互让解决。在这次会谈中间，实已解决了许多问题，即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谈纪要发表时已商定大体办法，所以十月二十日重行会谈，此问题所费的时间，并不很多。又如国民大会问题，我们听过毛泽东先生的意见，也知道他有让步的精神，当然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种种，还要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最后，本人以政府代表的立场，对赫尔利将军所予双方代表会谈的助力，热烈的情绪，表示不能忘怀。尤其是他将离重庆最后两天的努力，更使我们感动，今日乘报告之便，特别提出藉示感佩之意。

（原载1946年1月13日《新华日报》）

〔附〕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民主同盟也主张改组政府，这理由很多，并非为想参加政府，第一理由是大家既期望宪政实施，在这过渡时期总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我们很希望蒋先生成为民主的领袖。第二层为，结束训政完成宪政，总希望走上举国一致的政治，因此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第三，目前政府行政效率低，应该使它提高和现代化，本这三点认为有改组政府之必要。

罗先生进一步指出：依上述三点看法改组政府则必须确定三项要点：

（一）既要各党派参加，人就复杂，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西方国家政府由多数党执政，但在选举时必提出政纲政策来竞选，我们若没有一共同纲领，难免使国务院天天去争原则，今天政府代表未提，民主同盟认为应先有共同纲领，使能共同合作免贻误政务。

（二）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

（三）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办法也赞成，但要使它能真执行，要是既不能决策，又不

能行，那就违背了我们主张改组政府的原意了。

接着罗隆基先生提出一连串询问，希望国民党代表能作答，以便考虑何者可同意，他问道：

（一）国府委员会议是政权机关抑是治权机关？原来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府委员会是一治权机关，是否要修改？

（二）国府委员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参加，但须经国民党机关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

（三）增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是整个国府委员会改组重选抑是只补充？

（四）方案中说国府委员会是政治最高指导机关，而说明时则说是决策机关，这“指导”二字似谈不上“决策”。原来的国府组织法，并非指导机关。

（五）决策与用人权分离，则部会高级长官，是否向国府委员会负责，决策如何能保证其实施？各国议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权这问题如何解决？

（六）照方案所列，三分之一委员联名可建议，三分之二府委赞同有否决权，如采取补充办法，参加府委的党外人士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有否决权？

（七）主席紧急处置权，紧急两字如何解释，若无限制，则可能使将来的国府委员会，等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英美的紧急权需提交议会通过，而这方案中所规定只说向国府委员会报告，应请解释。

最后罗先生说他个人认为改组政府，一定要顾到前提三个原则，使它真能过渡到民主，不然只有过渡而无目的，就无意义。要是没有共同纲领，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事，要二个委员会来解决，这是很危险的，做不好，就对不起老百姓。

（原载1946年1月15日《新华日报》）

〔附〕 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同人主张：本会议为奠定国家统一，并树立现代国防起见，应通过下列两个原则：

（一）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

（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为实现上列第一原则及第二原则大量裁兵之一点，应即成立一整军计划委员会。此委员会以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包括左列三种人员：

（1）国共两党之军事人员；

（2）非两党之军事人员；

（3）非军事人员。同时并聘请美国军事专家一人至三人，为此委员会之顾问，必要

时，得被邀列席会议，或受委托，而协助计划工作，限期一个月内制订以切实可行之具体计划。此计划一面要达成军队统一于国家之目标，一面要裁减常备军额至可能之最少限度，但无妨于两年内分期完成。

上项计划，由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核通过后，经由国民政府执行之。在执行时，仍由该委员会负责监督考核之责，直至任务完成为止。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请大会公决。

提案人 张 澜、梁漱溟、罗隆基、黄炎培、沈钧儒

张申府、张东荪、张君劢、章伯钧

（转自《政治协商会议文献》）

〔附〕 梁漱溟对民主同盟提案的说明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民主同盟的提案与青年党的提案大体相同，只有详略不同。相同的地方，第一，为求军队统一于国家和主张裁兵，这两个目标两个提案完全相同。其次，军队国家化之定义，即是军队不属于任何私人，任何地方，任何党派所有，这一点也相同。至于军队国家化之必要，而两个提案也大体意见相同，不过我们提案中说得较少。

梁先生随即说明同盟提案中，主张应通过二大原则：（一）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兵额，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梁先生说：在这“不是世界和平就是毁灭”的时代，真正要求国防安全不在军队，而在努力国际和平合作，不使世界再发生战争。但同时也要估计到战争仍有可能，因此必须与其它爱好和平国家联合起来，准备对破坏和平的国家作战。这一战争，我们的意见不在靠常备军，而是靠科学与工业及受了普及军训的人力。总而言之，常备军无须多，多了反影响科学的研究与工业的建设。

以上是同盟提案中所主张的二大原则。至于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同盟主张成立一整军计划委员会，由：

（1）国共两党之军事人员；

（2）非两党之军事人员；

（3）非军事人员参加。

同时可聘美国军事专家一人到三人为顾问，限期于一个月内制定可实行的具体计划，要达成如何使军队统一国家，如何大量裁兵至可能最少限度。并主张该项计划交政治协商会议审核通过后，交改组后的政府执行。该委员会仍监督考察之责，直到任务完成为止。

梁漱溟并补充说明：同盟提案中的整军计划委员会应为主体，而军事三人小组只是做初步整编工作，可看为大工作中的一部分。其次，全国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它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

（转自《政治协商会议文献》）

延安权威人士在政协会议闭幕时发表的评论

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昨日圆满闭幕，延安权威人士评论称：政协会所获成果，是极其重大的。和平建国纲领，是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之共同施政纲领，是过渡时期中全国所应遵循的民主改革的总方向。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基本原则。整军决议，规定了全国一切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完成的条件。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虽然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在实行以后要达到彻底民主化，还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奋斗过程，去克服各种艰难障碍，但是中国从此无疑的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的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是与会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努力，特别是各民主党派据理力争、同时又作了重大让步的结果。权威人士指出：良好的决议，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一切决定于如何确切与忠实的实施决议。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对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将以最忠诚的态度，在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军队中加以贯彻实施，中共全体党员，将在全国致力于和平合法的奋斗，以求国家之彻底民主化，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共欢迎蒋主席关于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的诺言，希望中国国民党能本此精神，与全国人民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完全实现。

（原载1946年2月1日《解放日报》）

和平建国的起点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新华日报》社论

经过二十二天的努力，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昨天闭幕。从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看来，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确实有很大的成就。全体代表的劳心焦思，各界人民的呼号奔走，国际盟友的关怀劝告，以及蒋主席的领导，并不是白费的，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历史性与积极性的初步收获。

会议的收获之一，是和平建国纲领的通过，使政府在宪政实施前得到了施政的准绳。纲领首先指出："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应即开始"。这正确规定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接着，"本于国家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对于建国原则、人民权利、政治方针、军事改革、外交政策、经济财政改革、教育文化改革、以及善后救济与侨务等九项，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个纲领，经过各党派与无党派代表的一致协议，我们相信它乃是切实可行的。

其次，大会对于宪草修改原则，如国民大会职权、政府组织、地方制度、人民权利义务、及国防、外交、国民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都提出了合乎时代合乎国情的意见。为使宪草修改工作能够迅速有效的进行，大会并通过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以两个月为限，根据上述原则，参考各方意见，汇综整理，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

复次，大会通过了军事改革方案，规定了建军原则，整军原则，以政治军办法与整编办法。其中规定"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与"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尤有特殊意义。因为军队国家化所以成为问题，除了缺乏民主政治的前提之外，尚有对于军队卫国爱民之天职的不了解，实为不能隐讳之因素。政治协商会议，对症下药，定出的方案，实为导引军队国家化的正确途径。

有了好的纲领和方案，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机构来执行，那依然是白纸墨字，所以改组政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经过多次的争执与协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束一党政治，扩大国民政府基础，使各党派及无党派社会贤达，均有机会参加，并提高国府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决策权与用人权在内，使它成为最高国务机关。行政院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及部会长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由于上述各类问题，都得到了相当协议，所以最感辣手的国民大会问题，也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从这些困难问题的协议过程中，可以看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确实发挥了和平协商的伟大作用，这是中国历史的创举。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证明中国的团结、统一，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之上，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武力决不能达到统一，这是三十五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而和平协商的办法，证明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结束后，即努力以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此次政治

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虽然仅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初步，但是这些决议既然符合于今天中国与人民的需要，有它的进步意义，因此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致，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为其实现而奋斗！

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虽然仅是初步的东西，但要实现它，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与阻碍。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争取上述各项决议的彻底实现。和平建国是艰难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各党派的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开步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凡是爱好民主的人，不应对于前途有所怀疑，因而抱着消极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提高信心，积极工作，不怕困难，同困难奋斗，来实现光明的前途。

周恩来就政协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中共代表团二月一日下午二时假代表团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三十余人，代表团出席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周恩来同志首先发言：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昨天闭幕时，已经说过了，现在可由各位提出问题，我们回答。各记者纷纷提出问题，由周恩来同志一一作答。

问：这次决议与中共本来主张有何距离？延安接受有无困难？

答：这次协议结果，在若干问题上与我们的主张存在着距离，例如和平建国纲领与我们原来的提案有距离，其次如政府改组问题上，我们主张多数党在政府中的席位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现在的协议结果并不如此。又如国民大会旧代表，我们主张重选，而现在用政治方法妥协解决。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问：军民分治与军党分离，将来如何具体实现？

答：军事决议案中已规定有几项办法，我们方面保证负责实施。至于更具体的办法，须由改组后的政府和军事三人小组具体规划。

问：军队整编的步骤如何？驻地确定否？

答：全国军队的整编工作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中共将其所领导的军队改编为二十个师，政府将其直接统辖的军队改编为九十个师，双方分别进行。各部队驻地由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第二步，依据总的计划将全国军队统一编制为五十师至六十师。这计划是确定的，实行的具体方法则由将来改组后的政府，三人小组及将来的国防部和建军委员会计划此事，以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

问：第二步统一整编时，中共军队怎样？整编需时多少？

答：那时就无所谓中共军队，因为中共在军队中的组织和活动都取消了，正如同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在军队中也要取消一样。中共军队的整编要通过三个步骤：第一步，中共二中全会可能于二月底三月初召开，讨论并宣布取消军队中党的组织。第二步，实行整编，将军队中党的组织实际取消。第三步，由三人小组及改组后的政府制定全国军队统一的教育计划，普遍实施。以后，国民党自然不能在军队中作反共教育，中共也同样不作反国民党教育。

问：国共军队所受教育训练等颇不相同，混合编制，岂不困难甚多？

答：正因两军所受教育训练等很不相同，所以才须先分别改编、教育，以后再统一整编。

问：中共军队改编后情形怎样？

答：整编后将有四分之三成员退伍，他们将回到生产中去。

问：双方整编如何监督？如不执行如何处理？

答：为监督国共双方整军工作的完成，将组织整编计划考核委员会，包括各方人士参加，它有权赴各地实地考察整编情形。关于考核委员会的职权尚未具体确定，我想它必须具有相当权力，同时它如果发现不执行军事协议的情形，可以配合军事三人小组处理。

问：政治协商是在国共互让的精神下得到结果的，中共方面有何让步？

答：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由于各方面特别是国共互相让步，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让步，国民党方面也有很多让步。中共方面如：纲领问题，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大会旧代表问题，尤其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军队不仅有第一步的整编而且要进入第二步整编。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愿与国民党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以后不是武装斗争了。

问：什么时候可以实行改组政府？

答：我们自然希望越快越好，但自然也得和政府党商量。

（原载1946年2月2日《新华日报》）

较场口暴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新华日报》社论

昨天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被有指使的有组织的暴徒捣乱，大打出手，致主席团李公朴受重伤，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及劳动协会会员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受伤，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及大公报记者高学逵被殴，其他不知姓名之被殴者尚有多人。结果，会被打散，暴徒霸占主席台，为所欲为。这样的事情，出在陪都所在，出在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令人悲愤无已！

双十会谈纪要公布后，我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提高，随后内战扩大，我国的国际地位立即降低了；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各国一致好评，曾几何时，又演出昨天这样破坏民主的暴行。只要是中国人，除非丧心病狂，谁不为之痛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痛心得很。推己及人，我们想国民党人会比我们感觉更加痛心。

昨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考验。它考验了人民，也考验了政府。它考验了保证人民自由权利的价值，也考验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结果的价值。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日，作了四项诺言，其中一项，是保障人民自由。政治协商会议，在纲领中，在宪法修正原则中，都把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规定进去了。然而，从昨天发生的事情看来，这些有指使有组织的暴徒竟敢利用特殊势力，在万目睽睽之下，公开破坏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应享受之自由权利，大打出手，这置政府之诺言于何地？！且置政治协商会议之协议于何地？！

我们于此事不能不加以分析。政治协商会议之成功，会有一部分人感觉不快意，而且反对的。但反对者要讲道理，凡讲道理的反对意见，应该倾听，不应拒绝，这是民主的真谛之一。不快意的事，也只能用理智来衡量，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因为不快意，因为反对，就要利用特殊权威，大打出手，欺凌其所反对者，这还是专横独霸，有何民主可言？且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捣乱暴行，扬之中外，是为自己的团体增光吗？还是丢丑？是增强政府的威信吗？还是破坏政府威信？是拥护蒋主席吗？还是反对蒋主席？这不待智者自明，但为什么这一部分人的组织者竟敢如此这般做了？其根源在于这一部分人不是存心破坏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便是求快意于一时。属于后者，尚易促其觉醒，属于前者，则非单单解释和教育所能济事的了。因此，我们首先希望政府当局，对于这件事，为了自己的威信，也就是国家的威信，要认真查办主凶。这样，才能把整个政府整个党与少数破坏分子分别开来，把附从者与主使者分别开来，把可以挽救的人挽救过来。这样来解决问题，才是认真的，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相信政府诺言之价值，相信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协议的价值，相信国民党实行民主建国的能力。这件事情，关系中外的视听，关系民主政治的前途，万万不应等闲视之。我们坚决请求当局，注意此点。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向各界同胞说几句话。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双十会谈纪要以后内战扩大，这是一个曲折。政治协商会议后发生此次暴举，又是一个曲折。不能因为有这种曲折，就怀疑光明的前途，这样就会失掉信心，就会消极起来。如果怀疑，如果消极，如果因此人民的民主力量不能增长起来，那是极少数破坏分子所喜欢的。现在，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不论那一个阶层，实在痛苦极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我们的出路既然如此明白，除了团结更多更多的人，唤起更多更多的人，齐心尽力，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为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决议而奋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想头呢？李公朴先生说得好："为了民主，不但愿意受伤，而且死亦甘心"。民主的战士李公朴先生，他的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为民主而奋斗的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一切人们所共有的精神。

从昨天的事件看来，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一一实现，谈何容易，没有坚决的不懈的奋斗，人民所受的痛苦就要延长下去。"提高信心，准备曲折，联合起来，努力奋斗"，敬以此十六字，作为一切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奋斗的人们的座右铭。让我们从苦斗中把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建设起来罢！

〔附〕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告书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参加各团体：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业协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杂志联谊会、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华北政治经济协会、陪都青年联谊会、重庆青年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中国木刻协会、中国职业青年社、育才学校、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东北文化协会、音乐艺术社、中国学生导报社、社会大学、星海合唱团等二十三单位，顷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象，内容大要如下：

血案发生以前

首先叙述血案发生以前筹备的情形：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二十三团体，为表示人民对于政协五项协议的拥护，表示对于主持会议的蒋主席的崇敬，和对政协各位代表的慰劳，发起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我们为着要使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曾经举行三次扩大筹备会。对于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均曾发给通知，且随时在报端披露筹备消息，但该

团体等，始终未派人出席。大会决定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会场系向警察局洽借。至九日夜间十时，突有市农会理事刘野樵，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等四人，携带市农会领衔的并无团体公章的所谓八团体“公函”，至筹备委员章乃器住宅，声请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章氏当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致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自然也都会赞成的”。彼等表示：“通知仅有三个团体接到”。但再问以既接通知，何以始终未派人出席，则又支吾其辞。章氏当晚即商诸其他筹备委员，次晨临时多预备主席团标志，以便彼等参加。而中央社报导竟谓在迁川大厦公推刘野樵等为主席团，实属造谣，该社其他报导及对本会招待记者之经过亦多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淆惑视听，诚属令人痛心！”

血案的经过

接着，叙述血案的经过：

“十日晨八时许，会场内主席台上及周围，已有数百人占领，刘野樵及市党部委员兼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到场甚早；中医师公会李森普，市总工会李克愚，市妇女会理事长傅伯群等，亦随即赶到，陆续索取主席团标志，均一一发给。是时，尚未到开会时间，国民党政协代表邵力子先生等均未到，原经推定的主席团和参加团体亦未到齐，但刘野樵等即要求开会。同时布置在主席台上和周围的打手，也鼓噪起来，要求立即开会。主席团同人章乃器婉言劝止，首先被打。旋而刘野樵、吴人初、李森普、李克愚、周德侯、庞仪山等即霸占播音机，宣告开会，刘野樵则自称主席。本会主席团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表示，开会的时间和程序，须照筹备会决定办法，否则亦须协商决定，不能任意扰乱，即被打手围殴；李公朴被推至台下，拳足交加，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政协代表郭沫若劝请他们不要殴人，也随即被殴，台下打手同时即向劳动协会队伍进攻，台上打手并将条凳向该会等队伍抛掷，计被殴重伤有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四人，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劝令不必动武，也被殴打。还有一位姓赵的，为着掩护李公朴，也被殴伤，此外负伤和失踪的至少还有数十人，正在调查中。

劳动协会来的人相当多，因为接受了被打不许还手的命令，所以被殴重伤四人，但结果依然包围扭住了一个钻到队伍里的打手，名陈云鹏（第一次法院讯问时名叫陈云鹏，第二次改口自称系谢海南）身边带有卫戍总部稽查处信封，外注附五千元字样，内装盗用名义油印的口号多张，此人当由该会扭送法院。

至此，筹委会原推的主席团和政协代表曾琦、梁漱溟、罗隆基、陈启天、章伯钧、沈钧儒等亦相率被迫退出；邵力子、周恩来、莫德惠、张君劢、李烛尘等赶到，见此情形也纷纷折回。场内参加的筹备团体群众先后率队离去。刘野樵等领导打手数百人依然扮演开会！演说时，公然反对重订宪草的协议。他们预先准备好的盗用本会名义的告市民书和口号，继续在场散发（早先已曾在场散发），一幕文武配合的丑剧，即忽忽结束。临去时，还将张在会场上的红白布和桌凳，也一齐抢走。刘野樵自始至终均在会场。事后竟谎报受伤，实在是极下流无耻之能事！是日在场的，除了中国新闻记者之外，还有许多外国新闻记者，捣乱情形，闻有一部分已摄入镜头。

5

1

当天下午，在《新蜀夜报》上发现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市渔会、市妇女会的广告，诬指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大汉”捣乱会场，殴打会众，该报还有一篇社评：“要求严惩捣乱会场的特务”，而且说刘野樵代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李公朴不应该阻止他当总主席！十一日的《新蜀报》上复发现该团体等的广告，竟把并未编列队伍，更未携带标帜的民主建国会会员也列入打手了！天哪！天哪！光天化日之下，居然魑魅现形！”

血案的关键

并且，指出血案的关键，说明其为一种预谋：

“依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本案关键的所在：

一、事前通知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派员参加筹备，报上也早已发布新闻，但均未见派人出席。直至开会前夜十时，突然要求参加，显系出我不意，使本会无法准备应付他们的阴谋捣乱。

二、以要求参加为辞，骗取主席团标志，进一步抢主席。

三、未至开会时间要求开会，显系恐怕参加本会筹备的各团体遵时而至，会众增多，会使他们的捣乱阴谋难以贯彻。

四、文角武角姿态不同，但同时要求提前开会，同时要求重推主席，同时软硬兼施，对付劝阻他们破坏秩序的人们。

五、被殴伤的均系本会事先推定的主席团同人及参加筹备团体的职员和当时协同维持会场秩序的政协代表，事业昭然。

六、预先印就盗用本会名义的《告市民书》和口号。

七、以参加庆祝政协成功为名，发布反对政协协议的言论。

八、事后捏造事实，报反咬他人，万目睽睽，欲盖弥彰。

向全国同胞控诉

然后，向全国同胞提出控诉：

“我们向全国同胞控诉，要赶快一致起来，为着国家的为着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坚决要求这一个血案，迅速昭雪！”

几　项　要　求

最后，提出七项要求：

“一、严惩主犯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谭泽森、李克愚、李森普，并彻底查究幕后的主使者及其他凶犯。

二、已经扭送法院的凶犯陈云鹏为本案重要线索，必须严究；并彻底追究卫戍总部稽查

处所发给的五千元系何来源，做何用途。

三、严格查办维持治安不力的负责当局。

四、立即切实解散一切特务机构。

五、赔偿受伤者的一切损失及会场损失。

六、从速颁行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

七、国民党大多数贤良党员立刻起来肃清少数把持党务毁坏党誉的反民主的败类！”

（原载1946年2月14日《新华日报》）

罗瑞卿参谋长就北平执行总部被暴徒捣乱发表谈话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

本日午后二时，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冲入执行总部，中共办公室被捣乱，影响工作，记者特走访中共方面罗瑞卿参谋长，询问此事，承发表谈话如下：

本日难民请愿事，事先即略有所闻，除难民请愿团事件发生外，闻尚有饥寒请愿团亦将有所发动，更闻将在北平发起一反共浪潮，最近平津报纸已起而响应。证诸本日之事，高呼反共口号，不无蛛丝马迹可寻。不管请愿内幕如何，人民应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此乃中共一贯之主张，但本日之事与一般请愿游行不同，不仅闯入执行总部，而且冲进中共办公室，扰乱秩序，致使本部整个工作遭受阻碍。我方工作人员极为愤慨。此外我方通讯员往来受威胁，十九日晚在北池子大街曾遭人无理搜查，幸及时脱开，未受侵犯。政协结束不久，许多议案，全国人民正待政府实施，而特务竟敢如是横行，实属令人费解。执行总部设在北平，重庆曾有协议，安全问题由政府方面负责，从本日之事看来，足见北平地方当局对执行总部工作和安全保障未能尽责。如此种情形不即时改善，致使执行总部无法进行工作，对中国人民实为一大损失。中共代表团，为了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俘之共同任务而来北平，绝不因外来阻力而停顿工作，定用一切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以实现全国人民之愿望。今晨我方召集所属工作人员，一再说服，嘱忍耐继续工作，静待处理，今日仍去执行总部继续进行工作。

（原载1946年2月24日《新华日报》）

〔附〕 特务捣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详情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

继陪都特务捣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之后，古都北平今日上午十一时许，又突有所谓难民还乡请愿团纠集徒众千余人，在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

消解放区”等口号，并散发荒谬传单。午后二时，该批徒众即由少数特务率领，包围军事调处执行部（协和医院旧址）示威“请愿”。事前该部大门门口已密布宪警，但当暴徒夺门而入时，宪兵警察未加拦阻。他们蜂拥入门后，即高呼反共口号，并要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当时叶委员正与美方委员罗伯逊商谈工作，闻讯当即安详步出门外与为首代表王者清、张锴、左更生、李玉衡、李连池、汪振鏊、杜和甫、刘子衡、赵介民、李郅赓等十余人见面，并希望他们将要求解决的问题一一提出，以便交由十八集团军驻平办事处合理解决。奈少数暴徒在特务唆使下，不仅不听叶委员的解释，反而强行冲入执行部中共办公室，其中并有市政府职员和《建国日报》（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关报）记者杨文昌等参加。他们对中共方面之办公人员肆意侮辱和威胁，并猛撞叶委员办公室门。执行部美方委员罗伯逊先生、中共叶委员及政府方面郑委员，派员力加劝阻无效，他们在办公厅走廊内辱骂殴打执行部办事人员，最后竟追进中共办公室，直到被打者从窗口跳出方才罢休。暴徒中，并时时有为首人员高呼“不要打了自己的人”。这批暴徒一直捣乱到天黑，才由为首的暴徒吹哨子集合退出，临去时，还口口声声说：“今天叶委员没有满意答复我们，明天还要来。”按此事发生之前，早有若干征象。半月以来，平津各报早已作反共的叫嚣，特别是《建国日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机关报《华北日报》，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极尽污蔑挑拨之能事，《建国日报》且已重新写出“共匪”字眼，而今天暴徒所散发的一篇传单“匪区人民是这样惨死的”，全文早已在十二月十七日的《建国日报》刊载过。今天以前，已有好几批自称难民的代表向执行部请愿，当问其究竟是那里人是何人代表时，他们有瞠目不能置答者，而今天参加“还乡请愿”的，竟有几个是广东人。现闻执行部三委员拟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主席从严惩处为首者。

（原载1946年2月23日《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就《新华日报》社被捣毁事件向政府提出抗议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哲生、铁城、力子、立夫、厉生、布雷、雪艇、岳军先生公鉴：
并转
蒋主席钧鉴：敬启者，今日沙磁区学生游行，经过新华日报营业部约二十分钟之后，时在午前十一时半左右，另有暴徒百余人将该营业部捣毁一空，并殴伤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及徐君曼、管佑民等，重伤三人，轻伤一人，书报什物，门窗，全部毁尽。直至午后一时四十分，尚有暴徒在馆盘踞，同时闻民主同盟民主报社，亦有暴徒捣乱情事。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较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盟国合作，造成国内分裂，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之阴谋活动。长此以往，凡赞成团结民主之人士，在阴谋分子与特工人员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无保障，民主政治谓何？盟国团结谓何？堕国家之威信，置钧座庄严之诺言于何地？恩来等，为国家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计，不得不郑重提出严重之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敝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损害，实行道歉与赔偿，并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临颖不胜急切待命之至，专此敬颂
勋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
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秦邦宪

二月二十二日

（原载1946年2月24日《新华日报》）

〔附〕 张澜致蒋介石函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介公主席钧鉴：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始而发生特务在沧白纪念堂连日捣乱政治协商会议

陪都各界协进会会场事件，继而发生特务宪兵警察联合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各方已认为遗憾，不意政协会议议决五大方案方公布于国人，重庆忽又发生特务人员在较场口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血案，李公朴、施复亮以及政协代表郭沫若诸人，俱遭毒打，此案发生，尚在我公赴京之前一日，其经过情形，谅有所闻，嗣经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无党派代表李烛尘诸先生，亲访吴秘书长铁城，请求政府惩办祸首，迄今仍无结果，讵料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重庆学生爱国游行大队已过民生路二十余分钟，突来特务暴徒多人，利用学生游行机会，先将新华日报营业部全部捣毁，并殴伤职员数人，复将中国民主同盟所办之民主报营业部捣毁。自我公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初，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首为保障人民之自由，全国人民无不额手欢慰。乃反动阴谋分子竟在辇毂之下，制造不幸事件，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之知，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专此上陈，敬祈钧察。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张澜谨上

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1946年2月25日《新华日报》）

在国民党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新华社述评

〔新华社延安二十六日电〕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煽动和组织各地反苏反共运动的狂妄活动，在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之下，正在日益扩大。在重庆，反动派计划连续不断地制造事端，他们在组织二十二日沙磁区学生参加反苏反共示威游行以后，又用同样伎俩煽惑北碚学生于次日向渝市进发，重演二十二日反苏反共丑剧。在二十二日被捣毁的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墙壁上，特务分子贴上令人发指的污蔑标语："打倒赤色卖国贼"等等。在成都，反动派也如法炮制了同样的丑剧，煽动了一次反苏反共示威，特务分子照样突入新华日报办事处，捣毁用具，抛掷书籍。在南京，反动派所组织的"大东亚青年协会"与"抗战军人联合会""号召自动参战，武装收复东北！"（见合众社重庆二十二日电）。在上海，反动派煽动一群学生到苏联领事馆示威。其他各地，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及璧山等地，反动派都在拚命制造反苏反共舆论，积极布置示威游行。甚至在国民党刚接收的台湾，也于二十四日发生了所谓"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示威游行。根据上列各项消息，就可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个反动的高潮。所有这些反动示威，包括二十二日的重庆示威在内，被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欺骗参加的学生都只占当地全体学生的极少数，例如二十二日在重庆只有七千人，二十三日减至二千人，二十三日在上海只有二千余人，可见中国人民绝大多数其政治觉悟程度甚高，他们能够判别是非曲直，决不盲目跟随反动派走。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即是利用人们不明东北真相与不明反动派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阴谋之结果。我们相信只要东北真相被了解、反动派的阴谋被揭露，真正的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
西斯反动派这种狂妄活动，不仅没有遇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制止，却反而得到许多当局人士的支持和鼓励。美联社的电讯说："重庆一些观察家评政府之不干涉反苏示威，表示同意反苏的煽动。政府如愿意的话，是能够停止此示威运动于其甫一发轫之初的"。当二十三日反动派所煽动的北碚学生游行队伍行抵国民政府时，据中央社报道，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对他们讲了这样的话："昨今两日诸同学之爱国游行，已博得中外之钦佩同情，一俟主席返渝，即将同学意见转呈，想乃主席亦必感动。近来国内各地学生，如北平上海皆有类此游

*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新华社述评。

行，足见全国同学之爱国热忱，实应为国家庆幸。”

但是不论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如何起劲地欺骗并煽动一部分学生举行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反革命示威，也不论某些政府当局如何纵容与鼓励这种反革命示威，归根结底，反动派自己是要失败的。企图挑拨美苏两大强国举行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中国法西斯反动派好从中取利、从此“翻身”的阴谋，是确定要失败的。对于美苏，它们的团结政策一定不变，断不会受这批中国法西斯臭物所煽动。对于中国人民，因为这种阴谋完全是反民族的，即是说，如果反动阴谋实现了，仅仅于德日意法西斯残余有利，于中国民族是绝对不利。关于那些反动口号，例如所谓“铁血收复东北”，“自动参战，武装收复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之类，中国人民很快就会知道，这是反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反动阴谋。关于反动派挑拨内战的阴谋，表现在极端诬蔑与侮辱中共与民主人士，捣毁中共与民主派的报纸，殴打中共党员与民主人士，所有这一切，中国人民也是很明白，内战是确定地不能再打了。总之，在反动派极度猖獗之下，中国人民将更加团结起来，制止一切反动活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发言人谈坚持政协原则

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称：国民党中许多有力人士，现正企图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若干原则决定，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此举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协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凡所决定，都切合国家的需要与人民的期望，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尤得国内外舆论一致赞美，认为非此决不足以奠定国家民主化的基础。在政协会议中，国民党代表团人数最多，并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任会议主席，蒋氏曾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致词中郑重声明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各种方案，本人虽然不能出席参加，但是时时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现在距该会闭幕之日仅一个半月，国民党方面忽然对于宪草原则等项决议提出修改意见，实使人们不胜惊异！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诺言，素极重视，对于信守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更认为是各政党政治信誉与国家百年大计所关。因此，中国共产党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

（新华社延安1946年3月17日电）

彻底消灭法西斯阴谋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解放日报》社论

在最近一两个月内，人民欢呼了停战命令，欢呼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是代表人民对于和平与民主的希望，是人民长期流血奋斗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法西斯派不愿意中国得到和平与民主，中国法西斯派的乌云正在向着光明袭来，企图遮断人民的希望。

简单回溯一下，中国法西斯派，有很长的历史。从一九二七年清党以来，他们压倒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便成为国民党内当权派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力量及其特务组织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九一八"后，中国人民涌起了抗日爱国的高潮，中国法西斯派卖尽气力替日本法西斯血洗了这运动。但是他们在反对人民爱国的斗争中，又得到了新的经验，他们觉得需要重新充实他们的力量和组织，于是他们和墨索里尼有了更新的友谊，来来往往，象一家人，而希特勒皇上又给了他们更大的鼓舞。中国民族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苦难与中国法西斯派的气焰万丈，彼此成了鲜明的正比。这时候，他们除了到处扩大或重新建立"盖斯塔波"式的恐怖组织，成立了各种法西斯的秘密团体之外，他们还出版了许多杂志书籍，专门传播法西斯思想的瘟疫。在中国出版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许多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专书，差不多全是国民党内的法西斯派翻译或编著的。代表国民党统治官方的一切报纸，国民党开办的各式训练班，差不多全受法西斯思想的支配。国民党内是有大数量的民主派的，但是他们被认为"落伍"，遭受了排斥。

这里不能逐一计算中国法西斯派历来所歌颂的法西斯"德功"，一九三四年有一个国民党员写过一本《意大利法西斯政治制度》，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给他自己这本东西写的序言，有以下这末一段话：

"自一九二二年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执政后，一举而意大利变强，现已跻于世界四强之列，再举而希特勒执政德国，又趋于强盛之途，三举而日本势力澎涨，已侵占我东北四省，继之者有爱尔兰与奥地利，而英、法、波兰、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巨哥斯拉夫诸国亦皆有法西斯蒂之现形。最近，墨索里尼且宣称，法西斯主义为世界最好主义，法西斯蒂制度为世界最适用之制度，而意大利最近之对外政策，亦放眼于世界，除思攫取欧洲之霸权外（如最近又保障奥国之独立），并锐意联络东方各国……往者，墨索里尼谓，法西斯不是出口货物，今则已不胫而走天下矣。何以法西斯如此水到渠成，声势浩大？此谓人人所急欲知者……"

这类法西斯思想可以说是下流至极，而又狂妄至极。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思想完全相反的，这是完完全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中国法西斯派虽然嘴里叫什么"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却完全没有什么民族的良心，竟至认贼作父，他们对于侵略我们祖国的日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不但丝毫没有什么仇恨思想，反而发生了惊叹和顶礼

的怪现象。他们不以为做敌人的奴婢是羞耻，而且还想跟着他们的主子德意日法西斯的屁股后面，招摇走过世界。我们敢说，这些不只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多数的灵魂。他们长期地浸淫在这样下流的设想里面。

一九四三年意大利法西斯的塌台，对于中国法西斯派真象晴天霹雳，不禁惊惶失色，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谓"不胫而走天下"、"水到渠成、声势浩大"、"为世界最好主义"、"为世界最适用之制度"的法西斯开山老祖墨索里尼，一下子就象猪一样被绑起来，紧接着希特勒也完了，日本法西斯也完了，于是中国法西斯派便渐渐地想涂上另一种保护的颜色。

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法西斯派企图经过长期内战的方法，保护中国法西斯制度，但是这是中国人民所不容许的，也是反法西斯的联合国民主人民所不容许的。中国人的民主觉悟程度是空前提高了，对于这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就使是政学系机关报和国民党官方有密切关系而以"小骂大帮忙"为其宗旨的《大公报》也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这次抗战教训了大家……这次争民主浪潮决不象以前那样，仅是少数党派或知识分子的运动，而实际卷入了全国每一阶层，工业界、教育界、商界以至广大的农民普遍起而要求。因为事实说明，没有国家民主的前途，就没有任何个人生活事业的前途，这个浪潮实在就是这次呼唤停战的原动力，它也将坚持民主自由的贯彻实现，谁违反了谁就要遭摧毁。"

大公报是说得不完全的，特别没有说到和平民主的主要原动力——中国工人阶级。中国民主潮流是很广泛而不可遏止的，这已经成了公认的真理，国内的动力和国际的关系造成了停战命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这是对于中国法西斯派重大的一击。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中国法西斯派绝对不可能倒转历史的车轮。但是如果大家因此就以为万事大吉，就以为人民可以无灾无害，到达光明。这种天真的乐观，就会变成错误。中国在前进着，但是必须不断克服法西斯派的抵抗才能前进，这便是时局的特点。

中国法西斯派已有十八年的历史，一方面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机构、军事机构、经济机构、文化教育机构都拥有极庞大的特务组织，另方面他们在国民党内曾经全力发展法西斯派的秘密团体，贯注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因此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党务已有操纵的力量。人们必须看到这些东西：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这种特务组织及法西斯主义教育是绝对不能并存的。很清楚的，要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要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贯彻到一切实际生活，完全更新中国的面貌，并使国民党在人民中重新得到威信，那末当权的国民党，就绝对应该由中央到区乡，彻底解散这种政治机构、军事机构、经济机构、文化教育机构内所有特务组织，并公开地、毫无保留地对于历来在国民党内外所贯注的法西斯主义教育，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完全恢复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特别是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传统，在一般国民党员当中来一个民主主义的思想革命。

不错，拥护中山先生民主主义传统的民主派，与接受德日意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法西斯派，在国民党内是进行着斗争，但是法西斯派的力量显然是企图坚持自己原有的一切，并对于国民党内民主派实施着强力的压迫。中国法西斯派在新的形式下重新举行政治的进攻，并准备用这样形式或那样形式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变成具文和虚伪的东西。

中国法西斯派在国民党内正在活动着一种所谓"革新运动"。什么是他们的所谓"革新运动"呢？这种运动不是从拥护国内和平、国际和平发端，不是从拥护国内民主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发端，相反，他们是从反对国内和平和挑拨国际战争发端，是从反对国内和

平合作和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发端。人民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叫做成功，但他们却把它叫"失败"，他们把反民族、反国际和平、反苏、反共、反一切民主派（包括反对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反国内合作……这一切作为"革新运动"的指标。就是说，这种"革新运动"彻头彻尾是法西斯主义的，所谓"革新运动"就是中国法西斯派企图强化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他们觉得国民党旧有的机构还不能够对付民主运动，国民党内还有很多保持中山先生民主主义的开明人物，所以他们要求一个更强化的法西斯主义的机构，彻底排斥民主派或非法西斯派，以便他们进一步地操纵一切，并准备把他们原来还站在后台的人物完全直接站到前台来，提高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所谓"革新运动"乃是日本法西斯派的"革新运动"的再版。日本法西斯少壮派自称"革新派"，中国法西斯同样。中国法西斯派因此在最近就藉口东北问题，在国内外进行大挑拨，发动了反苏、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示威，求得重新树立他们在国民党内政治上、精神上、组织上压倒一切的威风。《中央日报》把这次反苏、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可耻示威叫做"新生之机"，就是说，这个法西斯运动，原来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革新运动"。

中国法西斯的这种反动活动，不能不唤起中国人民的严重警惕。把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粗略地例举出来，足以证明法西斯派的猖獗：

一、一月中旬政协开会期中重庆沧白堂的恐怖事件；

二、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被搜查的恐怖事件；

三、二月十日，重庆较场口群众大会被打散的恐怖事件；

四、二月二十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被捣乱的恐怖事件；

五、由二月二十二日重庆开始的反苏、反共、反民主示威，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殴打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恐怖事件；

六、广东国民党军队继续进攻广东的人民抗日军；

七、山西阎锡山军队联合敌伪，沿白晋路南犯解放区；

八、国民党军队王耀武部七十四军密运济南；

九、鄂豫国民党军队继续修筑碉堡，围攻新四军第五师；

十、国民党军继续在东北扩大内战；

十一、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勾结敌伪残余在东北各地组织恐怖行动，暗杀北满抗日联军领袖李兆麟；

十二、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对于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压迫，对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宪法原则的攻击，所谓"革新运动"的积极化；

诸如此类，事实说明了什么呢？事实说明了：人民的和平民主浪潮正在前进，但法西斯的反动力量还没有真正被击破，他们恐怖、破坏、种种阴谋，还在层出不穷。法西斯派在中国政治机构、军事机构、经济机构、文化教育机构内的庞大特务组织还是存在，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在国民党内也还没有被清算。重庆沧白堂、较场口、北平执行部、二月二十二日开始的反苏反共反民主示威……这一切所有的恐怖事件，没有受到阻碍，没有得到惩处，而法西斯派对于政协所决定的宪法原则的攻击与所谓"革新运动"的叫嚣，还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得到喝彩，这就表明，如果和平民主的力量不及时警惕起来，彻底击破他们的阴谋，则他们必将得寸进尺，寻找时机，起来推翻全部的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和整军协定，以便把人民重新投入内战的独裁的深渊。

但是人民将决不允许法西斯派的猖獗。人民的力量已争得来的东西，绝对不允许被破坏，被污损。只要人民的力量更充分唤起，只要人民善于注意法西斯派的一切阴谋，只要人民百分之百的实行政协的决定，不允许任何修改和破壞，那么法西斯反动派的阴谋就能及时的克服。人民的任务，就是必须用一切努力，去澈底战胜法西斯派对于和平民主的反动。

我们同时希望国民党的领袖和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充分注意法西斯派最近的活动，注意他们的活动对于中国的危险性，对于国民党本身的危险性，而坚决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与人民在一起，与中国的民主力量在一起，百分之百的实行政协会的协议，消除法西斯派的一切阴谋，取缔法西斯的一切恐怖行动。只有这一条路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新生之机"，除此以外，任何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都只能招致国民党在人民中间的失信与失败。

（新华社延安1946年3月18日电）

出 尔 反 尔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

《新华日报》社论

国民党的二中全会闭幕了。在它的开会期间，我们曾经指出："国民党的二中全会成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坛……整个全会中，专制反动的邪气高涨，和平民主的正气不振……反动分子肆无忌惮的公开正面攻击政治协商会议，企图撕毁其决议"。我们当时，为国家民族的福利计，为国民党的政治前途计，曾经向国民党总裁及一切正义人士致恳切的忠告：及时制止反动派的猖獗行为，勿让反动顽固派"横行无忌，出尔反尔，儿戏国是，使国民党和中华民族陷于黑暗之域"。很可惜，我们这些忠告，未被听取，反动派的横行，未曾受到及时的有效的制止，国民党的二中全会虽未公开宣布推翻政协决议，但实际上已被反动派拖上了出尔反尔，不信不义的道路上去了！

二中全会各项重要决议，除了一两处保留实行政协协议的空洞字句而外，从根本上从实质上从基本精神上完全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使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几个月以来的全部努力，有完全枉费的危险，使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光明前途，罩上了一层暗云。请看国民党全会的几个重要决议吧：由主席团提出经全会通过之要案称："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任之。如各党派人选在二中全会闭会前不能提出名单，则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常务委员会选任之"。这一决议，不但直接违背政协决议，回到国民党代表在政协开会前所主张，而为其他代表所猛烈反对的"国府委员须经由国民党中执委通过"的老调子，而且实质上使改组政府的协议全部变了质。政协决议的基本精神，是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以为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而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又重新回到国民党中执委君临于一切国家机构之上的最丑恶的一党专政去了。其他党派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选任，要听命于国民党的中执委，其结果是政府的改组只是一党专政的改头换面。如果各党派经过这种方法去参加政府，实质上就变成粉饰一党专政制度的脂粉。因此，这一问题在政协小组发生了重大的争论，而为国民党外的代表们所一致拒绝了。现在国民党片面撕毁了此项协议，企图重新恢复一党专政的统治。不仅这样，经过其二中全会，国民党比政协开会前还要更进一步，更露骨的企图继续一党专政，这从主席团所提出的第二项决议中可以明白看出来。这一决议说："……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撤消，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依据政协的决

议："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先生在说明政府提案时，亦曾确实指明目前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一切职权均移交国民政府委员会。而国民党现在又破坏了自己的诺言，及其与各党派的协商。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消后，不将其权力移交国府委员会，而"恢复"一党专政时代的一党君临政府之上的"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出尔反尔，一至于此。

其次，同日国民党全会又以全体一致起立的隆重仪式，通过了国民党总裁以国家元首出席指导及国民党国大代表的双重资格，出席国民大会。这是一个以一党独裁的丑恶形态去污损制定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企图，它不但违反政协对国大的决议，而且是任何民主国家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制宪会议要由元首去指导，除已经坍台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日本外，实在史无前例。

对于政协的宪草修改原则，国民党全会更加明目张胆的叫嚣，反对。全会对政协报告决议，将宪草列为专门一案，决议"通令全党同志遵照：（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这不仅是完全推翻了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协议，而且完全破坏了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的任何可能，根据这一决议，连五五开国民大会和制颁宪法，也是"违反总理遗教"的，因为制宪所应依为"最基本之依据"的建国大纲，规定："全国有过半数省达到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成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现在岂仅没有过半数省，而且连一个省也没有"达到全省地方自治完成时期"，所以，主张如期召开国民大会的国民党全会，首先就违反建国大纲！然而，一切"总理遗教""五权宪法""建国大纲"，都不过是遁辞与烟幕，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是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持衡；他们所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因此，他不但反对了政协决议，而且也反对了杜鲁门的"一党训政制度必须修正"及建立广泛代议性政府的对华声明，不管他们在口头如何伪善的称道杜鲁门对华政策！

对于整军协议，国民党全会则无保留的批准了与张周马三人委员会之"基本方案"完全对立的"军事复员报告"。这个报告一字不提三方面同意的"基本方案"，并且直接违反方案所规定的"政府与任何政党或派系组织，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独立性之武力"；而计划在整军第一期之末，保持五十一个兵工建设总队，即保持在方案规定的一百五十万人再加以机关学校之外，尚保持约一百万人的独立性武力，第二期亦保持相等数目的独立性武力。

全会关于政协报告的决议及宣言中又极力诬蔑始终忠实执行政协协议的中国共产党，而对国民党应如何确实遵守实行诺言，反无明晰具体之规定。对于政协开会时蒋主席信誓且且再三保证之四项诺言，全会决议默不作声；对于损害人民自由权利之特务暴行，全会无一字之谴责。凡此一切，都证明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反动派的把持下，走入了歧途，使反动派的卑污企图获得了在国民党内的合法面貌。全会的决议破坏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原则，坚持着要保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和其私有军队。全会的决议不仅违反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伟大愿望，不仅背信弃义地动摇了国民党总裁自己庄严起立拥护的政协协议，而且也打击了全世界民主人士对我国的热忱希望，违反了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告对中国的殷切期待。

二中全会所以走入这种出尔反尔不信不义的歧途，固然是国民党内反动法西斯派假“革新”之名实行反动，假“党内民主”之名实行党内恐怖，阴谋煽惑把持操纵的结果；但是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立通过之政协决议。我们认为，这无论对蒋先生，对国民党，对国家民族，均是深可痛惜的事。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重诺守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一个政党配得上称为政党的起码条件。我们在停战协议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在制定整军协议中，为着中国的和平民主，作了无数委曲求全的重大让步。但是我们一经同意，决不改口，决不反悔，我们将无条件地把所有三个协议完全无保留地实现。但是我们也是为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决不容许任何别人来动摇或破坏这一切协议的任何一字一句。

我们坚决指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这种破坏协议的行为！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为保卫与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而奋斗到底！

〔附〕 蒋介石在孙中山纪念周上讲话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

此次全会，关系本党之成败与国家之存亡。希望各同志平心静气，认识国内外之现时环境，研究实际办法，不可一时片断之观察，而有愤慨空洞之议论。继对国际情形及国内现况有所分析。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认为此系本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之表现，吾人应为国家之利益而促其实施。惟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本党一贯奋斗之目标，两者实不可分离。外间有人认为只要承认三民主义，即可不必采用五权制度，此点实有详加阐明之必要。宪法为国家百年大计，吾人应根据总理重要遗教，加以检讨。惟当时会议既有所决定，吾人只能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最后勖勉全会同志一切言论行动必须有目的，有政策，有宽大之气度，而不必斤斤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尤应在全会中发扬党德，发挥民主精神，并遵重纪律，以完成吾人革命建国之使命。

（引自1946年3月5日《大公报》）

〔附〕　国民党二中全会上法西斯派反动活动经过

〔本报综合报导〕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自三月一日开会，至三月十七日闭幕，出席中监委三〇六人（经常到会的只有二百余人）。该全会闭幕之前，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都纷纷预测即将爆发的激烈斗争："预期在即将举行之会议中，国民党高级领袖间关于接受政协会决议案问题上，将有许多激烈的争论，因为国民党中央政界与军界内许多有影响的分子，反对将权利交予其他党派。"（合众社重庆二月二十八日电）"关于政府对共产党让步的热烈辩论，料国民党顽固派将带头施行攻击。"（美联社重庆二十八日电）全会以前，国民党内反动派制造了从沧白堂暴行直到各地反苏反共示威游行的一连串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的宣传机关，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中央社等，不仅竭力散布反苏反共反民主的言论，而且叫嚣"国民要新生""对国民党过去历史与将来地位无隐瞒焦虑"，"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外人士早已知道国民党反动派要利用该党二中全会，来进行破坏全国和平民主事业，同时打击党内民主派与非法西斯人物的活动。大会开幕以后，这些活动丑剧便一幕一幕地演出来了。

三月一日蒋介石氏致开幕词，二日吴铁城作党务报告，谈到"党和党员脱节，党员和民众脱节""党员很少到群众中去服务"。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法西派即趁机对该党内部赞成政协会议的分子，展开猛烈的攻击。在"肃清官僚主义""肃清党内游移分子"的口号下，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力子、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理由是"对其他政党太妥协了""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等等，CC分子谷正纲并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革命的势力"。中央社对于此种攻击，大事赞扬，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三日由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报告中对马周张三人委员会所协议之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反动派拟以整军复员报告的方式，推翻马周张的整军基本方案，企图在十二个月后（第一期）保持三百四十七万大军，代替方案中规定的一百五十万；在十八个月后（第二期）保持二百八十二万，代替方案中的八十四万。这一报告和全会决议对于整军方案的态度（见昨本报）透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整军方案的阴谋。

会议两天，反动派已闹得乌烟瘴气。四日纪念周上蒋介石训话，虽然劝到会者"不可以表面片断之观察作愤慨空洞之议论"，但同时又给反动派以鼓励："各同志热烈讨论，此即爱国爱党之精神，本人寄与无穷之希望。"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蒋介石一方面说应该"促其实现"，另一方面却说"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实际上支持了法西斯反动派的立场。

四日下午二时，由反动派主持的（梁寒操出面）"党政革新座谈会"（"革新圆桌会议"），竟公开举行，有中委百余人参加，提出"打倒官僚资本""肃清官僚主义"等欺骗纲领。

四日下午及五日上午，反动派针对经济、财政金融两个报告（经济报告为翁文灏氏；财政金融报告为俞鸿钧氏），假装关心民生疾苦与保护民营工业等，集中攻击官僚资本之弊

端，与敌伪产业处理之不当，暴露了国民党的不少"家丑"："忽视民生主义，培养官僚资本"，"抗战期间统制经济失败"，"民营事业听其自生自灭，不加注意"（按应改为摧残吞并），"重工业几乎完全停顿"，"对失业工人无有救济办法"（按应改为暴力压迫和武装驱散），"经济部所派接收人员颇多失职"（按何止经济部！），"生产低落，民生凋敝，物价高涨，人民深受痛苦，公教人员及士兵生活艰难"，"后方工厂倒闭，收复区接收工厂都未开工，整个经济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反动派人物并提议大会不应接受经济部之报告，及主张行使"罢免权"，设立"接收敌伪产业物资清理委员"，要求公布官僚资本的姓名，列为革命对象，要求公布外汇之数目及清算公布接收之敌伪物资。CC分子更要求"行政院向全会辞职"，"罢免翁文灏"，"宋子文应负全责"。这些法西斯分子在几天的叫嚣中，好象变成了"反对官僚资本"的"英雄"了。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法西斯反动派不但是官僚资本的保镳，而且也是官僚资本的掌握者。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官僚资本，不是都在法西斯反动派的手中吗？前几天，利用开放外汇，以二十元法币官价（市价为法币二千一百余元）购进美金外汇一百九万大发横财的，不正是"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的董事长陈立夫吗？原来中国一部分官僚资本集中于法西斯反动派之手，还有一大部集中于其他大财阀之手，这两派的官僚资本间正发生剧烈的斗争，如接收敌伪资产、金融、外汇、财政经济等等，均为争执的项目。法西斯反动派在"反对官僚资本"的口号下，力图扩大自己的官僚资本，并吞其他派系的官僚资本。这和希特勒、戈林以"反对财政资本"为名，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垄断财阀，如出一辙。

从五日下午至六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中，反动派大肆反苏的叫嚣，据中央社报导，"会场充满了抨击声"，"会场情绪悲愤激昂"，"白崇禧等之发言，屡为热烈掌声所中断"。路透社报导：有些反动分子，甚至高叫对苏联"诉诸武力"。据路透社报导，王世杰氏虽曾极力表示对苏联"决不作任何'让步'？"，以缓和对他的抨击，但毫无效果。据中央社报导，六日"热烈激昂之情绪，较昨天尤有过之。"

七日八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反动派"对政协会改组政府及其他决议皆极端反对"，称之为"党国自杀"与"国际压力之结果"（美联社电）。整个两日会场为法西斯恐怖空气所笼罩。反动派不断咆哮："宪草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等等。

十四日正午刘斐（军政部次长）作东北问题报告，故意歪曲事实，肆意诋毁苏联，诬蔑中共，颇得反动派之叫好，"会场频报以壮激之掌声"（中央社）。在会场上反动派散发了攻击熊式辉（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传单与小册子，高喊"要熊式辉出来报告"，"武装接收东北"。为了配合会内斗争，反动派又组织了所谓"东北七团体"代表四十人冲入会场"请愿"，辱骂熊为"拙劣的外交"，"没有带无线电台及中苏条约一份至满洲"，要求"将熊式辉免职"（路透社电）。代表全会接见"代表"的陈诚与陈立夫，允将"请愿书"转给蒋介石氏。

十四日下午鹿钟麟等作巡视华北的报告，对解放区极尽诬蔑之能事，反动派"一致鼓掌"（中央社）。

关于全会的决议，本报除了已报导其主要者以外，还有一个决议须在这里补充报导，那就是十五日全会在反动派操纵之下，通过了"请政府对各省中共所谓解放区中各种虐政暴

行，速谋制止及善后，以解人民倒悬案”。这个狂悖的决议案，又是反动派阴谋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发动内战、血洗民主自由的解放区的一个铁证。二中全会是国民党内反动派的无耻阴谋的总暴露，全国人民和民主人士要看清楚这个阴谋，并予以粉碎。

（原载1946年3月20日《解放日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驳斥吴铁城谈话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接见本社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先生昨日发表的谈话，为国民党二中全会辩护，依然继续用强辩、逃避、蒙混的方法，想把事情混过去。因此，为了保卫政协决议的明确性，为了使国内外人士明了事实的真相，不能不加以驳斥。

（一）政治协商会议的价值，在于它的五项协议，结束了国民党一党训政。如果没有国民党一党训政之结束，则政协之举行是毫无价值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则企图用种种方法，表面上拥护政协，实际上系偷天换日，想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此种一党专政，已经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为杜鲁门总统与莫斯科三强外长会议所指斥。

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建立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政府。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应如吴铁城先生所说，须“依照训政时期约法”来产生，即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选任。如果新政府的名单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选任，那末，即使有别的党派或无党派的人士参加政府，这个政府仍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亦曾有过经过国民党选任的非国民党员参加，但政府的一党专政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在政协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第二条中，写明“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这里明明白白是经政府主席选任，不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任。在协议附注第一条中，诚有“提请”二字，但这是由于七次小组会议争持不下，为顾全国民党代表的困难留下的，既未书明向谁提议，且协议正文与附注发生矛盾时，自应以正文为依据。不但如此，而且该附注之第二条，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如所提人选有为各被选人三分之一所反对者，则主席须重新考虑，另行选任之”。可见主席在选任无党派人士时，当须与其他被选人商量，取得其同意。决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有权决定。现在吴铁城先生以附注中的“提请”二字来推翻正文中的规定，并解释为“依照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委员应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这种蒙混的办法，是没有人能够同意的。

不仅如此，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各决议中，国民大会由政府主席“指导”，明明是把主席的地位放在国民大会之上，“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国防最高会议，明明是企图把中央政治委员会放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上。

凡此种种，都是要坚持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实质，使问题蒙混过去，故“故意误解”的，正是吴铁城先生。

（二）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宪草修改原则，只有经过协议的才应被各党派所承认。而且，已经经过协议的更应被承认。政协所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是经过五方协议的，应被国民党方面所承认。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国民党代表经过政协综合小组两度磋商，曾向各方代表提出，要求修改三点。当时各方代表即指出，必须保证：一、国民党方面不再提出其他修改，二、国民党方面须执行政协协议，约束其党员在国民大会中赞成由政协修改的宪法草案，在这两个条件下，国民党所提出的三点修改可以进行协商；如果破坏此种保证，则国民党所要求修改之三点无法协商。十五日得到三点协议，十六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即通过决议，改三点为五点，“通令全党同志遵照”，“交中常委负责处理”。这是完全破坏了保证。

这种无限制的破坏保证，更表现于国民党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吴稚晖先生的提议。政协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中写明：“政协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协商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可见依照协议，只有政协的修正案，可以提交国民大会。这个协议，被国民党二中全会用通过吴稚晖先生提议的办法破坏了。

对于国家根本大计的宪法，如此一意孤行，难道算“遵守协议”么？

（三）人权保障问题：吴铁城先生认为“无再作决议之必要”。然而，所谓分别废止修改战时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已决定了将近两个月，至今未全部实现。释放政治犯之诺言，已经三个月，只放出了廖承志、叶挺等数人而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地血案迭出，特务暴徒大打出手，国民党的党部则参加暴行的计划与指挥，此种情形，全国皆知。政府对此无表示，党方对此无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默不作声，试问将庄严之诺言置于何地？

（四）吴铁城先生所说的关于复员计划的解释，我们很感谢，因为他的解释使我们知道，所谓“复员计划”，原来是不想有一个人复员。周恩来先生十八日发言中对此事的批评，原来还是太好心了，因为他虽然不满国民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该项计划，但以为依照计划，多多少少总会有一百多万人真正复员，想不到竟可做到一个人也不复员。照吴铁城先生所说，国军现有四百九十万人，其中军事机关学校及海空军一百一十万人，今后十二个月的逃亡消耗竟算为五十七万人，保留官兵一百八十万人，“应复员转业人数”一百四十二万人，四项共计亦为四百九十万人。可是，复员计划中的“兵工建设总队”那里去了呢？“应复员转业的”一百四十二万人，定会一变而为五十一个兵工建设总队的。这所谓兵工建设总队，谁都知道就是徒手兵。这样，事情就很清楚，所谓“复员计划”是把一百四十二万加五十七万人变成徒手兵，逃兵，而真正复员回家或转业去当老百姓的，则一个也会没有。这那里符合于整军方案？

（五）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我们不能不以“说真话，做实事”二语，还赠吴铁城先生与国民党。停战协定公布以来，各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始终未停。在中共军占优势之地区，如对周围只有一英里的小据点枣庄的伪军都停止了进攻，对许多伪军所占领的城市都不但不进攻，而且接济粮食。但是，接济粮食到北平去的商人都要被捕。在国民党军队占优势的地区，则广东东江纵队至今未被承认，还在被打，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绝粮，濒于饥毙的状态。这些事实，两相对照，谁说真话做实事，谁不说真话不做实事，岂不明白？到现在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解放区被占的城市村庄已达三百处之多。过去我们始终容忍，连报上也很长一个时期不作报导，而国民党的中央社，中央日报等宣传机关，则每日不断的进行恶

意攻击，这难道又是对执行停止冲突“说真话，做实事”么？

（六）吴铁城先生说：中共将有新行动发生，吴先生如此说法，极可注意，揆其用意，可能仅是以此来耸动听闻，转移注意力，以避开正面答复问题之困难。可是，说不定这句话的反面，正说明国民党在企图另有布置。如果事实如此，则真是不堪设想了。我们大家应加注意。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最后表示，仍旧希望国民党在其总裁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纠正其二中全会错误的决议，尊重并切实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及停战协议，整军协议。至于中共方面，已经历次表示以全力执行三大协议之决心，今后仍将如此。但中共决不受骗，也决不骗人。所以，事情非看明白不可。

（原载1946年3月21日《新华日报》）

〔附〕 吴铁城答记者问

关于中共对全会决议之见解

（中央社重庆二十日电）二中全会闭幕，记者特往访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氏。问答如下：

（问）秘书长对于此次全会之观感如何？

（答）此次全会讨论国家当前各项问题，其热烈周详为过去所未有。大会主要精神已有各种决议，并扼要列入宣言。总而言之，即在集中全国力量，完成和平建国之使命。

（问）今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发言人之谈话与周恩来先生之谈话，认为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的决议。秘书长意见如何？

（答）余对此二谈话内容甚为诧异，不知其用意何在。政治协商会议为政府所召集，政府对其决议正在着手实施，二中全会对政协报告加以确认，且亦已有明确之决议。政府不仅将实行决议，且切望中共遵守决议。至于宪法问题，仍在审议时期。二中全会所提出之意见，亦正由政府代表向宪草审议会提出，征求各方之意见。本党认宪法为革命之目标，关系国家大计，不能不慎重考虑。且政治协商会议原有了解，如有较好意见，可提出共同协商。

（问）周恩来先生认为国民政府委员不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秘书长有何意见？

（答）依照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委员应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扩大政府组织之决议附注内，明白指出国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当时共同了解，即系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只须参阅政协决议原文，即可明瞭。周恩来先生谈话似故意误解，颇为遗憾。否则“提请选任”字样，不知将作如何解释？

（问）周恩来先生谈话，认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是要指导“国民政府”。此言是否确实？

（答）国防最高委员会之职权已划归国府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完全系为本党指导党

员政治之最高机关，并非指导政府。共产党亦有政治局之机构。周恩来先生谈话显系曲解，故意令人误会。

（问）周恩来先生又谓，全会对人权问题一字未提，国大组织法还未修改，加以责难。秘书长以为如何？

（答）凡政府决定实行之事，自无再作决议之必要。战时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已在分别废止修改中。国大组织法，政府正在依法送由立法院修正。

（问）周恩来先生又谓，国军不遵停战协定，并引林郑二先生之言为证。确否？

（答）何方不遵停战协定，为全国人民所共见共闻，各地军事调处小组亦均有报告。余希望中共"说真话，做实事"。

（问）周恩来先生谓，二中全会中军政部林蔚次长报告军队人数，与其在政协会报告人数不符，军政部部队复员计划，违反政协决议及军事三人小组整军方案。秘书长以为确否？

（答）国军现有四百九十万人，（去年十二月份统计）除各军事机关学校及海空军共一百十一万人外，陆军部分共有三百八十万人。国军停止征兵后，逃亡消耗势所难免，故估计复员人数不能以十足计算。原报告估计今后十二个月之消耗率最少限为百分之十五，即应减去五十七万人，实有陆军人数应照三百廿三万人计算。国军第一期整编完成时，保留官兵一百八十万人，编为三十个军，九十个师，及特种兵勤务等部队。其应复员转业人数为一百四十三万人（内官长十八万、兵一百廿五万），共为三百二十三万人。故在政协会报告军队人数三百八十万人，及二中全会报告总人数四百九十万人，与部队复员计划纲要所列转业人数一百四十三万人，前后核计，并无错误。即原纲要所列第二期转业人数六十五万人，亦本此原则而计算者。至军政部部队复员计划，定全部复员期间为十八个月。第一期十二个月，复员到九十个师；第二期六个月，再复员到五十个师。此皆严格信守军事三人小组整军方案，至所谓兵工建设总队，乃是编余官兵无法取得职业者，从事于治河、修路、造林、垦荒。依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纲领第四款第五条之规定，"政府应筹划编余及退职官兵之复业与就业"，兵工建设即为此种筹划之一种，绝不能误会视为独立性之武力。周恩来先生之曲解，无须深辩而自明。

（问）如秘书长所说，二中全会并毫无动摇政治协商决议之意，何以中共忽作此大规模宣传攻势？

（答）此事最好去问中共发言人与周恩来先生。余可以相告者，中共每一大规模宣传攻势，即紧接一新行动。今日中共宣传攻势之后，将有何种新行动发生，未可预料。试就东北问题之发展，及统编方案之实施两事，加以注意，或可观察其动向。

〔附〕 张澜就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表谈话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就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政治协商会议会期中，就政府改组问题争执最久，各党派坚持最烈者为：（一）各党派自行提出国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不能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二）国府委员会必须有决策权与用人权，久经协商始获得国民党代表的尊重，而达成协议。这次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把第一点全部推翻，不仅决定各党派所提国府委员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任，并且还通过"如各党派人选在二中全会闭会前，不能提出名单，则由国府主席提请常委会选任之。"第二点也是加以混淆，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暂时最高决策与用人机关，其权力移交国府委员会，正是政协各党派力争的结果。此点，阅吴铁城先生昨日谈话，亦已承认，但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中："战事业已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撤消，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其行文明明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代国防最高委员会，任何人读其原文，只能有此解释。此种文字最少也表示有意含糊混淆，而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

（原载1946年3月21日《新华日报》）

破产的政治理论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解放日报》社论

国民党内法西斯派，抹煞了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精华，却利用“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作为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原则的藉口。其实中国法西斯派所捧为神圣的东西，如所谓“权能分职，五权分立”等等，早已被十八年国民党血腥统治所证明是完全破产了。

请看孙中山先生的态度。中山先生对于“五权宪法”，在他的“建国大纲”上明明写了“试行”两个字。可见本来他自己也认为是一种试验的性质。为法西斯派所操纵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案上，所谓“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完全是颠倒事实的说法。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举例来说，推翻满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民族主义。但是中国人民不能要等到什么“五权宪法”，才去“具体实行”推翻满清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举例来说，推翻专制、打倒军阀、实行人民自由权利、民选政府、地方自治，这是民权主义。但是中国人民不能要等到什么“五权宪法”才去“具体实行”这些东西。还再举例说，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保护民族工业，取缔官僚资本等等，这是民生主义。但是中国人民也不能要等到什么“五权宪法”，才去“具体实行”这些东西。相反的，中国人民在几次革命的期间中，特别在抗战以来的解放区里面，具体实行上述的三民主义，并没有什么“五权宪法”。又恰恰因为没有什么“五权宪法”，而得到了各种不同的伟大胜利。

按照中国法西斯派所说，必须有五权宪法才能“具体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在没有“五权宪法”的时候，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便都“罪该万死”，而日本帝国主义专制政体和一切已被否定的反动的黑暗的东西，便都应该重新恢复起来。难道这也算得政治理论吗？难道这个“理论”还没有破产吗？

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企图，是要藉口所谓“五权宪法”，去取消革命的三民主义，事情的本质，就在这里。

为法西斯派所左右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上说“权能分职，五权分立，尤为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本党五十年来领导革命，悉为实现此最进步之政治制度以建立国家而奋斗，决不容有所违背”。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十八年中，国民党当局实行了所谓建国军政时期与训政时期的主张，建立所谓五权分立的五院制度，在事实上证明了是完全与实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曾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这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是急需实行的。但他的“建国三时期”和所谓“五权宪法”无疑的是和他的三民主义相矛盾的，又是完全走不通的。国民党当局训政已经训了十八年。你们看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除了训出一个一党专政，一个个人独裁之外，还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区，训出了一个什么民主来呢？世界上任何民主都是由人民的自己运动中得来的，决不是有什么人可以训出来的。我

们老早就说了这真理，而国民党十八年的训政更其说明了这真理。五权分立也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十八年中“试行”过了，五院制是国民党十八年来的统治制度。什么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种五权分立制度的结果呢？一切人们都看得见，那并没有什么“五权”，也并没有什么“五权分立”，而只有个人独裁权力，总揽了一切，压倒了一切。行政不用说了，所谓立法，所谓司法，所谓考试，所谓监察，都不过是独裁权力单纯的工具，或纯粹虚伪的装饰品。除了个人独裁权的命令，便丝毫无事可为。十八年来，国民党政府所谓“五权分立”的五院制度，难道除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难道除了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变本加厉，高压在人民头上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难道这些东西没有破产吗？但是中国法西斯派，却说这就是“最进步之政治制度”，而且说是“决不容有所违背”。本来一件东西已经臭不堪耐了，人人都向之摇头却步了，我们的法西斯英雄们，还要捧为神圣，还以为有市场，这只是法西斯英雄们自己瞎了眼睛的缘故。

权能分开，以及所谓政权应归之“有权的人”，而治权则应归之“有能的人”，这是“五权宪法”的理论。但是完全破产了的理论。一切历史事实都证明，政权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东西。政府机关、法庭、军队、警察、宪兵等等，乃是政权最明白的具体标志。谁掌握了这一切东西，谁便有“政权”，谁便可以统治一切，也就是谁便有“治权”。所以政权即是治权，治权即是政权。这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真正的民权主义，乃是人民权力变为政府权力，乃是人民权力与政府权力的统一，如果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不能掌握政府机关、法庭、军队、警察、宪兵等等，那就是说人民没有可能统治国家，人民并没有政权。如果说在这样情形下面，人民就有政权，那便是虚伪的，假的。十八年来国民党当局假借中山先生这个关于权能分开的见解，认为他们自己是“有能的人”，而人民则是无能的“阿斗”，他们实行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占了全国的政府机关、法庭、军队、警察、宪兵等等，而把人民踏在足下，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就是要求改变国民党这种独占。假如在所谓“宪政”中，国民党依然独占国家的政府机关，独占法庭、军队、警察和宪兵，就是说他们依然拥有“治权”。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人民还有什么政权之可言呢？那不过是国民党一党的“宪政”——也即是国民党的训政继续罢了。中国人民中一切政治运动家，必须明白国民党法西斯派所强调的什么政权治权分工，即权能分开的理论，完全是骗小孩子的诡辩。剥开外壳，其里面臭不可闻。难道还不清楚吗？

“五权分立”假设的出发点，是由于把人民看成“阿斗”，也即看成“无能的人”，是由于不信任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因此就拆散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缩小人民代表在实际政治上的地位。结果，就让总统便于集中极大的权力。总统既拥有行政权，而事实上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又完全置在总统指挥之下。中山先生原来想用普选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以扩大民权。但“五权分立”的假设却又是缩小民权，这是很矛盾的。当然中山先生的错误假设，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还没有看见这些东西被国民党内法西斯派所利用去造成悲痛的结果。中山先生曾经不是教条主义者，不会把自己的某些意见去在行动上束缚他自己。在改组国民党时，他说过：“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又说过，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所谓“重新”，就是包含否定旧见解、旧东西的意义。中山先生背诵过这个可贵的谚语：“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果中山先生亲自看见国

民党训政和所谓五权分立的种种实际，那末他为着民族人民的利益，就有可能自己出来宣布放弃这一类东西。可是中国法西斯派，一方面蹂躏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另方面却要把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作为他们罪恶的盾牌。很久以来，他们即早把中山先生的所谓“训政”和“权能分开”的见解，当作法西斯主义去解释。甚至国民党首领蒋介石，在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所谓“国民会议”开会词上，亦做过这样的解释。他在那演讲词中，把各国“理论之立场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主义。第二共产主义。第三自由民治主义”。而对法西斯主义作了这样的介绍：“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至于中国应走什么方向呢？蒋介石说：“……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众，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这显然是把中山先生关于“训政”和“权能分开”的见解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而十八年来国民党的“训政”，的确是实行了这样的政治，他们对这种法西斯的“有效能的统治权”的说法，又叫做“万能政府”。但他们的“能”是什么呢？他们的“能”是在压迫人民这点上。至于在日寇鞭策下，在日冠面前，他们却是如摧枯拔朽的无能了。他们认为法西斯是“有效能的统治权”，也是极可笑的。你们看德意日法西斯们的“有效能的统治权”，现在都到那里去了呢？

不错，当时蒋介石还说过，训政“既明定为过渡之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蒋氏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与政协一切代表共同通过各党决议，在最近国民党二中全会开幕词中，也说过今天中国不能不“变通总理关于建国程序的遗教”。但是国民党既经过一度十八年法西斯式的统治，他们内部的法西斯派，却就要坚持继续这种统治，不许这种统治“过渡”到真正的民治。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法的原则，确定了中国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是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又是正确地、变通地、灵活地采取及保护了中山先生民主主义的精华。但法西斯派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所操纵的关于推翻政协宪草原则的五项决议，则完全否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法西斯派要求的，是在实际上完全反对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的法西斯宪法。他们想经过“宪法”重新明确规定他们的法西斯制度，而基本点即总统的独裁制。中国法西斯派反对和平、反对民主、反对党派合作、团结，但他们在现在人民的民主浪潮前面，不便于公开赤裸裸地一一提出，也不便于公开赤裸裸地把政协决议一一推翻，他们就设法突破一点，藉口“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以否定政协的宪法原则，以保留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并继续他们的内战职业。

保留和继续强化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这是中国法西斯派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全部努力。如果他们所企图的一点突破——即推翻政协宪法原则，变成现实的话，那么一切政协决定都推翻了。其结果就会把中国拉回悲惨的老路。这老路就是专制、独裁、分裂、内战，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所奋斗建立的国家。但中国人民能够任令法西斯派把中国拉回这种悲惨的老路吗？这是决不能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了下列的声明，而只有这一方针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斗争”。

（新华社延安1946年3月22日电）

谁在破坏整军协定？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解放日报》短评

本月二十三日国参会上陈诚的军事报告，对于国民党如何执行军事三人小组的整军方案，进行缩编军队，未作任何具体说明，反而打起“国防安全”“国际和平”的旗子，赤裸裸的主张扩充武力，他说：“建军之原则固愈多愈好”，“须充实力量，使足以维持国防安全（？）与国际和平（？）”。

自整军方案签字以后，反动派阴谋破坏这一协定的活动，中外报纸已屡有揭露。上月二十六日美联社报道，以胡宗南领衔的国民党内十四个高级军官，反对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酝酿之时缩编军队。北平《益世报》三月十日载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另据西安报纸揭载该同盟主张：

“一、反对政协会议；

二、武力接收东北；

三、反对裁兵；

四、继续剿匪。”

其后，国民党二中全会又通过了违反整军方案的军事决议案（见本报二十二、二十三日恩来同志及中共代表团的发言），现在反动派这一阴谋，更进一步的在其御用的参政会上，由陈诚亲口说出来了，这就是国民党“整军”“复员”的真相，这是值得全国人民严重警惕的。

反动派不只是在口头上叫嚣，而且正在实行扩张武力的计划。整军方案公布已经一个月了，我们没有看到国民党有一兵一卒复员，相反的，却是准备实行“全国皆兵”的计划与到处拉丁扩军，竟至把解放区复员的人员拉去当兵。冀东怀柔、密云，我复员战士二百余人已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强迫当兵；其他各地国民党军队，抓丁也从未停止过。这种种事实，不是更有力的证明了反动派破坏整军方案扩张武力的阴谋吗？

和上述这些事实相反的，是各解放区大规模的复员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第一期七万人复员计划已经完成，晋察冀边区各级复员委员会早已成立，察哈尔一万人的复员，月底即将完成，山东华中各地复员工作，也已开始。这种人所共见的事实，连亲国民党的《大公报》也承认：“保定附近共区已开始部队缩编”，“大批退伍官兵……候车归里”。（3月15日天津《大公报》）这证明了共产党是忠实执行整军方案，真正拥护和平。

但是，整军方案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为了保卫和平，我们必须把真实情况诉诸全国人民，大家起来打破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推翻整军方案背信弃义的阴谋。

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对时局发表重要讲话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各位记者先生：现在重庆舆论界正争论谁在动摇政协决议？谁在破坏停战协定？我现在以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协决议的实施问题

政协决议，我们一向主张全部实施，我们从未提过新的要求或修改。国民党内不算少的革新派，他们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主张推翻政协决议，在参政会上也主张推翻政协决议，但当着懂得了不能公开推翻之后，他们便表面上拥护政协，而实际上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要在实质上使政协决议变质。

第一件事是：国民党提出了修改政协决定的宪草原则。争论有三点。为着不使问题永远僵持，我们曾在形式上作了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省宪改为省自治法，不解散立法院。但是我们同意的仅止于此。如进一步要利用这三点修改，把民主宪法改变为独裁宪法、集权宪法，这是违反政协决议精神，万万不能同意。我们主张：（一）即使有了有形国大，亦决不能动摇将来实施代议制之立法院的全权。立法委员要由人民直接选举。中国要走多党政治的民主道路，决不能不承认代议制。（二）立法院可不解散，但行政院仍要对立法院负责。实行行政院负责制，政策通不过，就应该改组行政院。（三）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的地位，决不能改变。省有权在不抵触国宪之下，自订省自治法，中央法律不得变更。这是符合中山先生均权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接近美国。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人要取消代议制，实行独裁制，取消省自治，实行中央集权，更有人要将三点修改扩大为五点，扩大到推翻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这就是争论的焦点。

第二件事是：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改好了的宪草，依政协决议，应成为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这便是唯一的宪草，提交国民大会讨论采纳。但是国民党现在又不同意，有人说这只是提交国民大会宪草的一种，还可向国大提别的宪草，甚至原来的五五宪草亦将提出。我们认为，这又是推翻了政协决议，必须弄个明白，事先解决。

第三件事是：我们要保持国民大会中的否决权，为的是如有人想推翻政协修改好了的宪草，便可反对，加以阻止。国民党参加政协的代表既同意了这草案，当然国民党员对这修正的宪草，也应受同样的约束。但是国民党员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参政会，在另外场合，又自由地说他们可另提草案，甚至自由地说国大不限于制宪，也可以创议行宪。这种言论如

出诸未参加政协的无党派人士之口，还可说是他个人自由，但现在出诸国民党员尤其是负责者之口，这不能不说是在要破坏政协决议了。

第四件事是：政协已经商定了国大代表为二千零五十名，而国民党与参政会最近却又要增加一百五十名，另一提议还要加得更多。

第五件事是：训政已结束宪政未开始的这一时期，和平建国纲领明白规定为过渡时期，而国民党二中全会忽然决定国民党以外各党派的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常会选任。后来国民党方面虽说此点可以取消，但国府组织法迄今尚未修改，而国民党负责人仍说训政时期的约法仍然有效，这又与政协决议违背。

第六件事是：国府委员名额，国民党以外的二十名如何分配，至今未能商定，而具有否决权作用的十四名名额，政府亦不愿给以保证，此事不决，政府却天天在催交名单，这岂非滑稽之至。

第七件事是：任何国家常例，改组政府一定是整个政府包括在内，尤其是行政机构。中国政府改组，至少应该照杜鲁门总统声明与三国公告，各党派应广泛参加，包括一切政府机构，且要有真正代表权。但是现在谈国府改组，却不谈行政院，即谈，对八个政务委员如何分配，亦未解决，这又如何能交名单？

第八件事是：政协开幕时，蒋主席宣布四项诺言，但到现在究竟执行了多少？违背了多少？从沧白堂、较场口到新华报馆、民主报馆，伤人捣毁的事，一件未办，一件未赔。政治犯放了极少可数的几个，大批的尚拘于狱中。言论自由仍受限制，书报不能寄出，卖报被打，许多地方报纸不能出版。现在旧案未了，新案又来，本月三号三时，北平军警宪特，突然又把中共代表住宅中来平与政府商洽接济平津粮食的代表以及新华社记者杨赓，解放三日刊社总副编辑钱俊瑞、姜君辰等，共计四十四人拘捕了，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总之，只要把上述这些事件算一算，两个月来究竟谁在动摇、修改并企图推翻政协决议？是谁在违反在政协中的诺言？中共是处在保护这些决议的地位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动摇、修改或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这些事情不解决，就能轻率提出十个国府委员的名单吗？要如此做，就是出卖人民利益。只有一心想做官的人，才愿如此做。

第二个问题是军事问题

在军事方面，有三个协定，即是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编统编方案，这三件事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从事实上来看看，谁在实行？谁在动摇破坏？

第一是停战问题：停止冲突应是全国性的，不管任何区域，任何部队，都应停战。可是三个月来，政府对广东的中共部队，一直不承认，一直在继续围攻，直到三天前，才成立协议，但又只承认了东江抗日纵队，而与东江纵队同样坚持八年抗战的海南岛中共部队仍未被承认，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甚至对政府收编的毒害了中国人民的伪军，都停战了，而国民党政府对抗战部队竟不承认，还在进攻，这完全违背停战协定。

停止冲突应全面停止，停了就不能再打，但内地各省政府军仍在各处进攻，自一月十三号到三月底止，统计解放区有十六个县城三百八十一个村落被政府军攻占过，绝大多数地方未曾退出。北平执行部最近下令各军一律恢复一月十三日前位置，我们对此很欢迎，希望执行部各小组公平处理，亲到各处去看，便可证明。

停止冲突协定规定除少数例外外，各地军队一律不准移动，就是例外，也规定军队调动时要按日报告。但是政府军队在停战前开入东北的只二个军，到三月底却有了七个军，从未通知执行总部。这七个军的番号是连原来的十三军、五十二军，尚有九十四军、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新编二十七军。在内地军队更是一律不得移动，但在停战后，第五师从冀东移到热河，现在又移到辽宁。最近豫北新乡，集中了一个军，有一个师将从郑州渡河。在河南南部有包围中共部队的九个军，内中有两个军正向信阳确山集中。

在东北方面，当签定停止冲突协定时，政府代表说，不会派很多部队前去。那时，中美会商运输军队时，也只订运五个军。前天军委会发言人说，五个军亦要有二十四万一千人，但就现在已有的七个军共十六个师，尚有三个纵队，计算起来已有二十八万五千人了。现在政府还在计划增派八个军去，再加上已运去的就要达到十五个军之多，人数将超过五十万。这一数目要占第一期整军九十个师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要把全国的主力大部分调往东北，因为这些部队大多数都是美械师，其目的将不是停止冲突，而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

第二是敌伪和遣俘问题：依停战整军协定敌伪应限期解除武装。可是在阎锡山将军统治的山西，仍保有五万余日军，多未解除武装，并且组成特务团，进攻中共军队。北平执行部派往山西的执行小组，曾亲眼看见六百多日军在进攻中共军队。至于伪军，最近国民党报纸天天喊有十几个县城被围，这十几个县都由伪军盘驻，停战命令下后，我们从未进攻，就是枣庄，仅保有一小块地方的伪军，我们也不曾攻击，最近尚让其安全撤退。相反的，倒是刘峙将军在河南，正调七十四师向东明进攻，以图与东明伪军联成片片，这也是违反停战协定。

第三是恢复交通问题：这里有四件事：（一）是修复铁路交通；（二）是恢复一切交通，包括水陆邮电公路在内；（三）为平毁一切阻碍交通恢复的工事、碉堡、封锁；（四）为取消一切检查。这四件事应平行去做。现在修复铁路已有大进步，陇海东段、平绥路、胶济路，都大部修好，平汉津浦预计三四个月内也可修复。反过来看看，没有中共部队所在的粤汉路，半年以后都难得修复。在此华北铁道快要通车之先，我们有权反过来问问，一切交通是否也恢复？我们解放区人民能否出来不受限制，不受检查？事实上就连前天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及其随员坐国民党飞机到沈阳，竟也在机场被扣三小时，几乎被原机送回。张家口派到北平去帮助国民党政府解决粮荒又是粮食部要求接洽的人，也竟被扣二人，这有什么交通自由？邮电公路检查，从未取消。凡是阻碍交通恢复的一切工事碉堡，拆除了没有？国民党方面说，工事碉堡是为保护交通的，现在不仅未拆，反而增加了。工事碉堡是为打仗才修的，它们是交通障碍物，怎能说是保护交通？这一切，都证明恢复交通的命令谁在执行？谁在不执行？

第四是整军复员问题：整编统编方案签定后，三方面参谋会议，正不断在工作。国民党所宣布的复员计划是不合规定的，数目既先后不符，复员人数又只是抵消他们预计的逃亡消耗以及容纳到兵工总队中去，这不是复员，我们将在正式会议中去讨论。我们的计划，是真正要做到复员者归农或参加其他生产事业，完全解除兵役，这才算真正复员。中共部队因交通困难，整个复员计划，尚未能最后制成，但是除东北联络困难之外，已知内地九十万以上的正规军，到三月底止，已复员了三分之一以上，地方部队三十多万人，亦在部分复员。

第五件事是：本月一号航委会不知存何心思，突派八架战斗机，低飞延安上空，盘旋半小时。这种示威挑衅的行为，我们已提出抗议。而国民党当局只承认有此事，不承认是示

威。

所有这一切，也足够证明在军事方面，谁在破坏停战？谁在利用敌伪？谁在不愿意恢复交通？谁又在不真正实行整军复员？

第三个问题是东北问题

现军事执行小组虽已派往东北，但一开始即遇到种种困难，而军事冲突亦仍未停止，且有扩大之势。依郑洞国将军计划，要在最近几天内攻下昌图、四平街、海城、营口、本溪、法库、鞍山等地。郑将军何以敢在执行小组抵沈之后，仍冒此大不韪，就因为有人说这种军事进攻是接收主权，不是冲突。执行小组到了沈阳，如还不能把内战停下来，停战协定对东北将继续失其效用。政府方面很可能制造种种借口，不把执行小组派往冲突地点去，象沈阳飞机场扣人以延迟时间的办法，将层出不穷，而郑洞国将军就可以利用这些时机进攻上述地区，并继续扩大。本来预定本月五号以前，三人会议即应赴东北视察，现已不可能了。

我们现在谈谈东北问题的内容：

第一、历史上的问题：这方面不必列举事实，但要问：究竟是谁把东北断送了？谁又在东北组织了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谁在抗战中主张恢复“七七”事变时的国土就够了？谁又坚决主张打到鸭绿江边？中共在东北的抗战，连日寇也承认，八路军二十七年打到热河，二十八年打进辽宁，创造出冀热辽军区，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谁还能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这些问题，社会上尤其是东北人民，自会回答。

第二、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发展：最近一年中共领导的部队在东北有了迅速发展，这是事实。尤其在敌人宣告投降后，政府不承认中共军队有受降权，并且进行内战，而伪满军队又未放下武器，中共建立的冀热辽军区即配合其他各地出关部队，向东发展，彻底消灭伪满军队，并与本地之抗日武装汇合。后来杜聿明将军打出山海关，中共方面原以为杜军会东开接收沈阳，那知他竟西向攻入热河。中共军队未从正面阻止，乃转向北宁路东的广大地区，进行组织人民，摧毁敌伪残余的工作。这是停战命令发布之前的事。在停战后，内地中共部队即再未向东北移动，而政府军队却在东北继续作战经三月之久，不愿使停战协定适用于东北，这是政府军队首先违背停战协定的证明。前些时，政府情报，说赤峰方面中共有部队向东调动，当由执行小组实地调查，并无其事。

东北既然有了这样一支抗日队伍，当然需要统一领导，政府又不予承认，这就产生了“民主联军”的称号。这与合法非法无关。中共或其他抗日军队在国民党看来都不合法，但在政协与停战之后，一切都要经过协商与调处解决，因此，民主联军也无所谓非法了。

第三、民主政权问题：伪满政权被推翻后，中共号召人民起来，组织民主的地方自治政府，自己管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将来东北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改组后的政府，依据和平建国纲领，重新选举，扩大这些地方政府的民主基础，那是应该的。因此对于现在这些推翻伪满政权的临时性的地方民主政府，应奖励之不暇，有何非法可言？难道维持伪满政权才算合法么？

第四、外交与内政问题：外交与内政是两件事，不应混为一谈，应该分开解决，但可同时进行，不应该故分先后。外交问题由国民政府与苏联去办，而内政问题则应由我们有关方

而自行解决。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虽有美国朋友参加，但还是内政问题，因为他的任务是要停止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实行调处，愈早解决，愈于国家人民有利。

第五、军事与政治问题：政治与军事决不能分开，如派遣军事执行小组去东北的指令，在附记中提到军事，也提到政治，足见军事与政治不能分开。如说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有一种想法，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拿武力打下东北，再谈政治，这将不知何年何月？然而东北人民其何以堪？！

第六、要把停战协定用于东北，就需要照顾两个原则：一个是在东北也要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一个是政府军队为接收主权可以开入东北和在东北移动。现在冲突已经存在半年了，若因要接收而扩大冲突，那就是违背停战协定第一条，而冲突只有继续下去，若要又不冲突，又要接收，就必须先停冲突，后谈接收，并且要谈定接收什么地方，什么部队去接收。因此，在现形势下，政府军队开到什么地方，如有中共军在，须经过协商，乃是自然之理。如说因接收而引起的冲突，不是冲突，那么，执行小组不是等于不派吗？既然接收地方须经协商，商定了，即进驻，也就不必增派军队了，所以增兵东北，决不是为了接收，而是为了冲突。政府现正增大兵于东北，我们不仅焦虑，而且反对。

第七、政协一切决议应适用于东北，尤其是和平建国纲领，更应完全适用于东北。如说现在不可以，或要等到政府军队到齐了，驻满了，才能说地方自治，这就等于把东北特殊化了，其目的就是排除一切，造成独霸东北的局面。我们老早就主张停战，赞成派执行小组去东北，实行调处，欢迎协商，就证明中共不赞成东北特殊化，不要独霸东北。

× × × ×

总结以上三个问题，我们的主张连东北在内，完全没有超出政协决议及停战、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的范围。我们衷心主张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以求中国之民主、安定与统一。两月以来，国民党中顽固派想动摇和推翻政协决议，极力破坏和曲解停战、恢复交通与整军复员的方案，尤其想把东北问题除外。这样做法其目的在推翻政协，挑起内战，决不会实现和平、民主、安定、统一的中国。我们主张在决不动摇和完全实施政协决议的基础上来改组政府，决不同意在以上问题未解决之前而马虎地参加政府，因为这将是请客式的，粉饰门面式的改组，我们不能同意。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外国朋友注意，如果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和平、不民主、不安定的国家，又不能在政协的基础上组成举国一致的政府，同盟国家就随便给中国以帮助，特别是财政上的帮助，那只会增加中国国内的不安，便利一党独裁的继续。我们希望同盟国应坚守杜鲁门总统声明和三国公告原则，帮助中国结束一党训政，取消独裁，坚持政协、停战、整军等决议，那就有助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安定与统一。否则，中国人民将在国际不慎重的帮助下，受到灾害，增加混乱，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是不欢迎这样的帮助的。

（原载1946年4月6日《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为北平市当局有计划的反共暴行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

雪艇、力子、岳军、厉生四先生勋鉴：并请转呈

蒋主席钧鉴：敬启者，顷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委员剑英支电内称：四月三日晨三时，有大批军警宪特，以检查户口为名，至前京畿道十一号，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滕代远公馆，执枪实弹，如临大敌，逐屋搜查，逐人盘问，历时五十分钟，捕去滕之秘书李新、职员李坪妻女、及方从张家口来平接洽调剂粮食之贸易公司经理李耕涛、张家口市商会会长刘鸿达五人。同时又向我解放报社、新华通讯社两处搜查，将解放社总编辑钱俊瑞、副总编辑姜君辰、新华社记者杨赓、张迺赓等二十九人，及该社发行课主任马建民等十人，非法逮捕，总计四十四人，分别押于外二局内四局两警察分局。搜查当时，军警持枪均上刺刀，报社门口架设机枪，声势汹汹，若捕盗匪，被捕者皆双手加铐，绳索捆绑，沿路殴打谩骂，极侮辱之能事。几经交涉，仅将从滕公馆捕去之五人放回，此外三十九人迄今仍未释放等情。查滕公馆之租用，早经北平行营许可，解放报社、新华通讯社系敝党言论宣传机关，且已呈请北平当局备案，而新华社又为北平执行部公认之中共报导机关，乃竟于黉夜遭受非法检查，工作人员横被侮辱逮捕。日前延安上空曾为航委会派去战斗机八架低飞示威至半小时之久，东北小组到达沈阳时，沈阳警备司令部亦借故将我方四十余人在机场扣留三小时，且欲令原机送回北平。此一连串行为，显然与全国各地一切反共反政协反民主之破坏暴行，同为有人发纵指使之有计划有布置的阴谋。因此，敝党特再一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

（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

（二）严惩北平军警宪负责当局，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

（三）停止全国特务活动。

（四）向执行部中共代表及解放社新华社道歉并赔偿损失。

并请将敝方历次所提要求事项迅予圆满答复，是所企盼，专肃即希赐复。敬颂　勋绥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
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秦邦宪　　谨启

四月五日

（原载1946年4月6日《新华日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

《解放日报》社论

三月廿二日本报社论，曾驳斥国民党当局所谓“权能分职，五权分立”的破产政治理论。最近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所发表的演说，又把他们所谓“法统”的谬论，枯燥无味的重弹一次。“国民参政会”应声虫似地写了一次决议，叫做什么“国家法统不容中断”。事实上国民党内法西斯派所谓“法统”的理论，同样早已被十八年国民党血腥统治所证明是完全破产的了。

蒋介石现在使出来的“法统”论，是他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说“训政时期约法”是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制定的国家组织法，这一部约法，只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才能代替”。四月七日本报的社论，已经说到蒋介石所谓“国民会议”和所谓“约法”的来历。蒋介石说“我们国民政府就是根据训政时期约法而成立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就是根据当时蒋介石的独裁国民政府而成立的。如果要说什么“国家法统不容中断”，那么国民政府的法统早就在民国十六年蒋介石背叛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尚未擅自成立其独裁政府的时候中断了。民国廿年五月五日，由蒋介石所召集的所谓“国民会议”，那仅仅是国民党内蒋介石一派宰割国民的一种会议。那里面不但没有任何国民的代表，而且就在国民党内，除了当时拥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派之外，也没有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参加。蒋介石在这个所谓“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明了当时他召开这个傀儡会议的目的，第一是要按照他所说的“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规定一部法西斯独裁的“国家组织法”，也即是所谓《训政时期约法》。第二是要在这个法西斯独裁的“合法”基础上，继续扩大其屠杀人民和剪除异己的国内战争。蒋介石的所谓“法”，制造出来了这个“法”，不是别的，也就是法西斯独裁法，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法，就是内战法。这个“法统”不是别的，也就是法西斯独裁法统，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法统，就是内战法统。在这个“法统”建立之后，国民党统治下即出现了更可怕的法西斯恐怖。所谓《危害民国治罪法》，在全国雷厉风行起来，内战的规模更扩大了。而在它建立之后，四个月的时间，便出现了更大的“效能”，这就是民国廿年民族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是在这个中国法西斯派法统下的大创作。抗战以来，这个中国法西斯派法统，除了继续其法西斯主义的政令之外，又继续创作了一种举世闻名的军令——即民族失败主义的军令。毫无疑问的，这个法统乃是中国一切黑暗和痛苦的象征。

但是，中国法西斯派却认为这个法西斯法统总是万万破坏不得的。蒋介石说：“倘若宪法尚未颁行即废止约法，则政府竭六个月之力所得到的结果，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不是人人可以共循的合法动机，而是人人可以造乱的非法祸胎，这与我们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的宗旨是完全违反的了”。这是完全破产不堪的政治理论。事实证明蒋介石训政时期的约法所得的结果，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因此才有必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政治协商会议才有必要共商国是，以期结束训政”（见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也因此才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必要发出声明，认为需要修改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难道国民党一党训政必要结束，而国民党一党训政的“约法”倒不应当废止吗？蒋介石的说法完全倒过来了。他把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宗旨叫做政治协商会议的宗旨。他把他那“约法”所制造的中国混乱叫做和平，而把政治协商会议结束训政及其“约法”，因而可以造成的中国和平，却叫做混乱。他把他那“约法”所制造的全国分裂叫做统一，而把政治协商会议结束训政及其“约法”，因而可以造成的全国统一，却叫做分裂。蒋介石及其一派，把这种与事实完全颠倒的诡辩来欺骗民众。但民众拥护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热烈，恰好证明民众是不可以欺骗的。应当着重指出，蒋介石在这里公开提出，如果废止法西斯约法即将得到混乱与分裂，这里面还有更严重的意义。这就是说，如果人民和民主派，坚持贯彻蒋介石政府所“决不能承认”的政协决议，那么，他就决心把中国重导入混乱与分裂，决心以内战为维持独裁的后盾。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恫吓表示。这与蒋介石集团顽强地拒绝实行裁兵复员，顽强地拒绝向人民交出军队，以便实行军队国家化的一连串事实联系起来，其意义更为明显。因此，全中国与全世界，不可不在今后严密注视蒋介石的行动。

蒋介石口口“合法”，声声“合法”，试问他合的是什么法呢？难道只有国民党内蒋介石一派所制造的、代表少数寡头利益的法，才可以叫做法，而政治协商会议所协商的结果，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利益的法，反而不可以叫做法吗？难道否定了那种法西斯独裁法、一党专政法、分裂法、内战法的“约法”，倒可以叫做“造乱”，叫做“祸胎”吗？

蒋介石之所以在今日要制定宪法的时候，这样来强调所谓“约法”的法统是有其深长的意义的，就是说，他口中的所谓“宪政”，不过是一党训政的继续，而不是一党训政的否定。他要把“宪政”当成是他的训政之一脉相承。大家要把蒋介石这个“法统”的理论，和他及国民党二中全会法西斯派关于推翻政协宪草原则的主张联系起来考察，便能够容易寻索到其中的秘密。

全国人民和世界民主人士，都把政治协商会议看作为结束国民党训政并废止其“约法”的会议。而蒋介石却是相反。蒋介石说：“如果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和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否则中国国民党五十年革命努力的结果，对于全国国民应得的政权没有一个交代，而全国同胞八年抗战的牺牲，也一点没有意义了。这不仅是政府所不能接受，也是全国人民所万万不能容许的”。这就是蒋介石企图完全撕毁政协决定的自白。这就是蒋介石企图继续保持法西斯独裁法统、一党专政法统、分裂法统、内战法统，以统治中国人民的自由。蒋介石认为否定这种法统“是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所决不能承认的”。当然你们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但是，受了这种法西斯法统所压榨，而经历无数灾难的全国人民，据蒋介石说，却也特别喜欢起这种法西斯法统，并且人民八年抗战的牺牲，也仅仅是为着这个法西斯法统，此说可怪不可怪呢？蒋介石又从那里知道这样可怪的事情呢？不，原来蒋介石的所谓“全国人民”，不过是指蒋介石及其一派。而蒋介石的所谓“全国国民应得的政权”，就是指的蒋介石及其一派应得的政权。蒋介石的所谓“交代”，就是要把蒋介石及其一派的训政，交代给蒋介石及其一派的“宪政”。就是要把训政时期的法西斯独裁法统、一党专政法统、分裂法统、内战法统这老一套，都转移到所

谓"宪政"中去。这也就是国民党由法西斯派包办的"国民参政会"所谓"国家法统不容中断"的精义。

中国人民怎样办呢？当然，中国人民原来是为什么目标而斗争，今后更要再接再励，为原来的目标而斗争。这个斗争的目标，就是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废止那个祸国殃民的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法统。中国人民只能够承认中国人民这样的民主法统，绝对不能承认法西斯约法的法统。应当把蒋介石的话倒过来说。如果承认法西斯约法的法统，而否认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宪政的法统，那么中国人民百年来的流血奋斗，就没有结果，而我全国同胞八年抗战的牺牲，亦没有一点意义了。这不仅是各民主党派所不能接受，也是全国人民所万万不能容许的。

是人民民主的法统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呢？还是法西斯独裁的法统战胜人民民主的法统呢？这是极严重的斗争。但是，历史大势显然早已指出来了，人民民主的法统必将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中国法西斯派重弹其破产的政治理论，决没有可能挽回法西斯派独裁法统的命运，这已是千真万确的了。

（新华社延安1946年4月10日电）

周恩来致国民党三代表函

岳军、力子、厉生三先生勋鉴：

迳启者，本月十五日政协综合小组承蒋主席邀集茶会时，敝方曾即席声明各项问题须一道解决。嗣十六日与诸先生接谈，亦再次说明各项问题之相互联系及一道解决之必要，尤对于诸先生代表政府提出国府委员之比例数目，认为有违协议，决无考虑之余地。今已过二十号之约期，犹未蒙诸先生约谈，想目前所谈各项，定无法寻求解决，而时局紧张，内战蔓延，又非迅速停止冲突保证各项协议全部实施，不能挽此危局。兹为唤起政府注意，特相以书面声明一纸，送致诸先生，至希查照，并乞示复为感。特此，顺颂大安。

周恩来

四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

关于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大会之名单问题，中共代表团一向不认为此等事件可以孤立解决，而置政协决议、停战协议及整军方案任人破坏于不顾，尤不认为在内战重新扩大民主毫无保障之现况下，可以参加政府，召开国大。就政协本身而言，政府四项诺言，不仅迄未切实履行，且变本加厉，放纵特务，恣意横行，使人民自由权利毫无保障，国民党二中全会所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不仅未加澄清，且更坚持训政约法，一党统治，使政府改组毫无意义，宪草修改原则，不仅利用协议三点，企图改变代议制，且更拟动摇其他原则，否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制，而回到五五宪草之总统独裁制。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中共提议之名额（国府十名，行政院四名），不仅始终未获政府同意，即已确定之国府委员会中否决权问题，亦在发生动摇。国大代表名额，政府又拟增加，在宪草修改原则屡遭损害之际，在民主制与独裁制争论未决之时，何能考虑及此!?在此种严重情况之下，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若再加以东北内战之严重状态，并有牵入关内之势，则冲突不停，政府何能改组，而国大亦何能从容召开!?

因是中共代表团特再声明：只有在上述各项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与确定解决后，中共方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之人选及提交国民大会之名单。

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

四月二十一日

论　　时　　局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社论

今日本报发表了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及周恩来同志给政府党三代表的信。这个文件，对于当前时局，有澄清的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曾经决定国民大会之日期为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并在国民大会以前进行政府的改组。现在离开会五月五日，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并未改组，各党派的国大代表名单并未交出。这是什么原因呢？

国民党方面，要把这个责任归之于各党派，首先归之于中国共产党，说中共不交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国大名单，是“破坏政协决定”，想把政府“拖垮”。四月十五日，蒋主席邀集政协综合小组代表茶会，要各方于四月二十日交出上述两种名单。现在为期已过，各方名单尚未交出。国民政府则于四月二十日下令，告布了国大名单。一切做法，务欲达到下述目的：表示政府这方面非常积极，并且把这解释成为政府是在积极执行政协决议，其他各方是对此不积极，而且把这解释成为“破坏政协决议”。这样一来，就显得政府不但没有破坏政协决议，而且在积极执行政协决议，中共则恰恰相反，倒是在“破坏政协决议”。中共既然如此“阴谋”，那就“必以比前此更有力的行动来答复”，中央日报喊“有力的行动”喊了好久了。民生路上被特务打得稀烂的本报门市部，就是这种“行动”的成绩，至今未得丝毫赔偿，而国民党的反动派还要再来一个“更有力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方面，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对国民党有什么“有力的”或“更有力的”“行动”。中共的要求低得很，只要求国民党像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那样，承认我们，与我们合作，不要用武力或特务来消灭我们；只要求双方诚心诚意，把五方协议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付之实施，把一月十日的停战协议，二月二十五日的整军方案，三月二十七日的东北停战协议，双方都来百分之百付之实施，蒋主席自己所说的四项诺言，也付之实施。

这些协议，包括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和在国民大会以前改组政府在内。对于这两点，中国共产党直到今天还是准备付之实施，中共方面及各解放区的国大代表已经有所准备，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随时可以出来。中共从来不想“拖垮”政府，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堂堂四强之一的政府会“拖”得垮。中共希望各项协议愈快实现愈好。中共甚至对于这件事是过份性急了，为了迅速达到此目的，中共参加政协的代表周恩来、陆定一曾不顾风雪冒险飞行，王若飞、秦邦宪则竟以飞机失事殉难。

但是，中共直到今天没有交出名单。那是因为改组政府与召开国大，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条件即是政府党真诚履行而不是破坏四项诺言和四大协议中的其他许多重要部份。在政协刚开完的时候，中共是诚恳希望政府真诚履行诺言与协议的。可

是，时至今日，上述的条件已不存在，四项诺言四大协议几乎都被破坏，只有一个停战协议还残缺不全地在风雨飘摇中维持着，这样，改组政府与召开国大就决非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比如说到改组政府，就要问问：在东北正在大打内战，而且这个内战极可能延及关内的时候，这个政府能替人民做什么呢？在特务横行的时候，中共代表与人员是不是有安全保证呢？在国民党反动派坚持《训政时期约法》的"法统"之时，改组的政府能不能实行政协决议呢？在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宪法的时候，国大能否通过民主宪法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只能得到"否"的回答。那末，即使政府改组，即使国大召开，对人民有任何好处没有呢？一点也没有。这只能给反动派涂粉擦胭脂，以便骗取外国的借款，重演袁世凯用"善后借款"来大打内战的故事而已。如果反动派竟因民主党派的错误而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将使中国人民大众陷到地狱里去，那将使世界和平受到大破坏。既然如此，那末，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提出自己的名单，而必须声明，只有在其他问题一道解决时才能提出名单。中共这样做，坚决不动摇的这样做，乃是人民政党人民先锋队的本色；反之，如果中共不这样做，敢于违背人民利益，提出自己的名单，那就真正落到与法西斯为伍，变成中央日报所经常咒我们的"新法西斯"了。

自从一月十日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破坏，前后经过四个阶段。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中的法西斯反动派，制造"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协会员黄炎培先生住宅事件。这些事件，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曾要求政府加以澈查与严办。如果政府照了民主党派的意见做，那末，反动派就会敛迹。但是，政府不肯这样做，而包庇那些法西斯反动分子，于是小事化大。这是第一阶段。这告诉我们，就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反动派已经在进行破坏，而政府则予以包庇。

政协会议闭幕后，法西斯反动派即大举进攻了。从较场口事件到二二一反苏反共反民主的游行，北平执行部事件等，法西斯反动派的破坏政协的暴行，是以所谓"群众"的面目出现的。政府对于这时期的此种暴行所采取的政策，是对反动派鼓励，对民主党派和人民则欺骗拖延。虽然这一时期中，有整军方案的订立，但政府不准备实行协议的决心，明眼人早已看得清楚。

果然，三月一日起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就更进一步，公然用国民党的名义，来破坏政协决议和刚才订定的整军方案。政协五项决议无一不被破坏，整军方案变成一个兵也不裁的"复员计划"。暴行发展到新的高度，而且遍于国中，其中著名的，如大渡口钢铁厂竟发生枪杀工人的事件，如东北则发生暗杀李兆麟将军，通化暴动等。政府对于这些法西斯反动派，转到了积极帮助，而对人民与民主党派的要求与呼吁，不是装痴做呆，就是老老实实给以不客气的打击。这时候唯一较好的事，就是签订了三月二十七日的东北军事调处指令。

仅在指令签订后的五天，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与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四月一日国参会演说，这个演说的内容是大家所熟知的。于是，一切推翻四大协议的行为都公开成为"合法"的了。东北大规模的内战爆发起来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的政协决议是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南通惨案发生了。北平发生一夜逮捕八百人的恐怖行动，这在十余年来是史无前例的。人民权利四项诺言不见提及了。甚至"较场口事件"的字眼都犯了忌讳，由中宣部通知各报不许用了。一切国民党的宣传，又回到过去政协以前内战时期的老调，什么

"法统"哪，"分裂国权"哪，"剿匪"哪，"讨伐"哪，"国籍成问题"哪，"兽"哪，"有力的行动"和"更有力的行动"哪，懿欤休哉，这时候还有什么四大协议在政府的心目中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忽然要"积极实行政协协议"，要改组政府和召开国大了。这除了为"有力的行动"找寻资本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老百姓肚子里是明白得很的。

中共代表团早在三月三十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上由王若飞同志代表作了下列声明："鉴于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二中全会所造成的违反政协协议之混淆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议未决；国大代表名额总数政府又提修改之议；而中共应有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亦尚未作最后之肯定；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中共代表团声明：只有在上述各项问题确定解决后，中共方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之人选"。王若飞同志的这个声明，是四月一日以前作的。四月一日以后，即蒋介石先生国参会演说以后，各种情况更加严重，东北的大内战尤为当时所无，而成为现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的声明，是与三月三十日王若飞同志所作的声明精神一贯的。

应该严重指出，今天的局面，与一月间完全不同。一月间，是国共两党关系好转的时候。四月一日蒋介石先生演说之后，一月以来的一切协议被破坏了，中国进入了部份内战的局面，这个内战，在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之下，正在要把它发展成为全国的内战。当前国民党当局是看不出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诚意，四月十五日大会后的情形表现得更加明显。国民党当局发动关于改组政府召开国大的商谈，不过是为了卸脱自己破坏协议的责任，和找出理由更进一步扩大内战与特务暴行而已。

中国人民是在大灾难中，而且面临着可能的更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必须以一切努力，停止东北的内战，并严防它发展到关内来。必须要求通盘解决一切政协以来已经发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且，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过双十公告，又破坏了政协、整军、东北等协议，现在还在企图破坏停战协议，所以必须要求给人民以实际的保证，使以前和今后的协议，再不致于遭到法西斯反动派的破坏。这种保证之一，就是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并把法西斯分子从政府中清除出去。

2

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月）

刘 少 奇

一 十一月二十日的电报

（一）退出大城市后，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时，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搬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对铁路，除开军事上有必要者外，亦不要破坏。可以在人民中公开宣传，我们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退出城市，但我们要求东北人民实行民主自治。

（二）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国民党是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的。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二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电报

（一）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休养中。

（二）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的三份电报。

（三）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①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以上意见，请你考虑。如你同意的话，请向东北局提议迅速适当地改变若干部署。

三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电报

十二月二十四日你们关于群众工作指示，很好，望切实迅速贯彻执行。如果你们在东北今冬明春能发动广大深刻的群众运动，象大革命时南方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那样，又有十余万主力部队和二十万地方部队与之配合，那你们就不独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而且能争取对国民党的优势，否则你们在东北的地位就将是很危险的。望抓住这一决定性的环节，集中全力，加以解决，这样你们就取得了第一个决战的胜利。你们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及进行减租、增资，群众才不会讨厌军队。军队必须用心进行群众工作，新建部队亦必须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巩固起来。东北各地发动群众的具体情况，望经常电告，中央很关心这一工作进行的情况和程度。

---

① 梁即梁兴初（1912--），江西吉安人，当时任调至东北的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罗即罗华生（1910--），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调至东北的山东军区第二师师长

中央对东北工作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东北局、林彪、黄克诚、李富春、李运昌、热河、冀东、刘邓、山东、张家口、胶东、华中：

对东北工作指示：

1、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能可站不住脚。

2、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或交通干线附近地区内，这是在现时国际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大城市及交通干线。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军事建立第一线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这种地区将是两党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国共妥协后，这种地区可能成为两党的缓冲地带，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及广大乡村之内，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3、在确定任务地区及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目前东北工作的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长时期内将强过我们，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绝大困难甚至失败之可能。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一步一步的战胜一切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目的就是发动人民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增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与群众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最近热河省委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就分不清国共优劣，可能一时接近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4、我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得不到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心，这些情况都是和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

应向干部说明，即使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归于国民党，东北形势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及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必须告诉干部，对于国民党势力，切不可估计太低，也不可以为国民党不会向东满北满进攻，因而产生不耐心作艰苦工作的情绪，这样说明时，当然不要使干部觉得国民党势力大得了不得，国民党的进攻是不能粉碎的，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他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这就给我党以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辽热边境进攻，如果没有外力限制，他们不久必将向东满及北满进攻，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及热河坚决的有计划的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及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工作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5、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与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与地方军，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与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及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根据地。

6、此次我军十余万进入东北及热河新扩大者又扩二十余万，还有继续扩大之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之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及机关必须在战斗与工作之暇从事生产，一九四六年决不可空过，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此事。

7、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与争取将来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及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有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年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注意不够，此次东北党除注意国民党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及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及各项根据地建设工作。

8、中央酉号时局指示，戌虞减租生产指示，亥删四六年工作方针指示，均适用于东北，根据东北目前特点再给本指示望东北局及各分局同志们精心筹划妥慎实施。

中　　央

要超过已往任何一年

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生产运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

《解放日报》社论

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了。由于全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今年解放区人民将首次获得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机会。

解放区生产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生产运动使解放区人民有办法克服一九四〇年至四二年敌寇大举进攻和“三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各项工作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一基础，解放区军民才能在一九四三年以后开始对敌寇进行广泛的攻势，并在去年敌人宣布投降以后完成向沦陷区进军，解放千百万同胞和保卫解放区的重大任务。解放区生产运动获得了全国同胞的衷心倾慕和世界民主人士的一致称道，因为它最生动地表现解放区人民的伟大创造和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实际效果。

解放区生产运动既然在过去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它在今后全国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中一定还要起更大的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在一九四六年我们一定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展解放区生产运动，使这个运动的规模和成绩超过已往任何一年。只有这样，才能使解放区人民，特别是新解放区人民迅速恢复长期战争所给予的创伤和疲劳，改善他们的生活，发扬他们的积极性。也只有如此，才能使解放区成为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才能使解放区更有力量来支持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改革的艰巨斗争。

目前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仍然应当贯彻以农业为主的方针。因为解放区拥有广大的农村，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绝大部分是农民；要保证全解放区人民丰衣足食的生活，繁荣解放区的经济，首先必须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棉花及其他农产品。发展农业，不仅是为了适应今天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造成发展工业的条件。农业发展了，农产品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提高了，工业就有了广大的市场和源源不绝的原料供给。

发展农业的中心环节在于互助合作和改良农业技术；而在我们解放区许多地方互助合作已做得有相当成绩的情况下，改良农业技术尤为重要（在某些地广人稀的地区，仍宜酌量垦荒移民）。经过互助合作，如变工队、扎工队、换工队等，使农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增加劳动效率。经过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农作法、增加畜力、积肥施肥、防除害虫、改良农具、修建水利等，更可以增加农产品的收获量，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互助合作与改进农业技术，二者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互助合作，对于改进农业技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改进农业技术，则使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达到进一步增产的目的。

由于解放区的农民有了民主政府的亲切扶助，并经过了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他们的增

产热忱是很高的。但是要把这种热忱变成实际的增产行动，还需要艰苦的组织工作。我们要深刻了解：要把广大农村千百万农民更好地组织起来，改进农业技术，这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要把这件工作做好，不仅需要百折不回的精神，而且需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必须一方面防止自流，另方面防止强迫命令。必须根据当地情况与群众的需要与可能，通过群众中的劳动英雄或积极分子，耐心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先择费力较小、见效较易的项目做出一些成绩来，然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推广，以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好象缓慢一些，但实际上却是最坚实可靠的。改良农业技术，还必须鼓励农业专家和有经验的农民结合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创造有系统的和有实效的农业技术理论，并有计划地培养农业技术干部。公营苗圃和农事试验场，一定要做到：使自己的工作对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和真正的帮助。党政干部和群众工作者，必须虚心学习农业技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给农村生产运动以具体的指导。此外，我们还必须在这里着重提出关于耕畜的问题。从最近电讯中，我们看到某些地方，因为实行互助合作时牲口顶分（折价）太低，使用者不加爱护，以致群众不愿养牲口，牲口数量有减少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在目前我们的农村还得不到农业机器的情况下，增加畜力是提高生产力的一项有效办法。因此，互助合作的组织，不仅首先需要照顾没有耕畜的穷苦农民的利益，而且还要适当地照顾有耕畜的较富有的农民，这样才能鼓励群众添置耕畜，提高生产力。

为了发展解放区的经济，除了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以外，还必须努力发展工业。今天解放区已经拥有若干中等城市和工矿区。在今天，工业在整个解放区的经济里面虽然比重还不很大，但是工业的发展是有极大前途的。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使中国由农业国的地位升到工业国的地位上去。对于这个目标，我们从现在起，就要作久长的打算。因此，我们要十分珍视解放区现有的工业。无论公营工业，或私人工业，都应当使其繁荣生长。我们要努力发展为广大农民制造各种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另方面还要很好的经营较大规模的矿山和工厂。公私工厂都必须认真实行劳动保护法，同时又须保证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赢利。由于解放区有良好的政治条件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各地私人企业家想到解放区投资经营工业的，大不乏人；我们应当予以欢迎和必要的帮助。要发展工业，还必须有大批的工业技术人材。我们应当爱护和优待现有的工业技术人材，使他们安心地为人民服务，同时有计划训练新的工业技术人材。

今年各解放区机关部队，在不妨碍本身任务的条件下，仍须大家动手，进行生产，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建立革命的家务，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改善机关部队人员的生活。

最后，我们号召各解放区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们，认识一九四六年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到农村里，到工厂里，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学习各种生产技术，埋头苦干，长期建设解放区，以为全国和平建设的榜样。在过去三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曾经涌现出大量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我们热望这些同志继续努力，取得更光辉的成绩。同时我们预期今年生产运动还将涌现出更多的新人物和新创造，并预祝这一运动的成功。

中央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等正向东北输送，美必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势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代。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也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的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的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势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二、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三、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现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针只要我们明确的加以确定，并为之而实行不疲倦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反对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政府谈判已获有结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我们在东北有力量，能在东北长期坚持，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的困难，要他在东北打一、两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达到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与国民党实行民主合作是有严重困难的，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作到以下几点：

1、必须我们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严格限制地〔？〕自己的行动，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

2、在军事上力求巩固组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两个大胜仗。

3、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

以上数点望你们努力作到。我们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苏联和美国是赞成的，全国人民和各党派都赞成，如我在军事上能站住并给蒋以打击，我们必能打破蒋之内战方针，争取东北和平的实现与我们在东北的地位。

五、为了实现上述方针，中央已告恩来和国民党及马歇尔谈判，提出我们派人共同接收东北；我之东北武装编为地方部队，地方政府民选自治，国民党到东北武装不超过十万等条件，并派中美停战小组到营口。如国民党拒绝谈判，则东北发生冲突将由国民党负责。中央还准备公布东北及我对东北的主张，同时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1、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们让步。但必须巩固的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军的进攻。不在大城市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我也是有利的。

2、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

3、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的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

4、对国民党军队官兵、一切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等），设法与国民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与国方接洽。

5、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以上各项望你们切实进行，并将情况电告。

中共中央发言人谈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

记者获悉去年九月间由延安出发去东北的中共中委彭真、陈云、林枫等氏，已经到达东北，并于最近将东北政治情况报告中共中央，特于今日往访中共中央发言人，询以东北现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兹将谈话内容志次：

问：现在东北一般情况如何？

答：自从苏军进入东北消灭日伪以后，东北领土主权复归我国，国民政府亦已派遣军队与官吏前往接收，十四年来的国耻一旦荡涤。东北本为我国资源最丰富、工矿最发达的地方，但因敌人十四年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现极困苦，工商金融也因战争影响，多少陷于停顿，或紊乱，所以现在东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在广泛民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中心关键在于国民党方面派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如何根据停战协定及和平建国纲领的原则与东北各地地方人士、地方军队、八路军及各地的民选政府，实行和平民主的合作。

军队和地方政权情形

问：东北各地现在有些什么军队？地方政权情形如何？

答：东北民间武装素为全国之冠，自去年八月苏军开入后，各地民众即纷纷拿起武器消灭敌伪，从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干部，此时最为活跃，发展亦极为迅速。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指挥下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并成立了杨靖宇支队、赵尚志支队等。在八年抗战中，被敌人俘虏，因于东北的八路军战士与东北游击队员及民兵为数亦众，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亦积极参加消灭敌伪工作。同时，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诗、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亦均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原在冀热辽边区抗战的李运昌将军所部则在辽西一带。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已组成为一支数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伪残余，维护地方秩序。敌伪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这些部队与地方政权的领导，除东北各民主人士外，多数都有本地的与外来的共产党员参加。但是由于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久被敌伪破坏，所以这些党员的行动，最初未能完全一致。直至中共中央派去的彭真、陈云、林枫、林彪、罗荣桓

等同志到达以后，建立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才联系和统一了东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员的行动。现在，凡是共产党员活动地方，秩序都已经安定或正在安定。土匪已逐步肃清，工商业已逐步恢复，汉奸已着手惩办。人民在抗日反汉奸向汉奸算账复仇的斗争过程中，其政治的觉醒与生活的改善，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在某些偏僻的地方，还有土匪与伪军残部骚扰，若干野心未死的日人并予利用他们，以谋破坏东北的和平民主与保存自己的侵略势力，人民对之极为痛恨，希望民主联军能够迅速前往剿除，以便东北同胞能安居乐业。

四项原则必须确定

问：中共对于东北前途的主张如何？

答：中共对于东北的主张与对于全中国的主张一样，可以用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八个字来概括。中共从未反对由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东北主权并派遣一部分军队到东北维持治安，这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总司令谈话中，即有明白的表示；在今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共同发布的停战命令中也正式声明，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不受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限制。但是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

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以承认并整编与使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

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应予承认。如认为它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

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减轻人民负担，以利和平。至于改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二十七军）去接收东北主权，则应予以禁止。

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问：中共上述方针能否实现，政府方面对此有何表示？

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东北人民的要求下，在东北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与此相反的方针，必然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东北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如果不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不与国民党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样，国民党方面如果不承认东北地方民主力量与共产党的地位，不与他们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也会犯严重的错误。过去，国民党方面曾实行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但为了求得整个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军事上曾作过许多世界共知的让步。但是事实证明，仅仅片面的退让，显然并不足以维护和平。因此，甚至在一月十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军队仍图夺取营口、盘

山，以至停战令确已发生时效，冲突尚续有发生，而且国民党方面这种武力解决的方针，如仍固执不改，则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之下，同样的不幸事件仍然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最近重庆三人委员会方面，曾有派遣执行组前往调处的提议，我们为了实现全国的停战，是赞助这一提议的。相信政府方面应该不致拒绝。在政治方面，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实用于东北。总之，东北在全国地位既如此重要，情况又如此复杂，如果有关各方不作一通盘协议，因而引起东北的军事冲突，那就实在太对不起被蹂躏十四年渴望和平、民主的东北人民，实在也就对不起渴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全国人民。中共现正要求与政府进行这个谈判，希望政府仍本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使这一谈判能够迅速进行，并迅速得到圆满的结果。

（原载1946年2月16日《新华日报》）

中央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马周张关于整编全国军队的计划、已经决定，开始国共两党军队各自整编，第一期六个月，我军编多少师由我们自己决定。第二期又六个月，我军编成十八个师，马建议国民党九十个师。第三期再六个月，我军编十个师，国民党五十个师，并以我军八个师加国民党四个师编成四个军，以我方人员为军长，另以我军两个师国民党四个师编成两个军，以国民党人员为军长，一年内整编完毕，确定驻地以后不准调动（总统调动国防军须经国会通过）。保安队每省（将来划成小省）最多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国共美三方组织军政执行部负责执行，所有军事法规将由执行部重新依照美国形式加以规定，其他详细办法另告。

二、现在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第一期我军整编多少现尚未定，准备编成三十个至四十个师，恩来到各处时，请你们和他商量各区应编多少。这些师的干部，均将由中央政府按将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队干部及其余退伍残废军官，亦可由政府按将校尉加委，以后即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但也估计到国民党对我干部必将多方为难，以致加以各种破坏和危害，同时为了准备将来国内的反动派对我各地突然的袭击时，我仍有效的组织自卫斗争起见，中央规定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保安部队外，并保留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去请求国民党加委，以免影响□□□的束缚及国民党的破坏，保持活动自由，公开担负议员或其他工作，但仍保持与人民武装保安部队及其他部队的联系，以使在一旦被人袭击时，他们能够自由活动。此外，在我军表现特别不好的干部可不要去请求加委，这些不请求加委的军事干部，应向其说明上述理由，由他们自动起不要去请求加委而自愿隐蔽下来。

三、为了上述目的各地应即将我军各级军队工作干部造成清册，并附名单、履历、鉴定、官级、职别，内须请求加委或须隐蔽呈报军委。这些清册旅以上的干部须立即造好，在恩来到各地时即交恩来带延安或在二中全会时带延安，以便交政府首先加委定我军各师干部，团以下的干部亦须于两个月内造好交出，在鉴定官级时可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决定。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

一、关于东北问题，根据恩来及各方面情报，目前似还未至解决时机，因为苏联要在东北的经济合办，美蒋尚未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也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但在本年5月间第三次外长会议中有讨论并解决此问题之可能，在此以前美蒋和苏联还将继续进行斗争。因此东北的内政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妥协暂时将不能解决，只有在东北外交问题解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妥协才会有可能。

二、在东北外交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蒋介石将利用他已进入东北军队向我进攻，企图击溃我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想在外交上将东北更多城市移给蒋接受，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根据来压迫我方让步，因此蒋与我方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冲突将继续一个时期。蒋军可能在最近进攻西满及南满通辽、洮南及辽阳、鞍山、营口、海城、本溪、抚顺等地有被蒋军占领可能，但蒋军预定进入东北者只有5个军（约15万人），在此数外再调兵到东北即将牵动国内整个大局，今天还未见国方有此种计划，故蒋军在占领上述各地以后，即很难再举行更深入的进攻和在长春路上作战，并有可能引起苏军某种形式的干涉。因此如我能很好阻止其进攻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必须迅速准备严重的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斗，并须准备在上述地区被蒋军占领后你们仍能继续斗争。

三、现我们在宣传上、交涉上仍继续要求东北停战，并将参加政府、参加国大及整编军队等问题与东北停战问题联系起来向国党交涉；而你们在东北则应积极准备粉碎蒋军的进攻，并利用苏军未撤时期，迅速肃清土匪，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但你们不要希望中央再向东北增兵及增派干部，中央决定不再增兵到东北，因为这对东北局势不会有大的帮助，且将牵动大局。因此你们只可依靠现有部队及现有干部来应付东北一切情况，而东北现有部队，如能加以切实整训是完全够用的。至于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法，中央同意最近林彪的意见，坚持以多胜少，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及待敌分散疲劳后各个消灭敌人等项原则。你们最近的几次胜利已给蒋军的骄气以打击，再有几次那样的胜利，东北的大局可能决定。

四、由于国方的反苏运动，苏军在东北似乎又暂时可放手一些，我乘此时机向辰兄交涉，要求他们配合我军迅速消灭全东北的土匪，以消弱东北反苏、反共力量。只要东北土顽消灭，蒋军进入东北的5个军就不能有大作用，故消灭土匪意义非常重大。此外，还望你们切实问明辰兄那些地方是他们必须交蒋军接收的，又那些地方他们可以不必交蒋接收的，你们须切实要求辰兄不要在外交文件上及事实上将很多中小城市都交蒋接收，以造成我们在国共谈判中的困难，如过去由于苏军将赤峰、多伦交国接收，蒋即利用此点坚决不允停战，几

使谈判破裂，马歇尔至后还说我方不让，蒋军询？中苏已有协定，接收赤峰、多伦为不当，望将此事告知辰兄。你处应估计，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将很多城市例如不但南满、中东两线而且洮南、安东和佳木斯等一切有铁道、河道的中等城市在蒋方坚决要求下苏方也有移交之可能。因此，你们事先应向辰兄着重交涉，但这些中等城市我方绝对不能让给蒋方，即南满南段、中东西段某些城市也不能让，交涉结果望告。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一、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为了和平，我方代表曾极力向蒋、马提议在东北停战，但蒋、马在商谈后提出五条作为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以为执行小组去东北的先决条件，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三十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准开入占领等。但东北政治问题及我党、我军在东北地位则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在此条件下，我方当然不能接受，停战小组也暂不能派出，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

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除以西西为主干的少数革新派所进行之反苏、反共、反政协活动外，还有以何应钦、白崇禧为首的军人派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谋，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煽动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为此何白已电告孙连仲、王耀武、傅作义等到渝，并在全会宣读阎锡山反共电报，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所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其阴谋之危险性较西西等革新派更为严重。

三、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何白军人派之阴谋挑衅，除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高警觉严密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之袭击。如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我应一切秘密准备，对外切勿声张，勿给顽方以任何借口。

四、恢复交通及北平执行部一切合理命令仍应主动照常执行，北平执行部及各地执行小组中我方人员须加强工作，不称职者须加强人员，当做一件大事办理，并注意美国人。

五、切实具体的展开统战工作，以分割与争取顽军，反对内战阴谋为主要目标。

六、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减少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三个月完成，由各局自己做成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斗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执行，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延，并不要远离部队，在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须向一切人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反复解释多次，由主要负责同志出席解释，并发动复员自己讨论，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充分注意安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动员各方面及各界把他们当着有功劳于国家的光荣战士看待，使他们各得其所，如果还未解释好准备好的地方便不要仓促复员，如果

对此点疏忽，定会造成恶果，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召下准备归队。

七、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召开专门的减租训练班、生产训练班，纠正偏向，奖励成绩，在报纸上讨论减租及生产工作中的优点缺点，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生活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务必加强注意力，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八、不论反动派破坏如何猖獗，甚至再打一时期内战，不论全世界、全中国反苏、反共活动如何高涨，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业已确定，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我们应当有此坚信。在时局估计与党的政策等项问题上，党内各种过左过右的偏向，希望随时解释和纠正。

中　　央

三月十五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反革命的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一、据密息，国民党中宣部于三月十二日向各地国民党部颁发了第一次宣传通报说，宪草制定仅国大有此权力，在国大通过之前，政协决议不能成为定案。因此国民党主张：（一）国大为有发组织代表人民行使四权；（二）省为中央代表机关不赞成省宪；（三）中央政府维持总统制，但最后决定权既在国大，故二中全会提出意见不能认是决定云云。现二中全会已根据这三项原则通过五条件决议，公开发表。不管形式上如何曲折，实质上是将政协决定的国有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

二、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乃采取迂回阴谋手段。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只要宪草原则推翻，成立独裁政府，则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等决议势必成具文以致全部推翻。因此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此种阴谋，必须坚决反对，坚持周张和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任何修改，对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宪草原则的决议及其在宪草审会议中所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任何主张，必须予以痛驳，并要他们遵守信义，中央已在解放报发表了声明。

三、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裂，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动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如国方因我坚持政协决议，并利用东北问题实行分裂，发动全国内战，我应亦不惧怕，即使再打内战，我虽可能受些损失，但大势所趋仍将归于和平。而那时反动派的阴谋必将更加暴露，他们的气焰亦将大为降落，人民再受一次教育，和平民主的前途更加有保障。在反动派如此嚣张，蒋介石如此阴谋百出的情形下，和平民主前途是完全没有保障。最近一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才有作某些较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因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须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但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愿破坏他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中央军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一、自停战发生实效后，华中、苏北敌伪顽联合大规模军事进攻一般停止了，然而伪顽特务压迫，以伪军为主，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下，向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有加无已。他们依据铁道城市向我解放区步步压缩，最近四月来，各解放区均受了严重损失，仅就冀中、华东两区不完全的统计，即被占去村镇三百余处，杀死我村区县级干部三百余人，人民物资被抢，无以计数。反动派蚕食斗争阴谋，在这一时期是有较大收获的，如不给予坚决打击，如不歼灭蚕食进攻的伪顽军，收复一月十三日以后的失地，反动派的蚕食阴谋是不会自动停止的，伪军也不能从国民党控制下动摇分化与瓦解，解放区边沿地区的群众难以迅速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即不能实现，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提高，边沿地带不易巩固，解放区将日见缩小；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策，采取积极的防御，寸土不让，坚决保卫解放区，给进犯者以打击，并配合停战小组的调处，反动派的蚕食是可以打退与停止的。

二、为反对蚕食确保边沿地带群众利益，掩护春耕，应动员群众自卫联防，村与村，区与区联防，实行边沿区战线封锁消息，组织各种各样群众性的通信联络（鸣锣打鼓、烧烟放炮）。一村遇袭，各村自卫武装民兵武工队车子队迅速赴援，发扬抗日战争中民众武装斗争经验，发扬战斗与生产结合的互助精神。并在边沿地带选择主要地点利用建筑一班一排的秘密防御工事，准备粮水弹药防敌袭击，坚决据守待援，掩护主力机动队消灭进攻之敌，同时准备地道（坑道），在极端危险时可借此撤退，被敌占领时可利用此地道接近爆炸，打击顽伪。但设施此种防御工事须选择重要地点，以达到节约兵力便于机动，如边沿地区普遍都实施，则反而分散兵力，结果到处薄弱被动，到处不能防守，为着随时打击进犯之敌，必须在适当的位置控制机动兵力，目前还必须适当集中力量，对于一月十三日以后，进占我解放区一切大小村镇之顽伪军某个重点的给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三、国民党利用伪军进攻我解放区，并以伪军补充其主力。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使之知难而止外，更重要的是从各方面积极进行瓦解伪军工作。

四、对一般伪军官兵，应采宽大政策，调查与动员其家属亲邻号召他们回家，允从宽免究，保护其生命财产。至于过去作恶多端为人民所深恶痛绝，今仍依附国民党中法西斯分子坚决反共反人民反民主者，我必须采取坚决态度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至公审处决；但曾经反悔申明不继续作恶者，应不究既往，予以自新之路。

五、对于向我进攻之伪军应坚决消灭之，尽量多击毙，特别是军官；但一经俘虏或自动投诚者均分别给以优待，在解放区安家回家就业者，以同等公民看待，对于伪军政策必须宽严适当，宽大与镇压必须密切联系，才能申张正义，动摇与分化伪军。

把复员工作做好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解放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忠实执行整军方案，在解放区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单就晋冀鲁豫一地来说，已经有首批七万五千人复员完毕。晋察冀对复员进行了细密的组织工作，单单察省一地，即于三月底复员万人。晋绥军区以及其他地区，都纷纷成立整编机构，积极开展复员工作。解放区的复员工作的开展，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它将大大地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由于复员工作的实施，即减少了财政预算二十八万万七千六百零六万元的巨大数目），又大大地增加解放区生产战线和民主建设的生力军，使长期战争的疲劳得到恢复，使解放区的经济更能够向前发展，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建设的斗争中，它会发生极大的模范作用和推动作用。

解放区军队之所以能够这样地认真地进行复员与整编工作，并不是偶然的。解放区的军队乃是民主政权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他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因此，凡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全民族有利的事，他们都能够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去加以贯彻。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一切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不但曾经十分英勇地坚持了敌后的战斗，而且也曾参加了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建设工作。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流血流汗，建立了顶天立地的功绩，他们不但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学会了生产和其他许多本领。在今后和平民主的新时期中，他们中间将有一大部分回到民间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这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所需要的事。解放区人民军队的战士们，无疑是能够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去贯彻的。

解放区的复员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很顺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解放区的民主政府领导这一工作之认真和切实。单就晋察冀边区的例子来说，他们不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做了细密的领导工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三月十四日发出的指示（见本报三月三十一日第一版）就是全解放区各地认真领导复员工作的一个好榜样。这一个指示表明，解放区政府在进行复员工作之时，首先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它指出，解放区进行的大规模复员工作，其对全国的意义“是为了切实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应和平民主建国的新局面，并为全国树立整军复员的模范。”它又指出，复员工作对于解放区本身的意义：“军政人员的复员，是为了发展解放区的和平建设，增强经济战线的劳动力，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加强地方上的民主建设，节省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以恢复八年来边区人民的创伤，繁荣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边区的民主政治。”要使复员工作做得好，必须使每一个复员人员都能够自觉地热忱地成为和平民主建设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复员之

后，继续努力，为广大人民和全民族利益服务，因此，这样明确地指出复员工作的重大意义，是非常必要的。而根据这些意义，反复说明，进行深入的教育与动员，使每一个复员人员都能够感觉复员的光荣，也是非常必要的。就这一点来说，晋察冀边委会的指示，又表明了解放区民主政府对于人民认真负责的态度，它号召各机关部队要把动员与教育工作做好，"要使每个复员人员深刻了解复员工作的意义"，"坚决反对不作动员、推出即算的不负责任的简单方式"。它指出"复员工作是边区军政民的共同政治任务，它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组织工作，绝不是只发发补助费与路费等推出去即算完了的单纯事务。"它要求"各部队机关应针对本单位中战士干部中的反映，然后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它指出，应该经过动员会、小组讨论以及个别谈话的方式，使每一个复员人员都从思想上自觉地来接受复员的光荣任务，而"对于坚决不愿复员的同志，不得免强使之复员。"

这自然不是说，仅仅在思想上进行动员与教育就够了，而对于复员人员的物质照顾以及还乡后的安置问题可以听其自然，不必注意。必须着重的指出，不切实解决复员人员的各种具体的困难问题，要想把复员工作做好，使复员人员回乡后能在和平民主建设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还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解放区的民主政府仍然贯彻着它的认真负责的精神，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解决复员人员的一切具体问题。由晋察冀边委会的指示以及关于复员办法的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区的复员人员，在一切物质需要与各种问题上将能得到民主政府的周密的照顾。他们不但在出发时受到热烈的欢送，得到必要的衣服鞋袜以及路费的补充，在沿路并有各地政府的妥善招待，在有火车的地方享受免费乘车的交通便利。尤其回到了家乡，当地的政府和人民将给他们以热忱的欢迎与帮助，他们将能够获得生产补助费，享受贷款的优先权，他们将得到各种便利的条件来组织自己的生产，建立自己的家务。他们将受到当地群众的尊重，当地政府群众将鼓励他们参加地方的各种工作，以他们长期锻炼所获得的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贡献于地方的建设事业。总之，只有在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具体领导和切实帮助之下，一切复员人员才能在和平民主建设中发挥他们巨大的力量。

我们号召解放区的各级政府和工作干部，坚决地把复员工作做好。这一工作的意义和抗战时期的战斗工作一样，同样是对全国广大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负责的工作。要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晋绥等地作榜样，认真切实地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号召解放区的每一个复员人员，英勇地接受自己新的光荣任务，一如在抗战中接受战斗任务一样，正如晋察冀边委会的指示所说："复员的同志，在工作上是需要的，任务是光荣的，他与继续留在机关部队工作的同志，只不过是革命工作的分工。"因此，不要因为自己不能继续留在机关部队而懊丧气馁，要重视自己所担负的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自己对革命过去有了劳绩，而骄傲自大，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经常昭示我们的教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脸要天天洗，地要天天扫。"要准备回乡之后，成家立业，勤劳生产，致力地方公益，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地向群众学习，积极帮助群众，帮助政府，参加当地的民主建设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时时刻刻注意：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但是到达这一光明前途的道路是异常艰苦曲折的，在从事长期和平建设之际，要随时警惕中国民族敌人的捣乱，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重新挺身而出，拿起武器保卫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解放区建设得更好，才能够推动全中国和平民主早日实现，才不辜负我们人民军队和人民勤务员的光荣传统，才能保持和发扬这光荣的传统。

中央关于处理复员问题的规定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军此次复员人员经过革命战争锻炼仍为革命光荣的革命战士，必须认识此点，但复员系一很大的群众工作，必须慎重处理，除在政治上彻底解释清楚外，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因此各地应组织复员机关，如复员委员会等认真办理，不得敷衍塞责，并根据各地情况规定如下办法：

（一）复员人员按军龄长短，发给胜利生产补助金，入伍一年以内者发小米一百五十斤（此为北岳、太行标准，其他地区可依此比率，如山东发谷子三百三十斤华中发小麦一百五十斤），二年者发小米三百五十斤，三年者发小米四百五十斤。以上比例推算至抗战初年入伍者为止。八年以上战士老弱疾病，退伍还乡者斟酌情形加以特殊照顾，复员期各区自行统一规定。

（二）复员人员不论入伍时间长短，一律发给单衣一套或两套，鞋子一双或两双，毛巾一条，其本人旧的衣服被子准其带走，并享有上项待遇。

（三）转业人员（转到经济或政府部门工作）对外发表时列入人数内，对内则不得享受上述一、二两项优待，但有特殊情况者，可酌予补给，亦不能超过一、二两项之优待之平均数的二分之一。

（四）连以上干部一般不复员，但有一部分须帮助其转业，如有个别干部因特殊情形者要求复员，除照一二两项优待外，排级至少加发小米五十斤连级加发小米一百斤，营级加发小米一百五十斤，团级加发小米二百斤。

（五）对复员人员的部队应派人欢送到县（本区者），将关系情形介绍给县委或政府，另以村为单位进行欢迎帮助解决问题，如找房子、设法拨给土地，团结民众解决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复员人员回到各地以后，当地党与政府，可斟酌情形，吸收其参加各种工作。

（六）对复员人员一律发给复员证。

（七）本区复员人员须回另一解放区者，均一律将优待粮折成抗币发给，复员人员所带抗币如数交县政府以上机关，该县政府以上机关查验复员证以后，应按该复员人员应领粮食兑换能买到同等粮食的本地抗币数。

（八）各县复员委员会，应热情招待帮助过往复员人员，有疾病者须给以医治，生活予以照顾。

（九）荣誉军人回到任何一个解放区时，可按其所带的残废证，按各该区规定领取残废金，各该区承办机关应予发给。

（十）烈士遗族，按原来各解放区政府规定继续优待，其中有无人抚养的嫡系亲属，可

酌情按照复员标准予以优待。

（十一）对抗战期间数次精简照顾不周者，致个别人员流于饥寒痛苦者（如老弱疾病残废者等），可个别予以帮助，原则不能超过此次复员人员优待之标准，也不必成为法律规定，并向他们加以解释：抗战期间财政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现抗战胜利了应加帮助。

（十二）凡逃亡战士干部非经复员，不得享受上述各项优待，但也不应加以歧视。

（十三）凡战士干部其家非在我解放区者，应暂时尽可能争取其不复员或复员在解放区生产。

（十四）国民党军队复员到我解放区者，均应热情招待，不得歧视。

上述各种办法，各地仍可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办理。

周恩来对东北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

周恩来同志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假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招待记者，到会中外记者三十余人，恩来同志就东北停战问题、接收问题及中共对东北问题的意见，发表谈话，历一小时许。恩来同志首谓：为停止东北内战问题，中共及第三方面民主同盟，与马歇尔将军多日以来奔走谈商，曾作各种努力，但到昨日为止，此种努力仍未能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非先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坚持下继续扩大，实使人焦急万分。但协商仍希望在南京能继续进行。

关于东北的停战商谈约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抗战胜利前后，东北并无国民党军队，只有中共部队。此点敌人的报纸杂志皆直认不讳，故这时东北没有内战问题，而只有推翻伪满政权，收缴敌伪武装问题。第二阶段：十一月中，杜聿明将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了关外的内战。此时中共坚主停止内战，并同意国民党军队由北宁路东开，和平接收长春路之沈阳、长春，但政府军不去接收沈、长，反西向分路进攻热河，直逼赤峰、承德。第三阶段：一月十日起，停战协定公布，全国一切军事冲突皆应停止，但国民政府却将东北除外，并在东北扩大内战，连续增兵达七个军之多，攻占中共军队所在城市至八个之多，在此情形下，中共仍主立即停战，政府军队可实行接收长春路，但政府不允停战。至三月中，政府军队已进入沈阳，中共方面仍续主立即停战，并允政府军队接收沈阳到长春间一段铁路及其两侧各三十华里，当时苏军尚在长春可以接上，至于开入中共其他地区，则须协商。但中共这种努力，又被拒绝。第四阶段：三月二十七日起，签订了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执行停战任务的命令，此时更应达到停战目的，但执行小组到沈阳后，政府军仍不承认东北有中共部队，并宣称"只有接收，并无调处"，结果执行小组无法工作，东北内战愈演愈烈，政府军队且攻占中共军所在城镇七个。此时，东北政治建设协会曾为停战问题分别与陈诚将军及本人商谈，四月十二号曾露和平端倪，如此时政府真能下令停战，长春、四平街之战，即可避免，但次日蒋主席返渝，陈诚将军即飞赴南京，调解又告失败，遂演成今日的严重局面。回想过去若干次机会都被政府错过了，真令人非常痛心。我们对东北一向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战，并做了最大的努力与让步，此实无可责备。第五阶段：为马歇尔将军来华到现在。几个月的内战，使东北的形势已有了极大改变，苏军业已撤退，东北问题更成为内政问题。十日以来，第三方面代表及马歇尔将军曾作了很多努力，也曾就停战后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设想了一些解决的办法，甚至提出了若干方案。这些努力是值得感激的，但终于被坚持内战方针的人破坏了，这是令人愤慨的。现在，虽然不能在重庆求得东北停战，但我们仍希望能在南京继续商谈，求得东北内战之停止，而不致影响全国。

其次，对于东北问题的解决，我们的基本主张是：第一、东北的政治，应该在和平基础

上，实行民主，地方政权应由国共及东北民主人士共同参加，而绝不能由一党独霸或包办，事实上任何一方面想独霸或包办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外交上应求国际合作，既不能把东北造成反苏基地，同时也不应是排美的。第三、军事方面必需实行整军复员，以维持东北治安，并减轻人民负担。第四，一切交通必需恢复。第五、发展经济、增加生产，同时必需区分国营省营与民营，使各种经济能平衡发展。这些原则，东北民主人士都是赞成的，我们希望立即停止东北内战，实现上述这些原则。

再次，下面几个问题仍需予以说明：

一、接收问题　根据中苏条约及中共声明，政府派兵往苏军驻在地区接收，本无问题，一月十号停战命令公布后，更应该立即停止冲突去接收，但那时政府只图打仗，不去接收。试问冲突既不停止，怎能只许你打我，不许我还手，只许你攻占我的地方，不许我攻占你的地方。而且苏军在时，我让你接收，你偏不接收，苏军走了，你已经接收过的地方，因为战争未停，被我攻入，你仍说要接收，这是什么道理？现在苏军已完全撤退，“接收”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既无接收问题，自更不应借口“接收”，去打内战了。

二、承认问题　现在政府军事当局有些人仍不承认东北有中共部队，说只有“土匪”，如过去说广东只有“土匪”并无中共部队一样。后来虽承认了广东东江纵队，但对于琼崖中共部队仍不承认，这真是岂有此理的事。中共认为现实必须承认，过去既然签订了许多协定，就是互相承认了，不承认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三、主权问题　我们不反对国民党政府去日本占领区接收主权，或从苏军手里接收主权，但同时政府不能反对中国人民从敌伪统治下自动解放出来或中国人民武装消灭敌伪后所建立起来的中国主权。倘若非在那里建立一党专政，不叫接收主权，那么，全国各解放区都要发生主权问题，战争就永无休止了。

现在，全国需要和平，东北内战应立即无条件停止，因此，上面几个观念，需要弄清楚。

“打下长春，再谈停战”的说法，尤属危险。既然要打仗，在战争中地方的得失，无法料定，如打下长春失掉其他地区，或根本打不下，或打下了又产生新的欲望，这样，战争不会停止。如果真有诚意停战，就应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再谈其他。

根据目前形势，东北的前途有下面两种趋向：一、大打下去，这不仅糜烂东北，而且极可能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的内战，这是人民绝对不许可的。二、立即停战，这是唯一好的前途。但绝不能拖下去，因为东北现在打着，几千几万人的生命每天在丧失着，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甚望坚持内战企图拖延的人早下决心，回头不晚！

恩来同志谈毕，继与各记者道别，并回答所提各项问题。最后，介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及新华日报代社长傅钟，副社长周文诸同志与各记者见面。四时散会。

（原载1946年5月1日《新华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

（甲）关于土地问题的中央指示已发给你们，在东北热河等地，除坚决实行没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及其他敌人所经营的公私土地与汉奸土地外，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和当地情况运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各种形式及当地广大群众所创造的各种形式，使地主阶级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普遍的得到解决土地问题。

（乙）但对于蒙古人地区之土地问题，现不要急于要求解决，应详细调查另行处理。

（丙）你处对农民运动的指示及你们的经验，务必要经常的告诉给我们。

（丁）在放手发动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工作中，必须将战争动员、参军运动、武装农民、剿匪、搜缴地主武装、组织民兵自卫队等工作联系起来。

中央关于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

各局周叶罗饶李：

一、目前国民党除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外，并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全国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

二、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迟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到来更快；但我必须坚持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

（二）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应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发动中国内战，我们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和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应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要使纠纷扩大。

（三）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时间愈长愈有力。另方面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方面因彼方运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营路加以破击，一俟告一段落，即应转入调整。

（四）除东北加以作战同时加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并须于今后六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然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六个月又分为两期，五、六、七为一期，八、九、十为二期，望各地首先抓紧目前三个月工作，切勿麻痹松懈。

（五）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动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大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

中　央

辰　删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从分局四月间关于热河群众运动的报告中，看到你们坚决拥护农民解决土地的正义要求，实行群众路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散土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动了广大群众，得到很大成绩。这些工作你们作得很好，是完全正确的，与中央最近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方针是符合的。

（二）在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和少地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热河地区，中央五四指示更加适用，望坚决执行。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租息，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里。

（三）对于大汉奸土地，应坚决明令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于大地主所隐藏的黑地，抗日政府应在法律上否认其所有权，这样使农民清算黑地时更有合法根据。对于经营地主的土地，应坚决拥护雇农要求土地的迫切要求，运用反奸、清算等各种方式，使经营地主的土地，转入到雇农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手里。对勾结土匪，抢掠农民，坐地分赃的地主和土地，应当作为土匪窝主和抢掠赃物，彻底清算分配，以消灭土匪的基础。

（四）目前应将群众运动由承德、围场、热北等地广泛的推及到各个应该发动而尚未发动的地区，使土地问题，在今年年内得到全部或大部解决。要下决心调集大批干部去发动和领导（不是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同时与军队配合，彻底清剿土匪，使清算与清剿密切结合。

（五）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对党内在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右的和"左"的偏向，加以热情善意的教育和纠正，有计划的大批的培养本地新干部，适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对群众在斗争中的天才创造，应特别重视。

中共中央情报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

（一）关于木兰、通河、方正三县群众工作经验很好，我们已转给热河作为他们的参考。

（二）经验中证明必须使清算运动发展到分配开拓地、满拓地，这是很正确的，但根据太行、山东、华中的经验，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如大斗进小斗出等），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担负（如应由地主担负之地亩捐，转嫁于农民担负），清算霸占吞蚀，清算人权污辱（如地主强奸和霸占农民妻女等）等种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里和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此种经验，望你们注意。

（三）望你们通告各地迅速地放手解决满洲土地问题，以巩固我党在满洲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对热河处理土地问题的几点指示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

你们关于热河农运情况的报告很好，有几个问题请考虑：

一、政府颁布的没收敌人及汉奸土地、匪首及恶霸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及旗地归农民等法令，对农民分得的土地实行发照税契等办法，这对于推行土地改革很有好处，望速实行。但对于黑地问题，应明白宣布其属于地主者没收，属于农民者归农，以免有黑地的农民发生疑惧。

二、赤贫农及雇农得到土地最少，这种现象须十分注意。除你们所提调剂土地办法外，政府在颁布各种解决土地问题办法时，应特别予以保证。党的农村支部，区乡政府及群众团体在布置和发动斗争时，首先要在全体农民群众中说通这个问题，给赤贫农、雇农的利益以确定的保障，这样才能使他们积极斗争，并避免事后群众内部发生纠纷。

三、在进行土地运动中，必须多召集村乡的农民大会和以县为单位的农民代表大会，经过这种群众大会和代表大会的形式，领导农民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在群众初发动时，应多开会，这是发动与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和农民觉悟、暴露地主罪恶、打破地主离间、巩固农民团结、建立农会、培养干部、交换经验、改造政权等工作最好的方式，望加以注意。

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关于全区三个月练兵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国民党反动派，从发动东北内战起，即布置全国内战，情况万分紧张。我只有击破新的内战后，才能争得和平。为此，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及人民武装，均应在目前斗争态势与掩护夏秋收工作中，来争取执行中央五一发下的三个月练兵（可能时还延长三个月）指示。这在准备粉碎国民党新的进攻上有极大的作用，应由全党保障完成之。

第一、练兵的基准时间与内容

甲、各部队各就工作态势，抓紧使用其工作间隙时间，分头逐步实现这个三个月练兵计划。在纵深机动位置与斗争有间隙的部队，可自六月十五日开始。

乙、练兵内容分配：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而军事又以射击、刺杀、投弹、土工等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即：

1、军事与政治课为三比一。

2、技术与战术为三比一。

3、各特种兵技术与政治课三比一。

4、部队战术教育，着重于单人到班的战斗动作，多练习夜战及利用地形地物，以及守城、守阵地动作。如此更能发挥以前野战村落战的特长。

5、连以上干部教育——除亲身担任所属技术、战术教授与学习外，应由旅团组织其本身学习。拟出切合敌情的想定，以行战术作业（发挥自卫作战经验）使用兵与练兵结合。并在此军队生活中多多培养干部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四者健全的能力。

丙、对各级统率机关诸部门的工作要切实加以整顿，进行彻底的精简，加紧工作人员的业务学习，改善工作作风，锻炼与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实施方法应是：

1、结合现实斗争——诸野战纵队应以团或旅为单位，各在机动位置训练，军区部队以各独立机构（如团以至县区干队）为单位，各在战斗准备位置或其直后方训练。

2、不能同时实施者应轮番训练，有战斗任务者应充分利用间隙时间训练。不得因战斗而放松训练，亦不得因训练而放松斗争。

3、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与群众练兵热潮相结合。这就首先要各级军政首长动手研究教练法，不善教练及不懂技术者立即下苦工学习。同时开办各级轮训队，轮训所有干部，提高其技术基础与教练能力。

4、要实行学用一致，战教合一的办法。一切动作都要切合实战动作的情况，除个别最

基本的动作外，主要的必须到野外去，按照战斗活动的情况，实行操练。那种把战场和教场截然分开和空讲不作的教条主义，必须严格纠正。

5、实行官教兵，兵教兵和兵教官的群众路线方法。那种以为训练部队不是指挥员自己责任的想法，不在群众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不相信与不愿向群众学习的现象，必须克服。

第三、从对诸统率机关的精简中与动员归队中，设法充实战斗连队，是练兵工作的组织保证之一。请加以注意。

第四、动员与政工：

1、军区决定六月十号召开练兵会议。各军区、纵队应抽一个负责干部，并带个别军分区与旅级干部，前来出席会议，接受总的精神。此时各军区、纵队应自己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不要等）深入练兵运动的动员，并实行出操，进行实弹射击和刺杀、投弹，以测验其技能刺激其精神。在部队中应连系当前自卫斗争与准备应付法西斯向人民进攻作战的现实问题掀起大练兵热潮。

2、政治教育亦以揭穿法西斯进攻，提高自卫作战的准备为主题。政治工作要完全渗入到练兵运动中去，一切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发动竞赛、选举模范学习者等，都要以直接推动练武运动为中心任务。这里政工人员、指挥员与士兵群众一起操练，是掀起练武浪潮的最主要方式，应特加注意。

第五、关于物质保障，除由军区即发应用的教材外，各军区、纵队应在现有基础上，在不过分增加民负上，尽一切努力给部队在练兵运动中一切物质上的帮助，保障不发生过分之困难。

第六、关于人民武装，尤其干部首先应在减租减息生产运动中健全组织，接着本此精神结合边地斗争，抓紧农隙长短时间，给以必要的训练，尤应乘此锻炼与加强各指挥部的工作。

第七、你们应发扬一九四四年执行中央练兵指示的经验。并将执行本指示的进度，尤其是总结新经验，按月报告我们。

大家发愤整军练兵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

刘 伯 承

我们现在是遵守政治协商会议三大协定进行整军练兵，但又是处在国民党反动派违犯三大协定向我筑堡前进，不断蚕食奔袭和准备抢我麦收，对黄河归故不浚不复堤，光堵口，冲洗解放区，从东北内战发展为全国大内战环境之下，进行整军练兵。因为这样，我们整军练兵的任务，同时就是准备粉碎反动派可能的大举进攻，以保我晋冀鲁豫全边区。因为这样，我们的整军是在复员中减去骈枝、冗员、紧缩统帅机关，充实定额的战斗部队，以适合于练兵的组织。因为这样，我们的练兵时间是在与反动派斗争保卫边区各种岗位上抽出时间，轮番训练，分头逐步实现三个月练兵计划；不是离开斗争岗位，放弃掩护人民翻身运动，麦收、下种等任务，大家关起门来练兵的。因为这样，我们练兵的课目、内容必须使野战军步骑炮工兵、地方部队、人民武装等各种不同的部队，"有的放矢"，力求适合于今后保卫边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各种不同任务的需要；这就是毛主席教我们"实事求是""学用一致"的办法。

我们现在练兵的课目内容"主要是四大技术"射击、刺杀、投弹与掩蔽工作（利用地形地物，夜间动作，土工作业）占全时间四分之三；其次是适应敌情（它有炮兵坦克飞机）的战术占全时间四分之一。只有从技术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战术才会有物质的基础，只有战术适应可能的敌情，以发挥自己主动，才能消灭敌人。我们曾学过射击、投弹、刺杀，野外机动战斗，城市村落战斗和游击战争，而未深学过夜间战斗、土工作业，尤其是防守城市与野战阵地的战斗；我们要熟练以往学过的课目，更要熟练少学过或未学过的上述课目。战术，尤其是技术，各部队都要抓紧少而扼要的课目，在实物实地上苦练，先教单人到班的动作，练到熟能生巧的地步。而干部则于这种练兵基础上加学一点少而扼要的本职的现地的战术作业。这些训练，必须消除贪多无得，大而晃之，舍本逐末，光训不练的办法。

整军练兵任务，只有各级军政首长，尤其是指挥员亲自动手，以与所造成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广大群众的练兵热潮相结合而行动，才能完成。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必须担起练兵责任，鼓起练兵热情，亲自定出练兵进度表，研究课目内容、教材、教授法，尤其是亲自带头到轮训队与部队中去在实物实地上去教授、学习、检查，以及总结与发扬经验教训；切不可怕自己对练兵不熟练而单委之于训练参谋，与下级指挥员来敷衍塞责。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不能很好的用兵，犹之乎人没有积蓄得钱，就无钱可用。朱总司令教指挥员要学会养兵、带兵、练兵、用兵的四项本领；我们每个指挥员，在这次整军练兵中，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学会这四项完全的本领，尤其要学会我们最差的练兵本领，以使每个指挥员都具有四全的本领。

中共中央发言人为蒋军妄图歼灭中原我军发表声明

发言人称：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实行兇恶的“围歼”计划，现中原形势异常紧急。国民党方面各种进攻的军事准备业已完成，如不即谋制止，势将造成绝大惨剧。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特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负责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反之，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新华社延安1946年4月29日电）

中原军区严正声明呼吁全国制止内战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为国民党发动对中原军区部队六万余人之“围歼”阴谋事，我中原军区负责当局，顷发表如下声明：

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已久的对我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歼”计划，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国民党军在四周围困与准备参加“围歼”我们的部队，计有七十五军、七十六军、七十二军、六十六军、十八军、十五军、十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六十九军、八十四军等十一个正规军，共二十六个师，三十万之众的兵力。另河南九区专署所属各县之保安团，尚不在内，自四月中旬以来，即有六十六军、七十二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等五个军，计十个师以上的大调动。最近已经出动向我边缘地区进攻者计有新十五师、新十三师、一一八师、一八五师、十三师、一九九师、第六师等七个师。平汉路西之进攻，于四月中旬即已开始。路东方面新十三师倾一师之众在四月二十五日，猛烈攻占我小界岭（麻城东北百五十里）等，继之又于二十八日向我陂（黄陂）安（黄安）南地区进攻。以上国民党各军队作战给养准备已经完成。第一线部队，多数已准备三日携带之粮，花园、潢川、商城等地，均已设置高级将领指挥所。我军几处前线，已接获国民党军之哀的美敦书，无理要求我军撤离左家店、溜港店、朱唐店等重要集镇。根据上述种种迹象，中原大战，有在数日内爆发之可能，形势极端严重。

我们完全同意我党中央所指出的这一阴谋行动的全国性质，三个多月以来，各种事件的发展，已证明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三大协议之行动之继续。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反动派自此便最后地撕毁了停战协定，宣告全国和平的终结与再度全面内战的开始。他们妄图歼灭中原军区部队，以便抽出更多的兵力，去进攻其他解放区和发动全国内战。因此全国人民决不应忽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始终竭诚拥护和平。当我们还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来保卫和平与争取生存的时候，我们决不想动用武器，但一旦刀枪已经架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拿起自卫武器来坚决保卫和平与争取自己的生存。我们坦白地告诉反动派，你不要幻想我们是睡在鼓里的蠢汉，是一头“引颈就戮”的绵羊，我们早已看透你们的阴谋诡计了，我们早已安排好为自卫所必需的一切了。如果你们敢于进攻，我们也一定坚决地还击，你们何时进攻，我们何时还击，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人类的正义，我们再没有理由退让，也不可能退让了。反动派的老爷们，清醒一点吧，要是忽视这一千锤百炼而且是具必死的决心以求生存的六万部队的意志和力量，重燃起这把内战的火，那你们必将首先自食“玩火自焚”的恶果，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最后，我们仍要提出下面的希望：

（一）要求国民党当局顾全大局，悬崖勒马。

（二）要求国民党官兵拒绝参加内战。

（三）我们更要求全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及外国友人，重视目前的严重形势，努力制止这一内战的爆发。

我们所以作如此要求，决非仅为我军六万人之生命安全，也不仅为了中原数千百万民众免于战争惨祸，同时实亦为经过无数艰辛而获得全国的和平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民主事业。

（原载1946年5月6日《解放日报》）

叶剑英同志对国民党北平当局摧残言论的抗议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

新华社延安电：北平三十一日讯：今日下午四时军调处执行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将军为中共在平机关报《解放报》及本社北平分社与平市七十五家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同时遭受国民党当局摧残事，招待中外记者，到纽约时报、美国新闻处及平、津、沪、汉、渝各报及通讯社记者与杂志界五十余人。首由《解放报》及本社北平分社社长钱俊瑞报告该报该社横遭当局非法封闭经过，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之法西斯暴行，呼吁同业予以援助。

接着叶剑英将军发表谈话称："中外记者们，在中国历史上，在北平，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第二个'七七事变'。这就是说，北平市的反动当局，完全犯法的在五月二十九日的黑夜里，一下子封闭了或追停了七十七家报纸杂志通讯社，迫使七十七家言论机关，不能继续与读者见面，这里面包括妇女、儿童、语言学、科学、宗教、经济、商业性质的报刊，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空前的大反动"。叶剑英将军指出国民党当局这次的暴行，是第二次"七七事件"，他说："我们中国第一次'七七事件'，即是一九三七年的芦沟桥事变，是中国民族的危机，千百万人民曾在战争中遭到空前的灾难。而这一次的'七七事件'，是表示出中国民主的危机十分严重，同时也表示出中国反动派企图继续维持他们的独裁的野心。必须请中外记者先生们，要以高度的警惕性，来重视这一严重的事件，要以十分明确的真实性来报导这一真相，动员起全国和全世界的舆论，来制止国民党这一次反动措施，挽救陷入危机中的中国民主。"

他继即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机关报——《解放报》及其通讯社——新华社，在这一次反动的'七七事件'中，遭受到最大的迫害，他们不仅被勒令停刊，而且被当局违法的查封了。这一事件，明显的表示出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仇视与歧视，根本违背了四项诺言，严重的威胁了国共团结合作的局面。因此，请中外记者先生们，为了维护中国的团结建国起见，必须以公正和严肃的批评，来指责北平反动当局破坏团结的行为。"

剑英将军指出此次国民党当局摧残舆论之暴行，是国民党内反动派扩大内战的阴谋的一部分。他说："中共在北平的机关报——《解放报》及其通讯社——新华社，一贯的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而努力，对好战分子的内战阴谋，经常给以无情的揭破，因此，反动的好战分子视之为眼中钉，不断的给我们《解放报》及新华社以压制和破坏。今天，当着他们坚持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企图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时候，他们公然强迫我们《解放报》新华社停刊以至查封，这是对全国和平事业严重的打击。因此，记者先生们请用你们新闻战线的伟大力

量，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剑英将军答复某记者在招待会前提出之问题称：“政府当局的查封《解放报》新华社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这种行动破坏了治协决议四项诺言以及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原则。对于政府非法查封合法的言论机关，不论其为中共，其它党派或私人报纸，通讯社，我们都永远不能承认其为合法行动。至于我们的报纸通讯社暂时休刊，乃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已于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将该报社查封，并将承印《解放报》的印厂也查封了，剥夺了一切工作的可能。但我们为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将继续奋斗下去，不达到言论自由和《解放报》、新华社的复刊，誓不休止。我们已给了政府当局改正错误、解决此事的机会，如果政府一错再错，其后果应完全由政府负责。”

（原载1946年6月2日《解放日报》）

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

〔新华社延安一日电〕确息：当马歇尔氏好象在努力呼吁东北与中国和平的时候，现住越南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三个师，又将于日内由美舰运往东北扩大现已十分扩大的内战。此外第五军亦有将由美舰运往东北说。按马歇尔氏对于使用美舰运输国民党军握有权力，以前曾约定只为国民党运五个军去东北，后乃违约增运两个军；四月间又曾约许美舰在运过第九十三军以后不再为国民党运兵。但在中国内战首领蒋介石好象遵守指令一样地拒绝东北和平与全国和平以后，美国方面就又继续使用自己的海军运输工具及大量军械军火，积极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而其结果确使中国的内战空前地扩大了。此种美蒋双方密切合作屠杀中国人员的形势，深堪注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

*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

《解放日报》社论

中美两国人民是有传统的友谊的。在罗斯福总统领导美国与中国携手对日作战的时候，美国军队曾经受到中国广大的人民，包括解放区人民的亲密合作。美国的人民与美国政府中的民主人士，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良友。正因为如此，破坏中美友谊妨害中国战后和平民主的赫尔利政策，曾经不但受到中国人民而且受到美国各方民主人士的反对。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所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结束了赫尔利政策，它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协商停止敌对行动，要求中国各主要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使中国各党派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并声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将不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

美国所参加的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所发表的公报中，要求中国停止内战，达到团结与民主，要求广泛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关中，申明三国政府都不干涉中国内政，并约许美军将与苏军同样在最短时期内撤离中国。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上述的贤明方针，因此当去年十二月来华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根据上述方针促成中国的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时，他的工作也获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与热忱合作。

但是，中国的反动派对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公报的原则，对杜鲁门声明中要求中国和平民主与保证不实行军事干涉的原则，对马歇尔将军停止中国内战的努力，是反对的。中国国民党军事当局，从一月十日全国停战命令和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命令颁布的第一天起就加以破坏，在全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东北继续着他们的进攻行动，在全国各地继续调动军队，拒绝拆毁并继续修筑碉堡和其他封锁交通的工事，拒绝解散并收编全部伪军以及许多土匪。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军和伪军捣乱北平执行部，暗杀北平执行部中共人员，拘捕石家庄和沈阳执行组中共人员，殴伤泊头和枣庄执行组中共代表，并采取其他各种可耻的方法，使执行部实际不能执行停战的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任何一项也没有实行，一党专政法西斯恐怖统治反而比政治协商会议以前更为猖獗和野蛮了。按照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约束，美国应当停止并收回对于国民党政府内战与独裁政策的任何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美国是真心希望中国得到和平，民主和团结，真心实际不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内争的诺言，也只有这样，马歇尔将军关于停止中国内战的努力才不致成为一种徒然的装饰。

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当中国的内战和恐怖统治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中的

反动派对于中国反动派所支配的国民党政府却是成正比的继续加强援助，特别是继续在军事运输与军火供给上加以狂烈的援助。

在一月初的停战协议中，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曾向中共代表周恩来与美国代表马歇尔声明，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只限于一个不大的数目；以后在二月下旬签订的整军方案，又具体规定东北国民党第一期驻军限于五个军；三月下旬在东北停战协议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代表吉伦又一致声明，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不会并不允许超过五个军。可是在四月中，在国民党的五个军已经被美国海军运往东北，并在东北展开空前激烈的内战以后，美国海军仍不顾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多次抗议，继续从华南运送第六十军与第九十三军到东北去。四月下半月，马歇尔将军回到中国，他保证美国此后将再不会为国民党运更多的军队。可是到了五月下旬，东北的内战更残酷了，华北的内战也更严重了，美国海军又决定把国民党的五十三军和五十四军运往东北或华北，而华南和长江下游的其他国民党军的北运仍在准备中。很明白，华北东北的内战，是由美国代替国民党运送军队和军火之后，才能发生与加剧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运输，中国反动派要在东北华北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就根本没有可能。

从日本投降以后（就是说在内战中而不是在抗战中）到现在，美国庞大的海军和陆军驻在中国各地，屡次声明要撤退而屡次延期，现在连美军的家属都运来中国，表示美军已经把中国看作他们的基地了。不但帮助内战的发动者运兵，并帮助他们看守和修理港口、铁路、矿山、训练他们作战和使用美国供给的轰炸机、军舰、坦克、大炮及其他各种杀人利器，直到进行特务工作。美国在中国抗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给内战发动者装备了四十个美械师（而在抗战期间，只装备了二十个师，这二十个师的绝大部分也是用于内战，并未用于抗战），组织了海军和空军，供给他们大量的飞机、舰船、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以及其他一切战争物资，直至军官和士兵的日用品。很明白，没有美国这些军火的援助，中国的反动派是不能进行大规模内战的。

在上述情况之下，中国人民不得不怀疑到，今天的事实，究竟是蒋介石的凶恶内战政策要求美国的狂烈军事干涉，还是美国的狂烈军事干涉要求蒋介石的凶恶内战政策。中国人民不得不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干涉是不会没有帝国主义的目的，说不定那一天美国将要向中国索取军事基地和政治经济权利，使中国实际上降为美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而蒋介石之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来换得外国军事干涉，以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乃是一种汉奸卖国贼的行为。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中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是危害着中国的民族安全，危害着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危害着中美友谊和世界和平，这种政策，显然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约束不相符合，显然与杜鲁门不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过程的宣言和马歇尔停止中国内战的努力不相符合，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和平民主人士的愿望不相符合。因此，美国的这种错误政策，在美国国内与在中国同样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责难。

早在二月间马歇尔将军就承认，中国的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与繁荣生活的权利亦所不顾。在五月间，他又重复指出中国的好战分子，将使中国重陷于全面的战争火陷，并使中国人民遭受不堪的灾难。现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正在辽宁、辽北、吉林、热河、河北、山东、山西、豫东、豫南、湖北、皖东、苏北到处发动进攻，使内战重行发展为全国的规模。反动派已宣布在上海和北平，并将在它所统治

的其他一切地方，实行法西斯的警管区制和特种户口登记制，实行敌伪的国民身份证制和查问哨制，实行所谓“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即一九三六年内战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之复活），在北平查封七十七种报纸和期刊，在上海、广州、沈阳和其他地方任意没收和查封书报，在西安、南通和其他地方实行野蛮的屠杀和逮捕政策，成百成千的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工人、妇女和民主分子被捕杀，各地成万的政治犯不但没有释放，而且很多被秘密惨杀，在四川西部西康东部二十万农民被屠杀，在中国南部各省几千万人民在腐败而贪横的统治下被饿死，仅仅湖南一省就饿死了三百二十万人。中国反动派，是依靠着什么人的支持和援助才敢于并可能把这个不堪的灾难加于中国人民的呢？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反动派是仅仅依靠着美国反动分子的军事干涉政策的支持和援助，否则中国早已获得和平与民主了。中国人民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后，仍然被外国武器所屠杀——这就是美国的武器。中国人民今天的灾难，根本上乃是美国反动分子制造与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所赐与。美国的军事干涉，使杜鲁门声明中许多庄严词句，变为不能令人信任，使美国对中国内战的调解地位令人怀疑。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为了中美友谊，国际信义和国际安全，不能不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这种违反莫斯科三国会议约束的不正义不人道的罪恶政策，立即停止帮助蒋介石运兵，停止供给蒋介石武器物资和其他任何援助，立即撤回一切驻华美军和收回已经给予蒋介石的一切军火物资。中国人民相信中美友谊是不能被破坏的，中国人民相信爱好和平民主正义人道的美国人民必能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纠正美国助长中国内战和恐怖的军事干涉政策。

〔附〕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纪要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美国政府曾经签订或发布过下列庄严的国际务约和宣言：

“各会员国在国际过关系上不得使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略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宗旨及原则”第二条第四款。

“三国外长关于中国局势曾交换了意见，他们共同商定关于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团结的与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且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关于停止中国内部战争亦达到同意的意见。他们重申了他们忠实于不干涉中国内部的政策。莫洛托夫与贝纳斯关于在中国的苏联与美国军队进行了几次谈话，莫洛托夫先生声称：苏军已解决了解除满洲日军的武装并从那里撤退日军的任务。但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苏军因而延期在二月一日前撤退。贝纳斯先生声称：美军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驻在华北，美军的主要责任是执行日本投降条件，即是解除日军武装与撤

退日军的责任。他声称：这些任务一旦完结时，或在中国政府没有美军援助能够执行这些任务时，美军即撤离中国。两国外长之间，对于苏军与美军在完成他们的义务及他们的责任时，在最短期内撤离中国的愿望完全意见一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美苏三外长会议公报。

“美国政府久已承认下列原则：即国内事务之管理为各自主国家人民之责任。——美国的支持（指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编者）将不扩展至以美国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

但是，自日冠投降的十个月以来，美国政府及其在华驻军中的反动派，却违背和撕毁了这些神圣的国际条约和庄严的诺言，执行了和执行着狂热的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政策，和狂热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的内战政策。

一　大量装备、训练和输送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及东北，以及进行大规模残杀中国人民的内战

A　在对日反攻名义下大量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师团

美军所装备的国民党师团绝大部分没有对日作过战　去年十一月八日美国务院发言人：“美国方面于一年前曾有一决定，即美方训练和装备三十九个中国师”（同日美新闻处华盛顿电）。此种装备与训练，日本投降后仍在大量进行，据可靠来源，现在美方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已经不是三十九个师而是五十七个师了。这就是：新一军、新六军、一军、二军、五军、六军、八军、九军、十三军、十八军、三十一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五十四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九十四军、九十八军等二十个军五十七个师。

这些师装备成功后，绝大部分都未对日作过战。其中的第一军、第六军虽在缅甸战役中曾配合美方作战，但在其调回国内由美方重加装备和训练以后，也从未对日作过一次战。中央社重庆去年九月七日电说：“日军投降时，中国大部分作战部队（指美方装备和训练的部队——编者）分布在芷江柳州各区准备向华南反攻”。美国务院发言人去年十一月八日也说：“二十个这种师团已经装备好，并在日本投降时正准备进行作战。”（美新闻处同日华盛顿电）可见中美两国官方都承认此种事实。

B　日寇投降后美方即将这些军队大量运往华北和东北进行内战

在美军布置、输送与强大火力掩护下，蒋军由海空两路进入华北　日寇投降后，美方即将这些深藏在大后方或远在国外受训的美械化蒋军由海空两路运往华北，借“接收”为名以进行内战。前后计将新六军自芷江空运南京，九四军自柳州空运上海，九二军至汉口空运北平，后又将九四军自上海空运天津，时间均在九月至十月中。美驻华陆军航空队司令斯特拉特梅耶声称：“十四万华军之空运，实为印缅战区或中国战区一切工作中之最大而又最为复杂者，并相信此为历史上最大一次之空运。”（中央社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转美新闻处电）可见美方对此事之奇异的热心。

在美军占领塘沽、秦皇岛、青岛等要港（详后）并加以积极布置后，在中国内战已经大规模地展开后的十一月十四日，美方将第一批国民党军（第八军）在各种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运

往青岛登陆。合众社重庆十四日电说："中国政府强有力部队今日在美海军陆战队及海军舰队的大炮掩护下在北方港口登陆，正以充分规模的前进欲肃清山东半岛上的共产党。"

违反不运蒋军到东北去的诺言　去年十月十日魏特梅耶氏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以将军的约言称："美国政策为继续运送中国军队至战略性地区……然而，美国不把中国军队运往满洲"（合众社同日电）。但是，四十天以后，美方公开毁弃约言，将首批蒋军海运至葫芦岛，中央社南京十二月二十二日电谓："载运杜聿明将军部队之美运输轮一队，已于今日运抵葫芦岛，卸下杜聿明将军总司令部之兵员装备与车辆……该运输队属于美第七舰队巴尔贝海军中将麾下。"

至于美方为国民党大量运兵往东北，则在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的一个月以后。新六军的开始运送，即在今年一月十六日（中央社同日沪电），也即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之第六日与马歇尔将军促进中国停战令宣布后六日。

此后，此种运送即无限制地进行。本来，在一月初的停战协议中，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曾向中共代表周恩来与美国代表马歇尔声明，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只限于一个不大的数目，以后在二月下旬签订的整军方案，又具体规定东北国民党第一期驻军限于五个军；三月下旬在东北停战协议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代表吉伦又一致声明，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不会并不允许超过五个军。可是在四月中，在国民党的五个军已经被美国海军运往东北，并在东北展开空前激烈的内战以后，美国海军仍不顾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多次抗议，继续从华南运送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到东北去。四月下半月，马歇尔将军回到中国，他保证美国此后将再不会为国民党运更多的军队，可是到了六月中旬，美方又将蒋军五十三、五十四两个军北运，公开破坏协议。

直接破坏停战令，现又助蒋运两个军到华北扩大内战　据中央社六月十九日发布，国民党当局致军调部备忘录，正式通知五十四军阙汉骞部已由九龙运青岛，五十三军由广州运济南，以备扩大山东内战。上述两军公开违反一月十日休战令的调动，都由美国海空军担任运输，这是停战令后美国海空军在关内大规模运送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表明美军帮助中国国民党军进行内战之新的扩大。

迄至目前止，美方已为国民党运送第八军、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五十三军、五十四军等五个军共一十九万人到华北，运送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七个军共二十六万人到东北进行内战。两者合计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四十五万人。一个美国士兵说的对：

> "我们装载国民党军队，把他们放在有利的战略地位，只把按开枪机留给国民党士兵干，我们应该有勇气老老实实说真话，我们正在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花旗报中国版某美国士兵文）

C　为国民党军护路、筑路、建设基地、训练海空人员等

为蒋军建筑并保护往东北的通路　去年十月初美军占领秦皇岛及在天津登陆后，即用武力向我解放区推进，并强修北宁路，此后即由美军保护这条发动东北内战最重要的战略铁道。另外，津浦路津静（海）段，也由美军警备。又某些重要公路也由美军加以重建，如中央社天津五月十四日电称："津塘公路木质桥梁年久失修，驻津美军工兵营协助公路局加以重

修，一律改为洋灰桥基，全路共十八座，已完成十六座。”美军又在青岛建筑飞机场，据中央社五月十六日电称：“驻青美陆战队第三旅司令克莱门少将称，该旅×××队仍继续修筑青岛机场未完工程”等。

为蒋军训练海空人员，加强蒋军内战力量 除上述大量美械师及目前尚在中国南部诸地的各种陆军训练不计外，美方目前又在华北为国民党大量训练海军干部，并在青岛加强军事设备，建设强大基地。中央社去年十二月六日美第七舰队巴尔贝旗舰报导：“第七舰队司令巴尔贝中将于十二月十日在青岛设一学校训练中国军队使用两栖武器”。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同社青岛电又说：“此间中央海军训练团在美顾问协助下，培育中级干部已有六百人，分往美军登陆艇服务，是项登陆舰及其他军舰，已有二十余艘泊于青岛港口，正陆续交由我国海军驶用中。”中央社纽约六月十二日又报导，美方赠与蒋方八艘舰船已在来沪途中，“该舰队有军官八十人，士兵一千人，彼等始自美国学成，返国后或将命共担任训练工作。”

空军训练，据国民党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今年二月十日谈话，日寇投降后迄至当时止，派往美国受训者已达二千人，而其“费用一部分系根据租借法案拨付”。另据确息，美方又在汉口为蒋军训练空军轰炸大队，于今年四月开始，正副主任为美人卡来福与施德基。

D 六月十四日提出的援蒋法案将蒋军变成美军的附庸

新法案提出前美军对蒋军所起的作用 美方自一九四四年冬为蒋军装备美械师起，即在国民党军各师中，设有大量的所谓“美军干部队”也即所谓“Y部队”的组织，此事在当时的美国通讯社已有报道，无须烦引。此种人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及是否卷入内战漩涡，有今年三月九日魏特梅耶的一个“否认”美军曾指挥国民党军的谈话可以回答，魏氏说：“在建立起来的制度下，美国人是担任联络官，观察训练术在战场上的效果，指示他们使用和保持装备。一般说来，即帮助中国人应用他们所学来的作战经验。”（同日美新闻处电）国民党军队，先是由美国装备，然后由美国训练，然后走上内战战场由美国军官帮助他们“应用所学来的作战经验”，这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建立的附庸军队不知有何分别！

新法案下蒋军的附庸地位更加确定 本来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事机构中，日寇投降后，即设有大规模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据魏特梅耶今年三月九日称，该团设在南京，由麦克鲁将军负责（中央社六月十日电，新任团长为鲁克斯将军），人数历来电传均为四千人。

六月十四日，美国务院又以军事援蒋法案提交参院，美新闻处华盛顿十四日电：“美国务卿贝纳斯今以法案提交参院，请求核准，对华实施军事训练及技术上之援助。在附函中贝氏指出：对华援助之继续不断，极为重要。贝氏称：中国曾请求美方派遣军事使团驻华，其性质将与美国派往拉丁美洲之军事代表团相同。”十九日美副国务卿亚泽逊又为此事在众院演说称，新顾问团“将助其（指马歇尔——编者）协同实施关于促中国军队现代化之计划，并决定中国应有供应品及配备之数量。”依此法案，国民党军今后之改组、装备、训练、以至供应均将更由美国军事顾问团一手承办，贝纳斯氏也已公开将中国置于与拉丁美洲相等的势力范围之列，今后蒋介石军队之为美国军队附庸的地位，必将更加确定。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此项法案！

二　日寇投降后非法继续租借法案，大量供给国民党各种残杀中国人民的作战物资

中美关于军火租借物资的互助协定的第五条曾规定：

“依美国大总统之决定，此次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为对于美国或西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

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总统又宣布立即停止租借法案：

“白宫宣称：从今天起停止一切租借行动，昨天已发出通知有关各国的信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美新闻处华盛顿电）“杜鲁门总统称……租借法案纯系作战武器，目下战争已告结束，为适用目的计，此种联合国互助计划已属多余。”（同上八月二十四日电）

违背了罗斯福与杜鲁门总统的约言及中美互助协定　不幸的，是事隔两月以后，美国在华剩余作战物资不但未照中美互助协定归还，美国政府且公开推翻了上述杜鲁门声明，而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声明对蒋政权继续军火租借法案，“贝纳斯称：杜鲁门特别下令再以租借物资援助中国。”（同日合众社华盛顿电）

军火租借法案设立的目的，故罗斯福总统在其为此事致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曾明白地说，租借法案“是一切民主国家为了抵抗侵略以求自全者抗战武器的源泉”（一九四一年三月），但现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却把它用于完全相反的目的上。

租借物品原来即大量用在反共战争上　此事在日本投降前，我们即曾屡有揭露，当为美国政府所深知。连美国赫斯特系的《世界新闻》在去年八月也报导过：“有许多的租借军用品用得很奇怪。在中国后期对日进行攻势（？）时，有许多美国的P—40战斗机和B—25轰炸机留在后方不用，有许多前线迫切急需的美国汽车停在后方不用。这一切，没有问题地是留供在这些大战以后的战争用的。你可以到黄河前线上去，看到许多疲乏的、年老的、装备不良的中国军队在作战着。然后，你到很绵长的没有战争的前线，这前线是蒋介石封锁其敌人共产党的前线，你在这前线上却可以看到中国底最优良的和最活跃的兵士，和许许多多我国最好的租借军用物品。”

美助蒋内战物资，多于抗战时期的两倍　本月十四日，杜鲁门关于租借法案的二十二次报告中称，对日胜利日以后，给予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援助，等于胜利日以前五六年间租借物资总额的两倍。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迄今，援蒋军需物资总值一，三三五，六三二，〇〇〇美元（按：迄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止美方对国民党租借总额为六三一，五〇九，〇〇〇美元）。今后，如依据六月十四日贝纳斯援蒋法案，则此种援助势必更加猖狂，美陆长柏德逊十九日曾加以说明说：“陆军部支持授权总统采取措施供应中国军队（指蒋军——编者）训练与整编所必须的一切武器的一切法案。根据此项法案，总统可以批准运交中国战争物资、武器、弹药与技术设备。”柏德逊并称：“美国在日本的战争物资一部可以运交中国。”

必须指出，上述援助，还不包括美方大量赠送与蒋政权的作战工具加大量的船舰等在内。

三　长期大量驻兵中国，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协议中，美方曾声称在“解除日寇武装与撤退日军”完成时即行撤退，美苏两国外长并声明，两国军队“在最短期间内撤离中国的愿望完全一致”，但现在这些都为美国单方面所完全破坏了。

日寇投降后，美军反在中国大量登陆　在日寇投降一个半月以后的九月三十日，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十月初第三师在已被我解放之秦皇岛登陆，十月，十一、十二两日第六师在青岛登陆，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也随即进驻青岛和北平。兹将美军在华北的数目及驻地表列于后：

在华登陆美军情况表

类别	番号	人数	驻地
海　军 陆战队	陆战第一师	一八，〇〇〇	津塘一带，占领秦皇岛以此地区葫芦岛等海口
	陆战第三师	一八，〇〇〇	据守平津、唐山、塘沽、平秦、津静两段铁路。
	陆战第六师	一五，〇〇〇	占领青岛基地
海　军	海空第一大队		青岛
航空队	海空第二大队		北平
	海空第三大队		北平

以上连同海军航空队，据美方历次宣称，至少有五万三千人。

一再撕毁撤退美军的诺言　去年十一月七日魏特梅耶在北平告中美记者，“谓华北美军于使命完成后当立即离开，其首次移动本月中旬即可开始……据现在估计，如果情况许可的话，美军之离中国将于本月中开始，需时三个月或四个月之久。”（美新闻处同日电）但到十一月中旬时美军一兵未撤。照此声明中最长时间的四个月计算，美军也应于今年四月中撤尽，如众所周知，到期美军也仍未撤。

两周以后，魏氏的话又大变了，说，“如果现在每日三千人的速率能够保持的话，那么撤退长城与黄河间一切日军的工作，将需六个月至八个月。”（美新闻处十一月二十四日沪电），这里，魏氏将撤兵时间比上次声明无条件地延长了一倍。即依此计算，到今年五月二十四日也早就满了六个月的期限了，但美军仍然未撤。而遣俘工作，据路透社重庆今年二月六日报导魏氏谈话：“魏特梅耶将军对于解除日军武装及遣送日本军民回国工作之‘畅行无阻’表示满意”，则美军一再食言实属毫无理由。

至若根据中央社天津今年一月十三日合众电所言，“美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兵团司令骆基将军称，根据目前积点制，所有美陆战队可于三月一日前撤离”的声明，则美方当局的食言就不知食到那里去了。

遣俘问题真相　美方历次声称，美军在华北驻扎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中国遣送日俘。但值得注意的是，华中华南同样有更多的日侨日俘，美国并未有任何作战部队登陆，直到今天，华中华南除有数千美军总部工作人员外，并未有任何作战美军。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中国境内（指中国战区）之日俘日侨共计一百九十余万人，计已遣送回国者，约一百六十余万人，”并谓“各地之侨俘统限于六月底遣送完毕”，（陈诚六

月四日在京报告）。又据美官方宣布，遣俘工作也早已全部移交于中国政府，美新闻处北平一月十九日电称："美第三两栖部队（即驻华北陆战队）参谋长华顿准将今日宣称：美陆战队已将日军遣返本国之事项，移交中国政府办理……华顿估计此种管理权，移交手续约需一星期之久。"是则遣俘工作美方早已卸却。因此，半年来美军在华究作何事诚为难解。

美方大量海军舰队究有几只在遣送日俘，也属可疑。据美新闻处今年二月九日上海电讯报导，"中国战场美军当局，今日……指出在本月底，所有遣送日人返国之船只，一律改由日人自行驾驶。……负责撤退日人工作之船只，计有日船九十艘，自由舰六艘，及载运坦克登陆之轮只十艘。各该船均由日人自行驾驶，另有美海员驾驶之坦克登陆轮二十艘，也参加进行同样工作。由美海员驾驶之轮只，均自塘沽及青岛驶出，各轮将于二月二十八日前，改由日人自行驾驶。"

如上所述，美国当局历次关于美军驻华之"唯一"目的只在遣俘的声明，只不过如某美国军官所云，"我们已经发现，所谓'中国责任'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下午报某美军官家书）。

驻华北美军近且继续增加 美方当局不仅不依约撤兵，近且在华北继续增驻海军。据中央社五月十三日电，"美第七舰队所属航空母舰两艘率同驱逐舰七艘，十三日晨自沪抵此。"六月二日，该社青岛电又称，本月内有美舰若干艘，将陆续驶青，同社六月十二日电又谓美驻华舰队已改编为中国地区长驻部队，将久驻中国。同期美方电讯，也谓美方已在青筹备美军人员子弟学校，准备将美军家属接来中国，六月二日的中央社青岛电也说美舰官员眷属即将来青，国民党当局已为渠等加紧准备住宅。同社六月二十二日电，柯克上将已正式宣布，美第一舰队总部即将移设青岛。

另据可靠来源，美方的另一舰队，也已开至青岛，据说是为"避暑"。据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谈，"美国在华大小船舰一百七十余艘，较战前多数倍。"（中央社上海二月七日电）今又无故增加一个舰队，则其意义当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严重破坏，也必将是对世界尤其是对远东和平的一个严重威胁！

驻华美军的真正目的 根据上述种种，吾人始终不能索解美军直到今日犹驻在中国有何理由。此种驻军除为追求其帝国主义目的欲使中国变为其殖民地与好战分子为了准备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攫夺"世界基地网"外，余均无可解说。去年十一月美国《外交政策消息》杂志说："我们在中国以暂时的军事责任为掩蔽，正在建立一个长期的政治的势力范围。"赫斯特系的《世界杂志》去年八月则更"坦白"地说，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已使"蒋介石成为十足的我们在中国的人"，而今年二月十日美华尔街财阀集团机关报《新闻周刊》登载的一幅地图，竟赤裸裸地已将中国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四　驻华美军对中国解放区的蹂躏与侵犯

故罗斯福总统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上说：

"彼等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彼等政府组织结构之自由，……彼等相信全世界一切国家，无论为现实的及精神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盖国际间倘有国家继续使用海陆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和平势难保持。"

美军当局的几次挑衅声明 不幸的，是驻华美军完全违背了罗斯福总统的遗训，而执行

了完全相反的政策。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美陆长柏德逊声明："美军设非遭受攻击，并无参加中国内战之危险，倘遭攻击，即将予有力而制胜之抵抗。"（美新闻处十五日上海电）同日，魏特梅耶在上海更无理地声称在解除日寇武装时，"他们可能帮助中央政府军队而损害共产党军队。"（同上渝讯）次日，魏氏又在上海称："如共产党继续对美国人开枪（？），则美军将对华北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十六日美新闻处上海电）美军驻扎华北的方针，在这几个声明中，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从一件事看驻华北美军的任务 今年四月上海美人所办《密勒氏评论》曾载题为《华北射猎》的社论一篇，该社记者在访问华北美驻军后写道："国共两党在从事时发时止的内战，就在接近两方的战地或封锁线的地方，一两个美国兵去打猎了。……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该社论作者继续叙述他们和一个美海军陆战队员的谈话："他解释打猎的情形。'一个军官同行，你携带一架机关枪'……我们问道，'你们猎什么呢？''哈，共产党哪'……'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呢？''我不知道'，他回答道，'我觉得那是因为共产党在这一带。'"我们当然并不根据这个材料来确定每个美军都是这样，但这个材料却可以暴露一点，即该美军士兵之出此暴行，并非由于他本人对共产党有何仇恨，不过是在总的任务和教育之下自然产生的"发明"之一吧了。

炮轰解放区和平乡村 去年十二月四日，美军炮轰我冀东解放区卢龙县境某和平乡村。四日后，美驻华北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将军发表声明，说当地两个中国老百姓杀死两个美军，于是美军"在一点半钟内要村长将这两个人交出来"，"如果不把他们交来，便用炮轰该村。但是，一点半钟过去了，这两个人都没被交出来，于是便用炮轰击该村。"（八日美新闻处电）此事即使属实，也与该村和平居民毫无关系，美军应循正常途径交涉，绝无采取此种帝国主义血腥残暴政策之理。

美海军公开派代表胁我退出烟台市 去年九、十月间，美国军队即屡在我解放后之烟台、威海卫等地窥视，十月四日之前，美少数海军已数次在烟台登陆与我方交涉，办理美军上岸休息，调查美侨财产及共同勘测烟台海面等事，该地解放区当局无不予以友谊接洽。但十月四日晨五时，突来美驱逐舰一艘，并有上校军官登陆，向解放区烟台警备司令部声称：伊接获美海军上将命令，要其转告我方：（一）美海军陆战队将在烟台登陆，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撤除沿海防务。（二）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撤离该市。（三）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负责有秩序地将烟台市政府移交美方接管。（此事后因解放区人民及军政当局严词拒绝作罢）

搜查并拘捕我冀中办事处人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全副武装之美军官兵三十余人，在中国领土之天津公然包围并搜查我冀中解放区驻津办事处，捕去该处工作人员五人，解除并没收该处自卫手枪四支，并将办事处房屋占据，人员竟被带至美军兵营审问。美军除当日释放被捕人员外，对我其余种种抗议，均拒绝解决。

直接出兵占领解放区城镇 十月一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解放区军队曾派联络部队前往联络，由美军立即对之开火，该部被迫自卫，激战一小时，以不愿有伤和气，解放区军队忍痛退出战斗及秦皇岛周围地区。

十月三十日，美军占领我冀东解放区海阳、深海两镇，次日又占北戴河。先是十八日有美军五卡车开入北戴河附近之海阳及深海两镇武装示威，二十五日又逮捕我方派往秦皇岛向

美方抗议并交涉此事的六个代表，并向彼等声言，“将以海陆空军飞机大炮对付八路军”。三十日，秦皇岛美军即率领国民党九十四军一部二百余人占领海阳镇，并将该镇解放区游击队十八人解除武装。三十一日晨六时，美军又掩护九十四军一部侵占八路军已解放之北戴河，同时，美军继续率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沿北宁路向山海关解放区驻军进犯。

十一月一日，美军又占我解放区昌黎西北北宁路上之留守营车站重地。是晨七时，美军率领国民党军三百余人进犯，解放区军队为避免冲突，自行撤退。

以上美军对于解放区种种暴行，已经完全构成了“使用海陆空军军备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为自由和反侵略而血战了八年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忍受的。

五　帮助国民党建立庞大的秘密警察，对中国人民及解放区进行恐怖活动

故罗斯福总统在其有名的四大自由的号召中，又曾大声急呼，人类应有“免除恐怖”之自由，但驻华美军却大量帮助国民党建立庞大的秘密恐怖组织，使中国人民今天还生活在中外所没有的恐怖统治中。

美海军情报特务机关的主要工作，便是和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合作　前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副官爱尔索普(据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上海《大美晚报》介绍爱氏“曾经参加过策划这一工作”)在今年二月十二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戴笠与美〈海军情报组〉》一文上写道：“美海军情报组与戴将军的联系是一个可耻的联系……该组曾经替戴笠将军训练并且装备了十五支所谓游击队（即活动于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所谓“忠义救国军”——编者），那是一桩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的事，……而现在却到处为害，因为那些所谓游击队，作战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他们的中国同胞。人们时常攻击说美国武器被用去暗中进行中国的内战，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具体的实例。然而，供应并且装备戴笠的‘游击队’，同时跟他们交换人力物力——这似乎便是美海军情报组的主要工作了。”（译文载四月六日上海《文汇周报》）谁都知道，美海军情报组是美国在华同类性质机关之最庞大的，它所花费的金钱，比美国在华其余系统同类机关的总和还要多，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却就是帮助蒋介石建立秘密警察，而在对日寇情报的搜集方面，爱氏则称之为“非常贫乏”，并拒绝供给美驻华陆空军以敌情方面的情报。

今年三月三十日上海美国人所办《密勒氏评论报》也曾著文揭露此事。该文说：“关于忠义救国军与美国海军的联盟，虽然这两个组织讳莫如深，但大多数在战时留居中国内地的美国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中美合作所的人员奉有命令，当他们的车子在乡村街上碰坏人时，不得停车……不仅如此，这些特务分子，周身携带暗杀与破坏的武器……谈到取得关于日本人的情报，这个合作机关，显然与战时在中国活动的其他中美情报机关同样无力。”

这种指责也来自英国的舆论方面，伦敦《新政治家》杂志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说，美国在华特务机关，与“臭名远著的重庆特务警察首脑戴笠办了一个中美联合特务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　此种中美特务机关密切合作的实施机构，即为以戴笠及美海军将领梅乐斯为正副主任的中美合作所及散布中国各地的中美特训班。据可靠来源，该所成立于一九四三年春，属国民党军委会，该局人员曾自称，中美合作所设立的目的是：“本中国

式的精神，利用美国式的技术，建立德国盖斯塔坡式的秘密警察与党卫军。”

在中美合作所领导之下，又在全国各地设置中美特训班，据现在已知其确切存在过的，至少已有西安、陕坝、宁夏、兰州、华安、建阳、建瓯等处。现在举出其中一处的概略情形。

西安的中美特训班是其中的第三班。成立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前，设于河南临汝风穴寺，美人劳扬格斯任副主任。四四年夏迁至西安附近牛东村，故又名牛东训练班。据自该班出来的人称，至一九四五年十月止，该班已有六期学生毕业，共约五六千人，毕业后均分别派往各战区任反共工作。该班历年训练内容，均以反共、反八路军、破坏解放区为主要课目。据该班逃往我太行解放区之第一期学生，别动军第五纵队豫北铁路工作队上尉组长张揄卿云，该班课程有美国人及戴笠特工人员等所授之美造手提机枪、美造短枪、美造左轮手枪、美造手榴弹、美造胶质炸药、美造缓燃导爆线等使用方法，及中共问题、游击战争、测绘学、侦探学、秘密通信、逮捕、暗杀及爆炸各种课目。渠本人于一九四四年三月毕业时，戴笠与美国人均亲自训话，鼓励进攻和破坏解放区。

中美特务机关联合进攻解放区的行为　该班之五六两期，于去年十月改编为“军委会华北先遣纵队”，共三千余人。全纵队配有美国火箭炮二十六门，重机枪六十余挺，特种重机枪若干挺，除每个队员有美式左轮手枪外，每队并装备以自动步枪、卡通机枪、各式长短大小之迫击炮与其他美国新式武器。据其中之被俘军官说，该队任务为配合新八军、三十军、四十军向八路军作战，“坚决消灭共党”，该班改组后，即以该班美国教官数十人担任参谋，并指挥美国新式武器之使用及通讯联络工作。

去年十一月，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进攻我山东解放区之先头部队中，也有一中美特工合组之“山东别动支队”在内。系由西安中美特训班第四期受训人员组成，全队一千五百余人，十月底进抵济南后，即分头向我鲁中解放区进犯，全队配有各种美国新式轻便武器。

综上种种，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单方面的破坏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协议，狂热地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狂热地以各种力量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内战，中国目前的形势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此种危机最终又不能不影响全世界的安定与和平。因此，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改正这种绝对错误的政策，并希望美国人民起来改变美国政府这种政策，并督促美国政府为实现莫斯科苏英美三外长协议而奋斗，并促进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的实现，从而，中美两大民族的友谊与世界和平也才能维持于永远。至对于曾经帮助过、现在正帮助着，以及将来还要帮助中国人民达到上述目的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政府中的一切民主人民，吾人则始终表示最大的感谢。

（原载1946年6月28日《解放日报》）

周恩来关于东北停战的声明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

中共代表陆定一同志，六日下午四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周恩来同志关于东北停战之公报如下：

不论对于中国本部的冲突或者对于东北的冲突，中国共产党都是主张无条件而且真正停止内战的。由于中共的坚持，中国人民的愿望和马歇尔将军的努力，才得蒋委员长下令停止在东北进攻十五天，进行下列事项的谈判：

一、结束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

二、完全恢复中国交通之含有时间限制的议定办法；

三、不再迟延的执行二月二十五日关于中国军队复员的整编及统编的协定之基础。

我们虽然担心这十五天时间的短促，且谈判中又必然要牵连到东北乃至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需要更多时间，但我们为不放弃任何机会以求和平之实现，仍同意这一休战十五天的办法，并愿尽一切努力，谋取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具最大诚意，使过去一切协议见诸实施，并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以符合中国人民及世界友邦之要求。

（原载1946年6月8日《新华日报》）

〔附〕 蒋介石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

余刻已对我在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下列各点必须在此十五日内获得完满之解决：

一、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

二、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

三、获得一确切之基础，迅即实施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有关全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之协定。

（原载1946年6月7日《中央日报》）

延安权威人士表示：如蒋介石坚持内战人民将坚决抵抗到底！

美国若干当局不顾中国人民与各民主党派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呼舆，决心继续在军事上援助中国内战的发动者——蒋介石政府。据美新闻处华盛顿十四日电："美国务卿贝纳斯今（十四日）以法案提交参院，请求批准对华实行军事训练及技术上之援助。在附函中并指出对华军事援助之继续不断，极为重要。"贝氏称："中国曾请求美方遣派军事使团驻华，其性质将与美国遣往拉丁美洲之军事代表团相同，此次对华实施军事援助之法案系由陆海两部及国务院联名拟订，本人坚信国家之利益（包括本国重建与维护亚洲和平及安全之利益），需要美国援助中国组织与维持相当数量之现代化军队，俾中国可对该方面之和平与安全有所供献。"此间人士认为：当南京的中共代表正经过马歇尔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力争中国全面长期和平，而国民党方面正公然号召全面长期内战之际，美国政府提出此项鼓励中国内战之法案，为对于中国人民和平愿望之一种不友好表示。事实与贝氏的断言完全相反，此项法案如被通过，则中国将陷于严重的不和平不安全之中。而美国人民的利益与美国国家之信誉亦将因此遭受重大的损失。中国与世界舆论均已再三指明美国对好战的中国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巨大军事援助，乃是中国今日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于制止的唯一根本条件。中国人民不能了解美国政府究有何种权利将内战与独裁强加于中国，并要求中国与拉丁美洲同样降为美国势力范围，或为美国国家利益范围之一部分。中国人民亦不了解美国政府究有何种权利破坏杜鲁门去年十二月"不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过程"的声明，与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公报的原则。延安权威方面表示：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任何人不能予以干涉与剥夺。中国的反动派如果依靠外力援助坚持内战与独裁，将现在国民党政府公开直接变为秦桧、张邦昌、刘豫政府，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主席变为向外国称臣的儿皇帝，那便可以断言中国人民必将抵抗至最后一滴血。

（新华社延安1946年6月16日电）

中共政协代表提出东北长期停战四项建议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华社南京电：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于昨（二十一）日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提出东北长期停战四项建议，原函如下：

哲生、铁城、雪艇、力子、立夫、厉生六先生并请转陈蒋主席勋鉴：

自东北休战以来，全国人心，举世舆论，莫不渴望国共双方，在此十五日中，能由于马歇尔之共同努力，获得关于交通、停战及东北整军三项问题之一致协议，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停战，以重开和平之门。不幸经十五天各方面之奔走努力，政府方面所提整军方案竟完全出乎意外，以图将中共部队在整军期间排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便消灭，坚执美方代表在三方协议中之最后决定权，以保证此案之实施。似此情况，敝方实无从考虑。且政府运兵备战之事日亟，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值此紧急关头，如再不立即停止内战，则人民涂炭，国家糜难，惨淡前途，诚不堪设想。兹接敝党中央训令，根据目前内外情况，全国人民意志，诚为非迅速停战实现和平，不足以挽救当前之严重危机，出同胞于水火。为此，特向贵方正式提议，实现如下步骤：

（一）由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之具体办法，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

（二）停战令下后，由三人会议立即协商恢复全国交通之具体办法，并首先修复重要铁路。

（三）由三人会议定期商定全国及东北整军复员之具体补充办法，并立即付诸实施。

（四）由政府经协商定期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迅速解决改组政府、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及各项政治问题。

上述四事，如荷赞同，请即分别提交三人会议及政协综合小组协议实施，以安人心，以符重望。时危事急，特此建议，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敬颂公安！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谨启

（原载同年6月22日《解放日报》）

南　京　惨　案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解放日报》社论

六月二十三晚，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流血惨案。行凶的，是国民党当局所豢养的一群法西斯特务暴徒。被凶殴的，是受上海各界人民委托、晋京请愿、呼吁和平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诸先生及到场采访的记者。这一惨案，已经激起了京沪一带和全国同胞的义愤。

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坚决要求之下，发布了将东北停战令延长八天的命令。但是不出两天，命令的墨迹未干，它马上制造一个南京惨案来撕毁这个停战令。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八个大字，他们的手段仅仅是和平请愿。但是只要你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真正要求和平，那末国民党当局就认你是“叛逆”和“内乱”，必须加以“声讨”“制止”和“平定”。这几天来国民党当局的御用团体就大喊大叫，说这是“政府国策”，非“绝对拥护”不可。南京惨案，和去年十二月的昆明惨案及其他惨案一样，正是这种“国策”的再次具体表现。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就是：凡是真正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人，国民党当局都把他们看作眼中钉，必欲摧残之、消灭之而后快。国民党当局既然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样一个与一切和平人士为敌的“国策”，那末它还有什么诚意来实行什么“停战令”呢？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机关正在妄图把“和平毫无诚意”的帽子加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但南京惨案证明：这顶帽子只有国民党当局自己戴起来，才是恰合头寸。

为了掩盖南京惨案的真相和隐藏惨案的主使者，国民党当局伪造“苏北难民与请愿者冲突”的荒谬谣言，并在事后把当地警察所长撤职、下关警察局长记过、南京警察厅长申诫一番，以便草草了事，推卸责任。但是谁都知道，在警卫森严的“首都”，敢于目无法纪、公开行凶的，不是什么“难民”，而是法西斯特务暴徒。在今天中国，特务分子大大小小一共有几十万。他们的总头子，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惨案发生的时候蒋介石就在南京。没有他的指示和国民党当局的事前周密布置，南京惨案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试看半年多来的许多惨案，如昆明惨案、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事件，那一个惨案，那一个事件，不是由蒋之亲信——关麟征、方治、谷正纲、陈立夫之流在他的指示下组织进行？最近北平解放报的被封闭，还不是由蒋介石亲自下了电令吗？国民党当局摧残人民自由的工具，不仅有军警，而且还有效法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与日本法西斯的特务机关；在每一次惨案之后，国民党当局还有一套混淆视听、掩盖罪行的办法。这是国民党当局比北洋军阀更凶恶、更阴险、更精巧的地方。但是中国人民也比从前更聪明了。中国人民有能力识别这一连串惨案的主使者究竟是谁。

南京惨案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动派一手造成的中国严重危机。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百业凋

敝，民不聊生，特务横行，人民生命自由毫无保障，即素以反共著名之时代杂志亦发表了通讯，称国民党政府为“恶政府”。只有在我们解放区则是生产发展，人民生活上升，充分享受民主自由，道不拾遗，流匪乞丐绝迹。但是今天国民党当局却正在百端诬蔑解放区为“内乱”。今天国民党当局正在依外力为靠山，一方面更无情地搜括其统治区人民的脂膏，并加强法西斯恐怖，加速破坏社会秩序，更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内战反独裁的运动，另方面正在坚持内战，并积极地作扩大内战的部署，企图毁灭解放区，将全国推入空前的血海深渊。国民党当局这样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竭力制造中国的空前“内乱”。因此，南京惨案和当前的严重危机，应当大大提高中国人民的警惕，认清法西斯反动派的血腥大阴谋，并大大增强中国人民为了粉碎这一阴谋的团结的努力。

苏杭沪等地的群众反内战游行，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反对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正在蓬勃开展。法西斯反动派想要把这种伟大运动镇压下去，必然遭遇惨痛的失败。

我们对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和受伤的新闻记者，仅致热烈的同情与亲切的慰问。上海人民的要求也就是全国的要求，这个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是一定要实现的。

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毛　泽　东

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

（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二）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即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三）太行区除山西对阎锡山部队外，其余以一部监视豫北之敌，应以最大主力出动于豫东区域。

（四）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

（五）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有些县城可让地方部队逐次攻占之，我主力不必每个城均去打。

（六）在上述作战阶段中，充分注意争取杂牌及伪军反正。

（七）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五师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八）粟裕、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九）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十）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十一）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

（十二）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

（十三）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十四）蒋现延长休战至本月三十日，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十五）意见如何？望告。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中原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月）

毛 泽 东

一 六月一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

（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

（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

（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二 六月十九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

（一）宁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

（二）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

（三）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

* 这里选辑的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挥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六份电报。

三　六月二十三日给中原局的电报

（一）二十一日电[1]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

（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四　六月二十五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

（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

（二）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

（三）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

（四）务必保护三十二小组[2]安全，或留置现地交由我地方部队妥为护送其回汉；或带至铁路附近让其返汉；或带其同行（暂禁其电台工作），由你们决定。

五　七月十三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

（一）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其攻苏皖之计划，定于数日内行动，分为三路：一路由徐州向南，一路由津浦向东，一路由江北向北，同时向我苏皖边区进攻，总兵力在二十师以上。

（二）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

（三）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四）上述计划务守秘密。

（五）此电阅后即毁。

（六）你们行动计划望告。

---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电文内称："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就时间及敌情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虽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如再不主动突围，则以后更难了。如何？请即复示。"

② 三十二小组，指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的一个工作小组。

六　七月十五日给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并告王震的电报

（一）十五日电悉，你们休息两天很好。

（二）进到山阳、柞水、镇安地区时，既是山地，又两面无敌，应多休息几天，完全恢复疲劳。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顿住一时期，然后留小部在陕南游击，主力渡汉水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开展新局面。

（三）你们尽可能多休息，敌人无奈你们何。

（四）王树声、刘子久过襄河后，十五旅至流水沟被七十五军之第六师追上未能过去，现沿襄河东岸北上，进至宜城东北耿家集、新街地区。该旅虽与第六师作战，但损失很小（据敌人反映）。

（五）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六）西安息，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在宴会上说：李先念之企图系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等语。足见你们对大局帮助之大。

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毛　泽　东

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英美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说来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对中原区，对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对苏皖，有很快大打可能；对东北，目前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①一部与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的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的一部分。

①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个省，这里指的是九省中的三个省。

掀起拥军参战高潮努力支援前线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新华日报》社论

高坐庐山顶上的蒋介石，现正伸出血爪，纷纷调兵遣将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点起了内战的烽火。在苏中疯狂进攻的蒋军，虽然已两次遭受我军歼灭的打击，但仍续派重兵，节节进逼，侵占我黄桥姜堰各要镇，战争正在扩大。在淮南，蒋军占领我樊家集、四号墩、大赵等村镇，正向我炳辉城半塔镇等处猛扑进军。在淮北路东，蒋军四路长驱进犯，已占领我灵璧时村袁宅集等城镇，而徐州蒋军复继续出动沿陇海路大举向东进攻。在淮北路西，蒋军亦同时分兵四出，攻占我重要城镇萧县濉溪口永城等地。我们再看山东晋冀鲁豫东北各方面，均由于蒋军的不断挑衅与进攻，而战云弥漫，杀气腾腾。这一些都说明由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大规模的内战已经开始，他已经对全国人民不宣而战，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喽罗们所以向解放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伸出屠杀的血手，原因是很明白的：是为了出卖祖国给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好把中国变为十足的殖民地，变为道地的反苏堡垒，以便他作汪精卫第二，稳坐儿皇帝的宝座。明光老百姓说得好："去了一个汪精卫，来了一个蒋介石，半斤八两！"真是一语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相。二是为了维持它少数人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好任意剥削老百姓，奴役老百姓，屠杀老百姓，以便喝尽全国人民的膏血，断送全国人民的生命，而达到穷奢极欲，把中国变为他的家天下的目的。反动派所以不顾全国人民与国际的舆论，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不问能不能打得过人民的武装，悍然的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正是它这种丑恶残暴的本质的表现。但也恰如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所指出的，这并不表现它的强大，而是表现它对人民力量的恐怖与垂死挣扎。由于解放区人民力量的强大，全国反内战反卖国反独裁的力量的强大，国际间民主力量的强大，也由于反动派的丧失人心，士气涣散，以及内部矛盾重重与财政经济的空前困难，如果反动派不肯悬崖勒马，胆敢把内战坚持下去，扩大下去，战争的烈火是会把它自己烧死的。最近反动派向苏中进攻的部战，成师成军的被我英勇自卫的军民消灭掉，前时住在河南的五十五师自动起来反对内战，就是很好的例子。再检查一下过去半年来的事实，那一次反动派的进攻不是自讨苦吃呢！

但我们仍须万分警惕，百倍努力！因为反动派向我解放区人民的进攻，是其拚命的挣扎，他不惜用卖国得来的飞机大炮对我们解放区的军民作孤注一掷，他不惜用尽一切残忍与欺骗的手段强迫不愿意打内战的士兵替他当炮衣，他不惜想尽一切卑污无耻的办法利用特务土匪汉奸（如最近组织所谓难民武装还乡团等）向我解放区进行捣乱破坏。尤其是这次对我

们华中解放区的进攻，是反动派蓄谋已久的大规模进攻，它调集将近三十万的部队四面八方数路并进，他嗾使寡廉鲜耻的特务流氓在每个角落里进行其政治阴谋，以配合其军事行动。因之此次自卫战争是激烈的，复杂的，比较长期的（可能连续数月之久）。这是我们能不能粉碎反动派打内战的阴谋以保卫和平的重要关键，这是华中解放区人民生死存亡的重要关键，也是有关中国整个前途的重要关键。故我们解放区全体党政军民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保证此次自卫战的胜利。反动派是以解放区全体人民为敌的，我们为保卫八年抗战的果实，为保卫自耕自种的土地，为保卫民主政治的建设基础，为不使家乡被奸淫抢掠，靡烂不堪，更为了保证中国独立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我们必须紧张起来，行动起来，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着争取前线的胜利，使自卫战真正成为人民一致行动的战争，成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的胜利才有最大的把握。

那末，我们当前要做的是那些事情呢？

第一，是展开普遍热烈的拥军运动。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的传来，使我们欢欣鼓舞，同时也使我们马上感觉到在前线冒着酷暑，冒着炮火，浴血进行自卫战争的同志们是太辛苦了；而且他们离开后方机关与广大人民的人力物力上各方面的援助，是很难进行战争的。我们应立即更深刻的打通拥军思想，为使这种思想成为针针见血的实际行动；切实保证前方担架运输的人力供给，适时对前方作战部队作精神鼓励与物资慰劳，尤其是对从前线回来的伤员，要特别加以爱护和照顾，妥善的管照他们的生活，不断的予以鼓励和安慰。在解放区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在伤员到一个地方休养的时候，群众自动的慰问，替他们收拾房子，预备他们爱吃的饭，替他们洗衣服，这不但给伤员以安慰，传到前线去，便是很大的鼓励，便间接提高了士气。这是值得大家仿效和发扬的。

第二，是展开普遍热烈的参军运动。我们的战争是人民为着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自卫战争，人民是勇于参加战争的，也只有大批的壮年青年挺身涌上前线，才能保证源源不绝的战斗力量。故我们在此自卫战的紧张关头，应立即号召大批壮年青年参加主力，在战斗中为解放区的广大人民服务。因为我解放区人民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对于民主政权的衷心爱护，对于反动派破坏和平的深恶痛绝，以及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政治觉悟程度的提高， 他们的参军，是热烈的，自动的，如淮北宿迁县在一次三百余人的时事报告会上，即有一〇九人报名参军，泗宿、泗县、灵壁等县，在本月初，不到十天功夫，自动报名参军的便达千余人。泗县城自动参军的田庆明说："我要参军保卫泗城父老，共产党在春荒中救活我一家三口人，如果蒋介石要来，我就和他拚"。泗县清水乡邵泽香说："我帮十九年大工，自己连块木头都没有，共产党一来我翻身了，……我明白蒋介石来，我们穷人要受苦受难，青年人要搞起来保住家乡"。此外，如涟东县锡恩区怀庄小学校长程荼因愤怒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无耻，决心丢下笔杆，拿起枪杆，赴前线杀敌。这些都是很生动的例子，同时也就反映了群众一般的心理。故我们急需展开普遍热烈的参军运动，也一定会胜利的展开这一运动。

第三，展开普遍热烈的参战运动。在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多方面进攻，四出蚕食骚扰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广泛的发动人民自卫战争，才能到处给进攻者以沉痛的打击。故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民兵英勇迅速的行动起来，成队成团的组织起来，开往前线参加这次光荣的自卫战争，或配合主力作战，或掩护担架运输，或担任护送俘虏，或坚持边沿区及敌后的游击战争。留在后方的民兵则负责维持重心区的治安，与警卫后方机关，并积极扩大民兵的组织。这对战争定会起极大的作用。华北华中不少的大规模战争，都得力于大量民兵的参加和协

3

2

助。此外，群众团体文化团体及党政机关，虽然不一定参加军事行动，但应该直接或间接的为战争服务，如主持或参加后勤工作，在后方不断的动员人民参战，筹划前线的物资供应等。尤其是要以战斗的百倍紧张的精神完成本身的业务，如果把本身的工作做好并和战争密切联系起来。这就等于直接参加战争。战争不是单方面的，参战运动是广泛的，只要有高度为战争服务的精神，则对于战争就会有重大贡献。

在战争的炮火正在猛烈蔓延，正在轰动全国的今天，我们苏皖边区全体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巨大规模的人民自卫战争，是掀起拥军参军参战的高潮，努力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的伟大胜利。

（原载1946年7月24日《新华日报》华中版）

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夏季扩兵经验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

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未宥关于夏季扩兵轻验报告介绍给你们参考。

中　　央

夏季扩兵，根据现有材料，太岳原定五千完成一万多（归队在外）。太行原定五千，完成六千多。冀南原定三千，大体完成。冀鲁豫五千，可能完成八千。此次扩兵经验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把群众翻身运动与反内战（反大蒋小蒋大恶霸小恶霸）结合起来。激起群众对蒋介石的深仇巨恨，使群众认识参军与进行自卫战争是人民自己的事，认识顽固派来了，性命难保，土地更保不住。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军参战，才能打败蒋介石的进攻，保住抗战胜利和翻身运动的果实。

第二，战争是较长期的，因此参军运动须注意劳力物力的计算，务使人力物力能长期坚持。太行、太岳老区参军人数平均达到全人口百分之五到六点五，此次参军即完全分配在新区，这样计算是需要的。否则将形成劳力奇缺，优抗任务奇重，损害群众利益，必然产生挤兵现象，枯竭人力，物力，不能长期坚持。

第三，领导方法，运用大规模积极分子会议，及时表扬参军英雄，扩兵规模，推动大家发起竞赛，不必如过去一样，强调干部带头，不强调干部带头，可出现更多带头的人，更多的积极分子，免除精神负担，加强扩兵工作。此次普遍经验是土地问题解决彻底，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参军的群众性表现突出，这是与过去最大不同的（过去干部积极分子带头突出）。其次，把参军的积极分子与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区别开，不把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原样做为参军的积极分子，否则会使一部分群运中的积极分子（不愿参军）畏缩不前，对群众翻身与参军运动两受妨害。

第四，新兵部队各级领导者，必须认识新兵是翻身群众的觉悟更进一步提高，要对群众领袖积极分子诚意的爱护和尊重，给以适当的任务和工作使其成为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新骨干。这对下一次扩兵更有好处。

至于其他如打通干部思想，培养人民武装思想，宣传鼓动，各地均有好经验不另介绍。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

（一四六年十月十六日）

《解放日报》社论

蒋介石及其美国合作者，悍然拒绝中共的和平建议，在企图以最后通谍限期威迫中共投降失败以后，实行了全面破裂的步骤——占领张家口。过去九个月中中共为了保护和挽救和平，曾作无数次坚忍的努力，但是高唱政治解决的蒋介石及其高唱和平调处的美国合作者，却只要中共和中国一切民主力量的投降和消灭。中共不得不严正表示：对于蒋介石的反动独裁和武力统一，中国人民将永不会屈服。中国人民与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及其美国爸爸相反，一定要为坚持神圣的停战令和政协决议而奋斗到底。现在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们要求中共宁可在自卫战争中暂时放弃张家口，而绝不要牺牲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正气，他们对于张家口的撤退，丝毫不感惊异，相反的他们知道蒋介石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只是吞下了一颗炸弹。

一年多以来，张家口在民主政府管理下，成了东方著名的模范城市，全世界由此证实了中共不但善于领导乡村，而且善于领导城市，比充满贪污的蒋介石恶政府高明万倍。张家口的暂时撤退，对于人民当然是一个损失，但是从现实的军事观点上说，这对于人民却没有造成困难。现时中国战争的决定关键不在少数城市的暂时得失，而在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这已经成为人民的常识了。如果人民在十年内战（开始时人民并没有一个县城），和八年抗战（开始时人民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也没有一个县城）中，还能依靠歼灭敌军实力而取得胜利，那末今天在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中，暂时退出一些城镇来换得歼灭敌军的条件又有什么不好呢？事实上正因为如此，今天解放区自卫战争一开始就是以运动战而非以游击战为主，一开始就能在大兵团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只在过去七月至九月三个月中，就歼灭了蒋军主力二十五个旅之多。换句话说，还在和平，没有最后绝望、解放区没有正式宣布全面抵抗以前，还在解放区人民开始转入动员开始涌入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并开始集中兵力的时候，蒋军愈战愈弱，我军愈战愈强的基本趋势就已经明明白白了，今后解放区人民，解除了和平的幻想，解除了象保护张家口这类城市的负担以后，其军事力量必更见愈战愈强，其兵力使用必更见自由机动。而蒋介石方面的情形却正好相反。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已经接近极限，占他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约一半要用于守备，其用于进攻的另一半又须继续转用一部分于守备，其余的部分又不断遭受歼灭的打击，因此他的兵力虽能依靠装备，暂时占几个城镇，却不能打通铁路线和公路线，更不能在野战中保持优势。蒋介石在占领张家口以后，或者甚至还能再占几个城镇，但是他的防线拉得更长了，他的补给线更难维持了，他在作战中的被动性更大，弱点更多，因此被歼灭的机会必然比以前大大增加。蒋军被歼到一定程度，解放区就可以转入胜利反攻。因此蒋介石悍然占领张家口，我们全解放区

的一切军队，一切人民，就一定要团结一致，下最后最大的决心，严肃努力，发愤反抗，一定在今后超过过去三个月的自卫战绩，歼灭更多的蒋军，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集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以便恢复国内和平实现政协的一切决议。

当然蒋介石还可以进一步卖国来取得美国更多的援助，进一步残民来补充他的兵力，因此战争必然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作充分的准备。但是，即令如此，蒋介石的根本困难还是不能解决。蒋介石的战线太广了，可以断定全面战争的发展，一定使战线愈来愈广，蒋介石的士气太低了，可以断定不断遭受歼灭和不断用拉夫补充的结果，蒋军的士气以后一定越来越低，战斗力以后一定越来越弱。在过去一年内，已有高树勋、郝鹏举、潘朔端、孔从周、曹又参等将军和刘善本、张受益等空军人员的起义，可以断定这种起义以后一定越来越多，蒋管区的人民在四川、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现在已经纷纷武装反抗，可以断定蒋军统治地区的这种反抗，以后一定会变为内战的第二战场。蒋介石的经济基础是太衰败了，他的全副官僚统治机器是太腐烂了，如果在武汉失守后他还可以用与日本人的默契勉强拖过六、七年时间，那末可以断定他一定不能用更坏的基础，更坏的机器，来拖过更长久的紧张战争的时间。一切这些困难，蒋介石固然不能解决，他的美国爸爸也不能帮他解决。况且今天的美国也已经不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美国，那时美国在政治上是团结的，今天是分裂的了，那时美国在经济上是向上的，今天是眼看要向下了。美帝国主义本身的经济危机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危机，正在迅速酝酿。他的中国儿子的好梦一定不会很长。无论是在他梦醒以前还是以后，无论如何，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蒋介石今天的一切罪恶一定要自食其果。

〔附〕三个月自卫战概述

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积极帮助下，六月下旬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内战，企图在半年内摧毁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年内肃清一切解放区和民主力量。现已时过三月，蒋介石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

中原　一月十四日蒋军占我光山县城后，即以三十万众，包围我中原军主力，压缩我军于宣化店周围纵横百二十里之地区。六月中旬，蒋介石亲下手令，限于六月二十五日进攻，六月三十日聚歼我军。中原我军奋起突围，于二十九日晚粉碎平汉路封锁，大举西进。中原我军的行动，使蒋介石的阴谋受到惨败，蒋介石羞愤成怒，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十五军军长武庭麟，都受到蒋介石的申斥。此后，蒋军对我中原军连续追击一个半月，终于望尘莫及，且遭我军重大杀伤。现我中原军主力，已在豫、鄂、陕边区创造新的解放区；我王震、皮定钧、张体学等部，则分别进入了陕甘宁、华中、大别山等地；我散布平汉路东西之游击队，仍牵制蒋军五个师的兵力。此次突围，我已胜利达成战略转移目的，从宣化店地区被包围的状态中能脱出来。蒋军则不但一无所获，反而招致了巨大的损失，如赵锡田之第十军，原有万五千余人，在追击中伤亡和逃跑即达六七千人，四十一、四十七、十五、七十二、七十五等军，莫不减员甚大，因此，七十二军军长傅翼、七十五军军长柳际明及其以下团营长，

被蒋介石撤职处分者甚多。总计中原战役，蒋军军长一级受处分者即达四人之多。

苏皖 蒋介石藉口苏北我军“威胁京沪安全”，用二十个师的兵力及海空军大部，于七月十五日发动对苏北之联合进攻，企图血洗我苏皖边区。杀人魔王陈诚则扬言要“武力决赛”。苏中我军奋起自卫，在粟裕、谭震林将军指挥下，一个半月中七战七捷。蒋军七个师（旅），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共六万余人，全部被歼，残部被困于如皋、海安、黄桥等少数据点。指挥苏中蒋军作战的李默庵被蒋撤职，由抗战中以败将著名的汤恩伯接替。在淮北，蒋军九十二师被全部消灭，于是九十九军军长梁汉民受到撤职的处分。蒋以苏中惨败，乃改变计划，由徐州宿县进窥两淮。我军予蒋军重大杀伤后，九月十九，二十一日撤出两淮。从此蒋军兵力更加分散，后方联络线更长。粟裕将军所说“两淮将成蒋军坟墓”，是一定会灵验的。

冀鲁豫 为粉碎蒋军对我豫东解放区的进攻，策应苏北、中原我军之自卫，我冀鲁豫军民于八月十日出击陇海线，四天之内连下兰封、砀山等五城，控制铁路三百五十余里，歼灭蒋军一八一师（仅师长米文和化装潜逃），并予十八军及二十九师、七十四师以重大杀伤。九月初，又歼灭蒋之嫡系第十军（即整三师），生擒军长赵锡田，四十一、四十七两军（师）亦被打得七零八落。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因此被蒋介石于九月十五日撤职，由皖南事变戎首顾祝同接替。顾到任后，复驱败绩之师，与由徐州、砀山出犯之第五军邱清泉部、暂十一师胡琏部，侵我定陶曹州地区。我诱敌深入，主动退出菏泽。陇海路南之我军劲旅，则克复太康、淮阳，并解放了广大区域，有力的配合路北作战。豫北我军亦于八月初发起自卫，以三昼夜之激战，扫平孟县全境蒋军五十余据点，蒋军十七师一部被歼。二十一日豫北我军曾一度攻入辉县，该地蒋军一营起义反战。

山东 蒋介石原定于八月初发动津浦路作战，三星期打通津浦线徐州、济南段。但因内部困难重重，迟至八月二十一日，始以四个军向我台儿庄出犯。九月二日，蒋军侵占台儿庄，困守一月不敢前进。蒋并限令王耀武于八月中旬打通胶济路，然而，邹平文祖一役，我军生擒其九十六军暂十五师一团团长刘士珍以下一千四百余人，毙伤两千。南泉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第一大队则全部起义，胶济路至今未能打通。

晋南 晋南战场，胡宗南自七月四日起，即以五师之众向我进攻，企图强占临汾以南地区。七月中旬喜闻一战，胡部三十一师全部被歼，其师长刘钊铭仅以身免，逃脱后亦被撤职。胡部一六七师及阎锡山之七十二师、暂三十九师均受重创。闻喜之捷后，我军转入反攻，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城，控制同蒲线二百四十余里，吕梁与太岳两解放区联成一片。阎军之暂三十九师于洪赵战役中全军覆没，暂四十四师、六十九师大部被歼。八月十四日胡宗南将豫北第三十军两个师调来晋南，再度前进，从侯马至临汾不过百余华里，胡军前进了两个月之久，才在阎军接应下，窜入临汾。当胡军精锐第一师（旅）甫入浮山附近时，我军即于二十四日将其全部歼灭，活捉师长黄正成，一六七师、二十七师一部亦被击溃。

晋北 同蒲北段，我为制止阎伪军不断侵犯，于七月初进行反击，一个半月中、解放朔县、宁武、怀仁、山阴、代县、崞县、繁峙、五台、定襄九城，控制同蒲线高村至大同南关六百二十余里，阎军丧师八千余人，惯匪乔日成被击毙，蒋介石乃乘阎之危，将大同划入傅作义之十二战区，诱其出兵绥东，以配合其冀热攻势，并将正太榆次以东，同蒲线临汾以南

地区，划归其嫡系胡宗南。阎锡山如继续助蒋内战，显然是毫无出路的。

绥东 傅作义部在蒋介石的诱胁之下，甘为独夫走狗，于九月十日倾巢犯我集宁。我军歼其暂十一师全部于集宁城郊，并痛创其暂十七师、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一〇一师。十四日我军主动撤出集宁。傅作义不知悔悟。继续侵占我丰镇、凉城。

冀热 冀热蒋军，八月初即受命进攻承德、打通平锦线，并"扫荡"冀东以配合东北作战，故以十七个师分向我热河、冀东猛犯。我军诱敌深入，主动撤出承德、遵化等十六城，接着转入反攻，积小胜为大胜。

东北 在这三个月中，蒋军既在关内无法取胜，乃不得不暂时搁置其进犯哈尔滨、安东的计划，东北暂呈沉寂状态。但蒋军亦在析木城、辉南、桦甸等地有小的出犯，均为东北民主联军击退。

蒋军损失 总计三个月来，我共歼灭蒋军第四十九军、第十军两个军全部及二六、七九、一〇五、一八七、新七、九九、十九、九二、三一、一八一、暂三九、二〇、第三、暂十一、第一等十五个整师（旅）及交通警察第七、第一三两个总队全部，另三十四个正规团、二十二个营、十三个连、十三个保安团。蒋军计伤五万八千余，毙三万五千余、被俘九万五千余。生擒将级以上军官四十八名，包括军（师）长赵锡田、师（旅）长黄正成、朱志广、梁彩林、副师（旅）长冼盛楷、金亚安、田云从、麦霞冲、刘光显、王瑛等。击毙副军长王克俊、击毙师长谭乃达、胡长清。团以下军官伤亡被俘者无算。不愿为美蒋牺牲而起义者共计二起、一万三千余人。总计蒋军损失兵力共二十二万一千余人。占进攻解放区蒋军全数百分之十二强。各解放区地方武装与民兵之大量俘获，尚不在内。据已知的消息，因军事失利而受到蒋介石处分的军长以上的将领，即有刘峙等七人。

在被歼的蒋军中，蒋介石嫡系武器最好而战斗力却最弱，被歼者最多，占被歼总数五分之三以上。杂牌军作战，除少数走狗如傅作义以外，一般均不积极，不愿为蒋介石及其美国洋爸爸拚命。

三个月中，蒋介石占解放区四十四城（共占我六十一城，我军解放十七城）。平均蒋军每占一城，须付出五千人的代价，蒋军的损失与我军的损失之比较则为蒋八我一。在苏中战役中则达十七比一。

我军缴获 据尚不完全的统计，我共缴获长短枪五万余支、轻重机枪四千八百余挺、掷弹筒七百余个，各种口径炮七百余门、火箭炮五十七门、坦克十八辆、军用汽车六十六辆、火车头七个、各种弹药二千余万发、骡马一千三百匹、电台十八座、击落飞机十三架、其他缴获不计其数。在晋中、晋北、冀热等地所缴获者大部为美械。

蒋军必败 三个月自卫战的总结，清楚的告诉了蒋介石，也告诉了美国帝国主义者：所谓半年内摧毁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年肃清一切解放区和民主力量，只是美国反动派与蒋介石的好梦而已。解放区军民，正在动员起来，愈战愈强，蒋介石则军心厌战、民心反对、经济恐慌、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后方不稳、愈战愈弱，而且后备枯竭，消灭一个就少一个。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可能在今后更大量的消灭蒋军有生力量，彻底粉碎蒋介石的此次进攻，收复暂时被蒋军侵占的一切城镇，给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以教训，给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以教训。

（原载1946年10月4日《解放日报》）

南北两捷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解放日报》社论

华中与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同于二十四日在涟水与平汉北段获捷，两次战役共歼灭进犯蒋军八千人，对人民爱国自卫战争作了新的贡献，大大鼓舞了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也是给予南京和平攻势掩盖下的蒋介石新的军事进攻一个直接的有力答复。

蒋介石在侵占张家口和两淮以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平汉北段蒋介石九十四军两个师沿路南下。困守保定的十一战区第一、二两纵队也北上接应，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打通平汉路，但八路军之出击平汉线，着眼点原不在一城一地而在寻求机会杀伤蒋军有生力量，故在窥破蒋军企图后，遂机动撤离徐水以北若干城镇车站，于二十四日集中力量在漕河头全部歼灭了保定出犯的四千余蒋军。苏北方面自新四军撤离两淮一个月以来，即为蒋军安排天罗地网，这支作为蒋介石陆军总部直属南京卫戍部队，曾经退囚于运河以西津浦以东苏皖边境的精锐武装七十四师三个旅，（原军师改）终于在进犯涟水地区中遭受了人民解放军正义的惩罚。两军均美械装备，被歼八千人的武器全部补充了人民解放军。这对一心好战的蒋介石，又是个痛心的损失。

南北两捷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歼灭蒋军有生力量的正确方针，不斤斤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机动作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进犯蒋军是完全可能的。虽然进犯解放区的蒋军，在过去三个多月遭受将近三十个旅的巨大损失后，已经千小心万谨慎，在最近进犯各个解放区中，都采取齐头并进，步步为营办法，进军间隔甚小，每占一地，立时筑碉自固，但是只要我们侦察确实，部署周密，行动迅速，作战机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能够找到严重打击蒋军歼灭蒋军有生力量的机会。

两地捷音，也证明着解放区广泛群众性游击战的开展大大的帮助了主力军大规模运动战的胜利。这两个歼灭战，出现于涟水和保定附近地区，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地区向来是游击战最活跃的场合。以苏北来说，孤军深入的蒋军，只侵占了几座空城，游击队民兵控制了广大乡村，时刻威胁着蒋军侵占的城镇，蒋军不能不分出许多兵力去守备这些侵占的空城。这样就使得它的野战军大大减少，而且这些野战军还经常不断受到我游击战的消耗，给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造成了各个击破进犯蒋军的有利条件。所以蒋军愈深入解放区，地位愈孤立，交通线愈长，补给愈困难，兵力便愈分散，野战力量便愈减弱，遭受各个击破与歼灭打击的危险便愈大。蒋介石兵力使用已达饱和点，后方再也无兵可调，蒋介石的野战军天天减少，而解放区军民的全面抵抗却愈来愈有劲。这是战局发展的基本趋势。

蒋军侵占两淮和张家口后，陈诚、彭学沛和蒋方宣传机关兴高彩烈地说："共军已总崩

溃”、“苏北战争已近尾声”、“可在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曾经一再警告蒋介石和陈诚之辈，目前解放区人民的全面抵抗仅仅只是开 始， 来日方长，蒋介石的苦难正多，涟水和保定附近之捷，恰如其时的粉碎了他们的大言和幻梦。

解放区军民为自卫与正义而战，博得了全国各阶层同胞的拥护，我们不仅有信心，而且有力量维护和贯彻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企图以“既成事实”撕毁两大协定，强迫解放区人民俯首接受，这是万万不行的。解放区军民是渴望和平的，但是我们知道只有贯彻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才有真正和平之可言。停战协定经过中共、国民党及美方三方面的庄严签字，政协会决议经过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庄严通过，这两个协定，是中国人民多年奋斗的成果，为海内外同胞与世界和平民主人士所共同拥护。如果这些协定，可以放纵美帝国主义分子及蒋介口藉口“既成事实”任意毁弃，那末以后即便签订一百个停战令，蒋介石的内战只会愈打愈大。蒋介石的进攻一天不停止，蒋介石的军队一天不退出一月十三号后所侵占的地区，解放区军民只有坚决自卫，并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已被蒋介石毁弃的停战令与政协决议而奋斗到底！

（新华社延安1946年10月26日电）

再接再励争取全面抵抗胜利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解放日报》社论

正当蒋介石骄横无理的以“不交出名单即继续内战”，胁迫中共及第三方面参加其违反政协决议，一手包办的非法“国大”的时候，正当蒋介石在和平攻势掩盖下，得寸进尺，对解放区扩大军事进攻，使第三方面的和平努力归于失败，蒋介石对和平毫无诚意，已完全暴露，引起全国人民莫大愤慨的时候，捷报传来，十月底，与晋察冀子弟兵在平汉路保定附近歼敌四千同时，苏北与冀鲁豫我军，分别歼灭进犯苏北涟水与冀鲁边鄄城、濮阳的蒋军，蒋军损失达三个整旅之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都发生在蒋介石当前军事进攻的中心薛岳指挥的战场。它有力的打击了蒋介石迅速占领涟水、沭阳和濮阳、大名，打通陇海路东段和平汉路中段，切断我军苏皖和山东及冀鲁豫与太行联系的企图，使薛岳的进攻部署，遭受严重挫折，这说明蒋介石、陈诚之辈，想在三五个月内消灭中共力量，纯系痴人梦呓，美国反动派想利用和支持蒋介石，以武力压迫中国民主运动屈服，是根本办不到的；同时也说明解放区军民能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取得正义的自卫战争的胜利。

苏北和冀鲁豫的胜利，再一次说明无论蒋介石如何狡猾，如何谨慎小心，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办法向我进攻，只要我们对敌情侦察清楚，部署周密，善于寻求蒋军的弱点，机动作战，终有机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苏北被歼的张灵甫部，在两淮已受相当损失，本来应该调到后方休整，但蒋介石突然来了个“传令嘉奖”这道嘉奖令正如被俘的七十四师官兵所说，恰恰成了“催命符”，张灵甫冲昏头脑，率领所部向涟水冒险进攻，说“打下涟水再休息”。而苏北军民则义愤填胸，决誓与进犯者决一死战，正是由于我方是正义自卫，蒋方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战争，正由于哀兵必胜，骄兵必败，涟水城郊就成为蒋军的坟墓。至于说到蒋军兵力不足的弱点，根本无法克服，这一点无论苏北或冀鲁豫都十分显著。苏北蒋军占领两淮，续又南犯宝应至高邮二百多里的运河线，兵力便大为分散，这次进攻涟水，这一弱点完全暴露，乃遭歼灭打击。冀鲁豫蒋军占领菏泽、金乡以后，同样亦不能不分出很大兵力去守备交通线与侵占区，其野战军的战斗力便大大的削弱，此次被歼也是意料中事。所以蒋军侵占的城市愈多，战线愈长，兵力愈散，遭受歼灭打击的机会愈多。往往蒋军因侵占某一城池而趾高气扬之时，正是其行将遭受歼灭打击之日。泰兴、如皋的放弃，乃有苏北南线的七战七捷；东明、定陶之退出，接着出现冀鲁豫歼敌赵锡田等部的大捷；此次两淮与焦作的相继撤离，又换得了这么两次胜仗。历史事实的发展愈益磨炼出这一颠扑不破真理的光辉。我们必须认真教育解放区全体军民更深刻地认识“战争的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长”这一真理，号召全体作战军民，无论主力兵团、地方武装，都要学会和掌握“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无论党政军民，各种工作

都要为着这一“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苏北与冀鲁豫的胜利，主要是野战军运动战的成功，但是蒋军侵占区中的游击战，也起了很大配合作用。苏中南线蒋军侵占区民兵游击队的广泛活跃，冀鲁豫定陶、菏泽以南与豫北、道清路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给蒋军后方很大威胁，牵制了蒋军兵力，同时使我正面主力得以空出手来，运动歼敌。现在凡蒋介石侵占地区，美国兵和美国货即随之滚滚而来，蒋介石军队及其特务抢掠土地，霸占房产，抓丁征粮，敲诉勒索，无恶不作，各阶层同受其害，就是苏中地主也弄得欲哭无泪，与过去民主政府相比之下，不啻天堂地狱，这必然激起全体同胞公愤，奋起保家自卫。这就是说在蒋军侵占区，有开展游击战的充分客观条件和基础，所以，今后凡暂被蒋军侵占的地方，都要学习苏中、冀晋豫的榜样，预作准备和布置，继续发动群众，壮大民兵游击队，发动广泛游击战争，坚持各种斗争，保护当地人民切身利益，并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待将来时机成熟，向蒋军举行反攻。

苏北与冀鲁豫的这两个胜仗，打掉蒋军三个旅，连前三个多月的作战，蒋军正规部队的损失在三十三个旅左右。这些部队都是蒋介石一、二十年功夫建立起来的，消灭之后，决非短期内所能重建。对于蒋介石的确是个惨痛的损失。但蒋介石还没有死心，他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帮助之下，并未丝毫改变其武力消灭中共和解放区的梦想。他还想把内战长期打下去，打得更大更凶，他正在八个地区发动进攻，最近正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甚至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此，在今后几个月内战争将会空前的激烈、残酷和艰苦。我们解放区全体军民，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都应有充分的准备，使我们每一个人更加加强必胜的信心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同时亦不要因为已得的胜利而骄傲。应该如毛主席所说的戒骄戒躁，再接再励，同心同德，奋斗到底。现在蒋介石的后备已经枯竭，后方可调兵力无几，他目前这种疯狂进攻，是十分冒险的，正如陈瑾昆教授所说是一种“回光反照”。只要我们努一把力，象过去四个月那样，继续大量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转入反攻，争取全面抵抗的最后胜利。

广泛开展立功运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解放日报》短评

山东和华东解放区，正在开展为人民立功运动，号召每个人在自卫战中建立功劳，将英雄模范事迹记入功劳簿，掀起了“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敬爱”的立功热潮，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为人民立功劳，作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应当大大提倡和推广。

在推行这个运动时，无论党政军民，要热烈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竞赛，提高一切为人民服务与自我牺牲的精神，熟悉与掌握各种武器，提高技术水平与工作效率，加强战斗力，同时要发扬团结友爱，虚心学习的精神。华中新四军某团所提“有了功劳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号召全解放区普遍的开展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

（原载《建军增刊》第17期）

中共中央对俘虏工作指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由于我军不断的胜利，各地区对于处理俘虏，成为迫切的严重问题。过去中央指示，本人人有用之原则，基本上不释放是对的。依目前形势看来，各地区俘虏日增，而蒋军长期受反动宣传影响，多不了解我对俘虏政策；在战场顽强抵抗，被俘后又不能即时为我所用，劳民伤财致成累赘，兹决定新的办法如下：

一、对俘虏释放或留用，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极放走了事。要知道蒋军兵员干部，均感缺乏，放回去蒋又重新组织队伍，再来进行内战。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给以任务即时释放。对士兵俘虏内之老弱、残废、兵痞及有某些封建关系不易教育者，给以优待，于进行简单教育诉苦运动后，仍给以简单任务释放；其余大部争取补充我军，或选择一部分进行教育后，放回做瓦解工作。某地实行此种办法，一士兵在一月内出入三次，拖出十一人，十二支枪；有两个班长回去后，在二次战斗中，劝说营长排长放下武器。

二、俘虏教育问题，是争取俘虏极重要工作。派干部必须选择有能力经验及社会地位者，特别对比较高级俘虏起作用很大。应尊重其人格，避免用俘虏招待所或解放招待所等字样。某处用“民主建国训练团”“民主建国研究会”等名目，他们很高兴，出去后并感到以团员或会员资格为荣。在方式上要特别注意，首先要善于迁就，切忌过分刺激，如开始当他们的面骂蒋阎时，就起反感。应顾及他们旧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对我仇恨、成见与怀疑恐怖心理，不使他安心下来，一切政治都谈不到。要关心照顾其生活，诱导他们敢于说话，即反动言论，也不急于批驳或下结论。先做启蒙运动，慢慢在政治上提高，这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走一些曲折迂回的路子，才能打通思想。如有的转变后说：“初来时谁骂阎锡山，我就不高兴，现在痛恨阎锡山我比谁都厉害，想起过去才好笑。”组织问题，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俘虏中挑选较好者任小组长及分队长，要他们自愿的定出纪律，充分的发扬民主，自由的讨论问题，我们仅处于旁听指导地位，有较坏者，我们只做说服解释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批评斗争；在教育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样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如自动提出愿与八路军同等待遇，不要优待，要吃苦，坏分子也不敢公然活动了，在教育期间经常约定首长或派代表关心慰问他们，请人做报告，讲时事，参加各种比较公开的集会，义务劳动，组织晚会等等，使生活紧张活跃。按成绩优劣分别出团，时间至多三月至五月，某地经验证明，这种工作方式收效很大，但有些地区只是公式化的优待俘虏，请吃饭、看戏、发东西，

但不在教育上注意，或生硬的谈问题，结果费时耗财，问题未易解决，甚至引起反感。他们愈不满，我们愈防范，最后不是镇压逃跑，就是随便处理，结果影响很坏。“一把小米养恩人，一担小米养仇人”。因此在方式上应该很好的检讨。

三、大胆使用俘虏进行瓦解工作极为重要。由于他们熟悉国军情况，又有封建关系，因此联名发宣言，私人写信，研究瓦解工作中各种方式方法问题，甚至火线喊话，标语口号等，亦应倾听他们的意见，只要对他们使用适当，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是很积极的。如晋阎高级俘虏狄予公，在大同战役时，冒死冲入敌方进行瓦解工作，以后并劝其他俘虏说：“我从前想老婆想家，想回部队，了解革命后，一切都不想了，生命尚可牺牲，何况其他！”攻某城时，敌人炮火猛烈，不易接近城垣，某俘虏自告奋勇，愿身负炸药，冲至城根，与城俱尽，劝阻无效，英勇牺牲。有的可做专门研究问题整理材料之用，或用先来俘虏教育后来俘虏，更为有效。有的可组织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他们所熟悉的部队之瓦解工作，我们派人只是给以原则指导，解决困难问题。还有在训练过程中，可用“民主建国行动团”或其他名义，秘密发展组织，举行隆重入团仪式，写志愿书宣誓，派人监督训话，然后派出工作。履行这样的手续，对他们是很重要的。某地有的俘虏写血书，愿为人民服务，有的感动得流泪，经多次试验，凡入团者，大部工作积极，对我忠实。特别是士兵俘虏，在战斗中表现更好，晋绥部队在补充时，多愿要俘虏不愿要新兵，因为他们有技术，一补上即可作战。某些部队，俘虏占百分之七八十。只要我们指战员懂得优待政策，善于团结使用，即会变为革命的力量。另方面又要提高警惕性，不为那些虚伪狡猾分子所蒙蔽欺骗，对极顽固反动分子，经多次教育，仍不改正并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应给以必要的镇压与处分。

四、这一工作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及全体指战员，认识党的政策，参加这一工作，才能收到巨大效果。由于战争的残酷性激起仇恨敌人的心理，到处搜腰包，残杀俘虏之事仍很严重，有的地区不但搜腰包，甚至连近视眼镜金牙齿都没收。平社战役，将几个放下武器的团长都戮死！某一据点在激战中逃出十一人，枪杀七人，活埋二人，其余为父子二人，苦苦哀告，始免于死。后敌人拚死抵抗，致我伤亡甚大。这些血的教训说明我部队中，对俘虏政策教育不够，希接此指示后，在国军部门及部队中进行深刻的检讨，改正错误教育全军。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训练与培养干部的一封信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各军区各纵队首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一）由于我全军指战员的英勇，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拥护与参战，使我四个月以来的自卫战争，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绩，歼灭敌约三十五个旅，给了蒋介石以严重打击。在四个月战斗中更丰富了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将继续指导我们消灭蒋军，争取胜利，这是无疑的。同时在四个月的恶战中，我们也暂时丧失了部分领土与一批城市，为了换得敌军兵力的分散，便于各个歼敌，主动的放弃某些不能保守的城市与交通线，这是必要的。但亦有因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这说明了我军在指挥上、战术上、技术训练上、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上，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弱点。为了更好的打胜仗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弱点。在蒋军方面，固有许多基本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如民心不顺，兵心厌战，财政困难，经济危机，内部矛盾，地广兵力不够分配等困难，特别是政治上的孤立，将因战争持久而愈严重。但蒋军技术装备较抗战前加强，战术在某些方面亦有进步，如攻击精神虽差，而防御力还强，歼灭敌人两三个团的战斗，集中三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常需恶战数昼夜才能解决战斗。敌人还是强大的，战争还是长期的，对敌还不可轻视；但是可以战胜的。只要在今冬明春再歼灭敌二十个旅（师），即可迫敌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即可转入反攻，收复失地。只要我们不犯重大错误，不轻易失去有利的歼敌机会，是有可能实现的。

（二）四个月战争证明，平日注重训练的兵团、野战纵队，战绩特别显著，牺牲亦比较少。对于训练不重视的，或重视不够的，或训练不得法的，战斗胜利就比较少，伤亡较大，甚至还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一血的教训，应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练兵可以增加战斗力，又多一次证明。我们处在长期的残酷的战争环境，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提高政治觉悟与军事技能，对于每一个战役，每一个战斗结束后，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均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深入检查，总结经验，反复教育。从实际战斗体验中，加深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思想的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一书及八月十六日军委的战术指示，是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指南针，各级干部应人手一册，反复钻研，从学习毛泽东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加强对战争领导与指挥的实际能力。特别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谁能经常掌握这一原则，谁就能常打胜仗。在敌强我弱的当前形势下，需要我们百战百胜，且须每战均有缴获；打一个平手战，击溃战，缴不到武器、弹药，即难以继续作战，战略上也就难以持久。敌军尚在数量与兵器上占优势，且掌握近代运输工具，即要求每一战斗的迅速解决（两三昼夜的连续恶战）。如

不能速决，就不能各个击破敌人，敌人援兵一到，还有打败仗的危险。要想解决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就必须在战术上确立以多胜少的原则，只有集中六、七倍至少三倍的优势兵力和强盛的火力，而且是自己最精干的部队，突然指向敌人一点进攻，尤其是敌方弱点进攻，如敌两系统接合部、突出部，特别是向敌翼侧后方，突然勇猛的进攻，常收奇效。在相等兵力进行战斗时，在战术上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呢？这一问题我军大体是解决了的，但未普遍解决。假定敌我兵力各一万，为求得胜利必须采取攻势，以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佯动佯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展开而钳制之，荫蔽的集结主力，集中火力，突然的向敌弱点勇猛进攻，突破一点，消灭敌人小部（一千至二、三千）使均势变为优势，继续扩大战果，各个歼灭之。此种战法在根据地内，群众拥护，地形熟悉，敌情明了，作战时机可自由选择等情况下。这是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与可能实现的，而且过去许多仗是这样打胜的。在战役上战术上经常注意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击破一点，首先歼灭敌一部再及其他部，这是历来作战指挥原则。但仅有这一原则还不够的，当敌人集中强大兵力时，还必须善于以极小一部结合民兵、基干队，进行群众游击战，疲困敌人，以武工队、地方部队采取敌进我进的积极方针，坚持敌后破路翻车，打击敌清剿清乡的小部队。总之，要善于分散敌人，便利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击。当敌情变化转入战略进攻或转移至新地区时，敌人进攻部署尚未准备完成时，"分散发动群众"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如李先念部转移至鄂豫陕区，在三个月中建立了根据地初步规模，这就是运用了这一原则。再加上各兵种、各部门、各级指挥员，以致各个战士的战斗动作熟练，相互协同，相互配合象机器一样的灵活合拍，这就能经常打胜仗，这就需要经常训练。训练就是战斗的预行演习。我们的军事训练要根据战争环境、敌我军队的具体条件，扼要的有重点的去进行；如敌有强大的空军，兵器优良火力强，而士气低，此种军队利于日战，不利于夜战；我无空军配合作战，兵器差火力弱，而士气旺盛，在解放区内作战时，道路、地形、敌情熟，人民拥护。为消失敌人优点，弥补自己缺点，利于夜战。因此，我必须加强夜间战斗训练，整理夜战经验，表扬夜战成绩好的兵团连队和个人，使之普及。其次，如步兵训练的重点是射击教育、投掷手榴弹、刺杀动作，因为步兵战斗手段是火力与白刃，依靠这样手段去消灭敌人。其次，是利用地形地物侦察警戒，土工作业，以减少伤亡。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二者是联系的。但消灭敌人是主要的，因此应注意射击教育以及关于射击命中的补助教育，应反复进行，并尽可能进行实弹射击。射击成绩好的应当特别表扬，选举模范射手等办法提倡鼓励之。三，工兵训练的重点；根据我们今天的条件和需要，主要是内外部爆破，熟悉各种炸药性能，爆炸敌人城寨、碉堡、家屋。其次是破坏其防御，如爆破鹿砦、铁丝网、垒寨水壕、拔出地雷等。四，我们在开始建设炮兵，已有若干成绩，但多数司令部对炮兵训练是不注意的，缺乏对炮兵训练的具体计划、检查、督促、必须改正。但炮兵训练主要是射击技术、测量距离、驮载与放列迅速确实，不管速射与曲射炮均应如此做。根据我们现有兵工条件与运动战为主的需要，认真的建设迫击炮。迫击炮弹制造简单成本小，运动轻便，杀伤人马与山野炮有同等作用；惟破坏力较小。在我军建设炮兵中，应展开赵麻子运动。赵麻子是迫击炮百发百中的能手，在太行区建设迫击炮有很大的成绩，号召所有迫击炮射手学习赵麻子对迫击炮的专心致志之精神。机关枪射击手亦应经常注意培养，并培养各种模范射击手。

（三）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干部伤亡是很大的。补充伤亡主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大胆的提拔新干部，并须积蓄干部，开办教导队、训练班，提高与培养新干部是保障战争持久，

继续争取胜利与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提议各野战集团（如刘邓、粟裕等集团）办一中上级指挥员随营战术研究班（队），营团正副职轮流训练，主要学习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歼灭战，《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联合兵种战术，各兵种性能，兵器学常识，实战经验。总之，要使经验与理论结合。各甲种军区（如山东，晋冀鲁豫）在情况与条件许可下，开办技术兵种速成训练班，（炮兵、工兵、坦克）以及通讯、军医、供给学校。乙等军区，野战纵队须成立教导营或队，主要是培养连排级指挥员及指导员。军分区及旅亦须成立教导连或队，训练班长、副班长。训练课目时间，根据环境和需要自行决定。训练的目的是为着用，而不是为着看，因此要反对形式主义。训练期间的时间分配，业务应占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政治科目的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学员的来源主要从部队正副在职人员抽调轮番训练，部分的从地方抽调。部队的实战经验应随时总结，供给教育机关作教材，教育才有新的内容。学校的教员应轮流抽调有实战经验，有文化的干部充任。学校是集中军队经验与优良作风使之普及全军。我军一般轻视教育工作，这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四）部队政治教育，主要是解放区现行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使每个指战员、工作人员清楚的了解目前战争性质。中共坚决主张减租减息、清算运动等办法，达到耕者有其田，解除农民封建束缚，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国民党主张坚决反对农民解放，继续维持封建统治，压榨农民，使农民永远处于奴隶地位。这是目前战争最本质的原因，应反复以此进行教育。特别应以诉苦大会方式，启发全体战士，自己教育自己，提高阶级觉悟，使之深刻了解：为了农民阶级获得土地而奋斗。其次，战争是长期的，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克服战争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战争愈长期愈艰苦，就愈易忽视人民群众利益，破坏群众纪律，因此随时随刻要照顾人民群众利益，严肃群众纪律，经常注意拥政爱民教育，纪律检查，表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其三，国民党兵士有仇恨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治觉悟，四个月战争被俘兵士参加我军者将近五分之四，加入我军后在战斗中一般的表现英勇，这是很好的证明。争取被俘兵士的工作方式，各地均有新的创造。一般的方式是被俘兵士初到解放区时，人民和军队热烈欢迎与亲切慰问，顿时打破国民党的造谣（被俘杀头）。诱导其回忆土豪、劣绅压迫，国民党抽丁，军官打骂等痛苦，开诉苦大会，这是被俘兵士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应广泛采用。四，毛主席起草的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南针，仍有其重大的实际意义。谭政同志的边区政治工作报告，是在整风运动后复活了古田会议与若干工作方式上的发展，我们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应反复研究上述文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发挥。特别是政治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支部（战争残酷，党员须经常保持四分之一）以民主方式选举各种模范与英雄，发扬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以韩起祥说书方式进行时事教育，以《血泪仇》、《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李国瑞》等话剧方式作为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打破过去有些部队上政治课无人听的死板方式。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式才是生动的活泼的。

致以

同志敬礼

中央军委　总政治部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

鉴于各解放区有数千万农民起来坚决要求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事实；鉴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不劳而获，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没有或缺少土地，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态，是整个民族陷于被压迫、被奴役、穷困与落后的根源，是使我们国家走向民主化与工业化的最大障碍。而农民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则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根据孙中山先生关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及政治协商会议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决议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以下列各项为原则，制定并颁布土地法令，实现耕者有其田，以满足广大农民极正当的要求，同时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并为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工业化造成广泛的巩固的基础。

一、确认耕者有其田为人民不可被剥夺之基本权利，政府以法律保证一切用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

二、由政府以法令没收下列各种性质的土地：

（甲）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

（乙）在日本占领期间各级伪政府机关及其他伪公共机关所有的土地。

（丙）协助日本占领中国之汉奸卖国贼之土地。

（丁）在日本占领期间，在日军及伪军、伪政府机关及其他伪公共机关供职，犯有出卖祖国与残害中国人民生命及其他重大罪行者所有的土地。

（戊）前清政府机关及皇族所有的土地（如旗地）。

（己）地主的黑地。

（庚）一切用不正当方法霸占之土地。

（辛）其他由法庭判决没收之土地。

三、凡属地主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额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以法令征购之。

四、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购之土地之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之，大概以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上下为适宜（例如当地中农每人平均有三亩耕地，地主保留之土地每人应为六亩上下，即某家地主如有十口人，得保留耕地六十亩，如有十二口人得保留耕地七十二亩）。并应注意地主保留之土地的质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坏地。

五、地方政府征购地主土地的价格由各县政府和当地地主与农民代表大会参照当地土地市价根据土地质量的不同协议定之。

---

① 原件注明："此为中央起草的草案，交各地区讨论提出意见。"

六、征购地主土地每户超过一定数额者（如在河北、山东为五百亩，陕甘宁边区为五百垧），其超过定额以上之土地以半价或半价以下递减之价格征购之。

七、地主土地被征购后，地主多余的农具、耕牛、房屋、肥料等，为农民所需要者亦得征购之，但地主所有之工厂、商店、矿山及其他财产不得征购。

八、凡在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二年以上及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之地主，应保留等于当中[①]四倍以下之土地免于征购。

九、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

十、凡祠堂、庙宇、教堂及其他宗教机关所有之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依照当地人民公意及其族人或教民的意见妥善处理之。

十一、凡属国家及地方之公地，由政府征收，并分配之，各地为办理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须保留公地时，其数额及位置由当地政府与农民代表大会协商定之。

十二、一切原来附属于耕地之非耕地及水利（如山林、宅地、池塘、水井、沟渠等）均随同耕地处理之。

十三、凡荒地（不论公荒、私荒、生荒、熟荒）由政府无代价征收之并由政府规定办法，以之分发给一切愿意开垦的人开垦成耕地。但荒地之属于私人者，其原来地主有开垦之优先权。

十四、凡不在地主之土地，在该地主未返回前由政府征收之，但在该地主返回后，即按地主土地征购之。

十五、由政府没收、征购、征收之土地，即由各解放区政府征求当地农民代表大会之意见，依农户人口及劳动力两项标准，规定公平办法，分配给当地没有耕地及缺少耕地之农民耕种，如因为当地土地不够分配，农民得请求政府协助到其他地区分得土地。

十六、凡缺少土地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有分得土地之优先权：

（甲）在爱国战争中死难烈士的遗族。

（乙）在爱国战争中受伤的官兵。

（丙）在抗日军队及抗日游击队中服务二年以上的官兵。

（丁）在敌后爱国战争中服务二年以上的公职人员。

十七、所有一切有关土地改革事宜，除在各边区政府及各省政府成立土地部门外，在各县可由政府、农会、雇农工会的代表及开明士绅组织土地改革事务所办理之。

十八、为了办理发行及偿还土地债券的各种事务，各地政府得专设土地银行或委托其他银行办理之。关于发行与偿付土地债券细则，由政府规定之。

十九、土地债券之基金以下列方法取得：

（甲）分得土地之农民所付出之地价。

（乙）政府在自己全部收入中拨出一定数量之款项。

（丙）其他由政府指定之土地基金。

二十、一切分得土地之农民须向政府分年交付一定数量之地价。其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情况定之。（由于政府拨出款项及指定土地基金代农民付出一部分地价，由于政府无代价的没收及征收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际上分得土地之农民只须付出地价之一部分即够付清土地债券。）

---

① “当中”似应为“当地中农”。

二十一、农民分得土地后，其应付之地价，可分为十年付清，但特别贫苦之农民得分为二十年付清，并得在分得土地后第三年起开始交付。

二十二、由于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土地债券之单位可以实物规定之。农民亦得以实物或现款交付地价。

二十三、在土地改革后除开二流子所分得的土地，必须自己耕种不得出租出卖外，一切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农民分得的土地，均得自由出租出卖或自耕。

二十四、依第二条规定没收土地之家庭没有离本地者应保留相当于本地贫农或中农所有之土地，以便维持其生活。

二十五、除法庭依法判决剥夺其公民权者外，所有依法被征购、征收土地之地主及法人，其公民权不受侵犯。凡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地改革之地主应受奖励。

二十六、依法保留之土地及分得之土地的地权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

二十七、依法实行土地改革后，政府应用各种办法帮助贫苦之农民进行土地生产。由于改良耕种因而提高土地生产有特殊成绩者，及由于勤俭与善于经营而增加其家庭之财富者，由政府规定办法奖励之。

二十八、凡非因懒惰而确系缺少劳动力，依法实行土地改革后，以致无法维持生活之地主，由政府及社会团体救济之。凡失去劳动之鳏寡孤独，无法维持生活者，均由政府及社会团体救济之。

二十九、凡因实行土地改革而使生活困难之地主家庭，有适宜于作公教人员者，政府应酌情录用之。

三十、凡地主在土地改革后愿意从事农业垦荒，或经营工商业及其他正当事业者，政府应协助之。

三十一、依上述原则实行土地改革后，关于土地之累进税率应重新改订之，以不加重地主所保留土地之负担为原则。

三十二、从日本投降以后，所发生之土地纠纷，不论已处理或未处理，均依照上述原则所颁布之法律处理之。

三十三、在各边区及省政府公布土地法令后，下级政府均得颁布关于土地之补充法令。

三十四、城市非耕种之土地应另订办法处理之。

中共中央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

（甲）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因此，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准备选择适当时期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由各解放区政府制定土地法令，加以颁布。这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同时各地的群众运动发动不平衡，运动的进度不一致，各地区对外影响有不同，特别是我们对于各地当前的运动的情况不很了解，因此，首先提起你们对此问题加以研究考虑。

（乙）土地政策中有几个特别要考虑的问题，如照下列原则解决，对于没有解决土地的地区是否适当：

（一）没收敌伪及大汉奸的土地，没收旗地与地主黑地及霸占土地。

（二）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以法令征购之。

（三）地主可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免于征购，其保留数额根据各地土地的多寡，由各地政府规定之，但为了真正使地主在土地改革后能够生活，是否地主每人所保留的土地可等于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即超过一倍，如中农每人三亩，地主每人可保留六亩）。

（四）凡在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及积极协助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之地主，应给以优待，每人保留免于征购的土地可多于一般地主所保留者之一倍左右。

（五）每户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之大地主，其超过定额之土地，以半价或半价以下递减之价格征购之。根据你区土地收获量来看，超过多少数额就可开始用递减办法？

（六）地主多余的农具、耕牛、房屋等为农民所必需者亦得征购之，但地主所有之工厂、商店、矿山不得征购。

（七）政府征购地主土地的地价，由各县政府和当地地主与农民代表大会参照当地土地市价与土地质量之不同评议规定。

（八）征购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

收中调剂。除去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

（九）宣布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凡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地改革之地主应受奖励。

（十）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

（十一）凡逃亡地主之土地，仍按一般地主土地处理，在该地主未返回之前其应保留的土地及征购的代价，由政府代管，但在该地主返回后，即由政府发还之。

（十二）凡不是地主，而是城市的工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教员、技师、小职员等人，他们在乡村的土地，免予征购。

（十三）凡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经营的大农企业，及东北移民地区的攀亲地，应按当地实际情况处理之。

（十四）凡祠堂、庙宇、教堂及其他宗教机关所有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依照当地人民公意及其族人或教民的意见妥善处理之。

（丙）上述是需要特别研究的一些问题，至于宣布耕者有其田及将没收的征购的土地及公地荒地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等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再例举。我们所提的这些问题和办法只供你们参考，不要下达，请你们对每条都加考虑，提出具体意见速电报告。特别要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这样的法令其有效期是否可从法令公布之日起才发生效力，而在此以前已经解决的土地，不再重新征购。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的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和土地的办法，这样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这些问题，希望你们仔细考虑给我们答复，以及将你们对于照顾地主生活采取的办法，群众在运动中所创造的办法告诉我们，以便我们能更周密地考虑与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制定一公开的土地政策加以公布。总之，这一问题现在不能有一公开的法令，基本上保证农民取得土地，同时又给地主以较多的利益，才能在全国行得通。

中共中央关于对富农土地不宜推平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

我们认为陈毅对于富农自耕土地不宜推平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国政权，而解放区正处在战争环境，为了孤立地主，稳定中农，顺利进行土地改革；为了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内部巩固，以便能更广泛动员各阶层群众，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为了与京沪蒋区广大反蒋阶层与民主分子的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密切配合，扩大对解放区的同情，孤立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地位，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但在已经解决并取得多数人民同意的地方，不要再变动。此外，对待一般中小地主亦应与对待汉奸、豪绅、恶霸有所区别。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生活，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这些步骤，对解放区之巩固是必须的，因而就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各项过左意见是不利的，望你们加以考虑。

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

二十九日、三十日报告均悉，你们关于加深土地斗争的指示，对各项问题解决得很好，望贯彻实行。目前解决东北土地问题的方针是：根据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除没收敌伪大汉奸土地外，应普遍动员群众进行反奸清算运动，使农民从地主手中得到土地。你们三十日报告的意见，完全正确。中央正在准备的公开土地法令，现尚在研究中，目前还不公布。

〔附〕东北局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各分局省委并报中央：

（一）从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发出后，最近两个月来东北各地先后共有一万二千干部（其中约十分之二是老干部）下乡。大部分县里都组织了工作团，都突破了一个或几个村屯，少数县已经作到大部或普遍分配了土地，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涌现出一批当地的积极分子，干部取得了新的经验，发现了新的问题，对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信心。群众中也在纷纷议论清算分地的事情，这是很大的收获，但在工作中仍存在有以下偏向和缺点：

（1）有些地区的领导人只限于一般的号召动员，没有亲自动手突破一个地方总结几条经验，介绍和推广到其他地区，或者组织了工作团，没有坚强的领导，主要的成分是旧职员和青年学生，他们下乡后住在烧锅油房和地主家中，恩赐的发放开拓、满拓地和发放清算的果实，甚至有假公济私、贪污中饱的事情，这种现象在前一时期较为严重，现都经过纠正，唯个别地方仍未彻底转变。

（2）在群众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由于领导上没有坚定明确和具体的政策，产生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及个别地方给佃富有少分田或分坏田的现象。

（3）分散到各工作区去的主力部队以及地方部队和当地党的配合不够密切，有些部队对剿匪、掩护工作团、作群众工作不够积极。

（4）孤立的进行清算和分地斗争或者只搞清算，使斗争不能深入，或者在分地当中没

有真正的发动群众斗争，或者没有把土地斗争与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相结合。

（5）将清算斗争的果实大部归公引起群众的不满。因此各级党委应继续抓紧领导，防止和克服以上偏向，进一步深入群众的土地斗争，争取在今年旧历年底以前完成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二）分地斗争中对各阶层的具体政策：

大汉奸、恶霸、豪绅地主、顽匪头子是农村中的封建堡垒，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必须发动群众集中火力首先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分配其土地，甚至可没收其财产，但对其家属仍应按普通农民留下一些土地。

对一般中小地主可经过群众酝酿，采取要求仲裁的方式使其拿出土地，并且允许他保留的土地可多于普通农民的一倍（如农民每人分五亩则地主每人可留十亩），如系革命军人家属、干部家属或积极帮助抗日工作之开明地主，则他们所保留的土地又可多于一般地主的一倍。

对一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的部分绝不侵犯，而对其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财产除给其酌予保留一份外，均应分配。对经营地主即主要依靠剥削雇佣劳动的大土地所有者，应酌量分配其一部分土地、耕畜，但仍保持其当地一般富农的地位，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希望各省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按照占有土地的数量并照顾土地和家庭人口的比例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适当的定出区别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具体来源，以保证既能使基本群众获得地，又不侵犯一般富农的利益。

对自由职业者及孤寡，因无劳动力出租少量土地者，可不分其土地。

对富农除分配其出租土地外，不得侵犯其利益。

对佃富农必须确定他亦有按照一般农民分得土地的权利，不特别给分坏地，也不要因有牲口、房子而不分应分得的土地。

对农民应用一切方法吸收其参加斗争，给他分配清算斗争的果实，严防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侵犯其利益：

（1）靠城市集镇附近，地少人多，容易产生不照顾中农的推平土地。

（2）把伪满时当牌长、屯长的中农，当作汉奸分配其土地。

（3）中农害怕，自动拿出土地。

（4）中农出租极少数的土地亦被分配。

（5）佃农有马扣地。

（6）佃中农种地之土地的青苗被分配，没有得到所费人工、牛具、种籽等应有的补偿，如因此而已经侵犯了中农利益时，应说服贫、雇农给予退还或赔偿，雇农和贫农是斗争的先锋与骨干，必须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并应注意用各种方法吸收那些长期住在地主家里的雇工与劳金忠实的打头的参加斗争、揭发地主的黑幕，以提高其阶级觉悟不再受地主的欺哄麻痹，而不应对他们采取歧视和不理的态度。总之，我们的政策是使得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恶霸、豪绅、大地主、土匪头子。不树敌过多，但保持和巩固反内战、独裁统一战线。目前的斗争仍是在“反奸清算”、“分配敌伪土产”、“打土匪分匪产”、“反霸占”、“反窝主”、“反贪污”的口号下，实际上达到解决土地问题。

（三）改革土地运动中几个具体问题：

（1）分地的标准：地有多寡、好坏、远近不同，应以自然村（屯）或行政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照顾到给贫苦的革命军人家庭分好地，给特别贫苦的农民多分食粮并解决牲畜、房屋、农具，使其能安家生产，其具体办法由群众讨论规定。

（2）青苗的处理：青苗随地转移，如系佃户租种地的青苗，可按其经济状况由分得地的人给以适当的补及，或者如佃户贫穷亦可向分得地者交料①，由农会根据情况以民主方式处理。

（3）对地主献地的态度：在群众未发动前，地主小恩小惠拿出部分土地，以拉拢欺骗群众避免斗争，应揭穿其阴谋，并顺手牵羊追其交出全部应分配的土地，但当群众斗争展开后，对一般的中小地主自动献地土地应予接受，并给面子多留一点土地，而对基本群众则应加强阶级教育，不为地主的欺哄所蒙蔽。至于对地主成份的干部家属献出土地，应予以适当的表扬，准分地后，应迅速发给群众地照，焚毁地主原来的契约，并特别注意以分牲畜、贷款、买牛马、变工调济畜力等办法解决贫、雇农耕畜缺乏的困难，以准备展开明年的大生产运动。

（4）对汉奸应有标准，防止乱戴帽子，以稳定中农和一般富农。对仅仅当过伪满职员或牌长、屯长的中农和富裕中农，不能按汉奸没收其土地，如系群众所痛恨者，也只能要他在群众面前认错，坦白悔过，不得侵犯其家庭经济利益。

（5）长期发动群众和平分配了土地的地方，结果均不彻底（如开拓、满拓地），必须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彻底分配土地，原来分配不妥当者应重新分土地。农会应在斗争中组织，使它实际上成为农村政权，贫农、中农均可参加，但保证雇农和贫农掌握领导权。富农开始不宜参加，待农会巩固后可个别的经过农会会员的同意吸收加入。

（6）在群众清算分地斗争中，每个工作团均须将收缴地主、顽匪的枪支武装积极农民，以巩固农民的情绪，保证自己既得的利益。

（7）搞分配土地后，各工作团应根据情况酌留少数同志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许多艰苦工作，教育和帮助积极分子，巩固群众组织，适当的解决群众的各种纠纷，以进一步奠定乡村工作的牢固基础。

（四）以上指示应在各级党委及所有工作团中进行传达讨论，并提出积极的、具体的步骤，争取时间，使群众的土地斗争更加推广和深入，加速东北根据地的创造。

东　北　局

① 原文如此。

中共中央对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你们发来的土地指示，尚未收到。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

（二）但八月十九日电的基本精神，同样可以运用在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中。特别是（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的不动富农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侵犯了中农的土地者，必须退还和赔偿。目前当山东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动起来，有些地区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之时，领导机关对上面三个问题，更须加紧注意。此外关于分配土地问题，必须适当处理，务使贫农、雇农得到应有的土地；发地照，解决贫雇农的耕畜、农具、种子，提高群众生产热忱，准备明年生产等问题，应迅速解决。务使明年解放区的生产运动，有一极大的发展。

（三）目前山东应否由政府制订法令公布，你们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来决定，但如果征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抗日地主和抗属地主的土地，则可暂缓。因为在基本的解决了土地之后，是否紧接着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此问题值得慎重考虑。

9

1

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解放日报》社论

半年以来，解放区普遍地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件有空前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土地改革是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内容。真正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的血腥剥削中解放出来，将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回到农民的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这样便能“使农业从落后的水平进到近代化的水平，从而使工业获得市场，造成了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毛泽东）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完全证明：只要当土地“回了老家”，农民取得了“命根子”、“饭碗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空前的提高了。生产量就大大提高，有的地方已做到耕三余一，个别的甚至做到耕一余三。农村赤贫消灭，乞丐、偷盗绝迹，雇、贫农大批升为中农、富农，市场欣欣向荣，小工业蓬勃发展。解放区的这种兴旺气象，正是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指标。

在今天的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同时又是粉碎蒋军进攻，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根本关键。五个多月来自卫战的经验证明了，那里的土地改革做得好，那里的群众参加爱国自卫战争便越加坚决，胜仗也打得越多。如苏皖农民翻身以后，参战情绪十分高涨。泰兴新街区五千余户雇农、贫农平均每户得地三亩余，接着便有九百四十人自动参军，另有八百人涌入民兵。在泰兴北宜家堡战斗中，参加担架运输的农民就有一万二千人，几乎全部壮丁都参战。晋冀鲁豫有一千余万农民获得土地，民兵发展到二百多万，成千成万的青壮农民涌入主力军，各县成立了翻身营、翻身团，作为有力的地方武装参加战斗。正如刘伯承将军所说：“我军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军士气日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他们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

再以冀东为例，该区在自卫战争中游击战打得很好，其原因也在于彻底进行了土地改革。该区二十四县中，有三百万人得到了土地，群众参军非常踊跃。民兵的作战，三个月来每个分区至少一千五百次。遵化一县的民兵，一个月作战一百十二次，毙伤俘敌八十八人。尤其是掩护群众转移，监视特务分子，防止投敌，作用极大，至今遵化敌人只能困守孤城，乡村中投敌的没有几个。

半年来的经验证明了有一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那种观念认为：在自卫战争中不可能同时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要进行自卫战便不能不放松土地改革，自卫战与土地改革是两个阶段的工作，等等。事实究竟怎样呢？事实正表现出：自卫战急切地要求旺盛的革命精力，而土地

改革恰恰是提供这种精力的泉源。山东沂源县中心区，原先动员民伕很困难，后来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都分到了地，他们便都自动踊跃参加，连原来领到的工钱也要退回给公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另一面，自卫战在一定程度上又能进一步鼓舞农民翻身与保护土地改革。那里的土地改革与自卫战结合得越好，那里的土地改革与自卫战便越有成绩。苏皖、晋冀鲁豫、山东和冀东的农民，在这方面有很多新创造。他们在边沿区，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同时坚持游击战争与土地改革的方针。如苏中南通某乡农民手执武器，坚决打击下乡抢掠的“还乡团”，同时掀起了三天三夜的清算运动，全部农民得到了土地。苏中一分区某县农民开会清算恶霸土地时，突遭蒋军袭击，他们即以一部分人配合有名的郭海波游击队对蒋军展开战斗，另外的人仍坚持开会，完成了清算的工作。他们创造了一面打游击，一面在高梁地里算账；白天打游击，夜里算账；轮流担任战争勤务，轮流算账；男人参战，女人算账等等办法。晋冀鲁豫赞皇县东坛山村的农民，入夜由翻身队和民兵担任警戒，同时展开土地改革。山东高密县柏城区的群众先把老小家属搬往后方的亲友家里，自己则在炮声隆隆中进行清算斗争。在暂被蒋军侵占的地区或游击区，他们就组织武工队或翻身团向前挺进，摧毁蒋方特务组织和反动政权，建立起民主政权，逮捕罪大恶极的奸霸，追还其从群众手中夺去的果实，分给群众，然后进行土地改革，并适当照顾地主。他们在中心地区，则用全力进行土地改革，对供应民伕，采取轮流担任的制度，例如在山东采取民伕常备制，保证经常有大部分农民留在家中可以安心进行翻身工作。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很好的，各地都可以参考推行。

大半年来各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已接近完成，有的地区还开首不久，还有的粗看是“基本上完成”了，但过细检查，农民还是“翻了个 空 身 ”，或者“翻了半个身”。这种情况之造成，一方面因为各地区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客观情况，而主要的却决定于各地领导机关与负责干部的是否认真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及在执行这个政策中是否采取群众路线。为了迅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使我军更早的转入反攻，为了建立解放区民主建设的基础，我们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土地改革。在工作方才开始的地方，尤其应该尽可能集中大批干部，用全力去做。在已经有成绩的地方，切勿自满，要深入切实的检查，消灭空白村和明分暗不分的现象。务求做到在春耕以前基本上完成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艰巨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准备来春的大生产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

(甲)最近在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初步的经验如下：

一、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如与群众的诉苦清算运动相结合，决不会减弱群众运动，相反，大大加强群众运动，使群众的清算更加站在合法地位，使群众感觉有政府法令的保证而更敢于斗争，使地主感觉更非拿出全部余额土地不可。公债征购本身是一个发动群众的口号，只有在把它变成简单买卖关系时，才不能发动群众。

二、公债征购可以使地主把余额土地完全拿出，交给农民。因仅用清算、献地等办法，常不能把地主余额土地算完、献完，或献出坏地保留好地等。还有些农民也感觉某些清算的理由不充足，除清算献地等办法外，如再采用公债征购办法，则地主无法保留多余土地，且可使农民避免某些理由不充足的清算，使自己得到的土地更有合法的保证。在经验中证明许多地主宁愿献地，写献约，而不愿得公债卖地，写卖约。因地主感觉如写了卖约，以后再无借口收回土地。

三、有些抗日地主、开明士绅的土地不便清算者，可以公债征购。对于外国教堂、外国侨民的土地及其他某些公地，如用公债合法征购比用清算办法更可避免一些外交纠纷。

四、在必须取得某些个别富农的土地以分配给农民时，用公债购买的办法比用清算的办法使富农比较容易接受一些。

五、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能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

六、公债对于地主的生活亦有若干帮助，地主希望以公债缴纳逐年的公粮。

七、边区公债条例传到北平时，很得中外记者赞许，认为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有所变更，故土地公债的办法可使我们的土地改革增加一般的合法地位，减少中间派资产阶级的反对。

(乙)根据以上各项，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因为不是以公债征购的办法去代替清算、献地等办法、而是在采用清算、献地等办法之外，再增加一个征购的办法，多一个办法总比少一个办法要好。在陕甘宁边区也和各解放区一样，发动群众清算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这是由下而上的），但如果再加一个由上而下的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来配合，就更能发动群众，更能使土地问题迅速彻底而完全的解决。

刘少奇转发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①

兹将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报告转给你们，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是很好的。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对于这个报告应注意下列几点：

（一）对于地主，必须根据全体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意见来处理，对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的照顾，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愿，由领导上规定要留给这些地主多于中农一、两倍土地的规定是错误的，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必须让群众彻底斗争清算他一切土地财产，然后留给他最后生活。

（二）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其牲畜、工具等，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是不能不动的，但必须取得中农的赞成，向中农作详细解释，而且必须保存一部分富农经济（即在事实上允许农民发财），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以免引起中农的恐惧和动摇，因此，打乱平分及中间不动两头打乱平分的办法各地必须慎重采取。

（三）在各地所表现的左的错误，在于没有切实注意建立与经常保持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统一战线，在于对中农采取不谨慎不细心的态度，因而常常引起中农的恐慌动摇，或侵害中农利益，各地必须密切注意中农态度的任何波动，对中农采取密切联合政策，只要全部中农能和贫农一致，就不会有过左的冒险主义，而如果引起中农与贫农分裂就要成严重的冒险思想。

（四）我们各乡干部如有多占群众斗争果实及其他为群众所反对的行为，应充分发扬群众民主，让群众批评揭发及撤换最大的职务，不要阻碍群众，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相信自己作主人。为了使群众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应组织经常的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县区农民代表大会等，让农民选举，农民代表会暂时统治一切，并经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被群众批评和撤职的干部，应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调他们学习后改派工作，并在群众中对他们的错误负责。

---

①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附〕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关于我区土地改革情况及所询三个问题简报如下：

（甲）我区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对地主清算相当彻底，普遍的办法是"出题目做文章"，把地主土地财产全部搞出来，组织管理委员会，实行平均分配，在平均分配时有两种办法：一是中间不动两头动（中农除外的打乱平分），一是包括中农在内的全部皆动（打乱平分）。经过这一大运动后，地主大体消灭。运动的弱点是粗糙不深入。

秋后提出填平补齐运动（系根据太行武安，冀南故城两县经验提出），规模更大（老区亦卷入）更深入。内容是：（一）深入查田、查阶级、割封建尾巴（消灭封建残余），清查遗漏、隐瞒、干部包庇和假卖假分，做到彻底取消地主这个阶级。（二）干部、积极分子、民兵占取土地改革果实过多部分，采取各种方法令其退出，分给赤贫和贫农。（三）贫富合村，贫富村联合斗争，平分土地，达到消灭赤贫和贫农。在填平补齐运动中，对地主追究运动极猛烈，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全部重新分配，地下所埋藏的现金、衣物、器具等亦全部追出（发生了打与杀的流弊），填补了赤贫和贫农。对地主则先行扫地出门，然后由群众民主评议，赠送一些坏地、坏房以示宽大。对自私自利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落后群众，包庇地主替地主隐瞒财产，发动了广泛的挖"防空洞"运动，自私自利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落后群众坦白后，所有隐瞒包庇土地、财产等都追出来了。并采取换平办法，按远近地、好坏地、水旱地折合搭配，依全村人口土地比率一律平均分配（干部与群众同）；贫富村土地、财富悬殊甚大，单独进行不易消灭赤贫，则采取了富贫合村，富贫村联合斗争，共同分配果实办法；太行有些地区将贫村赤贫户移住富村，参与平均分配土地、财产；对干部家属、民主人士，则动员其自动献出多保留、多分得或隐瞒的土地、房屋、财产，对坚不献出者经过斗争解决。经过这样猛烈的运动后（去年十一月底到现在为最高潮），封建尾巴大体割掉了（但还有遗漏，特别发动群众较差地区）。得到两条重要经验：一条是在大运动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粗糙性和不深入性，比如落后群众未能全部发动，有些干部、积极分子自私自利多占果实，未能及时纠正，损害中农利益，中农恐惧等，这就给地主以空子可钻。而过去领导上恰恰就是在转折关头容易发生自满，忙于转入思想教育，转入生产或甚至忙于去反左倾等等，而忽视继续发动落后群众，彻底追查地主，因而每次运动都留了尾巴。此次在大运动过后（去年秋末），我们提出填平补齐运动，对地主采取"打死落水狗政策"一直追查，使地主无喘息躲闪的机会。二条是要想彻底消灭地主这个阶级，就必须发动落后群众，发动全体农民，凡单纯依靠干部、积极分子搞内货者（地藏及隐瞒），都走了弯路，而真正面向落后群众、注意思想发动的都找到了封建尾巴、地主阶级的隐避所，结果把地主阶级扫地出门了。

（乙）但最严重的问题，乃如你所指出的富农路线分配方法与贫农平均分配要求原则上相对抗。表现形式有：（一）区村干部、积极分子、民兵以功臣自居，普遍占有多而好的土地、房产、牲畜，窃取更多的现金、器具等。（二）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将没收汉奸或公共土地，房屋财产，占为已有，不让群众分配，并有用非法手段，占有应归群众分配的土地。名为生产，实则为少数干部把持。（三）原佃户、大佃户占有多而好的土地、房屋、牲

畜、现金、资财等。（四）县、区、村都有庞大的合作社，其基金多半为土地改革果实，包括土地、房屋，名义是群众性的，实则通年不分红，不报账，亦为少数干部把持。（五）在土地改革高潮中，有的地主自动将其土地、作坊等，献给政府、部队、机关、团体或投人公营商店合作社，其本人变成工属、抗属，经过干部包庇，把土地、房屋、财产保留起来。（六）有些干部其家庭系地主，在五四指示颁发后，火速把坏地卖出，保留好地，把资本投入公营商店、工厂、合作社、银行，其土地、财产转移保留。

填平补齐是全区性的动员群众更多的更深入的运动。为了开展这一运动，我们曾纠正了按有无租息、债务等纠纷问题分配土地的办法，指出清算等办法，只是为了在形式上取得合法，而终结目的则是为了达到平均分配土地，消灭赤贫和贫农；纠正了认为干部、积极分子、民兵有功劳应该多分果实的做法，指出他们多分土地，则等于赤贫和贫农分不到或分到很少土地，而土地改革目的，则要达到平均分配，消灭赤贫和贫农；提出政府、部队、机关、团体所占有的公地，没收汉奸地、借种地等等，应全部退出，交还群众分配。经验证明，要政府、部队、机关、团体退出土地，特别要干部打通思想，退出土地、财产等，抵抗极大，搞重了叫做泼冷水，说是“卸了磨子杀了驴”，搞轻了搞不出来，经过三、四个月运动后，创造初步经验如下：

（一）进行干部洗脸擦黑运动。县、区干部首先反省割尾巴，“匀出”多占果实（不要叫退出），起示范作用，一面开党员、村干、积极分子训练班，打通思想，效法县、区干部亦“匀出”果实。解决思想问题有两条：一是大家一起翻身有力量，毛主席是领导咱少数人翻身，还是领导大家都翻身；一是你革命是为自己发财还是为人民服务，自己翻了身不要忘记了穷兄弟；把这两条反复教育，达到干部自觉，即可进行平均分配，干部多分果实即可退出。

（二）干部、积极分子思想不易打通时，提出“团结互助大家翻身”及“拥干爱民”的口号，上面给群众撑腰作主，启发其诉苦，提出不满意见；同时教育群众认识干部翻身有功，只要改正错误，拿出多得果实，应该原谅并爱护干部；在群众有充分材料、有大力压迫和有热情感动下，干部思想普遍能打通，自愿退出多占果实，改变作风，重获群众拥护。关键在于做到干部自动退出，不要处于被动。此时要严防坏人利用群众，打击干部。左权黄甫束玉所著《周喜生作风转变》，太行光明剧团所编《改变旧作风》两剧本均反映此种情况，成为此时期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好材料。

（三）对少数极顽抗分子，经过上述努力仍不觉悟者：如系县、区干部，予以严惩，直至开除党籍，并依法迫令其将多占果实退出；在村干政策上，放手让群众批评，撤换抵抗分子，表扬好的，配合上面教育，一般起很大作用，但不提反新贵运动。

（丙）关于所问三个问题初步意见如下：（一）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土地办法，在我区似不迫切需要，因我区土地问题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谁都认为分配土地是应该的，是大势所趋，清算就是分配土地（农民认为这是土地还家），这在地主及农民中间均已认为合法合理。但颁布这样法令亦无妨害，对解决干部家属及民主人士等的土地问题有好处，且可给群众多一层合法斗争的工具亦有好处。此外，我们认为在土地改革中，政府可颁布法令，规定在土地改革期间，禁止土地买卖；规定分配土地时，所有的人（干部、积极分子、民兵在内）不得超过一定平均数（即当地平均数）；政府、部队、机关、团体不得占有所谓生产地，应一律退出让群众分配，否则视为犯法，这对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有

莫大便利。在土地改革已完成区，则由政府另行颁布保护地权法令，并普行税契，对稳定各阶层生产情绪有好处。

（二）是否提出重新分配办法？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填平补齐运动实际就是重分，不过不叫重分，而个别地区、个别村庄，在经过群众路线的条件下，亦有直接叫重新分配土地者。所以我们决定在春耕前以大力进行填平补齐。春耕后结合生产运动仍继续进行。填补，争取在今年一年内，分得更公平合理，最后把所有权完全固定起来。

（三）关于转入生产的困难，主要有五点：一是怕富、怕斗争、怕割韭菜，不敢发家致富，这由于过去数年每年春天强调生产，秋后挨斗争所致。二是怕负担，因为负担很重，有的群众甚至因此不愿意分土地。三是靠斗争吃饭，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思想。四是有许多贫、雇农，虽然分得土地，但牲畜、农具甚缺乏，困难未解决，政府贷款不够用。五是支差多，战争勤务繁重，妨害生产。我们已严重注意到解决这一问题。在冬学中加强生产发家教育，解决一、二两项思想问题。在继续填补中，多分给贫、雇农牲畜及资材并提倡互助买牲畜等办法，科学计算减少支差，加强组织起来，节省劳动力，组织妇女、儿童参加生产等步骤。详细将另有报告。

朱德、刘少奇关于彻底完成冀东土改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

（一）关于彻底完成冀东土地改革，尽可能最高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及从富农手中取得土地问题，区党委及分局各次报告均悉。我们在听取刘慎之报告并与冀察晋中央局各同志商讨后，认为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伟大成绩，但还未彻底，地主还保留了过多的土地财产，富农土地一般未动，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仍未满足。因此，农民继续要求获得土地。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这种要求及其过去一切反对地主、富农的行动，必须拥护，不能反对。某些同志怀疑群众这些要求和行动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因而批评反对甚至咒骂与阻碍群众的行动，向群众泼冷水，助长地主、富农威风，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了地主、富农的影响，必须坚决在党内反对与肃清这种意见，然后才能团结一致领导全体农民彻底完成土地改革。

（二）为了尽可能最高限度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第一、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可从地主方面继续取得一部分土地财产填补给农民。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央前曾要你们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是过早的。但在彻底清算地主的土地财产时，仍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奸、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抗日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和区别。

第二、在复查地主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的运动，除对汉奸恶霸富农为群众所痛恨者应该清算斗争外，对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应以不动为原则。就是说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在每一乡、每一区应该保存几家富农不动，中农才不恐慌。

第三、必须坚决联合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但最近由地主、富农下降的中农可以除外），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密切注意中农情绪和态度的波动。凡是引起中农恐慌和反对的事，应劝告贫农停止进行。凡是中农同意和赞成的事，应大胆放手进行。

（三）我们认为热河分局二十六日给冀东的指示，在精神上是有缺点的，它不能鼓励群众运动。为了在党内进行土地改革教育，望你们翻印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所有干部阅读。

9

1

〔附〕一年来的解放区土地改革

于 光 远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进行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最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这个运动以八年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为基础，首先从去冬的反奸清算运动开始，然后发展到清理债务，回赎土地，清算敌伪统治时期贪污中饱，清算地主转嫁给农民的负担，以及清查减租，清查黑地等等。数月以后运动的目标——实现"耕者有其田"——更加明确，同时保证坚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照顾各色人等，照顾地主生活。七八月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大举进攻解放区，土地改革乃与自卫战争密切结合，迅速走向普遍深入与彻底。若干地区并在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举行翻身大检查，采用全村大评理，大仲裁等方式，彻底分，一场清，采用填平补齐办法，使土地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现大部地区正继续发动群众解决半生不熟村（翻身没有翻透的）空白村和更公平合理的分配斗争果实问题。

根据新华社电讯及各地方报纸材料，晋冀鲁豫全区至十月间已有二千万农民获得土地，每人所有土地可达三至六亩的标准。苏皖于十二月初已有一千五百万农民获得土地。山东全区一年来一千五百余万农民已分得土地，平均每人在二亩以上。晋绥新区宁武等十三县在最近四月内，共有七百五十六村五万一千四百余户得到土地，仅雁门五分区左云等六县农民所得土地即达五十万亩。晋察冀察哈尔全省土地改革于十月间初步完成。怀来等二十五县八六九村四十五万农民获得土地。热河于八月间即收回土地四十八万亩。东北解放区截至十月底止农民得地二千六百万亩，农民每人平均得地约达六亩至七亩。陕甘宁边区一部分未经土地革命地区已由边区政府决定，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期于明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关系。封建剥削者地主阶级大大削弱了，在土地改革实行彻底的地区，他们都已转向自己劳动或经营工商业，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量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许多的典型材料都证实这个趋势。如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三十七户增至五十五户（增百分之五十一），中农由四百六十四户增至九百五十户（增百分之九十一），贫农由六百三十八户减至三百八十九户（减百分之三十九），赤贫由一百八十九户减至七户（减百分之九十六）。苏皖石塘鹅钱土地改革后原来无地的十五户赤贫已全数上升，五百一十户贫农减为三百八十四户，即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一百六十三户中农增加为三百零三户，即增百分之八十六；原三十户富农，因中农一户上升及五户在乡小地主转入生产，增为三十六户，即增加百分之二十。

一年以来解放区这一伟大的变革，对全中国乃至对全世界将发生十分重大与深刻的影响。它首先把几千年来统治中国，使中国人民长期对于贫穷与黑暗状态，使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在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沦为半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封建土地制度，封建剥削关系在基本上消灭了。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农民，在解放区却已从封建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土地，从而使他们免于将他们生产物的大部以地租的形式，供给地主作不生产的消耗，而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使他们生产情绪大大提高，

改良耕作法。改良土地，进一步组织劳动互助，自由发展农业，发展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大大的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变革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使解放区农村迅速走向经济富裕、文化发达，为工业品扩大原料耕殖及开拓广阔市场，创立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其次，它巩固解放区人民以工农为核心的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联合政权树立牢固不拔的基础。一年来的事实再清楚没有地证明：只有民主联合政府，即使是地方性的，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崇高理想；同时又证明了土地改革又怎样有力地巩固了民主政权。由于广大翻了身的农民，真正参与和掌握了政权，这个政府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自己的十分有力和有效的工具。

最后，一年来的事实又证明，土地改革为当前争取全国独立民主和平的爱国自卫战争开发了无穷力量的源泉，为这一战争的胜利提供最可靠的保证。由翻身农民所组织的军队，结合广大翻身农民热烈的支援参战，这一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

由于解放区一年来真真实实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它就为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大大振奋和鼓励了在蒋管区的广大人民，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为他们指出了奋斗的方向。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改造。而蒋管区则在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下，继续保留浓厚的封建剥削制度，由半殖民地并日益沦为殖民地。这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两条路线鲜明的标志。八年的抗战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农民战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挣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实行各种民主改革。而土地改革是一切民主改革的根本。今天蒋介石不顾一切向解放区人民进攻，其根本目的仍是恢复便于其四大家族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社会制度，使八年抗战成为毫无意义的流血。一年来蒋介石御用机关拼命对解放区土地改革造谣污蔑，和与蒋军接踵而至的"还乡团""倒算队"的暴行，再一次说明了今天解放区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农民战争，是保卫解放区农民既得土地的战争。如果说抗战是已经胜利了，那么在今天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保证之下，谁能怀疑当前的爱国自卫战争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呢？

（原载《解放日报》1947年1月1日）

中共代表对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大提出书面抗议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哲生、铁城、力子、亮畴、雪艇、立夫、厉生、岳军先生公鉴，并转陈蒋主席赐鉴：敬启者：国大召集日期，原为政协议决事项之一。尔后延期，蒋主席亦征询政协综合小组同意，政府始公布延期命令。当时，傅会员斯年提议，定一召集日期，蒋主席以国大有关诸问题未商妥前不便定期为辞，未予接受。阅时七十日，有关国大诸问题不仅未曾商妥如故，并且从未一商。本月三日，为国民党一党执政机关之国防委员会，竟片面决定召集国大日期为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敝方闻之，不胜诧异。当即一再请求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乃未获贵方同意，而国民政府已于本月四日，明令公布矣。贵方此种举动，是否表示不管各党派意见如何，抑或将置政协于不顾，不能不令人发生疑虑。查政协决议，曾经蒋主席及各方代表在内，庄严起立表决，如有修改，亦须得各方同意。今贵方发表示若此，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敝方今向贵方郑重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敝方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其有关问题之主张。贵方如仍予拒绝，并因此而引起纠纷，其责任应由贵方负之。专此奉达敬颂公祺！

周恩来　董必武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李维汉　敬启

七月七日

（原载1946年7月10日《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为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向政府提出抗议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哲生、铁城、布雷、力子、雪艇、厉生、立夫、岳军并转
蒋主席赐鉴：敬启者，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因热心奔走和平民主运动，竟先后在昆明被暗杀致死，闻先生之公子亦伤重垂危，远道闻之，悲愤交集！政府既一面大举进攻鄂豫边、山东、山西及苏皖、苏北各解放区，准备造成全面内战；另一面，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中国号称反法西斯胜利国家，四项诺言，言犹在耳，而特务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国。殴打未已，暗杀继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据昆明来信所云，李先生被难之日，即有再杀闻先生之风传，令其言果验，岂属偶然！且李、闻两先生之外，还说重庆有邓初民先生等，上海有沈钧儒、罗隆基先生等，皆为暗杀对象。人心惶惶，举国震怒，政府当局如果从此悔悟，犹惧春秋笔伐，应急起制止，以谋善后。恩来等闻此凶耗，夜不成寐，除对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事件表示严重抗议外，特要求政府立即采取下列措施，并以明令公布全国：

（一）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问罪，并由政协派员陪审。

（二）先葬死者，通令全国追悼，并给死者家属以抚恤。

（三）严格责成各地政府及军警机关，负责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四）重申四项诺言，彻底予以实施。

（五）彻查政协会议以后各地所发生之惨案，并应惩办祸首。

（六）取消一切特务机关。

（七）释放一切政治犯。

恩来等认为政府必须实行上列各项最低要求，方足表示政府有重返和平、民主之意。特此奉达，并希于三日内赐复，无任企盼，并颂

公祺

周恩来　董必武　吴玉章　邓颖超　李维汉　谨　启

七月十七日

（原载1946年7月18日《新华日报》）

〔附〕民盟为李闻二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哲生、雪艇、铁城、亮畴、力子、立夫、厉生、岳军诸先生并请转陈蒋主席钧鉴：本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委李公朴同志于本月十一日在昆遭暴徒狙击身死。正惊痛间，而本同盟中执委兼云南省支部常委闻一多同志，又于十五日与其子义和，在昆遭遇同样狙击，闻君当场身死，其子重伤后亦复不治。查此两案其为政治性暗杀，毫无疑问，与上次本同盟所抗议西安秦风日报李敷仁、王任之惨死案事同一律。前案尚未解决，而此两案又连续发生，则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

（一）李公朴、闻一多、李敷仁、王任诸君，始终站在本同盟立场，从事民主运动，其主张无外于要求民主、和平，其行动不出乎作言论号召，在不犯法之范围内，而遭摧残至此，则政府究竟是否准许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动之自由？假如不犯法的政治活动是政府所准许，则政府为何又容许此种非法摧残之事在南北各地继续不断演出？假如政府对于此类非法摧残是不容许的，则本同盟上次抗议之西安惨案，为何至今不查明严办？

（二）政府既以实施宪政号召国人，一再公开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而数月来如秦风报事件，如西安昆明各惨案，皆显然地一致地为向本同盟施以摧残压迫，则政府是否准许各政党之合法存在？对于和平公开之政治结社竟如此摧残，是否不惜驱迫其转为地下活动暴力革命？如或不然，则何以不见对于本同盟予以有效之保障？政府今后是否能负责保障一切和平而公开之政党活动？

以上各节请予明白答复，以释群疑。此外关于昆明惨案之善后，本同盟复有下列各项要求：

（一）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本同盟所推派之人员同赴昆明进行调查惨案真象，早日公诸社会。

（二）政府对本案正凶及主使者，应依法究办，其审判时并应准本同盟推派之法律专家列席参加。

（三）政府对于惨案发生时，应负责任之地方治安长官应即予以撤惩。

（四）政府应对于李、闻二君之遗属特加抚恤，并负担其子女教育费用。

（五）政府对于目前因惨案威胁而避入昆明美领事馆之本盟领导人潘光旦等十一教授以及一般民主人士，均应切实负责保护其身体安全及自由。

（六）政府立即撤销国民党党部及军事机关之调查统计局，以后设置情报机关，并应保证不作对内政治斗争之用。

再则，昆明惨案发生以前，早经传说有所谓黑名单，李闻二君均属首列，事后果一一如其所传不虚，据闻此外列名其间者，尚有本同盟政协代表及各地负责者数人，并此提请政府注意为幸。专此函陈，伫候复教，顺颂政祺。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同启。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摘自《群众》周刊第12卷第1期）

周恩来招待记者说明时局重要问题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同志今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事先分发油印《群众》第十二卷第四、五期合刊社论摘要，并表示此为中共对时局正式意见。招待会上周恩来同志答复各报记者询问。对最近期内和平商谈情况及严重的内战形势有极详细说明。

问：蒋主席文告发表后，商谈经过如何，内容可见告否？

答：这十多天内没有商谈，蒋主席发表文告前，政府经司徒大使提出五项要求，我们已拒绝了。从此以后，马歇尔特使与司徒大使宣布谈判陷入僵局，调解困难。过了几天，蒋主席文告发表，内容仅是旧调重弹，要中共退出几个地区，这是继续内战的文告。随后马歇尔特使与司徒大使有这样一个意见，即可否现在来谈改组国府委员会，我们的回答是：本来依政协精神，是先停战后改组政府。不过，停战从六月谈到八月，未得解决。为使国民党放心，先谈改组政府问题来促成停战，也未始不可以。不过有两个问题要弄清楚：一是改组政府问题谈清楚时，是否马上停战。二是改组政府谈清楚后，政府是否放弃前次所提的五项条件。假使能如此，则谈改组政府问题自来得容易，因为按照政协改组政府的决议，只有两点需要谈：（一）是国民党外二十名府委的分配问题；（二）是保障政协和平纲领的执行的否决权的问题。问题在政府有否诚意。象现在的打法，是表示国民党不想改组政府或拒绝中共参加政府。我们这样怀疑是有根据的。政府并不放弃五项条件，只说换个题目来谈谈，对无条件停战又不愿意，所以要弄清楚。不然，会拖下去。六月谈判已解决了问题的百分之九十，即王世杰也说已解决百分之八十五了，最后国民党提出要中共撤四个地区，使谈判拖延不决，后来变成五个地区。明知中共无法答应，以此来拖。现在又谈改组政府，若不弄清楚，又可能拖几个月。国民党就是用“拖”来蒙骗要求和平的人民，欺瞒世界舆论，“中国没有内战”，以便获更多美国援助。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拖中大打的现象，应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

问：今日报载蒋主席同意停战，但要中共先退出苏北津浦线，此种办法有助于问题解决否？

答：不可能的。六月谈判中共让步极大，最后政府提出由四地区撤退，我们不能接受。一、此一要求违反政协决议；二、解放区民选政府无处可撤，只有：如认民主不够扩大，再来选举；三、政府理由是“威胁和平”，“妨碍交通”，不成问题这是违反政协决议的战争口号。本此三点，我们所以拒绝政府的不接受就打的态度。我们要和平，但决不屈服，只有动员全解放区人民抵抗。这样使人民流离失所的内战，国民党竟说是看热闹，好残忍！但是打决没有结果，六月七日以来，国民党已损失了六万人，战斗中损失比我们大。蒋主席尚在

口口声声说遵守政协决议，为什么要破坏政协来争取几块地方？对此种无理要求如答应了，是我们也破坏政协，故我们肯定拒绝，绝对不考虑。

问：对马司调处的观感如何？

答：调处问题，越来越复杂。马歇尔特使来华是在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公告之后，马歇尔根据的是杜鲁门的声明来调解。在一、二、三三个月成立了那么多协议，这不能不说是马歇尔特使直接间接努力的成绩，我们感谢他。但以后形势变了，东北大打，随之全国大打，此时美国扩大帮助国民党鼓励他打内战，我们不能不批评。六月谈判紧张的时候，美政府忽宣布军事援助计划，这是鼓励国民党内战。现在内战扩大，彼得生又来华要转卖三亿五千万到五亿美金的军火卡车等物，这使我们不能不反对。这情形如继续扩大，可使马司调解无效。我们是希望马司调解成功，杜鲁门声明实现，但美政府必须改变四个月来的错误政策，马司才能成功。

问：美国政策可能改变否？

答：我们把这问题诉之全国全世界舆论，我们不能蒙蔽舆论。国民党已将所有九十一个军的八十个军二百七十一个师用于内战，人数达二百万以上，占总兵力百分之八十六。东北已增兵至十个军，战事也爆发了。这是二十年来空前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出动了陆海空三军还不够，正准备用毒气，我们要向世界指出这是大规模内战。我们欢迎美国调处，但反对片面帮助，相信不相信我们，全世界正义人士都会回答这问题。全世界舆论、参加莫斯科三国会议各国以及整个联合国都有责任。

问：中共军事力量如何？

答：一月十三日后关内一百二十万人，关外大约五十万人，至四月止，关内已复员四分之一，现在情形不清楚。过去国民党方面常责中共不把军队名单地点交执行部，这个问题我过去不愿提，现时应该说明：在战事不停情况下，我们怎能将军队情形告诉美国代表？因为美国有二重身份，一方面是调处中间人，但军事上是国民党的帮助者，我们如何能不保守一点秘密？我们原拟东北停战后就交出，但东北战事停不下来，关内又大打，故复员情形不能提出。我们不愿象国民党把师变旅，原封不动，做表面文章。

问：李立三的任务如何？

答：李立三为中共负责人之一，参加东北调处工作，现为林彪代表。我们共产党的三分之一中央委员，都参加了调处工作，这是我党最大诚意的表现。而国民党在北平负责的人，又是什么人？做什么事的？大家都清楚。从此亦可见谁有诚意与力谋和平。

问：李先念部停战谈判进行如何？

答：在老河口曾成立一协定，国民党军停止追击，李部派代表前来接洽，但这第一步要先停止追击，否则问题不得解决。李先念电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处长周子健为代表，周被无理侮辱。李部又派出三代表赴西安，事先通知姓名时间，但迄今三人下落不明。我们要求政府保护小组去李部，政府又加以拒绝，说是通不过，又说李部已打散了，如此以人民为刍狗。我可以说一句：李部绝对打不散，将来问题更大！我们愿意受调处，将李部转移解放区，但得不到解决。

问：和平之获得要靠什么力量？

答：第一是人民的力量。人民有力量，且一定能制止这内战。第二是对峙的两党要有和平决心，我们是有此决心的。我们随时主张无条件停战，这要希望国民党领导者的觉悟。第

三才是国际因素。三个因素中最可靠的是人民的力量。

问：英、加二国大使是否已参加调处？

答：中国问题决不单是中国一国的事，如调处仍照现状，我想联合国不会不关心；至于如何关心或咨询，我不清楚。

（原载1946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沪地人士政治认识大有进步*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

周　恩　来

一、今日返宁，故意未见马①、司②。

二、直接与沪地人士接触，深感一般政治认识大有进步。在蒋美实际教育下，多能认破蒋政权之无望及美帝国主义之实质。有人对沪商人说：过去怕共产党，将来要不怕共产党，而怕国民党。商人答：现在已经如此。民盟及昆明教授张奚若③、钱端升④等，都同意我目前之揭露蒋及逼美表明态度的政策。黄炎培⑤见罗迈⑥就问战事如何，并谓民主决定于战争的胜利。一般人士对我作战非常关心。最近多次胜利，影响很好。他们认为，对美批评极为适时。钱直接说：蒋还不是靠他的洋爸爸！此次我反对美转让剩余物资，一般反映甚好，更使一般人认识美之助蒋内战政策。一年来，美军在沪之横行及美货之充斥，不满美之情绪遍于民间。我逼美政策之转变，条件已成熟。对美斗争虽曲折复杂，但已不如过去想象之难。

三、少数左倾分子有速胜论情绪，但中间分子经证明均承认有半年大打。马歇尔现在虽认为国民党军无内战信心，但战争是长期的，需打一年半载。另据确讯，国民党现存美军火尚够半年之用。

四、现沪上层民主分子多关心我之一切做法。我告以：我们仍主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如蒋继续内战，仍行拖骗政策，我即停止商谈；如蒋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他先分裂，我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美方仍助蒋内战，不撤兵停助，我即宣布美方调处失败，执行部失去效力。那时，不仅美国人民要说话，三国公告⑦签字国及联合国也要说话。他们皆同意并认为应说明：只有在无条件停战及照政协整军等决议办事基础上才能与美蒋谈判；否则，可于谈判失败后即赴沪商讨联合行动及宪草，以利逼美表明态度；否则，谈判暂告结束，唤起美国人民及各国出来说话。

五、下午，吴铁城⑧、张厉生⑨来谈，我们告以不保证停战及放弃五条⑩，照政协办事，对改组政府便无从谈起。吴、张对停战闪烁其辞，已说明不能保证，故不正式会商一次，会即告失败。

---

* 这是周恩来从南京发给中共中央并转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的电报。

注　释

①、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职业军人，政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回国。

②、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③、张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陕西朝邑（今大荔）人。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为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④、钱端升，一九〇〇年生，上海市人。抗日战争时期，为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外交学会副会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⑤、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故又称黄任老），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举人。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一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⑥、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一九五七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⑦、三国公告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发表的公报。其中有关中国方面的内容是重申三国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此后苏联政府履行了这个协议，而美国政府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⑧、吴铁城（一八八八——一九五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九二四年任广东革命政府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广东警卫军司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九月是国共谈判改组政府问题五人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

⑨、张厉生，生于一九〇〇年，河北乐亭人。当时是国共谈判改组政府问题五人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

⑩、五条指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五项条件。其内容是：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撤出苏皖边区；二、撤出胶济线；三、撤出承德与承德以南地区；四、东北在十月半前退至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北半省与延吉；五、山东山西两省须撤出六月七日后中共占领地区。”这是国民党政府为阻挠和破坏全面停战和商谈改组政府而提出的无理要求，因而当即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断然拒绝。

周恩来将军向马歇尔两提备忘录
抗议美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南京二十七日电）周恩来将军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于本月十四、十五两日，连续致送马歇尔备忘录两份，反对美国政府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内战空前扩大，并通过马歇尔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冻结剩余物资，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兹将该备忘录两份，分志于后：

（一）

马歇尔将军：

阁下调处中国内争，抵华之最初三个月，曾被认为极大成功。但其初步成就，未能使之持久，国民党政府过时未久，即撕毁协定，并对中共解放区发动攻势，从东北打到关内，致使阁下失败。

目前内战席卷全国，和平谈判形成为政府当局放手大打之烟幕，于分析此种严重局势时，不能不认为仅仅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之财政军火与物资的援助，即已大有助于政府当局之进行内战。回忆自中国抗战至今，据已知者，美政府曾予中国十四项借款，总计约十三亿一四五、二〇〇美元，加予各种转账，中国政府现在美存款，尚有七万万美元之巨。此外，自一九四二年起，在租借法案项下，据七月二十一日联合社讯，美政府曾交中国总值十五万万美元以上武器及作战物资，其中约有五分之三系胜利以后始给予中国者。过去十二个月间国民党政府对此巨量物资大事挥霍，实际上仅仅支助其全面反共战争，未作他用。最近反共战争正如火如荼之际，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订约让售价值八万万二千五百万美元之剩余物资与设备，这种火上加油的办法，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之不安与愤怒。兹请阁下注意：美政府此类行动，实未合于去岁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所云美国之帮助不致扩展内争，形成中国任何内争方面之军事干涉。中共一经获悉售卖剩余物资之谈判在进行中，即于八月二十三日向阁下提出抗议，反对在此时进行售让，并指出此项行动所引起之严重后果。然此种买卖竟不顾吾人抗议而于八月三十一日签定。因此余今复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一亿四千万人民，对于此项交易，经过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该约所列之物资船舶等全部冻结。鉴于美国政府一再宣称其在中国无其它目的，仅为促进交战党派间之和平团结，我们希望经过阁下之努力，务使这一要求能够实现，以灭战祸，而安中国人心，并盼早日得到阁下回答，并候起居。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

（二）

马歇尔阁下：

自从六月休战未得结果以来，三人会议即停会，至今未予开会。在阁下停会时之用意原

期另辟途径，寻求停战之方法，不意政府当局竟利用停会之便，拖延时日，大打内战。七月初的五人会议，七月中以后司徒博士的调处，八月十号阁下与司徒博士的联合声明，最近一月司徒博士关于非正式五人小组的提议，均被政府当局用作边打边谈，以便掩盖其拖延中大打的烟幕。

为求和平，中共方面不惜委曲求全，甚至同意先商谈国府改组问题以冀取得停战保证。乃政府拖延至今，不仅对停战问题不给任何保证，并且还声明在停战前中共必需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同时又暗示在国大前行政院不能改组，而政府军已经进占地区仍需进占之。此次国民党政府不仅无意于停战并将五项要求复提，且连政协决议已经规定之程序都一一推翻之，此实为政府当局违反停战协定与推翻政协决议最好事证。而事证之最明显不过者，厥为全国内停严重存在与发展。自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时起，至八月止，政府军违令调动军队至一百六十个师（或旅）之多，使用于进攻中共解放区前线之正规部队，竟达二百零五个师（或旅），在一百七十四万人以上，占其全部兵额二百五十六个师（或旅），二百零六万人的百分之八十五，进攻各地之大小战斗有六千余次，侵占而未退之城市七十六个（截至九月止）。现时战争，不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均在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之中，承德则已被占，张家口、淮阴、（按该地现已被蒋军侵占）、哈尔滨等城遂成为政府军进攻之目标，锦承铁路既被攻占，于是长春、平古、平绥、同浦、正太、胶济、陇海、津浦、平汉等沿线之战事亦随之扩大。国民党作战之部队，名为整编，实际上今日一师定额业已超过过去一军实数，复员变成动员，征兵师管区业已恢复六十余处，亦即增加六十余师。扩兵不足，大编伪军，山东、山西更复留用日俘，改名换姓，以图蒙蔽。战局发展至此，不仅不会停战，且协定全被破坏无余，而其发动情形已超过一月停战以前状况，且其规模之大，乃为二十年来内战所无。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获得如此巨大的美国援助，使内战空前未有。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租借法案之军火物资，即依美政府所宣布者，已于战时所得之数目字相等（均为六亿余美元），其实数尚不止此。美械师使用在对日战争中者，仅印缅远征军及最后一次湘西之役，而今日美械师几已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不足，助之以美军海空运输；犹不足，助之以美军防守铁路、城镇与海港，乃至协同进攻；仍不足，竟于六月休战协商之际，美国政府公布延长对华租借法案十年之提案于国会，以助长国民党政府之杀气；仍不足，更于今日内战正在发展之际，美国政府竟让售价值八亿二千五百万美金剩余物资船舶与设备予国民党政府。美国政府此种巨大援助与武装干涉，试问置其全权代表如阁下及司徒大使作为居间调解者于何地？尤其使阁下以指导军事调处之三人会议主席的资格，更处于难堪之地位。美国政府如其不欲美国全权代表作为国共争执之真正居间调解人，而听其受人指摘则已，否则不能不考虑到有改变其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错误政策之必要，撤退驻华美军，冻结剩余物资，停止一切援助，以便阁下及司徒博士得以实行公正调处，然后中国之和平方有大望，中美两大民族之合作，亦将受益于无穷。凡此愿阁下深思之。

六月休战以来，一切迂回曲折之做法均已试验失败，无补时难，且便于好战者拖延时日，蒙蔽舆论，扩大战局，祸害人民，因此我现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之地位，特向阁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提出直接了当开门见山之办法，请阁下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问题，立即停止中国内战，此为全国人民之愿望，为全世界人民之愿望，阁下来华之使命亦基于此。阁下之居于调解人地位，担任三人会议主席，系由国共双方延请阁下协商停战而来，北平执行部与长春分部之得成立，停战小组之派遣，亦由国共双方成立停战协定而产生。今天

局势显已如此严重，唯一之希望只有仍成立唯一合法之停战机构，协商停战办法以求直接解决。阁下为三人会议主席，请转致此意于政府代表，并请规定开会时日，愈早愈好，以便集议，谨候阁下之通知，此致敬意。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

反对蒋介石卖国协定

（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

《解放日报》社论

今日本报转载美国杂志《世界报导》消息"中国（指蒋介石国民党）为了获得购买八亿余元美军剩余物资的权利，已允许美国军舰在三十年内可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这是蒋介石对美国订立的又一秘密卖国协定，依此美国便得自由、出入、使用，并实际上是占领了我国的一切海港，只此一宗，蒋介石的卖国罪恶已不容于诛。

可是，在这次卖国交易中，蒋介石所拍卖的中国主权，却远不止此。八月三十一日让售物资合约成立，蒋介石政府即与美方陈纳德订立合同，授权陈纳德组织空运队在中国各地飞航，至本月一日，该队已开始飞航。随着九月二日，蒋介石政府又与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政府签订上海、马尼拉间的飞机降落协定，于是，中国领空权被蒋介石陆续出卖乾净了。九月十九日，在美代表提议下，在沪举行的联总远东区委员会通过了《载运联总物资至长江四口岸（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案。同时期中，蒋政府并已准许美国轮船自琉球驶入及停泊于我台湾之基隆及高雄两要港，于是，内河及沿海航行权又被蒋介石出卖完了。据九月十二日沪大公报载：美方投资粤汉铁路之"合作"计划已具体化，在六千一百万美金的投资总额中，美方占三分之二，于是，这一横贯南北的交通命脉之主权又非复我有了。据九月七日沪商报载；台省公署宣称："台省之各种企业，欢迎美英及联合国方面之投资，尤其农林工矿及交通方面，欢迎外商之直接投资"。又据中央社九月六日讯：美方"中美工商协进会"代表即将来华，飞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作"投资西南各项建设前之初步考察"，于是，我国的各种经济资源的主权眼看着又将装到美帝国主义的口袋里去了。

看吧！在这短短一个月内，蒋介石又把我们国家的主权陆陆续续的拍卖得如此之多，造成了中外古今卖国罪行的新记录。蒋介石为了获得购买八亿余元美军剩余物资的权利，就是说为要当美帝国主义的顺从的儿皇帝，换得剩余物资来进行内战，屠杀人民，才这样放肆地卖国。另一方面，全国同胞从这里看得很清楚，美帝国主义所以要让售八亿余元物资给蒋介石，支持蒋介石继续与扩大内战，就是要我们全国同胞都作美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而蒋介石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已。但是我们全国人民是誓死也不愿做亡国奴的。我们誓死反对蒋介石签定的一切卖国协定，誓死把我们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斗争一直进行到最后胜利。

立即解散非法的“国大”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解放日报》社论

蒋介石曾经希望他不顾共产党和人民的反对而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即使共产党不参加，第三方面还是会参加；即使第三方面也不参加，拉上青年党或民社党的若干人物点缀一下，还是可以蒙混一些中国的舆论界；即使蒙混不了中国的舆论界，还是可以蒙混一些外国的舆论界，至少总会有些不明真相者说他是偿了“还政于民”的宿愿之类。他是没有料到这出戏演出来竟至如此难堪，踏破铁鞋无处觅到一个喝彩的看客。在国内，温和的大公报把蒋介石关于“国大”和“制宪”的计划，比之为秦始皇的计划：“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这种思想专制，在主观上是无比的凶暴，在客观上是迫使国家分裂，天下大乱”。在国外，不但苏联的广播评论员，而且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星报、甘萨斯星报、圣路易斯邮报、以至素来替蒋介石捧场的纽约时报，都共同宣告蒋介石“国大”的欺骗性、分裂性和失败性。“国大”十天预备会，争夺主席团的丑剧闹得愈热，看客就看得愈冷。在这种狼狈情形之下，“国大”中除了十年前就已弄得很不名誉的那批旧“代表”（其中还有不少人谢绝出场）以外，几乎人人都要向社会表明苦衷，或者乞怜于后世历史家之公断，以图挽救其公开出卖的政治节操。甚至与“国大”无直接瓜葛的某些美国人，也要远走避嫌，躲开南京的瘟疫。拒绝参加“国大”与否，已被公认为忠奸善恶的分界，“曾琦第二”的头衔，已与汉奸一样可耻！世界之大，竟没有一个有常识的人考虑这个“国大”会通过一个什么有利的民主的宪法，会丝毫减少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自己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当然是种瓜得瓜自作自受！但是他为了逞个人的私欲，不惜拿国家的地位来做孤注一掷的牺牲品，这却使一切爱国者不能不痛愤抗议。

事到于今，还能有什么解救办法没有呢？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美国圣路易斯邮报的建议：该报说：“‘国民大会’企图为持续国民党统治粉饰，怀有此项故弄玄虚企图之人，咸信（或至少希望）他国家系易于欺瞒者。此项伪装将无济于事，其骗局亦极明显。蒋氏之上策，乃为解散‘国大’，继即退而促使中国成立一代表性政府。盖建立此项政府，本即渠之革命目标也”。末了一句话，表明圣路易斯邮报何等老实，则还承认建立代表性的政府是蒋介石的“革命目标”！而连这样老实的旁观者，也起来要求蒋介石解散“国大”，又可见这个“国大”是如何非解散不可。我们没有比圣路易斯邮报更“激烈”的见解，我们要求蒋介石立即解散这个确定独裁、确定分裂、贻笑万邦、遗臭万年的“国大”，恢复政协决议与一月停战令的效力。这些协定虽然被蒋介石片面撕毁，我们是仍旧坚持为它们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

早在去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他向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报告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蒋介石说：

“不顾广大人民及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性，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的。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共产党人从那时起，就要求蒋介石不要走这条绝路，因此而有去年日本投降后的重庆谈判，因此而有今年一月的政协决议，因此而有今年六月直至十一月的南京谈判。因此，直至所谓“国大”开幕的前夜，中共还建议它停开。但是，不幸蒋介石偏要“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偏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绳索还没有到永远解不开的时候，但是蒋介石有没有这样的聪明和勇气来系铃解铃呢？国民党内有头脑的观察家、国民党外有头脑的观察家、外国中立的观察家、外国亲蒋介石的观察家，都认为实行所谓“国民大会”的分裂方针，对于蒋介石乃是一条死路。大公报二十一日的社评，引用吕氏春秋上武王伐纣的故事，暗示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已经陷于商纣末日的险境。纽约先锋论坛报十三日的社论说：“遵守民主之中国领袖若能在国大中占优势，则诚为值得庆幸之事，若彼等未有此项力量，则国大所产生之宪法可能成为反动之账本”。十三日“国大”还没有开，到了十九日该报就证实了在“国大”开幕时，“听蒋主席演说的都是反动分子”，并且预见蒋介石即令还可以继续从美国获得内战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仍是“一局输棋”。蒋介石的政治棋局已经输光了，他的军事棋局眼看也要输光，但是无论是蒋介石本人也好，蒋介石部下的CC集团也好（他们是“国大”的主要组织者），蒋介石部下的军阀集团也好（他们正在继续组织进攻解放区的战争），他们似乎都失去了必要的理智来倾听中共和国内外各方的警告了。据确实的消息说，蒋介石在“国大”开幕时，因为看到失败的袭来而十分懊丧。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心反动到底。我们共产党人是提倡与人为善的，如果蒋介石现在立即解散所谓“国大”，实行政协的决议，恢复一月十三日的军事位置，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他做圣经上所说的回头的浪子，如果不然，他既不要人民的原谅，人民也就无法原谅他了。

上海摊贩惨案

《解放日报》时评

正在蒋记非法“国大”开会的时候，蒋政府又连续制造了两件流血惨案。第一件是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在香港遭遇蒋介石特务暗算，第二件便是上海摊贩被蒋介石军警屠杀。这两件惨案完全证明蒋记“国大”正在炮制中的所谓“宪法”，除了杀人犯政府的装饰品以外，别无意义。

上海摊贩群众向国民党当局游行请愿，仅仅是为保存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糊口权利，因为蒋宋孔陈四大家，为了垄断一切市场，取缔他们的营业，使他们无法谋生。他们的游行请愿是完全合理与合法的。但是蒋宋孔陈四大家的政府竟对他们采取无情的镇压手段。它竟然动员了军警特务，使用了美帝国主义给它的武器——步枪、机关枪、催泪弹等等，来残害和屠杀这些饥寒交迫的同胞！

蒋介石及其一小群口口声声以“法治”欺人吓人，但是看一看这次摊贩惨案牺牲者的贫民的尸体和血迹，在蒋介石统治下，有什么法律可言！蒋介石有的，只有一条法律，那就是：只许蒋宋孔陈四大家发财，不准人民吃饭，只准独裁政府随便杀人，不准人民集会结社请愿游行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但是蒋介石这种法律，蒋管区广大人民是一定要起来反抗的。这种法律是和中国人民所公认的根本大法——政协决议，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

摊贩被惨杀案，已经引起了京沪一带各阶层人士的广大义愤。现在国民党当局正在纷纷发表谈话，诬指摊贩群众“越出常轨”，并妄称摊贩群众的行动为“有计划的政治暴动”，以制造更凶残镇压群众的借口，以及嫁祸于中共及其他民主人士。这种阴谋诡计，反动派在一年前昆明惨案早已施用过，是瞒不过任何明眼人的。相反的，这种阴谋诡计只能更加增加人民的义愤。

摊贩惨案再次反映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危机的加深。这个惨案发生在上海，那里是中美反动势力最集中的地方。然而正因为反动统治使人民难以生活下去，人民群众争取自由和生存权利的伟大运动必将不顾一切压迫而日益壮大起来。

（原载1946年12月8日《解放日报》）

〔附〕 上海天津等地摊贩群众反抗国民党当局斗争消息报道四则

（一）

上海全市大骚动　五千摊贩抗蒋屠杀暴行

在蒋家军警刺刀下死伤百余人　群众激怒纷纷以木棒石头自卫

〔**本报讯**〕据各方报导：由于蒋政府逮捕上千小摊贩，并屠杀请愿群众之结果，昨日摊贩群众的激愤反抗，已形成为全上海的骚动，路透社、合众社的报导，均描写“这次骚动为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激怒的五千余摊贩昨日竟在全上海各街市出现，以石头、竹杠、木棒对抗全副武装之警察及军队，并继续包围黄浦警察分局。除绝少数商号外，全市商店均行停业。公共汽车、电车均被迫停驶。蒋家所有警察、宪兵及驻军均行出动，以水龙、刺刀、警棍、步枪、机枪及催泪性炸弹，屠杀反抗之群众。据合众社报导：在黄浦警察局前，“午后警察拖走与痛打群众，这种逞威的行为，只是激怒了群众，警察调来两架救火机，四支水龙向骚动者喷射达一小时以上。警察增援部队于下午九时驰至肇事地点，当群众虽在凄怆的寒雨之下但仍拒绝退却时，警察向群众抛掷催泪炸弹”。据路透社称：全日军警向群众开枪至少在一百排以上。在军警屠刀下死伤的人数尚无法统计，至低限度死十人，伤百余人。国民党当局力图掩盖其屠杀群众的真象：“两名中国记者当去采访消息时，为警察所重伤；一位美国照像记者看到两具尸体，企图拍照时，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警察所阻止。”（合众社）据最后消息：昨日深夜，上海市区稍归沉静，但大批群众在零度以下之凛冽寒风中仍麇集警察局附近，全上海仍处于戒严状态。

（原载1946年12月2日《解放日报》）

（二）

对沪请愿摊贩群众蒋方竟令“格杀无论”

〔**新华社三日讯**〕据各方报道，反抗国民党当局逮捕及屠杀的上海摊贩骚动，昨日已因当局的流血镇压表面上暂告沉寂，据说全市交通已行恢复，若干地区的商店已被当局强迫重新开业。唯全市仍告戒严，全副武装之警察在街上来往巡逻并在一切重要路口布岗。蒋政府于前日全市骚动中，下令警察对反抗的群众“格杀无论”，该日蒋政府除杀死摊贩十余人及杀伤百余人外，并逮捕二十八名摊贩。合众社称众信许多摊贩已被警察暗杀。旁观的上海美侨所办的大美晚报评论称：此次骚动，乃上海经济的混乱状态及劳苦状况普遍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上海经济处于千钧一发之中，可能造成全市的更大冲突，此次事件“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又据合众社讯：上海街谈巷议，咸认摊贩的反抗乃为政府“迫使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事件。上海大多数观察家指出，上海经济情况正节节恶化，许多工厂、商店预料不能渡过旧历年关，预料上海市场将再度发生骚乱，甚至规模更大、更严重之骚乱，人民对政府一切措施的不满，“已酝酿成熟，有一触即发之虞”。

（三）

摊贩斗争暂趋沉寂 平津蒋政府又不准摊贩营业

〔本报讯〕与上海摊贩惨案同时，北平、天津蒋政府亦宣布驱逐摊贩。据美联社讯：北平蒋介石宪兵于一日晚下令市上一切摊贩均不准在街上摆摊，并宣布全市戒严，所有商店及娱乐场所均被迫于晚上十点半以前即行关门。天津蒋记市政府当局亦于二日下令驱逐各主要马路上之摊贩。天津摊贩曾结队至市政府请愿要求缓期实行，但遭拒绝。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12月3日）

（四）

抗议蒋政府逼令迁移 天津摊贩全体罢市

〔本报讯〕据中央社天津三日电，天津摊贩已以全体罢市，抗议国民党当局驱逐摊贩的命令。本月二日蒋记天津市政府藉口"妨碍交通"，勒令摊贩自其集中地区的旧法租界菜市场一带立即迁至张自忠街。摊贩闻讯后，以年关在即，一旦迁移损失必巨，乃组"跪哭请愿团"群赴市府及警察局请愿缓迁，但当局加以拒绝，谓成命难以收回，必须实行，"致问题由僵持而转趋严重。"现摊贩已全体罢市表示抗议。

（原载1946年12月4日《解放日报》）

〔附〕一年来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丁树奇

过去的一年，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一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鲜明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要求取消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和平、民主的新国家。

大体上说来，一年来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一月至五月，这一运动的主流是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从一月政协会后，一切要求民主的运动，客观上都具有为政协五项决议的实现而斗争的性质。其最著者如重庆成都各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二月十日及十六日），西北大学学生为争取集会结社自由的罢课（三月），北平中国大学学生的反特务游行（四月十九日），广州全市大中学生抗议蒋军暴行的大罢课（四月十六日），上海妇女自动选出国大代表（四月十日），重庆民主运动联盟（五月四日）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五月五日）的成立，上海全市剧艺界的反对"艺目登记"运动（五月下旬），重庆成都等地高中学生的反对集中军训（五月），遍及全国

各大城市的反对实行警管区的呼声（五月下旬），上海学生助学运动，“收复区”十万以上学生的反甄审运动（去年十一月起），自发的武进群众反对法院包庇土劣的抬匾游行（五月八日），与杭州、温州、福州等地的饥民抢米风潮，以及一开始就喊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上海春季大工潮，加上全国电报员工的总罢工（二月二十三日），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公教人员怠工、罢工、罢教、总请假运动，以及上海数千家棉布商为反对中纺垄断掠夺的全体罢市——这一切，作为蒋政府坚持独裁，撕毁协议的一连串行为底回答，便交织成国民党统治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的画面。

第二个时期，由于蒋介石破坏一月停战令，继续在关内各地挑衅，并在东北大举进攻，使中国面临长期内战的威胁。在五月间，上海北平等地的人民即发出立即停止内战的呼声。六月起，蒋管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即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奋斗的目标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这一阶段的运动，从六月中旬苏州杭州学生的反内战游行开始，以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十万群众的大游行和下关惨案为其顶点。在这时期，各地各阶层人民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致函，呼吁停止内战，要求美国停止援蒋，并发动大规模签名运动，致函美国工人、美国人民要求纠正美政府现行政策，致电美国政府要求改变援蒋政策，致电巴黎和会请注意中国日益恶化的局势，以及佛教、回教、基督教教徒的和平祈祷，对下关惨案的抗议及受伤者的慰问，募捐等等。这期间，与美货倾销而俱来的国货工厂的减产与倒闭，推动了从沿海（如上海）到内地（如成都）各城市工商界爱用国货运动的展开，也推动了上海工潮的再度爆发；蒋政府开放四通商口岸的决定，又掀起了从上海到重庆航业界的护航运动，而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提出，更把美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因而激起了更多的反对美国援蒋内战的呼声，这样，就使得运动逐渐从单纯反对内战发展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助蒋内战的阶段。

第三个时期，从八月底起，蒋政府连续出卖内河及沿海航行权和领空权，代价是八亿余元的美军剩余物资。于是，蒋政府敢于发动全面内战的真正原因以及美国援蒋进行内战的真正意图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揭穿了，加以与日俱增的驻华美军暴行，运动的锋芒就明确地转向美帝国主义，口号是“美军退出中国”！

九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响应美国民主人士所发起的“退出中国周”，发起了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很快就展开到北平、重庆、成都等各大城市，旬日之间，参加运动的人民团体即达一百个以上。蓬蓬勃勃，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华政策与蒋政府丧权辱国行为的愤怒与觉醒。十一月以后，蒋介石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和航空协定，更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抨击与反对。十二月十八日杜鲁门重申起一年前的声明，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阴险无耻，更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愤恨。

一年来的人民民主运动，遭到了蒋政府千方百计的破坏与镇压。蒋介石费尽心机，从欺骗（如在上海工潮中提出“劳资合作工厂”）、分化（如对民盟）、篡夺（各地的“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吞并（劳协）、捣乱（较场口事件），伪造民意（如“反内乱大同盟”），对学生工人以开除逮捕，一直到暗杀（李闻）、明杀（王任律师）和大批屠杀（重庆大渡口惨案）。但不管这一切，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并不因欺骗而动摇，因屠杀而畏惧，相反的，正因为如此，激起和加深了广大人民的义愤，使爱国民主运动更为开展。

经过一年来的磨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已经空前的提高了。不过一年的时间由于铁的事实所证明，他们对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是一概消失了。如果蒋介

石在二月间还能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欺骗一部分人民进行反苏反共游行的话，那么，经过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在上海要发动一个“反内乱大游行”时，就连强迫来的七八岁的小学生在内，总共也弄不到一千人了。而“反美就是反祖国”的威吓，对于“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必竟也证明其无济于事。

一年以来群众的组织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即以上海一地而论，学生、妇女、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都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工人则帮会观念已逐渐打破，从机器厂到理发店的三十万工人都已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各行业参加工会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上海学生助学运动，在蒋政府百般压迫、破坏下终于获得成功，组织健全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在上海大工潮中，不仅产业工人，就是手工业工人，店员以至清道夫、黄包车夫都能一致行动，甚至摊贩也能团结起来，对抗警察，坚持斗争，更说明了群众的组织程度已有了飞跃的进步。

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包括着极其广泛的阶层：金融家、工业家、商人、大学教授、最高法院的法官、地方绅士、文化界、新闻界、学生、妇女、薪给生活者、店员、工役、工人、农民、小贩、清道夫等等，这表示目前的斗争是全民族反对异民族侵略的斗争，是各阶层人民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专制统治的斗争。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已是何等孤立，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阶层，将因美蒋统治迫得全国人民更无生路而越加广泛，运动也将越加深入。特别是这一运动将深入农村，与蒋管区广大农民相结合，那是可以断言的。

在一九四七年，解放区军民的爱国自卫战争和蒋管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将更好的结合起来，迎接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在反对侵略反对卖国独裁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有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为其有力的支援。到今天，大部分的民主人士已经明白，没有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国就没有了希望。因此，一年来解放区军民自卫战的每一胜利，都鼓舞了蒋管区三万万人民。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也更其加强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原载1947年1月1日《解放日报》）

新华社记者评《蒋美航空协定》

新华社记者评论十二月二十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航空协定》称：这是蒋介石继《中美商约》之后又一卖国条约。蒋介石在商约中已经将中国全部领土和沿海内河的主权卖给美帝国主义，那么，做为“必要的”补充，他此次签定航空协定，是最后和全部地将中国的领空权拍卖乾净了。

根据电讯：《中美航空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二：第一，规定美国飞机得在上海、天津、广州及“以后随时同意之地点（！）”，装卸和转运乘客货物。第二，规定美国飞机得在中国领土内，享有非交通之停靠权。按照第一项，今后美国飞机在中国将到处可以飞行装卸和转运，完全控制中国的空运事业，在普通商运范围内，更便利了美货的独占中国市场。按照第二项内容，除通常交通外，美国飞机还享有军事性的降落权。《中美商约》中曾规定美国军舰可因气候恶劣及其他危难（！），进入中国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海，现在再加上这种飞机“非交通停靠”权，这样全中国就将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

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乃是美帝国主义世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远在抗战期间，美国以援助对日作战名义，在中国大西南建立密布的空军基地群，日寇投降后，它又接收了大批日军在华的飞机场。在今年三月到八月的转让剩余物资谈判中，蒋介石为了取得大量内战物质，无耻的允诺以全部航空权作为交换品的一部分。五月间美蒋成立密约，美国取得在中国内部各省及东北台湾进行军事性的空中摄影之权。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与美人陈纳德空运公司签订合同，允许该公司飞机在中国经营空运事业。九月二日蒋政府又与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菲律宾签订上海马尼拉飞机降落权协定。此次正式签订《航空协定》，蒋介石出卖全部航空权的“合法手续”就算完成了。

杜鲁门最近对华政策声明中，还一再辩白美国对华政策系以“充分尊重中国主权”为依据，而侵夺中国全部领空权的《中美航空协定》，恰恰在他的声明发表之后的第三日签订。这对杜鲁门的声明是一个残酷的讽刺，也是对他的所谓“充分尊重中国主权”下了最好的注解。而卖国贼蒋介石正当其签订这一卖国新约之时，还在其伪“国大”的“宪草”演说中，厚颜无耻地大讲其“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再一次地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当年汪精卫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无论在精神上与形式上，都毫无二致。

（新华社延安1946年12月26日电）

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揭穿蒋方“和谈”欺骗性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

〔**本报讯**〕新华社记者今日访问中共中央某负责人，询以蒋介石是否有派代表来延之事？其目的何在？中共中央某负责人答称：十六日晨蒋介石经过司徒雷登通知南京中共发言人王炳南说是要派张治中来延商谈和平。但这完全是欺骗作用。蒋介石对于中共所提两项最低要求：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这就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蒋介石的企图是要在侵占解放区一百六十五个城，十七万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是打了败仗，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五十三个旅之后，求得休息时间，巩固已占地方，补充军队，重新进攻。为了这个目的，他现在需要“和谈”了。如果去年一月马歇尔与蒋介石代表张群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可以被蒋介石撕毁干净，而马歇尔则主持片面援蒋，发动内战，则在现在又由一个美国人介绍一个姓张的来开所谓“和谈”。试问有何办法证明其不是欺骗？张治中氏本人亦曾于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是仅仅五天，就被蒋介石撕毁，在东北大打起来。此次再来谈判，试问有何办法证明谈成的任何东西，不被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加以撕毁？如果去年一月由蒋介石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由蒋介石撕毁干净，敢于召集非法“国大”，制造伪宪，保障独裁，试问有何办法证明现在的所谓“和谈”，有丝毫的真实性？以此种种，我们对于现在喧嚷的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任。除非蒋介石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便无法证明他不是欺骗。因此要开谈判，必需实现这两个条件。中共及全国人民均不愿再受欺骗了。

（原载1947年1月17日《解放日报》）

新　的　骗　局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解放日报》社论

骗子碰到瞎子，才有机会夸耀其老套骗术的高明。对于明眼人，则吃一次亏，长一分智；遇到骗子再来，便大可以嗤之以鼻。蒋介石这番发动的“和平”攻势，实在是欺人太甚，而其愚也诚不可及。

一年以来，蒋介石为他的四大家族统治确乎占了许多“便宜”。他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了一月停战令，侵占了解放区十七万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百六十五个城市。他又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加紧法西斯专制统治，并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经过蒋介石自己的手，最后关闭了和平协商之门。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第一、蒋介石在解放区军民的坚强抵抗前面，却大吃败仗，其正规军已被歼五十四个旅，约占其全部进攻兵力的四分之一，兵力补充不易，部队士气消沉。真如一位美国作者勃莱斯所说：“国民党军的攻势已达最高点，且已开始下降；而中共军却在过去数月中发展着，逐渐取得主动。”“中国内战的整个过程行将改变。”（今年一月四日密勒氏评论报）。第二、全国人民近来在反对蒋美商约，反对蒋记伪国大与伪宪法，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全国爱国运动中，已表现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与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的坚强意志与伟大力量。蒋介石在政治上已更加孤立。第三、蒋介石的内战财政已难以为继，蒋管区工商业大批倒闭，农村凋敝，民变蜂起，财政经济已临破产的边缘。

蒋介石在这样严重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困难前面，就由美国反动派的提示，定下了一条“和谈”之计。于是放空气，装样子，拉拢试探，显得自己是一尊力求“和平民主”的弥陀佛模样。而且实际上，蒋介石也确乎想借此一手，麻痹中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以便军事上求得休息的时间，巩固已占的地方，补充军队，重新进攻；在政治上则企图缓和国内外的反对，以所谓“和平统一”和所谓“民主联合政府”的假招牌，取得美国的借款和其他援助，以继续扩大内战，巩固其独占专制的统治。因此蒋介石对中共所提两项最低要求，即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竟然置之不理，甚至根本“未予考虑”（十四日中央社电），而单单提出他的所谓“方案”来，准备在“和平协商”的方式下，为其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决议的罪行制造根据。关于这一点，美国合众社已泄漏了一点天机，它报导“政府希望先颁布停战令”，并称“政府主要想解决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问题，双方部队维持目前位置，然后对主要铁路上地点进行管制”。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就很明白了。

谁都承认，去年一月停战令和政协决议，是中国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各党

各派和社会贤达共同制定的宪章，是中国人民希望与意志的体现。它是一块试金石，可以由此判断究竟是谁真正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而谁才是出卖中华民族的汉奸，与绞杀民主的刽子手。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曾经作种种让步，但决不愿也不能牺牲一月停战令与政协决议，因为牺牲了它，那就等于牺牲全国人民的命运，断丧全国人民的信义。现在蒋介石一意孤行地完全拒绝了中共的两项要求，就是连走向和平协商大门的道路，都给他压根儿挖断了。

蒋介石历来的态度，就是一手可以签订某些庄严文告（如停战协定），但一手又随即彻底地撕毁它。依照蒋介石的逻辑，他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决议是应该的，是“当然”的，而中共要求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取消完全违背政协决议的伪国大伪宪法，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吴铁城谈话，一月四日中央社电）。他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决议，是责无旁贷的，至于“取消宪法，实无人有此权力，国民党及参加‘国大’之‘代表’，均不能取消”（中央社一月十四日电）。总之，对于蒋介石来说，凡是背信弃义，危害中国独立和平民主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应该的，有此权力的和可能实现的；而对于恪遵信义，有利于中国独立和平民主的事情，那他就无此权力了，是不可能实现，因此也就一概不会予以考虑的了。

以这样一个不仅毫无信义，而且以背信弃义为当然为荣誉的人，再加上一个同样毫无信义的美国“调人”来导演，现在居然又嚷起“和平”来了。这岂不是活见鬼？它那能取得中共和解放区军民以及全国人民的丝毫信任？有人劝告中共“不要以政府和平的举措为烟幕”，而且也不要“猜疑”。我们可以诚恳地答复这些先生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上蒋介石的当已经上够了。去年蒋介石一手颁布停战令，一手密令他在各地的部队“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地”，说“停战令不过是宣传”；现在他一面高叫“和平”，一面却又在大调军队，准备对山东等解放区作新的大规模进攻。如此情形，试问究竟有何办法，可以相信蒋介石的所谓“和谈”，有一丝一毫的诚实性？如果他真有一点和平的诚意，为什么他不能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和废止伪宪，来表示他还有一点子信义？现在中共根据过去经验与现在事实，指出这次所谓“和平”完全是一个骗局，这决不是什么“猜疑”，而是正确的预见。中国共产党如不照这个预见办事，那就要再上大骗子蒋介石一次大当，那真太对不住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了。

美国兵强奸了中国人，中国人出来反对，反说中国人“忘恩负义”。蒋介石自己撕毁了停战令与政协决议，完全拒绝了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与实现政协路线的正义要求，反说中共“关闭和平之门”，“中共不要民主”。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并不为奇。中共和中国人民却坚决和急迫地要求真正的和平与真正的民主。他们凭着自己的惨痛经验，决计不再上当，一定要揭穿蒋介石的新骗局，并以自己的努力，争取上述两项最低要求的实现，奠定真正和平民主的基础，不达目的不止。

新华社记者评《军调部一年工作总结》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新华社记者评论称：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御用的中央社所发表的军调部一年工作总结，妄图将破坏停战令的责任全推在中共身上；但是，事实胜于一切狡辩，去年一年蒋介石侵占了解放区有二千万人民的十七万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百六十五座城市。这是谁破坏停战令，谁进攻谁的最好证据。

实际上蒋介石在停战令签订之前，也并无真心停战，停战令签字之后，又一直破坏着停战，证据不必多举，只要看看蒋介石自己去年一月七日命令（即所谓“委座子阳电”）：“政治协商会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其尚未缴械地区应速令当地驻军即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须秘密迅速，免资共方借口。”再看看一月十二日孙连仲向所部传达的“委座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议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灰（十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在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同时必须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这就是蒋介石一面下公开的停战令一面却下秘密的作战令的真象。他这样注意要占领“有利地点”，要“抢占战略要点”并要“星夜前进”来对付所谓“奸军”，这里有任何一点真正的停战气味吗？停战令一项重要规定是军队一律停止调动，但是蒋介石现在用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一十八个旅中有二百一十个旅系违约调动的。这些违法调动的军队中又有十个军、二十九个师系美方违约代运的（计关外四个军，十二个师、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关内六个军、六个交通警察总队），中共对此曾作过数次的抗议，均被蒋美两方置之不理。

东北、华北内战之所以日益扩大，就是蒋美合作违约运送如此大军“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的结果。东北内战发生后，国、共、美三方于三月二十七日签定“东北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又拒绝实行，放手在东北大打。

六月南京谈判，尽管中共如何重大让步，蒋介石仍故意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使谈判不能成功，暗中却布置对于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的进攻。六月十三日，蒋介石亲信刘峙主持的第六绥靖公署颁发“已元电”：规定对中原军区的“作战计划”。在东沿大别山，西至随枣，南至长江，中沿平汉路的广大地区都部署了进攻与防止突围的详细计划,企图一举“围歼”。六月二十六日南京谈判还在进行时，“围歼”即已开始，李先念将军所部迫不得已才突围，中央社反说李先念部三路“窜扰”。

蒋介石令其部队抢占战略要点的结果，从去年一月至六月共向解放区进攻四千三百六十五次，被攻地点四千一百五十八处，占我城市四十个，占我村镇二千五百七十七处，其使用

兵力前后总计二百七十七万余人。

去年七月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十一月间并作“五个月内在军事上击溃共军”之荒唐语。传“国大”召开之际，“打下延安作礼物”的梦话也居然在南京出现了。十一月蒋介石又来了一次“停战令”的插曲，但是蒋介石命令其部队继续前进，向其部下说明这个“停战令”只是宣传作用的电令，也在前线被我们缴获了。

蒋介石的宣传机关竟想抹煞一年来中外人士所共知的铁一般的事实，企图归罪于中共与解放区军民，只见其无聊万分，心劳日拙而已。现在的问题是去年一月十三日的军事位置一定要恢复；政协路线一定要贯彻，伪国大宪法一定要取消；一切狡辩和施放任何烟幕都无济于事。

（转录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二集）

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解放日报》社论

蒋介石今天的处境实在尴尬已极。已经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因为他来一手“紧急措施”更趋深刻化。他自己跑来鲁南指挥，就白白地送上七个整师给人民解放军来歼灭。莫斯科会议已迫近了，他的主子美国帝国主义所迫令缴卷的稳定经济最后期限的六月三十日亦已不远。美国金融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在催促南京“民主分子”袍笏登场，而“改组政府”的丑剧始终搁浅。正像本报所指出，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已陷入“进退维谷”的苦境。

为了从这样的苦境里“超拔”出来，蒋介石最近又投身于一个更加绝望的冒险。他从陕南、豫西和晋南调了十一个旅的兵力，集结陕甘宁边区的南线，本月十八日开始五路进攻我边区的关中分区，廿日侵占了我关中分区的首府马栏市。现在正掉头西向，进迫我陇东分区。看来，这一次蒋介石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是很明白了，他进攻了关中，又企图进攻我陇东，如果得手，就进而向民主圣地延安继续侵犯，也是很有可能的了。

我们边区的全体军民必须了解，蒋介石的困难即使比之去年十一月间确是多得多，而且严重得多。但是如果我们从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蒋介石在三个月前还只敢在边区门口骚扰一番，今天他决不敢真的打进边区和延安来的；如果这样想，那么就是对于一个将近死亡的反动统治者的行动规律，还摸得不够清楚。俗话说得好，狗急要跳墙，一条帝国主义的死走狗，当山穷水尽、进退维谷的时候，必然要疯狂的挣扎几下。蒋介石的这次进攻边区，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事实，并且今天已经相当深入，进占我关中分区的马栏和大片土地，而且继续向陇东窜进。我们边区的人民已经有上千上万在遭受蒋军的蹂躏了。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三个月前动员的精神，迅速和紧张地动员起来，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而战斗，而工作。

三个月来的自卫动员工作是绝对没有白做的。它不仅使各机关各团体同志和全体军民从思想到行动上引起了必要的转变，和得到了若干锻炼，而且在边境的自卫战斗中获得了良好的战绩。我们边区的自卫力量比之三个月前是大大加强了。但是在蒋军已经深入我边区腹地的今天，我们应该很好的检查各项自卫准备，是否还有不够的地方，甚至是十分不够的地方。首先是防空设备，特别要引起全体军民的警惕。其次如坚壁清野，警戒放哨，埋设地雷，自卫组织等等，都要彻底检查，即速改进。

这里特别提起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土地改革。最近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派了大批干部下乡，协助县区乡干部，在边区各地普遍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战争到来，就此放松。应该了解，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乃是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基本关

键，因此越是有战争，便越要紧张而正确地即是采取群众路线，来贯彻土地改革，克服土地改革中与封建地主妥协的倾向，克服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倾向，要坚决站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这一边，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群众自己的力量，达到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能得到土地的目的。这应该看作是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另一件是春耕生产。保卫边区，保卫延安，我们还必须有长期观点。加紧准备春耕，继续发展纺织，求得军民的足食足衣，这就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要反对那种想法，以为战争要来了，生产就不能再搞，也不必再搞了。这种没有长远打算的想法是十分错误和十分有害的，前方各解放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以战斗掩护生产，与劳武结合的全套经验，也证明上述想法是完全不合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彻底纠正，无论公家和私人，军队和老百姓，应尽量布置和进行春季的生产，同时要厉行节约，反对费浪，要巩固边区经济和财政的基础，争取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胜利。

如果这几点我们做到了，那么蒋介石所押的最后这一个宝就必输无疑。

周恩来将军为蒋政府迫令中共代表撤退事致电蒋介石

周恩来将军顷为蒋政府迫令撤退中共在京、沪、渝三地之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事致电蒋介石，原文如下："王炳南转送蒋主席：顷悉南京卫戍司令部及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布之通知，限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于三月五日前撤退。此项通知不知为贵方地方当局之主张，抑出于阁下之命令？如属前者，则地方当局之任意妄为，应请阁下立予制止；如属后者，则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惟为判明责任与手续起见，仍请阁下以正式公函通知我方驻京代表董必武，须延长撤退限期至三月底，俾使我方代表得据以作被迫撤退之计，而我方联络机关亦方有可能作撤退结束。专此候覆。周恩来，二月二十八日。"

附：据蒋记中央社二十八日电讯：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国民党当局，二月廿七日夜及廿八日分函该三地中共联络处及办事处，限中共人员于四天内即在三月五日以前撤退。函中极尽颠倒是非、含血喷人、下流诬蔑之能事。现重庆之中共联络人员与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二百余人，已于二十八日清晨被当地卫戍司令部派员强制集中于曾家岩二十三号中共人员宿舍及化龙桥新村七十六号新华日报印刷厂两处，不准外出，与监禁无异。而新华日报之一切电台、机件、器材，亦被强行接收，致被迫停止出版。早在上月中旬，各种现象即已证明蒋介石企图以各种手段扣押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蒋介石曾两次经过司徒大使及皮宗阚询问中共南京联络处是否撤退京、沪、渝三地联络人员。但当中共人员询以是否政府决定中共人员撤走时，则均避而不答。同时重庆之"二·五""二·十"及上海之"二·九"惨案，及北平、沈阳等地蒋政府多次逮捕市民之法西斯暴行均先后发生。上述限令中共人员撤离之消息发出后，中共驻京、沪、渝办事处即遭蒋介石特务之严密监视。据美联社电称："二十八日南京共产党已处于特务重重监视之下，当本社记者往该办事处采访消息时，这些特务连藏也不藏。"据南京中共发言人称：重庆来电谓："蒋占区唯一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出版九年之后，已因蒋政府之迫害而停刊。未悉重庆有逮捕事件，但警察不断盘查共产党办事处之一切来往客人。"

（新华社延安1947年3月4日电）

运动战歼敌人的又一光辉范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大众日报》社论

蒋介石已面临军事上、经济上的严重危机，他企图首先在军事上多少打开一些局面，以缓和其即将灭顶的危机，乃自一月底开始东拼西凑，集中可能集中的兵力分由南北两线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妄想在这孤注一掷中取得山东会战的胜利，因此，他不仅叫陈诚到前线督战；还要亲自到徐州来部署和督战。他担心光杆陆军不大保险，又派周至柔亲率大批空军来实行所谓“战略轰炸”。他鉴于多次全军覆没的教训，命令他的军队在进攻中稳扎稳打，决不轻进，尽量集中，如临沂以南正面仅仅八十华里的地带就集中四十个团的大兵，以飞机掩护，用坦克开路，一天只走十来里，像乌龟一样的向前爬，凡此一切，都说明蒋介石诚惶诚恐，既怕被歼，犹图冒险前进，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蒋介石的军队“爬”进了莱芜、新泰、口镇、临沂、郯城等城镇，但完全出乎这位神经极度紧张的蒋介石的意外，他在上述城镇中不但没有找到解放军的主力，甚至连居民和任何物资都没有找到，原来是扑了一个空。但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检讨这个严重的错误，他的部下李仙洲指挥的两个军七个师非常“集中”的五万大军却已在本月二十日突然爆发的炮火声中全军覆没于新泰、莱芜一线，这就是本报报导的北线辉煌胜利消息，这个胜利对于全华东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对于野心勃勃而又小心翼翼的蒋介石却是一个多么悲惨的“耗音”。为什么这个胜利值得我们兴奋而又必然为蒋介石所极其悲痛呢？就是因为这正是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公报中所指出的，是我军“山东会战第一阶段的全胜”。这个会战是去年七月以来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中规模更大的空前的一次，正是因此，也很可能成为绝后的一次。“如果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此次进攻，蒋介石虽然还可能再把兵力集中进攻某一地点，但是决计很难像这次一样集中兵力了。”（《解放日报》社论《十一月以来的战局》）因此，这次胜利就是一个信号，它预告着下一次、又一次以至再一次的大捷，预告着山东会战的结果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更预告着在这次大会战胜利以后跟着来的将是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伟大全面反攻的局面。

我们所以这样乐观的预告战局，是因为北线大捷更生动的证明了我们具有足够的条件保证上述预告一定会成为现实。

首先北线大捷是我军运动战歼敌的又一光辉范例，蒋介石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了临沂、郯城、新泰、莱芜等几座空城，其初次付出的代价则是在新、莱地区覆没了五万大军，弄得人地两失，并更加丧失了战局的主动，还要继续付出更大代价，我军主动撤出临沂等城而不过十几天间，即取得了歼敌五万恢复新莱地区的伟大胜利，这就是“人地两得”。我军大退大进，运动自如，已充分获得主动，并紧紧掌握了主动。本报在临沂放弃后的第二日（即二月十七日）即曾向读者预告：临沂的撤退将是歼灭蒋军的开始。迄今仅八天，这个预告就

得到了最生动的回答，我们愿意再次向读者预告：跟着北线大捷而来的将是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一切暂时被蒋军侵占的城市包括临沂在内，一定会逐一变为埋葬蒋军的坟墓，全部重归人民。

其次北线大捷，又证明了我华东人民野战军已经更加强大，更加熟练的掌握了运动战的方针。去年十二月宿北之役，我军五天歼敌三万，今年一月鲁南战役，前后三个阶段经十八天歼敌五万，而此次新莱战役，我军仅以三夜两天的时间获得歼敌五万的更大战果，这就是一个例证，主要原因是：在陈军长、粟司令"以战教战"的号召下，我各级指挥员已取得了大规模运动歼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歼敌的丰富经验，而所有英勇指战员也更加提高了自己的战术技术，能使上级的决心彻底完成。第二在陈军长、粟司令"以战养战"的号召下，我军自蒋军手中夺获了大量新式武器与军火补充，我军战士并迅速熟习了这些武器，使我军已逐渐成为拥有近代化装备的大军。第三、在华东局"全力支援前线"的号召下，支前工作有了显著提高，更加集中、及时与有组织，解放军到了那里，人民的援助就跟到那里，粮食和军火就送到那里，真正表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气势，这就保证了我军能在广大人民的援助下克服落后交通工具的困难，完成大进大退，运动歼敌的任务。第四、上述三个条件，再加上人民子弟的热烈参军与大批解放战士的觉悟，就使得解放军愈战愈大，愈战愈强，保证了战争的彻底胜利。

最后，北线大捷是我野战大军的最高功勋，也是我全华东军民一致努力的成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冀鲁豫兄弟部队，华中蒋后军民和坚持原地斗争的新莱党政军民对这一会战也作了有力的配合与援助，也证明了蒋军大举进犯山东、后方兵力空虚的条件下，正是华东蒋后军民歼灭蒋军恢复广大地区的有利时机。蒋后斗争和正面会战的密切配合，必使蒋介石陷于进退维谷前后受敌的必败之地。北线大捷，尤其证明了一切被侵占区的军民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胜利，新莱地区党政军民廿天的坚持斗争，终于获得胜利便是一个范例。

（录自1947年3月1日《渤海日报》）

朱总司令在保卫陕甘宁动员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八日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朱总司令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今天开动员大会。为什么动员？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已把我们派出的去代表和平谈判的使节送回来了，同时在北平、重庆各地逮捕我们的人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说不讲和平了，一定要打仗，已关死了和平的大门。

蒋介石要坚决地打内战下去，我们也没有和平可讲了，当然也只有打下去。

今天的动员大会是为的打仗。过去我们边区七八年来都是和平的局面，同志们也同日寇打过仗，也疏散过，但敌人总是没有来，大家和平的观念已养得很深了。大家都以为有毛主席在这里，同时，我们又有这样多的军队，恐怕敌人永远不会来。这一和平观念要改正过来，要起来消灭胡宗南的进攻。

胡宗南的进攻首先要进攻延安。这次进攻，不仅是可能的了，而且是一定了。这有什么根据呢？

胡宗南已调了军队在边区前面，这是事实。送我们的代表回来，来准备长期和我们打仗；这也是事实。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同我们打了好久啊，延安的人虽不大知道，但从报上可以看到。事实上抗战时他也打，抗战完结后还是打。前年蒋介石请毛主席出去谈判和平，当毛主席尚未回来时，在河北、山西、河南就打起来了。

这次，已经打了一年多了。打仗的地方算起来战线有几万里。为什么有几万里？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村一个村的打，几千几万村，你们算算战线有多长？！

延安的同志们，同胞们，要警觉起来，决心和蒋介石打仗。蒋介石现在已调兵来了，这是真正的全面进攻，他用了全部的兵力来打内战，在山东、东北、河北、河南、江苏都在打仗，这里也要打。同志们，过去不相信敌人会打进来，这次一定要相信了，这已是全面进攻，全面分裂。

同志们，打垮胡宗南的进攻有把握没有？会不会打胜仗？一定会打胜仗的，同志们，已在报上看的很多，我们是打垮一个算一个，这八个月已消灭六十五个旅（也就是师），这是它的正规军，它的伪军团队还不算。这在我们说来，我们是已打了胜仗，俘虏了它的将官一百一二十个，打死的还不算。

我们过去是打了胜仗，是不是各地方都打了胜仗？也还有些地方是打败了。我们兵少的

地方，如象陇东，敌人就曾经占去了庆阳，虽然我们终于把它打出去了，可是，这要算一个败仗。我们把它打出去，消灭了千把人，这又是我们的胜仗。

打胜仗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希望打胜仗就能打胜仗。更不是希望人家打胜仗我们来享福，所有打胜仗的地方，都是自己拼命的。老百姓和军队个个拼命，正规军民兵都拼命，大家一条心，真正不怕死，就能打胜仗。

所以，同志们，打胜仗是有把握的。可是有些地方我们的兵尚未集中，敌人的兵先集中了，便侵占了我们的地方，把老百姓的粮食抢去吃了，吃不完的烧了，这在我们就算是败仗。蒋介石占了我们一百几十个城市，我们消灭了他几十个旅，他捉到我们一个将官没有？他没有讲。消灭了我们的军队没有？也没有见他讲出什么部队番号。可是我们却捉到了他一百几十个将官，消灭了他几十个旅，所以我们是有把握打胜仗的。

同志们，我们如果希望人家打胜仗，自己不动手，这样胜仗就打不成。蒋介石打仗靠美帝国主义帮助，但去年一年他的家务已被我们缴了不小部分。美帝国主义前后帮助他四十万万美金，装备他四十九个师，我们都打过了，事实证明美国的帮助也并不能挽救他失败的命运。

同志们！让我告诉你们打胜仗的办法。在陇东，敌人打进来了，受了损失，我们民兵打得很好。我们打垮了它一些部队，这是好的经验，别的地方应该来学。鄜县的民兵也有好的经验，应该将它扩大成为整个延属分区的经验。民兵见着敌人就打，那就很便于我们正规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民兵的战法是一方面要打仗，消灭敌人，另一方面要坚壁清野，到处埋起地雷，敌人进来，一点东西都找不到，只剩下空窑洞，他将进退不得，更便于我们消灭。

民兵积极去打仗，要与正规军配合。正规军有民兵就会打得更好，民兵有了正规军，也就愈打胆愈大。这次我们决心要打胜仗，要在边区里面消灭胡宗南。他现在来了，正是消灭他的很好的机会。这里的地形是民兵最好的战场，山大林深路少，好打麻雀仗。在山上一个人，可打他几个人。他要派一排一连人来搜索你，可是等他到了，你又转移了阵地。民兵最好的武器是地雷、手榴弹。

我们的正规军当然不是到处分散的，要集中隐蔽起来，等敌人来了好去包围消灭它，缴它的械。

各个地方都要切实地作好坚壁清野工作，每一家的粮食都要好好埋藏起来，敌人来了找不到米吃，找不到炭烧，敌人就愈多愈会感到进退两难，困也困个半死，大军一到就更容易消灭。所以坚壁清野是我们各个地方干部要作好的工作，要通知和检查，每一家切实作好。

同志们，我们要准备长期作战，打它一年半年。如果还没有打出去，就打它三年五年，一直把胡宗南消灭为止，以配合其他解放区争取全国的胜利。

同志们，今天动员大会就是要大家下决心，打要打得彻底，全国胜利才能到来。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动员的意义。

（新华社延安1947年3月9日电）

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在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彭 德 怀

同志们！我到延安四年了，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抱歉。

今天我们开一个动员大会，胡宗南已调了十七个旅，三十五个团来进攻边区，进攻延安。

敌人侵犯合水、庆阳，已被我们打出去了。

洛川、宜川这方面，敌人集中了十三个旅，要准备进攻延安。我们也要把它打出去！

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打我们的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它，不消灭它，就不能和平。我们农民要分土地，土地没有分好的地方还要继续分，敌人来了也要分，因为地分了，敌人虽然来了，也抬不走，要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成家立业，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种地。我们农民不种地就没有饭吃。胡宗南的进攻就是来破坏我们分地，使我们农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它是保护大地主，保护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把它打出去！

蒋介石要实行独裁，我们要民主，把中国变成是大家的。为着民主，也要打垮他的进攻。不取消蒋介石的独裁，中国就没有民主。

国民党蒋介石要卖国，第一个卖国贼是汪精卫，把中国卖给日本，现在又出了一个卖国贼蒋介石，他要把中国卖给美国帝国主义。我们要中华民族独立，我们就要取消蒋介石的卖国专政。要和平，就要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要分地，就要粉碎他的进攻！要民主，也要取消他的独裁！中国民族要独立，也要取消他的卖国专政！不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这四样事情，都得不到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消灭他的进攻军队。

我看能消灭它。有人要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这自然是有证据的。

一九三五年的事情就是证据。当时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可是那时候的敌人有多少呢？

据我记得的，那时敌人有一百〇一个团，三十万人。今天胡宗南却只有三十五个团。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可就大不同了。边区那时只有三四十万人，五个县，现在我们是大的多了。大家想一想，看我是不是扯谎。（群众：是真的！）没有扯谎，这是实事。当时红军却总共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比之。可是今天他只有三十五个

下旬以来，一连被歼五个整师（或军）十六个整旅（或师），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师团，十七个旅，我们比那时的一万五千人就多的多了，我们能打胜吗？（群众：一定能打胜的！）是的，是一定能够打胜的。

当时，我们在南线，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胆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

现在，已过了十一年了。恐怕不能这样来比，现在我们已消灭了他六十几个旅，捉了他一百一十九个将官。我们所有的解放区，华北、东北、苏北，早都起来，消灭敌人的进攻。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消灭他六十个旅，再捉他一百一二十个将官，把进攻者一起捉来，这样子就会实现和平、民主，中华民族就会独立，农民就会有了土地。

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

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消灭他三十五个团后，他打延安，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消灭了他三十五个团，他西安就没有兵了，我们还不到西安去吗？这可能不可能？（群众：能！）是的，我看很可能。这要看大家努力，努力大，早一点，努力小，迟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是可能的。

（原载1947年3月9日《解放日报》）

中央关于准备退出延安给各局、各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蒋胡以六个师十三个旅共约八万人于三月十四日开始向延安进攻，经六日战斗，现敌军已占甘泉、南泥湾、金盆湾之线，迫近延安城，延安有于最近失守之可能。在这六天战斗中，我军节节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并已掩护在延中央及边区机关与物资安全全部撤退。我军在抗击战斗中伤亡不大，而敌已甚感疲劳。万一延安不守，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

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端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之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南胜利之后，不会因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相反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它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望将此意对各地重要干部加以解释。

台湾自治运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社论

台湾人民和平的自治运动，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武装大屠杀，追得起而自卫，到本月八日已发展成为武装的斗争。台湾人民所组织的“二二八惨案处理委员会”通过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议案”三十二条，并颁布命令于三月十五日以前设立政务局，其委员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选产生，同时又命令接收蒋政府在台湾以“公营”为名的四大家族独占企业。八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紧其武装的进攻，开往台湾省有两个师，即第二十一师与第二十师。蒋介石并派了白崇禧、朱绍良往台湾指挥。蒋介石的意图，显然想把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淹没在血泊中。

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不少访问过台湾的中外记者，老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蒋宋孔陈四大家属以劫收和专卖的方法完全垄断了台湾的经济，这批中国封建法西斯对于台湾人民的掠夺，如此残酷，简直连一线生机也不留给他们。最近由于蒋介石拼命打内战，在台湾征兵征粮，使台湾人民更加求生无路。台湾人民的要求是极其平凡的，不过是要自治，要废止专卖制度，能在台湾当行政官吏等而已。蒋介石既然说“还政于民”，台湾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手续以求其实现，有何理由不答应他们？然而蒋介石竟不但不答应，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残忍的手段来加以镇压，二月二十八日的惨案中，台胞死伤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残暴程度真是旷古未有。蒋介石的所谓“还政于民”，所谓“民主宪法”，在这里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纯粹欺骗的性质。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在其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是一定不会停止的，欺骗与镇压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愤怒而已。

仅仅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装斗争不可，这不仅台湾的经验如此，解放区的经验也是一样。中共二十余年的斗争，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这二十余年的斗争中，我们已经有很充分的争取自治的经验，来贡献给全国人民和台湾同胞，作为借鉴。

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我们要贡献给台湾同胞以下列几点经验，以便台胞的自治运动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第一，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胁，反对出卖，须知对法西斯蒋介石的妥胁投降，将使台湾同胞受到蒋介石最残暴的血洗。任何上层领袖如果主张妥胁，那就是叛卖台胞，就应该坚决把它清洗出去，驱逐出去。只要坚决反对妥胁，反对出卖，坚持下去，台胞的自治运动就一定会得到胜利。

第二，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接收蒋政府财产，供作自治运动的经费，和建立民主的政务局，作为自治机关的初步，这些都是对的。除此以外，应该立即成立军务局，把武装的人民，组成台湾人民自治的武装队伍，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并指挥这些武装，为自卫和争取自治而奋斗。由于蒋介石决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装进攻，因而武装斗争成为极其重要的斗争形式，应当很快的把军务局成立起来，并组织基干的正规自治军，掌握在最忠心最坚决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里。

第三，应当立即设法满足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蒋家财产分配给工人农民，组织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城市贫民团体及其武装，在农村要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如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和把农民组织起来。满足劳苦大众的要求，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自治运动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纲领也才会实现，这就是真正切实的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如果不这样做，以照顾各阶层利益为借口来阻碍劳苦大众的发动，则运动就没有力量，就会有失败的可能，因而就无法去照顾各阶层利益，实际上乃是叛卖了全体台胞的利益。

第四，为了使自治运动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团体来做领导，这个团体对自治运动的敌人能坚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敌人派在自治运动中的内奸能够加以识别和肃清。参加自治运动的台湾各党派各团体和个人，应当团结在为自治而坚决奋斗的阵线中，这个阵线中所有的党派都应当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并且大家得到自己的发展，使这个共同的阵线成为自治运动中坚强的核心。这个阵线应该公开出来指导自治运动，以免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被动摇分子所出卖，或被反动派的内奸所篡夺。必须时时警惕：自治运动内部的叛卖，是比外面的敌人更凶恶的敌人。

第五，必须立即训练大批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农村中去，领导武装，领导政务工作，领导众群运动，领导经济工作，训练得愈多愈快愈好，派出的愈普遍愈好。台湾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可以一开始就从劳苦人民中多训练出干部来。

第六，蒋介石对于台湾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加以猛烈的镇压，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运动的中心由大城市转到小城市和农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蒋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领导人员和大批干部，去建立自治运动的根据地，把接收的资财运到这些地方去并适当的分散开来，建设起长期支持自治运动的财政经济基础，把这里的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坚决的采取步骤满足这里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围，将来蒋军来后不可免的将成为战场，该处的工作应当以此为着眼点。

中国解放区有无数经验可以供献给台湾同胞。上述的几点是当前对于台湾最重要的。台湾的自治运动，无疑的还会经过许多曲折，但是它一定胜利，而且时间是不会很久的。蒋介石决心以武装进攻来反对台胞的自治运动，但是它的兵力已经非常枯竭。现在调往台湾的两个师，是原来驻在台湾而后来调去参加内战的，其二十师是在徐州战场，那里蒋军从十二月

下旬以来，一连被歼五个整师（或军）十六个整旅（或师），正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师战斗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歼灭。两个师一共只有三万八千人，只要台胞采取坚决的立场，这些兵力决无办法镇压燃烧全台湾的自治运动。蒋介石再要加派兵力到台湾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蒋管区各地都有自治运动和民主运动，解放区战场再打几个胜仗，蒋介石的兵力将更感不足，对于台胞的压力就会减轻。因此，台湾同胞的自治运动，是一定胜利，而且不久就会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雄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

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

叶、罗[①]转沪台刘晓、长胜[②]、钱瑛、港台方、林[③]：

近日，蒋顽因军事、经济、政治种种危机难以解脱，于是大造谣言，捏造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企图一方面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另方面借此捕杀我党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以镇压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在此情况下，你们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党与民主团体，群众组织及进步人士等关系，亦要多发展极端隐蔽党员及同情分子，成单线领导，居中工作，不要以党的公开面目经常来往，尤要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从城市派人往外县乡村去发动、组织与领导武装斗争，必须与城市其他任何工作及人员分开，免致牵连。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少开会，少接头，多做局势研究与策略指导的工作。总之，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中　央

辰微[④]

---

① 叶，指叶剑英。罗，指罗迈，即李维汉。

② 即刘长胜。

③ 指方方、林平。

④ 指五月五日

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叶、罗即转上海局并香港分局并告朱、刘①：

一、刘晓卯俭电②关于群众斗争形势的分析及斗争方针的规定，均甚恰当。一月来的米骚动及此次学潮，完全证明了你的分析的正确，斗争的发展也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香港分局应依照刘晓卯俭电（另电告）方针，配合行动。

二、目前蒋管区由于蒋军侵占延安后军事全面失败，蒋政府改组毫无欺骗作用，且更加速其独裁统治的瓦解，二月经济紧急措施亦跟着破产，遂造成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其速度与深度大大超过三月以前蒋管区任何一次恐慌。因之，现在全国人民的斗争，不仅人民解放军的自卫战争是在搞垮蒋介石统治，就是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相互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作是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人民解放军也是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战。我们不必怕人民要和平，进步乃至中间舆论主张和平，我们要在为和平的斗争中，证明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和平。即使蒋介石一旦被迫而承认一时的假和平时，我们也能以人民要求真和平的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为和平而战的力量，突破蒋介石假和平的防线而搞垮蒋介石，这与为民主的斗争一样。

三、斗争口号的提高，停战条件的改变，要适时但也不要频繁，其作用要在能动员广大群众接受此口号并为此口号奋斗，以达到搞垮蒋介石的目的。在现在，停战两条件，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队位置与取消伪宪，还没过时，也还没有危险，因为蒋介石目前是以放下武器、恢复交通为宣传条件，在被迫时有可能又以无条件停战欺人，而人民中有真能无条件停战也不错的想法的也还有人，我们应提高他们为停战两条件与我们共同奋斗。如果逼到蒋介石也意识到只有接受这两个条件才能缓气时，那我们就可乘势直攻，逼其在取消伪宪撤回原防以宣布其政治军事破产中搞垮他。如蒋依然是拖骗（此种可能最大），则我们那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他，更师出有名了。袁世凯取消洪宪随即垮台的经验可以为证。政协决议在蒋大打内战，订卖国条约，开国大，制伪宪，赶走中共代表团，改组伪政府，宣布三党施政方针后，已全部失效。我们现在所坚持的是政协路线（或精神），不是政协决议。路线是指党派

① 指朱德、刘少奇。

② 即刘晓四月二十八日电。

协商会议、联合政府而言。决议是蒋介石彻底破坏的，我们是拥护的，且已失效，可不必提它有什么弱点。

四、在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发展中，适当地提出实施民主自由，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驱逐反动好战分子与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内战等口号是很对的。

五、上述解释在最接近的同情分子中可以传达。

六、关于组织上领导关系，望照中央辰月[①]各电所告原则办理。钱瑛已参加上海局，其所管关系，当然应遵守上海局的指示，统一策略行动，但组织系统，仍应是平行的，在学校机关中不必打通，以适应斗争形势的复杂发展，有可能还要经过一些艰苦曲折的过程。许涤新所管的上海经济界上层关系，可介绍其关键人物与张明，以便配合斗争，但必须注意，一切斗争不应急求组织统一，而应多求方针与策略一致，以利斗争的持续与组织的保全和发展。

七、经费问题待询明董、钱后再复。

中　央

辰漾[②]

〔附〕 群众运动复趋高潮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

（一）由于最近物价暴涨，从三月以来发生一连串美军侮华事件，经济统治剥削与政治压迫加紧，近月来群众斗争又复趋活跃，虽是分散的、生活性的，但从公教人员要求公平配给、学生的学业保障与增加公费，一直到各校各厂的具体斗争和今天正在开展的职工解冻指数的斗争，是此起彼伏没有断过的，而且每一个斗争都带有全体的统一性与包含反国民党的内容。群众对国特恐惧逐渐减少，中间分子在斗争中表现积极，上层分子一部分思想开始有新的转变。象大公报王芸生对时局看法，自己认为有修改自己观点之必要，拒绝胡政之对新政府多捧少骂的意见，而胡竟惊异说王左倾了。章乃器公开发表拥护我们主张意见，罗隆基在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到南京中大，以新政府成立发表公开反新政府演说。上海工业资本家以吴蕴初为中心，联合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输入限额分配决定，反对浪费外汇。

（二）这些说明蒋区城市的群众运动目前曲线即将走完，抗暴运动以后第二个高潮又将很快到来，辰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开始。这一高潮要比抗暴有更大社会基础，更广泛也会更坚强，配合全国军事形势的转变，有一直发展成为高潮可能，当然也还可能走一两个曲折。但这次国民党是有准备的，在新高潮来到前也将极力阻挠与破坏，必须有一个艰苦斗争

① 指五月份。

② 指五月二十三日。

过程，才能突破，走上高潮。因此，这一高潮不象抗暴带突然性，而是在开始形态，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把蒋区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三）我们的方针：

（甲）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因为这是敌人弱点，我们更易推动群众与准备力量。职工中的斗争是从解冻生活指数发展到劳资共同要求目前多贷款，配原料，减捐税，抢救工商业。学生以增加公费，救济清寒同学，保障学业，反对会考，自治会自由选举，发展到反对借外债，打内战，增加教育经费，扩充学校设备，提高待遇，救济同学。

（乙）使此起彼伏形态的过程略为延长一些，不过早过急使之全面化（形势突变当可改变），以便尽量准备力量，动员更多群众，从分散斗争中削弱敌人，使在时机到来突破时容易成功，而突破了可以有力发展下去，不为国民党打垮。

（丙）在这些分散、此起彼伏中，真正集中，大量组织几个中心运动，作为运动骨干汇合时的主流运动，指导与国民党斗争的主力。

（丁）虽以生活斗争为主，但必须渗进一些政治斗争，而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

（戊）上层分子政治性组织大胆公开活动，多作宣传，多作号召，多把生活运动与政治运动从思想上联系，不断提高。还要大胆公开扩大活动斗争。中间分子已从这些斗争团结、汇合到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活动中来，要国民党无条件停止内战政策，挽救民族危机。

（四）以上各点请即示复。

上海局　刘　晓

卯俭①

〔附〕　对即将到来的新斗争的工作布置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央城工部并华东局：

（一）为着巩固战果，争取社会更大同情，教育中间分子，躲过敌人之攻势，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以便累集力量在决定关头使用。由于群众疲劳需有休息，预备力量（职工）还不能投入战斗，上层配合还不够有力，还须加强（过去我们不管，现我们将自动接收这一工作），全国性组织建立后要加以整理，更因为新的更尖锐更大的斗争将在面前，必需有所准备。因此，趁我声势还浩大，上层分子已有配合，群众情绪还高涨，敌人内部对学潮政策有

① 指四月二十八日

分歧，还未统一的时候，主动决定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上罢带弹性斗争策略。

（二）估计新的斗争又将在一月后爆发，当前抓紧时机进行如下工作：

（甲）加强全国性的联系、检讨，统一策略，统一步调。

（乙）进行深入群众统一运动，巩固中间分子情绪，团结新积极分子，争取与分化三青团与打击特务。

（丙）在精神上仍保持斗争状态，号召准备新的斗争，扩大人权运动，宣誓互保公约，保护自己领袖。

（丁）提高干部教育，严密下层组织，争取教授。

（戊）加强上层与完成职工中准备工作，组织强有力预备军，特别注意警宪工作，已发展一批新党员，公开与秘密关系重新整理一下。

（己）以上各项在一面斗争、一面整理的总策略下进行，只是暂时将重心从街头转入生产内，互配反内战的罢课仍举行，但不游行。

（三）以上意见请复示

刘　晓

辰迥①

〔附〕蒋管区群众斗争近况及今后策略问题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央并城工部：

据刘晓辰帮电叶罗辰世②转如下：

你们指示完全同意。在运动中应当注意：

（甲）目前运动已从个别要求发展到共同要求，从局部发展到全国性，从经济性到带政治性，群众情绪高涨，社会同情，CC系与政学系矛盾，经济危机，继续发展对我们有利，但敌人预布之紧急措施，企图以威胁、镇压，首先压下群众气焰和进行若干妥协，以达到分化、打击积极分子。平津京沪均已发生惨案。我若在目前退却，敌人则得寸进尺，且群众情绪降低，敌会趁机击溃我们。因此，我抓紧各地惨案（这是敌人弱点），发扬上述我之有利条件，利用我一部分预备力量（只是扩大声势不行动），集中在三个可能实现的条件上，压迫敌人作若干让步，取得局部胜利，趁胜利转变斗争方式，即一面上课，一面交涉，来巩固这次斗争中的成果，准备第二次斗争。在我们进行这一策略时，同时推动一部分教授或参政会出面调解，这可以转圜，又可在第三者保证下转变，使我们更有利。但主客形势若有新发展，此运动可能变成新的五卅，必当向前推进。

---

① 指五月二十四日。

② 指五月三十一日。

（乙）目前斗争是将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高潮。只有斗争形式改变，而无有斗争的停顿。为着既能发展而又能滋集力量，我们使斗争预定是：此起彼伏，不同形态，车轮战式（即学生运动暂时休息，职工斗争又起；职工休息，学生又起），并充分利用矛盾来发展，使在每个斗争中，有主流，有细流，既分开，又配合，以经济为主，但又联系政治，使之不断提高。利用每次群众运动影响与运动，来争取与分化敌之统治力量。如：这次我们对军警作了很大妥协。从样样斗争中，取得我之群众基础，扩大群众领袖，创造、大胆提拔新干部，并使组织更隐藏在群众力量中，使用时以学生及文化上层为第一线，职工为预备，不要轻易使用。

（丙）由于斗争今天已带全国性，又由于今后斗争的新形势与我们力量弱，决定利用这次斗争，在真正群众基础上，成立各地学联与全国总学联，使之成为公开群众性领导机关。

（丁）以上各点，请即指示。

中央关于在学运中向青年军与宪警进行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叶、罗急转上海局、香港分局、五台局转平津两市委：

日前学潮日趋高涨、广泛，蒋政府所恃以镇压与殴杀学生者在其后方兵力空虚条件下仅有青年军与宪警。在上海为202师，北平为208师，重庆为203师，均青年军，宪兵中亦有很多学生出身的士兵。为避免与青年军及宪警士兵造成对立，并争取他们同情学运，以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起见，你们应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尤其要利用学校中退伍学生及同校学生向青年军中进行同军同学的联络、解释，提出适当口号，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特别当青年军人宪兵殴打、逮捕学生时，更要进行学生群众有力的劝阻呼号，以感动他们停止动手，即使是消极的袖手旁观，对学潮的发展，也是极有利的。

中　央

辰漾

中央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

叶、罗转沪台上海局：

刘晓辰智[①]电方到。你们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街上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目前蒋政府捕杀学生兼及教员、记者的暴行是普遍的，应抓紧社会上对此暴行的共同愤慨及统治阶级中某些矛盾（如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坚持放人反暴行的要求，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学生的组织形式也应与此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式，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但形式上却不要马上号召成立全国学联，致引起敌人过早注意分化与压迫。究如何为好，由你们依实际指导之。暑期工作，亦应及早计划。

中　央

巳江[②]

---

① 指月二十日。

② 指六月三日。

中央关于对青年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

叶、罗并转山台刘晓、港台方、林：

据五月二十九日冀中来电称，辰养①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已与青年军二〇八师交谈。二十三日清华退伍军官两人，赴二〇八师联络，相谈甚详。二十四日清华学生代表三人，燕京二人，再赴二〇八师，由该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氏接见，并招待。陈氏否认青年军殴打学生，系外人冒充，并谓青年军亦有被清华学生殴打者，两校学生亦加否认。凡此误会均系缺少联络。陈主任请两校代表向同学解释，并召各连小组与同学联欢。青年军亦有剧团、球队，将分别举行友谊比赛，及提出两校学生留此，分别招待青年军到校参观。清华并应该军之请，由教授数人分期到该师讲演，实行联络。北平罢游时，各校参加过青年军之退伍返校军人数百，列队参加，并穿戴作战之全副军装，佩战功勋章，作大队前导之前导。游行时吃午餐，皆自袋中取出窝窝头大嚼，云云。据此，证明青年军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但应注意国特分子故意利用青年军与学校来往，以暴露学生中进步分子，同时，各地所采方法应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不要刻板照抄。

中　央

巳鱼②

① 指五二十二日。

② 指六月六日。

中央关于同意上海局学运方针的复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

叶、罗速转上海局并告香港分局：

沪局巳支①电，巳巧②始到。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学运的复课休整以巩固和扩大校内校外的同情运动和阵容并准备新的更大斗争的方针。在目前，宜使同情运动集中于反暴行要求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教授、记者及民主分子的问题上，各种组织也要与此相适应。蒋政府现正禁止全国学联的成立，我们应利用各地各校的签名运动，校内的后援会或共同委员会先求得几个地域的联合，以配合华北学联、京沪五地学联的行动，为全国联合准备基础，而不要马上集中一切力量于全国联合的组织，去便利敌人的集中打击。各校组织的整理和发展，平行组织和单线领导的坚持，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暑期工作与下学期工作的布置与干部的配备和调整，都要有适当的指示发给各地，以准备新的斗争领导。

中　央

巳皓③

---

① 指六月四日。

② 指六月十八日。

③ 指六月十九日

中央关于蒋管区学生暑期下乡中心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叶、罗沪局刘晓并转港分局及中青委、晋察冀城工部：

暑期学生下乡，其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当其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并取得群众信任后，则可组织群众，发动斗争。学生下乡，要依环境决定其组织形式，最好是利用社会和家庭关系，分散下乡，或者利用夏令旅行、采集生物、暑期教育等等名义（一般地不要再用演剧、歌咏等形式）集体下乡。宣传方式，要利用探亲、访友、访问、调查、教农民识字、讲故事、讲卫生常识、看病、施药等等机会，接近农民，引导农民由反对征兵、征粮、征差而逐渐认识到人民要饭吃、要和平的重要与蒋介石国民党卖国打内战的必然失败。工作方式，要避免暴露孤立，不仅在离开学校城市时，要避开国特、三青、警、宪的追逐，便在乡村中，也不要一下子就为联保主任、保甲长所特别注意，相反地，为便利工作进行，学生本身，要多吸收中间分子参加，活动方面，不拒绝上层拉拢，并尽量利用家庭亲戚关系，以掩护下层工作。群众组织，在有可能进行时，要利用社会上存在着的某些形式，团结起乡村中一些积极分子，常常集合，为斗争准备组织基础。斗争发动，如有可能，必须在当地农民为生活斗争的基础上，逐渐联系到反对征兵、征粮、征差或反对加重负担，要求救济（如两广水灾）等等斗争，以扩大范围。总之，学生暑期下乡，主要是播散反蒋斗争种子，学习与群众接近，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开花结果，其意义好象“一二九”以后的学生下乡为抗日战争播散种子一样，不过今日在蒋管区乡村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及工作方法更应适合今日的形势为要。但也应预先指出，学生在下乡时，如果发现有适合于自己工作的岗位，或在当地取得信用而被要求留下工作（如当小学教员），即应坚决地抛弃学生生活，留下去开展这一乡村工作；如果发现当地有进步分子，即应设法与之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工作。党委党组对学生下乡指示，不要普遍号召，而应经过各校核心分子，采取适合环境的办法，进行各种不同方式的传达，以避免损失。

中　央

巳漾①

① 指六月二十三日

〔附〕 沪局关于整顿、布置学运斗争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

中央，城工部并华东局：

山台巳支[13]电转如下：

（甲）为着打击敌人利用一部分中间同学和社会上层分子及校内教授对于无限期罢课口号的不十分赞成，对六二行动的恐惧，怕被加煽动者帽子，而进行分化孤立政策，我们抓紧五二〇事件所形成敌人的弱点，更大范围扩大斗争，从政治上更进一步向敌人进行一个反击（上海、南京均进行了全面总罢二天，职工亦开始开展同情运动，募捐慰劳，表示声援，且酝酿指数斗争）。迫使吴国祯不能不基本上接受学生要求后，即主动地宣布暂时休罢课。六二在校内纪念时，为争取中间群众，使分散群众再行集中，争取教授与社会人士，揭破敌人借口六二打击学生阴谋，作为应付敌人新进攻的准备。在五卅，敌人新进攻开始了，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敌人宣布工人指数高到二万三千倍，来和缓职工斗争，使学生运动与职工运动不能结合，而孤立学生，集中力量打击学生，首先打击上海学生。只要上海学生被击破，则可进行全面进攻，开始其新的四一二恐怖。因此，上海学生必须坚强抵抗敌人进攻，充分利用这一理直气壮的有利政治地位与社会及教授对我更大同情的有利条件（交大，复旦罢教，《大公报》态度的改变，某外国报的同情等等），展开更广泛深入政治进攻，再宣布继续罢课，一部分主要中学及大学作同情的罢课一天，或素食一天，以表示抗议及声援。为了表示全上海学生团结，与表示政府不能以武力以压服学生，正式宣布上海学联成立，包括大中学一百零二个单位，六二宣布全市总罢课，坚持反内战为民主斗争。现在正深入推进发动大规模抗议暴行要求释放同学签名运动，各校已与教授组织保障安全或抗议暴行释放同学的共同委员会。另一方面，进行社会人士中同情运动。现除交通、复旦教授外，其他各校教授，均大部分起来呼吁，并派代表向当局请愿。外国自由主义分子，男女青年会上层干部，学生家长，甚至连上海一部分耆老如张菊生、陈叔通、胡藻清等，也推动他们起来表示同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准备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各阶层联合组织与斗争。我们将不轻易采取示威游行的斗争方式，而采取这一深入广泛孤立敌人、削弱敌人社会基础，扩大我之社会基础与阵容，使敌人受威胁更大的斗争方式。在争取我之合法，迫使敌人非法，迫使敌人不能不暂时停止其攻势，准备我们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新的更大斗争，把斗争向前提高到各阶层联合反国民党斗争。在职工中，除扩大声援同情来壮声势外，还积极准备即将开始（大约在端午节）作更加发展的生活斗争中为斗争向前发展的主□（此处可能掉字——译电员注）……

（乙）由于在敌人进攻下，我之主观力量受到相当打击（上海被捕八十余人内，党员四十人，重庆损失更大，大部被捕），群众恐怖情绪逐渐增加而分散（交大在校只有二分之一，复旦仅有五分之一，暨大、同济也只有三分之一），群众疲劳（前后相持一个月），教授已开始起分化，不能在今天方式上坚持，某些积极分子有被迫辞职之危险，暑期即将有提

早放假可能。敌之被迫暂时停止其进攻，而进行新的群众与社会上、舆论上的准备。因此，我们为着更联系群众，作深刻准备，巩固后果，在策略上不能不在一定条件下复课。在复课姿态上，继续进行斗争。这对我们更有利，因为斗争更合法，更合适同情者继续支持，可以集中学生回校，进行整理，更可进行长期工作的准备，把几万学生组织起来，深入各阶层及农村，展开一个普遍社会宣传运动，把运动向更高阶段推进。同时，争取时间，休整组织，配备力量，总结经验，提高干部，推动助学运动，以准备新的更大更残酷斗争。

（丙）其他各城市，也根据这些策略把斗争深入与普遍变成各阶层的联合运动。是否正确？请示。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月）

毛泽东

一　五月八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

为着于六七两月内，击破顾祝同①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三十个旅）之目的：

（一）刘伯承、邓小平军仍按中央五月四日电，争取于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六月十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月一日时局与任务指示②，应作普遍传达。

（二）陈毅、粟裕军在六月十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震林率七纵亦似于六月十日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二　七月十九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谢富治、韩钧的电报

---

* 中共中央确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按照这个任务，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六日三十日晚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的外线兵团于八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太岳兵团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到十月底，三路大军基本完成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这里选辑的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挥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电报。

① 顾祝同，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后，顾祝同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军队。

② 即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起草的党内指示。参见《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一〇七页《迎接中国革命新的高潮》。

（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赓、谢富治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德怀、习仲勋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二）提议赵基梅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三十八军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

（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八月十九日以前渡河。

（四）一切准备注意机密。

（五）陈赓日内回太岳。

三　七月二十三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的电报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八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

（二）陈士榘所部在未能出泗水、曲阜与叶飞、陶勇会合因而不得不出鲁西情况下，邱泉、吴绍周两集团③可能迅出鲁西，并可能集中行动，不利歼击。因此，陈士榘、唐清亮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作战。

（三）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四）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

③　指由邱清泉指挥的国民党整编第五军和吴绍指挥的整编第八十五师两部。

四　七月二十九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的电报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关、洛阳，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飞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五　七月三十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及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电报

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基梅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渡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三十八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八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六　八月五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电报

待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五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五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清泉、欧震西渡；主力集结郓城地区休整，并在郓城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保证北岸接济。该五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在局面没有大开展时期内，该五纵主要任务是直接钳制邱、欧，即借以间接钳制陇海线上及其以北之敌，而不是直接钳制陇海及其以北之敌。只要该五纵能于你们出动以前制止邱、欧西渡，又于你们出动后能在鄄城、郓城地区立住脚跟，不被邱、欧切断后路，则不但邱、欧不敢使用于进攻你们方面，即金乡、菏泽等地之敌，亦将不敢轻动。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七　八月六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谭震林，陈赓、谢富治的电报

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十师两个旅、七十九师一个旅及骑一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雒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

量大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八　八月六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告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的电报

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陇海（桂系等）三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清泉、欧震；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城、巨野，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九　八月七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裕粟的电报

（一）你们至少一星期不动，帮助陈唐叶陶休整，并待陈粟到来。

（二）陈粟集中六个纵队于郓、鄄地区筑工固守，控制黄河渡口，不怕邱、欧来攻。万一不能守，退至黄河以北转攻泰安一带，邱、欧亦不敢南下，孙震、刘汝明亦不敢全部南下。

（三）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

（四）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先打陈粟。

（五）只要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

（六）叶飞、陶勇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望即告。

十　八月十二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

有三点请你们斟酌：

（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

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四）以上三点，如刘邓认为可行，则请告知陈唐叶陶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到四八年元旦）

陈　毅

（此报告系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这次本不打算到北边来的，因我们的军队已经南下到豫皖苏去了，队伍离开了山东，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我到了太行是为解决些战争配合，以及部队供给粮食、票子等问题。以后石家庄解放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来电叫我到阜平，把野战军工作报告了一下，毛主席又来电要我到陕北，同时那边野战军的工作也需要向中央报告，因此，我这次来是被动的。

华东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没有做过详细的总结，在太行、在晋察冀中央局报告过一次，这里又要我报告，我讲的没有系统，用漫谈的方式希望同志们听了研究纠正。"大的战争考验是严重的，局势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事前无准备，吃亏不少。在晋察冀的情况也差不多，坏的现象应有尽有，当然好的现象也差不多。个人的经验教训很少，有些经验教训是很痛苦的，我们山东报纸多登好的，主要是打气，我们坏的地方更多更严重，错误也不断，依靠个人的自信心是很成问题，战争不是容易的事，个人的作用很少，微乎其微，主要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党、靠群众。"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叫做"一年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分下面八个问题来讲：一、战略问题；二、战役问题；三、战斗技术；四、政治工作；五、后勤工作；六、反攻和新区情况；七、国民党方面的解剖；八、结束语。

一、战略方面

（一）一年来伟大的自卫战争总结，首先是战略总结。战略是敌我双方的思想战、精神战。毛主席与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许多国民党的俘虏兵都说："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俘虏的蒋军师长、旅长等也这样说的。他们对我们部队看不起，认为我们军队不懂军风纪，武器杂乱，甚至连口令也叫不好，有时闹出笑话。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有些不服气。我们回答："不管怎样总是把你们俘虏来了"。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则愈强，如旅

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略战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国民党的战略指挥主要是美国人，马歇尔是世界有名的军事家。因此，我们的战略胜利不仅打败了蒋介石的统帅部，而且打败了美国的统帅部。我们的战略有世界意义，在全世界是崭新的、优秀的。如果我们军队再能把战术提高一步，配合优良的战略指挥，在世界上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军队。

我们俘虏的旧军士兵，现在有的已当上了排连长，他们有一普遍的呼声，要求我们改善指挥。说："你们的指挥是肉弹主义，采用集团冲锋，英勇固然好，就是要多死人。"我们为此抽了一些班长当兵，排长当班长，连长当排长，营长当连长，旅团长当营长，组织两个营作战斗演习，许多团旅长甚至纵队司令员因常打仗，平日很骄傲，一演习战斗都不行，旅团长不能当营长，连长不能当排长，排长不能当班长，暴露了我们战术上许多严重的缺点，这样使我们很多指挥员虚心了些，知道自己的战术不行，现在部队提倡学习战略，由此学习战役战术，提高战术战斗动作。这对部队是重要的。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华东野战军伤亡十七万人，到现在约有二十万人，这表现了我们的英勇，也说明了我们战术战斗的蠢笨与落后，伤亡很大，否则伤亡是可以减少的，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北伐时期的战术，采用波浪式的集体冲锋。

（二）我们的战略战役问题表现特别突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全部消灭敌人，即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了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时机转入反攻。采取这种战略方针，要舍得丢地方，抛出空间，争取时间，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以退为进，先退后进，逐渐改变敌我的形势。一年来自卫战略的基本方针和战争全部过程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如华东战场我们把敌人诱入山东，一直牵到胶东烟台那个牛角尖上。西北战场诱敌进到绥德、葭县，冀鲁豫战场也是三进三出，敌人进到黄河沿岸，甚至渡河攻占大名府。敌人不断占我们地方，也不断被我们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他们每进一步，占领我们一个城镇，必须付出几个旅的代价，反复如此，这中间是有矛盾的，但到一定的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不得不停止了，我们跳过来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反攻，敌人是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出让地区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我思想斗争也就是这一问题。战争的复杂奇妙为古今中外所未有的。

这是个新问题，但也是个老问题，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在苏维埃内战初期，井冈山时期，这个战略思想就开始形成了，就有了一个草稿，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北伐时期与今天不同，北伐时是一往直前，没有后退的。北洋军阀一直垮下去，北伐军一直前进，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不同，北洋军阀非常腐朽，北伐军异常精锐，能够一往直前，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以农村条件和新式武装的城市作战，就出现了这个战略方针。敌人进攻，我们后退，再进再退，必要时我们退出井冈山，另建立根据地，因为敌人是强大的，有现代化的武器，有依据城市，经济力量比我们强，我们革命军队是处在农村，由工农和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没有正式军队，也不懂军事，敌人来就打，硬碰硬非失败不可，敌人恰恰希望我们这样做。敌人集中又有准备，我们先让他扑了个空，使他精神松懈了，防备不周，如能打则打，不能打时，让敌人再进，又扑了空，精神更加松懈了，造成我们有利条件，我们即可将他消灭，壮大自己，又削弱敌人，这样我们胖了，敌人瘦了。毛主席以十六个字概括这种战略思想，即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

退我追。”一年来自卫战争并没有出这个范围，敌人进攻是因他强大，我们不能和他硬拚，不明敌情是不能乱砍刀的，一定得往后退。敌驻我就乱打冷枪、摸哨、破路，使敌人不舒服，精神疲乏，敌疲劳了，我们休息好就打他。敌退我们就追击，收复失地，打开新地区。这种战略方针，主要是研究敌我力量的对比，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最后才可消灭敌人。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唯一办法。研究了苏维埃内战时期广西、赣东北、湘赣红军的经验，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此。广东海陆丰不照这个规律，虽然那里的农民条件很好，还有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的部分军队参加，但是最后还是垮了，失败得最惨，就是因为打硬仗，不愿离开海陆丰一步，当时他们认为见了反革命不打就是机会主义。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地方主义。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敌人进攻到非要离开根据地不可时，井冈山可以不要，另去开辟根据地，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叫做“后发制人”，准备好后再打，与历来旧军事思想“先发制人”不同的。

长沙战役以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成为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使这一战略内容更丰富了，原则更扩大了，那时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不怕苏区被敌人占领，不怕坛坛罐罐被打烂，使敌人深入以后，再聚歼他一部分，结果是国民党军之张辉瓒、蒋鼎文、毛炳文、朱绍良等部都先后被我消灭了，因为敌我强弱条件未变，我们唯一的长处是政治条件，即群众条件。将敌人引入我熟悉的地方，敌人的长处变为短处，才易最后将他消灭。那时有人从莫斯科回来，硬抄教条，强调苏联“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结果失败了，全部苏区被搞掉，几乎全部红军都被消灭。实际上苏联也并非机械的实行“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次苏德战争也是诱敌深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来消灭敌人，因为当时希特勒统治整个欧洲，他用整个欧洲的力量压在苏联身上，也是敌强我弱的形势。

抗战八年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强，我们战略“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利用我们的长处和农村环境，以疲惫敌人，进而消灭敌人，求得敌我形势逐渐改变。现在革命形势不同了，我们提出基本上是运动战的方针，其原则仍不变。这次自卫战争的指导是综合了苏维埃内战时期、长征时期、抗战时期的经验，一年来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古代军事思想也有过这一战略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一书中，为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曾引用左传一段话：“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主张后发制人，以退为进”。水浒中林冲与柴大官人的教头比棍，教头骄傲轻敌，林冲先让他打几棍，看出他的弱点，结果一棍将教头打倒。拿破伦进攻沙俄，五十万军队一直送到莫斯科，当时库图佐夫主张一直撤退，甚至把莫斯科也烧了。等冬天一来，转入反攻，拿破伦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五万人回到法国。燕国攻齐，一个多月连下七十三城，田单守即墨守了三个多月，燕国攻不下，军心松懈，转入反攻，一个多月收复全部失地，消灭了敌人。淝水之战，秦符坚出兵百万，都是骑兵，吹牛说：“投鞭可以断流”，晋兵只有七万人，谢安、谢玄选择淝水地区为战场，那里遍地皆水，骑兵无用，一打即垮，秦兵百万前面的被打垮了，后面还在长安未出发，互相践踏死的不少。毛主席是研究了敌我强弱、政治条件、气候、地形等条件，得出这一军事思想，并将他完成一个体系，写成学说，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的军事思想，这次战争运用的更广泛更复杂。执行这一方针不是容易掌握的，且为一般人不易理解，这里讲几个故事：

一是美国人，去年六月底驻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克里门将军来到临沂找我，他自吹牛皮法

国登陆有他，北非登陆也有他。他希望我到青岛与反革命王耀武见面，我拒绝不去，他说："那么战争非打不可了！"我说："不是我们要打，是国民党要打，我们是不打出去的，如国民党要打进来，我们一定要应战。如果你真有调解的诚意，去跟国民党讲。只要国民党不打就行了。"他又问我："战争打起来，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初期两淮、临沂要放弃，甚至张家口、延安也可能失守。"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国民党力量大，你们美国又帮助他。"他说："那你们何必打，讲和算了。"我说："不然，半年以后形势会完全变化，我们会打垮他，他进攻两淮我们可消灭他多少，进攻临沂可消灭他多少，进攻延安消灭他多少。"最后他晃着肩膀说："我不懂，你们又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问题真复杂。"我说："占领临沂不容易，进来就退不出去。"毛主席这个军事学说全部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特点，是外国人所不能懂的。最后我又告诉他："现在你不懂，一年以后你就懂了。日本开始也是不懂，八年以后懂了，要他无条件投降"。

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当我们失了张家口、两淮时，他很着急恐怕我们要失败，但在三个月后他承认了错误，我们不守张家口、两淮是对的。

三是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有上海和武汉两个新闻记者，他们也许是自由主义者，也许是左翼，在克里门走后第二天找我发表谈话，我说："现在要打仗了，不发表谈话了。"他们要我谈战争，我把和克里门所谈的问题谈了，他们大吃一惊，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是真话。"他们说："这样动摇人心，民主人士会不干了。"他们正在宣传我们会打下徐州、南京，我说："没有办法的事，第一年人心动摇，第二年人心巩固，第三年人心欢喜！"他们以为我骗他们，是为着保守军事秘密，我叫他今后看事实就会了解我讲的是真话，实际上这个道理是很难为人了解的。

四是汉奸郝鹏举：他叛变前几天来找我，他说："延安报纸说消灭这么多敌人，俘虏这么多军长、师长和旅长，我认为是战役战斗上的胜利，蒋介石已占领我们二百多个城市，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意思是我们不行，蒋介石靠得住。我说："我不是军事教员，但是许多军长、师长让人家捉去了，不会与战略无关，世界上没有这种战略，我们失去的二百多城市很快就可恢复的。"他不相信我的话，回去后没几天就叛变了。

这种战略方针只有革命人民革命政党、革命者才能了解的，对其他人是说不通的。苏联武官在三个月后就了解了，所以他承认了错误。这种战略有国际的意义，对近代军事学说有新的发展。苏德战争也可得到证明的。但他不是万灵膏药，这是人民的军事学，革命的军事学，单讲两个军队，弱军可以用这个办法，两军相等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主要是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若是我为绝对优势，敌为绝对劣势就不用这个战略方针。就象大人和小孩打架，一下把他抱起摔倒地下就对了，用不着先退两步再去打他。我们与国民党比，军事上相对的弱、政治上绝对强，国民党在技术上、财政经济上是相对的强，政治上却是绝对的弱，因为他卖国独裁内战，他不可能采取这个战略。若采用了失败更快，这个问题是反革命不能懂得的。

（三）其次为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几点经验：

第一、反对逃跑主义。一方面是有秩序的撤退，一方面是在敌后坚持斗争。开始执行这一方针，党内多不信任，有很大的震动。逃跑主义表现在和平观念未完全转变，敌人一到，主力一撤退，人心动摇，认为敌后不能坚持斗争。说抗日是民族战争，日本是外国人，各阶层都反对，敌后容易坚持。现在是内战，蒋介石有他的社会基础，地主富农是他的天然基础，敌人一到，地主，富农就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就站不住脚，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也站不

住，不愿坚持斗争，不管你经过组织许可不许可，从华中纷纷逃跑到山东，不讲纪律，不讲秩序，以为华中不能坚持了，结果到山东没有组织介绍信的，我们坚决要他们回去，不给饭吃，不给房子住，把他们的理论打破。

我们说抗战时能坚持，内战时同样也能坚持。统一战线更有广泛的基础。今天很多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都被蒋介石搞垮了，很多地方土地改革提出"挖蒋根"的说法，是不策略的。蒋介石原来没有群众的，你硬送群众给他，硬把所有的地主、富农算成蒋介石的是不适当的。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但不一定都拥护蒋介石，因为蒋美的政策是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蒋军多是客军，是两广、四川人，语言不通，他们把解放区一概认为匪区，到处奸淫烧灾，对地主、富农更凶，因为地主、富农的女人更漂亮，财产多、屋子好，他们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便乱搞。有些地主说："我们被清算了！"蒋军说："妈的皮，你投机"，更搞得厉害。我们调查了苏中几个区的地主、富农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跟我们走的，二是愿意守中立的，认为天下大事胜负未定，不反共也不反蒋，三是极少数坏的，破坏我们，我们就搞掉他。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地形不熟，讲话也不懂，每个军常带几百个"还乡团"，其中也可分三种人，一种是回乡搞点财物，取点底财，赶快回南京、徐州。他们说："新四军真厉害，住不久"；二种是外乡流浪多年，没有饭吃，老婆、女儿卖淫为生，一回乡马上和农民搞好说："给我分一分土地耕种，我再不反共了"；三种是流氓汉奸特务坚决搞武装破坏我们。由于我们各线连续打胜仗，鼓舞人心，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国民党的逃兵，我们放回的俘虏，他们都说："共产党又消灭国民党军队多少多少。"结果"还乡队"都来向我们声明"不反共"。因此我们数百人的游击队，就可坚持一个县的工作。开始从华中撤退时，只留下六个团，每团不过千余人，最近没有主力帮助，大部分地方都收复了，许多乡村没到过蒋军，也说明敌后是可以坚持的。靖江、江都、南通这块地区，经过敌人连续三个月的"扫荡"，但除靖江县委及县大队因麻痹在一个地方住月多不转移受到损失外，其他地区没有受到损失。敌人的区乡公所始终建立不起来，全在县城里办公。因为蒋军纪律坏，搞翻了老百姓，他没有正规军就建立不起区乡公所，如每个区都要一营正规军，那里有这么多正规军呢？所以我们只有在敌后坚持，那里才是我们的。我们在华中暂时退出城市，广大乡村仍是我们的。

有秩序的撤退，我们从华中撤退二十万人，一些必要的器材、工厂、银行、荣誉军人、家属、医院、及后方机关、工作干部等，要预先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到枪声响了再撤退是不成的。沿途设兵站招待所，准备好粮食，这样撤到山东的成为很好的宣传者，无秩序撤退的就变成流亡政府、难民，散布失败情绪、惊慌失措，他们到山东后把金融也搞乱了。华中票子到山东买东西商店不要，他们说："毛泽东出的票子，你们为什么不要"，后来有些伤兵就不用票子，见到合作社就乱拿东西。

撤退不能太劳民伤财，华中有很多花生油、棉花、粮食，都没有撤退，分给了老百姓，如这些东西撤退，需要一千万民夫，因为动员太多，沿交通大道的老百姓有的把大车烧了，牲口杀了，以避免动员，有些无组织的撤退，结果把钢丝床、沙发，以及很多书籍都带走，我们就组织检查站，在交通要道上将这些东西没收送给老百姓，如老百姓不要就放火烧了，这样把思想问题也解决了。

经过我们组织动员后有三四万人重回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没有回去的很后悔，流亡山东被人看不起，政治上又犯错误。在开辟敌后工作比较好的方式是先组织精干的小型工作组，

我们中央局军区曾组织了好些工作组，先回去几天，就回来座谈敌后的情况，又回去活动一个礼拜，又回来座谈总结经验，又回去就住下了不回来了，采用这种方式回去好多人，当时我们都在前线，故有此条件。

第二、关于保卫城市据点，要防止两个偏向：一是拚命死守，寸土必争，另一是不战就逃跑。有的城市要适当的必要的保卫，多保卫一些时期是有价值的，这与死守不同，死守是愚蠢的。我们必要的保卫城市是有两种作用：一是掩护撤退，稳定人心，二是争取时间，使我们获得在主要战线上的展开。保卫据点并可锻炼我军的守备力量，使我们一个打敌人十个。但我们反对拚命死守的，敌人是希望我们死守，怕我们撤走了，不和他们展开真面目的战斗，我们保卫城市与死守城市有区别的，放弃一地要有一定的代价，不能不战而随意放弃。我们二次保卫涟水，当时有些干部说："涟水城不过一千五百人口，直不得我们一万二千人的伤亡来保卫，不知道我们第一次保卫涟水是为掩护伤病员、家属及大批后方机关等撤退，我们伤亡八千人，把敌人打退了，使敌人侵占推迟了一个月时间；第二次保卫涟水，是为争取在侧翼主要战线的展开，使敌人疑为我们主力在那里，拚命追攻，我们伤亡四千人，却造成宿北大捷，消灭敌人一个军，这些干部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战略意义的。

第三，决战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急性病的反映，他们认为不决战，拖来拖去将人都拖死了，埋怨领导上为什么不决战，是拚命主义的表现。有些同志主张要打就先打敌人的主力，不打较弱的。他们不懂得敌强我弱，战争的长期性。敌人是愿意和我们决战的，我们本钱少一决完了，就没办法。敌人本钱多，有许多的后备力量，我们同他决战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方针是选择有利条件全面歼灭敌人。一个俘虏旅长说："与共产党打仗真不痛快，要打时你又走了，不打时就被你捉住"。决战思想的另一原因，因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头脑发烧，轻视敌人。他不知道敌人只是打伤，还没有打死，敌人力量相当强大，对长期战争没有耐心。两淮战争时敌人想同我决战，我们没有上当，下边不断讲怪话。领导上不能放松对这些人的教育说服。毛主席说："决战要分多次来决"，一次决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分为多次决战，每次歼灭战都带有决战的意义，如莱芜之战，孟良崮之战，鲁南之战，苏中七战七捷，每次都有决战的思想。象吃梨一样，先把皮剥掉了，切成一片一片的吃，你一口吃下去，非把喉咙弄坏不可，甚至塞死。象喝一杯茶，一口一口的喝，直至一杯喝完，如一下喝完，也会把喉咙呛坏。我们对日本的决战是决了八年，最后才把它打败了的。

我们华东野战军开始消灭敌人一个旅算大胜仗，以后消灭敌人一个师才算大胜仗，后来认为消灭敌人一个旅不算什么。有些人看消灭敌人几百人，连战报都不愿写了，毛主席说：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有些人就要求打敌主力，不愿打保安团、还乡队，以为消灭了也不算数，实际上敌人的保安团、还乡队是蒋介石的基础，你消灭了一个保安团、还乡队使农民土改能顺利的开展，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团的意义还大。有些部队对打汉奸更不高兴，郝鹏举叛变后，派部队打他，他们认为是看不起他的战斗力，倒霉的事情。当时我们发表谈话说："临沂人士对郝逆叛变非常冷淡"，其实我们真不高兴，你吃了解放区这么多小米，胡子一抹就走了。我们应该把他消灭了，将他捉回来了，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军影响还大。

我们打敌人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强的吃不消，弱的也壮起胆子了。如先把弱的消灭了，其他同样的敌人都恐慌被歼，强的敌人也变成孤立，慢慢转为弱的。先打弱的敌

人，强敌可以变弱，这是辩证思想，是科学的思想。七月间打十一师没有将他消灭，我们部队撤出来。路上碰到伪军吴化文的部队，也向我们调起皮来了。

第四，集中兵力首先反对地方主义，这对我们有很大的经验。在日本投降时，山东有部队卅万，内野战军五万，苏中二十万，内野战军三万。初期五十万军队，在第一线作战的只有八万人，其余都是分兵把守，地方部队调都调不动。苏中七战七捷是蒋军分散，一个旅为一路前进，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所以打了七次胜仗。淮北敌人把三个军集中一起，不好消灭。双方兵力相等，只消灭他一个旅。后来华中撤退，集中了卅万兵力，经常保持六人打敌一个人，所以有泰安、莱芜、孟良崮等五次胜仗。只保守一个地方，是不行的，主要战线胜利了，其他各地都可解决。撤退到山东，也是为的保卫华中，这点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对集中兵力有很多意见，在厕所里写起诗来："反攻反攻，退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何意见，打回华中。"后来他们了解集中兵力的好处以后，又有人批评集中兵力过晚了，不知集中兵力要逐渐的集中，一下子把地方部队全部集中也不好，使地方政权天天打游击，无法进行工作。集中兵力时，在次要方面仍需要留些部队牵制敌人。不可过分集中，最多集中到地方兵力不超过三分之一，要采用割韭菜的方式，不可连根拔掉。

二、战 役 问 题

战略方针要战役战斗来实现的，战役是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年来胜利和失败的规律，去年七月后，苏中我们七战七捷，后来保卫两淮，打泗县及海安三个战役未打好。初期鲁南打了三仗，胶济线小的战斗很多，大的歼灭没有。去冬宿北战役后，部队集中了，在宿北、莱芜、鲁南、孟良崮等地打五次仗，都打好了，今年七月后，转入反攻，八个仗只有三仗打好了，也只消灭敌人四个团，对局面影响不小，九月在沙土集打好了，以后在陇海路南主要打河南的保安团，六个保安团都被我们消灭了，县长都被搞光。

（一）一年来战争出现这样的规律"此起彼落"，先打了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又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常胜的将军，没有一直打胜仗的军队，也没有一直打仗的军队。打了胜仗就骄傲容易栽斤斗，栽了斤斗爬起来是不容易的，主要是主观上的原因。就是苏联也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后才反攻的，我党二十余年的历史也是胜败的反复。胜利了便轻敌，种下栽斤斗的因素，失败又是胜利的因素。领导上主要是在栽了斤斗之后，如何领导爬起来，如我们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在两淮、泗县就未打好，经过检讨失败原因，大家虚心了，谨慎了，所以又打了胜仗，连接在宿北、鲁南、孟良崮等地打了五次大胜仗；可是在以后就轻敌骄傲在七月反攻后，七仗就有五仗未打好。

敌人也有同样的现象，汤恩伯初期在苏中有六个军，他轻敌结果被我们打了七捷后，他就小心了。薛岳有八个军，初期他接受苏维埃内战时失败的经验，很小心，行动很慢，经常集中三个军在一起，不用无线电，用汽车送信，我们与他们兵力相等，不容易消灭他。且淮北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牛斗牛的形式硬顶。我们后来打泗县没打好，放弃了两淮，他就骄傲了，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大胆进军，结果被我们消灭了几个军。

我们也是这样的，胜利时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人肥遮百丑，马瘦则毛长，胜利后是高兴的很，不容易检讨自己。一年来我们打了大仗卅余次，三分之二打好了，三分之一未打

好。战争没有一帆风顺的，是此起彼落的，三分之一仗没有打好，没有很好的检讨教育，这主要是主观上的缺点。

我们部队打胜仗要克服骄傲的情绪，打败仗要克服悲观的情绪。由于部队成分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俘虏的成分很大，有的连队百分之九十是俘虏兵，班长带哨都怕，打胜仗时没有什么，稍有不利就出毛病了，怨言到处发生，你埋怨我，我埋怨你，说什么嫡系与非嫡系呀！常常以个人观点来代替党的观点，以个人的本位来代替党的本位，骂别的部队不好。华中撤退时，我在会上说："张家口、延安、哈尔滨都可能丢掉，不然不能胜利。"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当面讲，心里是不服气的，一年后事实证明了，才服气，有的坦白说出来："现在相信了，以前怀疑军长犯了机会主义。"去年七月五个仗未打好，下边说怪话的很多。有的说："司令员的命令要讨论后再执行。"发展到极端民主化。以后打了几次好仗，又说什么："英明领导天才地才"。张家口丢掉，有很多就骂晋察冀的部队不好，小广播乱传，我们说："晋察冀部队有很多老干部，比我们强，不久之后一定能打几个胜仗的。"果然经过清风店，石门、元氏等地的胜利后，许多人的观点改变了。胜利英雄，和平时期的英雄，人人能当，可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在低潮的逆境下，能坚持工作是不容易的。

我们部队有些人，在打了胜仗之后，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就是他自己打的一样，别人都不在内，我说："没有华东，其他地区仍可打败蒋介石的。华东不过是牵制敌人一些兵力。"我们的胜利是整个的，胜利的原因：一是我党二十余年来的优秀战略方针的正确；二是野战司令部组织战役的周密；三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四是人民的拥护；五是敌人犯了错误。不是任何个人与部分的力量所能创造的。就是一个仗打败了，也不是我们胜利的条件没有了，而是我们主观估计不足，没有组织好。有的部分打不好仗，大家骂，看不起他，干部也不安心。我们不能将整个组织作用看成个人的，也不能以暂时的现象看成长期的。

常常碰几个钉子有好处，失败后的教训是比较多的，可以看见自己的缺点，跌了斤斗要爬起来。毛主席是全国全世界驰名的，他的经验是二十年来受了许多挫折综合总结起来的，毛主席的历史不是顺利的，受过挫折的，有时为一些人不信任。张家口、两淮失守后，波动大，大家乱骂；临沂、延安失守后，波动就小了；一年后的今天，把从前骂娘的也纠正了。

一年多来战争的难关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今后还有困难，我们思想上仍要有准备。

（二）战役的准备……（略）

第一，决定打一个仗，在事先的准备动员会要开的好，在纵队、旅指挥员会议上作战计划经大家研究讨论，会上发言积极，顺利通过，命令经大家研究后写好发出，且要他们回去召开团、营长会议。大家研究同意了，全体指挥员都了解整个的意图，往往能打胜仗，如果有几人不来参加，或会上没有发表意见，发言也不积极，很免强的接受任务，则仗一定打不好，所以在准备会上一定要很好的动员，使大家都了解，战役目的，只是少数指挥人员知道是不行的。一定要下面大家都知道。如果准备不好，那么干脆不要打，犯急性病是要不得的。

第二，事先要充分的准备弹药：敌人一到宿营地就构筑工事，修地堡，搞围墙，鹿墙一天一晚就可以做好，同时在平原作战，不易隐蔽，且村落很密，村落多有围墙有碉堡，大都是村落战，攻坚战、巷战，一定要明打，没有什么运动战埋伏战的，所以弹药是很大的问题。司令部要抓住一部分弹药，万余斤炸药，数千发炮弹，不要一下都发出去，把弹药乱放光了，以备在总攻时，下面弹药打完了，司令部就可把自己掌握的弹药接济上去，往往能解决问题。刘邓部队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数次仗没有打好，就是因为弹药接济不上。我们

进行一个战役，在相当距离外即布置好，赶上敌人打起来，往往第一、二天是小打，先把敌人消灭一部分，第三天是总攻，如果第三天打不好，那么就撤下来，不要继续打下去了。作战时第二梯队要防止飞机的轰炸扫射，每门迫击炮要准备三百发炮弹，山炮五百发炮弹。

第三，粮食民夫的准备及伤员的救护。消灭敌人一个旅，我们要有一千多人的伤亡，消灭两个旅要伤亡二、三千人，消灭一个军就要伤亡七八千人，同时敌人还有二、三千的伤兵，救护伤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很好的组织，丢了伤员则影响很坏。我们医院经常要保持一万个空床位，有五万个伤员分布在二十余个医院里，我们部队在山东打仗经常有三十多万人，每日每人二斤粮食，再加上民工吃的，是个很大的数目，一天即需七、八十万斤，常常需要二、三十万民工、两万辆大车运粮，再加上运炮弹、子弹的，需要很大的民力。所以在一地作战就要烧光吃光的，打孟良崮时因运输供给不上，部队三天没有吃饭，因部队走一天百余里，民工就要走二、三天。今年敌人在山东重点进攻，我们部队也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后不得不分散，因为吃光了，山东虽然富庶，也吃不消。我们作战时，县长、专员、县委都成了民工头子，带民工搞运粮食、油盐、菜蔬。幸得我们有七百辆汽车可以运输弹药抵了大事，现在有的零件坏了，还得修理。

第四，通讯工作，电话网之沟通，战役之前一定要搞好。从野战司令部直通到团部，有时几十里甚至二、三百里，需要很多的皮线。电话网畅通，往往打好仗；不通时，往往打不好。这里叫不通，那里也叫不通，你发脾气，也没有办法。所以电话组织很重要。

第五，接敌的情报侦察与封锁消息很重要。部队包围歼灭敌人，往往距离两天的路程，过近了不好，在战斗前俘虏兵一开小差，就把秘密泄漏了，打不成仗，两天的路程，也弄不清情况，一下跑不到敌人那里，等他跑到了，我们已把敌人包围起来。

第六，侧后游击队的配合作战，使敌人摸不清我之主力。

以上条件弄好，打胜仗就有把握。

（三）要打歼灭战，在兵力使用上，要用一、二个纵队截断敌人的归路，从敌人军与军之间大胆的楔入敌人纵深，走入敌人阵地内去包围敌人，使敌人全盘混乱，互相不能联系。这个部队很重要，要精锐的。如把敌人的归路一切断就能打胜仗。

（四）楔入敌人纵深之部队，首先把敌人的指挥部打乱或解决，打乱其电话，卫生机关及八大处，打垮其坦克和技术兵种。如鲁南战役和宿北消灭戴子奇都是这样。

（五）战役上要分割支解，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敌人都包围全吃，这样吃不下。可先集中力量搞一部，然后再搞其他的。要用吃梨子削萝卜的办法，去分割敌人，如敌人有三个军，先消灭其一个军，再消灭二个军。欲消灭其一师，先消灭其一旅，欲消灭其一旅，先消灭其一团，不能用一杯干的办法。

（六）造成上述条件后，最后解决战斗，把敌人压缩一狭小地区，然后用炮打，这样打集中的敌人，容易使敌人动摇缴枪。如莱芜战役敌人突围被一个旅阻击五天五夜，倒退回莱芜，该城又被我军占领，于是五万敌人挤在一条长二十里，宽四五里的山沟沙滩上，我炮兵一炮打到敌人司令部的骡马队，骡马又跳又叫，全盘混乱，士兵都叫喊："缴枪，缴枪，老子一辈子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就投降了，战斗总共不过三小时。孟良崮战役也是把敌人挤在三个山头上，中间一个鞍部我们用炮轰，一炮打倒几十个，连山上石头也炸死敌人，敌人很快便缴了枪。

（七）扩大战果：消灭敌人一个军后，整个战线动摇崩溃，这时要不顾疲劳追击敌人，

往往以很少兵力可以解决大量敌人，一团可解决敌一、二个团，一旅可解决敌人一、二个旅，我们的缺点是缺乏预备队，所以追击敌人部队很少。

（八）钳制：打敌人的增援部队，过去蒋军增援不积极，现在日夜增援都很快。如果钳制敌人打好了，就可以胜利。但我们的部队是不愿打钳制的，因为不能缴获胜利品和捉俘虏，且要挨打，原因是部队不会做工事，被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轰击下，冲几次便垮下来，敌十一师被我们包围五天五夜，挤在两个村落里，因钳制部队不得力被接走了。

（九）战后处理：战斗完后，往往打枪打炮比战斗时还厉害，有时不敢前去看，往往打死自己人，同志们比枪、比表、比钢笔，争俘虏、争武器、试枪、试炮打手榴弹，特别是新式武器大家都想试一试，开汽车数十辆汽车一齐乱跑，冲死人也不管，这种游击主义，不克服是很危险的，无法打扫战场，而且影响兄弟部队团结，主要原因是连、排管理问题，有时干部因几天没休息很疲劳他们睡了觉，而发生这些问题，指挥员需注意克服这些现象。

我们的缺点：

第一，在战役上扩大战果不大，是缺乏足够的预备队，钳制部队兵力较多，不能连续作战，如部队注意做工事地堡，增强防御力量，能够减少钳制部队。

第二，我们的战役侦察好，但战术战斗侦察直接与近距离的侦察很差，有的两三天摸不清敌人的情况，所以以后用捉俘虏和组织便衣队的办法进行侦察。

第三，雨季战斗对我们很吃亏，我们军队没有油布雨伞，以致战斗间手榴弹潮湿，炮弹打不响，我们这次到豫皖苏洪水遍地，又没有工兵架桥，往往一天才走二、三十里，一晚才走五里路。在雨季时我们最好不作战，可以整训，派出小部队进行游击活动。去年我们在淮北，今年在山东的两个雨季都使我们打仗不利。

第四，对敌人的研究太差，象晋绥总结汾孝战役的经验，我们那里是没有的，对新来的敌人情况都是用电报问，（敌原来驻地的战略区）抓不住敌人的弱点。我们印刷一些对敌人研究的材料，也不过敌人官兵矛盾，进攻力量差，守备可以会做工事，不善野战，一套党八股，多是主观主义的。后来我们把五军及其他部队的俘虏兵组织到一起，指定其中的指挥官，演习其他原来的战术战斗，可以得出其特点，所以要向俘虏学习，不了解敌人的情况，盲目的进攻敌人，是会造成我们很大的伤亡的。

战略一定要与战役联系起来，我们撤退的地方，一定要歼灭敌人，农村还要控制，战略是以战役战斗胜利来实现的。我们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战术的固定性，一切都按步就班的没有灵活性，往往丧失时机。另一种倾向是猛冲，不顾一切，听到枪响就往那里跑，跑上去便打。上述两种倾向各有其特点，前者动作慢用于钳制敌人好，后者勇猛动作快，用于袭击敌人攻坚好，但要防止其遇到强敌碰钉子，产生悲观情绪，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组织训练两者兼顾的学校，就现有基础上，欲达到消灭敌人，主要是勇猛精神。

三、战 术 战 斗

战术战斗动作自己看的不多，听的也少，我现在要说的战术战斗动作是我们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

第一，由于我军多是翻身农民，他们参军没几天，就拿枪打仗，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因

为中国人民战争的残酷性，天天要打仗没有时间训练，步兵战术、战斗动作、内务条令我们都没有研究，更谈不到按步兵操典上所说的去做，甚至连军语也不懂，作报告就是一套“精神训话”、“什么英勇杀敌，打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等。如果我军能把战术战斗动作提高一步，就可以减少伤亡，革命的胜利就要快些，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就不用二十六年的武装斗争，这要引起我们领导上很大的重视。

当然我军不是不知道战术和管理部队的，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战术战斗动作，管理教育的方法，以前的红大、后来的抗大，是有我们的一套的，但很不够，对目前日益发展战争局势是赶不上的，不够用的。这话如在前方讲，有些营团长就会不服气说：“老子当兵十多年，不懂战术，还不是消灭了敌人，”事实上，我们的缺点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我们打仗打三天三夜，消灭敌人二、三个旅，要打三、四百万发子弹，实际予敌杀伤只有四五千人，你想多少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平均要一千发子弹，太不合算了。我说我军切不要象张勋的军队，他与段祺瑞打仗，打了三百多万发子弹，才打死二十八个人，我们部队打仗是二、三百挺机枪摆在一起，乱打乱放，打的子弹真是惊人，把敌人的鹿砦围墙都打垮了，一挺机枪平均打六七千发子弹，一门炮打三百发炮弹，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怎能打得起呢？我们计算一个迫击炮弹等于二个中农（生活费），一个山炮弹等于三个富农，我们不知打掉多少中农、富农了。我们每一个战役战斗都是以血肉和敌人拚，伤亡很大，这对老百姓是有罪的，解放区的老百姓把他们的子弟交给人民解放军，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任。我们的干部不会指挥战士打仗，是以督战精神来指挥战士，一说就是：“操你妈，为什么不冲，杀呀！冲呀！”乱叫一阵，不知组织火力和使用兵力，只是猛打猛冲，蛮干，伤亡很大，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有个神圣责任，就是要提高战术，减少伤亡，这样我们才是对人民负责任，不然为什么打了这样多的子弹、炮弹自己伤亡这么多呢？！

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能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划几个圈圈（梅花形）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了，他们都是老兵，有些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学生，他们把我们看作异民族，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仗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的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他们长官也说“只要打胜仗都行”，奸淫烧杀是不管的，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的代价。

我军勇敢固然好，就是一排排的集团冲锋，当把敌人冲下来时，牺牲的人也是一排排的，这种冲锋一遇到顽强的敌人，伤亡就更大，说明我军没有很好的战术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辟地，不讲究机炮火力掩护，敌人等到我们冲到七八十米达才打枪，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关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说：“营长你叫打那里呀？”营长没法答他，他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他的意见，他并提出要用三挺机枪封锁五个枪眼，他先负责布置搞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火力，营长就发命令冲锋，以手榴弹打进去，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被迫投降了。这是战术作用。我们的营长不如人家的班长，俘虏兵起了指挥作用，这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的缘故。

第二，组织火力。现在炮兵多了，榴弹炮、山炮、六零炮、轻重迫击炮等，常常炮兵在战斗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团营长使用炮兵是老一套采取近战，实行抵近射击，把炮拉到距敌人二、三百米达射击，因炮兵多，敌人用六零炮与机炮就可把我们炮打坏，炮兵伤亡很大。在抗战时期我们的炮少，敌人在孤立据点，则可用抵近射击而有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现在有三、四百门炮，抵近射击，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我们一定要用间接射击，把炮拉到一定的距离，榴弹炮十里至十五里，野炮十里或七八里，山炮、迫击炮一千到二千米达。我们的炮兵多是解放战士，你叫他把炮拉近射击他硬不干，他说："世界上没有见过这种炮兵，你那套是不行的，我们按一定距离射击，射击不准，杀我的头。"我们指挥员往往枪一响，就命令打炮，但他们不知打那里，解放战士有经验，炮打得很好，我某部有一部榴弹炮调到石家庄作战，没有赶上，后来参加元氏战斗，指挥员也是叫炮拉到二、三百米达来打，结果打死了九个炮兵，有一门炮的瞄准镜也被敌人打坏了。有时炮太近了，东面打到西面，西面打到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解放炮兵往往几炮就把敌人的工事打垮了，人家是科学的。蒋军被我俘虏的一个旅长对我们炮兵表示钦佩，又带讽刺地说："八路军的炮兵就是差一把刺刀"，一面说我们勇敢，一面说我们不懂炮兵战术，我们不能满足于老一套的战术。国民党的步兵操典一般的原则是对的，可以学习。我们考试一个连长关于司令部的卫兵守则，他报告半天要如何提高政治警惕，注意反革命等一套政治讲演，我又叫一个解放战士来讲，他只讲七、八条简明扼要的就说完了。

今天我们提倡战术，主要是我们的火器多了，连长要掌握机枪、步枪、手榴弹、掷弹筒、六〇炮、手提式、刺刀等七、八种武器，营长要掌握三个连的火器，大小炮二、三十门，轻重机枪六、七十挺，不讲究战术是不成的，如何使用火力配合。封神榜中有万宝囊要用什么就拿什么，也讲组织火力，该用步枪就用步枪，该用机枪就用机枪，该用六〇炮就用六〇炮。旅团长掌握火器更多，更复杂了，更要很好讲究，研究各种火器的性能，如大师傅炒菜一样，分析蒜、葱、辣子不同性质，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才好吃，现在我们是一锅煮，光喊"放枪"，好听是好听，就是无产阶级的无底洞，消耗的太多。我们的火器越多，性能越复杂，一兵团世界各国的武器都有，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蒋介石的，炮也不同，不讲究战术则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每团有二、三千人，如能很好的掌握武器，在一、二千米达外就有很好机会消灭敌人，主要是组织火力要适当，要会使用。而样样武器齐鸣，乱打乱放，或是放在一边不用，如一个连长拿上步枪就冲上去，把别的武器都放在一边用不上，如能很适当的使用，可节省弹药，又解决问题，每件武器一定要用，但不能乱用。

第三，我们部队战斗频繁，整训较少，在华中打了半年，到山东五个月打了五次大仗，战斗一结束马上就转移，中间虽然休整一、二星期，也是专门作俘虏兵的政治工作，军事上没有注意。另一方面是干部调动太大，二个月的连长，半年的营长是没有的，团以上干部伤亡较少，排班级干部伤亡更大，打一次仗，就得换一批，现在中、下级干部有很多是解放战士。连队的政治战士是翻身农民，如能争取整训一个时期，练习技术战斗动作，弹药是可以节省的。现在强调步炮协同动作，指挥员指挥作战以战术做出发点，步兵、炮兵协同、步炮火力的配合好，加上爆炸是很有力量的。

第四，爆炸是蒋军最怕的武器，过去抗战时期，使用手榴弹、白刃战，射击瞄准。现在强调爆炸。在部队是比较普遍的，炸药也很多。破坏敌人的障碍都是用爆炸，如一组炸毁敌人的鹿砦，二组炸外壕，将他炸垮通过，三组炸围墙，只有十余分钟就可完成，山东部队比

较熟练，每个班都有一套办法，华中部队不愿学习，他们说："打了十多年仗都不用爆炸"。你问他怎样破坏鹿砦，他答："用斧子砍"，你问他怎样过外壕，他答："用梯子架起来过"，问他如何过围墙，他答"用梯子架起来爬"，你说"这样伤亡要大"，他答："妈的，老子革命还怕死吗？"但经过长期的教育与实际经验的教训，现在学习爆炸也不错了。

第五，土工作业，过去我们强调投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现在要加上爆炸做工事成为五大技术。

防空我们主观上是不注意的，近来注意了挖防空壕，头天行军进入宿营地，次日敌机就来了，且每次十六、七架，这个阵地炸完了，又到那里去，战斗中特别是第二梯队受空炸威胁大，第一梯队因靠近敌人是不容易炸中的，敌机也不敢乱丢弹，房子无论如何不成，野外都是平原也不成，只有挖防空壕向地下发展了，因此没有土工作业是不成的，我们过去没有做工事的习惯，你发给他锹铲他不愿带，经我们提倡土工作业后比较好些。我们部队不愿打钳制，主要原因是不会做工事，没有做工事的知识，做起的也很可笑，用板门加些土就算了，所以防御力量很弱的。近来我们强调打钳制，创造"钳制专家"学做工事地堡，一个地堡只用两、三人能钳制很多敌人，过去有些同志因为一到宿营地就做工事，明天出发又要破坏，所以做的很少，蒋军会做工事、地堡，如我军学会做工事地堡，他就更怕我们了，信鬼的人最怕鬼。蒋军说我们不会守，因我未做工事故敢来攻，后来知道我们做起工事地堡后他就不来了，很远地用炮来轰，过去是猛打猛冲，迂回我们，现在先要用飞机大炮轰击，或是绕路走了，为提倡土工作业，粟裕副司令亲自动手，一到宿营地就领导警卫连做工事，汽车上带着锹自己挖防空壕。

我们现在提倡野战近战，过去白天是敌人的，黑夜是我们的，现在提出白天、黑夜都是我们的，过去黑夜打敌人解决不了战斗，天明就要撤退，次日晚上再打时，往往敌人又将昨晚的阵地恢复了，这样再攻损失很大。现在是继续黑夜白天打下去，一直把敌人消灭。在抗战时我们养成黑夜打仗，那时我们的火力弱，现在我们的火力强了，可以白天打。近战中每次都是白刃战，通过外壕围墙就与敌人拼刺刀，蒋军的刺刀很少，每连只有二、三十把，加以夜战，使得蒋军非常害怕，我们俘得蒋军五军官兵说："我们就是怕你们的刺刀、手榴弹"，问他们，我们有什么缺点，他们说："你们的缺点是拥挤一团。"我们的优缺点他们都讲到了，我军野战近战很强，火力组织在突破阵地前还好，但在突破阵地后，进入纵深战斗就混乱了，这与我们的战略方针有关，我们是以八、九个共产党打一个国民党的，我们要研究用各种火力配合起来组织成交叉与纵深式的火力协同。

四、政 治 工 作

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表现在溶化俘虏，昨天放下武器的蒋军士兵，今天就拿起枪打仗，且打的不错，立功运动，评功庆功，评定伤亡、评定战术，团结解放战士、老战士与新战士，人民战士与解放战士的团结，组织救护伤员，组织民工担架队，运输给养，时事教育等，是自卫战争得到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点是在战争的长期化、残酷化，土改后暴露出来的，政治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的阶级军队在严格执行纪律，政治上保证我们党军的纯洁，保证在攻克城市后政策的执行，保证部队

的战斗胜利，全体动员作战。作为党的阶级的军队，保证军队组织的纯洁性是削弱了，这原因：

首先是成分问题，内战时的工农政治工作人员，在抗战中已转为军事干部，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他们没有政治工作经验，这批人加入政治工作的好处，使政治工作活泼生动些，晚会上的花样多了，报告也满流利，过去连马克思的像也画不象样子，现在能画象样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不是土气，而是洋气，线条多了一些，但作为阶级的党的政治工作的特质是削弱了，这与过去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时期阶级路线不够明确有关。

其次军事人员形成单纯的军事观点，不但不帮助政治工作，反而天天骂政治部，不好好地组织救护伤员呀！教育俘虏呀。政治工作人员因他们是老干部，资格老，有实际战争经验，往往向他们让步。

第三，土改以来的潮流，整党、整军、整干部，即三査运动。这批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经三査后个人情绪与政治机关的威信都不高，且成分复杂，机关中更厉害，我们野战司令部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地主富农，但有一部分很好，思想不错，生活朴素，工作积极，比有些老干部有发展前途，一部分特别坏，吹牛拍马、贪污腐化等。关于改进政治工作我将向中央请示，先要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改变政工人员的成分，从地方上调些干部，如县书地委等到政治机关来。

（一）溶化俘虏：每一战役后，每个团要补充一千多俘虏兵。俘来后就给发枪打仗。我们溶化俘虏有一套经验，一是用老解放战士争取俘虏兵，二是用翻身农民战士教育俘虏，三是不搜他们的腰包，失掉东西给一定的赔偿，四是民工教育俘虏。我军每团都有二、三百民工，他们有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他们虽不洗面，手脚很黑，穿着便衣，但经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阶级觉悟很高，时事政治都了解，利用他们向俘虏兵宣传教育。使俘虏兵感觉了不起，一个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这样多，往往比指导员或高级干部的讲话作用还大。再经过评功记功，给他们挂上红布条，升为班长，他们就高兴得很：“在蒋介石那里，当兵一辈子升不了，到解放军不几天就升了班长。”我们很多指挥员愿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认为翻身农民到部队里给你讲民主，有时开小差，很难侍候。但解放战士在打胜仗时没有问题，一到艰苦时候就开小差，如华中撤退，反攻转移，解放战士就大批开小差，而翻身农民很少，甚至没有。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有些部队则不要，以翻身农民同别人换解放战士，后来因在困难时解放战士逃跑多，大家不愿要解放战士了，最好部队补兵比例是翻身农民十分之四，解放战士十分之六。一年来，我们补充了二十万解放战士，十二万翻身农民。

（二）立功运动是将过去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的扩大，因为英模运动在战斗中表现狭小，条件过高，要生活艰苦，思想正确，工作努力等，很不容易做到。现在你只要做好一件就算一件，其他思想问题可以慢慢解决，有错误的可将功折罪，戴罪立功，也可功上加功，把功臣选为模范。评功大会与评定战术结合起来，这样在战争中战斗后都能提高士气。但也有些人因功骄傲，冒功，假报成绩，互相争功，甚至有一个碉堡三个部队都说是自己夺得的现象发生，将立功变为锦标主义、风头主义，有的同志根本反对立功，他说：“老子革命十多年，打过多少仗也没有立功，毛孩子打过几次仗就立功。”有的人是老一套，他说：“对俘虏兵这样好是乱子，我的这样大功也没有这样”。后来部队的立功运动又发展到农村

的群众中，他们在打扫战场，追捕逃亡的蒋军军官，清查俘虏，救护伤员，有很大的成绩，野战军就送给他们一面旗子，他们很高兴。农村男人女人都开展立功运动，他们供给蔬菜，救护伤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评定伤亡是刘邓部队创造的，每个伤亡的，大家给他评定，有的光荣的负伤，有的是不光荣的犯错误的。后来觉得不好，人家在前线打伤打死了，还犯错误，使人不满意，谁能知道敌人的子弹是有规律的呢？敌人的子弹都是不正确的。后改为评定战术，如武器的使用，加上伤亡的比例，看你的功绩大小。

（四）团结互助运动，克服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现在部队很复杂，有翻身农民，老战士，解放战士，山东还有一一五师的老红军，华中有八个师的单位，每师有许多小单位，有过去各地来的红军游击队，真是十八路诸侯，汇合成华东人民解放军，这里面就有南北分界线，山东人看不起南方人，南方人好洗澡，搞菜吃，说话听不懂，轻飘飘的，好留头发。南方人说山东人不卫生，地方不好，个子大，穿的鞋象一只船，骂他吃大葱，相当对立。这样情况下，他们在布置打仗，补充兵员，配备干部，群众纪律都互有意见，打仗中互相争功，要统一于人民解放军，打破本位主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我们克服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的经验是：

第一，不能互相指责，只能互相表扬，指责要由其直属的首长去作。

第二，部队间只能互相退让，不能互相指责，指责归之于党。

第三，犯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严重者撤职。

第四，士兵有这种反映不怪，但干部有这样就是非法活动。

制造纠纷、分裂，要批评处分甚至撤职，要统一听党的指挥。

五、后　勤　工　作

组织民兵担架队，每个纵队有七、八千民工，民工开始三十万，后来减到十二万人，象一条龙一样，关于民工担架前方需要很大，弹药、粮食、菜蔬、伤员、鞋袜等，都要运输，就是款子也是问题，山东票子高涨后，每个纵队一月要三万万元经费，送票子也要三、四辆汽车，送到纵队后，还得送到旅团去，要很多的人力，有时票子也没有人数，一个纵队的经费就是几十个人数，也要一、二个星期，后来改用秤称，多少钱，多少斤票子计算。从前采用一兵一夫，现在改为三兵一夫，担架队包括在内，八个人一副担架，担架也笨的很，两条大木头有八十多斤重。

过去采用抗战时临时就地动员的办法，这次战争证明不行了。临时就地动员无论如何不够用，在山东时，每部队每天要八十万斤粮食是无法供给的，临时只能动员民兵来促俘虏，且弹药、粮食都在数百里外，运来后有时部队因情况变化又走了。运粮大车达两万辆，走起来长达二百余里，比野战军走起来还长。壮丁民工三十万人，就需要组织领导。我们组织了后勤司令部，设总司令、参谋长、各科长下设四个团，团下设营连，每连二十辆大车。伤员运送也是这样的，每次战役有伤兵八、九千人，其中重伤二、三千人，敌也有重伤一、二千人，共三、四千人，一个人要八个人抬，共二万余人，才能把伤员运送到后方，运送中路线的选择、食宿的准备，没有很好的组织是不成的，初时由于没有准备，这一点民工往往在途

中吵架打架。

专门的后勤机构成立后，地方上一切为了前线，从省政府、厅长、专员、县长、地委、县书等人都变成后勤司令部的司令、团、营、连长，做民工的头子，农村的支书则成为民工队的支书，很多县委机关人员全部搞后勤，只留下一个伙夫无事可做，干脆叫他到鞋厂做鞋去了，这样使后方无人管了，影响百年大计，是一个最大的困难问题，同时部队使用民工浪费很厉害，有的一个民工在部队三个月，只抬了三次担架，现在我们为节约民力，采用兵夫合一，自己运输东西和抬伤员，这样可减少民工，只有五万个民工也就成了。

后勤工作的不良倾向，一种是倾家做买卖，过高的消耗自己的人力物力。四十万民工把三、四个县的壮丁一下子弄光也不够，这样是不能长期战争的。我们又不是只打一仗，就可解决问题的。而是长期打下去的，所以要有组织有计划的使用民力。

其次是打小算盘，不愿拿出东西，汽车留下自己用，救济物资不愿给部队，说是“美国人说的”。有些同志起初不愿意拿出东西，后来敌人来了搬不动都毁光了，汽车也烧了。我们为长期节约的观点，达到有计划有组织的后勤工作，使前后方的工作都能照顾。

成千成万的民工是个严重的政治工作，起初有些同志认为他们经过抗战锻炼和土改，什么都知道不去管他们，叫他们“夫子”，他们不高兴说：“什么夫呀妻呀”；叫老百姓，他们又说“你们是当官的统治我们呀”；叫老乡也不高兴；后来给他们找好房子住，送猪肉吃，他们也不高兴说：“我们不是吃猪肉、住好房子的，我们是来参战打蒋介石的。”主要是没有作政治工作，指导他们防空，使他们学习政治，发给文件读，如果把政治工作作好了，他们可以教育俘虏，其作用比我们的干部大的多。伤员又可迅速转运到后方，他们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很英勇，一个俘虏参加部队三天打仗负伤了，很危急，民工把他救出火线，他就哭着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民工说：“你为我们打仗负伤，才是我们的恩人。”他们八个人照护一个担架，做的很好，研究抬担架的办法，使上山下山伤员始终保持平衡，到宿营地时四个人睡觉，四个人照护伤员，伤员把打仗得的表、钢笔，好的东西送给民工，民工给他们搞东西吃，十余万民工起了看护的作用。

民工三个月或六个月回去后，他们参加过各种会议，看过打仗学了一套东西，回去成为土改的领导者，动员军勤扩兵的积极分子。十几万民工等于住了很好的学校，但军队有些同志动员他们参军，用开会举手办法，结果有的在第二天就跑光了。有的说：“你要动员我回去后再来”，他们都是卅多岁的人，在军队里不合适，也会造成民主政府法令无效，使群众不愿再来前线服务。

他们运送鞋袜、粮食、菜蔬、牛乳等物品，从不动用一点，一个美国记者说：“这些民夫他本身缺吃少穿，日夜运输日用品，吹风落雨，敌人威胁又无人押送，但不贪污，不偷用一点，美国、英国也没有这样人，若是国民党的人，早就搞光了。”证明解放区的人民觉悟很高，为古今中外奇迹。也说明我党领导经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地区，群众是有组织有觉悟的进步的。把落后农村工具、条件来供应现代化大兵团作战，这是自卫战争最伟大的一面，是以前国内战争、抗日战争所没有的，但战争需要我们，还须继续提高一步，只满足于大车毛驴是不行的，如有五百辆汽车，比四十万民工还强，运输又快，节省费用，民工还可在家生产。有时靠民工运送太慢，部队一天行军，民工要走三天，使部队发生饿饭影响作战，所以要修公路、铁路。太行群众自动要求修铁路，邯郸到武安已修通，还打算修到长治，老百姓都很赞成，否则确实浪费民力太大，沿交通要道的群众为避免支差杀牛、毁车，

不然牛车支差还要跟上人，沿交通要路村庄，许多老百姓都搬了家，他们的负担确太重，鲁中、滨海地区群众被战争破坏，没有三、五年是不能恢复的，这里我们想到战争的胜利确是每个老百姓的血肉换来的。

六、反攻及新区问题

（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问题提出，是去年七月刘、邓大军渡河。当时华东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打敌第八军五天五夜只消灭二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七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这时，我们提出反攻中原，部队很多同志波动很大，且部队山东人多，要他们离开根据地转移到豫皖苏地区有很多疑虑不相信，他们认为过去提出“在山东来保卫华中”，今天提出“在中原来保卫 山 东”，认 为“是领导上欺骗”他们认为反攻有很多困难，到蒋区作战，脱离根据地没有党政军民帮助，没有弹药和兵员补充，群众条件不好等等，他们又认为在山东吃光了，站不住脚，反攻是被迫的，反攻是带游击性的，要倒回头的，反攻是长征，这些右倾情绪很浓厚，一肚子不满，在厕所里写起打油诗：

“分明被敌人赶出山东，你们硬说是反攻，反攻反攻真说不通。”

我们说这些意见有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幼稚的，必须给他们痛击与进行教育说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轮流下去作报告解释，此时中央反攻指示，解放军宣言来了，但这些情绪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不懂得被迫性与革命性是辩证的矛盾，马克思革命是自动的，也是被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人受压迫，被迫革命，同时是他阶级觉悟自动革命的，是一定条件的自由，一定条件的被迫，没有绝对的自由。

第一，反攻不是被迫的，是主动的，这些反攻有预定计划。敌人进入鲁中、胶东是主动的，也是我们引诱敌人这样做的，被我们调动的。当我们从山东转移到空虚的敌后，敌人被迫调转来，我们取得了主动，很自由，敌被我们牵着走，我们要过黄河就过黄河，要过长江就过长江，要回山东就回山东，我们要在那里打就在那里打，蒋介石要听老子的命令，说我们反攻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从全面的历史的观察战局。有些人当山东打胜仗时，以为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好象打倒蒋介石就是他的本事，其实没有山东蒋介石也要打垮的，他们看不见自卫战争的全过程，我们消灭敌人五百多万，我们正在转弱为强，由劣势转到优势。

第二、反攻不是带游击性的，不会被打回头的，认为反攻是打游击，要被打回头是错误的。我们三路反攻大军，共有五十个旅渡过黄河以南，展开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是蒋介石不能抵御的，他不可能拿到五十个到一百个旅来抵抗，这是不可阻止的力量，是一 往 无 前的，我们想打南京，就打南京，我们打游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快轮到蒋介石打游击了，他退出南京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将一直打到西藏去，对我们力量估计过低，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这种思想是跟不上时代的，敌我形势变化了，我们同志的思想，仍是旧的一套，我们必须以中央的正确方针与之斗争，打破他们的旧圈套。

第三、有些很老的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反攻是长征，不能给他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们是根据实际经验提出的，根据长征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很多次长征结局都是悲惨

的，如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长征到广东，东江第一次长征失败了，一九二八年，毛主席、朱总司令被迫脱离井岗山根据地，向广东、福建长征，因没有党政民的帮助，队伍下山，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结果被打回来，第二次长征是失败了。方志敏、邵式平的抗日先遣队，长征到皖南被消灭，第三次长征失败了。后来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幸得陕北有块老根据地，有高岗、刘志丹两同志，否则也是很危险，到陕北后过了黄河，还不是又回来了吗？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在根据地打仗，消灭敌人，我们军队一出解放区，举目无亲，"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伤兵没处放，粮弹补充困难，一说几百条，有的说："在根据地我负责消灭敌人两个军，出去一个旅也不敢保险。"

我们说：我们背靠着根据地，兵工、弹药等仍可源源接济，我们反攻的地区大别山、中原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们反攻是收复失地，连广州、四川我们都要收复的。所以不是出门，而是回家，以历史上的长征作类比是不适当的。那时我们被迫的打游击，被"清剿"的无法生存，再不走就会被人消灭。那时是处在革命的低潮，国际法西斯正在嚣张之时，现在我们消灭敌人百多万，国内人民运动与国际人民力量日益高涨，国际反动派陷于孤立，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上到了最危急时期，解放区空前壮大，我们是胜利的大进军，大发展，敌我力量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那样了解反攻，是形式主义是唯心的。我们反攻的实际困难，依靠发动蒋区群众，战斗胜利的缴获，和解放区后方的援助，三方面是可以解决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只要我们把新区群众发动起来，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的。他们提出反攻是长征是思想方法问题，但他们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在我党的两个历史时代，遵义会议前，党内不能讲困难，要讲自己如何能干，夺取中心城市，谁如果讲困难，就说你是"机会主义"，而讲国民党是怎样的不成。这是机会主义、乐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上台了，党是全面的看问题，看到困难与缺点，也看到我们的力量与优点。抗日八年很多党员干部经过长期的磨炼，想困难想得多，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过多的想困难，对胜利估计不足，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今天看见裤带都怕，总由反攻想起长征。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抗战三个阶段。防御阶段只一年多，相持了六年，总想反攻会到来，不知道反攻三天就完了。过去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因为罗斯福、邱吉尔不出兵结果许多人又说是吹牛皮。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过长江，转到江南作战，那是新的事变，蒋介石垮台之快是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过去经常批评对困难估计不足，今天要批评对胜利估计不足，许多困难估计到了，但许多洋财可能估计不到。毛主席估计抗战后有内战，因之整风、召开七大，做政治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很充分。现在是第三个转变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对新形势到来的困难应想到，同时对胜利条件亦应充分估计到，当然我们是要宁做长期准备的。但不应是不敢胜利。我们党员思想比群众落后得很，不敢有冒进的精神。今天要勇敢的前进，不怕冒险，不要左顾右盼，白区党员尤其要有冒险精神，拿起枪杆子来干，蒋区到处是干柴，就是少点火的人，今天还讲困难是不成的，没有意义的。今天主要是敢不敢胜利，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今天我们与长征时期抗日时期不同的，那时真有点老虎头上跳舞，扫荡来躲一躲，斗智不能死打，现在我们在政治上是绝对优势，军事上正逐渐转为优势，正在不断迅速的发展中，要估计到困难很多，更要估计到胜利很大，要把士气与干部观点扭过来。

（二）新区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新区的实际问题，解决我们同志的思想问题，比什么教育还好。当我军转到黄河以南，群众热烈欢迎，纷纷起来分地主的浮财，争相参军，在解放区还要说服动员，对抗属互助，在那里不叫他，他自动来找你，每个村子军队住了一夜就有一、二十个青年参军。群众帮助军队，供给粮食弹药，他们的斗争精神真使人感动的，群众没有失败的情绪，他们不怕蒋军回来，只知道打地主、打土顽、分浮财、分土地，这是蒋介石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见到我们是想不到的欢喜。他们天天等我们去。原因是蒋介石政权机构过于腐败无能。他们的保甲制度，乡区县政权天天要粮要款，抓兵拉丁。贪污腐化，杀人如麻。蒋介石给人民的灾难太重大了。

在黄河以南更好打仗，在山东时敌人重点进攻，有二十四个军，现在我们只负担四个军。敌人是一军一旅在一起，顶多是两个军在一起，三个军是没有的。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我军的旅为单位分散活动，扫荡土顽固，消灭敌人保安团队，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给养又便利到处可以取得。吃得又好，吃鸡鸭、吃竹笋，吃鱼。不比以前那样的吃不上菜。我军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国民党到处恐慌的很，常常有国民党的县保安队找他的正规军，结果找到我们军队来，我们说："你们辛苦了，进来请坐！"当他问到我那部分时，我们说："我们是新四军，把枪放下。"敌人马上张惶失措，举手缴枪。

加以各线我军的胜利配合，过去对反攻认为是打游击的、被迫的，长征的人看到各地我军反攻的胜利消息，蒋军的恐慌，这时说："真象反攻的样子呀"，特别是山东华中的恢复他们奇怪起来"怎么我们走了，反而收复失地，真是首长远见，领导正确"。我说："他们的头脑就是缺少马列主义。"

我军现在转入蒋区作战，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这是不好受的。我们是过来人，知道的很清楚，过去打仗在解放区，用解放区的骨头熬解放区的油，把山东吃得精光，现在这个大包袱，加在蒋介石头上，叫他尝尝滋味，在立三路线时说：敌人是"恐慌万状，十分动摇"现在以这八个字描写蒋介石是恰当的。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打到徐州附近，我们则打到徐州以北六千里时，那时蒋军真是手脚无措，徐州有一个卖西瓜的人，把西瓜皮丢在大街上，另一个人走路不注意踩着瓜皮滑倒了，两人打吵起来，周围很多人来看，有的人乱跑乱喊："新四军进城了"！马上震动全城。沈阳在我军进击之下，国民党的太太小姐抢着坐飞机逃难，曾把一架飞机抓烂了。今年春天，我们要放手大量消灭敌人，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那时蒋介石从南京搬家，也会尝到搬家的滋味，要船没船，要车没车，老婆娃娃乱叫一团。也叫他们把钢丝床、沙发，甚至马桶都搬上走吧！那时，也许南京一个西瓜皮会顶十万大军，蒋介石的出路怎样呢？搬家打游击或是垮台，出现象西安事变相似的事件，或是带上宋美龄出洋去了。总之蒋介石的垮台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三）人民军队的阶级教育：反攻后感到部队成分复杂，干部思想摇摆不定，其原因是缺乏阶级教育，阶级观点，阶级立场不明确，反攻后我们从根本上教育着手，以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纪律教育，搞反特务教育，没有从根本着手。现在从阶级的基本教育即土地改革教育着手，主要是诉苦，发动指战员一起检讨反省，诉苦后，追穷根，追出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激发大家对蒋美的仇恨情绪，拥护反攻，坚决反攻，提高战术，加强纪律，争取战争的迅速胜利。

开始有些人赞成诉苦，但是用老一套的办法，有些地主出身的战士诉共产党的苦，有些流传假诉苦，有的强迫诉苦，如一个连长把队伍带到大庙里开诉苦大会，他坐在一边，板着

脸孔说："今天开诉苦大会，大家诉吧！"没有人诉，他说："诉吧！为什么不诉，你诉！"他自己拉起人来叫诉，还是没有人诉，就散会了，回来向上级报告："我连不需要诉苦"。有的诉苦，一说就是蒋介石卖国内战罪恶，美国如何侵略中国等一套。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样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那里能坐到飞机。美国人帮助中国军队武器金钱打日本，怎么是侵略。"他不参加诉苦大会就走了。一研究，他是一个兵痞，长期受统治者情感的蒙蔽，一时不容易认识与觉悟起来。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捉住没杀了，共产党是他的恩人，要报恩决定不开小差，坚决为共产党打仗，后来先从生活上团结他，与他一起吃饭闲谈，有时顺便把他带到会场听人诉苦，初时还反感。一次他听到一个战士诉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卖淫养活他长大，又被蒋军抓兵抓走，母亲饿饭等悲惨情景，全场战士听到都哭了，他也哭了，问他"为什么哭？"他答："这是和我的历史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诉苦？"他说："这和蒋介石、美国人没有关系，又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后经过解释启发才慢慢觉悟过来。村里老百姓看见部队开会都哭了，很奇怪，怎么昨天进村是高高兴兴的，唱歌谈笑，今天就大哭起来。后告诉他们是诉苦诉的哭了，于是老百姓也要求参加一起诉苦，开军民联合诉苦大会，诉得军民都哭了，老百姓说："这军队真知道老百姓的苦呀！"军民关系也搞好了，说明我们军队有些诉苦是抽象的，不实际的，真正诉苦进行好是对部队最好的教育。

军队干部中有的是豫皖苏的，这次部队反攻到那里，他就带上警卫员骑上马回家去，真是"锦衣还乡"，那知回到家里是扫地出门，他的老母亲住在破房子里，于是大发脾气，找村公所、区政府说："什么政策，根本过左"，老百姓答复："是毛主席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把他捆回部队来，自己反省承认错误。有的是工农分子，经过土改学习，觉悟更加提高，但也有投机装假的，有的说："你们十年搞统一战线我就不同意，那是非阶级路线。我十年来被压下去，今天政策变了，我抬起头来了，敢大声说话了。"他根本否认党的路线，否认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是不对的，说明在阶级教育中，仍表现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有的诉苦诉到干部头上，说连排长怎样压迫他，要求调换干部、撤职，使得干部不敢在连里参加诉苦大会，逃到营部里，打电话问是否诉到他头上，没诉到时，心里就安下来，诉到了，就怕的很，等诉苦完才敢回连，把干部的军阀主义也整了一下。因此我们决定凡是士兵诉到干部头上时，干部无论如何立即向士兵承认错误，这样也可以克服军阀主义的倾向。

（四）今后的任务：

第一、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第二、打开战场，建立民主政权。刘邓部队要过平汉路西，陈谢部队向南发展到老河口一带，陈粟部队还要向洪泽湖发展，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蒋政权，保甲制度，土顽固彻底扫荡后，建设起民主政权。

第三、破坏铁路，割断平汉、陇海、津浦三条内战的动脉。使敌人不能通车，孤立交通线大据点。

以上三点造成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人，把蒋军主力，五军、七军、十一师三个军消灭后，蒋介石就垮台，象一座房子十条柱子，砍断了三根柱子，不倒也得倒了，那时我们强大兵团渡过长江，蒋介石垮台的迅速是会出人意料的。

七、国民党方面剖析

（一）知已知彼百战百胜，前几天报告是分析我们自己，现在来看看国民党，因为知道了对方，才能估量自己，双方照顾到战争才能胜利。“知已知彼，百战百胜”这是真理，我党二十余年来之斗争历史就证明这个真理。如不知己，亦不知彼，必然百战百败。我们有不少的教训，由于不知己亦不知彼造成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不知己亦不知彼，李立三之左倾机会主义，是不知己，轻敌。知彼不容易，知己更不容易。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知道别人呢？要知别人首先要知道自己，古代孙武子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许多人犯了错误，就是因为做不到这一点，这次战争中，我们有些人对国民党及美国估计过高，认为他们了不起，是不知彼，也不知己。有清醒的头脑，便能知己又能知彼，这是有联系的，不能分开看，我们华东野战军打了几个胜仗，就骄傲轻敌，把自己估计过高，这是不知己不知彼之故。在战争中又碰了钉子，经过检讨纠正，又打了胜仗，这是知己知彼做的比较好，所以知己者也能知彼，知彼者也会看看自己力量如何，毛主席说：要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个道理，我到晋冀鲁豫问一下刘邓部队也是这样，两胜三败，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古诗说：“不知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天天在庐山不知庐山的美丽，游过庐山的人便会知道，当你身在庐山时感到平淡无奇，当你走出二、三十里路，倒回头一看，你就感到庐山景致的美丽。便是不知己也不知彼，所以在我们华东，强调要知己知彼，要很好的研究自己，也要了解敌人，研究敌人甚至向敌人学习。我们不能从对敌了解不够轻敌观点出发，要从敌人长处方面出发。陈诚是第二号的反革命，他一次在徐州训话时说：“知彼容易，知己很难”，这是对的，国民党犯错误就在这点上。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作了不起，过高估计了他美国爸爸的援助，不把自己称一称究竟有多少重。他们曾吹牛皮，三个月结束战争，蒋介石于七月一日下令内战，次日就带宋美龄上庐山避暑，梦想到九月底回南京时就可把“共产党消灭，结束战争”。他和他的美国爸爸是轻视我们的，总把自己看作了不起。

（二）去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国民党是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其中一部分人是动摇的。前年三月间我到济南去会见了王耀武，这时期济南反动报纸曾大吹牛皮说：“山东国军对共军象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

我问王耀武：“是真的吗？”看他样子很不好意思的说：“那是吹牛皮的。”

我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呢？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报纸总是说什么‘土匪长，土匪短’都是‘王婆骂街的一套。’

王说：“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我问：“那三大好处？”

王说：“一是共产党方面还读书，经常看到你们很高级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内那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好。”我说：“你们不是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吗？”他说：“那是宣传的。三是你们的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你们。”他讲的三点都是真的。我说：“我们也有缺点，一是读书没

止境；二是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的关系便是搞不好的，三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差。”

这说明国民党方面有些有见识的人，但是由于他们整个领导机构的腐败无能，故不能接受这些人的意见。

以后我到徐州去会见顾祝同，我说：“现在和平民主的潮流不可抗拒的，北伐是一种潮流，你和蒋先生都是那时候起来的，可知顺潮流的人便能存在。抗日也是一种潮流，现在民主和平也是一样，谁要想抗拒阻止，他一定要失败的。”顾祝同表示很同意我的意见。我问他：“对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他说：“这完全决定于美国，美国人要打就非打不可，美国人不打，要打也打不起来的。”我问他：“老先生闹着要打，现在你们不是有些吗”？他说：“委员长也没有办法，老头子能顶什么事？”我问他：“打起来前途如何？”他说：“你们军队作战勇敢，但装备不好，现代战争主要是技术决定一切的。”我说：“我们也得到日本人的许多武器，装备不一定差吧？现在美国要打，你们应该起来反对。”他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真难说。你们共产党报纸说我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其实真冤枉，我不过是执行命令。”他问我们有多少军队，我说：“不算地方人员光穿军装的，连后勤人员在内共有八十万。”总之，看他们的上级指挥人员都是动摇的，其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以后顾祝同又叫他的参谋长和我谈话，他首先给我戴一阵高帽子，他参谋长说：“光靠国民党方面不能解决，美国人还没有决定打，因为不了解国共双方情况，等马歇尔回国后才能决定。和平局面很难保证。”又说：“陈先生要负责让步些，不要给国民党刺激太多了，以免好战者的借口。”想把我们吓住。我说：“你的话不对，你们国民党对我们刺激太大太多了，如果进犯解放区，我们便坚决自卫。你们总是称我们为‘土匪’这不是刺激吗？你看我是不是‘土匪’”。他说：“陈先生很有学问的，那里是‘土匪’”。我说：“我不会来打徐州的，你们如果进攻我们，我们有权自卫的，你们昨天把我们的席位按到末位，不让我们代表团参加宴会，这是大刺激，你们到临沂去，我们就没有失过礼，国共美三方平等的，为什么这样？我准备去向美国人讲的，但我觉得中国人的事情，向外国人讲又不好。”他急忙赔道歉说：“是副官长搞不好，他不知道。”我说：“马、张、周三人小组来时，我们不能到机场欢迎，是你们不给汽车，我们不能去，以后你们又要说我们无意和平，不到机场欢迎三人小组。”以后顾祝同也来道歉，后来又见到马歇尔谈到来徐州的问题，我说：“我们本不愿来的，马、张、周三人小组叫来了，他们又不让我们出席宴会，在席位上对我们是侮辱，去机场欢迎又不给我们汽车，我不去，后来又会造谣生事的。”马歇尔立刻叫美方徐州代表哈里斯来申斥一顿，向我道歉。我说：“不怨他，主要是顾祝同。”马歇尔说“感谢你的坦白，对国民党腐败要原谅”。临走时，顾祝同又来道歉，我说：“不是我告诉马歇尔，是一位美国上校问起来不得不讲。”

从此看出国民党的发动内战，要对他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就是在一个很小的问题上也是想办法侮辱你的。

（三）关于国民党战略路线：

第一、国民党战略总的方针是战略进攻，战役战术防御。其目的是夺取大城市，控制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其过程有三个阶段：

前年七月至去年一月，七路分兵进攻解放区：一，程潜搞中原，二，汤恩伯搞苏中，

三，薛岳搞淮北，四，王耀武搞胶济线，五，杜聿明搞东北，六，刘峙搞豫北，七，李宗仁在北平，胡宗南在西北取守势。将其兵力分散于各战场，战役以军为单位，战斗则以旅为单位。

敌人分兵进攻被我各个击破。苏中粟裕指挥十个团和一个地方旅（四个团）后增加三个团，共十七个团，打了七仗，七战七捷。第一、二仗是以十个团打敌人二个团，三、四仗是十四个团打敌人四个团，后来是十七个团打的，都是以多打少，四个人打一个人，或五六人打一个人，我们占绝对优势，所以打了歼灭战。刘邓方面也是这样，以五人打一人，或七人打一人，消灭敌人四个多旅。初期在淮北，我们部队十五个团，加一个地方旅，共十八个团，敌人经常三个军在一起，双方兵力相当，只消灭敌人一个旅。且战场狭小，这时总是消耗战，说明没有优势兵力不能打。在胶济线敌人有二十个保安团，二十四个正规团共四十四个团，我们也有十来万人，也是消耗战，消灭他一个营便是好仗，歼灭二个营是大仗，这一线只一次歼灭它一个保安旅，其他没打大仗。中原方面我们是五万多人，敌人有十个师，六十个团，组织大包围圈，最后我们突围只剩下一万四千多人，被敌搞垮了，这说明只有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才能打歼灭战。在战役战斗上双方兵力相等，或我居于劣势的兵力，是很难打歼灭战的。

第一阶段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分路进攻，由于他吃了十年内战的苦头，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美国最怕苏联舆论的指责，蒋介石更怕国际国内舆论的反对，轻视我们，这是他政治上、军事上的弱点，所以采取战略的袭击，不能长期的集中大兵力作战，便于我们各个击破。后来敌人先集中兵力搞华中，我们有困难，敌人也有困难，敌人如把我们华中的归路截断，我们就南渡长江，进到江浙三角地区到天目山，再没有办法回江西，把他们的大后方搞一通，他更不好受，敌人也就是怕我们这样做，用重兵封锁长江，把我们往北挤，留给我们到山东的退路，连飞机也不去轰炸。敌人在山东时也这样，始终不进犯滨海走廊，他想把我们挤到华北，以黄河为界。敌人对中原也是这样，怕李先念回到太行山或和苏皖我军汇合，在东面用重兵把守，放松了西面，我们都向西突围，三天即把敌人甩在屁股后面。但这不是说敌人愚笨，他是从各方面都研究了的，要慢慢地往北压缩，来消灭我们。如果我们一过江南，他就更无办法，这是他政治上的致命弱点，不得不这样做。

以多打少，以少打多，集中兵力的问题，毛主席说过：在战役战术上要以优势的兵力消灭敌人。国民党对我这一点是不能了解的。在去年七月时国民党的军队数量比我们多，他有二百多万正规军，我们只有卅多万野战军，每个战场有的三万、有的五万。他们的火力比我们占优势，且有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但他分路进攻，优势逐渐变化，到战役战斗上更分散，成为劣势了。如汤恩伯在苏中指挥十个军，分兵使用，以四个军守江防，六个军进攻，一个军一路，每军又是一个旅在前面，名义上有十个军，结果在前线与我们打仗的只有两个团。我们在战略上虽是劣势，但在战役战斗上集中兵力，却成为优势。华中我们集中三万人打他二个团，在战术上更为集中，火力也比他优势。我们的战略与战役战斗是有联系的，国民党的战略与战役战斗是脱节的。我们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则不同，他对地方很重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每一个班长都应该知道的，打歼灭战，以多打少，就是你打游击战时，也可以用得上这个原则。

战国时有个军事家孙膑，是魏国田相的家臣，田相与国王赛马，把马分为上、中、下三等，田相以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结果三赛全输了，回家后很不高兴。孙

膑问他，他说是赛马输了，孙膑问明输的原因后说："人家国王的马比你宰相的马好，当然要失败，有一个办法可以获胜，用你的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就可以两胜一败。次日田相用此法又赛马，果然取胜了。魏王问："这次你为什么能胜"田相告诉是孙膑建议的。魏王便重用了他。我们同国民党打仗也是这样的，国民党不善于使用优势反而削弱了，我们以主力打他的主力是不好的，用我们的主力打他二、三等的部队，可以歼灭他，要懂得军事辩证法。

第二阶段是重点进攻：由于国民党第一阶段分兵进攻的惨败，知道分兵的错误，为重新树立优势，采取重点进攻，把后方的兵力都集中到山东一线，后方没有兵防守，形成空心战术。将徐州、开封指挥机关合并，共集中在山东的有二十四个军，第一线十二个军，分四路，每路三个军。他认为华东是解放军的主力的主力，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莱芜战役以后，我野战军有四十万，九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纵队，每一纵队三万人，共卅万人，连民夫共四十万。每个军二万五千，第一线十二个军，也有卅万人。敌人是齐头并进，后方有巩固的据点，寻求与我主力决战，第二线敌人也有十二个军，相距不过两天的路程。那时敌我兵力相等，形成牛斗牛的局势，天天打消耗战。从三月到六月底，我们只消灭了敌人两个师（七二、七四两师）。国民党经重点进攻后，在山东的战场是改善了，但其他战场漏洞百出，如晋南、晋冀鲁豫，东北等地，敌人兵力异常空虚。华东战场负担很重，却造成全国战场的休整，使我们有时间准备反攻。蒋介石是堵住一墙，其他的墙全垮了。

第一是神经战、思想战。国民党中央社广播，天天叫喊，我们没有出路，他们说"共军背靠大海，海水是吃不干的；退到胶东，胶东是牛角尖，烟台没有桥可以通过大连，又有海军阻击；往西过微山湖与刘伯承会合，他有强大的部队阻击；困守鲁中山区，要被国军的强大炮火扫荡；倒向华中，到处驻重点，必须将其消灭；渡河北窜，北面有国军精税兵团，最好是投降吧。"我们部队每个团都有收音机，天天听他们的广播，不让听，又有关言论结社自由，有时敌人用飞机散发传单说："你们人多马多没吃的没有办法"。敌人这时不是天天骂我们"土匪"而是与我们实际困难联系起来宣传了。我们有些同志听了看了，确是动摇人心，许多人心里着急，看看地图也实在是那样的。三个月才消灭敌人两个师，敌人又宣传再拼掉三个师，一定把你们挤到海里去。宣传被俘的李仙洲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救出忠勇的将领"，又说你们剩下的县不多了，马草困难，伤兵无处放。而我们实在也困难，消灭敌人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但加强教育之后，大家很容易从许多事实辨别是非，敌人欺骗终成泡影。重点进攻是蒋介石亲自动员的，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我们再往后退还可以打的。地方上有许多同志说"无论如何退不得，没有地方了呀！"其实我们还有五十多个县，过去中央苏区只有四个县还打几年，那时才不过几万人，现在人又多了，和过去大大不同。

当时我们教育干部说其他战场反攻后，敌人的重点进攻就可打垮。但是林彪夏季反攻，还是重点进攻，聂荣臻反攻津南，还是重点进攻，陈谢渡河反攻，还是重点进攻，刘邓渡河反攻，还是重点进攻。直到刘邓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我们又派两个纵队打到徐州以北六十里，敌人的重点进攻才垮了。蒋介石真是坚持了最后一分钟，他不知从那里学来这样镇静，那时徐州敌军参谋长大发脾气说："我们是玩空城计，再这样我的参谋长不当了。"

蒋介石重点进攻破产后，我们性急马上出击。因干部思想还没有充分准备，动员不够，又因分兵三路，每个纵队攻敌人一个城，打八仗有五仗没打好。如果我们沉着些，让敌人走远些，多准备些弹药，召开干部会议，先把意图说明，充分动员集中二十万兵力，少打几仗

至少可以消灭敌人四个军，十一师也可能被我们消灭了，蒋介石在长江布防也就不可能，我们会一直打到苏中，反攻形势会更顺利。

第三阶段蒋介石的战略防御，由于他重点进攻的失败，我们转入蒋区反攻，争取全面战争的主动权，蒋介石掉在我们后面，完全被动。现在蒋介石以长江为界，在江南布防组织民团，每县要集中一年的粮食，挖外壕工事；在长江以北地区，采取局部的战役进攻，企图挽救他的失败；在黄河以北，则采取守势；派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据说要"恢复北伐精神"；可能还要到昆明恢复抗战精神。但他这一切措施，均不能使他避免死亡的。

第二，蒋军战役方面是多头指挥，徐州薛岳指挥华东作战，陈诚超过薛岳，蒋介石又超过薛岳、陈诚去指挥，甚至超过前线的军师长，把旅调走，他们还不知道。南京国防部直接规定旅、团的行动位置，薛岳直接指挥到团营的战斗行动。这样形成混乱，下面都是死板的矛盾百出。由于多头指挥往往打败仗。

我们歼灭马励武指挥的三个旅，一个快速纵队和一个技术兵种时，马励武到后方去了，因他哥哥来拜访他，到了峄县，他一走，我们就将他部队全部歼灭。后来薛岳委他为峄县的指挥官，该县只有马部两个营和一个保安团，陈诚说不够，又派一个旅长带一团兵到峄县，于是马励武接薛岳的命令，那个旅长听陈诚的命令，保安团听省保安司令的命令，三个人分守三个城门，北门无人守，我们就从北门打进去，将他们消灭。后陈诚集中卅六个旅进攻临沂，与我决战，我决定放弃临沂，集中二个纵队抵抗，使他感到攻临沂伤亡大，不好打，命令从北面调李仙洲七个旅进攻，我军即转到济南附近打了莱芜战役。蒋军共有二军七旅十五个团兵力，很谨慎向莱芜前进，估计我们没有部队。敌人有蒋介石、薛岳、陈诚、王耀武四个人指挥李仙洲，蒋陈还直接打电报给旅长。王耀武令撤退新泰后，陈诚说不成，部队又回新泰。薛岳说不能住新泰，部队又撤出来，真是五心不定，被消灭的干干净净。李仙洲开师旅长会议也不能解决问题，王耀武为怕部队被歼，怕打电报泄漏秘密，亲自坐飞机到莱芜上空投命令给部队叫撤退，蒋介石又说"陈共欲与刘共会合不能撤退"，部队又倒回来。他们进到莱芜十天，天天行军，来往奔跑，很多士兵躺在沙滩上说"老子不走了，被共产党消灭倒好"，军长韩练成说"这次一定被消灭，跟上特务团想逃走，师旅长到军部找不到他，在特务团找到后，他说"我来视察阵地。"谁知他一回军部就被消灭了。李仙洲说："我知你们不会和刘伯承会合，因为你们还有五、六十县，你们在临沂南二个礼拜没有打，一定北上来打我们。"当时有一个旅长提议："共军情况不明，可派两个旅出击试探敌人兵力，如已碰上，其余五个旅可以突围"。李仙洲不同意说："老弟，你是拿上肉包子打狗哩！"那时我军距离敌人仅卅里布置包围花了十天，敌人还未发觉，如敌人突围，最多不过消灭他两个旅。总之，蒋军多头指挥不适合于前线，他们在南京、徐州指挥前线打仗，是没有不失败的。

第三，不会使用技术兵种：他把技术兵分散使用，是愚笨的。他有十个榴弹炮团，经常两个营分开用，作用不大。有飞机二、三百架，也有七、八架一起用，如使用于一、二个战役，其轰炸也使我们不好受。同时，他的技术差，百多架飞机在一起，自己也会碰烂的，他有坦克三个团，是以一个营为单位分开使用的，象我们汽车一样的成为步兵的累赘，有时步兵来保护它，蒋介石无工业基础，无技术基础，他的坦克、汽车另件坏了在前线不能修理，顾祝同说："现代战争技术决定一切"，结果适得其反，常要步兵来掩护技术兵种，成为步兵的负担。

第四，编制失策：原先一军三个师九个团，改为一师三旅六团，一师三团改为一旅二团，改编后的好处，是充实战斗力，火力重新配备加强了，其实缺点：（一）所有军官降级使用，情绪不满。（二）编余军官失业，影响在职者不安心。（三）指挥不方便，一师三旅六个团兵力较前单薄又不好形成重点，特别是旅更不能形成重点，一个团突击，一个团钳制，突击力量弱，旅长成为光杆了。后来旅长直接抓两个营，四个营突击两个营钳制，团长又不满意，骂娘"要老子干什么的"。（四）最大的弱点蒋介石接受美国命令改编，叫陈诚执行，陈诚为加强自己这一派的力量，由他拥蒋，特别强调军队国家化，借口改编把何应钦部队改掉，消灭杂牌。把王耀武部队改编后，安插上他的人，使王耀武指挥不动。本来蒋军是按封建关系来团结组成，王耀武培养他的部队十多年，以私人感情来维持他的部队，他说一句话大家都服从，现在就不成了。李延年部队改编后，安插上新人，都不服从上级的指挥，战斗力大为削弱，陈诚这次可算给革命立了一次功劳。象桂军改编时不要一个非广西人的干部，其战斗力仍很强，因他是依靠封建关系来维系的，所以蒋军改编是害多利少。

第五，美械化是害多利少，美械是榴弹炮、司登式、汤姆式、卡宾枪，火箭筒等，使蒋军的火力增强，现每连有九挺轻机枪，营有迫击炮，重机枪，团有炮兵连，旅有炮兵营，师有炮兵团，不用花钱造子弹，美国可给他造，这是好处。劣处是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按规定电话线拉到排，无命令不能移动火器，不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蒋介石虽二万辆汽车，分配到全国各战场，再分配到军、师，结果许多师汽车极少，七十师只有十五辆汽车，火器成为累赘。蒋军每连仅有步枪二十枝，兵不够用，强调用火力摧毁敌人，先用火力摧毁工事，然后用步兵冲，可是兵太少，造成野战能力很弱。而自己又不会造子弹，由美国运来，去年夏天由美国接济一万万三千万发子弹，从华盛顿运到中国分给五大战场，每个战场二千多万发，每师补充的不够打一仗。

蒋军不会使用坦克和飞机，和我们一样的，七十四师的俘虏兵说"在抗战时每人一枝步枪，二百发子弹，四个手榴弹，一把刺刀，要走也方便，现在坦克汽车走不动，还要很多士兵来推，打败仗了，路被坦克汽车挡住，跑也跑不赢。"七十四师前进时要派两个营掩护运输，前进又要两个营，前线战斗力削弱，被我们消灭了，后面不打就缴了械，蒋介石是硬把美国的机械化搬来。美国是工业国家，交通发达，他一出动坦克近千辆，飞机数百架，能形成重点，且能供给上弹药。中国是农业国，机械化搬到农村里就走不动，我看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

第六，赏罚不公，他们排斥杂牌，恭维嫡系，官官相卫，拿人血染红顶子。为保卫七十四师，使四、五个杂牌旅被消灭，七十四师还骂杂牌军"不中用"，后七十四师被消灭后，杂牌军俘虏非常高兴，他们在俘虏招待所里相见时说："你们也来了，不错"，说七十四师太骄傲应该被消灭。而七十四师的俘虏官兵则说："你们应把十一师消灭"，因十一师是蒋介石比较亲信的，七十四师被消灭后，很多杂牌军官被处罚，说他们不援救有罪。

第七，蒋介石军事机构腐败无能（一）叠床加屋，南京国防部，徐州绥靖司令部，济南绥靖分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总司令部，能不能起作用。军事机构重重叠叠，一个命令由国防部一层层地下到师旅长，一个报告又一层层地送上去，来往迟缓，不起作用。（二）情报机关非常复杂，非常多，每个军师有情报处，济南、徐州，南京都有情报机关，各有各的系统，且每一个情报各说一样，如莱芜战役，济南说"共军北上打李仙洲"，南京说："陈刘会合"，徐州说："陈毅部回华中"。蒋介石情报说："与我决战"，使其五心不定，不知

如何是好。（三）假公济私，很多物资、弹药、救济物资不能发到士兵手中，都给上面贪污卖了。我们可以和他们做军火生意，他们把子弹卖给我们说："反共，不反共，我卖子弹，你要我就给你。"（四）假报伤亡，消耗大要求多给军需武器，华东敌人和我们打了一年，不知道我们没有第五纵队，经常说我们第五纵队如何如何，其实我军就根本不要"第五纵队"这个臭名字。我们在苏中山东撤退时，被其缴获的重要文件不少，但他官僚主义，也没有去研究，就是有些研究的人，也吃不开的，如七十四师一个旅长了解我们，说我有什么优缺点，人家就骂他"你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这样清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在打两淮时，被我杀伤数千人，他数次挨打后打电报给十一师、七师等部说："匪军无论在战略战役战斗皆优于国军，数月来，匪军向东则东，往西则西，本军北调援鲁，南调援两淮，伤亡过半决战不能，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吾公以为何？"这是说出些道理，但受到蒋介石的申斥。张灵甫是研究我们的，他打两淮得我军装一套，研究我军装的好处，把军衣带到南京见蒋介石说"共军军衣比我们做得好"，蒋介石说："匪军还有军衣吗，赶快拿来看"，他拿给蒋介石说："这军衣好处：一是长厚，很暖和，穿起可节省大衣，又方便，我们的短，遮不住屁股，又很薄，不穿大衣受冻，穿了又不方便，二是肩上扎线，背枪弹不容易坏；我们的不扎，烂的很快。三是军裤很长，我们的很短，还要用绑腿打起来"。蒋介石说："你不要在这里宣传共产党好，赶快下去"。蒋介石是犯神经病的，他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的，更听不得共产党好处。蒋军军长韩练成也研究我军装军鞋，一打仗时他就穿上我军装，准备化装我军逃跑，我们革命工作的真理，反革命是不敢研究的，一研究就坏事了，象红膏药一样，一染就红了，近朱者赤。

第八、作战是互相当学生，互相当教员，我们和蒋介石打了几年仗是有进步的，但国民党也有进步，一是，他现在很注意保守秘密，部队调动，我们不容易查明。二是，增援很快，过去各管各的，现在一下就增援来了。在淮北打仗，十一师与薛岳部队相距二十里，不增援，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才增援，互相要求靠近自己，双方竟商量了一整天，还没有见面。七十四师被歼时，与杂牌军相距五里，他说你前进五里，他说你靠近五里，也讨论了一天没见面，蒋介石下命令叫他增援，他说："有共军七个纵队进攻我们"，其实我们只有一营兵力。蒋军现在日夜增援，旅长、团长也带队伍冲锋。三是，蒋军打夜战和我们争取夜间，有时晚上袭击我们，以前飞机白天来，晚上不来，现在晚上也来轰炸。四，防守上也有进步，工事做得更强更深。这些进步是敌人的回光反照最后挣扎的表现。

第九、一年来对蒋介石的神经战对干部战士要有正确的战略和政治教育，才不致被敌人迷惑，干部思想才不会波动，中央社的广播是非听不可的，其中军事消息有一半是暴露秘密的，莱芜战役时就是得自中央社的广播，那时敌人不用有无线电，只用汽车送信，中央社广播："山东共军有六个方向可走"，而每个方向又说明国民党如何布置，如："往东渡黄河有王耀武兵团阻击"等等，这等于我们参加了蒋介石的国防部会议。因此我们故意在临沂南打上三天三夜，转兵北上消灭王耀武部队。因为国民党是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往往保守不住军事秘密。且美联社最知悉蒋军内情，他们就将其作为新闻广播了。

敌人企图捕捉我主力，与我决战。他费尽心力，想痛痛快快与我打一仗，消灭我一、二个旅，或一个纵队，但他无法实现。我们几次要犯错误，都经领导上挽回来了，领导上要十分注意不犯这个错误，不上敌人的当。敌人摆上五十个团兵力在临沂、徐州之间，希望我们打回华中，被他途中消灭；希望我过黄河，希望我与刘邓会合，都是为消灭我主力的吊膀

子，我们也不上他的当。

敌人企图轰炸我的指挥部，利用美国人所造的无线电测向台侦察，以徐州、南京为中心，前线也设有测向侦察台，判断我指挥部的位置，用飞机轰炸。敌人前线测向侦察台与我司令部不过百余里，侦悉我有三、五架电台发报后，判定最低是纵队司令部，就派飞机来轰炸，在临沂北我有一炮弹库被炸起火，足足响了一天，后来我们把电台移走，大行动前不发报，他认为有鬼，我又在大行动前大发报，他认为又有鬼，有时我们不行动也乱发一起，使其捉摸不定跟他做神经战。

总之，敌人一年前的优势现在是没有了，一年前他有三百万的军队，日军一百另八万的武装，美国四十万万元贷款和四十个师的装备，占据平津、京沪等大城市的资源和联总救济物资，蒋介石回南京是抗战英雄，现在蒋介石再凶也找不到以上这些东西了，他所有的东西已快用光了，如果蒋介石再有一年前的条件也可能挣扎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了。一年来远东方面绝大的事变，世界上的巨变，已使蒋介石的力量根本起了变化，蒋介石的优势正如唐诗所说："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已打下千载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空前的内战在全世界亦少有的，双方动员兵力五、六百万在前线上，敌人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其战争规模差不多相当于欧洲大战时情况，这种战争把国共两党秤了一下，共产党重，国民党轻，我们俘虏蒋军的将官什么芝麻酱、辣椒酱之多，为古今中外战争所未有的，斯大林城之战才不过俘虏了一名上将，及几个中将，这是我们转为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蒋介石并不愚笨，美国人也不愚笨，因为他们有五大矛盾不可能解决。

第一，他与广大人民矛盾，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卖国，因此他的改编军队，他采用的战略战术，都经过最后考虑，没有办法不如此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圣人，他很聪明的，我们给他当参谋长也不可能挽救他死亡的命运。他是不能不多头指挥，枣庄守了七天，他叫部队死守，不叫突围，如果叫突围了，济南、青岛、北平、天津都会突围光了的。他宁愿叫他的部队死守，被消灭也不叫逃跑，与其逃跑被消灭，不如死守待毙，蒋介石还在南京，他的部队就要死守，除非他从南京逃跑走了，才能允许他的部队逃跑的。我们不怕宣布自己的战略方针，敌人是不可能采用的。这只有革命军队才能采用，我曾给部队下过死守临沂的命令，有些同志说："恐怕会变成死拚造成全体壮烈牺牲。"我说："不怕的，革命同志有机动性，见到形势不利，被敌人包围时，他会突围出来的。"如果你要他机动一下，他很快就会撤走的，多坚持一下给敌人阻击杀伤，对战争发展是有利的。

蒋党会不会得到美国的继续帮助，美国不帮助，内战就打不下去，王耀武说："美国人要打只得打。"他编制部队的优缺点，部队的机械化的使用，只能这样做。宋子文说："和平拖垮，不和打垮"。我们搞农村，白崇禧也说："要搞农村"，这是国民党不可能办到的、因他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农村一闹乱子，他就受不了。他在城市还有些群众，有城围起来还可以用兵守一下，他没有广大农村群众，如到农村垮的更快，这是他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一。

第二，他战略与战役战斗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他的战略是进攻，而战役战斗是防御的，如果战略和战役战斗都是进攻，则都象汤恩伯在苏中一样，七战七败，他更受不了。只能分散兵力守备，兵力一分散，火力也分散了，他的优势变为劣势了，如果他逃过这一关，进行长期的准备，结果也是被消灭的。

蒋军还有部队与部队间的矛盾，官兵的矛盾，军民关系的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蒋介

石是个聪明人，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现在保守军事秘密进步了，旅、团长带队冲锋了，仍不能保持其优势，现在他进攻力量很弱，一般只能防御，但还能做局部的战役进攻，这样结果到处挨打，被我毁灭。蒋介石战略的弱点，形成他火力的弱点，他的心理精神的变化，和一年前是大不相同了。

关于国民党的看法，对国民党的剖解，就是这样的。我们对于七四师的调查研究比较好些，但写的不好，掌握材料还是问题，很多好的材料未写进去，我们研究国民党仍差，需要加强。

八、结　束　语

军队工作与地方党工作一样，需要新的形式，目前新的大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自卫战争胜利，解放区伟大土地改革普遍开展，蒋区工人学生民主运动的发展，反攻再前进一步，将发展成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重新整编队伍，三查运动，审查与提高干部，提拔新的干部，从地方上抽调好干部到军队，提高部队，使部队各方面的工作焕然一新，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一，发扬阶级军队阶级武装的特质。抗战八年，我们军队的阶级武装性质未变，在党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服务，今天更加要发挥这一特质，才能成为土地改革的军队。蒋介石向他的军官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共产党的清算对象，我已六十多岁了，还怕什么，主要是你们自己"，这是他最后挣扎的表现，说明蒋军是有他们的阶级性。我们要树立农村贫雇农领导，割断小资产阶级与旧社会的关系，成为一支崭新的坚强的人民军队，担负扩大创造新解放区的任务，军队干部要学会建军、建党、建政、建民，把新解放区巩固起来，使之转回来帮助军队，扩大军队，我们在反攻中是以军队为主创造新解放区，先帮助地方工作，把地方工作做好，使之倒回来帮助军队，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改造我们的军队。以前我们在内线作战时什么都齐备，现在在外线作战就要自己搞党政民工作，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这四项工作，否则反攻会倒回头的，今年四八年我们能否渡过长江，不决定于蒋美而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如我们把长江北的工作搞好，彭贺部队进入陕南、四川，林彪部队出关，则我们与刘邓陈谢部队可转入长江以南作战。抗战八年，我们只学会打仗，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会做地方工作，做经济工作也是搞投机生意，华东部队干部在艰苦的时候，思想发生波动，是一点也不偶然的，是由于阶级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我们要彻底转变从旧到新的突变。有些要被淘汰，一部分人要落伍，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也是世界革命的规律。不管你是大革命的，十年内战的，抗战的干部，都需要提高一步，彻底转变，审查干部提高一切工作，发挥我们阶级军队的本质，军队大批干部调到地方，深入蒋区工作，地方好干部调到军队，向蒋区发展，深入蒋区发动农民土改。

第二、发挥军队独立作战的性能，过去一年我们强调集中，反对离开战略战役的机动，但反攻到蒋区后，许多同志机械的很，一举一动也问上级，搞不来独立作战了。今天我们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正规战运动战，一面又是分散扫荡土顽固，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要做到又分散又集中，分散了集中，集中了又分散，但反对游击主义，要善于抓住时机学会攻坚，共国两党卅年来在各方面的论争，思想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论争，主要是土围子

不能解决，敌人在土围子里，你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不学会攻坚，就无法完成中国革命，学会了革命就快成功了，现在打开石门、运城等地，证明我们攻坚力量提高了。但仍不够，一定要继续提高，我们还要学会山地作战，越向南越多山、雨季作战也要学习，我们急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能指挥各种兵团在各种情况下作战，应付各种情况的军事家，二十余年来我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材，也有一批军事干部，但仍差得很，要好好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史，并使之与实际结合，培养成全面的军事人材，象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导很高明，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党能有这样的人材百把十个就差不多了。我们解释毛主席的政治思想著作很多，但解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很少，需要一批有理论与实际经验的同志来作这项工作。国民党步兵战术操典，拿破仑战争史，及古代军事理论都要学，将经验提高到原则。

第三，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今天要强调建设统一的人民解放军，以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位，来统一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本位，具体办法是调开其本单位，调虎离山。

我们反对破坏主义与破坏专家，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思想，他们打开城市破坏城市，打开教堂破坏教堂，打下医院破坏医院，他们不要的东西都给你破坏了。他们不懂得反革命的财产一到人民手里就成为人民的财产，你只有保护的义务，没有破坏的权利。有一次我们部队的一个勤务员把博山一个房子里许多玻璃窗、电灯泡打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汉奸住的要打掉。"鲁南战役时，缴获敌人快速纵队的军需品，价值数十万万元，足够五个月用，但破坏不堪。华东消灭敌人近五十旅，至少可装备二十个旅。但现在炮仍不够用。这与本位主义有关，他们认为"给你调走了，我还是用不成"。有了东西是人情，我把小单位搞好了，不管大家是否受损失，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以战养战"，以敌人的骨头熬敌人的油，尽可能减少后方群众的负担。前方的缴获能解决很大的问题。缴获的食粮不少，结果变成额外的消耗与浪费。我们有两万多匹马，一个骑兵团才二百多匹马，连拖炮的马都不够用。这样的仗我们是打不起的。

我们今天提倡"以战养战"实行大公无私主义，共产党是革命的破坏主义，破坏为的是建设，与破坏主义破坏专家不同的，有原则区别的，反对破坏主义破坏专家是党内很大的思想斗争，特别要反对破坏的头子，这批人是党内的"功臣"，他们虚报、假报、大斗进小斗出，要来一个对"功臣的扫荡"，只有把他们"扫荡"掉，不然是无法无天的。

军事教育实行"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攻下据点，即演习攻据点，这样提高军事技术，这是建军中很重要的一环。

第四、强调艰苦斗争，反对贪污浪费，晋绥陕北生活很艰苦，弹药少；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那里有一部分人过的是地主生活，反映了地主意识，结果反对土地改革，但一般部队生活是很苦的，只是少数供给经济干部，大权在握的干部，生活铺张浪费，有一旅长出门，要用九十个民夫，后经调查，他除带用几个伤员外连家属小孩还有四十余人。但我们一般指战员很艰苦，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碉堡攻不下，我们一、两个同志拿很多炸药捆在自己身上，以自我牺牲炸毁敌人碉堡，打七十四师动员时，有很多人事前写遗书，牺牲后要求追认入党，或取消处分，有的牺牲了，有的没牺牲，第二次又写遗书。我们就接受其请求。发挥了高度的阶级觉悟，我们进攻敌城堡时，爬城梯子，周围布满死尸，还是硬往上冲。这样的战

争哪有不胜利的。有的部队因一个地方撤出来就痛哭："对不起上级，对不起老百姓"，表现了人民军队的特点。而一部分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人则高高在上，不能反映群众的情绪，要很好改造。要开刀才能割去盲肠。

第五、战争的展望，南线北线作有力配合，北线消灭敌人的孤立据点越多，根据地愈大愈巩固，东北解放军进关，则南线大进军的胜利越快，南线工作做好了，南北大军配合就可致敌于死命。今年秋天能组织一百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可能结束战争，否则到明年一定可结束战争，这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的总结（摘要）

（一九四八年二月）

刘 少 奇

（一）国内形势：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对付日本的，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会议是对付国民党的，是准备胜利的，过去开会往往是准备困难的，今天主要应从思想、组织、政策各方面准备迎接胜利，过去几次均因事先准备不够，使工作损失。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二）党内的“左”倾：

今天“左”倾表现在划阶级订错成分，整党时光靠组织解决问题不解决思想，贫农团关门，清算工商业，增加工资，贫雇农路线也是“左”的，是无政府主义，表现为自以为是乱搞一通。

过去党内对错误不敢严厉批评及必要的组织手段解决问题是错误的，因此整党更有所必要，组织解决应从思想基础来实现，而组织解决又是为了帮助思想解决的，因此目前要防止“左”。产生“左”的原因：主要应由领导上负责，同时先来说明那些当做那些不当做，自己没有经验，又未及时研究别人的经验，因此自上而下开展自我批评非常必要，在开展批评时要反对乱承认错误，也要反对批评专家，有错即要承认；其次是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破坏性、绝对平均主义都是“左”的社会根源。因此今后在党内、外公开宣传党的政策，反复解释，不是党的政策与群众要求相矛盾，而是正确政策与错误政策相矛盾，凡是牵扯到群众性问题，都应提到政策上去解决，尾巴主义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左”倾能挽救蒋介石命运，胜于美帝援助。

今天党内纠正“左”右倾，并不困难；因无其领袖，只要说明，犯盲目性的同志，都可转过来，过去我们不了解此特点，发生急性病，反右来“左”，反“左”来右，今后处理“左”、右要冷静耐心，讲清政策，着重从正面宣传中央政策，规定具体条文，反右时三管齐下。反“左”也不能原谅，“左”倾应公开批评，在报纸上发表，必要时执行纪律。

什么都要调查研究，不要性急，即要反对急性病，又要反对慢性病。

土地会议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①对阶级划分不明确不具体；②没具体反对平均主

义，致侵犯中农；③对富裕中农认为可以平分；④对贫雇农路线及其他错误论调没有进行严格批评。

今后应充分准备好再发动群众，否则易出错误，但准备好部分出错误也是难免的。毛泽东化的干部，不是没有缺点与错误的。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在适当的地点、时间、条件下，适当地提出反"左"反右，这是领导艺术，单怕犯错误是不行的，必须在工作中要求不犯原则错误，有错就改，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财政经济问题：

财政经济上要有胜利观念、长期观念、统一观念，这三者是一致的，必须统一起来，只有长期而无胜利必然犯保守主义，前方保证胜利，后方长期打算，前后方应建立在战争长期与胜利，在此目的上统一起来。如果有违反上述原则，要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能马虎或妥协。

前方要照顾后方困难，后方要照顾前方需要，军队要严格纪律遵守制度，反对浪费，缴获一律归公。方针是："统一制度，严格纪律，贯彻政策，发展生产，适当节约，反对贪污"。军队在执行时要特别注意教育，在战争中军队之破坏行动，必须注意政策纪律之教育，群众是通过军队来认识我党，军队是我党第一把旗子，因而政策策略教育特别重要。有的部队如不改正，即执行纪律。

今天不是前方能否胜利的问题，而是后方能否支持的问题，因此前后方都要执行上述方针。全国必须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另外还要照顾局部及个人的，先做到地区统一，再做到全国统一，我们要小心谨慎，搞的不好，还有垮台危险。

贷款要以实物计，用于生产，保证收回，有重点事业及地区，累进说不要太高，不妨碍新富农及中小资产阶级发展。代耕一般取消，个别军属要代耕，后方支差要禁止。通货要有计划发行，以免过分膨胀。取之于敌要强调。

（四）土改问题：

过去是不宣而战，土地法大纲公布后是公开了，比不宣而战是好的多了。

东北局下了决心抽几万干部（从部队调）进行土改，迅速改变了敌我情况。比其他解放区发展得快，军队现有八十万。

山东由于揭发黎玉之错误，进行教育，土改整党走上正规。

土改要搞好需两三年，一九四九年底全国政权能大部到我们手里。

土地会议对平分与绝对平分区别不明，未严格批评绝对平分是错误的，由于过去强调平分满足贫雇农要求及贫农组织独立，因此造成侵犯中农。今后对中农及新富农说服不了，不必免强。

新区工作是保存原有制度，不提平分土地、浮财口号，待各方面条件具备后再做，先集中力量打击最坏的，以联合或中立其一般的，反对急性病，边沿区更要慎重。

挖底财已知者可以挖，但不能打人或打死人，以免造成恶果，扒坟要禁止。

对地主管制不要一般化，形式化。

（五）城市与工商业政策。

目前主要危险是“左”倾，今后进入城市要首先维持原状，了解情况，取得经验，逐步前进。

官僚资本主义要没收，但要有步骤以免混乱，其他中小及民族资本家一律不动，但政治上统治要改变，即以工、贫、店员为主结合工商业者的联合政权。

工人取消封建剥削，保护劳动自由与雇佣自由，工人要努力劳动，增加生产。工资原则上不提增资口号，维持原工资。在政治文化上要保护工人，工运同志要分别我区与敌区的方针不同。

以下几种情况均可破坏工商业：没收不当、乱增工资，待遇时间规定不当，开大会过多，交通不好，战争影响，对敌斗争不便，袒护公家的工商业等。

公营企业中要组织工资评定委员会，工人行政均参加。工厂委员会不能干涉行政。

工厂党与地方党要分开。

（六）杀人问题

欧洲是暴动，所以必须多杀造成赤色恐怖，我们是军事占领所以不必多杀。

我们杀人要建立司法工作，杀人经过批准只用枪毙。

（七）整党问题：

党内基本上是纯洁的，但存在部分不纯，党内不纯，恶果很大，其原因：党的领导教育不够，战争影响无时间。党内基本上是思想问题，故须坚决整党。整党目的，是使党与全体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整党要分步骤进行，要求过高急都不行，整党中对待党员，有无政治问题者要分开，成分与思想作风要分开，地、富与子弟要分开。对地、富子弟要爱护改造，对地主，富农本身要根据入党动机及思想行动分别对待，如系异己分子，入党动机不好，入党后镇压群众者，应清洗。如表现好者应与一般党员看待。过去不注意成分是错误的，唯成分论也是错误的，今后个别好的地主、富农还可以吸收，其子弟一般可以吸收，改造过来都是好干部，换防也不是绝对的，不能排斥知识分子。

整党基本方针是：“治病救人，教育改造”，只有对反党反人民分子才是坚决清洗，一般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步骤发展创造典型，积累经验，必须有准备，否则搞坏了，采取组织办法是不多用的。有许多问题不能怪下面，应由领导上负责。问题讲清楚后如明知故犯，即要严格批评与教育，只有这样做才能消除顾虑，团结多数，用此种方针、步骤、方法将问题搞清楚，再向党外进行自我批评。当采用组织纪律时是整党的结果，不是整党目的。但在开展时有些地方用反了。执行纪律与运用组织方法，也是为了教育个别同志及教育全党。很多的人是用纪律维持纪律，而不是以教育来维持纪律是不对的。如果用纪律维持纪律，思想未通也维持不了，此处弄好那处弄坏，结果使党员不敢动，处处犯错误，特别是领导上要

进行检查开展自我批评，不抹杀优点也不夸大或掩盖成绩。

整党既要坚决又要慎重细致，通过组织，改造组织。

执行上级指示，不要盲目，要根据情况，要发挥，领导者要听取反对方面的意见。

部队集中性大，整党时要特别掌握领导。

（八）建设政权问题：

政权形式既不完备，在战争时期有困难，俟环境许可时再来做，先将乡村、市、县的基础打好。

现在是人民代表会议（不是工、农、兵代表会议），既不能因内战而否定三三制，三三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个别人不好，不能因此而怀疑三三制。在抗日时期，一些地、富到政权中来是有作用的，不能否定过去一切。

宪法不得过早公布，要搞中央政府（明年）有了几个大城市，特别控制某一条主要铁路的时候。

（九）领导问题：

今后进行思想教育时要从正面提出问题，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叫“左”、什么叫右。领导上遇事要考虑确定，不要急躁。

一切强调统一，反对分散独立。

各级党委书记，要亲自领导党报。

上下级要建立正规报告制度。

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毛 泽 东

一、庆祝你们攻克辽阳。

二、南线各军除一部分外，一年半中没作过大休整，最近作了一次全国大休整，彭张军二月上旬结束休整，中旬行动；陈粟军、陈谢军、许谭军、徐滕薄军二月底结束整训，三月初行动；刘邓军暂时分散打小仗，是半休整状态；苏北军原只四个旅二万余，现拟增强至七个旅五万余，三月可行动。南线敌除对大别山尚有重点进攻外，其他均取守势。杨罗杨军二月底三月初当可打平绥，四月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

三、你们如能照我前次电报所讲的意见，将大休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时间推迟至解冰以后，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几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这种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则尚可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拟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

*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一个电报。

中央关于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中央审查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草案，和研究该次会议中各种报告材料之后，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的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且已经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机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二、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认为必须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尚相当普遍的存在（晋冀鲁豫的情况要好一些）。因此许多地方对于发展工业（包括副业）和生产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合作事业，提倡解放区缺少，但有可能自己出产和推广的各种生产（如植棉种蓝等），尚缺乏认真的坚持的贯彻到底的精神。财经机关在对服从财政等政策上，对于如何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缺少注意，或者是注意的不够。这就不可能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种情形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并努力加以改进。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党、政、农会、工会，除支援前线工作之外（注意节用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它日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加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少，不能解决财政的关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连续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工作，当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务。

三、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应即坚决实行。各级党委和财经机关，应当讨论传达财经会议决议（参考该会议的综合报告，及各区报告中许多很好的经验）。配合当地具体情形，布置工作。明年的农业生产运动，今冬就当计划和着手进行。

〔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决定

中央指示我党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这个反攻是长期的，中间还可能发生某些曲折，不论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要长期打算。因此，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抗战期间，我各解放区在财政工作上即存在有：

必须大量养兵，必须保障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准，和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基本矛盾。自卫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分散的落后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交通不便，与比较近代化的大兵团作战间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必须适当解决，始能支持长期战争。

人民负担能力在八年抗战，一年自卫战争后，究有多大、能支持多久？为了支持长期自卫战争，争取最后胜利，最低限度究需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一个士兵的生活标准，究应有多高始能维持？会议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一点五；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十六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其次，应估计到在长期战争中，我解放区某些部份可能暂时沦陷，并受严重摧残，某些地区还可能遭遇灾荒以及黄河泛滥，反攻开始后，我必须支付更多的人力物力。凡此种种，均会加重我之困难，必须有计划的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过去我各解放区财经建设已有相当基础，人民生产发展，已积蓄了相当多的力量，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土地改革后成千万翻身农民，热烈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这又是我财经工作的有利条件。只要军民团结，各解放区团结，共同斗争，一定能克服困难，赢得胜利。会议研究过去经验，目前情况，专作如下决定：

（一）经济建设必须奖励土货，抵制美蒋货，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实行保护政策。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争取自给自足。为着提高生产力，应当改造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奖励互相合作，组织变工组和合作社扶助群众生产。发展农村副业。土地改革后，更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发家、发放大量贷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缺乏生产资金的困难，调剂耕畜农具，保证生产品的销路。公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公私兼顾，照顾群众利益，照顾社会经济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应使之得到发展的机会、保障其营业和赢利的自由。

（二）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只要保证了部队的必要供给（衣服粮食菜金弹药医药、通讯器械及炮兵工兵的建设费用），及必要的生产建设费用，就算是完成了财政任务。其它工作可不办的不办，可缓办的缓办，降低生活待遇，提倡艰苦奋斗。反对“仁政”观点，也反对铺张门面百废俱兴，以至无限度的加重人民负担。必须拿出已有积蓄，放手使用力量；又必须作长期打算，要从发展经济中去保障战争供给；财政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而必须从一万万几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民富即国富，这是我们与国民党不同之点。

（三）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在战争期间，部队可占脱离生产总人数的四分之三，地方占四分之一。军费开支可占财政开支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地方费占百分之十五。部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保证野战部队要占部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能集中起来机动作战的）。地方机关和军队后方机关，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

提倡科学的精确的合理计算，细心审核预算决算，核实人数，消灭虚报重领等浪费现象，严格财粮制度，反对漠视制度一切机动处理的有害观点。供给标准，部队高于地方，前方高于后方，野战军高于地方军。后方应特别提倡艰苦奋斗，一切为了前线，向农民生活看齐，切戒继承地主或踏袭资产阶级的生活。

（四）开源、取之于民者：应改进公粮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必须改善粮食和征收保管运输调剂工作，反对重财轻粮。负担政策，应扩大征收面，减少累进率，照顾农民生活，不要伤害农民生产情绪，税收工作与对敌经济斗争，管理贸易和奖励生产相结合，做到既保证财政收入，又刺激经济发展。

取之于己者：机关部队生产，应以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为主。反对投机贸易，取消机关部队的商店，归工商管理局统一经营。过去有些机关部队，积累了相当大的资产，应鼓励其捐输归公，支援前线，以减轻人民负担。

取之于敌者：战争缴获物资归公，除武器弹药由部队自己管理（多余部份仍应互相调济）外，其它如粮食布棉金银货币等，均应交公作为财政收入，严禁私自扣留、和破坏行为，出击部队，就地取粮，实现"我们的后方是在前线"的口号。

（五）整理村财政，目前村财政无制度，浪费惊人，必须加以整理，整理村财政，节约开支，应成为村干部为人民立功内容之一。整理办法，最好由政府统一规定，收支标准，由村民民主评议。经区公所核准，自筹自支，并按期结算账目，送上级审查公布，村财政负担，要求做到每人每年不超过小米六斤。整理公产公款投资合作生产，以其收益，补助村财政。

（六）调整战勤：由于几年来参军参战农村劳动力已感缺乏，自卫战争开始后，战力更加频繁，且有严重浪费现象，如不能尽量节省民力，以致影响生产，因此，要求战斗部队精确计算，科学使用民力，做到平时不超过三兵一夫，战时不超过一兵一夫，支用民夫应有严格制度，除抬送伤病员和运输粮食弹药等战争必需者外，其它当严厉禁止。战勤负担面，要力求扩大，做到公平合理，改善民兵民夫的管理工作，建立战勤组织制度，使战勤与生产相结合。劳动互助，优抗代耕，实行大变工，按期计工算账，办法，并要统筹计划，实行村区县大调剂，全区大调剂。

（七）贸易和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对内调剂供求，扶助生产发展。为此，必须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奢侈品消耗品，及妨害我生产发展者应禁止输入）。争取出入口平衡或出超。必须改善交通运输工作，组织群众运输。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稳物价，保证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为此，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我的影响，必须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

为促进群众生产顺利发展，还应采用各种方法来便利土产运销，调剂农村信用，在合作社发展的地区，应即贷款发展运销，和信用合作社，组织合作社的联合运销。银行和贸易公司，必须扶助这些合作事业，使之健全发展。

（八）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出击部队的粮食等供给，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措，不应单靠后方补给。新解放区人民（尤其地主富商），也须担负战争供给，反对"仁政"观点。反对抓一把的做法。蒋政府的公产、和汉奸恶霸财产的接收没收，须有纪律有组织的进行，避免破坏及浪费，有步骤的进行本币，收兑和排挤蒋币。新解放区的奢侈品消耗品不得没收或补税，应当加以登记管理，逐渐改造市场，使为人民及生产服务。为着保证部队供给，管理接收没收资财、掌握金融货币，贸易工作，应当组织财经工作队随军行动，掌握政策指导工作，避免混乱现象。

（九）组织领导。鉴于各解放区多已联成一片，人民物资交流，军队机动作战，和贫富区

适当调剂。均要求我华北财政经济做到适当的集中统一。同时又鉴于各区财经工作发展不平衡，交通不便等关系，在集中统一下，又应有很大的机动处理权。会议本此原则，一致要求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统一的财经机关，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对敌经济斗争，调剂贫富有无，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供给标准，统一计划掌握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各种货币兑换比率，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其它具体工作则完全由各地机动处理。

各解放区间的货币贸易关系，应即进行适当调整，便利人民物资交流，使我对敌经济斗争力量加强，步调一致。会议决定，邻区物资交流，应与内地贸易采取同样政策（通过敌人封锁时，须有适当措施以免走私偷税），进口出口采用一道税制，邻区已征税的不再重征，各区货币应互相支持，便利兑换，帮助邻区采购必需外货，推销剩余土产，互相调剂，减少对蒋占区的依赖。

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必将更加繁重和困难，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键，建议各级党委亲自掌握财经工作，动员全党全军及群众力量，共同努力渡过目前严重困难，并把我们的财经工作提高一步。

1947年5月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

四日报告十二日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四日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至四日报告末项所述问题我们现在难提解决方法，亦请付大会讨论。

〔附〕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

中央：

（一）土地会议各地情况汇报数日即完，将转入讨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及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作风并撤换与处分那些坏干部。关于土地改革本身各种问题，大体均有各地成熟经验，已无重大原则问题须要解决，我们当与各地代表商讨解决之，但关于民主则有重大原则问题待解决，故特请示。

（二）从晋绥到阜平，我即注意考察土地改革不能彻底的原因。在阜平反对了领导上的右倾后，很快就看到冀西的左倾急性病，干部在乡村中的无限权力，强迫群众到会，付表决、呼口号，在斗争地主及所谓国特时，强迫群众打人杀人，并用强迫办法做到形式上的百分之九十向上级作报告。我用坚决态度停止了冀西的这种运动，即细心考察党内与干部情况。在土地会议又与各地代表谈话并听了许多报告后，发现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冀察晋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冀察晋（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

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份，其中地主、富农成份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雇贫农抗战初期虽在党内占多数，但现在一般只占少数，且不起作用，他们仍系最受压迫阶层，中农、贫农出身的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党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儿作老婆，在土改中有帮助其岳父者，冀察晋军队中曾有反土地改革高潮，现已纠正。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许多地主得我干部帮助降低了原来成份，他们主要是利用我们各种组织形式来保护自己，压迫群众。本地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对地主有些包庇，每次群众起来，他们叫嚣过左，每次反左纠正偏向，他们乘机报复，镇压群众，有时他们也故意左倾把事情弄坏，引起上级反左，其中最坏者，则对上奉承，投上级所好，在强迫命令下完成任务迅速或作假报告，在报上吹嘘自己成绩，因而获得上级信任鼓励，安上模范头衔，但对群众则是完全统制镇压，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感情大多同情地主。过去领导机关对于这些情形熟视无睹。

（三）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得罪群众，怕群众揭发报复，因而更要控制恐吓群众，有人批评他们错误泄露其黑幕者，即予以打击，他们大多不当兵，不服抗勤，负担较少，降低自己社会成份，而以当兵，派抗勤，出负担，订成份去打击其反对者，照顾其拥护者，选举开会完全包办，村干部有的分成二、三个宗派，互相反对，轮番上台，但各派作风大多一样，群众则是中立的、冷淡的。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一般党员，一般村干虽不都是坏的，内部也常有矛盾，但多被坏干部统制，没有党内民主，正派人受压制，不能得势，邪风上升。我们派了些工作团到乡村去，不少支部有组织的非法封锁，不让了解真实情况并作假报告，当工作团直接向群众调查情况时，常有人恐吓群众，工作团常须作一时期秘密工作，才能稍得真实情况，当贫农团已组织并批评村干时，不少村干骂贫农是流氓二流子，工作团超越组织，并用各种方法瓦解与破坏贫农组，当贫农组已巩固并联合中农成立农会时，他们才感到孤立，开始低头，开始分化，一部要求加入农会及贫农组，另一些人则左右为难，到处探听，托人说情，坐卧不安，有些工作团须用一半人力去教育支部村干，只用一半去直接发动群众，方能减少阻力，并引导他们一同参加运动，但仍有少数坏的站在旁观地位冷嘲热骂或暗中阻扰或顽强抵抗，贫农团对下中农邀请其加入农会或贫农组，对上中农加入农会则常要介绍人，对地主、富农拒绝入会，对村干部有的欢迎加入，有的要介绍人，有的要三人介绍，只许作候补会员，有的拒绝入会，一切人入会均经大会审查通过，村中五个主要负责干部，大多被农会拒绝入会，工作团解释亦不允许，有的允许待他们好了以后再入会，只到此时，原来不好的村干，才开始解除武装，坦白错误，向贫农和群众屈服，但有贪污及犯罪大者仍不愿坦白。此时群众中则常有过分主张与行动，强迫村干到大会坦白，不彻底者穷追，并加打骂、扣押，有仇者报复，夸大罪过，此时领导如不能有效说服群众，并组织法庭接受控诉，上述主张即得群众赞成，发生打人、押人等事。干部亦有在群众行动下逃跑与自杀者。我们如此试验了将近三十个村，大体经过均如上述。只有一个村支部和村干得群众信任，并经过他们顺利组织与领导贫农组、农会完成土改。其余二十九村的五大领袖大多被拒

入农会。其他党员干部被拒入农会者亦不少，被拒加入贫农组者更多，有些村农民坚持先斗村干，后斗地主。康生在晋绥也经过三十多村的试验，其经验亦同。上述过程，也许由于在地方干部中尚未作系统的思想动员，而工作团系外去干部，一般不免首先见到缺点，忽略成绩，而发生若干夸大村干缺点偏向，也许在全党布置充分动员并宣布纪律后，可能大大减少抵抗，并使村干部能和工作团一起参加运动，增加支部独立完成土改任务的数量。但上述发展过程的方向，一般是不会错的。许多贫农，过去认为落后分子，现为一村领袖及积极分子，他们开始组织就建立严格纪律，宣誓办事公平、听群众意见、不自私、为群众作长工、守秘密等。当他们领导农会成功，诉苦斗争地主，分配果实公平，消灭封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后，特别在斗下村干时，农村气象更新，群众活跃，作风改变。但贫农欠缺办事经验，如无老村干帮助，则发生困难，其他缺点尚未看到。如能在以后有正确领导和教育，他们可使全党作风改变。

（四）当农民起来撤换村干，特别群众中有过左行动在大会斗了某些村干，打骂、扣押及自杀逃跑事件发生后，影响极大，四周贫农及不满村干群众就欢喜，并派人来请工作团，向工作团告状。另一方面，干部大哗，有的意见较好，只要求不在大会斗争，弄清是非轻重和责任，有些意见则根本反对，强调村干功劳，强调上级责任，问党是否还要干部，并威胁说：如此下去，既无人敢当干部，公粮、扩兵、抗勤等任务，将无人负责，卸了磨子杀了驴，悲伤、恐惧、躺下怠工、不管工作，并造作许多谣言，向上级反映，从村干一直影响区、县、地委、区党委干部和党校议论纷纷，只听一面之词者，即受他们影响。有些干部准备工作团到他们那里时，即逃跑或进行联防自卫，逐渐形成有组织的非法抵抗，并有训练班数十干部到自杀者坟上烧香、示威、叫口号，村干部如得上级干部撑腰，则胆量突增，不向群众屈服，并敢于作一切非法抵抗。现在他们还不知整个组织意见，但将来整个发动，如无正确领导及周密准备，必致发生重大事变，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与宗派斗争，均可参加进来，如此类似富田事变及打AB团改组派等严重错误，亦可能重复，特别在军事紧张情况下更可能。

（五）两月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然而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为此，特作如下建议：

甲、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一切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完全忠实和正确实行此方针，并很好完成任务，如有党的组织和干部不能有效执行此方针者，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此方针，如有抵抗和破坏此方针之执行者，即根据情况给予处分，直至解散其组织或开除党籍。在土改业已彻底地区，即进行改造组织及干部工作。

乙、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城市建立市民代表会）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全国农民总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政府公粮、预算、征兵、征夫计划等，经农民代表会通过后实行，农会决议，亦得交政府执行，经农民代表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官僚主义，树立雇贫农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地

位，青年妇女团体亦加入农会，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

丙、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或其他日期）一些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十天改选村干部完毕，并召开区代表会，改选区干部，再十天改选县干部，省及分区改选另定。

丁、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集会自由等权利，监督、鉴定、选举与罢免自己的勤务员——各级干部，反对干部非法侵犯人民权利及压迫人民，并对过去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适当自我批评。此宣言如由中央发，我们可起草交土地会议审查后报告中央。

戊、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鉴定，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的决定，为人民作长工，有错者认错，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必须劝告家属接受农民要求，不得反抗群众，以免被斗，然后由群众决定给予若干照顾，并号召党员严格遵守纪律。

己、根据地党员是秘密的，有些地方群众要求党员公开，并要求由农会或贫农组介绍党员，我看此要求可接受，无害处，巩固区的党可以公开，群众反对并提议某人不应作党员者，经党审查后，如理由正当，应拒绝入党或退为候补党员。

庚、地主、富农出身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以免亲朋包围麻烦，严肃党的纪律，宣告：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侵犯人民权力，作假报告欺骗上级，封锁上级人员了解情况，威胁报复群众，故意毁损隔断党与群众联系，隐瞒自己成份与历史，不退出侵吞果实，向党进行两面派斗争，进行小组织活动，隐瞒包庇其他党员非法行为等，须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辛、上述各项如中央批准，即提交土地会议讨论，再将文件报中央批准，然后在各地领导机关取得一致，再以区党委为单位召集县以上干部会，并召集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干部讲话，告他们在土改中如何自处，再召开区、乡干部会，并集中贫农进行训练，如此将上述计划贯彻实行。在这些会议中即号召各级干部，特别高级干部退果实，坦白错误，有罪者自首。

壬、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有罪者适当分别处刑，群众向干部斗争时，则严格保障少数人应有基本权利，干部有否认、辩护、发表不同意见，出席、退席大会等自由权，并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在大会逼供等行为，群众在大会上对干部只有批评、罢免、选举及控诉之权，干部如有犯罪部分，必须交法庭调查审讯后，由法庭处理，只有法庭才有权逮捕监禁。如此保障干部及少数人不受群众中某些过分行动的侵犯，并对其犯罪行为得以揭露、证明和处分。

癸、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及犯罪干部、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方针，而不是毁消他们，分别令其受训及派工作。但有些坏分子必须洗刷，有过者必须适当处分，否则即无原则的严肃性。对于干部的功劳与过错及功劳与过错铸成的原因及责任，均须在群众中有适当评判，避免偏在一边。在运动中提拔的新干部与老干部，实行团结的方针。

（六）上述计划已与主席团商谈过，如经会议讨论，可能有许多修改，并改成决议形式，请中央先作原则批准。此外尚有一问题不能解决，即老地区有些支部很大，一百多党员，但贫雇农全部较党员为少，如吸收贫农百分之二十入党，仍占少数，如此贫雇农在党内即难占优势和领导，而贫雇农如不占领导，支部即很难领导贫农组和农会，此问题如何解决，望示。

刘　少　奇

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

九月五日报告悉。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附：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

中央：

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内即可闭幕。讨论原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因新华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而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及整党、组织农民与进行农村民主运动及生产运动的方法等。土地法大纲及决议草案，待通过整理后，即电中央批准并发出。上述各项，特别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是否妥当？望即复示。

中 央 工 委

中共中央工委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及召开各级代表会等问题给晋绥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十一月三十日报告悉。《土改通讯》第一、二两号亦阅悉。望寄《抗战日报》数份给工委。

（一）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问题，可在法律上规定许多办法去保障。例如：解散旧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旧组织，收回其图章，再由贫农团负责筹备新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组织。旧干部的审查、撤换与处分及新干部的提拔，以及订成份，各种组织会员的介绍，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没收和这些土地财产的分配等，均须先经贫农团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农民大会讨论通过。如此，贫农团即使人数不占大多数，也自然成为领导核心。乡村中一切工作，特别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必须先经贫农团的启发和赞成，否则，就不能办。这些都可成为法律，党与政府可训令一切党委、工作团及党员和干部遵守这些规定去进行工作，凡有不遵守这个方针和这些规定的党委干部和党员，可给以处分，撤职、调离本地和开除党籍。如此，可从领导方面去切实扶助贫农团的领导。但仅仅这些法律规定，还不能树立与保障贫农团在乡村中的领导，还必须依靠贫雇农的积极性，贫农团组织的纯洁性，而不致被坏干部及流氓分子所篡夺。同时，贫农团办事，必须公道，必须注意去保护中农利益，而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并且事事与中农商量，在贫农团自己讨论好了之后，都提交农民大会或代表会去与中农讨论，取得中农同意后，再来办理，而不要由贫农团独断独行。如此，贫农团即可联合中农，避免孤立。在贫农与中农讨论问题时，如中农有不正确意见，但还不是企图推翻贫农团领导者，则须好好解释，有时并须适当地等待与善于妥协和让步。有时贫农团可申明自己意见是对的，但为尊重中农意见而实行让步。但如有野心分子坚持不正确意见企图推翻贫农团领导者，则须严加驳斥，孤立与打击少数野心分子，才能分化与争取中农到贫农方面来，这种斗争，对于贯彻土地改革也是必要的，不可退让或避免。为要能够作好这一切，你们必须注意教育工作团及雇贫农积极分子，使他们能迅速成熟，代替一切不好的旧干部，并把一切工作做好。因此，在报纸上及口头上应经常指导一切觉悟的贫雇农如何去思考与解决问题，及如何进行工作。最近五台吸收非党贫雇农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和各级干部会，得到很好效果，望你们亦采用这个办法。

现在仍为贫雇农的旧干部，犯有错误者，应抓紧教育和争取，对他们的处分不宜过重。由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好的亦可个别吸收加入贫农团，但不宜把所有新中农都吸收到贫农

团，因为这将使新中农更易掌握贫农团的领导，妨害贫农团的纯洁性。

（二）工委给冀东关于代表会议制度电，是指解放区经常的政权制度，这是要在群众业已充分发动或土地改革业已完成的地区，才能建立这种代表会系统，而且必须在目前反对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财产，改造旧干部等斗争中，建立了党与贫农团正确的领导，才能使这种代表会真正形成，而决不是可以和平建立的。因此，你们应立即召集县以下各级临时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去解决土改中各种问题，而不要等待农会通统成立，也不要等待各村代表会成立后再召集县、区代表会，可先召集县、区临时代表会再到各村成立村代表会。也不要去说什么两重政权，什么时候代表会能改组各级政府并把政府各种工作拿到自己领导之下来，即拿过来就是。

（三）你们《土改通讯》第二号关于后木栏干村成份问题的意见，是不妥的，偏于过左的。确定某人成份，应以当地建立新政权前若干年及抗战后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决定，而不要联系到很远的历史，更不要以今天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好坏为标准来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份。尤其不要用故意提高某人成份的办法去打击旧干部，因为这是违背客观真理，这就要造成群众中的分裂，并给地主、富农及坏干部以反攻机会。某人思想及政治态度与工作不好，可用群众鉴定的办法来加以区别和记录。望你们详细研究苏维埃政府怎样分析阶级及其决定，并改正这种错误意见。

（四）关于自发运动与普遍运动不应当作口号去叫喊，也不要成为固定名词写成什么"自运"或"普运"。虽然我们不要惧怕群众的自发运动，但我们不只是群众自发运动的追随者，而必须努力去领导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尽可能更多地变成自觉运动——有系统、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运动。现在你们那里不是缺少群众自发运动，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因此，你们再不要去鼓吹与煽动自发运动。你们那里所缺少的是党对于这种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因此，你们必须加强正确的领导，加强运动的计划性与系统性。为加强领导，现在经常召集县、区代表会，依靠代表会这个形式是很必要的。望考虑实施。

中共中央工委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根据晋绥与晋察冀最近土改材料，虽在许多地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但在若干群众业已发动地区，在划分阶级，首先在确定地主、富农斗争对象上，有下列左倾错误发生：

甲、划阶级的标准有好几条，政治态度和思想也列为标准之一，如曾是国民党员或对新政权态度不好，或是贪污干部，欺压群众，就被提升成份，订成地主、富农。

乙、追历史，查三代，其本人在新政权建立前数年，虽已从事主要劳动，并一直劳动到现在，但只要其老辈是地主或本人早先曾过地主生活，就抓住他的封建根子不放，仍订为地主（或称为破产地主、下坡地主）。

丙、把有劳动之家做为无劳动，主要劳动做为附带劳动，因而把富农订成地主。如将自己劳动并雇两个长工者订为地主，理由是自己劳动只占三分之一。也有的将富裕中农（如靠自己劳动只雇一放牛娃或放羊娃者）订成富农。

丁、确定谁是地主、富农，有的仅由贫农团通过，或少数人决定，而不由全体农民讨论通过。

二、我们领导土改的干部，对于上述错误，不去教育说服农民改正，反跟着农民走，拥护农民这种错误，而自诩为群众路线，其实这是放弃领导，是尾巴主义，与我们的群众路线毫无相同之点。

三、上述错误，如不及时防止和纠正，将妨碍土改之进行，并使将来难于纠正。望各地党委立即检查本地土改工作，如已发生上述错误，应立即纠正、补救，如尚未发生应早加防止，不要使这种错误发展。

四、划分阶级应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再提出其他标准都是错误的。追历史只能追到当地新政权建立以前三年五年，而不要追到太远或追几代。例如，在当地新政权建立前三年中是地主，即订地主成份，是农民，即订农民成份。望根据新华总社广播的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及怎样分析阶级两文件去办理，并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印发给一切土改工作干部详加讨论，并根据中央指示，立即提出修改及补充这两个文件的意见速告中央，以便中央能迅速规定分析阶级的统一标准和办法。

五、确定谁是地主、富农，必须首先在贫农委员会及贫农团大会讨论通过，经工作团或上级审查同意，再由本村农民大会讨论通过，方可确定。而决不应由少数人决定或有任何强迫包办。

毛泽东对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附：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

西北局并中央：

（一）毛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外热烈拥护。干部中正展开讨论，大大的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改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是有许多问题，应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首先是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的高（内战时），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还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贫雇户数，当然亦有特殊现象）。如再平分，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象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问题为有利。第三，地主、富农（旧）也比新区少的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评的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可能在三种情况下发生错误：（一）把新升富农评成旧富农。（二）把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当真转化，并参加劳动最少在八年以上的，又订成地主、富农，再去斗争。（三）把富裕一点的农民，订成地富。或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动力者，也订成地、富。如果再去斗争已经转化了的地主、富农，对农民的观感，就等于再动已分得土地的贫雇。这在老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慎重处理。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光看表现，不一定合理。第五，在老区发动群运，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老区的群众，就是发动起来后，也不会在运动的形式上有新区那样轰轰烈烈，这是由于老区的许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此，老区的群运，绝不能在

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如崔区有些乡村没有地主，硬去制造）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从几位同志的汇报中，知道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的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如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分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胡采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恐惶。再就是普遍的冷淡中农。斗争地主不让中农参加。即贫农团的组织，亦缩小在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其风气，不是中农被坚决联合，而是到处都给中农以精神上的很大威胁。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因此，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开展，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枣林坪，四乡安沟村，马受材是一个贫农党员。内战时，曾任过区军事部长。在全村贫农中，威信很高，都要选他当贫农团长。派去的工作团同志，只强调初期不能让能说会道的人参加领导。在评成份中，故意评为下中农，连贫农团也不能参加。这是一种代替包办方式。同时，对超越区、乡组织的精神也不懂。所谓超越区、乡组织，只划清好坏干部界线。被群众拥护的好干部好党员，仍应坚决吸收参加工作，否则，就易产生形式主义。又如在贫农团、农会中，要保证选谁负责，也不能用人工保证。主要的，要在本人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条件来保证。实际上就是该人本身，就应具备当选的条件。否则，就是包办代替作风。也就是形式主义。这是运动初期很普遍的现象。

（五）许多地方，发现群众自发运动。实际上，这是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的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大部旧干部和地主、富农领导的），让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故对此种自发运动，应很快参加进去，改造领导，以至完全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而引向正确的发展。如无力顾及就坚决制止。这种制止，十分必要。因是打击不良分子的破坏，而不是给群众泼冷水。这对将来继续发动正确的群众运动，毫无妨碍。

上述意见，请指示。

习　仲　勋

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对地主经营工商业的政策问题给邓子恢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于地主经营之工商业，应持如下观点：

（一）保护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

（二）过去鼓励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是正确的，今后仍应鼓励。

（三）地主、富农工商业一般应予保护，而不应一般没收。只应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但没收者亦不应分散或停闭。

（四）华中一般清算没收地主、富农工商业的政策是错误的。

（五）在保存地主、富农工商业条件下可酌量不分或少分地给他。

毛泽东对李井泉、晋绥分局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方针及步骤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三日报告及以前井泉报告，分局发给各地的几项指示均悉，你们所采取的方针及步骤都是正确的。

〔附〕 李井泉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

一、我回来以后，即在分局开会数日，根据中央的精神，检查了土改中对中农及工商业的左倾问题。已拟出改正脱离中农错误的办法发各地并报中央，不知是否收到。工商业问题，已先告各地检查，并禁止各地土改侵犯工商业，因土改与营业税过重而影响工商业，其补救办法正在拟定。

二、党内亦提出缓和过分紧张空气。已起草关于三查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指示，发给各地，并已报中央。

三、根据绥蒙二分区检查，大约有半数上下地区群众，确已开始发动起来，大部分中农参加土改运动。因此，估计基本上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贫雇农独立脱离中农的偏向也存在，但易补救。而划成份脱离中农，成为最基本问题。在兴县蔡家崖与五寨前所纠正错订成份，已获得农民拥爱，现正推广。工商业，在这两个地区，主要是土改牵连较大。而朔县则更严重，乡村农民数千进城扣押敌伪人员及地主，没收财物，领导上未加控制，异常混乱。现已拟释放不应扣捕之人员，赔偿不应没收与处罚过重之财物。各地营业税过重者，已采取按超征额退还。死人在各地均相同，……，最大部分为恶霸地主。分局规定杀人经县级批准后，一月份末发生多杀。上述情况，估计各地不完全相同。老区错订成份，基本上是退东西问题。新区地主保存较多财物，错订成份被斗争较少。三分区因征营业税影响商业较大，其他则土改影响很大（九、十分区没有征过营业税）。有较强骨干的地方，错误较少，改正较快，否则错误较大。

四、我们现在正告诉各地集中力量分地，并配合改正成份，争取春耕前，把群众已经发

动起来的地方分配完毕。其余半数地区则只能采取调整办法解决，把斗地主放在后面做。对检讨错误，我正在绥蒙与二分区进行改正工作，并派武新宇、龚逢春到其他分区传达，因工作很紧，故未能开较大会传达，准备旧年后再开会总结并讨论生产问题。毛主席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各地已经引起注意，所以各地接受改正意见均较快。其余待回分局后详报。

井　泉

〔附〕　晋绥分局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方针及步骤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

一、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以老区的兴县、保德、静乐、临县较为严重，新区亦有左的偏向，然没有老区严重。主要是由于定成份中单纯追历史和追财富大小所致。老区的某些大川村庄，有与陕甘宁类似情况，中农占绝对多数，地富和贫雇农是少数。根据兴县蔡家崖和胡家沟自然村的材料，地主、富农的土地较中农少，有的新中农占有土地比旧中农还多。工商业政策上的错误，除九、十分区因为没有征收过营业税，偏差不大外，其他则新区、老区一样严重。井泉同志于传达布置工作后，即先往绥蒙和二分区指导纠正左的偏向，昨晚来电话说，他须三日后才能返回。

二、各地左的行动现在基本上已停止了。当去年十二月初，井泉去中央开会，路过碛口，发现土改中侵犯工商业的错误后，分局已电告各地，严令制止。当井泉由中央来电，提出订成份的错误时，分局当将一九三三年文件印发各地，并将中工委的二次指示转发各地，严令各地立即停止在订成份和中农问题上的错误作法。所以，在井泉由中央返回之前，各地左的行动，已基本上停止。这从各地来的报告和新闻稿件中也可以看到。现时，各地新闻来稿锐减，以致目前报纸只能暂出半张。

三、井泉同志回分局后，召集边区一级主要干部和正在参加分局对敌斗争会议的各分区主要干部，开会传达并讨论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大家对中央指示都一致接受，只是在纠正方式和退东西的问题上，曾有不同意见。由于井泉同志的坚持和解释，最后意见趋于一致，通过了有步骤的坚决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会后，分别开小会研究纠正办法，写出关于改订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关于三查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指示，都已先后发各地，并报中央，想已见到。除井泉亲去绥蒙和二分区外，逢春同志去吕梁和九、十分区，新宇同志去二分区，黄照同志去八分区，分别传达中央和分局决定并帮助进行改正错误工作。现时分局正研究富农剥削分量的算法问题、纠正工商业政策错误的具体作法问题以及分配土地中的具体问题。拟由各地参加对敌斗争会议的同志带回，更进一步的具体贯彻执行。

四、现在各地土改工作团的工作，均已转入分配土地。在分配土地中，改订成份，退出错订中农为富农者的东西。刻下，还没有具体材料报来。总之，分局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是

坚决的。但在具体执行上，我们是采取了有步骤的、较缓和的方针。第一步，先纠正显然错了的；下一步，再纠正比较不好区分的；最后，以做到完全彻底纠正为止。经和各地实际工作同志商讨，大家一致认为纠正不能太猛，因恐贫雇农一下不易接受，反予坏分子以打击新生力量之机会。故暂不在报纸上简单号召纠正左的错误，而用各地具体纠正中成功的例子，陆续在报上报导，以推动各地一致执行。以上所采取的步骤和作法，是否妥当，请指示我们。

晋 绥 分 局

毛泽东关于审查新区土改指示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少奇同志：

因粟裕、陈谢两军正在休整开干部会，请你对我一月二十二日给粟裕的指示先加审查提出意见，以便二月十日左右能将此指示发给他们，盼复。

毛　泽　东

附：　毛泽东关于新区土改问题给粟裕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粟裕同志：

一月十七日报告悉，各项布置均妥，该区地方武装必须分散游击，掩护群众斗争，不应过早与过多的集中组织纵队，你的布置极为适当。惟土改工作不能性急，我们去年曾告你们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你们应当灵活执行，你们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三年内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能够全部按土地法分配土地，就是极伟大的成绩。所谓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全部三年内按土地法分配土地，是指中原、华中、华东、邯郸、阜平、晋绥、西北、东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管辖地区，一九四七年所占可耕土地，再加一九四八年胜利战争所占可耕土地，应当争取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的三年内有步骤地不但从土地的数量上，而且从土地的质量上大体上按人口平分完毕。所谓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是说依照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及其后中央及中央工委所发有关土改的指示，有步骤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团结全体农民，达到平分土地之目的，不犯大的左右倾错误，而主要是不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如果犯了大的错误，则三年解决各区土改问题还是不可能的。所谓有步骤地启发群众觉悟，团结全体农民平分土地，是说土改方法应从宣传群众，寻找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不是投机分子），调查研究具体的阶级关系，发动群众分大地主的钱财，斗恶霸，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党的支部，组织民兵游击队，组织区乡政府，然后发展到没收分配土地。在新区没收分配土地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中立富农，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时，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采取不同的待遇。在此阶

段内，以贫农为主体组织农民协会，除地主、富农不许入会外，一切农民包括在内，不另组织贫农团。在国民党统治的农村中，贫农、雇农及其他无地、少地农民约占百分之七十，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约占百分之十。故农会所包括的群众极为广大，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最为积极，自然成为农民协会的主体，中农在初期是徘徊观望的，斗争开展有了胜利希望的时候，中农方愿加入农民协会，故此时期，可以不另组织贫农团。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此时才动，在此阶段内，是否于农协内部组织贫农团，看那时农协的情况决定，如果农协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贫雇农积极分子手中，可以不另组织贫农团，如果农协有地主、富农及其他狗腿混入，并掌握了领导权，则必须另组贫农团，并改造农协的领导机关。在新区（例如鄂、豫、皖三省）土改工作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应当经过这些步骤或阶段，才能启发群众觉悟，斗倒封建阶级，建立稳固根据地。在群众觉悟程度有很大区别的新区与老区，例如陇海以南与陇海以北，土地法的应用必须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老区的经验，正是如此。老区是经过多少年。多少月方才把土地分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经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觉悟，认清敌人，取得胜利，共产党员也是如此，必须在斗争中教育自己，取得经验，才能领导群众得到胜利。为了这个原故，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每个乡村，必须有绝大多数群众，认为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由群众自己批驳了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正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份，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共产党员领导着缺乏精神准备、缺乏团体生活、缺乏斗争艺术的农民群众，向着诡计多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占优势的地主、富农作斗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与农民群众一道，逐步完成精神准备，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党的团体、群众团体、民兵、游击队、区乡政府），逐步学会斗争艺术，才能最后斗倒封建阶级，实现真正的平分土地，否则，必然被地主、富农打败，必然闹出许多危害群众的大乱子，即使平分，也是假平分。这一点不论在老区、在新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如果环境许可，干部又多，又有训练（必须有充分的训练），可以在全区中一切有工作团的县，每县选择一个区，同时进行土改工作，而对其他的区，则是进行准备土改的工作，一县之内，一个区大体上做好了土改，不犯冒险主义，没有乱打、乱杀、乱斗，大体上没有分错阶级、订错成份，全体农民真正自觉的团结起来，得到土改利益，县一级干部及工作团干部，真正学会了土改方法，这个县的土改工作，就会很快的开展，群众运动就会出现真正的高潮，而不是易起易落的形式上的高潮。这里所谓环境许可，是说在新区应当分为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应当由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进行土改的。第二

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向群众做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财物，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的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相机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并须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付办法。在这种地区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进行土改，土改工作还要有所等待。

新区工作中，还有一个地主、富农左翼分子问题，应当好好的解决。历来经验，新区游击战争时期，地主、富农阶级有一部分左翼分子，拥护我党反帝、反蒋、反大地主的政策，愿意参加这一斗争，而在新区群众尚未起来，工农积极分子尚未形成，没有或很少现成的本地干部，我党不得不和这些左翼分子合作，经过这种合作，打败蒋军及大地主阶层，成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及地方军。这些左翼分子，就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党，成为当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骨干之一部分。他们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不是知识分子，有些能在党内教育下改变其地主、富农立场，继续执行党的路线，有些则在群众起来实行土改的时候，发生动摇，有些竟至成为土改的严重障碍，你们到新区，对于这个问题，应取正确态度，首先不怕同他们合作，不怕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但须加重对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到了实行土改时期，则应分别情况处理，有些人继续任用，有些人调职受训或做他事，对于把持权力、压迫人民、障碍土改、无法教育者，则坚决发动群众洗刷他们。此外，为着了解农村情况，为着进行土改，区党委书记以下，政治部主任以下，必须亲自调查几个区、乡的土改工作，否则，就不可能正确的领导土改。

以上望告知豫皖苏区党委及你们政治部各同志，并望将你们的经验报告。

（此件可印成单张发给各级区党委及工作干部）

毛　泽　东

刘少奇关于土地法实施应分三种地区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毛主席：

关于土地法实施，应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问题：

（一）在五台，经过复查，土改彻底地区（约有一千个村），只有一部分下中农稍少一点土地，贫农与富裕中农稍多一点土地，这种地区，完全不用再平分，也不须抽补了，如有个别缺地较多者，只须实行个别调整即可。这种地区应以生产与整党为中心工作，但贫农团已组织，暂时似亦不应取消。在太行，有一千万人口土改彻底地区，又有一千万人口基本彻底但留有尾巴地区，那里是贫农特别干部分得多于中农不少的土地，而地主则只分得少于中农并坏于中农甚多的土地，富农土地亦少于中农。故在这些地区，也不用再平分了。但五台与太行的这种地区，是老区与半老区都有，最大部分还是在半老区。因此，似应规定在半老区中土地已大体平分的地区，亦不应再平分，必须实行个别的或部分的调整。而在土改不彻底的半老区，则完全适用土地法。

（二）老区应该是指日本投降前的对我一面负担地区，因当时两面负担的游击区情形又有不同，而且游击区很大。老区土地问题已经不多，主要的只是土地之若干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则仍保有相当数量或大量地财，故在这里，普遍平分土地，确有不妥。但现在老区平分空气甚高，这一方面使中农有些恐慌，但另一方面又使土地之抽补调整及退出贪污果实等容易进行，故我意在这种地区亦不必宣布（在已复查地区应宣布）取消平分，只说土地早已大体平分，现在只实行部分多少与好坏地之抽补调整。至于在这种地区是否需要组织贫农团问题，则须考虑者，不仅是在实行部分抽补调整土地时需要，主要的还是在整党时需要贫农团。大多数要由贫农团代替支部一时期的作用。但反由现在无地、少地农民组织贫农团，亦不能整党，所以平山贫农团一方面规定过去受过剥削的新中农，即老贫农，也加入贫农团，另一方面，又规定过去地主、富农降为贫农者，称为地降贫或富降贫，不得加入贫农团。故平山贫农团比较纯洁，人数一般占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平分土地与整党两个任务都能担负，特别在团结全体人民建立人民代表大会过程中的作用很大。照平山经验，如没有这样的贫农团，则整党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在乡村中即农会），就要发生困难，抽补土地及其他工作亦将有困难。因我们在乡村中失去党支部这一个倚靠的支柱后，如不找到另一个倚靠的支柱，我们就很难有所作为。但我们如吸收了过去翻身的老贫农即现在的一部分新中农加入贫农团（其中旧干部与群众关系不好者不吸收），又拒绝了地降贫、富降贫（这个名词很好，

有大的政治意义）加入贫农团，则这种贫农团的成立，似亦无害处。问题似在如何能组成平山这种贫农团，地主、富农、流氓、坏干部均用一切方法来渗入与掌握贫农团，这就可能使贫农团亦不可靠，或引起贫农团严格的清洗与关门主义。因此现在好的贫农团，还不是多数。除贫农团外，是否还可用其他方式在这种地区建立我们在乡村中可靠的支柱，目前尚未发现。如党的支部是可靠的，或稍加整顿即可成为可靠的支柱，似可不要贫农团，但党的支部如不可靠又怎样办呢？自然，在人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业已巩固，党支部业已整理好，贫农团无疑是可以取消的。但目前过渡时期怎样办呢？此点，请你考虑。其他意见，均赞成。

刘 少 奇

毛泽东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习仲勋等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

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与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去年九月）时两年内所占地方的半老解放区，与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的新解放区，此三种地区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应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请将你们对此种区别的意见告知。在半老解放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组织贫农团与农会，而以贫农团为领导骨干，农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只占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老解放区，例如，晋绥的九十万人口或四十五万人口的老区，陕甘宁约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老区，土地大体上早已平分了，即是大体上早已实行了土地法，在这里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调剂土地填平补齐。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也照中农占少数、贫农占多数，土地尚未根本解决的半老区一样，组织同样的贫农团与农会，人工地、勉强地叫贫农团在农村中起一样的领导作用，叫贫农积极分子在农会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是否行的通，是否会冒犯脱离中农的危险，如果不是这样其组织形式应当怎样，是否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只在农会之下组织贫农小组，或者仍然组织贫农团（如果不只一个贫农小组的话），但只使这种贫农团起其保护农村中少数贫农的作用，而不使其起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在农会中及乡村政府中，贫农积极分子如果获得中农同意（这是必需的条件），可以当农会会长、村长、政府主席，但不一定要这样做，主要地要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这些工作，而在农会与政府的委员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必须有他们的地位，但占少数，例如三分之一，中农积极分子则应占多数，例如三分之二；而在半老区则反过来，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告知。同时亦请一波告知自己的意见。

附：习仲勋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毛主席：

（一）二月六日指示悉。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我们已深感过去两月来的土改，与组织贫农团农会，不仅收效不大，反而增加麻烦甚多。陕甘宁边区，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的老区，在去年十二月义合会议前，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土地革命区，地主、富农过去漏网的是极少数），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大部或全部中农土地，甚至还要动百分之十贫农（户数）的土地。要分给的是一部分很少或无地的移民，或倒给地主、富农补进不足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我们虽于月前开始转变，但工作还未全部走上轨道。农民虽已开始注意生产，但还不是思想上最后解决问题。其原因，就是有些地区工作团同志，仍坚持组织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事实上，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因为贫农团本身很复杂。有的因为过去分得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不能发展。有的因为偶遭灾祸下降。有的是地富还未转化。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中农欢迎地，贫农不要地。在运动中犯左的地方，甚至贫农也恐慌。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借贷、买卖、租佃、雇佣等关系，都停止了。土地再平分，农民都感到把农村追死啦。真正劳动的贫雇，也抱怨我们给他们造好多困难。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于生产吗，在农村，那倒是中农领导贫农。至于起领导作用吗，那又会变成少数不纯分子把持村、乡政权，因此，我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平补，再不能实行平分。贫农少的地方（在边区，老区，有很多乡村，就很少贫雇），不组织贫农团。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农村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在中农同意下，吸收其当选农会会长，政府村乡长，而主要的吸收中农中公正积极分子做这些工作（因有很多中农，就是以前的贫、雇农）。老区农会及政府委员会中，必须有贫农地位，占其三分之一为适宜。老区的农村支部，经整党后，仍应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否则，将会发生农村工作混乱现象。

（二）边区的老区，地主、富农可一般的不扫地出门（其过去分配彻底者，后由自己真正参加劳动者，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应不因其过去是地主、富农而再动其一部或其大部）。因有这一条，下面同志就可作出许多麻烦。一是乞丐增加。二是实际等于肉体消灭，逼得一些人铤而走险。三、在老区，群众不论贫、雇、中农，普遍要求的是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

风，支部包办，负担不公平，故民主与土改生产结合，此是边区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年来战争频繁，负担奇重，如义合一乡，去年交公粮，将近五百石（比往年多两三倍）。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请中央注意，我拟再作研究后，发一关于农村合理负担指示，改正这一偏向。详情后告。

习 仲 勋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

东北局划分阶级文件中，规定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为：全家主要人员（十八岁至五十岁男子）全部参加主要劳动，或全家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靠自己劳动者，为富农；全家主要人员一部参加主要劳动，全家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靠剥削者，为经营地主。又规定富农、小富农、富裕中农界限为：全家剥削收入等于雇用半个劳动（能耕种二垧地）到一个劳动（特殊情形下一个半劳动）者，为小富农；剥削更大者为富农；剥削更小者为富裕中农。在这两个规定下，据东北局一月二十七日报告，北满地主、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五。因此发生打击面过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东北经营地主与富农虽较其他地方多，但上述这两个规定都须重行考虑，并根据一九三三年规定原则与东北特殊情况，提议作如下修改，请研究答复：

（一）在全家是一个经济单位，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条件下，在其占有土地等项生产资料超过普通中农水平，其剥削收入超过其总收入四分之一以上的条件下，凡普通家庭（二十口以下）有一个人参加主要劳动，每年满四个月者，即为富农，不满四个月者，即为经营地主。凡大家庭（二十口以上）主要人员四分之一以上参加主要劳动每年满四个月者，即为富农，不满主要人员四分之一者，即为经营地主。例如某家主要人员四十口，有十人参加主要劳动者即为富农，不满十人者即为经营地主。

（二）如全家不是一个经济单位，则应以各人独立的生活方法分别订各人的成份，例如做教员的即认为自由职业者。如全家以工商业为主要收入，则应认为工商业者或工商业者兼地主。如占有土地等项生产资料不超过普通中农水平，则不认为地主或富农。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四分之一者，则认为富裕中农或普通中农。

（三）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计算方法请你们实地研究并告我们，农民一般是可以估计的），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例如二十口之家，全家劳动，只雇一两个长工，大概即只算中农。人口特别多的家庭这样要占些便宜，但亦无大害，还可用税收和其他方法去调剂。东北将地主、富农及其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分别对待是正确的，富农一般应只分其多余之土地、财产，至东北现称的小富农则似应根据占有条件与剥削条件改列富裕中农。

（四）照以上标准则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减少，究竟减少多少，则望研究电告，并望将

东北各地城乡人口比率亦电告。

（五）东北大家庭多，此事对发展生产的利弊各如何，亦请研究电告。小家庭对各人生产积极性虽可提高，但许多地方农民因逃避负担，把家庭愈分愈细，减少可公用的财富，增加可节省的开支，使许多富农、中农迅速降为贫农，对生产发生不利影响，故望注意。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纠正土地改革打击面过大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

（一）刘少奇同志二月七日报告转给你们。

（二）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究竟应当缩小到何种程度及采取何种步骤解决此项问题，使土改走入正轨，既不对土改高潮泼冷水，又不使运动跑出正当的范围，请你们拟具办法电告。

〔附〕刘少奇关于东北土地改革中打击面太宽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中央：

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有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即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剥削部分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者划为中农，除平分土地外，这种中农的财产不动，对这以上的中、小富农在征收其牲畜、农具、房屋时，给一部分代价（价款由地主封建财产中支出，或由政府发一次公债），其粮食及其他财产不动。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考虑后告知东北局。

刘少奇

〔附〕 东北局关于缩小打击面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中央，工委，并告各省委：

中央发来少奇二月七日的报告、中央二月九日的指示均收到，完全同意。

（一）我们也正在采取注意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的内部。对中农与富农的区别界限，以剥削分量百分之二十五为界限，在特殊情形下，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亦应划为中农。对佃农，计算其剥削与被剥削部分相抵，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者，不得划为佃富农，应划为中农。根据此标准划错成份者，一律加以改正，并在分配财物时，予以适当补偿。查化形，只能查"八一五"开始土地改革以后，不能追到"八一五"以前。对一般佃富农，即剥削与被剥削相抵后，其剥削分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者，只平分牲口，其他财产不动。

佃富农，分出牲口，分进土地，也不至吃亏。佃富农占富农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解决这一办法即为缩小打击面。对地主与富农，要有区别，即对地主要留生活出路。对富农，应执行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关于征收多余部分的决定。对大、中地主，应与小地主要有区别，对小地主，要打击轻。对恶霸富农，应与对一般富农要有区别，对一般富农要打击轻，对小富农则更应从宽。

（二）东北，尤其是北满，地主、富农合共占户口百分之十五、十六，人口百分之二十三、二十五。上次给中央及工委关于打击面和农村人口比例，大体上是比较确实的。因为那种估计，是根据前年清算、分地、煮夹生饭的材料。在那时，划阶级还比较松。从反面材料对比可说明，即是农村雇农占户口百分之五十，占人口百分之四十五，如果没有占这样大户口及人口的地主富农，那末，这样大数量的雇农就无法存在，就无法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估计采取新的办法，可以把人口缩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户口缩到十四以下。缩小打击面办法，一个是把错划的改正；一个是分化打击面内部。对地主与富农，对大的与小的，对恶霸与非恶霸，加以区别。坚决执行采取这些办法，可以达到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内部。另一个办法，是准备征调一批富农的青壮年去前方担任民工及运输队的工作。因为这两年来，参军及参战都是雇贫农，大批雇贫农参军，在北满普遍已达人口百分之三，有的地区已达百分之四或五。前年六月以后至十二月底前后，共补充主力十三万。去年三下江南后，又补充三万。去年夏季攻势后，补充五万。去年冬季，补充五万。后又成立了四十几个团，十万。今年又将成立四十二个团估计四十五万人上前线，这也相对的增加了农村地主、富农的人口比例。

（三）关于打击面的解释，一般所说打击面，是指在土地改革中，多少都拿出一点东西或挨打都包括在打击面内。这里面有几种：一种是地主，只有出无进；一种是恶霸富农、大富农，也只有出无进；另一种是佃富农，有出有进，牲口分出，土地分进；另一种是小富农，虽有出，但并未打击过重。在斗争中，群众对小地主及一般富农的斗争分寸上，都是与大、中地主及恶霸富农有区别的。但虽然有各种不同情况，我们必须用全力解决，以各种方法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

东北局

刘少奇关于成立乡一级组织问题给薄一波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

二月五日报告补充指示，由毛主席答复，划分阶级，中央即将有新文件发表，可作根据，一九三三年文件，只能作参考。又你处有无乡一级组织，如无，应为人民团结及领导的方便，立即成立乡的组织。否则一区领导五、六十个村，决不能把工作做好。划乡时，如不涉及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财产问题，人民即完全赞成，毫无困难，如涉及此问题，即争论不清，故以不涉及此问题，土地、财产仍依群众意见以村为单位分配为好。又在乡成立后，乡应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只在必要与可能时才开全乡人民大会，村则只成立人民大会，而不要人民代表大会。并须使村的组织，大大简化起来，以乡为基层组织重点，各种问题的决定权都归乡，使必要的村干部（村干部可一律称为乡干部）只成为执行乡决定和指示的人员。如此，似更能使我们掌握对乡村的领导。

毛泽东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

（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附〕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毛主席：

二月三日、二月六日指示悉。

第一，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须：

（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

（二）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南进后，由于对此认识不够，对此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立根据地，五个月的成绩甚微，确犯有急性病毛病。在一月二十二日答复六问题的报告中，对富农、中农问题只具初步感觉，最近又了解下述材料，可参考。

（甲）我六纵十六旅在英山北部，一面剿匪，一面土改，成绩颇好，他们的方法是：树立贫雇骨干，组织贫农团，将所有地主的财产及富农多余的土地、财物全部交给贫雇农（下中农也得到一部分）每人分得五斗到三石粮食，半匹到两匹布和其他衣物。贫雇积极性大大提高，仅一个半月内即完成了百万人分田，以老部队两个连为骨干，扩大了两百多地方武装，自己打土匪，在横直百里地区土匪不敢深入活动。苏北经验与经扶相同，只要满足贫雇

要求，树立贫雇骨干，则群众可迅速进入与蒋匪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根据地的雏形能较快地建立起来，中农也在贫雇优势下要求加入农会（还没有组织农会）。但此种作法，必然对小地主、富农打得很厉害（我还怀疑打了一些富裕中农，但无具体材料）。反之，在许多同等条件的地区，多不这样做，作风很坏，干部私吞果实，不满足贫雇要求，工作毫无基础，情况一严重，全部垮台，遭受损失。

（乙）凡敌情严重及蒋匪、地主武装活动厉害的地区，采取现在作法，成绩均小，或稍有成绩，很快又被摧残。

（丙）有些地区中农由中立到反感，其原因有多种：

A，部队粮食，中农负担过重，特别是人烟稀少的山地；

B、乱杀人吓跑（如岳西）；

C，敌军、地富力量大，土匪威胁；

D，我团结中农政策不明确，引起怀疑；

E，打乱平分土地，侵犯到富裕中农，个别地区甚至主张平分粮食，急须纠正（此种现象最为危险，正注意纠正）。

（丁）在组织形式方面，我们开始组织农会，很快即被中农、流氓、狗腿所掌握，进行假斗争，与地主勾结，斗争无法前进，后计划专门组织贫农团，即改变，但中农不满。

（戊）立煌、经扶近两个月已逃亡县、区游击队和民兵约三百人，多半系坏人掌握，有基本群众在敌人威胁下缴枪投敌者，凡在条件未成熟时，不宜过早组织民兵，县、区游击队亦应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县干部应由部队调换干部去，否则非常危险，现在照此实行。

第二，根据大别山情况，具体的意见是：在新区，除了分为两个阶段外，还应分为两种区域，即可以巩固的区域和游击区域。六日所示两个阶段的策略，在大别山完全适用，只是在完全可以巩固的区域，时间及过程应该缩短，在这种区域，基本上仍可采用经扶、英山的经验，但应修正几点：

（一）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

（二）现在的贫农团已保证了贫农的农村中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在尚无工作的此类地区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的领导。

（三）暂时不斗富农底财。

（四）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

第三，工商业政策，乃应再次明白规定，苏维埃前期所规定的城市政策及具体办法，即保留地主的工商部分，地主住家又开商店者不没收，布告贴在店门等，在今天完全适用。如大别山到处有锅厂，现已全部停业，影响生产甚巨，现应采取争取业主（即地主）复业，否则暂由政府代管交给工人合股经营的办法。

第四，部队在尚属新区的供给，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兵团在贫困山地，尤其困难。现蒋管区民生凋蔽，我军新到一地，又无经常收入，打土豪、向大商人等筹款亦难解决大兵团供给，用粮食换油、盐、柴、菜的办法，既浪费混乱，同时也不能持久。请考虑，是否可以印一种带军用流通券性质的票子，随军发行。

小　　平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甲）地富五年、三年改变成份是一种经常性的规定，无须设定起点止点，何时满了五年、三年，何时即可改变成份。（乙）同意你们对党员出身的意见，但对有些地富出身党员已自愿脱离剥削关系，而其家中土地已交出听农民分配者，你们如何处理？而新富农党员如本人即是剥削者，又不脱离家庭经济生活，是否适当，尚待考虑。

（二）同意把战士作为主要劳动。任何军、干、烈属及任何群众如确因缺乏劳动力被迫雇人而生活并不富裕（占有土地财产并不多）者，均不应算入剥削阶级。

（三）剩余价值必须扣饭钱，精确的计算还应扣生产资料的消耗。雇工所做零活凡不生产价值（不生产副产物）者，均可不算，亦不便算，且可与雇主家庭中妇女为雇工做饭等劳动互相抵消。自有两个劳动又雇两个长工的农户，只要对长工没有过分剥削，一般本未必是富农，加上自营副业劳动收入增大，更难成为富农，这种劳动收入大的人增加了乃是社会的好现象，硬订成富农只有使人不敢营副业和雇工，这才于社会不利。在群众不了解时应耐心说服。

〔附〕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划分阶级和对地主、富农成份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中央，工委：

关于划阶级问题，有下列问题存在：

（一）关于地主转入劳动五年和富农转为贫、中农三年，即应改变成份问题，群众是拥护的。群众说，不这样办，会“打击劳动”。但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甲）从何时算起。有人主张以五四指示为标准。有人主张以土地法大纲公布时为标准。我们决定，一律从现在起，往前推算。（乙）党员计算政治成份问题。现在乡村支部，混入大批老地主、富农分子，有些是抗战期间破产下降的，但因他们的破产是由于我们削弱封建的政策，具体的是减租减息和统累税实行的结果，因此，他们对革命并无好感。入党动机大多数是想借党的力量

来保势保财。群众说他们“人穷心不穷”，“不跟穷人一条心”。所以，我们决定，把村级地主、富农党员一律停止党籍。我们意见，在土地改革中，对于这些党员的社会成份计算，仍按一般规定，但在党内计算其成份时，下降者，仍按其抗战初期的成份计算；上升者，依现在经济情况计算。这对于克服乡村不纯，有好处（村级新富农党员，仍不停止党籍）。

（二）军属、干属、烈属之劳动人员计算成份问题。有些干部和战士，如果他在家参加劳动时，其家庭成份，即可改变。但因本人参军，参加工作，家中缺乏劳动力，家庭即须雇人，因而仍为地主、富农。军属为此很不平。我们决定原则如下：（甲）一切战士及战士出身之干部在评定其家庭成份时，其本人应算主要劳动。（乙）此外，一切战士与干部，以本人在家时是否参加主要劳动为标准计算（边区地主、富农，有广大的一部分是军、干、烈属）。

（三）关于富农剥削，须满百分之二十五的计算问题。各地同志意见，关于剩余价值额之计算，只从雇工所生产的价值中，扣除工资，不扣饭钱。雇工所做零活，亦不算剥削。否则，自有两个以上劳动，又雇有两个长工之农户，若再加副业收入（副业收入，有的很大），则剥削收入，仍不满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均不够富农条件，在群众中难以通过。同时，此种计算法，似亦无大坏处。

（四）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即复，以便执行。

晋察冀中央局

毛泽东转发李雪峰关于新区斗争策略及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此件发给各地参考。李雪峰同志是中原局的副书记。

〔附〕 李雪峰关于新区斗争策略及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

毛主席：

新区斗争策略及组织形式问题谨呈初步意见。

（一）国民党强化基层组织保长，武装三青团与特务，为有形组织形式。其谍报队长，即是县乡保长，经过多次训练，甲长多由富农、中农及流氓分子担任，保长则为大恶霸地主直接掌握。县区党政军离城不离境，其策略似是依靠地主，联合富农，争取并利用中农及流氓分子，镇压、分化、控制贫苦农民。现大地主、大恶霸大部逃出，但特务四外巡逻，结合中等地主及富农组织秘密武装，维护其保甲统治，并利用我们搜剿匪威胁农民，反对土改。广大贫农及中农，均对保甲仇恨，把清算保甲恶霸的口号，结合分粮废债，接着发动诉苦复仇，可以成为广大农民统一战线的主张。各地分浮财，实际包含有类似的内容，但多从分财一点出发，政治口号不明确，缺乏将政治、经济及收缴地主武装的斗争，明确结合统一。中农有一部分与地主、富农有关，儿子上中学的不少，他们是观望态度。劳动富农不问政事的，在群众中有较好影响，分他们的浮财，农民在开始时是不同意的。

（二）第一阶段的策略：中立富农，专对地主，其中又先打击大地主，后斗争中、小地主，是必要的。在实际斗争，例如清算保甲的具体对象中，即难免有的小地主、富农甚至中农分子，他们为广大群众所痛恨，应当允许群众复仇，这样就可打垮地主统治机构及国民党的农村统治基础，对我建立民主政府或农会政权及进行土改是很必要的。但策略上，应使农民懂得集中将目标对准大地主及其走狗，从清算中分化地主集团，而又便于组成农民统一战线，当着进行打中、小地主时，则连带打倒部分封建富农，而且这一步发展可能很快，中立富农，在此时可能起若干变化，但仍可中立一部分，对于联合中农有好处。在此阶段内，即应将地主土地加以清算没收（清算对教育农民，使农民感觉有理及利用矛盾上均属于必要方

式），按平分（填平）原则，分配给贫农。到第二阶段，提出彻底平分，才全部动富农，并进行查地主、查阶级、挖地财、斗隐蔽，彻底解决地主财产及其统治，而后分给他同样一份。这样作的好处，是在第二阶段中不至树敌太多，尤其可免影响中农动摇，致为地主、国特所乘，而且在一致对付地主的斗争中，不仅大大发挥贫农积极性，且可广泛发动中农，建立贫农、中农联盟，以为进一步彻底平分之准备。

（三）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方针，应贯彻土改全过程。在第一阶段，集中打击大地主，摧毁保甲，就可能也必须发动中农，结成贫、中联合阵线，尤其必须着重发动贫农，组织农民的核心力量，否则，运动便软弱无力，贯彻不下去，始终走上弯路。因此，第一种组织形式农民协会，把群众组织与政权组织结合为一的组织，简便而集中。到第二阶段，组织贫农团，克服中农的软弱与动摇，使运动深入贯彻到底。在第一阶段，如何深入贫雇工作，使其取得领导，形成独立力量，是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太行过去作法，采取积极分子会议及贫农会议形式；或者进而组织小组，以为下步成立贫农团之准备；或者在农协开始组织时，严格一些，只吸收贫雇农，到运动发展，贫农有了基础，再扩大范围，吸收中农，成为名实相符的农协。但此种方式，也势必另采取临时的农民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我们亦曾经考虑到第二种组织形式，即在第一阶段使用贫农团，在酝酿时候采取贫农小组形式，而后将许多小组结合成为贫农团，贫农团开始也严格一些，吸收正派贫农，扎好根子，而后发展为贫农的阶级组织。这样产生的好处是：组织形式与我们着重发动与组织贫农的方向相配合，观点明确，便于贫农自己了解，掌握全部组织，便于有组织的去推动贫农自发的运动（这种自发运动是非常必须的），便于贫农取得领导权，便于贫农掌握武装。另方面，则不怕扩大农民对外战线，从行动中团结中农，采取大会、积极分子会、农民代表会、翻身代表会，这类带会议性的组织形式，把群众的与政权的组织统一起来，更广泛一些。到第二阶段（或一阶段后期）清算富农及一切封建分子，彻底平分土地时，中农的一部分将会动摇，这就一方面增加了贫、中农内部适应的斗争的必要性，另方面，团结广大中农更为重要，此时除加强贫农团领导外，应组织农民协会，作为进一步的农民统一组织，巩固贫农中农联盟，将贫中农间的纠纷和斗争拿到农协内部来处理，以便团结一致，打击富农，清算一切封建残余，转入民主运动、生产运动和进行建党工作。我们也考虑到第三种组织形式一开始即将农协与贫农团并举，将领导骨干的组织与农民统战组织分立又结合。缺点是贫农更不易理解掌握运动，领导上也难于掌握重点，分配引起混乱。总之，适应两个策略阶段的斗争要求，如何更好团结中农，而又能培养贫雇骨干，确保贫农领导，使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的方针，能在组织上加以解决。（毛按：先组织贫农团，树立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较为妥当。农民协会的委员会，同时就是政府，在土改问题彻底解决以前的一个长时间内，乡村不必在农协以外再成立政府，以免重复。）

（四）时间问题：我们估计平分政策较"五四"政策简易合理，如农运能跟上军事展开，而又策略正确，可能发展很快，因保甲统治动摇，地主破产，农民迫切要求翻身，各地分浮财及开始分地中，已可看到此种现象。但由于地主武装统治及国特控制较顽军为甚，加以战争反复，农民顾虑也不少，同时看见党内不纯，作风不好，策略思想模糊，而又难于找到时间好好整顿，地方干部跟不上，农民常在分浮财之后，即一下消沉，或快一点之后，即又慢一阵，往返起伏，在所难免，至快也要一年两年。

李 雪 峰

毛泽东致刘少奇的信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①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唯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份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二）划分阶级草案②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③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④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⑤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

（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 泽 东

三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① 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能迅速得到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在电报中，他还对老区土地改革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② 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草案。这个草案曾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

③ 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原则通过的《中央一月决定》草案。这个草案的主要内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

④ 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就新区土改问题准备发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⑤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

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关于计算剥削年限与剥削分量问题给冀中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冀中新华分社八月五日及十四日致电总社，询问剥削年限与剥削分量两个问题，已由总社转我们，兹答复如下：

一、根据你们来电，你们似未注意今年中央重新公布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时，并发表了《关于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的决定》，印在两个文件前面，其中即曾明白指出："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的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加上这样补充以后的三三年文件，就是划分阶级的正确标准。

二、来电第一条所问的关于剥削年限的问题。三三年决定规定以革命政权成立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三年，做为划分阶级的时间标准。这是划定某人在革命政权成立时，是否地主或富农成份的时间标准。弼时同志报告中说：在民主政权下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取消剥削三年者改变其成份，这是指根据三三年决定，当革命政权建立时，原是地主、富农，但在民主政权下，由于我党政策之执行或其他原因而下降为农民，地主满五年，富农满三年者，即应改变其成份。这两个规定并无矛盾。弼时同志报告中的规定，正是三三年决定的补充。譬如革命政权成立于三八年初，某人在三五、三六、三七三年中，连续过地主生活或年年的剥削收入均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三三年规定的百分之十五，照弼时同志报告改为二十五），则此人已构成地主或富农成份。但如此人自三八年以后的无论何年起即自己从事劳动，不再剥削别人已满五年者，即应由地主改为农民；或此人原为旧式富农，如取消其剥削已满三年者，即应由富农改为农民。

三、来电第二条所问的剥削分量问题，首先肯定照弼时同志的报告，以百分之二十五为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如你处已按百分之二十五为富农、中农分界的标准划定成份者，再不要按百分之十五去改变。至于对雇用雇农的农民之剥削分量的计算方法，则是从雇农的生产物中，扣除工资和食粮（其余不扣），看其盈余是否超过此雇主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如超过则为富农，不超过则为富裕中农。这是大体正确而简便易行的计算剥削分量的方法。八月十四日所询"剥削他人部分"在此是指雇工的全部生产物。譬如某农民自己劳动，也雇人劳动，全年总收入是一百石，如果雇农生产物是六十石，又如某雇农的工资伙食是三十石，六十石减三十石尚余三十石，超过其总收入一百石的百分之二十五，此农民应订为富农。八月五日所提扣除五项农本按百分之十五计算的方法，实际与只扣工资、伙食两项按百

分之二十五的计算方法相差无几。

四、上面所说的正确标准与计算方法与中央未公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决定》草案中所规定者是一致的，今后应即根据上述标准和计算方法来划分阶级，凡是过去划订的阶级成份与此不合者，无论是单纯根据三三年两个文件所划分者，或者是根据中工委去年十二月指示所划分者，均应与颁发土地证时，或今年冬季重新改订过来。

五、但过去订为地主或富农，照上述规定应改订为农民者，除完全弄错者，必须坚决补偿外，如果是根据中工委十二月指示或单纯根据三三年两个文件（未加弼时同志报告的补充规定）而订为地主、富农者，则其土地、浮财之处理，应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已分配给农民者一律不退（如被扫地出门，无法生活者，则应设法安置）。

（二）已被没收或征收，但尚未分配给农民者，可由农民与之协商解决，应说服农民退还，至少应退还其一部。

（三）至于在民主政权下，由地主或富农下降之农民，其已被没收或征收而尚未分配之土地、浮财，应依照前晋察冀中央局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决定的处理办法第二项处理。

对这种人的土地、浮财之如上处理办法与按照三三年两个文件和弼时同志报告改订其成份，两者并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处理，才能达到少变化，安定生产之目的，否则，按改变后之成份一律退还土地、浮财，又将引起农村大的动荡，反而使农民不能安定生产，然而这只是对已分配或已没收或征收的土地、财产而言，绝不能因而借口待遇一致，把过去未动者也按百分之十五的界限或十二月指示再去没收或征收其土地、财产。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同意华北局八月十七日给冯文彬同志并报中央关于处理浮财及改订成份的意见，不另复。）

〔附〕 冀中新华分社关于计算剥削年限与剥削分量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

总社：

目前我区在改正错定成份中，有两个问题急待解决，一个是地主、富农的剥削年限问题；一个是富农的剥削分量问题，请予解答。

（一）关于地主、富农的剥削年限问题，一九三三年文件规定："构成地主成份的时间标准，以革命政权建立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份。""从新政权建立时间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任弼时同志报告中说："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民主政权下，因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清算斗争，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己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连续有五年者，应改变其成份，评定为农民。富农已连续三年取消其剥削者，亦应改变为农民成份。"

（二）关于富农的剥削分量问题，三三年文件规定："其剥削分量超过全家一年其总收

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任弼时同志报告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最近决定采取比一九三三年更宽大些的政策，即有轻微剥削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仍算为中农，这比一九三三年规定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是更宽一些了。剥削部分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者，且连续三年者，则算富农。”以上两个问题，在老区究应依那个文件？怎样具体执行？富农的剥削分量怎样具体计算？过去我区评定成份的标准前后很不一致，已变动过几次，如现在依照三三年文件改正错定者，从前依照任弼时同志报告定对者是否还统一改正？特别是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比三三年文件正式发表早两三个月，其中已订为中农或富裕中农者，按三三年文件执行，有的就要订为地主或富农。这样如不统一改正，则在同一村庄定成份的标准前后就不一致，这对党的一个政策的统一贯彻是有影响的。目前我区改定成份中，各分区、县的办法仍很不一致。关于地主、富农的剥削年限问题，有的按三三年文件定成份，处理其土地、浮财，处理以后再按任弼时同志报告给其改变成份；有的是按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订的成份，后又按三三年文件改过的；有的是按那个文件订对了的，以后虽有三三年规定，也就不再改变。关于计算富农的剥削分量问题，执行中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定为富农，但要从其总收入中除去牲畜饲料、工具修理、肥料、种籽、工资、饭钱等五项来计算剥削量；另一种办法是按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评定为富农，但要从其总收入中除去工资，饭钱两项来计算剥削量。以上两个问题各地不断询问，怎样解决和解释，请速详示。

冀中新华分社

〔附〕　冀中新华分社关于剥削分量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

总社：

有关政策询问一则，请速予解释答复：一九三三年《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第四节“所谓全家一年总收入是指自己生产部分与剥削他人部分的合计”，这里“剥削他人部分”一语如何解释？是否系指“剥削他人生产部分的总收入”？还是仅指“剥削收入”（剩余价值或盈余）？请电复。

冀中新华分社

中共中央关于由新华社答复划阶级成份中诸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所询关于划阶级中的诸问题，除剥削分量、剥削时间、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等，已详新华社八月三十一日广播外，其余问题亦将于最近期间由新华社广播答复。

〔附〕新华社信箱：确定地主、富农成份时计算剥削年限与剥削分量的标准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问：我们在审订成份中，遇到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一个是地主、富农的剥削年限问题，一个是富农的剥削分量问题。关于前一问题，一九三三年文件中规定以革命政权建立时为起点，向上推算，凡连续过地主、富农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富农成份，而任弼时同志报告中则规定在老解放区内，民主政权建立后，地主劳动连续满五年、富农不剥削连续满三年者即可改变成份。关于后一问题，一九三三年文件中规定“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而任弼时同志报告中，则规定其剥削收入要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才算富农。以上两个问题，在老解放区究应依从那个文件？又富农的剥削分量，怎样具体计算？是否应从其总收入中扣除雇工的伙食、工资？

答：关于“究应依从那个文件”的问题，今年中央重新公布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时，并发表了《关于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的决定》，印在两个文件前面，其中即曾明白指出：“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它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加上这样补充以后的一九三三年文件，就是划分阶级的正确标准。

关于剥削年限问题。一九三三年的决定，规定以革命政权成立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三年做为划分阶级的时间标准，这是确定某人在革命政权成立时是否地主或富农成份的时间标准；弼时同志报告中说，在民主政权下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取消剥削三年者改变其成份，这是根据三三年决定，当革命政权建立时，原是地主、富农，但在民主政权下，由于我

党历年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之执行或其他原因而下降为农民，地主满五年，富农满三年者，即应改变其成份。这两个规定并无矛盾，三三年决定规定的为构成成份的年限，弼时同志报告中规定的是改变成份的年限，后者正是前者的补充。假定革命政权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初，某人在一九三五、三六、三七三年，连续过地主生活或每年的剥削收入均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三三年规定的百分之十五，照弼时同志报告改为二十五），则此人已构成地主或富农成份；但如此人自一九三八年以后，无论从何年起自己从事劳动，不再剥削别人已满五年者，即应由地主改为农民；或此人原为旧式富农，如取消其剥削已满三年者，即应由富农改为农民。

关于剥削分量问题。应一律依照弼时同志的报告，以百分之二十五为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至于对雇用雇农的农民之剥削分量的计算方法，则是从雇农的生产物中扣除工资和食粮（其余不扣）看其盈余是否超过此雇主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如超过则为富农，不超过或刚好等于则为富裕中农。假定某农民自己劳动，也雇人劳动，全年总收入是一百石，假定雇农的生产物是六十石，雇农的工资、伙食合三十石，从六十石中减少三十石，尚余三十石，超过其总收入一百石的百分之二十五，此农民应定为富农。如上例，总收入为一百石，若雇农生产物为五十石，雇农的工资、伙食合二十五石或比二十五石还多，从五十石中减去二十五石或二十五石多，尚余二十五石或不到二十五石，仅占其总收入一百石的百分之二十五或不足二十五，此农民应定为富裕中农。

〔附〕 新华社信箱：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出租土地？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问：土地法大纲第十一条允许分得土地的人“在特定条件下出租”。这里所说的“特定条件”是指什么条件？

答：这里所说的特定条件是指出租者和租额两方面的条件。第一，对于一般分得土地的人应当不允许其出租，但是例如分得土地的人是孤寡废疾，或者是革命军人、革命职员的缺乏劳动力的家属等，那么就应当允许其出租。第二，对于这种出租者的土地应当由当地政府规定适当的租额，使出租者或承租者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刘少奇关于土改整党问题给薄一波等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你们干部下到乡村后，发动群众的情形怎样？望告。此间发动后，表现左倾现象不少，虽已没有乱打大杀现象，但大批逮捕地主、富农及干部和封门现象，仍普遍发生。但在发生后，立即纠正，为害尚不大，又在订成份时，因无一定标准，侵犯中农利益亦不少，望注意。你处如有上述现象发生，望立即纠正，不要让其发展，造成难于纠正的错误。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这种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以便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又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地主、富农的财产及贫雇农都不多），故仅在土地问题上常不能组织广大群众队伍及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在平山因吸收两倍、三倍、四倍的非党贫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党的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及整党查阶级查思想作风与行为，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获得极好结果。望你们亦试行这个办法立即公开支部与整顿干部，并使这种工作与平分土地密切结合起来。因为在老区整干部的民主运动与肃清封建残余是不能分离的一件事，而民主运动则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或机械规定先反地主后整干部，先进行土改，后进行民主运动，都不能有广泛的群众运动。又华北有许多地方无乡一级组织，因此一个区领导四、五十个或六、七十个村，小区亦领导二、三十个村，如此断然无法领导。故必须建立乡一级组织，一区成立七、八个或上十个乡，一乡管理五、六个或七、八个村，成立乡代表大会及乡农会与乡政府和支部等，以乡为基层组织，工作重点放在乡，如此即可大大免去村中复杂的组织形式，减少村干部、村财政，而工作效能会加强。在山地即以现在的行政村为乡。这个办法，在平山试行，毫无困难，益处甚多，望酌量采用。

关于整党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

邓 小 平

（一）

毛主席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如果不加整顿，就要使党丧失战斗力，至少也要削弱战斗力，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坏的作风，在许多环节使革命受到损害，如在土地改革中贪污群众斗争果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坏作风，结果群众就必然发动不起来。作风好的，工作自然就会好，如最近我们到处把地扫干净了，不乱屙屎了，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也就密切起来，士气也高了，这就说明，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革命的成效，尤其是在这中国革命接近胜利的关头，每一个关节都不能松懈，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明确的认识自己的政治责任。认识每一个环节都有严重的政治任务。有的干部把自己的任务看做单纯的技术工作。这是错误的。"我"字必须清算，把"我"放到天上，把革命工作看作第二，到了"我"和革命、和党和工作发生矛盾的时候，就暴露了原形。我们天天看到不仅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损害党的利益，损害党的声誉的事，如打仗怕死，生活腐化，纪律不好，官僚主义，只发号施令，不自己动手等等。这些党内存在着的邪气，使毛主席的方针不易贯彻，我们整党的目的，就是在于扫除这股邪气，把正气发扬起来，把我们党的队伍坚强起来，使党能以贯彻毛主席的方针，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不仅对党的整编不应有所怀疑，更应当积极拥护，把眼睛放亮些，耳朵放锐敏些。同时必须认识战士是好的，就是是干部问题，干部越大越需要整。党整好了，队伍强大了，和群众联系好了，党的领导强大了，革命就可以少受到挫折。有的人一听到整党就心跳，那一定是自己毛病很多。

整党的目标明显，我们一定要站起来拥护！

（二）

那末，我们整党是怎样整法？这次整党要去掉"我"字，把"我"放在一边，用另外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来批判我。不要看到我还有点缺点就逃避了。我们的目的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只有对那些不能挽救的人，才清除出党，对那些诚心诚意想改造自己的人，都采取教育方针，在党内，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带进党里的毛病较多，应该下苦工夫改造自己，

但也不是唯成分论，整党不是依靠成分，而是要看其具体表现的。工农出身的人并不都是好的，工农干部也有蜕化分子，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毛病带到党内是危害党的，而工农出身的蜕化分子，投降地主资产阶级，也要一样加以清算，入党是承认你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就是要看你是不是合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资格。

这次整党，查四种东西，就是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查工作。你过去站在什么立场？合不合毛主席思想？有没有蜕化思想？作风是民主的呢？还是官僚主义的呢？工作是不是负责？对工作岗位采取什么态度？

整党当中，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既往不究，今后严格”，只要你好好反省出来，既往不究，但今后再犯，一定要受党的纪律制裁，如果你贪污了，转变的起点是必须把果实退还群众，否则按党章办事，这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论是工农或知识分子出身，待遇是一样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必须痛切反省自己，割掉自己的尾巴，蜕化的老干部，更要痛切反省，不能闹山头，不能钻空子，那只能表现自己不好而已，中国只有两个山头，一个是毛泽东山头，一个是蒋介石山头，七大以后，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统一的党，不能有任何山头存在。任何金字招牌都不行，老资格是摆不得的。

（三）

我们整党工作，要抓住每个空隙来进行，并且把他和建设三大民主结合起来。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这是根据目前情况需要的，如果有的干部认为这就吃不开了，那一定是自己有毛病。如果干部为战士做好事，就一定受战士拥护，就一定吃得开。领导贪污、作风不好，指挥不好，战士应该反对，难道这些吃得开，是光荣的吗？只要部队有了民主，力量就会大起来，陕甘宁部队最少，但是力量很大，就是实行了三大民主的结果。三大民主一定要做，只要自己真正走群众路线，战士和干部一定会更亲密，领导顺利，如果战士人人都是自觉的，就会感到队伍就是自己的。政治民主就是战士的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发表意见，对战略战术对政治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有选举权，任何人不得干涉，不得压制，不得脸红，一定要虚心接受，即使不对的，也应很好进行解释，不能给战士泼冷水来个下马威。经济民主就是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连队伙食。十天公布一次帐目，伙食尾子可以买黄烟，解决个别的困难，或大家分。军事民主则不是那末广泛，绝对服从指挥这一条是一定要的，对于作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战后可以提出批评，就是对刘邓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转给我们，大家想办法的群众运动，我们试验成功了，蟠龙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蟠龙战斗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几十个战士坚持得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比战士聪明。如果那一个干部不好，士兵委员会有权弹劾，要求上面调动。撤职后，士兵委员会可以推选干部，再由上级承认批准。战士提的往往是正确的，再加上级批准就更稳当，这是对干部的教育。

现在全军一律推行建设三大民主，我们整党要和三大民主相结合，整党整军是中央做了决定的，非做不可，共产党员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拥护和执行这个党中央的决定，思想还没有弄通的同志也要赶快把它弄通。

中共中央对晋绥整党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

晋察冀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对极少数成份太坏、作风太坏的支部外，工作团采取完全抛开党的支部去进行土地改革的办法是很不好的，应当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容易产生好坏不分，错误大小不分，否定一切的偏向，以致分散和减弱土地改革的领导力量，而且要伤害广大党员的情感，便于坏党员去蒙蔽好党员，增加土地改革工作和其他当前工作的许多误会。区、县级干部全部调离本区、本县的办法也不妥当，必须将一切好的或较好的干部留在本区、本县工作，因为区、县干部全部调离本地，新去的工作团完全不了解本区、本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容易发生割断历史的毛病，增加工作团进行工作的许多困难，而且可能错误的处理一些问题。晋察冀在土改运动开始时是普遍召集了一次支部大会，宣布党员必须执行土地法，支持贫农团、新农会，保证其正确决议的执行，不得有破坏土改，普遍停止了真正地主、富农分子的党籍，以待将来审查，并且撤换那些很坏的村级，把他们调出训练，进行教育与反省；提拔成份好而积极的，参加支部及村级领导，或任党的小组长。但在疏忽以后也曾有一短时期（约二十天左右）把党的支部冷在一边，只依靠贫农团去进行土改工作，今年一月间就发现这样做增加了许多困难，比如坏分子容易钻空子，党员违反参加土改运动①，甚至采取消极旁观、抵抗的态度，影响一部分农民特别是中农也不敢积极参加，因此贫农团及工作组就感觉自己很孤立。如是又决定恢复了支部的活动，召集有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犯有错误的干部及党员进行反省，群众进行批评，坏分子受到批评指责或适当处罚，一部分地区这样公开了党的支部组织进行了党内外相结合的民主批评之后，使支部与群众的隔阂也就开始打破（老区支部长期秘密也是造成与群众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经过这样初步改造过的支部，证明在土改运动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广大党员的情绪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他们参加土改运动在团结中农上产生好的影响（因党员中有不少新、旧中农成份），特别在必要时动员中农抽出地时，党员起了带头的作用，晋察冀这次大扩兵运动中，以及支前工作中，不少干部及党员是带头参军和参加担架、运输队工作。凡是工作团（工作组）对支部加以改造协同干部一起做土改工作的，也就大大的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而且更易于全面的了解全村特别是中农中的动态和情况，使贫农团再不感觉自己孤立；反之，凡是把支部完全抛在一边的地方，工作即遇到不应有的困难，同样对于成份不纯、作风不纯，不采取坚决克服的地方，工作即更难进行。晋冀鲁豫及山东等地也都是采取经过支部的方针去进行的。他们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有的地方还做得更细致些，主要是更多的经过党内外的思想酝酿过程，做到党员和群众都能了解整党的意义，我们认为晋察冀的经验值得你们参考和学习。我们在来

① 原文如此

晋察冀途中也曾问到某些地方整党的情况，代县县委代书记郝德青同志认为一般的超过党支部去进行土改的办法，并不见得要比不超过支部为好，他也认为如果经过初步改造支部领导成份，工作组协同这样支部去进行土改，可能使土改整党工作要作得更好一些，过去机械要超过组织和旧干部与党员的办法，不但使党员情绪受到打击，而且要失去党员同情。在三交工作的某些同志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在兴县听侯维煜同志说代县二十一个支部中有十八个被地主、富农把持，据郝德青说情形并不如此，其七个支部干事会中有地富分子当支书或干事的。为什么两人说的如此相反，这是值得注意的）。根据晋察冀经验和晋绥一些同志的意见，故毛主席在公开发表的兴县讲话中关于整党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改，在整党工作进行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适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根据晋察冀及晋绥党的状况，虽然大多数农村支部的领导干部过去有严重的脱离群众的现象，但大部分党员和党的支部还是好的，或是可以改造得好的。党员大体可分作三类：经过八年抗战、二年内战考验过的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好的，他们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真正是群众中先进的积极的分子，其中也有一些作风上不很好的，这是一类。另有较前者为少的一小部分党员是很坏的，他们中有些是成份很坏，钻进党来为着保护自己及其亲友地主、富农家庭利益的，有些则不仅作风很坏，而且借势图私，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及为群众所痛恨，这些人，如不能彻底改变，是须要从党内清洗出去的，有些则已经证明成为犯罪分子无可挽救，更应立即开除出党，这又是一类。最大部分党员则是作用不大或不很大，群众对他们也无多大恶感，但这些党员还是可以教育的，而过去我们对党员的教育确实不够，这又是一类。一般党员中真正的地主、富农党员数量并不大，原来贫雇农成份的占党员百分之七十，在几年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已上升为中农，现在贫雇农成份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而一般旧中农成份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至于支部的情形，大体也可分成三类，有一部分支部是好的，这些支部的领导骨干不算坏，一般的说，的确领导者作风也不甚坏，这样支部只须调换个别干部就可协同工作团领导土改。另有一小部分支部是很坏的，一部分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主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他们拒绝或破坏党的政策的执行，实行反土改、反支前等活动，这样的支部是不可能进行土改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但其中也还有少数党员是好的，对这样的支部就完全应当超过他来进行土地改革，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者是宣布解散，吸收其中好的党员另行成立支部，对这样支部如不超过或解散，那是无法贯彻土改、生产、支前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但在解散这种支部之前必须先在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准备工作，找到适当的依靠，你们那里如果是超过这种支部进行土地改革则是正确的，但这种支部的数目不大，要防止随意扩大其数目。另有大部分支部是平常的，他们一般可以完成上级党所给与的任务，但是强迫命令的作风相当普遍，支部干事会中新、旧中农占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只是个别的，贫农也很少，支部干事会中以及农村其他工作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强迫命令或有自私自利行为，有时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他们是为群众所不满的，对这样的支部领导骨干应有更大一些的改变，即须在经过充分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撤换一批很脱离群众的干部，保留一部分较好的干部，提拔党员中成份好的积极分子参加支部领导，经过这样初步改造后，工作团是可以领导这些支部去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同时组织贫农团，工作团依靠支部与贫农团双管齐下，并按照支部情况决定以何者为主。此外要注意在土改斗争的过程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继续进行改造和教育，使支部能够成为配合领导农村工作的力量，以便在工作团离开之后，他们能够继续领导农村工作。你们过去对晋绥的党显然缺乏具体的分

析，对党的缺点加以重视，是完全必要的，但如因为存在某些严重缺点就笼统的确定应当超过一切乡村原有组织则是不妥当的，如果不加纠正则将造成错误。党内存在着的作风不纯和党员政治觉悟不高，一部分党员发展了自私自利思想，支部不能起更大作用等，上级对他们的教育及检查督促不深入也是有责任的。望你们详细检查一次晋绥党的状况和整党工作，应当很快恢复的，凡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应大批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有计划地将党迅速整好，使之能够成为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对于尚未进行土改的地区，在今秋进行土地改革时，应当吸收晋察冀和你们的经验教训去进行土改整党工作，应使整党与土改密切的结合起来进行，即先将支部领导做初步必要的改造，以利工作组协同支部去进行土改，在土改运动发动起来与深入过程中，注意吸收新的成份入党，并继续进行改造党的工作，只有那些太坏的支部才去超过他或加以解散。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在土改工作完成时党的支部组织也就很快能够完成整理的工作，在工作团离开之后使他们能够负担起农村领导的责任。

整　军　问　题

（一九四七年九月）

朱　德

第一、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因为在土改中暴露了军队的许多毛病，地主富农钻到我们的军队里来，土改中利用我军躲风躲雨，穿起军衣反对群众土地改革；不管在野战军中或军队的后方机关，都要审查清洗。地主参加了我们的军队，而且参加的很久，他现在表示不反对土改，愿意学习，愿意工作的，一律给予在继续工作中进步的机会。坚决反对土改，或过去有过重大的镇压群众包庇地主行为的，一律开除军籍，交人民法办。

在抗战中参加军队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地主富农子弟，也有的不是这地方人，他们的立场也要审查一下究竟站在那一个立场，是不是站在工人农民这边赞成搞土改。只有诚心诚意，不要半条心，而要一条心——为人民服务，要放弃他们原来的立场（这里边包括地主富农的子弟在内）。

另外，我们军队里边，沾染了封建社会的习惯，在红军里头已革除的差不多了，到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的成分复杂了，加上政治工作不好，许多恶习又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在军队中的影响很坏，有些人到军队中就是想当官，摆架子，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来。这种旧的不良习惯，是我们很大的敌人，它在我们思想上各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思想上是牢不可破。只有土改后，经过贫雇农起来把旧社会的那一套恶习气贪污腐化，自私自利，军阀主义打下去以后，军队才能完全脱离其传染，这些是地主富农的思想，容许这种思想侵入军队中，是很危险的，必须扫除。我们有很多老干部也蜕化了，也向地主富农军阀看齐。他们想：打了半辈子仗，辛苦了，想法讨个老婆。讨个老婆叫太太，生了儿子叫少爷，生了姑娘叫小姐。太太，少爷，小姐就这样喊，这在蒋管区喊不奇怪，一到我们这儿喊就糟了。这样的干部有没有呢？也有几个，也可能还多。对这种人思想上、组织上都要审查清洗一下。跟地主女子结婚也是地主富农思想，地主的女子总是漂亮一点，讨一个老婆要那样漂亮作什么？能够作事情就算了（笑声）。思想没有打通就是要漂亮的，这样一讨就讨到地主富农的姑娘，他一做了太太就是蒋军太太的思想（？）（笑声）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从思想上清，组织上也要清，我们的立场不能马虎。怎样清法呢，就是女同志也要作工作，我们王震同志有一点阶级观点，他在南泥弯，有的要讨老婆，能够做工的他就批准，不能做工的话就不行，他有一点蛮劲（笑声），所以他的家属就不同。每个人都可以作工，不能作旁的工，作一些手工业也可以。恐怕将来家属需要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是向地主、资本家、军阀看

* 这是朱德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报告中的第五个问题。

齐，那就糟糕。有了这样的东西军队的律纪也不好，上下级的关系也搞不好。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如果去掉了这些，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也就搞好了，阻碍土改，宗派主义等不良现象也就减少或没有了。当然我们好的方面也多的很，我们没有薪水，有党的领导，大部分人阶级立场还是很稳的，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等。如果把这些坏东西去掉，军队才能担负起他的任务，才能是阶级的军队，这一点同志们回去要注意。对这些地主富农投机分子要清洗，愿意改正进步的可作一些不重要的工作。——致于一些知识分子，把他的思想搞通，经过锻炼，还是好的。蒋军官、俘虏，尽量的还是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还是有用的。

第二、关于军民关系。只要把农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军队中的战士把家庭问题解决了，军民关系就可以搞的很好。我们在这儿调查了一些情况，士兵是怎样参军的呢？多半是强迫去的，有些是拿钱买的，我们解放区里边还有这样的情况！村款多半就是这样花的，你逼他走了，结果他反过来对村干部就非常仇视。过去我们摸不到村干部是土皇帝，在爱民拥政中听到很多牢骚话，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怕是造谣言，但一查有他的真理，这是群众的呼声。许多人过去只晓得我们的干部好，不知道他们压迫人民到那样的程度。我们的军队纪律坏，什么道理，摸不到，是不是军队中有坏人呢？当然有坏人的。我想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然军队要拥护政府，对人民要很好的爱护，过去我们军队里边有错误，对老百姓不好，对政府不好，年年正月进行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现在看起来，这一点还不够。这还不是辨证法的。还是机械的拥护。现在我们要提出军队帮助地方，改正地方上的错误（这不是干涉）；政府帮助军队，改正军队中的错误，这才有群众基础。政府帮助军队中改正了缺点，这就叫拥军。不是拿一些钱，送点东西，说军队一阵好，就解决了问题，过去是那样，现在要增加一条，互相批评缺点。军队要到处接近群众的，要把政府、党、地方群众有什么缺点、错误也告诉地方党、政，好的地方也指出来，那才算真正的拥政。

要真正的使我们的子弟兵，每个人都爱护政府，政府也爱护军队，也真正作到视群众为我们的父母一样，随便老百姓的一点东西，也不要损坏，要很好的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最近野战军发起了帮助老百姓运动，每人每天不管行军也好，打仗也好，至少要帮助老百姓做一件事，那怕是很小的一件事，这一点起了很大的效力。过去军民关系搞的非常恶劣，打死老百姓的也有，老百姓恨死了队伍。如果那样一做，一个纵队算二万人吧，一天就要作二万件事。一次正是老百姓上粪的时候，老百姓上不到地里去，大家一天就把粪都上到地里去了。老百姓看到这样好的军队！过去老红军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不做就成问题，如果一作就收效，所以现在发起了这个运动，随便你作什么，挑水就挑水，刨地就刨地，一天总是要作一件事，养成这样的习惯就好了。爱民要这样才行。

第三、关于军队里边的群众路线问题。

甲、教育要走群众路线：

过去我们就是发扬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正因为这样，我们战士的技术和军队，才大大的发展了。过去有些人天天向我们军委要人，要派那种教官，我们就一个也不派，要在自已队伍中找，那一个能干一样什么，就要他教，你就要向他学，把架子要拉下来。（笑声））队伍中有的是能人。他回去当真一找，那一种都有，炮手、机枪手等，会什么就让他教什么，他是俘虏就俘虏，要他教。这也是教育中的群众路线。要动员全体军官走群众

路线，那就了不得。

乙、在战术方面也就要走群众路线，每一战役结束后，由一班战士检讨作战优缺点后，一直到全部队都检讨战术，这就大大的发展了我们的干部走群众路线，这样爱护战士，那样爱护战士，生怕战士饿了冷了，这都是好的。战士（陈赓的部队）最近提出了一个问题："爱护我们，你把战术搞的好一点，少死几个人，比爱护我们的身体不是更好吗？"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实际，提的很好，大家是要很好的警惕的，不要说过去一冲，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战术也没有学过，一样的打胜仗。不怕死、很勇敢，可是多打死了几个人。如果把战术搞的好一点，又勇敢，少打死几个人不更好吗？所以真正的爱护战士，干部要把战术学的很好，这也算是群众路线的一条。走了群众路线，战术也容易学的顶好了。

丙、政治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

现在战士中又发明了三合一班：有三种战士，（一）国民党主力的俘虏兵。（二）老八路。（三）彻底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战士各有各的不同，各有优点，也有缺点，白区的战士，他的阶级路线是模糊的，老战士有八路军的传统作风。但是他对土改没有完全受到新的实际利益以前，他对解放区的感想不是那样十分好的。他出来是被迫的，而不是土改后自动的出来保护土地这样去的。所以把这三人组织起来，开一个诉苦会，你是怎样苦，他是怎样苦，他又是怎样苦，经过开会后，三方面的东西就会都合拢起来了，解放区土改也知道了，白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各种作风也知道了。这个会开他一天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野战军也要进行，没有时间，想法抽出一点时间也要搞。但现在土改还没有搞好，新战士还没有好多，老战士想回家，俘虏兵也时时刻刻想逃跑，而新战士就是班里的政治战士，部队的巩固就是靠他。这也叫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

丁、奖惩，也要走群众路线。立功报功这个运动，也是最近发明的，过去我们也没有，共产党打仗，红军打仗都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表功呢？不要这些。最近进行了立功运动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好处，军队中人人大振作其精神，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并且把它运用到各种工作上，甚至不说假话这些都算。不一定大功，小功也算，这样慢慢的就训练好了。这一点我们过去政治工作上没有，好多年我们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很好，并发动群众报功回去，家里也贴起报条，好象过去中了武举一样，这东西了不得，干部也奖励他。这样前后方也联系起来了，过去军队一出去村里就不管了，现在把他都联系起来了，军队同后方联系起来了，军队同党也联系起来了。新战士与老战士俘虏兵也团结起来了。立了功，大家都尊敬，向他学习，这也是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过去每做一件事不是发动整个军队作，而是派几个工作人员作，那样收效就不会大，如果把群众发动起来每个战士都作，那就很快并且派几个工作人员作，那样收效就不会大，如果把群众发动起来每个战士都作，那就很快并且作的很好。不要看到我们的军队只会打仗，而他们是很有政治认识的，很有能力，能作很多事，能作一切事。所以把军队带好真正成模范连，那是最爱人，最舒服。吃饭在一块，行军在一块，思想一致，行动也一致，把落后的慢慢的训练也没有了，那个队伍就漂亮的很。我们有很多的游击队，不仅自由脱离群众，本身上也没有搞好，没有团结，没有教育，乱七八糟，这样就会自己消灭自己，不用别人消灭自己也活不了。武工队的作用不是游击队，要派很好的干部去，要有很好的政治工作。抗战时发现了这一点，将来用武工队这个形式发展游击队，它就代理武工队。这个作用并不是专门打仗，主要是作群众工作。关于军队里面的民主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来是不是搞一个士兵委员会？过去有过这个东西，他起

不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发展到士兵打官长，硬是打过连长的屁股，说官长这样作恶，欺压士兵，当然是有点过火，有个别的发展到了极端，这也不行。但是改造军队的军阀主义是很好的，现在用这个办法需要不需要呢？需要各团士兵搞在一起，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有好处。可以先试验一下，有了这个会，也有农会、青年会、妇女会、工会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人民代表会，参加人民代表会的士兵代表要是一个老战士有文化程度，他真正代表士兵的利益。

第四、关于抗属问题，应该清理一下，过去的标准太多了，抗属恐怕还是以在军队的为主，其他什么干属，能照顾就照顾，不能照顾就算了。陕甘宁边区照顾到什么程度呢？工人缺乏的时候，工人家属也照顾，学生缺的时候学生家属也要照顾，结果把老百姓弄的没办法，所以以后要加以整理，有的要取消。现在我们没有薪水制度，这也很困难，但是也要想办法，一方面要他们生活，另方面恐怕要组织互助合作社，抗属也做一点事，大家来变工，这样照顾恐怕合理些。照顾的程度要根据他家里的实际情形。

退伍军人和荣誉军人问题。这些荣誉军人，退伍军人，我们查了几个村有七十几个，很不少。但是以社会旧观点——地主富农的观点看来，这些人大概是二流子，如果拿新观点看他们就是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立过功的，应该尊重他们，但是社会上一般是鄙视他们，并不尊重。有的是有些坏处，但今天是不是象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变成二流子？不是。我们的军队是受过训练的，军队的党员训练久一点，起码比农村的党员要好一点。他们打了仗，走了路，见了世面，他们天天开支部会，难道比农民党员减色一点？这个道理就说不过。有些支部就不收他们，他们回来拿着党的介绍信，有的支部说不行，一定要中央局转达才行，你看要经过这样多的关系行不行，结果把党籍搞掉了。苏联的乡村苏维埃主席差不多都是退伍军人，有好多工作都是靠这些荣誉军人，退伍军人做。因为他们比农村受的教育好，他们又有功。同时也应该给他们一个职位，应该给他们事情干。这些人经过训练，将来一定会担任很多事情。如果不把这些个旧观点改正过来，将来战士回来，不仅会安置不了，而且在社会上要成为一个累赘。所以要把这个观点转变过来。这些人在革命中起了推动作用，打仗拼死，革命总算有功，如果我们将来工厂没有工人怎么办，就会很快把我们这些人去做工，苏联也是这样，敌人不来就做工，敌人一来马上拿起枪就又去打仗，将来我们也可能到这一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精神准备，无论那一个战士退伍回来，不管他还有什么缺点，我们要改正他，使他回来有用，成为一个很好的公民，不要把他们当成二流子看待，否则会对立起来。是不是这些人回来没有办法呢？管不了呢？不，他们也喜欢好，他们回来，很好的安置他，帮助他生产，帮助他安了家，讨了一个老婆，这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公民！？荣誉军人，一只手或一只腿的，可以找适合他们的工作。

第五、军队参加土地改革问题。这个会的效果很大，各种经验很多，我也学了不少。最后又把我这个"快"的问题解决了。中央来的这个电报说：彻底平分田地好处很多，赞成平分办法。这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能够搞好，实现平的方法，也可以说，人人能分土地，人人也知道分土地，也知道分土地的方法。所以军队到什么地方，三天就能够弄出个样子，革命不是那样细细腻腻的。群众运动起来，恐怕不是依这些个规矩，恐怕是依他们的规矩。这个运动中会搞出一些岔子，这是免不了的，我们怕不怕它呢？只要我们抓紧了团结中农的问题，我看也不要紧。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人人起来，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会分，搞的过火了也不行，总要平均，左了也不好，右了也不好。我当然赞成这个平的办法。用这个办法的话，全国几万万人轰轰烈烈搞起来，中国早晚有这一天，现在恐是时候了。在大革命的时

候，我们党也没几个人，军队还没有，把广东的农民运动、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江西的农民运动，都搞起一个热烈样子，几千万人有组织地搞起来，那时候还能，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二百几十万党员，二、三百万军队，就不能！？同时那时候农民还是没有现在农民的觉悟这样高。全国分了土地有二十年的斗争了，农民还不懂的，我就不相信，我看，不懂的，就是地主富农不要你懂，所以我们要搞地主，就把这个东西搞下去。将来我们的一切政权，就是压迫地主帮助农民起来平分土地。这一平分就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发动群众也比那时候快了。

发展游击战争，非分地才能发展游击战争，那一天也讲了，人民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穿的，农民要保护他的土地，他要加入游击队，把土豪的武器转到农民手里头，所以游击战争一起，他们都自动来打游击，并请求站岗。被人家捉住了就要杀头，杀头他们也干，现在地主武装凶不凶呢？他们有相当的力量，比如我讲的那六个省都没有正规军，但是他有地主武装，他的保甲制度是相当厉害的，我们军队去了首先要把地主武装消灭，经过这一手，事情就更好办，就更快了。过去土豪劣绅也没有经验，突然来了个袭击。但是我们也没有经验，我们那时候拿着几杆枪，就找不到教员，也不晓得走群众路线，所以很久才把游击战争的武装搞起来了，这个游击战是打垮封建势力最快最彻底的方法。自己的地位也容易巩固。农民一有了武装，就容易起来，而且发展的也快。讲到平分土地这个办法，在井山区时我们也想不出顶好的办法，当时也是靠群众想，想来想去提出了平分土地的办法。那时把地主一搞掉，就分土地，首先分东西，分浮财。我们军队打土豪就是把农民组织组织，开会分土地，结果是都赞成平分。有些假分，有些真分，怎样分法？开两三天的会，这个几亩，那个几亩，烧契约，把牌子一插，以后收了一两年的谷子，农民就高兴了。后来中央来了一个指示，就是富农分坏田，发展到查田运动。那时候富农、中农分不清楚，结果有些中农也挨打了，所以那时开头我们左了一点，盲动主义时期，抓住地主就杀，后来不杀头了，要俘财，但是不给他分地，后来我们要把地主送白区，送也送不出去。农民们拿起红缨枪很凶，妇女队，青年队都拿起枪，都很勇敢，有大批地主富农，就被赶到白区。苏区的地主、富农，那时候跑的较多一些。地主、富农叛徒跟国民党组织起来，他又晓得我们的真情，引起国民党来进攻我们，加上我们军事和政治上有些错误，所以后来根据地十分困难。那时候我们只有二百多万人民，土改彻底的地方只有两县，几十万人，打了四五年，人力、物力相当枯竭，兵源相当少，但谷子始终吃不完。所以农民起来能生产，能够解决问题，坚持那样长久残酷的斗争，就是依靠几十万彻底平分了土地的农民。所以我赞成平分土地。今天太行区七百万人口地区彻底平分了土地，已打出反攻局面，如果全国一、二万万人口地区彻底平分了田地，那任何敌人我们都不怕的。在土地政策上我不多讲了。土地分好了以后怎么办呢？下面就讲发展生产运动问题。

诉苦与三查运动*

（一九四八年一月）

周恩来

壮大军队，我们有两个法宝，一是扩兵、爱兵，一是放手发动民主，实行诉苦运动。

西北野战军的扩大恐更要靠俘虏兵，新区动员群众，老区也将供给你们一部，这使你们的发动民主与诉苦运动更重要。

…………

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应该受到称赞。其可采用的如：

1、革命军队制度一般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使民主的比重增加，范围扩大，可是不能脱离集中的领导，亦不能象群众团体那样范围的民主，因此由连以上的干部去领导连队中的三查运动是好的，也是打破军队中官僚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办法。

2、以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是很好的教育方式，不但反对封建可如此，反帝反蒋政权亦可如此，但土改、三查是应以反封建为主的，而且这种诉苦主要依靠于贫雇农出身的战士和干部。

3、三查结果：审查出许多特务、伪、异己分子及坏人，这是群众运动的火力，较之高高在上的领导机关更能有成果的地方，自然这样就更能巩固部队，团结自己，加强对敌的战斗意志。

4、在这个运动中经过支部改选就扩大了党，出现了积极分子、新的干部，也教育了许多原来的干部。

但是也还有些问题，在汇报中还没有解决，我现在提出如下，望大家在讨论中解决：

（1）军队中地主富农问题。土改中动员问题，法律规定不要，一般地不要，可以参加劳役，或根本不提；现有部队中的，一般地清洗，特殊好者留，或一般地留，特殊坏者不要；一般地不规定，由各地依自身情况解决。

（2）军队中为实行阶级教育，三查，实行思想站队，联系到人的出身是可以的；如组织站队，其目的何在，是为看清地富，则农民站队即可；如为吸收党员则宜与出身又区别又联系是可以的；如在农民内部站队，则鸿沟很难清除。许的报告已经证明：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究竟如何做法为好？成立贫雇农小组或会议，贫雇农骨干分子，是否可改为

* 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八年《对目前战局分析及今后作战方针》中有关诉苦、三查部分摘要。

积极分子会为中心，着眼于好的农民出身之人。查成分，是否已成为中心问题，从审查及选举中看，都如是。

（3）不经过连上（连长、政指）是否是一般做法，如是，是否妥当？

（4）选举干部，乃是班长，是否适宜？

（5）各连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研究一下不好的一面，互相比较，再做定论，尤其是成分制度，更宜慎重。

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三查结合三整工作的原则指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

土改学习最高目的是要重新整编我们的队伍，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土地革命的党，“使我们的军队真正成为土地革命的军队”以适应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需要，以完成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进一步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反之，如果任何一个组织与个人反对土地革命，他就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需要，他就不能完成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他就会被群众所唾弃，被革命所淘汰，他就成为反革命了。

同时任何一个组织与个人，如果对土地革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对破坏土地革命思想和行动采取调和放任的态度，事实上是对我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表示不负责任，这是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也要受到群众的反对和革命纪律的制裁。

因此，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如何，成为当前考核每一个组织与个人，是否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主要标志，任何其他借口（如某某基本上是好的，就是对土改不了解，如某某一贯不错，这次反对土改是一时的错误，如某某过去有功绩，应予原谅，如某某尚年青，还可改造等等）都不能模糊这一铁的原则。各级领导机关坚强正确与否，也要在这次土地革命大浪潮中去测量，任何或左或右以及粗枝大叶，敷衍塞责的表现，都是领导上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具体反映，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

因此，当阶级斗争进入到明朗尖锐的今天，在我党我军内部不容许有第二种和第三种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坚决站在工农方面，为完成土地革命而奋斗，如果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来反对土地革命，或者是既不革命，又不反革命，长期站在两者之间都是不能容许的。当然在开始时期少数人尚未搞清楚是会有的，但必须迅速打通思想，表明态度。

因此、不能把土改学习，也和时事学习、常识学习一样看待，只是打通思想，解释问题，统一认识，而是要看做只是整编我们队伍的开始，更重大更繁杂的工作，还在今后，这是我党我军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是一个严格的阶级的思想斗争，必须要把我们的队伍整编好了才算土改学习的结束，什么大体上结束，一般的完成，已经差不多了，从此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很危险的自满情绪，必须纠正。

二

军队与地方在整编队伍的重要性与目的性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在具体执行方面有某些微

小的不同，这只是适应战争情况和军队特点的更灵活更有效的方法方式而已，决不能以军队人员经过战争考验，生活集中，管理严格，则有些人思想上不痛快也不容易见诸行动等等糊涂观念，来松懈我们整编队伍的工作，如果军队真有特殊性的话，那就是拿起了武器的人更应该整编，整编不好，危险性更大，因此整编队伍的工作更艰巨复杂。

成分不纯，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军队与地方也处于同一状态，如有不同，也只是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各级党委与领导骨干必须引起严重的警惕，尤其我们不少干部还不是真正思想上搞通了，只抱着眼不见为净（没有搞到自己家里去，我不管他）的态度，这些人的反面就是"眼一见就动"，小则动嘴，大则动手，严重一点就动武，若不迅速解决，前途仍是危险。

保持与地主家庭的联系，影响土改或明或暗干涉土改，对党的土改政策不满，不积极参加土改学习与土改工作，或者采取各种方法方式来抵抗土改学习与土改工作，这是直接破坏土地革命的思想与行动，其他例如羡慕没落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只能享福，不能受苦，只能占便宜，不能吃点亏，只讲地主生活享受，不计对人民的贡献。看不起工农，不接近工农，谩骂工农无能，认为工农是生成的体力劳动者，自己是法定的智力劳动者，苟且偷安，自作聪明。只能做先生，不能做学生，骄傲自大，出人一头。贪污浪费，损公利私，损人利己，尽地主剥削农民的伎俩饱一己之私囊。军阀主义，打骂战士和群众，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封建统治者，把战士和群众当成自己的奴隶，对革命事业的雇佣观念，谁对他好一些，谁要给他一点享受，就跟谁干，就干得起劲一些，反之就要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地主阶级思想在我党我军中的反映，如果反映在地主富农出身的身上，那就是反动阶级本质的保持和延续，如果反映在工农出身的身上，那就是忘本，不管发生在什么人身上都应该反对和克服，但可相信，工农的忘本思想要克服它，一般的是比较容易的。

三

整编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发扬全党全军尤其是贫雇农的高度积极性，责任心，抱着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来完成这一历史伟大任务。

认真的彻底的进行全军上下毫无例外的三查，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关键。以查阶级为主，是三查的中心。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结合自觉，是查阶级的有效方法。愿查就查，不愿查就整，是三查的态度。思想打通，组织调整（部分的），纪律制裁（个别的）是三查的方针。查好还得整好是三查的目的。

经过诉苦复仇之后，阶级觉悟空前提高，阶级思想尖锐对立，民主作风开始发扬，领导作风略有转变，地主富农思想和行为，已受到部分打击，并引起了大多数人对此之警惕和注意，这是完成三查的有利条件。但因三查更接触每一个人的实际（诉苦只是给以思想上的震动）而且是群众性的大家来查与大家被查，又必须是查与整相结合，这一关不是每个人都那样容易通过的。因此我们要比诉苦复仇阶段更紧张的更细致的来正确掌握这一运动，不是一轰就可以解决问题，否则不是搅得不彻底，就是搅出很多严重问题来。

大家要查，大家要整，是坚定不移的原则，在具体执行上，应该有一定的步骤，掌握一定的重点，又不能机械的分开，例如，查阶级为主，必须结合思想、工作、作风。典型的查又不能妨碍全体都查，普遍都查。对营以上的各级领导，必须从中收集材料来证明领导上的中心环节在那里，群众的舆论是什么，以便在查领导时更加丰富起来。

阶级指导思想，思想指导行动，故应以查阶级为主，毫不含糊的把各人的阶级成分分析

清楚、并结合思想、工作、正确作出结论，使部队的阶级界线分明。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中出身的反动顽固和工人贫雇农中出身的叛徒）应该清洗出党甚至出军去，班以下的地主富农，一般的应该调离战斗部队，加以训练，另行分配其他工作，今后对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应经常注意其教育改造，严格锻炼，使其由思想改造，到行动生活各方面的工农大众化。

发扬民主，依靠贫雇农，改造地主富农思想，清洗个别阶级异己分子，是整编部队必须采用的方法，只要各级党委主动的去领导，他们在已有的阶级觉悟基础上，是不会出什么大乱子的。自流放任，是一种自由主义，乱喊过左是一种反抗的借口，只准自己有民主，不准别人有民主，是最卑鄙的行为，利用民主来达到个人目的，是罪恶的勾当，都应该注意防止与及时发觉纠正，善意的提供意见，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严格的展开斗争和纪律制裁，只对少数顽固不化和不可救药的分子。自觉就是自救，不自觉就须挽救，这就是自己努力与群众压力双管齐下。

治病救人的方针仍应适用，但还须病人愿救，不能因治病救人反变成了慢性病。

查好还须整好，故三查与三整必须结合，不只是揭发了一大堆问题，而且要逐一的具体的解决这些问题，在三查时固然欢迎个个坦白反省，同时更希望人人在这一运动中有切实的转变与具体进步，不能口说一套，在实际行动上又是另外一套，如果有人害怕说到做不到，那是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或者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打的烟幕弹。

至于经过三查之后，要做到一些什么，才算完成了整编队伍的任务，以后另有指示。

具体执行的办法，野政召开之政工会议已有讨论，各部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创造之。

前　委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

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

杨　成　武

我们部队的纪律是有着不断的进步，各个部队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根据要求来说还很差。在每次战役战斗过程中，在部队各部门的工作中，在三查运动中以及我们到部队做了更深切的了解之后，暴露了我们部队军事纪律与政治纪律的松懈与废弛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在作战命令日日命令的执行不彻底，赏罚不严明，侵犯群众利益的严重等等；暴露了我们在各种制度执行上不严格，对制度的不遵守、不坚持，甚至明知故犯；暴露了我们有不老实不真实的客里空，对任务对事情不认真，甚至有的虚报假报。比如供给制度方面，据军区谈全野战军有数千人的虚数，这是造成何等惊人的浪费！因为这些严重缺点的存在，结果直接影响到部队的统一与集中，影响到战斗力的提高，影响到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以至应该胜利的战斗没有胜利，不应有的损失而遭到损失。前委为此特决定在查阶级查思想的基础上，同时进行三整——即整顿纪律、制度与作风，要在我全军中进行普遍全面的整纪律、整制度、整作风。使思想的三查与实际行动紧紧结合一致，使部队更加正规更加统一与集中，保证一切命令的彻底执行，保证一切制度的完全遵守，保持与发扬我们的优良作风，使我们全军的战斗力能提高一步，这是大兵团作战的需要，胜利的需要。

第一　怎样整顿我们的纪律

我们整纪律就是整顿军政两种纪律：

甲、严肃纪律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党与军队主张有严格的军事纪律与政治纪律。在紧张残酷不顾生死的人民革命战争中，如果没有严格的军事纪律，没有坚忍心，没有顽强的精神，就不会有统一团结的意志去进行战争，要战胜阶级敌人是不可能的，任何否认纪律就等于直接削弱自己的战斗力，因为没有纪律的维系，就不可能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就不可能保证与群众团结一起对敌斗争。纪律是一切命令执行彻底的保证，如果否认纪律或不重视纪律，就会使命令的执行失去了这种保证。在今天部队纪律松懈废弛的情况下，如不即加整顿任其下去，没有严格纪律的约束，将不能使那些（不管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动摇分子、散慢、松懈、不能坚忍、不能团

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劣根性很好的彻底的去掉。如此必然会使部队削弱战斗力，同时党与领导机关将无法率领我们的部队进行胜利的战斗。因此必须坚持严格的军事政治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全军，克服所遇的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乙、部队纪律的状况

总的说来，纪律严格的部队战斗力必然较强，×纵队×纵队的某个团及×纵队较老的团，平时工作效率即较高，不是松懈拖泥带水，这样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坚韧与顽强；与此相反纪律不严（战场纪律与平时管理教育均同）的部队，工作就散慢松懈，工作效果很差，战斗力则不会很强。×、×、×、×纵队的某个团特别在紧张情况下，表现不能坚韧，不能有顽强的精神，不能有整齐动作，不能团结，表现动摇。战斗中是要求全体指战员的精神和体力都要高度的紧张起来，就是说每个胜利的战斗都在极端紧张的努力后（顽强、坚忍、排除一切障碍等）才能取得的。纪律不严的部队就不能坚持取得这个胜利，经不起这个考验，而发生进攻时，攻不进去，防御时不能顽强防御，退却战斗时容易发生混乱以致溃散，这是部队纪律好坏与战斗力强弱的关系的一种状况。在我们部队中，过去历次作战在维护纪律上，虽有其成绩，各个部队纪律好坏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总的说来部队纪律松懈废弛的现象是严重和相当普遍的存在着，它主要的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执行命令方面：有的部队有的干部不执行或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私自变更部署，打滑头仗，不完成战斗任务。有的战斗作风不够勇猛顽强，进攻攻不进，坚守守不住。有的怕负主攻任务，积极求战精神不够。有的互相观望等待，致延缓时间失去战机，由于右倾思想的存在，以致有些人畏缩不前，甚而个别人员、干部可耻的自伤，发生个别的在战场上不坚决死战而向敌屈服极其可耻的行为。这些问题虽是个别的少数的，但其性质是很严重的，使能以打胜的仗不能取胜，不应有的损失会遭受损失，它会直接削弱战斗力，败坏我军传统的优良战斗作风。

假报谎报情况，对敌情、地形、战况、伤亡、消耗等等，报告不真实不老实，致影响上级对敌我的估计，甚至使上级发生错觉，影响到整个作战指挥。

对日日命令执行最差，这是普遍的现象。执行最好的是马马虎虎的办了，差的根本不去执行。野战军从成立后，七个月所下达的十三个命令中，有六个命令执行的很不彻底，另有两个没有报告上来尚不了解，执行算比较完满的五个，各级都须检查一番执行命令的情形。有人认为日日命令不执行不要紧，不会影响作战命令的执行，这是错误的。更有个别干部公开违抗命令，还有某干部把枪向上级一交不干了，这是绝对不许可的严重违犯军纪的行为。

（二）内务纪律军容很差。有些人自由行动，随便回家随便离队，不请假不归队，请假逾期不归（有的并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恫吓群众障碍破坏土改）。工作制度不严，责任不清，工作要求、工作态度、上下级关系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军容不整，散慢松懈，行军不列队，遍处皆有自由兵，着装不整、风纪不严、没有礼节，大街上乱买乱吃，尤其是机关更为散漫。以上现象在部队普遍存在，部队游击主义习气，还很严重，障碍我们的进步，应坚决抛弃。

（三）侵害群众利益，浪费民力极为严重，并且各部队普遍存在（只是程度的不同），在战役中动员民工担架大车太多，此次保北作战已超过一兵一夫。又因后勤部门精心计划不

足，不少预备民工并未参加多少战勤。行军中掉队落伍及不到队人员太多（尤其是机关），一两个人就找一个响导，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恶劣现象。驻军中，无组织的向村中要粮柴草，借锅桌凳等，甚至私自动员群众劈柴铡草等等。涞水战役中，有的村庄经常有十几个老乡在村公所值班支应不暇，并有五十个人准备出差。如九旅供给处在易县××庄（五十户的小村）一月五日一天就动员民力九十九个工，野司在××庄过新年三天中使用六十个工（畜力折合），类此事实很多，对群众利益的侵害无法以数字计算，关心群众疾苦太差。

（四）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帐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有一个支部通过集体贪污分赃，不告上级。一个组织科长竟盗用烈士遗金、党费做运销从中取利。有个管理科只个别的人不贪污，有些贪污分子任意挥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过着地主资产阶级糜烂腐化的生活。

与贪污腐化分不开的，就是严重的浪费和制度的废弛（特别是供给制度），有的随便开支非法享受，假报虚报人员马匹数目，吃空额，多报减员、出差费、客饭。据罗政委说全野战军虚数与实数竟差数千人之多，造成巨大的浪费。再就是不爱惜公物任意糟塌。不爱护武器浪费弹药乱打乱放（此次保北战役七旅攻涞水只试炮就打了五百发迫击炮弹），战场遗失炸药手榴弹现象极严重。

（五）缴获不归公，打埋伏。从本位主义及个人利益出发，有的团委通过打埋伏，几次追查不清。据八旅谈，该旅石门战役缴获计算起来起码浪费三万万之多（实际上不只此数），有的将缴获物资变卖，有的私存某地但不缴公，有的部队收交缴获东西屡收屡有。更有个别分子在战场大抓一把，私自据为己有贪污享受，武器弹药缴获亦不实报缴公私自存放，更有乱卸零件使好武器变为废品。以上种种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六）违犯俘虏政策。枪杀俘虏及对俘虏补枪（有的为发洋财），搜俘虏腰包等。

（七）近来发生动摇分子在战场自伤直接破坏革命力量。

丙、今后纪律的要求特重申如下

军事纪律方面：

（一）战场纪律：凡不坚决执行命令违反命令，临阵畏缩（指挥员同），战场自伤，按兵不动，不坚决作战，向敌屈服被俘。不积极完成作战任务打滑头仗，不积极援助友邻部队，致使友邻部队遭受损失危害。私吞缴获资财，暴露秘密，致误军机。谎报军情惑乱军心，不遵守时间，不完成战斗保证（如侦察警戒通讯联络防空防坦克防毒及后勤各种物资保证等）。不营救伤员与抛弃伤员，不服从间接首长指挥。均属违犯纪律。如违犯者，依其重轻应受纪律惩办。

（二）内务纪律：凡内务条令内所规定者皆应遵守之。包括军纪风纪、各级负责制、正确的工作关系（尊重首长，上级关心下级，协助同级）、严肃的工作制度（警戒、卫戍、勤务、值班、汇报、起居作息、请假、销假、军营卫生、诊断保健、接待来宾等）。

（三）管理教育纪律：坚决执行日日命令、调令、执行操场课堂、野外作业、紧急集合、夜间演习、野营演习、实弹射击、校阅点验、纪念典礼等制度，及其所规定之规则，不

执行者均属违犯纪律。

（四）革命军人道德纪律：提倡忠于职守，养成忠勇朴实，谦逊严肃、大公无私、上下敬爱的高尚精神。遵重公共道德，注意个人修养。凡贪污腐化、窃盗公物、酗酒、嫖赌、虚伪做假报告、苟且偷安等均属违犯纪律。

（五）爱护公物武器纪律：凡不爱护与不正确使用自己的枪械弹药、被服装具、交通运输工具（车辆马匹）军用资财（通讯工具卫生工具器材）者，损失与浪费团体公营财产、军粮医药者等，均属违犯纪律。

（六）严守军事机密纪律：要随时随地均提高政治警惕性，一切言论和行动，均须严格遵守军事秘密，严防敌探汉奸反动派之一切破坏行为，并坚决与之作斗争。凡泄露军情，遗失命令、报告、通报、秘密文件、暴露目标均属违犯纪律。

政治纪律方面：

革命军队纪律不仅要有严格的军事纪律，以顽固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指挥与作战的顺利完成，而且要有高度的政治纪律群众纪律，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取得人民的帮助，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我们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好了，才能彻底作到保卫人民的利益，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军队。今后要求：

（一）坚决执行政治机关的一切决定指示，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坚决执行党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如俘虏政策、锄奸政策、土地政策等等）。

（二）缴获归公。不论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反对本位主义，一切家务要交公（武器弹药编制外的全部军用物资与医疗器械、交通工具、电器材料等）。

（三）不侵犯群众利益，严格遵守八项注意，战后要做善后工作，不浪费人力物力热爱人民，缴获没收要归公，不侵犯群众果实。

（四）尊重党政民机关工作同志，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帮助农民翻身。

（五）占领城市后保护一切建设及工厂机械，遵守城市政策与纪律。

（六）遵守处理俘虏纪律。

丁、为了保证以上纪律的正确维持，与贯彻执行于战斗中管理教育中，以及一切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中必须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首长人员，正确的了解与正确的维持纪律，特提出以下几点

（一）纪律的重要意义、纪律条令、民主与集中的正确关系等，要在部队中强调进行教育，要长期的随时随地都要反复的进行。必须充分说明要保证团结行动，战斗的统一与一致性，纠正纪律的松懈废弛，必须整顿纪律。从根本上讲，我们革命军队必须是最有纪律的，不这样就不能战胜敌人。我们军队的纪律是对全体军人要求服从命令动作一致而规定的，是为了部队战斗力巩固与发展，保证我们整体的利益，使能团结一致协同动作，坚决勇敢顺利完成任务。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纪律与制度是为了培养与锻炼革命军人具备坚强、勇敢、无畏、忠诚、服从、机敏独断、吃苦耐劳、军民一致等素质，发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这样才能成为具有坚强战斗力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那么就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因此革命军队的铁的纪律高度的军事纪律，必须经常提倡进行

教育，这是革命军队的命脉，每个革命军人必须自觉的严格的遵守，同时必须说明我们主张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与反革命军队的纪律是有原则的不同，他们是用以压迫士兵的，我们则是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革命军队也应该是最有纪律的。朱总司令指示说："纪律教育是长期的，随时随地都要教育，上下一致的执行，掌握了这个方法，其他一切都好办，都容易进步，这是军队教育的生命，希努力做去。"我们军队中过去破坏纪律的人，有些是不懂得什么是纪律或不懂其重要意义，这是我们教育的不够，纪律条令及纪律的重要还没有很好的进行过教育；对于民主与集中，军阀主义与严格纪律了解模糊，教育不够；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奖罚不严不明，因此就须将纪律条令要普遍进行教育。学校及训练新兵，训练解放战士的部队，要把纪律教育成为必须的重要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在惩处违犯纪律分子时，应对部队进行反复教育，以提高部队纪律性与自觉性。

（二）要正确的了解与正确运用民主与集中的正确关系（即严格纪律与民主作风的关系）。民主还是要强调的，军阀主义是要反对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彭真同志说：一切经过民主讨论（如战役战斗工作等）后，在集中的形式上出现，这就是表现在命令上的集中，命令一下，就要无条件的执行，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容。

正因为集中是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所以强调纪律的同时，要使部队能养成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政治军事经济等），这样才能很好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维持纪律、经过群众路线发挥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及干部与全体同志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互相监督，工作的活跃，敢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为达到发挥积极性的目的，还须实施民主制度的教育，使大家懂的什么是民主生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使那些对民主集中的模糊观念，明确起来，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正确扩大民主生活，同时也要使大家懂得严格遵守纪律，部队如果没有高度严格纪律，也就不能保证群众的意志和力量统一集中起来，贯彻实行。因此，扩大民主生活与严格部队纪律并无任何矛盾，二者是统一的与一致的，不可偏废。目的都是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

我们的军队靠什么手段来维持纪律呢？明确的说：维持纪律本身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来维持，使全体干部特别是战士知道维持纪律是他自己的事，不仅是上级或干部的事，是广大人民也是广大士兵的最大利益，这样，多数群众觉悟了，在广大战士政治自觉基础之上，以群众的维持和首长人员维持相结合（即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才能有真正的严格的纪律，所谓强制执行，也只有多数群众觉悟了，才能以强制办法对少数人，不然依强制办法也难达到目的的。

最优秀的部队其纪律是最严的，政治觉悟最高的部队其纪律也是最严的，因为它的纪律维持是依靠群众监督的，不是专依靠少数干部来监督或强制维持。有的政治纪律很坏的部队，但战斗力较强，这种个别的客观情况有时是有的，但这又表现它的政治上不够觉悟，这个部队没有分清对敌要恨对内要和，因此对这样的部队更要强调觉悟性的提高。

所以如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发扬民主生活制度，动员群众来维持，才能够达到把维护纪律放在民主的自觉的基础上，使我们的纪律真正的严格起来（要求严格并不是军阀残余）。极端民主化、放任主义、无政府思想等，是反对维持纪律或严格维持纪律的，这些思想应加反对。

（三）军队党的民主是少于地方党的民主的，其目的是为着巩固纪律与增强战斗力，保证指挥员命令的执行的，而不是削弱纪律与战斗力的，因此军队纪律是带强制性的。为此我们所制定公布的纪律经过教育后，就应不折不扣的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和行动，已经下达的决心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对于不遵守纪律违抗命令的，就要强制执行，以至处分，维持纪律的目的是为了首长命令的执行，使成为铁的纪律，不致成为空谈。

（四）领导机关与干部，在维持严格的铁的纪律时，本身应：

（1）以身作则，遵守纪律。有高度的自觉性与纪律性，与坚定勇敢的精神成为执行一切号令的模范（忠于职责，不断教育部队，大公无私，赏罚严明）。

（2）严格检查一切命令、条令及所规定的任务的执行情形，未完成者要求督促完成，对违犯纪律者，应依其轻重分别予以惩罚。在紧急情况下，上级指挥员可以用较严格的手段强制执行，一直到动用武器。遵守纪律者应给以奖励，惩奖均含有重要教育意义的。同时必须处理及时，才会有更大效果，但不是滥用职权，假公报私，或采取放任态度等。这乃是违犯纪律的行为。

（3）为使纪律执行贯彻一致，除党委在领导上注意外，各级干部要求同级干部一致严格，上下级一致严格，对真正严格维持纪律的干部一定要给以撑腰。平时管理要求严格（如学习等）。要养成此种作风。为了要求严格，正确的维持纪律，只要自己正确大公无私就不要怕人说“军阀主义”（本来就不是军阀主义）。在思想上要为坚持正确原则准备吃点苦头，但必须指出，要求严格与军阀残余并无丝毫相同之点。

（五）上级下达命令时，不要轻易从事，要了解下情，已经下了命令，则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妥时，由下命令者负责。

（六）下级接到上级指示命令后，必须讨论，以求了解意义及讨论如何执行办法，要传达的必须迅速传达，保证完满执行。

（七）在严格执行纪律中，可能有个别的同志有意见，不同意，应很好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在思想上要充分准备与之斗争。保证纪律的执行。

第二要整顿我们的制度与必需建立的制度

制度的严格执行，本身就是严格的执行纪律的具体表现。制度与纪律是分不开的，制度的规定是保证有组织的科学的分工，使工作不混乱，各负其责，是为了有纪律有章程的有良好秩序的进行工作完成任务。有了制度可以预防各种不良倾向不良作风的发生（如贪污浪费，不负责任，本位主义，闹独立性等），使部队走向更好的正规严格与严肃的工作作风与生活制度，使一切工作更好统一、一致与集中。

为支持长期战争，节约人力、物力、资财，保证供给争取胜利，为保证部队巩固与战斗力的提高，为保证一切工作统一与集中求其一致，我们必须整顿制度（已有的），以及建立必要的制度（尚未有的），这些制度是依据普遍性一般的需要所提出来的，所以希全军无例外的贯彻执行。除以命令、训令文字公布执行外，特提出几个重要的制度：

（一）供给制度

整顿与建立供给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提倡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严查贪污，保证制

度的正确执行。

最近华北财经办事处指示中对反对贪污浪费问题指出：贪污是有意识的（明知故犯）犯罪行为，与因幼稚或疏忽而犯的工作错误性质不同，完全应由犯罪的人自己负责。我们处在私有社会，如立场不稳，很容易被贪污这种尘垢沾染，只有天天拂拭，经常检查自己，才能保持纯洁。机关首长必须以身作则，拒绝一切不应得的享受，否则是不能与贪污现象进行严肃斗争。对资财浪费现象亦应严格检查，虽与贪污有区别，但同样是削弱革命力量，加重人民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的一种罪恶行为。要严格建立审计制度，检查收支状况，发动群众力量来反对贪污才有力量。注意节约，爱护弹药（炮弹、炸药、粮食应报告）。

除在部队中提倡节约，反对与严查贪污外，经此次后勤会议讨论决定如下（详见后勤会议决定）：

（1）保证人员马匹数完全正确确实，消灭虚报人数多支重领，造成巨大的浪费。

（2）解放大队、随营学校拨出，不归纵队供给。

（3）预决算报销开支，由各该级政委负责审核盖章

（4）严格预决算制度，各伙食单位统计各种数字统以每月二十日为准（野司、政统计统一二十号标准），团报旅为每月二十二日、旅报纵队二十四日、纵队报后勤指挥所为二十五日。决算时间的规定，见后指决定，依据人数发被服补充装具等。

（5）一切所存物资款项弹药武器，除编制内及配备之预备基数者外，一律交军区。

（6）提倡节约在不违犯供给制度下真正的节约，以百分之七十归节约部队，百分之三十交公。

（二）民工运输力使用制度

后勤会议有详细规定，其基本精神是从各方面加强管理与改进使用方法，达到节约民力之目的。我们为支持战争争取胜利必须节约，同时为了减轻笨重必须严格遵守规定（民工大车收容车之数量等），不许向地方直接动员，必需时应持有后勤指挥所动员证，否则为犯法。加强民工的管理教育，在民工动员科未组成之前由司政供各部门派人参加领导，要从各方面节约民力，禁止驻地动员民力牲口，行军请向导注意尽量减少，注意守密，更要注意行军队列。为保证部队切实遵守执行，野司野政特发出联合布告，张贴于各村村公所，大车民工担架分配数见后勤指挥所指示

（三）处俘问题

处俘及处俘制度问题在野政敌工会议上，经过讨论作出具体规定（详见杨政委在敌工会议上的结论），总的精神是纠正过去处俘的缺点，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对毛主席“人力物力主要来自前线”的指示，思想认识上不明确，今后要以毛主席的思想纠正我们的缺点，必须反对精兵主义思想。我们的口号是“确实能争取者不少争取一个”，无论如何争取俘虏比扩大容易的多。不能争取要放者也要充分利用做瓦解工作，主观上尽量做到不能浪费一个，要很好进行处俘释放等工作。

（四）战地救护工作制

加强部队战地救护教育，每两周以一小时进行卫生教育。基本内容为绑扎与止血。班建立卫生战士，作战时每连建立救护组，由文化教员、文书、理发员、卫生员组成，指定一人或以卫生员为组长，放全连作战附近，做紧急救护。

团设绑带所，旅设手术组，负责小手术，纵队设手术队作大手术。

所有担架依规定不得扣留，后站服从前站，调剂前边。

不许遗弃负伤战友，危急时要设法抢救。

保证伤痕不生蛆，不因绑扎不好流血而牺牲，加强火线初步疗伤与手术以达减少死亡率及残废数字

送医院之伤员保证适时送到被毯及党的介绍信等。

烈士必须妥善葬埋，以慰死者，鼓励继续战斗的战友。

（五）报告与汇报制

会议汇报制度，宿营报告与日报表均照前规定执行，现规定以下制度（仅限于对野司野政的）：

（1）军事的：战斗要报两天内报来野司，战斗详报五天内报野司，实力统计每月一次，团以上干部花名册每月一次。

（2）政治的：综合性政治性报告每双月下旬一次。质量统计不定期，增减结计三月一次（季报）战役统计报告每次战役结束后报告一次。非战斗减员报告（分别逃亡、病亡、病送等）每月一次，团以上干部简历名册，在三查确定成分后报告一次，此后在调动提拔时随时报告。

此外各部门，主要是上级与下级各该部门适时交流经验及工作指导，可建立不定期的（一个月或一个工作战斗完成后或临时问题）通讯。

（六）军械工作制

军械工作制度是最差的制度，损失浪费很大。军械工作干部许多未真正做本职工作，领导上亦未重视，重金钱不重物资（如炮弹手榴弹医药损失遗弃浪费很多）必须纠正。今后领导上要重视并严格工作制度的各项规定，加强军械部门的本职工作，所有弹药武器的配备遵照军区的规定，多余者全数送交军区。盗卖弹药武器者依纪律严办。

（七）收容工作制

在运动战的大踏步前进后退转移中，收容工作甚为重要，否则将使减员增加，掉队落伍者并易于违犯纪律，因此规定：

行军时营为单位组织收容组，团组成一个收容队，在部队后跟进，其任务是：收容掉队

落伍的同志，收容及治疗临时发生疾病的同志，维持与监督行军中的群众纪律，完全以说服耐心教育的工作方法完成任务，收容队组成要有政治干部负责，以宣传员、医务人员及配备必要之武装组成。全团五辆大车，估计有必要时要带粮票菜金等。

（八）人员调动制

（1）人员调动，必须要有正式介绍信，无者可不收。

（2）所调动之人员要带被服登记表，干部要有鉴定表，命令所规定不许携带的东西如望远镜、枪、马（规定许可带的不在此内）、地图书籍等则勿带走，需要时经上级批准之。

（3）干部调动时应交替全部工作与手续（包括工作、人、马、武器、弹药器材及经济手续等）。

（4）犯错误的在调动前必须给以教育，并作出结论，经过教育后再介绍他处。

（九）干部工作制

（1）干部升任调动制，营级由纵委批准，连级归旅委批准，排由团委批准，团级由前委批准报军区备案，旅级经军区批准。今后团级干部报告前委（野司政）由前委报军区备案，旅级干部各纵直接报军区批准，并告前委（野司政），但野司政可以提出同意与不同意之意见。

（2）干部鉴定制度，按军区最近规定，营以下干部三个月一次，团以上干部每半年一次。

（3）干部培养：除在职培养外，连排干部归各纵队随校、班级及射手等归各团军事队，营团干部送军区军政学校。

（十）点名与点验制

所有部队每天要点名，行军时亦应力行之，要呼口号及简单十分钟的讲评与解释等。每年要进行两次有计划的全面的大点验，于春冬换装时举行，各纵及野直各自进行，并报告野司以便派人参加。

以上各种制度是目前迫切须要的，有的本已严格执行过，现在则松懈废弛了（如供给制度），有的过去就不够严格。为了战斗力的提高，为了节约民力财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秩序正常不致混乱，建立真正的负责制。希望以上所确定的各种制度，在全军中坚决的贯彻执行，为此应：

（1）要将所规定之各种制度在全军中进行普遍的反复的不断的教育，使大家了解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制度，应如何执行这十大制度。

（2）要充分准备与不遵守及破坏制度者（即使是个别的）作坚决的斗争，以达保证制度的执行。

（3）经常检查与监督制度的执行，要保证其经常性，各级党委要保证其贯彻（不管是整训战斗或行军）。

（4）各级首长要成为执行制度的模范，并给维持制度的干部撑腰。

军委总政关于在连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一）部队中实行广泛的民主生活，经验证明，很有好处。自各地实行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民主以来，对防止军阀主义，加强部队团结，以及提高军事技术上作用极大。为使这些民主生活，更能经过一定组织形式，当作制度建立起来，经常发挥作用起见，有些部队已组织经常的士兵委员会，例如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去年底曾作出决定："连队与伙食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给予士兵以经济与政治民主。如属群众运动，均可由行政提出，通过士兵委员会，讨论执行。士兵委员会，按时审伙食费收支，讨论改善生活，并进行对干部的批评与审查。连队士兵委员会，应以工人、农民中出身的优秀分子为骨干，经由民主选举之"。

又如渤海军区在三查运动中，曾在连队中临时成立士兵委员会，发动战士对干部与党员之批评与审查，提高了战士政治情绪与积极性，改进了部队的工作。因此，也拟将此种士兵委员会建成经常制度，由士兵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娱乐、学习，自己维持纪律。最近，西北野战军在三查学运中，亦采用类似士兵委员会性质的办法，由战士以民主讨论，推选一些优秀分子，经行政批准，提拔一些新干部后，连队工作气象一新。西北野战军与晋察冀野战军均曾在战斗中放手发动连队士兵，开会讨论如何攻克难于攻克的敌人堡垒阵地，收到了极大效果。

（二）总结这些经验，我军各部队似均可在连队中普遍成立士兵委员会，并应将连队党的支部完全公开，使与士兵委员会之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后支部开会，应邀请士委会的非党战士参加，保证他们在会议上对党员有自由批评与建议之事，达到不仅确立士兵委员会的一定民主生活，并在党内也建立一定的民主生活，使支部不脱离群众，使党员接受群众监督，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组织的纯洁，意义极大。这样做似乎利多弊少。望各地各部队接此通知后，即斟酌情形，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几个月作为试办时期，至其产生办法工作范围及内容等，晋察冀军区、渤海军区及西北部队的规定与做法，各有不同，只能作为参考，而应根据各地各部队情况，在完全有领导有秩序的情况之下具体地进行。并将成立经过及获得经验，陆续电告军委。

中央关于将整军的民主精神转向经常的民主生活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据赓（陈士榘）唐（唐亮）×日×时电称，根据整风和土改学习经验，只采用阶级性的民主形式，一方面干部得不到群众经常性的监督，常常助长了错误，另方面每来一次民主都要发生许多偏差，故建设经常性的、正常性的民主非常必要，军委提出组织士兵委员会很好，除执行外并有两点建议：

一、士兵委员会名义，因易误解为士兵对付干部的一种组织，许多士兵名词为战士所不欢迎，以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较好。

二、因干部民主作风未很好养成，且能力经验较差，部队中俘虏成分太多，又在残酷的战争情况下，故对其具体权利开始稍加约束，加强民主教育，视上述情况改变逐渐放手等语。中央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在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的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左的倾向加以防止。但一般的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有领导的、有计划的、有秩序的在进行。为巩固和发展这一成绩，现在确定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那就是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就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法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除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政策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多方试行这一组织，并派出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部队中的成分，俘虏兵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与弱，党的支部健全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或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出其

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已所遇到的实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强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华东军区政治部
新式整军运动的几个基本经验*

（一九四八年）

（一）新式整军运动不仅是有领导有秩序的，而且还应该是有准备有分别的民主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与内容，总的方面（基本的）即是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来加强党与无产阶级对于部队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与非组织观念的思想意识，扩大党内军内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培养工农骨干，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成份，树立正派的作风——即从实际出发与联系群众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民主作风——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偏向，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纯洁性，借以巩固与提高部队的觉悟程度及战斗力量。

但在这个总目的总内容之下，还应该按照各个部队的具体情况（内部情况与外部情况）、具体任务，提出本部队所必须的和可能的一定时间内的整军目的和内容，力求明确而具体。并须分清阶段，确定步骤（如在思想、组织、作风上应依据具体情况确定一定的重点，依据不同的时间及任务确定一定的要求）。再根据这种整军的具体目的与要求，确定一定的形式（如几查、几整或几评等）。如果不是这样，就会使运动失去明确的目标，不是要求过高，就是陷于盲目被动。

新式整军运动既然是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由认识到改造的具体过程，那就不能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应该是连续的、长期的建军和整军运动。不管这个运动采用何种方法方式。如果他的结果不是达到团结内部、改善领导、加强战力、发展生产与提高技术，那必然是有害的与错误的，应当力求避免。

（二）实行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方法是发扬三大民主，走群众路线，并贯穿着阶级教育的基本内容，使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与群众性的阶级自觉运动密切结合。发扬政治民主，扫清旧社会所给予的愚昧错误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及作风；发扬经济民主，扫清一切贪污浪费及保证改善部队生活；发扬军事民主，扫清军阀残余、教条主义残余、及经验主义的倾向，保证军政工作及技术的提高。实行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掌握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由下而上的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因为这是一切团结进步的原动力。同时，应着重从领导上解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为领导上健全与否，对整个工作有决定影响；而思想则是指导行动的，在思想保证、组织保证、纪律保证这三项密切结合的方法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是打通思想为主。民主的根本问题，乃是思想作风问题。三大民主不过是这种思想作风在政治、军

* 这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在华东军区政工大会上关于三查三整运动的总结报告。

事、经济三方面的具体表现；所以从领导上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乃是发扬三大民主的关键，也是测验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的重要标准。

为什么要强调发扬三大民主？本来我们革命军队中一贯是有民主的传统的，例如官兵平等、阶级友爱，以德、才、资为基准的干部政策等，这和反革命的军队是有原则上的区别。但由于军队中成份有部分的不纯，又受到旧社会封建统治及旧军队的影响，加以长期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与农村分散分割环境，因而免不了有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甚至滋长着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恶劣倾向。这就是我们在整军运动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民主运动的缘故。

但民主运动当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不能破坏集中，特别是军队要有更高度的集中，故民主运动必须在集中指导下去进行，这种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反过来就更能有助于正确的集中。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由下而上的互相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发扬这种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运动的具体道路。这里重要的就是干部应把自己放到群众运动中去，并且站在运动前面，去正确领导，而不应站在运动外面或后面，对运动采取旁观的态度或表现落后，形成不是矛盾统一而是矛盾破裂的现象。另外应发挥党委支部对运动的领导。过去民主运动中，有的党委对支部没有领导，有的支部对战士委员会完全没有领导，今后必须注意避免此种情况重复发生。

因此，从运动的过程来看，领导上最初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而在群众起来之后，又要预防可能产生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为了放手发动群众，一般应该首先打通干部思想，通过干部对群众进行思想动员，使大家明确地了解整军运动的目的、方针、任务、及必须注意的问题，并打破两种顾虑：一种是干部不习惯于高度发扬民主，害怕群众起来检讨，以为群众意见都是左的或偏差的；一种是战士不相信高度民主，害怕意见提太多了干部要报复，要给"穿小鞋"。必须强调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以防止右倾的偏向（不敢放手），又应该强调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以防止左的偏向。领导上一开始就要紧紧掌握情况，掌握积极分子，以便及时的防偏和纠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或者在群众发动之后采取放任自流，都是不好的。

（三）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时，领导上切戒犯急性病与公式主义的偏向，故应强调有准备有分别的进行。

所谓有准备，主要是说：如果领导上没有取得直接经验，或者部队觉悟程度不高，干部经验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应该首先从几个连队或团队做起，创造典型，然后波浪式的推广，不要一开始就普遍号召和发动，应当是重点掌握，全面照顾，未成熟的经验不要普遍介绍，更不要企图在短时间里，提出许多要求，否则就容易犯主观主义急性病。

所谓有分别，主要是说：应当从实际出发，避免一切形式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偏向。首先应区别军队与地方不同，切忌一般化机械搬用农村经验，其次应该区别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思想斗争与反特斗争），切忌两者混淆，造成群众性的逼供信。如发现有政治嫌疑分子，在没有确实证据之前，应当把问题约束在思想检讨的范畴，除特殊情况外，对有确实证据的政治嫌疑分子应当于运动大体结束或告一段落时，个别处理，或由专门机关处理。再则区别党内与党外，区别普通党员与干部党员，不可一律的以同一标准去要求政治锻炼程度不同的对象。又如有战斗考验的骨干，较健全的部队，与完全没经过战斗考验的，骨干不健全，政治水平低的部队，都应加以区别，前者着重提高，后者应重启发觉悟。应当通过各个部队的不同特点，来决定它们进行整军的具体要求和方式方法。主力部队应注意其集中性、纪律性、

战斗性（特别要掌握情况，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最必要的工作）；地方武装应注意其地方性及由农村反映的封建性、落后性（一般民主性要大些，方式要更群众化些，教育启发时间要长些）；基干兵团则要注意到他处于主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许多特点（一般教育时间也应长些，但对其纪律、制度等要求比对地方武装可以高些）；机关单位则应注意结合经常业务；工厂、医院等则应注意结合生产与提高技术等问题。

因此新式整军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可以因时因地因情而有不同，在查思想、查组织、查工作的总范围内，一般说查思想时应结合查入党动机或入伍动机。查组织时包括评定（或修正）社会成分、评定或修正革命军人成分，查工作（作风）应着重联系战斗、生产、业务。根据具体情况，未经过三查三整的应该进行三查三整（也可以把查组织——成份历史——包括在查思想找社会根源中，而不单独成为一查），已经过三查三整的部队则应着重巩固提高，并赋以新的形式，如山东兵团的三查四评（评技术、评勇气、评指挥、评纪律）及苏北兵团的民主推荐干部等都可。

（四）连队的整军运动有着特别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它是整个运动的基础，领导上应给以极大的注意。连队查整的规律（指未曾正式经过查整的部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为准备阶段（或酝酿阶段），包括了解情况，拟定计划，及思想、组织、领导下的各种准备工作，访苦与准备诉苦等。第二为阶级教育阶段，包括引苦诉苦、追根，或论战算账。第三为三查阶段，包括查思想，评成份，查工作。第四为三整阶段，包括通过鉴定，确定努力方向，整顿组织及工作，进行工作或战斗的准备等。

诉苦教育是最生动活泼与最有实际意义的革命的阶级教育。例如：比光景的方式，暴露旧社会地主阶级及旧军队军阀统治方式的一切罪恶，大大启发了指战员的阶级同情心（但不一般的去比，而须选择一定条件，选择乡村典型地富与雇贫对比最好）；算旧账的方式，对每个指战员证明被压迫被剥削的铁的事实，大大激发了部队的阶级仇恨心；论苦追根的方式，从政治上划清了阶级界线，使阶级立场、革命意志更为明确坚定。诉苦过程一般可能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引苦（有的叫思想论战），即从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以至技术上引起苦的感觉，接触到苦的深处，以至情不自禁的掉下泪来。第二步是诉苦，即依情况的发展，组织一定形式的集体诉苦（班、排、连最好是班、排为单位），准备典型或在自愿的原则下由干部带头先诉，或军民同诉，都有推动作用。第三步是论苦追根（有的叫算账），追究苦从何来？仇人是谁？或算租佃、雇佣、高利贷三种剥削账（中农算负担特殊、天灾、生活对比）。这三个步骤一般都是不可缺少的，至于由思想论战到诉苦到算账，仅仅在开始的形式不同。而其内在的规律性则一样，譬如争论“谁养活谁？”“世界上什么最贵？”“扛活的能不能扛富？”“穷人怎样穷？富人怎样富？”其归宿自然还是比光景，这种同一过程的不同形式，可以依具体情况采用。譬如：渤海县区武装开始由于历次以诉苦为升级参军打仗的动员方式，引起战士讨厌诉苦，因而采取思想论战的新方式，即是一例。而三个步骤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追根，这是由经济的认识提到政治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更高级阶段，直至联系到当前的战斗任务等，追根越深收效越大。诉苦运动应该包括各种成份在内，包括干部在内，但须根据完全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能强迫命令。由诉苦追根转入三查时，可依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简短政策学习（土地法大纲，入伍动机等）。这个运动的一般偏向是犯有严重的形式主义与公式主义甚至掺杂许多封建迷信的与宿命论的成分，这是一种倒退的落后的与反动的消极因素，应当极力避免发生。

（五）干部查整的启发，一为学文件，二为听报告，三为参加诉苦。前两者是在思想理论上启发，而后者则参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启发。许多干部脱离生产太久，更由于他出身非无产阶级，因而对工农痛苦体验不深，应有组织的参加到战士勤务人员的诉苦运动中去。如果从查工作开始，即应根据当时需要，联系文件学习，由具体提高到原则，由盲目提高到自觉，在查整中应有同级不断帮助，上级随时启示配合群众的推动，单纯群众压力与组织压力都将增加干部的思想负担。干部查整一般的放在工作岗位上进行较为适宜，便于更好连系实际，取得群众帮助；仅仅在必要时才调去学校，或组织轮训。干部轮训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应普遍采用，必须记住，干部的查整应当是以放下思想包袱（对工作、对成份、对组织、对历史等）开动机器，提高工作效能为目的，而不是相反。如果查整结果是增加干部思想包袱（个别坚持错误者例外，那就不是运动的成功，而是运动的失败（恶果）。

在查整时不仅查坏处查缺点，同时还要查好处查优点，使每个人的优缺点都能得到群众与组织的公正评定。

（六）在查思想查工作后，对于查的过程中所表露出来的思想问题，组织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应尽可能做出正确的总结，借以教育提高领导干部和群众。同时，查整之后，应逐步树立各种民主集中的制度及规则，使全体指战员养成一种良好的民主习惯与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有的部队不注意从组织上来巩固整军的成果，三查中已产生极端民主化倾向，三查后又回到民主不足的老样子，这是应引为殷鉴的。

连队战委会（军人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形式，对于发扬三大民主起了积极作用，应当成为连队经常的主要的群众组织，但过去战委会超支部或超行政的倾向必须纠正，应当在支部与行政首长领导下来进行民主活动与经常工作。在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部分，战委会开始的权利可以扩大一些，并主要以战士参加，但当民主已经发扬，倾向已相当克服时，则战委会应有连排干部（少于战士）参加。一般在诉苦中成立的学委会或诉苦委员会，三查中可改造转变为战委会。

连队班排干部的提升，在审查后也可树立民主推荐的制度（如二纵四师及华中二分区），即可经过军人委员会推荐，建议，同时结合由上而下的审查，通过上两级组织最后核定。过去渤海的“量”干部方法，有消极的反作用，一般不采用。

至于家庭成份的标准，应以中央公布的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及任弼时同志报告为基准。

（七）整党与整顿组织的重要内容是审查和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党委、支委），是审查与改进党委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是审查与鉴定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情况与工作表现（是否联系群众？是否够一个共产党员条件？），从而发展党的组织或个别洗刷不够党员条件而又无改造可能的分子，以加强党对群众的联系。是从运动中不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并依实际情况作必要的合理的组织调整，但这项工作的进行，除了一般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而外，还应特别注意区别党内与党外，区别干部与党员，区别党员与群众，提出不同要求与不同方式，一般应该由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由领导到群众，并使两者同时结合起来，例如九纵先纵委而后师委，吸收下级党委参加，这种做法比较好的。查党应该先查支委领导，以至各个委员，在党员大会上报告工作自我检讨，由党员群众审查提意见。在审查党员时吸引群众参加，对每个党员可以自由批评提意见。但对党员的发展或处罚以及个别调整，必须通过支部审核及上级党委最后批准，否则就会陷于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干部的升降惩奖（主要班、排干部）也必须如此，即一方面由下而上实行群众性的评定与建议，同时又结合由上而下实行有组织的审查，并通过一定组织手续，作最后决定，而不能只有群众的意见，破坏党的组织原则。至于组织上调整应该着重积极方面的东西，即是培养与配备新的骨干核心分子，加强组织建设，个别洗刷与处罚是运动的结果，不能以调整组织代替思想教育，更不能以个人好恶决定组织调整，反对任何不尊重组织原则及在组织问题上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偏向（如胶东个别地区的某些县分，不经过三查三整而调整组织后，得的结果很坏）。

1

新式整军初步总结

（一九四八年）

总 政 治 部

最近几个月来，人民解放军的所有部队都先后利用战争间隙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在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及部队支部的领导下，普遍进行了学习土改政策、诉苦、三查的阶级教育及改造支部，评党员、评干部等民主运动，同时按照战争实际情况采取官兵互教、新老战士互教等方法，进行技术和战术的训练。

这种整军的必要，是因为我军转入进攻的战争形势及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运动的发展，要求军队必须更加英勇作战与更好的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为此，就必须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加强军事知识和技术的训练。同时还因为个别人员在战争形势发展及土改、整党运动中，表现了严重的地主富农思想，以及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等恶劣作风。均有影响于我党政策的执行和损害着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

部队经过整军之后，干部积极深入连队为战士服务，已成普遍风气。很多解放战士也认清了自己阶级地位，懂得现在是为自己阶级而战，因而打破从旧军队带来的雇佣思想，并有很多提出要求入党。西北部队解放宜川之战，大雪无粮，仍保持良好纪律。华东部队向胶济线出击，连续七天行军仍乘夜冒雨前进，而无怨言，并冒雨攻城，仅数十分钟就解决战斗。东北部队冒零下卅度奇寒，连续作战三个月，士气始终高涨。从这些表现可以看出，部队经过整军运动之后，不仅阶级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而且在干部作风的改变、不良倾向的克服以及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

这样的整军较过去的整训，收获更大，已经是各部队一致反映，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样的整军的方法，和过去不同，毛主席这样指出："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他把这样整军运动称做"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整军运动"。如果需要对这种整军运动加以总结的话，那末这就是最基本的总结。

首先，这一总结告诉我们，指导一个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必须领导与群众结合，然后，运动才能按正确方向进行。在整军运动初期，虽个别发生过放松领导作用而尾随群众偏左情绪倾向，以为不如此就不民主，致个别连队机械仿效农村土改斗争，建立贫雇农组织，搬连队石头等不适当做法。同时发生的另一种偏向，则又是怕揭露自己缺点、错误或是怕群众起来不好掌握，因而不敢采用民主方法，使运动缺乏生气。这都是由于缺乏运用民主的集中制的原则去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不了解部队实行民主，应该是在部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及连队支部领导下，在平时工作及作战前后的战斗准备与战斗检查中，采取民主方法，将

领导思想变为群众思想，集中群众的智慧及启发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既需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要防止民主运动中可能发生的极端民主的倾向以及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整军方法是任何旧军队所不敢实行的，因为他们害怕士兵觉悟，害怕士兵知道他们的罪恶，他们训练士兵是采取欺骗和强迫的方法，在人民的军队里是反对这样做法的。人民解放军的方法是启发战士自觉、自动不怕在战士面前揭发错误，这给解放战士以很大的感动，他们有的表示说："要是在国民党军队那边，他们那样多的丑事，是不敢让大家来批评的"。这种民主制度之施行于军队，不仅使解放战士得到迅速改造，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并且是破坏中国封建的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这一真理，是早为我军建军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其次，这一总结说明，这种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整军，乃是人民解放军长期经验积累与发展的成果，为任何古典军事学说所没有，因而它是一种新式的整军方法。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具体的体现。

这种新式的整军方法，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完全不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拘泥于旧的陈规、习惯，假拟情况与死板说教因而完全脱离实际。这种坏的作法，在抗战初期给了我们军事政治教育以某种程度的影响，其后，经过整顿三风，尤其是从西北留守兵团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小册子发表以来，受了批判，而代替它以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方针，使我军政治军事的训练工作，不但保持了历史的优良传统，而且日益完善的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和方法，在政治训练上从英模运动、拥政爱民、尊干爱兵等，到互助立功，诉苦复仇，和三查运动等创造，尤其是有领导有秩序地民主批评制度的建立、公开党的支部及士兵委员会为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等，都标志着我军政治训练制度和方法的更加完善，在军事训练上，从官兵互教到实际战斗前后大家想办法，群众性的战评，以及按实际战争需要，边打边练，同样标志着我军军事训练制度和方法的更加完善。

对于这种民主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方法，各部队都认为收效很好并均拟继续深入进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还应指出，很多整军运动中所产生的经验，经过整军实践的普遍证明其正确有效者，则应形成制度坚持下去。但如果将仅限于一定的情形下适用的东西而盲目的搬用，这是经验主义的作法，需要避免。

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邓　小　平

（一）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

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问题，同志们要看看"七大"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那上面连带兵练兵等问题说的都很详细，我这里只提主要的谈一下。

建军原则第一个是军内关系，就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外关系，就是军民一致，这是每个人必须做到的两条。

军内关系，为什么要官兵一致？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建筑在阶级本质上的，所有的人，都是为着一个政治任务、都是自觉的来革命的，利害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人格上，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尽管工作上有上下级的区别，但另一方面又都是同志关系，同样的光荣。所以反对把我们的战士降低到一个单纯的人，降低到军阀部队的一个兵的地位，单纯的使用他，当成驱使的对象。但是我们确实有些同志不去关心战士，打呀！骂呀！侮辱他们，这样便模糊了战士对自己是人民军队主人翁的观念，模糊了自己对人民军队也要负责的观念，战士便不会发挥高度的积极性，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提高觉悟性。有些人认为干部只要有本事就可能解决问题，就可管军队，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做好官兵一致，首先要人人思想上认清以上几点，特别是干部，不但自己要执行，同时还启发战士去发挥积极性，大胆对军队负责，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来当军队的主人，只要战士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并认真执行起来，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军外关系上，就是军民一致，军队和人民，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不管你官大小，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个公民，比起老百姓来，权利并不大的，政治地位并不高的。我们要做到人民同我们一块反对蒋介石，就必须树立军民一致的思想，军民政治上一律平等的思想，那样便不犯军阀主义了，不犯群众纪律了。

只要认真执行了以上两条，我们的力量就会大的无比，有了任何困难，依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都是会逐渐解决的。

（二）三大民主问题：

要做好官兵一致，必须走群众路线，也就是要实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

济民主），这点军委、总政治部通令全军都得很好运用执行。

政治民主就是政治上官兵一律平等，每个战士每个革命军人，都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都有保障和关心党的政策的权利，都有对打仗、工作等负责的权利，都有批评一切违犯纪律的权利，都有批评上级的权利，只不过是在一定的会议上进行，不准随便乱讲。还应指出，如果战士不敢批评干部，并不是政治健康的表现。在党的问题上，党员应成为群众公认的，党员要在群众中公开，要经过群众的审核，不准开秘密会，一般的会议要吸收群众参加。

经济民主，就是连队的一切开支，凡是按照规定属于战士享受范围的，均应由战士全权管理，他们可以讨论改善生活，可以分伙食尾子。

军事民主，主要是对于军事有提出意见的权利。如战前，战中想办法会，战后评定伤亡、评定指挥、评定战术、检讨战斗等，凡是这样办的，都会得到极大的效果。另外一面是战士对于连、排、班干部，有批评的权利，有提出意见的权利，但只准在一定的会议上，不能乱讲，有直接越级向上级提出意见的权利，有提议推荐或撤换干部的权利，但批准权仍归一定的组织。这样一来，有的人可能以为有些战士会胡来一气的，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战士的眼睛是亮的，是很爱护他的干部的，你有了毛病，只要改了战士还是拥护的。

三大民主必须执行，全军都要做，毛主席已经规定了，思想上要打通，组织上要做。但是有障碍，障碍就是干部，对执行三大民主有的干部积极抵抗，有的消极抵抗，都是不对的。有的以为实行三大民主就没法子管了，没法指挥了，或者自己一点也不管了，完全交给战士管，当他们管的稍有点毛病时，便回头来说："民主还是不行吧！"等等风凉话，都是不对的。还有的形式主义，光摆个样子，要纠正要防止。我们说关心部队爱护战士的人是不害怕的，凡是怕执行的或抵抗执行的都是有毛病的人，如军阀主义、喝兵血等。而实际执行起来的结果，管理上方便了，指挥上容易了，因为人人都自觉了，同时还帮助了干部接近了群众，提高了一步，对干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为了今后战士们能够负责，能够维护与执行政策，今后所有政策、法令、指示、工作等都必须向战士讲，不然便无法提高其觉悟性去积极负责任。

（三）支部工作：

支部是一切领导的核心，三大民主做的好不好，决定于支部工作好不好。过去我们工作缺乏经常性，工作不踏实，就是支部工作没做好，今后要长期的做好，只要有一天军队，就要有一天支部工作。要使支部工作成为有生命的，而不是僵硬的，就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反对庸俗的自由主义。在工作上，在执行三大民主上，不能分这是连长的事，那是指导员的事，应当是共同的事，共产党的事，革命的事。

（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建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把军队的三大任务，集中了一下，能够适合每个军人都能做到和必须做到，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成为不

拿人民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成为一切缴获都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到八项注意中去，如对人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公平是工商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所以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只看成是群纪问题，应知道，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够了格，只靠冲两个锋，是不够格的。要做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不容易的。以后要恢复老章程，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要有专人管理这事，只要这事办好了，力量就是无穷的。大别山有个地区，二十多年来反对我们，反攻后第一次去他们跑了，但我军纪律很好，东西一概没动，打扫了清洁，第二次我们去，老百姓就不跑了，他们说："知道您这样好，我们还跑干什么？"所以我们应反省在大别山时的纪律，那里群众对我们最痛恨的就是抛撒米、抛谷草，到处屙屎，还有我们好住内房，把人家的马桶弄出去，使得女人有的跑出四五里路找隐蔽的地方解手，大家想这是多么不好啊！

（五）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有个别单位，军政关系很不好，你争一点权我争一点权，还有的分赃不均闹无原则的纠纷，都是不对的，都是不了解建军原则中的军政一致。我们的任务是一个，方针是一个，工作计划是一个，必须在一个工作计划下面一齐努力，上下一齐努力，官兵一齐努力，绝不许各自为政、闹关系。

（六）领导问题：

领导有三条（特别是高一点的干部，连干也是一样）：一是掌握原则，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检查。

掌握原则就是根据建军原则，党的政策，具体任务来进行工作，要掌握中心，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时刻不能忘记，要军政一致，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学习形势、学习政策、方针，反对庸俗的自由主义，反对光管油、盐、柴、米、酱、醋、茶的事务主义。当然一点不管油、盐、柴、米、酱、醋、茶也是不对。

根据原则确定了工作计划，就要走群众路线去执行，真正聪明的是群众，执行当中要及时检查，了解运动的发展，进一步的把运动深入提高，必须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关于干部政策，领导上对干部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干部认真的批评，才能帮助干部进步，才是真正的温暖。所以要按党性标准来认识干部，选择干部，那种不注重批评的庸俗的自由主义，不能帮助干部进步，反而害了干部，不管出身怎样，只要入了党，就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提拔干部的标准德是第一，就是原则性和阶级性，才、资是次要的，这点必须明确，只有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是真正的温暖。

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

（一九四八年四月）

邓 小 平

（一）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到三月底已经进行了一年又九个月了，在这期间已歼敌二百一十五万人，而我军力量则比战争开始时扩大了一倍，敌我力量的对比，在质量上不用说我们已超过了敌人，在数量上经过一定时间，就要达到敌我平衡，这说明了大反攻形势已使中国革命追近了全国范围的胜利。所谓追近胜利，不是明天就胜利，不是可以坐待胜利，而是要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的。任弼时同志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在三五年内革命就可能在全国胜利。"四万万五千万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革命胜利了，就等于世界革命大部分胜利了。三五年内可能解决中国全部问题，世界大部问题，这是多末幸福，意义多末重大的事情。

形势与人民觉悟是具备了，但是要加上一条全党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策略。即是有了胜利的局面，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革命还是要失败的，毛主席规定战争、土改、整党、杀人、工商政策五个问题上不犯错误，就能很快胜利；搞错了，或其中任何一个搞错了，就会使革命失败，或者延缓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央号召我们，不仅要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而且要正确的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政策策略，路线是空洞的。这一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负的责任越大就越有认识的必要，越是领导机关，就越不能粗心大意。

（二）

但事实上，在执行时，却往往忽视了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这是和目前胜利局面相连的。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教导我们：当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容易犯右，当我们和国民党分裂时又容易犯左。我们所亲身体验到的，在抗日时期到困难的时候，就用心去钻研政策策略，如革命两面派政策，而一到和平时期就把政策策略忘了。这不仅中下级干部、党员如此，就是我们领导同志也搞忘了。现在当我们追近胜利的时候，又不讲究政策策略了，只记得中央路线的几个口号，不去好好体会路线下面的政策和策略，把新华社广播的东西当作是对国民党区宣传的，不当作是对我们指示，与我无关，甚至糊涂到把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都当作是对外宣传的，认为自己还有一套，不懂得

我们共产党是表里一致的，能做的就能说，能说的就能做。比如秘密杀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怯弱，是对自己的事业表示没有信心而已。既然可杀，又为什么不能公布呢？

今天是胜利的局面，是追近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局面，主要是左的错误，不讲政策策略叫左，而忘了那条路线则叫右。在前一阶段，指出土地问题上的偏向是右，这是对的，今天大家都赞成"土地改革"四个大字了，极大部分的党员都诚心想把土地改革干好，问题就在于纠正具体执行政策策略中左的偏向了。左的偏向表现在多方面，如在土改中侵犯中农；侵犯自由资产阶级；对地、富无区别，对大、中、小地主一律看待，一律扫地出门；斗争中乱打乱杀；甚至对开明绅士也要取消，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抱绝对态度；在新区不估计到斗争环境，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工作步骤犯急性病；还有在职工运动中劳资两利的政策未执行等都犯了不少错误。

（三）

但反对左的偏向，这不是说要把土地改革放在一边，另外搞一套政策策略，而是正确执行土地改革这条路线下面的政策策略，土地改革不但不能动摇，而且要加速把它完成。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有土改的老区，土改是三五年取得胜利的主要保障，新民主主义胜利的标帜，就是反帝（解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反封建（解放生产力，给资本主义生产开辟道路）的成功。左为什么使土改不能实现？如犯急性病，侵犯中农，一次打光，不听群众意见，单从命令任务出发，以及杀人过多，把人吓跑，甚至基本群众跟地富一起拿起枪来反对我们。如工商政策，乱没收，结果凡是我们控制的地区，几乎全部商业关门，工业停止而对外交流不易，人民生活困难，自己造成封锁，象大别山锅厂普遍停顿，人民原有的生活都取消了，土改还干什么？这样下去，军队即无法维持，人民就不跟我们走。

什么叫策略？毛主席指出十六个字叫"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土改中的多数，是百分之九十（包括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加百分之二十的中农）的力量，路线叫依靠贫雇，巩固的联合中农，这是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我们的政策策略标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赞成，利用地富中间的矛盾，分化地主阶级，使他们一部分中立，争取知识分子等都是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策略的精神，但一切策略的出发点是为着便利于动员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群众障碍更少，群众觉悟更易提高，更好的迅速完成土改。百分之九十是基本因素，对地富中立一部，打击最坏一个，达到击破目的。不要听到策略就忽视出发点，为了后者就忘了策略。真正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再犯错误。

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但为许多党委所忽视，许多行动都带着盲目性，致使革命遭受损失，经过中央天天的喊，现在开始警觉到了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必须警觉起来，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

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

为了更加有利于革命战争向南发展和华北解放区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节约支　起见。中央及军委在与中工委会合后，特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其管辖境地，并决定人选，通知如下：

（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皖苏解放区改隶于中原解放区。原属太岳区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州以及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属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华北与晋绥两解放区关于上述各县的划分及移交的日期，应自行商定，报告中央核准。

（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峰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

（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以徐向前兼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委，调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以杨得志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

（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

（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

（六）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

（七）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八）中央已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消。

中　央　军　委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月）

毛 泽 东

一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六月三日）

二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地，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八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来电《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上写的一段批语；第二部分是他在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加写的一段话。

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

刘少奇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天。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与后退，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与后退。中国共产党前进了，那么中国也就前进，中国历史也就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后退了，大概中国是不会好的，也是要后退的。所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现代史。我们的干部，如何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了解我们党的历史，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研究与了解我们党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间成立，到一九四八年的今天，已经整整二十七年。这中间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开的，所以我们就以七月一日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在那时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仍在党内并健在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董老。那次会一共有十二个代表，也就只有你们前面这一排这样多，（笑声）讲起来是那样的重要，小的却是那么可怜。在上海的一个地方开会，开了几天，消息泄漏了，迁到了浙江的嘉兴，在一个船上把会开完，通过了一个党纲，选举了中央机构。

为什么那时那样一个小的团体，小的组织，在二十七年以后的现在，时间并不是很长，就有这样大的发展呢？为什么从此以后就在中国闹得天翻地覆，跟孙悟空差不多，拳打脚踢，天上地下，到处都有他，什么事情他都要过问呢？照最近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我们党已经有三百万党员了；有个别地方的数目字还没有收到，所以恐怕比三百万还要多。现在想一想，我们共产党为什么迟也不产生，早也不产生，恰恰产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七月？而产生了以后又有这样大的发展？

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待说大家都是了解的。它的产生，有各方面的客观的条件，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期，要产生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产生。其原因就是：近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发展成了帝国主义，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发生了，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民族问题提出了新的问题，民族问题变了性质。当时中国旧的民族问题，是清朝

统治着，但是，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民族问题就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提出了新的问题，产生了中国新的民族运动——鸦片战争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我在小学时教员也讲，现在的民族问题与以前不同，现在外族侵略就要亡国灭种。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有民族革命运动，而且一直搞到现在，我们党也搞了二十七年，今天才算基本上成功，不过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这样一个民族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经过了七、八十年。在我们党产生的前夜，有一个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时中国的情况、条件和环境。

帝国主义到中国来，一方面是侵略中国，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他要侵略中国，就要带机器来，也就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开始时，帝国主义自己搞一些机器，搞一些工厂，后来中国人也就学着办，也来办工厂，这样就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有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就跟着发生出来。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也就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发展了，无产阶级也发展了。既然有了无产阶级，就有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工人运动。因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就给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据一个材料说，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中国的近代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国家比较起来，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集中。中国工业是集中在几个地方发展的，其中上海的工业产值就占了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上海的中外工厂，共是五十一家，工人六万一千多人。而到一九二〇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上海的工厂就发展到了二百零四家，十六万多工人，工厂数目发展了四倍，工人发展了两倍半。中国人办的工厂在一九一一年是三十六家，工人两万一千名，到一九二〇年，发展到了十万零五千人，发展了四、五倍。一九一一年外资工厂有十五家，到一九二〇年发展到了十八家，工人由四万多人发展到五万四千多人。以上海为例，可以想见那时新式的工业工厂有很大的发展。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这一个时期有几倍的提高。据估计，一九二七年上海五百工人以上的工厂（五百工人以上的就是大工厂）的工人，占全上海工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工人大部分是在大工厂里头做工。就是中国人办的也是大工厂多，占工人的百分之四十五。那时上海工人总起来是二十几万人，大部分在大工厂里头做工。中国工业集中的程度是很高的。《联共党史》上讲，苏联共产党产生时，俄国资本主义很集中，工人百分之五十四在大工厂里头做工。我们可以说，中国新式工业也是比较集中的。

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就有工人运动。有一个材料说，在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全国就发生了二十五次罢工，有些罢工没有罢工人数统计，有人数统计的是十二次，参加的人数有六千四百多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发生了六十六次罢工，其中有二十二次是可以考查的，参加的人数是九万六千五百多人。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发生了六十四次罢工，其中可以考查的十九次，参加的人数四万六千多人。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那一年，发生了四十九次罢工，其中可以考查的二十二次，参加的人数是十万八千多人。所以在那时就有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已经为自身的利益而起来斗争。而且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特点，它与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更加强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不论在政治

方面也好，其它方面也好，特别是它的战斗性，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资产阶级有软弱性，无产阶级就没有软弱性这个缺点。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很多工厂，其中也有工人，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不但数量大，而且受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所以它斗争起来更坚决。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力量强，也比较集中，再加以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它就能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无产阶级的产生，产生了工人运动，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那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那时成立的小组，是几个人、十几个人那样的组织）。开始是带研究性质的，到后来才联合起来成立共产党。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那天起，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完全解放而奋斗，而且前途远大、目标远大，一直要达到共产主义。那时虽然党员数量很少，可是信心很大。谁能有什么办法使它不成立呢？没有办法。开始有很多人反对成立共产党，想阻止，想破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各派社会主义都来了，我就看过各派社会主义的书。在最初一个时候，无政府主义受到欢迎，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很多人相信无政府主义，以为痛快得很，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长时期的辩论，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就进行辩论，在共产党成立后，又进行辩论，陈独秀在这方面就写过好几篇文章。结果把无政府主义驳倒了，把其他各派社会主义思想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站稳了脚，在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界里边有了它的地位。在那时有很多人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他们把我们叫“马子、马孙”，见了就骂，就要斗争。在学生中，工人中，群众中，彼此要骂，要打架的。思想上经过斗争，组织上也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先进革命思想界中争取到了领先的地位，然后共产党才有产生的可能。当时有许多种思想要阻止共产党成立，不许它产生。就是在革命队伍里边也有，但它还是产生了。至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军阀更不用说了，它们更加反对共产党，并且要进行“讨赤”。所以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根据的，是由各方面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

从第一次大会开过后，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工作，开始建党、办报纸、作宣传。在湖南长沙有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北京等地有其他同志。他们开始建党的组织工作，并且作工人运动。

中国在共产党宣告成立前，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是在一九二〇年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二一年才入党的。我是在党没有成立以前由青年团送到苏联的。我跟任弼时一路，一九二一年春天到了海参崴（那时占据海参崴的是日本兵、俄国的白党）。从那里坐火车到莫

斯科整整走了三个月。（笑声）在火车上，没有煤炭烧，就烧木炭，没有了木炭，还要坐火车的人到山上去背，背回来以后才能开动火车（笑声）。一九二一年夏天（七月），共产国际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住在共产国际的寄宿舍。那时莫斯科办了一个东方大学，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是头一班。出国以前，在上海办俄文学校，让学生先初步学会俄文。我出国以前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几个地方有了共产党小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党刊就叫《共产党》，以后才出版《向导》。所以共产党一开始筹建就作了许多方面的工作。

党在一九二二年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时有些同志从莫斯科回来了。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取回来了。当时在苏学习很不容易，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的俄文，蹩脚得很，翻译也蹩脚得很。瞿秋白和另一个同志当翻译，但他们的翻译不大好懂。товарищ到底翻译什么好？到底翻"伙计"好呢？还是翻"扛货物的人"好？（中国人将扛货的人叫码头工人）我们初到莫斯科时，看到卢布票子上有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各国的文字都有，中国文字是华侨翻译的，"无产阶级"不晓得翻什么好，他把这句口号翻成中国的成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笑声）"全世界"译成"四海之内"，"无产阶级"不晓得翻，"联合起来"译成"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大家团结的意思，还不错。（笑声）那时，"同志"、"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这些名词都没有，都还在考虑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笑声），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的很深。工人阶级、工人运动是基础，不能离开工人阶级，简单的名词学了一点。那时候从外国、从欧洲、从苏联来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译成中文的也较多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我们党的宣言，那上边"帝国主义"也有，"封建势力"也有，"资产阶级"也有。在第二次大会通过了党章，又通过宣言，在宣言上提出了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要求建立独立的党，这些基本方向，在那时就有了。

我们党开始产生时是在学生中、知识分子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党组织，但是如果不跟工人运动结合，不跟中国劳动群众结合，那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不能算是在中国真正地生了根。虽然产生了这个组织，但如果根没有扎到土里去，幼芽就不能成长，和我们在房子里水盆中培养大蒜一样，那样的大蒜是不能成长发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所以列宁讲：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就成为共产党（那时讲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就叫社会民主党）。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劳动人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做了很多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翻译来的，"劳动组合"就是工会，日本叫劳动组合，书记部不晓得是那国的。照我们现在的翻译就是工会办事处）。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有，北京有，汉口有，长沙有，广州也有。有些同志，有些党员，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都是为了学习，我那时也是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是张国焘，里边还有李立三、邓仲夏等。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就在工人中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后来又办工人俱乐部，玩一玩，唱一唱，再去组织工人，鼓动工人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罢工胜利，罢工委员会就变成了工会。

共产党开始产生时，有些统治阶级的人物糊里糊涂，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们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学校，呈请立案，请求批准，官厅都批准了。我们的口号是"提高工人的知识，

培养工人的德性”，办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他还不批准？统统的批准了。办了没有半年，工人一组织起来，马克思主义一宣传，罢工一宣传，工人很欢迎，结果工人就罢起工来。罢工很有组织，工人斗争是很英勇的。那时反动政府慌里慌张，莫明其妙：为什么工人罢工这样有组织？这样有纪律？搞得他们毫无办法，那时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头一个浪潮。比如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二年在京汉路组织罢工，要求十二月过年发双薪，斗争胜利。工人说：这是共产党给争来的，十二月份发两个月的工资。一九二二年有九十几次罢工，参加的工人有几十万，罢工胜利后就组织工会，所以那时工会中有几十万会员。有铁路工会、矿山工会、海员工会，大城市里边差不多都有工会。湖南有全省的工团联合会，湖北也有全省的工会联合会。所以一九二二年前，在全国就有空前的罢工浪潮，一九二二年后，共产党跟工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很多工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党就有了群众。

许多罢工都是胜利的，但是外国企业里边的罢工是失败的。唐山罢工最激烈，也得到了胜利，但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工人的经济要求是达到了，但工会始终没有成立。唐山的英国资本家不准成立工会。上海有些外国工厂资本家也不让成立工会。

从那时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走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即二七罢工），工人开会，吴佩孚用枪一打，全国的铁路工人都举行罢工表示抗议。后来罢工被压下去了。二七罢工虽然受了挫折，但是，意义很大。那时共产党那样小，从成立只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敢于与吴佩孚、与北洋军阀斗争。当时吴佩孚也装得好象看得起工人，他请工会的工人代表去谈话（罢工以前吴佩孚驻在洛阳），并且似乎谈的很好，他说：命令已经下了，不好收回。工人代表回来时，每个人还发给六十块钱的路费。人家那样客气，好象是拍工人的马屁，其实是麻痹工人，工人也不警惕。人家一方面那样客气，另一方面准备好镇压。那时的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财产，吴佩孚每年要抽八十万款子，工人罢工要求年终加钱，还不是拿吴佩孚腰包里的钱？不过，吴佩孚还没有能完全统治京汉铁路，段祺瑞还同他闹蹩扭。因为那时幼稚，不懂得。二月一日开成立大会，工人无论如何要开，吴佩孚无论如何不让开，所以就罢工，起来和军阀斗争。工人斗争很英勇，江岸工会的委员长林祥谦同志被吴佩孚抓去，让他下命令停止罢工，他不下命令，就砍了一刀，他还是不下命令，于是砍第二刀，他还是不下，于是砍第三刀，就这样把他杀死了。林祥谦，是我们党的党员，我们的同志。二七运动被压下去之后，汉口的铁路工会被封闭，律师施洋同志被捕，以后也被杀害。二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从此在全国，不论敌人也好，朋友也好，工人自己也好，都晓得了工人是有力量的，共产党是有力量的。我听到萧三同志讲（那时他在法国），法国的工人高兴地说：中国的苦力也起来了。法国工人还援助了中国罢工工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也援助过中国的二七运动的工人。

二七罢工被压下去以后，因为中国军阀中间有矛盾，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仍在发展。如满洲的张作霖，给罢工工人捐过好多钱。那时他反对吴佩孚，吴佩孚杀了工人，张作霖就来向工人讨好。连军阀也要讨好工人，这就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势力，以前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可见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用斗争赢得了自己的地位。这虽然是斗争的头一个回合，但它已打出名来了。以后孙中山也要找这个力量，因此，在这次斗争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正式形成了。在二七运动以前，孙中山还觉得共产党可以不要，可是

在二七运动以后，就不同了。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底一九二四年初，共产党就跟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形成了统一战线，从此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国共合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派了代表去参加（那时我们有许多同志参加国民党），跟孙中山共同制定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在共产党没有参加国民党以前，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死气沉沉，如果不跟我们合作，国民党是不可能发展的。同共产党一合作，国民党就生气勃勃，就有了新的生命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孙中山也可以看出来。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以后，搞得毫无办法，这表现了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软弱性。国民党一来内部分裂腐化，二来那样多的国民党员都做官去了，有些人转过来反对孙中山，孙中山被他的党员赶过好几次。所以那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他就不能提出明确的纲领。他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但是没有明确完备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国民党与群众的联系很薄弱，内部又那样不统一，不断地分裂。孙中山虽然搞过武装，但是也没有组织好自己的可靠的军队。同时他只讲军队的组织，根本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所以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纲领上、党的组织上与群众的联系上，以及各方面，在没有跟共产党合作以前，国民党都表现了他的软弱性，假如不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还能在中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来。譬如：国民党对五四运动所持的态度就是消极的，那样大的群众运动，国民党就同它结合不起来。国民党也不会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他虽有土地纲领，但没有实施这个纲领的具体办法。他跟共产党合作，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办法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有了，政治、军事、群众运动都有了办法。孙中山执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建立了黄埔军校，许多实际工作是共产党替他做的。黄埔军校的工作是谁做的呢？主要是共产党员做的。恩来同志一直在黄埔做工作，以后参加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政纲定不出来，军队也搞不成，跟共产党合作，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孙中山同共产党合作，使国民党得到了新的生命。

当然，我们党在这里边犯过错误，被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了。蒋介石也是共产党扶植起来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蒋介石能有什么力量呢？我们把蒋介石扶植起来了，结果他却反过来打我们。但是，蒋介石自从反共以后，他就走向灭亡了。虽然他靠帝国主义，靠封建势力，开始似乎有很大的力量，但那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他反对共产党，就决定了他最终必然要灭亡。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地位，是同共产党的帮助分不开的，是以共产党为灵魂、为中坚的，不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国共合作以后，当然，我们不只是吃了亏，而且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共合作以后，就有五卅运动，这是全国性的大运动，反帝高潮、反军阀的高潮，有了北伐战争，有了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五卅”以后，共产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个大革命差不多要达到胜利的时候，共产党被自己扶植起来的朋友出卖了，被国民党暗害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我们党从国共合作以后，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党的地位是提高了，力量扩大了。一九二七年，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已有五万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员只二百多，第三次四百多，第四次八百多），当时的成份大多数是工人，大部分是湖南、湖北、广东三个省的人。那时工会会员二百八十万，农会会员二千多万，农会力量最大的是湖南、湖北、广

东。那时我们也参加了军队、参加了政府。不过在军队里边大多数是做政治工作的，这是个缺点。做军事工作的只有叶挺等一些同志，那时叶挺同志当独立团长，后来当了师长。

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虽然力量很小，但很英勇，很能战斗，战斗性很强，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怕，藐视一切。帝国主义它不怕，人数少也敢反帝，要打倒帝国主义。那个时期我们的另一个口号是打倒军阀，军阀的力量虽然那样大，我们也要打倒它。没有那个人发言说军阀打不倒，或者说不要打，没有人脑子里边这样想。

那时虽然很勇敢，很能战斗，基本方针、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政治上很幼稚。我们对同盟者要阴谋玩诡计还看不清楚，同盟者打我们的主意，陷害我们，我们也不注意，也不警惕。陈独秀那个机会主义者，原则是非分不清楚。那时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了，党内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好，但是没有被党的领导所采纳，所以就来了个失败。那时这个幼稚很难免，因为党还没有经验。虽然当时革命失败了，党被打到地下去，工会搞垮了，农会搞垮了，党在许多地方的组织也搞垮了，很多人被捕、被杀，动摇分子大批地脱党。虽然经过这样的风波，但我们党还是坚持革命，坚定地打着革命的旗帜，没有投降，与群众结合着渡过这样的困难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党有什么危险呢？有这样两个危险：一个是党有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当时反动派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我们共产党，包括采取肉体消灭的方法。第二种危险是党内有分裂的危险。陈独秀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旧的领袖推翻了，新的领袖没有培养起来，新的方针、正确的路线没有完全形成，有不少的野心分子企图分裂我们党，党内党外的敌人都企图消灭我们。十年内战时期，基本上是我们党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群众密切地联系，开始与工人联系，后来与农民联系，并开始组织武装队伍，组织红军，搞苏维埃，与农民与武装密切结合，这样就坚持了革命的旗帜，避免了被消灭与被分裂的危险。避免了这两个危险就是我们党的很大的胜利，我们党没有被消灭和被分裂，党还是统一的党。到抗战爆发时形势起了变化，渡过了反动时期。

《联共党史》上讲，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二年七年的反动黑暗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投降，没有扔下革命的旗帜。《联共党史》上有这样两句话："我们渡过了黑暗时期，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旗帜，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组织。"这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情形。我们中国党也渡过了反动时期，而且比俄国遇到的压迫、黑暗更厉害，时间更长，到了一二九运动起来，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新的革命高潮起来后，我们党的情形怎样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保存了革命的旗帜，渡过了十年反动时期，一个危险时期，我们没有放弃革命的旗帜，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组织。因此，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人不相信共产党是抗战到底的。保存了革命的旗帜，而且也保存了革命的组织，还保存了党中央。当时俄国的中央搬到了外国，我们的中央没有出国，而是上了山，过了雪山草地就是了。我们还保存了大批的中坚干部，而且保存了革命的军队——红军。这支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三万到四万人，而且这支军队是经过锻炼的。这一点是比苏联共产党做得更好的。我们还保存了一块革命根据地——陕北。如果没有陕北，"抗大"就不好办，党校也不好办。我们渡过了反动时期，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旗帜、革命组织，而且保存了革命的军队和一块革命根据地。我们最大的胜利，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不过我们应该讲，这些保存是在红军里保存的。因为保存了这支军队，也就保存了一块根据地，因为保存了根据地，保存了队伍，也就保存了组织。如果没有红军，革命组织也保存不了。在这里还应该讲：白区的党基本上没有

保存得了，也是因为这一点。这个保存——保存革命的旗帜，党的中坚干部、中央、一支军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经过了许多斗争，克服了许多困难，然后才达到了这个成功。

我们党经过了跟敌人的斗争，在白区跟敌人斗争不用讲，红军跟敌人斗争不用讲，在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用讲，在艰苦的环境中还经过了严肃的党内斗争，反对"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以及其他，如克服军事上的错误领导，召开了遵义会议等等。经过了这许多党内斗争，才把党保存下来，才使党没有分裂。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克服了各种反动倾向，战胜了分裂分子，始终保存了统一的中央。而且这个组织在任何时期都有威信，虽然在一个时期是在错误领导下，但它还能把广大的党员团结起来。

避免分裂是一个大胜利。我们战胜了各种分裂分子，陈独秀、罗章龙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都失败了。因此我们避免了被敌人消灭，避免了党的分裂，把党保存了下来。到一二九运动以后，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就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那个时期没有军队的保存、党的干部的保存、革命组织的保存、革命旗帜的保存，以后的发展就不可能，抗日战争期间的这个发展就不可能。没有抗战期间的发展，今天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大，革命就无法胜利。所以前一个内战时期虽然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有一点"岌岌乎"！但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消灭。当然各国无产阶级对我们有帮助，共产国际对我们有帮助。

抗战以来，日本一锤子打到了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就不得不跟共产党合作，暂时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打算。后来国民党讲："共产党本来可以被消灭，就是日本这一锤子，不得不跟共产党合作。"日本侵略以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满州事变不算甚么，华北事变还忍耐得住，七七事变就没有办法了，再加上他内部的张学良转而要求抗日，反动势力内部分裂了。抗战时期跟国民党——主要是跟蒋介石，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一次合作时，我们党已经经过了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我们党各方面的政策，党的方向是正确的，党的头脑是清醒的。从前讲我们幼稚，抗战时期幼稚少了很多，就不糊涂了，是自觉的。特别是跟蒋介石合作，在党的领导上是完全自觉的，完全清醒的。当然蒋介石也不糊涂。蒋介石在内战中没有能够消灭我们，他是准备在跟我们合作中间消灭我们的，但抗战中间又没有能够消灭我们。抗战还没有胜利，他早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力量集中起来，准备在抗战结束以后消灭我们。他一方面跟我们合作，一方面打我们的主意。我们大革命时期上了一次当，这次就学乖了，我们完全不糊涂。从跟蒋介石开始合作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晓得，总有一天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要玩他那一手——背叛同我们的合作，我们作了准备，从思想上、组织上、各方面作了准备。后来蒋介石反对我们的时候，搞磨擦，搞皖南事变，以及抗战胜利以后，马歇尔来玩弄以和谈掩饰准备打内战的这一套，直到全面内战爆发，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我们是完全有准备的。所以第二次跟蒋介石合作，我们没有上当，没有吃亏。避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上当、吃亏、被人家出卖的那一些错误和失败。

抗战时期，蒋介石把军队放在后方，准备时机一到就发动内战，消灭我们。他有了准备，我们有准备没有呢？我们也作了准备，从抗战开始那一天起，我们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长期地作了准备。到一九四六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我们也不慌张，一出手就打了胜仗。虽然马歇尔跑到延安谈判，跟吴佩孚和京汉铁路工人谈判一样，但是他没有麻痹得了我们，因为我们防备了他。他来那一手，我们没有上当，应付过去了，并且我们在政治上孤立了美国，孤立了蒋介石。

所以在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是老练的，是成熟了

的，因此才有后来的胜利。一九四六年爆发全国内战以后的第一年内，我们就消灭了蒋介石一百个旅，打退了他的攻势，接着就转入了战略的进攻，现在正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斗争。现在那种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和被分裂的危险没有了；我们把危险奉送给了蒋介石，他就要被革命力量消灭了。他们那里有内部分裂的危险，有李宗仁分裂的危险，情况是翻过来了。这是由于抗战时期长期准备——准备力量和蓄力量的结果，避免了危险，把危险送给了蒋介石。

现在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避免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那次内战时期就没有统一战线，一切都不要了，只剩下工农。现在跟蒋介石破裂了，我们的民主统一战线还是有的，我们还要联合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这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分裂后就不要统一战线，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土地革命中犯了错误，党内斗争也犯了错误。现在我们也在防止和纠正这类“左”的错误。土地改革中有的还不是搞了地主扫地出门？“扫地出门”就等于“地主不分田”；党内斗争就是整党，“搬石头”一下搬掉了几千几万，内战时期就搞这一套。那时搞了多少年没有纠正过来。十年内战时期的冒险主义现在在个别地区也有，但这一些错误不是主要现象，是个别现象，是暂时现象。这些错误一发现，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了。土地改革中的错误被纠正了，整党的错误被纠正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宣传民主，不搞冒险主义，学生运动一直到现在还在搞。在南京城里，蒋介石办的中央大学里演袁世凯登基的戏，挖苦蒋介石。国民党把两个学生逮捕到青年部，学生们从青年部里又把他们要了出来。今天在南京搞那样的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后几年间的白区是不是能搞呢？还是能搞的。

我们在抗战时期也犯了一些类似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不是主要的，很快就被纠正了。在解放战争中也犯了一些类似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也很快就被纠正了。因此现在可以讲：不论在政治上，不论在军事上，不论在组织上，我们党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备的，在以前是不完备的。毛主席讲：过去我们不是系统地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是系统地解决问题了，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土地改革问题、建党问题，各方面的问题，从原则上、方针上，以至具体的办法上都有了一套，都是系统的完备的，而且这些政策是经过多次群众斗争的检验与考验，是正确的，不是骗人的。我们在大革命时期就不然，到底你的对还是我的对，没有经过考验。中央开会我也参加过，四五个人开会，一开会一个人讲那样一篇，听起来也都有道理，张国焘还没有讲那样长，特别是彭述之，你说他不对也驳不了，说他对也实在弄不通。（笑声）现在不是那样了，许多东西都经过了考验，许多东西摸着底了。我们党已经有了领袖。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所以有分裂的危险，就是党的领袖还没有形成。现在以毛主席为领袖。我们党到现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练的，我们渡过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危险，克服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克服了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我们正在走向胜利。现在我们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有了党的领袖。我们从抗战时期逐步的走向胜利，逐步向前发展。这个胜利是不是有一天会停止下来？当然暂时的停止是可能的，打到长江边上不一下过江，等年把半年再过，在长江边上停止一下是可能的。但从总的趋势来讲，我们正在取得的胜利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一直到完全胜利。这是可能的，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条件能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那一个阻止得住？美国开兵来，美国干涉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取得胜利，那也是不可能的。它开一两百万兵来是不可能的，开少了又阻止不住。开一、二十万只能占据沿海几个城市。你愿意占你就占

去，中国大得很，占那么一点，我们还是向前进！向前进！继续向前进！

自然，中国也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是不是中国革命可以在一个早晨，一下子就胜利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在外国可能，突然一天早上，象保加利亚，红军在一早上把城市完全占领，把反动派完全捉起来，一下子就胜利了。中国的情况，只能是逐步地胜利，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积等于整个欧洲。欧洲也不能一下子都胜利，头一步是俄国，再搞波兰、捷克，也是一步一步的胜利。

现在能阻止我们胜利的，就是我们的党犯大的错误。但是，现在看起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全国有这样一大批经过锻炼的干部，党再犯那样大的错误，致使我们中国革命停止下来，或者向后退，这是不会的。而美国也不可能开一二百万兵来，那样做也很难。只要这两件事能够避免，还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们胜利呢？

这个胜利，就是从几十个人开始的。从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共产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开始的，我们党从成立以来，虽然犯过许多错误，可以说各种错误都犯过，有原则性质、路线性质的许多大错误，但是基本方面是对的。反帝、反封建，要革命，要跟工人农民结合，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保持团结，这些基本方向是对的。党还能够联系群众，还能够保持党的统一，还能渡过危机，渡过困难。所以，党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能够克服错误的。这些错误一般的是犯一年、半年、有些是犯几个月，就是十年内战时期犯得最久，有三、四年。但也不是一切都错误了，假使是一切都错误了，搞三、四年，结果会使马克思主义，使党呜呼哀哉。所以不是一切都错误了。至少基本方面是对的，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向着这个方向斗争。这个错误虽然犯得很严重，时间很长，受了很大损失，但是，这个错误还是可以克服的。

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做了这件事的。这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的历史前进。这件事情虽然经过许多曲折，但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后，就投入了大革命，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现在还不能停，全国各个地方，三百万党员天天在那里斗争——流血的斗争与不流血的斗争，公开的斗争与秘密的斗争，以及各方面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武装的，群众的，统一战线的，都在那里斗争着；现在三百万党员，几百万军队，几百万非党工作者，一万万几千万群众跟我们在一道斗争。我们的军队里，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七十是非党群众，他们在军队里边跟我们一道进行流血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广大的学生群众运动反对蒋介石，在马路上游行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重演袁世凯登基的丑剧。在解放区，有工人农民在努力生产，缴公粮，扩大军队，支援前线，出民工运炮弹，后方妇女做鞋子、磨面，紧张得很。所以，有广大非党群众和我们的三百万党员一道，天天在那里紧张地进行斗争。

在这样紧张的斗争中间，当然也有一种事情，就是读书，研究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很多党员理论上的准备很不够，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理论上准备不够。就许多党员干部来讲，就有这个缺陷，因为他们天天做鞋子，支援前线，打仗，游行示威，……不能很好地读书，研究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在座的同志中很多也有这个缺陷。就现在整个党来讲，没有这个缺陷。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文字写书，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也讲到中国的事情，但讲得很少，所以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不是翻译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所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做了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因为做成功了这件工作，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才有今天的胜利。

学习和运用理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理论准备好，是要经过长期斗争、艰苦创造的。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正确的，在井冈山时，建军的东西，政治上的东西，理论上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就初步形成了正确的路线。但是人家不接受，正确意见受到教条主义的排斥和反对。一直到克服教条主义，提高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争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自由以后，才把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党内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这时，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也完全巩固了。

列宁讲，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我们党生长在列宁时代，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在列宁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今天还在毛泽东思想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建设起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军事上、政治上，在群众中间是巩固的。以后只要争取我们不犯大的错误，干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是无疑问的。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所以，今天在我们党的诞生纪念日，我谨向我们的领袖，中国活的革命历史创作家——毛泽东同志致深深的感谢。（热烈鼓掌）

习仲勋同志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

在老区我们已有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领导上只要能抓紧组织，注意改变作风，全党同志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则各项工作，便能逐步向前进展。但在新区，则情形完全两样。五月以后，西北局便以很大力量注视新区的工作，我们虽然派出了大批干部去新区，领导上也很密切的注意，但执行政策上所产生的毛病仍然不少。基本原因是边区对新区情况不了解，思想上又缺少充分的准备，过去我们对新区的各种观念，同今天新区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怎样把中央的政策和路线，在全党同志中认识一致，以及怎样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便成为新区工作的主要关键。现在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加以指示。

（一）在蒋伪统治区，有一种情况为我们长期所忽视者，即一般农民生活，并不如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穷困，所想象的那样无法生活下去。例如黄龙西府地区农村内，一般小农经济都很发展，在洛川农村中，中农户数，一般的是占百分之五十左右，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一般人民生活，甚至比边区战前的水平不差多少。自然，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人民，不用革命不需要革命了，他们对蒋胡马（胡指胡宗南马指西北马鸿逵等），抓丁、派款、征粮、贪污，以及暴戾的特务统治，仍是万分痛恨，只要我政策上不犯错误，在解放后即能很快建立起很好的民主根据地的。

抗战期间，敌寇没有打进潼关，陕西甘肃两省的农村生产，未遭受到大的破坏，抗战时期内，壮丁也出的不多，这次两年多的内战，又主要是在边区打，对蒋区的直接破坏也不大。此种情况较之十年来战争频繁的晋绥与中原等地区是大不相同的。过去边区附近的蒋管区农民起义事件是不多的，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可能只是西北的特殊现象。由于以上情况，我们在思想上要去掉过高依靠客观的错觉。在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这次麟宝战役，我军在这方面作的很好，凡安置在民家的伤员全部无损失，西府地区的人民，纷纷盼望我军麦收后再去，可见政策的正确与纪律的严明，对新区群众影响之大。

（二）在蒋管区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自去年八月以后，对我党我军态度，已有了好转，一些中上层分子，虽对我方缺点仍有所批评，但都是从望我少犯错误，迅速推进革命胜利的愿望出发，一些中上层分子，虽然对我们仍时有议论，但却已不象过去反动分子那样的恶意中伤。素来落后的甘肃，实际情况亦有大变，陇东甘边一带人民，听说八路军共产党，都争

着来掩护，甚至过去一些反共份子，也帮助我掩护人员，极力表示好感，这种情形，确为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上月我路东×支队在××被敌人包围，两次突围未果，以后发觉城西北敌方士兵朝天放枪，又有人在挥臂西指，我军即由此方向顺利突围出来。这些情况，一面当然是由于我军力量强大与战争胜利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于我党实行了各项正确政策的结果，这同时也就证实了贯彻中央政策的重要性。现在蒋区人民最普遍的顾虑，是我们能否真正按照宣布的政策彻底实行，他们怕我中途改变。西府（即泾渭之间）距离边区较远，一般群众对我军热情欢迎，群众情绪安稳，但在黄龙地区较差，中农以上的，特别怕我来后斗争动刑，传言共产党要清算斗争，要组织杠子队、石头队，这其中，虽不免有特务故意散布谣言，但老区左倾的偏向，却大大地影响了新区群众，那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求得老区再不犯政策错误，是顺利地建设新区的一个重要条件，老区对于新区的影响，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三）新区人民，要求安定的生活，解放后，要求社会秩序很快转入安定，新区解放后，首要的任务便是首先建立革命秩序。我们要趁敌人混乱时，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并用大力来肃清土匪，清查特务（但不是乱抓乱捕，而是经政府同群众结合，分化瓦解以至肃清。）力求安定社会人心，缩短社会混乱时间，然后在较为巩固的条件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的各项工作。如不分缓急，不分先后，毫无步骤的乱忘，便会将社会的混乱时间拖长，黄龙地区就在这上面吃了很大的亏，把混乱的时间拖长了，人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对今后经营这地区，也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兹就黄龙地区这时期工作中几个问题，谨述所见：

（甲）在新解放区，不应过早的提出土改。韩城解放后，提出“快定快分”口号，结果是贫雇农并不能分得多少果实，而“扫地出门”、乱打乱斗的左倾乱来，弄得不少人恐慌逃走，影响极坏。因为群众尚无觉悟，党的力量不强，再加上我又无充分准备，在这种情形下，急于去搞土改，反易为流氓分子所乘。现在新区以至蒋区的地主富农，主要地不是怕分土地，而是怕乱杀、乱打、乱斗、乱“扫地出门”，不少地主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拿出分配，只要不打死不乱斗。黄龙决定在一二年内仍实行双减，即靠近边区地方，也要看群众觉悟程度如何而再定土改与否。黄龙地区有着大量的荒地，我们规定私荒开垦三年不出租，公荒则规定谁开谁得。经过这番改变之后，社会人心大为安定，但仍有地主献出土地的。我认为真正自动自愿献出的，亦可由政府接收，调剂与无地的农民，否则地主不安，随时担心着斗争。这是否算作恩赐观念呢？我以为不然，地主能如是作，又有何不好呢？过去总把形式上的斗争，当作是最革命的，其实是极不策略的，过去对这些问题，认识上有缺点，我们常不能从群众全面的长久利益的观点出发，去了解问题，去解决问题，这是不对的。

（乙）在黄龙地区，我们一共解放了九座县城，我们进城后的政策，一般都很不坏，洛川更是成功。洛川为敌特务据点，有较强的统治基础。敌人退走时，全城居民逃跑一空，我初进城时，城内只剩下三个市民。我入城后即组织进城委员会，城市的管理、纪律、和宣传，即统一由进城委员会负责。为维持秩序，设立了纠察队，城门封三留一，不准乡村农民或其他人等进城，只准城内人民回去。公共物资收集后一概交给政府，民间寄藏的敌方物资则暂时不动。商号如无人看管者，由政府封起，非本店人不得出入。同时政府又进行了必要的救济与慰问工作，结果秩序良好，商民无损失。三天后城市开放，全城居民和商人便陆续回来，这种办法是对的，群众对我普遍表示满意。当前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贩、小商及

城市贫民的生活问题。每城均有数百小贩小铺，每天所赚的钱，皆不足糊口，黄龙地区九座县城内共有摊贩约三千余人，我们对这些人所采取的基本办法，是组织这批人转业生产。城内的大商号一般均日趋萧条，主要原因是敌军在时购用消费品多，我军到后，此种消费品销路锐减，加以乡村灾荒，农民购买力不强，市场的萧条也就难于避免。现在的方针，应是怎样加强发展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由此而奠定城市繁荣的新经济基础。

（丙）政权工作问题——新区政权工作，不宜过急地实行民主选举，过早地进行选举，好人不出来，坏人反易乘机混入，这等于把政权交给一批坏人，给坏人以民主合法的地位。故新区建政，在无党的地方，一律可采取暂行指派的办法，等到半年之后再实行普选。（是否这样快便能实行普选，还值得考虑。）在有党的地方，可发动党的力量，召开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政权负责人员。在西府等地我军不能巩固占领者，可暂时利用旧保甲人员；在黄龙乡村政府中，有的地方百分之六十仍用的是旧保甲人员，现已逐渐注意改造旧政权工作。

（丁）财政工作问题——新区城镇中，税收是极大的一宗收入，我们不能置之不闻不问，须用大力去注意税收工作。今后新区解放后，税收一律维持原状，原税收机关，可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等到我有干部、有能力管理时，再去接收，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征收公粮，实行合理负担，我们所规定的征收办法很受群众的欢迎。新区财政工作，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今后应很好调查研究。

（戊）在黄龙地区，敌人的保、警、土匪武装原不下六千余人。这些武装已被我政治瓦解，军事消灭，形将完全肃清。剿匪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清剿，应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单纯的军事清剿，是会愈剿愈多的。清剿中，对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缴枪者从宽处理，起义者改造，有功者奖励。民间枪支，在解放初期，仍应由政府协助收存，等群众组织起来后再交回，一般说，这是最妥善的办法。如在群众中规定只登记办法是不完备的，仍给特务活动留一便利条件，我们对于民间枪支应很好研究，妥当的处理，稍一不慎，便要出乱子。

（己）我们在新区的学校教育政策，在初期是不够明确、不够注意的。在开始时，一切学校都想自己另行办起，但自己又办不起来，结果是拖延搁置，不闻不问，给人民以极恶劣的印象，有的人认为共产党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在新区内，我们对学校应是坚决地采取一律保护政策，在解放初期，学校一律可以暂时维持现状。凡属学校的教职员，除其中的少数职业特务外，必须一概争取其仍旧供职，而教职员的薪金，则尽量维持其过去标准不变，一般学校都应允许其存在，我则先集中力量办好一处或几处，一所或几所学校，逐渐做到全部改造。为了照顾经济上困难，学校不应多增公费生，但原来的公费生额亦不要减少。黄龙地区不少完校学生，大部是农民子弟，学校改造好了，是能为我们造就一些后备干部的。对教职员及青年学生的教育和改造，思想上要严肃，方式上要禁用鉴风坦白办法，学生中蒋党党员团员，可不规定登记手续，如此作法，更能打破顾虑，减少抗拒性，便于我从思想上争取改造。这种方针，在黄龙各县短训班经验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行之有效的，可以采取的。

（庚）在今天我党不断的发展与胜利形势下，敌人阵营内已发生很大的分化。过去很多反对我们的人，今天都表示要向我靠近。在此种情况下，我统一战线方针应很好掌握。许多地方把中上层分子，不加分别地一概采取不理态度，使新区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阻碍。洛川士绅中分为三派，一为地方派，他们只要能混得吃就行了，群众对之无多大恶感；

一为党团派，这批人一般都是当权派，掌握着党权政权军权，应是我们坚决的打击对象，打击他们可能得到全县人民的同情；一为在野派，他们在地方既无权位，又受党团派的压迫，对我解放洛川表示赞助。在野派及地方派，和党团派的矛盾很大，我可争取与之合作，只对其中个别为群众所痛恨的恶霸，才可发动群众斗争；其中的公正人士尚可酌量吸收他们来参加工作，这样就会更孤立坏人，使我和特务作斗争，更加有力。但以前的这一总方针，却偏偏为今天新区同志所普遍忽视，我们如不吸取过去经验，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首恶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是完全错误的。另外，在黄龙分区，地委又不敢放手让群众斗争最坏的乡保长，结果群众又自发地起来去斗，使人心反而不安定，又是执行统战中的另一偏向，这一偏向是应纠正的，该打的敌人不打，这就不对。

从上述问题中，我觉得在执行新区各项政策上仍犯有左的错误，我们应在党内克服这种左的情绪和错误，只要我政策不犯错误，就能团结广大群众去战胜敌人。

（四）我们今年派到新区的工作干部，他们的优点是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其缺点是教条作风，常以感想代替政策。老区出去干部，大部背着自满的包袱，这一包袱，大大的阻碍了自己的进步。在今天胜利局面下，我们深感这些同志理论水平的惊人薄弱，他们在新区复杂的事物面前，显示一切不足，但他们却很骄傲，在执行政策中因而表现了严重的不谨慎。老区干部出去，不仅原来错误的作风应当改变，即在老区完全正确的东西，也不能完全搬到新区去照办。一般作风上的毛病容易纠正，但新区工作中的老区作风，不容易说服同志注意。现在正开展全党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来克服与补救上述缺点。总之不创造一套适合新区的工作作风，要贯彻党中央在新区的政策，那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五）在义合会议以后，党的政策已能被各级党委所重视，党内思想，不像以前那样复杂了，党的队伍，比以前整齐了。不久前，延安对敌占区的工作方法，以及陇东三边的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的加强，都因政策上掌握得好，工作便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过去由于乱打、乱杀、乱没收，把这些地区造成了赤白对立，我武工队出去活动，是常常受打击，甚至遭歼灭，形势异常严重。但经政策转变后，那些地区虽然仍是敌占区，但是人心向我，游击队也显得神通广大，没有主力也能把敌制服，这种情形给各级领导同志以深刻的教育，自然也还有个别同志尚不觉悟，还未能体会到执行政策错误后的严重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上仍自以为是，向党闹独立性，和党闹磨擦，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新区这种无纪律以及分散主义的情形更严重，如黄龙地区的一些错误措施，都是自决自行，做了再报。黄龙各县甚至可以擅自修改上面的方针政策，可以自由决定土改方针和制定各种政策，可以任意打人、杀人，各种各样极恶劣的自以为是作风，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现正以大力来克服这些严重的倾向，转变干部的作风，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与政治水平，使新区工作能更好的向前发展与巩固。

——以上意见如有错误，望即来信指示。

（原载《政策汇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1949年6月编印）

中原军区负责人论中原战况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负责人今日发表谈话，详论中原战况，全文如下：

在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开始之际，在我中原各兵团转入进攻的周年纪念之际，在七月的五路大捷全国战局大开展之际，我们来论到中原战况，是有其必要的。我们首先指出中原斗争正处于全部大解放的新局面。让我们来说明这一正确估计的根据和理由，我想这一分析工作对于我们内部对战况认识不足的个别分子，乃是一种有益的教导。对于蒋匪掩饰其惨败的虚伪宣传，将是一种宣传上有力的歼灭战。对全国人民特别是蒋管区内盼望解放的人民，将是一种安慰和鼓励。特别对于潜伏或残留在中原解放区内还企图死灰复燃的土蒋分子，将是一种指示迷津的号召和促进悔悟的福音。

今春以来我军在中原战场，坚持了大别山之后举行连续不断的歼灭战，如二月许昌漯河之役，三四两月两次洛阳之役，五月宛东宛西之役，六月开封被攻克，七月豫东之役，襄樊之役。这些战役蒋匪军全部被歼者计有整三师，二〇六师，六十六师，七十五师，五十八师之一八三旅，二十五师之一〇八旅，四十一师之一〇四旅，五十六师之一六三旅、一六四旅，蒋匪正规军团营之被全歼者尚不计算在内。其中受歼灭性打击或被我击溃损伤甚重者，计有二十师、十师、八十五师、二十八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十八军、五军等部。总计被歼兵员达二十万以上。这些野战损失，是蒋匪在二年战争惨败中仅能保持的最大的机动兵力，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这就是蒋匪本人所夸称在中原组织进剿的最干脆最响亮的回答。从洛阳到开封襄樊之被攻克，正是蒋匪中等或头等设防城堡之被攻占。在上述地方蒋匪依托日寇固有设防加以美式的改建。蒋匪自谓守城信心大于野战，即是说解放军不能解决攻城的困难。可是当解放军一出手，便将攻占坚城全俘蒋军的事实，一一呈于蒋匪之前。连加拿大的新闻记者，也说："开封被攻克，象征着蒋介石已不能防守中国任何部分。"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即蒋匪盘踞之中国任何城镇，只要解放军刀锋所指，必被攻克，这是两年来战争进程中蒋我战斗力升降的标志。这就是我人民解放军对蒋匪惨败之余，企图以强固城堡，维护其安全的致命打击。从去冬到今年夏季，前后歼灭蒋匪军的省保安团和县大队，计河南、安徽、湖北、陕南共计数十百起，兵员总数约计达十万人。连同十几个专署百余个县府及所有反动军政机构之被摧毁，是将蒋匪在中原二十年来所经营的地方反动基础，一扫而光。蒋匪在这方面的损失，以及中原人民解放事业在这方面的收获，应与野战攻坚主战场的收获列在同等地位。试想蒋匪野战军损失还可从其他战场去抽调拚凑，攻城的损失还可加强新的设防，去作自安自慰式的弥补，但是这种地方反动机构与反动团队武装成千上万的损失，又从何处去拚凑去弥补呢？我们分析蒋匪上述三项损失时还应进一步指出，这些损失无

论在全国战场，以及中原战场均是蒋介石匪帮及其美国军事顾问团深思苦虑屡屡改变战略、改进战法之后所遭受着的新的和更新的失败。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我中原各路兵团先后挺进中原，进入大别山，直抵长江之时，蒋匪不得已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改为回兵中原，企图以进剿围攻大别山的手段达到巩固其中原基地和防守长江的目的，此为蒋匪在中原战场战略上的最初的部署。一九四七年冬到今年春，经过解放军在平汉、陇海、洛阳诸战役以及大别山诸战役，蒋匪不得不放弃其对大别山的围攻，转而巩固其铁道线与中原各中等以上城市。这是蒋匪在全国战场失掉主动之后，企图在中原保持一点围攻大别山的主动，也不得不痛心放弃了，而蒋匪全面防御中的中原重点防御便形成了，这是蒋匪战略上的第二变。经过今年夏间宛东、宛西、开封、睢杞、襄樊诸役到现在，蒋匪中原重点防御也开始被摧毁了，中原重点防御之被摧破，其结论必然是全面防御的面临崩溃。其中最特异的是今年春蒋介石匪帮乞怜于日寇冈村宁次，从日本帝国主义武库中借来总体战全套把戏，企图以匪帮的党政军特务一元化，来挽救其战略的失败。这一新的战略，由白匪崇禧开始实施于大别山地区，其特点是匪军到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造成无人区，企图以遏阻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在最近大别山斗争转入开展以来，证明这一总体战并不能产生任何奇迹足以挽救匪帮的失败。另方面，今年七月当豫东大战剧烈之际，白匪崇禧令其驻南阳的匪军第九师一部率领大批土蒋钻进我豫西解放区腹地，又被我军围歼于南召南阳之间，蒋匪的偷袭战术又宣告失败。这就是蒋匪惨败之后其战略战术屡屡改变而仍遭失败的过程的说明。我人民解放军已能粉碎蒋匪帮任何新战法新狡计是为事实所证明了的。现在我们来替面临死亡的蒋匪设想一下可能采取的新对策是什么呢？第一，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将残缺不全的几支机动兵团加以补充，以维持其中原的重点防御。但我们仔细一算，蒋匪在江南十数省兵力已无可抽调了，蒋匪用以镇压川滇人民仅有的十九七师，业已参加中原战斗序列。蒋匪去冬从前线抽调回后方的一批后调旅，业已陆续调到前线。且有一部又同样于新近加入了被歼的序列。蒋匪唯一可指望的，是胡宗南所属之十几个旅中，部分抽调出关来维持其中原颓势。但由于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实有抽不出之苦。即令抽调一部出关，难道能有例外不被歼灭吗？第二，是否蒋匪能考虑放弃东北华北山东某些战略重点来增强中原呢？问题不在于蒋介石愿不愿意，而在于那些地方残存据点早已一一被歼少得可怜，而又陷入我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如何能抽调出来呢？第三，是就中原现局势，再放弃许多地区以加强其机动兵团及各大城市的设防，在这一着来说，蒋匪在中原守备的要点被拔除所剩不多，而其守备要点是与其机动兵团互相依靠是无法不留置兵力的，当我人民炮兵已掌握着战场上的优势时，特别我人民解放军半年来由于新式整军的伟大启发下，指战员在攻坚技术上有高度而丰富的成就时，蒋匪帮的筑城防御自然变得更不可靠了。两支军队相斗一面是斗力，一面是斗智。人民解放军无论在力量与智慧两方面都大大超过蒋匪军的现在，蒋匪军安得不败？蒋匪本人素来以技术自夸，素来轻视人民解放军的技术，那知道两年战争中所创造的新事物，早已超出蒋匪帮意料之外呢？蒋匪帮的技术是就现存事物呆板使用的死技术，他是窒息人们的智慧的，使其官兵疲倦烦闷焦灼消极等死的技术。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是与广大人民的头脑结合启发智慧、从事创造的、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是就现存条件加以改造提高的新技术。我广大指战员集中其心思才力以研究克服战斗中的困难，故近来在野战军技术上攻坚技术上提高了若干倍。这是伟大的不可抗拒的革命活力，正在发展，前途无量。人们就不难从这中间去了解开封、洛阳、襄阳以及北线之临汾、昌、潍、兖州等中

等城市之攻克原因何在。在蒋匪帮野战连续失败，坚城相继失守，地方反动基础溃灭，屡屡改变对策寻求延续其寿命，终于是新的失败继续降在蒋介石匪帮的头上，这就使中原人民全部解放、蒋匪在中原全部崩溃的形势以及蒋匪在全国总崩溃的形势必然要到来。再来看某些部队中原人民方面的情况，第一，是各野战军兵团经去冬今春以来实行一面作战一面整训的方针，调整了编制，加强了装备，充实了人员特别已完成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某些部队的查整已到结束时期，某些部队正在开始，经过这样的整补步骤，使我各兵团在政治上组织上，战术与技术上均有显著的提高，去年转入进攻以来，各兵团那种长途转战于新区的疲劳现象已成为过去，一变而为生龙活虎似的，到处变为蒋匪军的灾难。我野战兵团，这一支人民解放事业的先锋队，正在增强中，对蒋匪的更大打击还在后面。第二，是各军区军分区建立后，使各级人民的地方革命武力有了初步的成就。例如江汉区桐柏区正以独立发展的姿态，向襄河西南开辟新的解放区。陕南区控制了陕南中心腹地，正向川陕鄂边区扩张攻势。大别山的鄂豫区皖西区一年来完成艰苦游击战争的坚持任务，近来开始取得安定，由山岳地带转向平川的扩张。我豫皖苏地区和豫西地区是我中原解放区两大阵地，流动情况开始结束，正进入新的建设。第三，由于今夏我们执行了党中央对新区的正确政策，即停止实行过早的土改政策，改为调剂粮食、合理负担、实行减租减息、以便顺利准备土改的既照顾农民又照顾地主的社会政策以来，对蒋介石匪帮在中原的地方反动力量起了极大的瓦解作用。土蒋武装纷纷向人民解放军缴枪投诚。被蒋匪胁迫外逃的人们纷纷回家，在明了我党政策之后均情愿回到解放区在当地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开始获得了安定。第四，各地人民组织正在开始，今夏以来各地人民参战支前的工作开始了初步的规模。第五，中原解放区的影响正向南扩大，号召了蒋管区的人民纷纷向我区迁徙。来解放区就业学习的人民正在增加。上述现象是在一年战争之内所获得的成就。一年的时间本来不算长，我中原党政军民全体继续努力，加上北线各老解放区的援助，加上北线各解放军胜利的配合，在不远期内，即半年到一年的努力，获得中原全部大解放促成蒋匪的总崩溃是定可实现的。在这里我们提出如何解放全部中原的任务：第一、是各野战兵团应利用战斗间隙完成新式整军，提高士气，提高技术，提高指挥方法，保证在部队中能经常贯彻实施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各级司令部后勤部应改善自己的工作，使前方后方工作能适合需要，这样以保证我军战斗力之提高，以便争取今年秋冬两季完成几个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以粉碎蒋匪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并适时的继续的扩大战争规模到蒋匪的深远后方，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第二、各军区各军分区应加强对我党建设人民地方武装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切实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现有地方武装，采用新式整军方针，在各地方武装中进行诉苦自觉的民主运动，来达成战斗力的提高，保证各部队能独立而胜任的担负保卫各该地区及当地人民利益的光荣任务。锻炼各地方武装成为我野战军的助手和后备。第三、各级党委各部队政治机关各级民主政府均应研究党中央对新区的政策，研究中央局的六六指示，更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从团结中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出发，从分化争取剩下的百分之十的人口出发，只办首恶，不问胁从，做到团结更多的人来参加反对美蒋的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着重研究分化现存在中原的蒋匪势力，使得我中原人民的解放阵线愈壮大愈好。组织整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去反对蒋匪将是取得军事胜利和巩固军事胜利的有力步骤。第四、还须估计到在全部解放中原以及扩大战争规模深入蒋区的道路上，有不少的困难。例如可能发生的灾荒，蒋匪潜伏势力企图活动，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破坏和损害，在局部地区蒋匪军仍有进扰的可能，这些均不容轻视，应有准备加以筹划采取适

当的政策。例如我们内部中尚有个别的对战局认识不足的分子，尚有对停止土改表示怀疑的分子，又可能因停止土改而产生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右倾现象的产生，这样造成与群众隔离的损失。我们某些部分在工作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着的。某些地方某些部队中部分贪污浪费破坏纪律仍未有根本的纠正。上述现象尽管是局部的分散的，可是如让其存在或有发展的可能，将是人民事业前进中的一种障碍，必须加以克服才能顺利获得解放全部中原以及解放全中国的光荣而伟大的成就。

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贼近已决心撕破伪装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其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已有财经紧急处分令。其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已有特种刑事检举。现北平已发出拘捕学生传票二百四十份，南京已发出传票一百四十份。上海、天津、广州、昆明及全国各蒋管区城市必将继着大行检举。必将由学生发展到工人文化工作者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在紧急处分令中，已禁止罢工、怠工，不久必将禁止其他一切群众运动。这是蒋贼在我人民解放军愈加胜利面前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和手段，这是蒋贼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但蒋贼愈接近死亡，他的统治内部便会愈加分崩离析，各找生路，他统治下的群众便会愈加不能生活和走向革命化；到那时，蒋贼及其死党仍有可能在最后据守的城市，继续其疯狂的法西斯最后挣扎。但这种挣扎不是将自己的统治直接送进坟墓，便是被其统治内部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之下进行和平阴谋的政变所代替，从而也使代替者进入坟墓。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错误。在此原则下，针对当前紧急情况及可能发展的情势，除乡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党的荫蔽组织，以待解放军的到来外，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根据最近上海来的材料，党的准备工作及学生运动情况，都有此冒险倾向，这对于今天的坚持、明天的配合解放军进城，或在反动统治内部举行政变时所需发动的人民革命运动，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其已进入解放区受训者（如泊头），目前绝不容许再出去。如一时无法进入解放区而又有可能回到家乡者，即回家乡进行隐蔽工作；不能回家者，即须转移地区，另找职业隐蔽。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在检举风浪过去后，再谋有步骤的发展，以便积蓄新的力量，等待时机。在这次大检举中的斗争策略，要依靠各个单位自己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尽量利用统治内部的矛盾）。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

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如果大多数学生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凡脱离中间派的群众行动，必须力求避免。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在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导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必须认识敌人所欲打击的中心，是我党组织，必然从公开检举当中，寻找打击我党组织的线索，你们应特别注意党组织尤其领导机关的保护。对已破获的组织，不要急于恢复。对其中发生了叛变分子的关系，应暂时隔离，待弄清情况，再谋处理。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你们执此电情况，望报。

中　央

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军委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 战 略 方 针

毛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两年来的胜利发展，预测这次革命战争如果得到全党全军不断努力，继续动员广大人民参加而又不犯重大错误，大约经过五年左右便可根本取得全国胜利。这一预测，我们从战争两年敌我兵力对比的变化上看已证明其充分可能性。这次战争第一年开始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连后方机关学校海空军在内共约四百三十万人，经过一年战斗被歼和逃亡达一百五十七万人，补充只一百万人；到第二年开始，遂减为三百七十三万人，又经过一年战斗，单单被歼就达一百五十二万人，补充一百四十四万人；到今年七月第三年开始，又减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如果依此比例战斗下去，今后三年我军每年平均歼敌一百五十二万人，敌人亦能照第一年每年补充一百万人，则至第五年总结时，敌人只能保有二百另八万人。在这个数目中，敌人庞大的机关学校（六十九万人）必减员较少，战斗部队正规非正规在内将不超过百余万人，以之分散据守最后几个孤城及偏僻省分和边疆，到那时即使不发生别的变化，也将更无斗志、更难抵抗我最后之围歼。

我军方面在战争第一年开始时仅一百二十八万人，第二年开始时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至今年七月第三年开始已近二百八十万人。两年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缴获步枪近九百万支，轻重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后方的补充不算，单就两年的俘虏和缴获数目已足扩大与装备现时的我军。实际上我关内许多部队俘虏成分已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十，而我军的武器更是全部取之于敌，今后三年参照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经验，任何时期都未超过五百万人，预计我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便可取得全国胜利与保卫全国治安。如今后三年的俘虏和缴获亦同第二年一样，则从新区补充和老区部分补充不算外，亦足补充我军的扩大而有余。战争两年来，第一年为内线防御，故解放区的面积人口城市皆减，第二年我转入外线进攻，不仅收复了大部已失的解放区土地人口城市，并且增加了新解放的土地人口城市，现在我已占有全国近四分之一的面积，约二百卅五万余方公里，解放全国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达一亿六千八百余万，解放全国过四分之一的城市计五百八十六座，今后三年如继续向外线发展并肃清内线，则面积可达全国之半，以内线完全肃清新区解放三分之二计算，人口可能达到三亿六七千万，城市可能达到一千五百上下，如此所剩的除掉敌人几个孤守据点外，将是不起作用的偏僻省分和

边疆。这一切，预计都将循着毛主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主要取之于敌的战略方针求其实现。

二 作战计划

基于上述意图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大致规定如下：南线以中原战场为中心，敌人在此集中了七十五万人，其中正规部队有八十四个旅，一年内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如能全歼卅个旅（七月份已歼的五个旅在内），即使敌人不可避免地要从其他战场抽调援兵，但我东北西北两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人必将逐渐失去其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

南线的华东战场有敌三十六万人，其中正规部队卅五个旅，一年内我如能攻占济南，山东兵团南下机动，连同苏北兵团华东至少可以达到歼敌十二个整旅的要求（七月份已歼的两个整旅在内）。

南线的西北战场有敌三十万人，其中正规部队卅八个旅，一年内我西北野战军如能平均每月歼敌一个整旅（八月份已歼的一个半旅在内），则胡马系统必将无法以大兵团增援中原。

北线的东北战场有敌四十三万人，其中正规部队四十三个旅，华北战场有敌（傅阎两系统）五十一万人，其中正规部队五十一个旅，一年内我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二、三两兵团如能大量歼敌，肃清北线除平津沈外的各大据点，则东北华北便可打通，东北敌人增援中原的可能便将减少，我华北第一兵团配合晋绥部队如能攻占太原则第一兵团便能于明春南下，晋绥部队亦可调至西北归建。如此，北线我军一年内应达到歼敌五十个旅上下的要求（七月份晋中战役歼敌八个旅，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

南北两线我军在第三年内如能在现有地区周围及内线歼敌一百个旅以上，纵使敌人将其第二线兵力（四十四万人其中正规部队卅四个旅）之在江南的廿六个旅抽出一部增援中原，或编组新的部队，亦将不能挽救其颓势，而我军则可开辟第四年南进发展的宽广道路，打通江南与华北并发展西北、中原，因而也就利于提高生产一寸，并打开建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的局面。

三 军队建设

建军：我军现有武装力量计为五大军区，四个野战军，九个兵团，五十一个步兵纵队，一百六十八个旅，特种部队六十四个团，地方部队二百五十个团，连后方机关学校在内共约二百八十万人。基于战略要求今后三年发展到五百万人的编制，预计分为步兵纵队七十个，步兵师或旅二百一十个，炮兵团九十五个，骑兵团卅个，工兵团四十七个，兵团及野战军的指挥单位依情况需要而定，以上野战部队共约三百一十七万人，地方部队五百个团，及后方机关学校共约一百八十三万人，两数共得五百万人。依此，预计战争第三年，因在现有地区周围及内线作战，一般并不需要增加编制，只需充实野战部队，增建特种部队，整顿地方部队，精简后方机关，便能担负第三年的作战任务。充实野战部队主要依靠于俘虏兵的争取，

部分的从新区动员补充，老区半老区在战争第三年一般的停止扩兵，特殊的须经军委批准方得在指定地区扩兵。五十一个步兵纵队如能依照编制逐渐充实起来，则不仅可能完成第三年作战任务，并且可以奠定四、五两年扩大编制到七十个步兵纵队的基础。增建特种部队，主要是建立炮兵，首先是建立各纵队的山炮团、营，其次视条件许可逐步建立各纵队的工兵营、连，野战军的战车重炮团等，北线则应加强骑兵的编制。整顿地方部队，应区别地方部队为作战部队与警备部队两种，凡属战区地方部队不论是团营或游击队其任务均是配合野战部队或独立担当对敌作战，在不作战的巩固地区，地方部队应是保卫地方治安的警备部队，并实行兵工制度参加地方建设，在警备已经不再需要的地方，或者升级为野战部队，或者转入新区担任作战。精简后方机关应成为各级军区的经常任务，其人数比例应保持占本区武装人员的十分之一上下，精简以人少得用、合理分工为原则，编余人员强者派往前线作战，弱者转入生产建设。以上四项任务的执行军区应负主要责任。

编制：我军确定步兵以师（旅）、特种兵以团为战略单位，在目前凡成立一个师（旅）或一个特种兵的团，均须呈报军委批准，成立步兵团或特种兵的营则报军委备案。

我军编制在目前条件下尚不可能要求完全一致，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北的编制，每个步兵师八千余人，每个纵队二万五千余人；一类是东北的编制，每个步兵师一万二千余人，每个纵队近四万三千余人；一类是较适中的编制，每个步兵师约九千人，每个纵队三万七千余人，但不包括炮兵团、补充团及运输担架队在内。

编制原则均采取三三制，师直到班均如此，班以下创设组，每班三组，组亦三人，师以上每纵队亦辖三师，但新成的纵队得先辖两个师，在新区为发展计，得从三个师的纵队中抽出一个师分散作地方基干部队，野战部队旅统改为师，地方部队成旅者仍成独立旅或警备旅，旅辖两团或三团不等。

我军编制中的武器配备，因纯系取之于敌目前亦不可能要求完全一致，但为支持长期战争防止武器的损失和浪费，除在后勤项内另有规定外，连队中每个步枪班应有不背步枪的弹药手一至二人，携带炸药及手榴弹，炮兵部队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山野重炮（重迫击炮在内），每连以配属三门、每排一门，为便于运动与作战，步兵炮则视武器多少配属六门或四门。

部队从班长起一律设副职以利工作与发展。

军队系统野战军的番号由军委统一编排，纵队和师均依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的次序排列，地方部队的番号则按军区分别编排。

野战部队的序列，纵队以上设野战军、野战兵团两级，数目不定，依情况需要，纵队及独立师或分隶于兵团或直属野战军兵团，一般地分隶于野战军，但无野战军一级者则直属军委指挥。

地方部队归军区建制，军区分为三级，与中央局同级者为一级军区；与中央分局同级者为二级军区，受一级军区管辖；与区党委同级者为三级军区，受二级军区管辖或直属一级军区；军区下辖军分区，分区下辖县指挥部或人民武装部，地方部队按其任务和组织分受各级军区或军分区指挥。

一级军区及野战军和直属兵团均属军委指挥，野战军与直属兵团目前在行政上一般地受其主要活动地区的军区管辖。

在不作战的巩固地区，三级军区或军分区应缩小其司令部、政治部组织，或改为人民武

装部专管地方警备部队及支前动员和民兵训练，其系统仍隶属上级军区不变。

一二级军区之建立和划分权属军委，三级军区和军分区之成立和改组须呈报军委批准。

补训：目前我军人数二百八十万，占解放区现有人口百分之一点六六，依照华北财经会议的规定养兵应合人口百分之一至一点五，看来则已达规定的饱和点，从老区半老区的兵源来看，一般的说壮丁已感缺乏，故不论增编部队或补充部队主要的来源今后均应取之于敌，战争第三年的补充计划主要的是争取俘虏，部分地新区动员、老区归队、伤愈出院和收容敌军逃兵。

为执行俘虏一个不放、大部补充部队、小部参加生产的原则，并鉴于过去逃兵现象的严重，特别是今年七月份俘敌二十万各部补充不足五分之二的教训决定从现在起建立后备兵源的补训制度，一二级军区设补训师或设补训兵团，下辖数个补训师，西北军区则设数个补训团。三级军区及军分区视情况需要亦得设补训团，野战军除中原外设补训师，兵团及纵队设补训团。野战军的补训师、团，主要任务在收容一切战俘及敌军逃兵不使散失，然后加以甄别，除清出俘官交政治或保卫机关及伤兵老弱后送或遣散外，其余均应经过训练定期补入野战部队。军区所属补训师团除收容战俘及敌军逃兵外，更负责接收地方动员的新兵、归队和伤愈出院的战士，给以必要的训练后再整队送往前方。在较大战役中，军区所属补训师、团，应适时的开往前方，一面收容俘虏，一面又可于战斗结束后将已训练过的兵员交给野战部队补充野战部队。补训师团收容俘虏满额后，应将多出之数交军区所属补训师团。

各军区扩兵计划和数目必须呈报中央及军委，经批准后方得实施，军区所属补训师团的兵员分配亦须经军委批准。各野战部队除在新区个别吸收外不得在地方上直接扩兵。

不论新区老区的地方部队上升为野战部队者必须经军委批准，野战部队分遣于新区为地方基干部队者其归建须得到一二级军区之批准，不得自由收回。

部队的整训，一年中应有一次较长的时间实行新式整军，确立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及部队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军委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军任务给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十九日午电悉。中央政治局会议业已结束，漱石、曾山已回华东，向前已回晋中，小平、贺龙不久亦可分别回部。此次中央会议根据战争第一第二两年歼敌正规军一百八十九个旅，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二百七十余万人之经验，认为五年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七百万人左右，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是有充分可能性的。我军已由两年前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二百八十万人。如果能从今后三年的作战中或更多一些时间的作战中增加二百二十万人，便可达到建军五百万之目的，这样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而且能够全部地完全地打倒国民党，并使我们能够统治全中国。欲达这一目标其关键在于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要求全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十六个旅左右，其大体上的分配是：东北及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罗瑞卿杨成武）担负三十六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华东野战军四十个旅（七月分歼敌七个旅在内），刘邓（包括陈谢）十四个旅（七月歼敌两个旅在内）彭张赵担负十二个旅（八月歼敌一个半在内），华北第一兵团（徐周）担负十四个旅（七月歼敌八个旅在内）。如能完成这一任务即可开辟第四年大举南进的道路。目前华东全力位于徐济之间，攻济第一阶段已顺利完成，吴化文率两个旅起义，已令开至黄河以北整训，我军今晚发起攻击第二道城，估计尚有几场恶战，才能夺取全城。刘峙在我攻济第四天方才下令集中援军于徐州以北，估计尚需数日才能集中完毕。其援军数目大约有二十个旅左右，可能使我打援计划难于完成，但阻援以争取攻城所必要的时间，是可能的。华野在此次战役后须有一时间休整，那时拟请陈毅同志回至该部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东北我军因两次准备打长春，最后还是因恐长春坚固难下，放弃攻长计划，故上半年少进行了一个战役，但全军获得了整五个月的大休整，野战军充实到了六十一万人，士气旺盛，现已进行北宁战役，北宁线上锦州、义县、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唐山、葫芦岛、秦皇岛等处共有敌军十九个旅，现正进行作战。准备全歼此敌，并打沈长援军，控制整个该线。杨罗耿三个纵队现在平北地区钳制傅作义主力，杨成武、李井泉率四个纵队出绥远，九月二十日已由朔县北进，九月底十月初可在绥远境内打响，以占领整个绥远为目标。向前所部十月十五以后可以开始作战，太原城防较坚，敌军尚有九万余人，我军兵力十万，恐需付以几个月时间才能攻克此城。彭张赵所部准备于本月底开始秋季作战，和你们现正准备之作战互相呼应。政治局会议所作各项决议陆续电告。

关于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会议的传达报告提纲

（一九四九年一月）

贺　龙

去年九月间，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共开会六天。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总结了过去，规定了今后的任务。我将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加以传达和说明。

第一　国际形势

仍然是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世界第三次大战，战争危险确实存在。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力量，已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正在发展，必须而且必能克服战争危险。

我们从许多事实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动力量，确在进行侵略并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可以从军事、政治、思想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如美国现在仍保持强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军费，在世界各处建立军事基地（如在地中海、日本、南朝鲜、蒋介石中国及太平洋上许多的岛屿），不撤退在外国的驻军。支持反民主力量，镇压民族民主运动，武装和帮助训练外国军队，美英联合参谋部的保持。反对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裁军、销毁原子弹（这是进攻的武器）以及其他制止侵略的各项公平而正义的提议，保持并扩大原子弹的生产。扶助日本和西德的恢复，组织西欧集团。所谓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就是以“经济援助”为引导达到政治上奴役其他国家的目的。对于它们这种侵略行动和战争准备，在舆论上说成是自卫的。如美国、土耳其等国许多反动报纸、通讯社所进行的战争叫嚣和反动宣传，美国不少政府的官员的演说，和邱吉尔富尔敦大学的演说，都在唱着同一的侵略和战争的调子，所有这些都是为进行侵略战争，作动员舆论的思想准备。

从上述这些主要的事实，可以看出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战争，斯大林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关于柏林问题向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说：“英美两国当前领袖们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发动新战争的政策。”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乃是由于垄断资本家、金融寡头的需要，首先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他们想从追求世界霸权，向外扩张中来解脱其内部的困难，来解脱日益追近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所给他们

带来的灾难。

我们要认识并揭露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阴谋，认识到新战争危险的存在，但是我们并不为它所吓倒。从战争准备到进行战争是有一段过程的，在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削弱，世界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的力量空前壮大，并正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建设，是可以制止战争的。因而我们有责任动员和加强世界民主力量，以制止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日意美英法六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打倒了三个（德日意），如果再把他们扶持起来，一个短时期是做不到的。英法在战争中大大削弱，战后经济无法恢复。美国在战争时期，由于军火生产，在经济上虽有若干发展，但战后就业和失业问题很严重，生产相对过剩，仓库存货日渐增多，经济危机日益逼近，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为了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存在着若干矛盾。这是我们敌人的状况，他们是比第二次大战以前，更加削弱了。

而世界人民民主力量，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锻炼，及其以后的发展，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首先就是苏联的强大，在反德日战争中，苏联军事力量发展和壮大了，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培养和训练出了素质极高的大量军队干部，军事技术的提高，武器装备的无比优良，和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及其他重工业为基础。这样强大的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的部队，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在经济上出乎美帝国主义意料之外，她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进行迅速恢复，并有若干发展，工业生产已超出战前水平，在农业生产领域内，运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宽度也超过了战前水平。四七年底并顺利的进行了币制改革，取消了配给制度，由这个措施实际工资增高一倍以上，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是迅速的上升着。这与帝国主义的生产力停滞，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恰恰形成了一个对照。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苏联的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她和欧洲和亚洲若干国家都订立了友好条约。这是世界和平的柱石，我们对这个力量要有足够的估计。

东欧和东南欧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波、捷、保、罗、匈等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域，均迅速的恢复了为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制订了发展经济的计划，迅速提高生产力，为走向社会主义准备基础。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合并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在马列主义旗帜下领导群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从此结束了这些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正是有利于反动派，而为反动派所努力以求之的），因而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

在西欧　各国的民主力量也大为增强。如法国共产党员一百万以上，意大利共产党员二百万以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会员均在六百万以上。去年四月十八日意大利的选举，美国为了帮助意大利反动派赢得选举的胜利，曾用各种方法，去分化威胁民主力量，但仍有八百万以上的选民选举共社两党的联合阵线，美国看见这种分化民主力量的阴谋失败，乃进一步的刺杀意共领袖托格里亚蒂，又从而引起了七百万人以上的大罢工，以抗议这一卑劣行动。希腊和西班牙的民主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斗争。英国在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主力量也加强了。美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有大的发展，华莱士的进步党并参加了竞选，打破了二百多年来的两党制。

在远东　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生存，具有特别意义，它可以在这里销售商品和掠取原料，特别是中国，这是美国认为在东南亚反苏最适当最便当的基地，因而她极力设法援助蒋匪来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革命

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取得全国的胜利。美国帝国主义以中国作为反苏基地的阴谋必能打破。因此，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对世界民主力量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在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鼓舞之下，南洋和近东许多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缅甸、马来亚、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处，均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在朝鲜和日本民主民族运动也迅速发展。

若干世界性的民主的群众团体组织（如青年、劳工、妇女、学生）的设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设立，在全世界廿亿人口中约有二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从这些概括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其强大的程度，已经可以使我们有信心，以之作为基础去争取制止第三次世界战争的发生。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宣言，日丹诺夫、莫洛托夫都是这样估计的，斯大林曾几次的这样说过。我们要对世界民主力量作足够的估计，如此我们才有信心，努力去争取制止战争。

世界大战不爆发，对于人类是福利，对于中国革命有利得多，我们在胜利后的建设中，可以得到国际的援助。特别是苏联可以养精蓄锐，进行生产，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建设，当苏联生产力提高到年产六千万吨钢，六千万吨汽油的时候，世界反动派望也不敢望她了。

我们对民主力量应有足够的认识，不要作过低的估计，但我们也绝不能轻视敌人，它的力量还是强大的。美国还保持着强大的生产力，联合国大会还可以在他们操纵之下，否决苏联的正义的建议，而通过反动的决议。意大利的选举，反动派还可以获得胜利，他们努力采取各种阴谋和卑劣手段来破坏民主运动，而且还会继续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必须努力进行工作，方能克服战争的危险。

根据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我们对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应提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按照民主原则成立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内的较早或较迟时间。我们讲的妥协，不是指国际间的一切问题（如果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指国际间的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如对于柏林问题，如对德奥对日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会订下来的。如从四六年以来，苏联就与意、罗、匈、保、芬订立了友好条约，英美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的可能。

苏与英美法之间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妥协，乃是苏联和世界人民民主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做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它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向其本国的反动政府进行妥协。相反的，各国人民应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从来反动派对于革命力量有两条原则：即能消灭者坚决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针对这样情况，革命力量对于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今天我们中国实行的第一条，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争取革命的完全胜利。

第二　战略任务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一年左右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去年九月中央会议，总结了革命战争两年的胜利和时局发展，对敌我力量作了详细的估计。当时毛主席指出，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而在战争第三年经过了头四个月的伟大胜利之后，又提出一年左右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估计都是稳健的谨慎的。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在关于战争胜利的总结中，在中央公开声明中，和这次会议印发的小册子中都有说明，我不在此多加叙述，这里仅提出若干问题加以说明：

什么叫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呢？例如山西在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可以说在山西根本上打倒阎锡山呢，是的，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全部打倒。因此，我们只要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基本部分，并由于歼灭军队的结果，占领了各个主要的省份和地区，使其政权失去了抵抗的基本力量和依据，这就是国民党根本上被打倒了。但是如果把一切反动力量，从各个角落里都扫光，肃清封建势力，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要充分的估计胜利的前途，也要充分的估计到困难，和考虑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我们面前可能发生的困难，如果估计不足，由于我们工作不好，未能制止战争，世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的很快，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那时坚决打到底。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打仗的党，我们是不怕的。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就更好。

美国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想各种办法来支持国民党反动力量，来破坏中国革命运动，这也是困难，但我们可以克服。这两年多战争就是美国支持的，没有美国援助，蒋介石早就垮台了。据我们知道在日本投降之后，美国采取各种方式供给蒋介石的物资军火，共值四十三亿余美元。在抗日战争时期，美给蒋的援助值十五亿余美元，其中很少一部分是在印缅战场用于对日作战，绝大部分留在以后用于反人民战争，这样总计在五十九亿余美元，并没有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在军队方面，国民党的完全美械师和半美械师，总计一百二十个，经过两年零四个月（至十一月二日止）即被歼了近八十个。除此以外，还有接受日本一百多万军队的武装，所有这些都没有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命运，足见没有什么可怕的。是否美国会直接出兵打仗呢？这种可能性虽有，但大规模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世界人士和美国的人民都会反对他的，他国内很多困难并且资产阶级内部也不完全一致，而且出兵少了不顶事，出得多了那是国际问题。现在中国沿海就住的有兵，就是再来一些兵我们也不怕的，我们曾以几万人开始，八年打败了具有世界上头等陆军的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有三百余万军队，是不怕美国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丝毫放松对于敌人的警惕，美国会采取并策动国民党进行各种阴谋的，这些敌人绝不会放松压制人民革命运动的。元旦由蒋介石、孙科匪首以及其他蒋的嫡系和非嫡系的反动分子所发动的和平运动，以及企图利用既与民主阵营有联系，又与反动阵营有联系的人物，打进民主阵营，从内部来进行破坏，以取得喘息机会，保存残余的力量。再在适当的机会向革命进攻，这就是目前敌人所进行的阴谋。对于这些阴谋，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什么阴谋，我们要予以揭露，发动全国人民来坚决进行反对，采取各种步骤阻止这些阴谋的实现。教育党员、干部、部队，懂得这些阴谋的实质，不要丝毫松懈战斗意志。并教育引导全国人民将战争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特别要对部队说清楚，鼓起这股劲来，把战争进行到底，一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再加一段时间就是全国的胜利。

其次如果发生大灾荒，也是困难。七大也提过这个问题，太行、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灾荒来了，只有全党动员起来加以克服之。

虽然说是快胜利了，但是人还要死、粮还要吃、衣要穿、钱要用，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人力动员已到了相当的程度，通货膨胀，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财政、供给工作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组织性，所有这些困难都很大，但是可以克服的。党曾经过了若干大的困难，如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这是两次最大的困难。以后的困难就比较不同了，如抗日战争中的困难。这次战争，第一年有敌人进攻的困难。第二年有刘邓打到大别山去的困难。第三年有大的攻坚战，和大会战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克服了，胜利的渡过了；今后的困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下，是一定可以克服的，而且必须努力克服之。

为了一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就要军队向前进，作战方式就要正规化。现在有些地区部队正规化得好些，有些则差，在集中作战这方面来说，是比较正规化。在其他方面还差，如部队供给标准不统一，编制不统一，没有编定统一的番号，几个解放区的部队集中在一块作战就会发生困难。自然没有一定的条件（如交通运输条件等）对正规化有困难。但是我们必须有计划的克服尚存的若干游击主义，使部队走向正规化，不然我们就会发生错误，就不能走向全国的胜利。

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然就没饭吃。为了克服部队向前进中的困难，一方面要使物资补给经费粮食人力补充，从歼敌和扩大解放区中来求得部分的解决。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加强生产，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较之现有水平要增长若干成分，再加上节约，就可以保证使我们不致受到太大的困难。

第三　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我们政权的阶级性，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是工农，而是包括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叫做人民民主专政，是区别于蒋介石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各部门，都必须加上人民二字，如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这个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他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由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她的，我们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第四　以东北政府的财经委员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个区域

（现又加上中原、东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行政工作和管理工作，并将逐步走向全国统一。过去由于条件不完全成熟，没有进行统一。不统一对于支援战争，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困难，统一了对这些方面都有好处。特别是对支援战争现在是可能又必要的统一过来，可能不必要的暂不统，必要而不可能的，也不统。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个区域的党政军保障统一命令的执行。

但我们应认识到，虽然说财政统一了，但我们仍是困难的。我们这边的财政收入，只有这样多，如由华北供给一部分，他们拿金子来不能吃穿，且金子不多，拿棉花来需用去百分之三十多的路费，如拿布来，也要百分之三十多的路费，且会打垮我们的纺织生产，粮食拿不过来。而且华北的财政也很困难。因此我们仍要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彭总所规定的生活标准就很好，已经超过中农富裕中农以上的水平了。中央的同志，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标准。并号召其他解放区，生活向下看齐，就是向我们看齐。就是将来西安打下了，西北解放了，以至全国解放了，财政问题还是困难的。那时还要节约来进行建设，一句话，就是虽然统一了，我们仍要过现在的生活，即节衣缩食的生活，这种生活，至少还要过三五年。

第五　发展党内民主，练训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培养占领全国的各方面的工作干部

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需要增加。我以为在我们的部队中一般说来，民主是发展了的，比后方机关要好些。但部队中民主发展也不平衡，营以下民主生活，比团以上要好。营又比连差些。我们要放手的发扬民主，如此才能发扬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才能更好的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改善领导。发展民主的办法，是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代替干部会。后者召开迅速便利，这是好处，代表会要保持干部会的好处。

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不高的，有很多的理论观点，没见过，很多新的问题不会解释，如划成分问题就表现了我们理论水平不高。今后我们解放区迅速扩大，并将占领全国，有很多新的问题急需解决，有各种各样的人，须要领导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如果，没有一套去说服他们，就不能领导这些人。而且也不能说服我们某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禁止打人骂人，但我们还有打人骂人的现象，或者用打枪威吓战士的现象。我们必须加强学习，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第六　学会工业和做生意

我们已有了广大的解放区和许多城市，必须把这个任务在全党提出来加以解决。

第七 反对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加强纪律性

这是上述各项任务的保证，没有这一条就进行的不顺畅。现在无纪律状态，已发展到不可忍受的状态，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游击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等，各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从去春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并发起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把自己管理地区当作独立团的运动以来，虽有若干成效，但还没有完全克服过来。在战争第三年必须完全克服过来。首先从我们高级干部起，必须把它克服过来，只有上边搞好了，下边才可以搞得好。这个会议之后，回去要进行深刻的检查，并规定若干制度，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无纪律状态。

第八 励行节约

我们后方工作中和部队中都还存在若干浪费现象，例如在人力畜力的动员上，对资材的使用方面；对于装备弹药的使用方面；一颗八二迫击炮弹要三百斤米，只要一下就完了。对炸药使用上也要节省。又如同样打仗，一个是牺牲几个人打胜了。一个是牺牲几十个没有打胜。对俘虏有的争取了，有的杀了，有的就争取得多，我们要保护俘虏，一个也不要放掉。缴获要归公。例如缴了很多枪枝，到底现在还存有多少，我主张各纵队要清查一下。节约这个口号是有丰富内容的，与生产配合起来，我们即可以取得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犯命令

我人民解放军自转入进攻以来，所向无敌，全国胜利，屈指可期，国民党反动派懔于覆没的命运，近更灭绝人性，施放毒气，屠杀人民，破坏建筑，毁灭物资，作垂死的兽性的破坏。我全军上下，除应更加努力，采取一切有效办法，保护国家与人民之生命财产，使之免遭国民党军队溃败被歼时之破坏与损失外，应对此种战争罪犯彻底追究，严予惩处。为此，特根据我军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宣言之精神，宣布如下命令：

一、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下列各项罪恶行为之一，而证据确凿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

（一）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或拆毁焚烧人民房屋者；

（二）施放毒气者；

（三）杀害俘虏者；

（四）破坏武器弹药者；

（五）破坏通讯器材，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

（六）毁坏粮食、被服仓库及其他军用器材者；

（七）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及各种机器者；

（八）毁坏海陆空交通工具及其设备者；

（九）毁坏银行金库者；

（十）毁坏文化古迹者；

（十一）毁坏一切公共资材及建筑物者；

（十二）空袭轰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二、凡带头执行以上各项罪恶行为之一者，亦应依法惩办。

三、凡采取有效办法，因而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及一切属于本军的战利品及城市建设获得安全或免于破坏者，均给予应得之奖励。

我各地人民解放军应切实执行此项命令。

我军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上述战争罪犯应属于首恶者一类，必须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不容漏网，切切此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新华社陕北1948年12月25日电）

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毛　泽　东

一、十一月八日作战经过报告收到阅悉，甚为欣慰。即转发各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中央对你们胜利之贺电，望即印发全军以励士气。

二、你们尚有许多新的经验教训，望写出电告，以资推广。

三、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余万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即是说国民党已不可能再动员三百万人，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上请在干部会上宣布。

---

* 这是毛泽东同志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各局、各前委的电报。

中央军委关于成立中原、华野两军总前委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各电均悉，处置甚妥。

二、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邓、李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

三、若中原于攻克宿县后，能续歼固镇一带之敌，并以一部进驻蒙城，则可能推迟黄维向宿县进行时间并威胁蚌埠。

四、李延年现在蚌埠充六兵团司令官，辖九六军、九九军。据李称三十九军（即原驻烟台后运锦西现运浦口之八军王伯勋部两个师）十六日可到蚌埠、凤阳。请刘陈邓加以注意。由锦西南运之五四军（阙汉骞四个师）是否亦将加至蚌浦线则尚待侦察，假定该部亦到则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王伯勋、阙汉骞等部共计二十五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

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的电报。

中央关于组织平津前线总前委的两个电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一 中央决定组织总前委

为统一夺取平津及防守一个时期（大约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工作，均归其指挥管辖，以一事数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面商解决。

二 中央军委对总前委工作之指示

一、关于组织总前委统一领导平、津、唐一切工作，已见中央一月十日电示，为执行此电便利工作，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彭、叶等应移至××，以便机动地应付北平的变化局面。

二、平、津两军管会，除叶剑英、黄克诚分任主任外，其全部委员名单望由各市委提交总前委决定，并由总前委经东野中指定负责同志两人（如谭政）分任军管会副主任，然后电告中央经批准后，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委任发表。

三、平、津警备部队开始时至少须以东野各一个军担任，并须即行指定以便进行政策教育及接收准备，两军管会亦好与之接洽，该两军军长及政委即暂行分任平津两市之警备司令及政委，并加入军管会为委员，对塘沽的警备及接收，亦预先指定部队准备布置。

四、为使东野两个军及警备塘沽之部队，迅速于平津塘新的秩序建立后即行抽出以便休整，军委与高岗、罗荣桓同志商定，将东北四个整编师调入关内，组成一个新的军、（或再由林罗指定现有的一个新军抽出两个师与此新军中之两个补训师对调），到后，接替平津、塘沽、唐山及秦皇岛的卫戍任务，并划归平津卫戍区指挥。

五、平津地区所有作战部队的后勤工作，军委已与高岗、罗荣桓、薄一波同志商定，概归东野后勤部统一指挥，除东北已担任的四个月供给外，华北担任的对东北野战军的两个月供给及对华北二、三兵团的全部供给，统由东野后勤部规定送达地点、时间，电告华北军区转令前方照办，并经过华北军区派去东野后勤部之代表直接命令前方，后勤支前机关。上述

六个月外，华北并准备增加一个月的供给筹划，东北野战军所需经费一、二两个月之五千亿东北券，华北局决拨等值之五亿人民票，分批在前方付出，东野应将此五千亿东北券全数封存，送回东北财委会。中央决定在一个时期内，人民票暂不出关，东北票亦不入关，避免互相流通，以利东北建设。部队中所存东北票，应由东野后勤部负责以人民票收回，三月起东野经费即由中央以人民票拨付东野。东野从一月在华北境内所使用之人民票，东北应以何种方式和物资拨还华北，另责成中财部与双方磋商具体办法解决。

六、在平津作战期中，东野及华北二、三兵团所占地区的敌方仓库，原则上统应交与平津军管会派员接收，部队负看管之责。但仓库中如军火和军需品而为部队所急切需用者，得东野首长或为林罗授权之首长批准后，可加动用，其动用之数量应经东野后勤部报告北平或天津军管会。平津军管会接收仓库物资之分界在廊坊，廊坊属北平军管会，塘沽属天津军管会。

七、为使冀东早日归还华北建制以利工作布置，望东北局即令冀东区党委、军区、行署，自电到日起即接受华北领导，但支前后勤及一切与天津作战有关之工作，均属总前委指挥，冀东原辖之山海关应划归东北管辖，其所属之桥梁、工厂亦由东北派员接收，以利铁路修建。

八、罗荣桓同志今日由中央经彭、叶处回东总。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一）中国青年，在中国人民的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期间及抗日胜利以后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在中国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建设中，都起了伟大的积极的作用；经过了长期的各种斗争的锻炼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已经普遍地提高，涌现出了大批先进的积极分子。因此，仅有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读书会等类形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而党在解放区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因为缺少先进青年有组织有系统的推动，常常流于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党中央即已发出建立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提议，并责成各中央局、各分局择地试办；两年以来，在东北、华东、华北、西北（包括晋绥）各解放区，都已在若干地区建立有团的组织。各地区试办青年团的结果证明：凡是根据中央提议的精神所建立起来的青年团，都受到广大青年群众与成年人民群众的爱护，它在领导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土地改革及民主建设和文化事业中表现了极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完全可能的与必要的。根据此种需要，并为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它的任务，就是首先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并在这种实践的奋斗中不断地教育中国的青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应当吸收一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为新民主主义的事业而积极奋斗，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的男女青年为团员，其年龄一般地应为十五岁至二十五岁。正因为它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应该比较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民主阶层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团，以扩大自己的群众性，但是它仍然是中国青年群众中的先进积极分子的组织。而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青年团体。只有很好地组织中国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才能使中国广大的青年群众有一个巩固的核心，在全国青年群众中进行坚持不懈的工

作。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全中国的青年群众。团员成分应以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和一般劳动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和其他阶层出身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基础，同时也应当吸收其他阶层中的进步的觉悟的愿为新民主主义而积极奋斗的青年人参加。团内生活，应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民主的与群众化的生动活泼的作风，培养团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训练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应当特别注意防止在青年团的工作中和作风上产生狭隘的关门主义、青年先锋主义或宗派主义的倾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系统，党无权直接命令青年团。青年团内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并以不疲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巩固党在青年团中的领导。

（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因此，应在为人民大众与青年服务的基础上创造适合环境特点与青年兴趣的各种方法，团结和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去实现下列各项工作：

第一、当前中国人民的两大战略任务，为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恢复与发展一切解放区的生产事业。青年团必须把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前以及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二、青年团应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经常地注意和努力为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与切身需要而服务，并在这种努力中逐步地引导广大青年群众去参加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建设工作，和国际青年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和平运动。

第三、在青年团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地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去认识社会发展过程，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学习文化、科学、生产与军事知识；学习业务与技能；使每个团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与工作上，不断地提高自己。一切青年团员应该把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作为自己的光荣责任。青年团并应帮助政府教育机关，去改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第四、领导少年与儿童工作，吸收七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参加儿童团，吸收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少年参加少年先锋队，较小的农村则合组为少年儿童团。青年团应选派最好的干部领导这一工作，并在各级团委之下设立少年儿童部，或少年儿童委员会，作为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的领导机关。

（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建立在青年群众的自愿的和自觉的基础之上，要在群众运动与各种工作中公开地进行建团。因此，应在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中进行经常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在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中树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的认识。在开始建团时，尤须深入宣传与充分酝酿，然后根据本人自愿，经过入团手续正式入团。应当绝对防止在发展团员的工作中采用强迫办法、随便拉人入团的办法和简单地追求团员人数众多等项错误的作法与急性病。在建团工作中，一方面必须保持团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同时也要防止狭隘性，将一些先进青年拒绝于团的大门之外，妨碍团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各地党的组织必须将现有青年工作干部加以审查，并慎重与迅速地提拔、抽调一批思想正确、联系群众的青年男女党员干部，经过短期训练，使他们能够正确地掌握建团的方针。各级团委负责人应由相

当于同级党委委员与下一级党委书记的干部充任。两年来建团的经验证明，掌握中央建团方针，训练和配备足够数量的青年工作干部，乃是建团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建团的步骤，应当是有重点地逐步地向前推进，首先从城市、工厂、学校、部队及人口较集中、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村镇开始，然后再求普遍的发展。在上述地方，尚无团的组织时，党必须责成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划出一部分年青而优秀的党员兼为团员，作为建团的基础与骨干。区以上得设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在一个工厂、学校、街道或农村中，有五个团员，应即成立团的支部，一个区内有三个支部以上，即应正式成立团的区委，一县或一市，有三个区委以上，即应正式成立团的县或市委的组织，使团的组织与工作能迅速地得到发展，然后召集各地方各省及各解放区的青年团的代表大会，选举各地方各省及各解放区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新解放的城市与地区，因无工作基础，建团时则须较老区半老区有更充分的宣传酝酿与准备工作。

（五）中央决定在一九四九年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并选举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会。目前应即由地方青年团发起建立全国青年团的筹备委员会，筹备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召集。并提议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的联合组织。

为了有计划地训练青年团的干部，除中央已经责成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举办团校外，各中央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和市委并应在各该地区举办团的学校或训练班。为了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广大青年学习，中央决定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中国青年》的定期刊物。

（六）建立全国性的和各地方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下的极重要的工作之一，各地党委必须予以重视。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县委和市委，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关于在军队中如何建团另行规定通告）接到此项决议以后，应即召开会议，定出具体工作计划，并切实督促执行。

邓小平同志关于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给中原局的来信

（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

一、我们正在开会，这次会议解决问题颇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著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提高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强调指出提高纪律性，即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保障前两任务及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此种精神，从最近中央对东北局的批评电示可以看到，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对此应迅速检讨，成为一个正式的决议，报告中央，同时发给各区党委各纵队，我的意见应包括下述内容：

甲、我们本身对此环节的意义了解极不深刻，或只了解成为报告制度及政策的统一性，而未充分认识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给予党的损害。

乙、中原各区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是严重存在的。一年来的游击分散情况不能不使各地带有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发展了无纪律状态，如各地各部队自出布告，自订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报告不真实等现象事实很多（应列举其大者）。

丙、中原局及中原军区，对中央军委报告不够，对下面的不报告多采取原谅态度，亦即是自由主义态度。

丁、具体规定今年内克服此种现象的办法，特别强调党内的民主。这是个人意见，请开一次中原局正式会议（张玺、陈谢及附近纵队首长可到会讨论），作出决议，中央还拟有一个关于纪律问题的文件，待通过后即发下。再者九月分报告请按时作出。

二、华北、华东已决定合并。华北、华东确定今年不搞土改而以生产为中心，中央同志意见，中原亦应以生产为中心，连系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请研究指示各地。

三、今年华北、华东确定不扩兵（确有困难），年底拟扩一部数目尚待研究，军事问题正讨论中。

中原局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

中原局于九月四日集会讨论中央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报告制度的决定。都一致认为：

一、中央一月七日规定报告制度后，于八月五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电系统的说明克服无纪律和反无政府状态及报告制度的重要，又连续将各中央局讨论中央对报告制度的指示转给各地。此种严格地、有系统的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在中原是很缺乏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原局面正在草创，百端待理，情况复杂，如不学会中央此种领导方法，必致难于顺利完成创造中原解放区，并扩大战争规模到江南的光荣任务。同时我们研究毛主席去年九月着重抓住转入战略进攻和深入土改两大环节，去年十二月又于两大任务初步定局时，着重巩固反右倾的成绩，并同时对当时正在生长的左倾以致命打击。今年一月到五月最后确定了新区政策和老解放区土改、生产、整党和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任务，八月连续提醒各地执行报告制度——这是一年来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路线，抓住中心环节，以推动全局。此种马列主义的领导方法，必能有保证的领导大革命走向胜利。中原局决心用心学习，转用于中原的实际上。这里纠正了我们历来仅从工作关系上、组织原则上去认识报告制度的观点。过去我们没有把各级不作报告以及其他方面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提到原则的高度，没有把他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相反的采取自由主义的容忍态度，这是极其错误的。中原局过去虽曾定期作过综合性政策的报告，可是十分不够，其反映仍不全面，其政策性仍不充分。报告内容并未经过详细分析，仅由负责人起草后传阅一次即上报。同时把报告制度仅了解为中原局与中央间的需要，或中原局负责人与毛主席间的需要，并不了解中原局所管辖的各级组织更需要充分的政策报告和方针检讨。特别是中原各野战军、各军区、各区党委，从来没有检查工作、报告工作的习惯，中原局仅凭零星片断的或部分的记忆和接触来作综合性报告，自然其内容只能是大致不差。此种大致不差是距毛主席的政策要求太远的。中原局决心从这方面加以纠正，开始定出报告制度，养成定期检讨政策和工作的良好习惯，力求使每一次的中心工作均经过细心计划和讨论，向中央报，向下面传，以能达到少犯错误为目的。经过中央半年来有系统的指示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到现在，我们才了解这是关系全国革命胜利的工作中心环节。中原局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去更多的了解实际情况，更集体的去分析情况，更负责的去作出结论，使每一工作部门能有专门贡献，去帮助负责同志向毛主席作报告，以便及时取得中央指导，去更好提高自己的工作。

二、中原局面正在草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在各方面均表现着。首先是政策转变上，特别是对于停止土改转入减租减息的基本政策，目前仍遭着不少地方的顽抗。中原局“六六”指示虽引起各地注意并已开始转变，但确实遵守的精神仍差，某些负责人以自己的政策代替党决定的政策的不良现象仍然存在。他们是以口头上同意中央、中原局的新区政策，而实际则企图主观的去扩大土改面，总想多划一些土改区，以证明过去一年自己的工作是正确的。此种肆意孤行，必须引证当地假土改的实际材料才能坚决纠正，这是我们努力的第一面。第二、中原地区是各老解放区干部的博览会，也是几大部分解放军的博览会，同时加上一部本地干部，各地好坏作风一齐带来，八方风雨会中州。不仅许多坏作风肯定的不适合新区，就是老解放区的好作风也不一定可以照抄。我们最近正深刻了解中原某些地方的特点，如不深刻调查研究去获得地方知识，冒然决定工作方针，其为害是最大的。中原地方的地主、资本家、知识界和地方流氓土匪有长期应付南北战争的经验，有长期武装斗争经验，最善于应付上层，最善于控制群众；就是工农群众也看过多次朝代变换，不看准确，绝不轻易表示态度。我们需要艰苦的群众工作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从老解放区带来的工作方式偏于由上而下的一套，长于行政动员，短于深入农村与人民结合。目前各地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动辄以我在老解放区工作得彩自夸，不面对现实，尤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作报告，有的滥用职权，有的放弃职权，客观上形成一种“各党各派”的办法。虽然中原前线敌情未退，地区流动性存在，尚不宜超过实际限度去机械执行集中统一，但在政策上、工作方针上、工作报告上按规定讲程序、有组织、有纪律乃是必要的，这并不会与独立负责机断行事相矛盾，在统一政策的集中领导之下去发挥独立活动的能力是完全必要的。可惜这一方面比较少，正待培养和提倡。第三、野战部队、军区部队的本位主义、闹独立性、对上级指示抵抗、对地方党政不尊重、党委组织内闹不团结诸种现象仍不时发现。某些人把部队看成个人私有，比较大的战斗、重要行动、整训经过及结果从来不作报告；把公家的财产视为个人所私有，把自己领导的区域视为独立国；只向上级要人要干部要经费，而不向上级作报告和请示工作和呈缴经费；几个同志可以互相默契打埋伏，向党隐瞒。这些均是无纪律无政府的严重表现。中央局过去采容忍的方针是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今后首先纠正。

三、为了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厉行报告制度起见，我们决定：

（甲）中原局按单月到期向毛主席和中央作下列报告，初步分工如下：

1、向毛主席作综合性报告，小平（正），陈毅、子恢（副）。

2、向军委作野战军报告，伯承（正），陈毅、李达、际春（副）。

3、向军委作军区报告，陈毅（正），际春、李达（副）。

4、向中央作地方群众财政报告，子恢（正），雪峰、子久（副）。

5、上述二、三、四三项报告，均以带综合性为主，均应由负责人收集材料，自己作出分析结论，先在中原局会上作简略报告后才着笔，并共同核发。正负责人不在即由二、三名递补。

6、各部门工作报告应责成各部门负责作，经过中原局核发。

7、临时性事件或专题报告，视其性质由主管部门作，中原局核发。

（乙）中原局所属分局、区党委、军区、野战纵委应讨论此指示，具体检讨该单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表现，讨论出纠正办法，并订出定期作报告的工作制度。中原局认为：

1、分局书记、区党委书记、纵委书记应于双月向中原局（分局按中央规定单月报告）作综合性的政策报告，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项，着重概括分析该区情况和检讨政策的执行，均将结论和下一步的方针和办法告知中原局。

2、军区司令、纵队司令或政委，应于双月向中原军区作综合性的军区报告。包括该军区该纵队的军政情况和部队实际生活，特别是关于人民地方武装的建设方针上的检讨，例如部队整训、战斗、剿匪、部队生活、后勤建设、军民关系、军队地方关系等，均须有分析有结论上报。

3、军区政治部主任应向中原军区政治部报告自己的政治工作。

4、各行政公署主任应向中原行政委员会报告行政工作。

5、所有报告应于双月十五日前送达中原局、中原军区，以便中原局能以之作为根据进行讨论，并给中央作报告。

6、各地讨论此决定时，对于该地许多破坏纪律的严重事件及其代表人物，不仅限于说服，应视其性质分别处理，凡必须执行纪律者，应按党纪军纪考虑其处分，不应让某些反省专家，以自专家过关了事，以免日后又故态复萌。

（丙）现时，中原局除中原大学外，同级政府与民众团体等尚未建立，故无其他党组，一俟建立，当即督促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分局与区党委除自身对此项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外，还应指示督促地委，市委及专级以上政府与民众团体之党组同样地展开检查讨论，并分别定出对上级与对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

（丁）中原局认为这一决定的成败，取决于中原局及各地自身对中央政策的仔细研究和能较充分了解下层实际并通过实际两点来决定，因此必须建立派员巡视制度，汇报工作制度，并须认真执行。同时估计到在报告制度建立之后，必然有更多的电报文件蜂拥而来，如何处理方不白费，又不形成文牍主义，以及天空保密问题、机要规则问题，文件传达问题等，我们思想上应即加考虑，并作专门讨论。

关于中原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

陈　毅

毛主席：

现将整个夏季五、六、七、八四个月的中原情况及政策转变问题，向中央作如下汇报：

（一）关于中原情况

一、中原局面业已开始好转，这是经过夏季军事上的连续胜利，及中原局“六六指示”，政策转变与军事胜利并进，所获得的结果。由于这一好转，在中原出现了两种于我极为有利局面。

第一、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秩序已开始恢复，开始安定。（豫西某些中心地带人民说廿年来从未有如此安定的局面，历来的兵匪骚扰没有了，农民生产情绪开始积极，多买牲口。）农村逃亡地主极大部分先后回家，知识分子开始向我接近，中州币信仰已开始建立。物价还无暴涨暴落现象。

第二、许多中心地区的出现。如豫皖苏地区在七月以后，从阜阳敌撤退，中心区广阔无敌；豫西廿余县已无敌纵；江汉桐柏地区，在汉水与平汉之间取得了新发展，陕南之郧西、郧县已变为腹地；皖西、鄂豫两区已站稳了脚，大别山局面开始稳定等，豫皖苏、豫西及桐柏的一部，已联成一片。

上述两种情况的好转，是一年来努力的成就，这一成就，使我党在中原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中原解放区的建设，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开始进行，并造成将来南进的阵地。

二、蒋匪鉴于我主力集中作战，其在中原地方反动政权已被我摧毁，乃乘我过去政策过左所造成的弱点及针对政策转变，而干部思想尚有抵触的空子，采取了下面一些反动的政策：

甲、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即实施总体战，加强保甲，组织地主武装，围寨网，联防连坐等办法。

乙、由郑州、南阳、商邱、合肥等地，派遣正规军配合流亡土匪，千人数千人不等，分股对我中心地区进行穿袭，企图以此来分散我野战主力，减轻其野战军负担，同时尽量的扰乱我后方秩序，破坏我后方建设。

丙、在我地区组织谍报网，携带电台，潜伏我区活动，侦察我军动向。

丁、利用我党宽大政策，有计划的派遣特务回家，并且组织武装及进行恐怖的黑杀，镇压与威胁我区村干部，以“枪打出头鸟”，残杀群众中积极分子，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不敢起来。

戊、在我区广泛进行谣言攻势，说“三次大战已爆发，中央大军将来中原进剿，共军已在作退回黄河北准备”；宣传河北人如何不好，号召河南人起来反对河北人；而对于我政策转变，则宣传是共产党的“三头政策”、先甜后苦政策等等。

国民党反动派上述反动政策，是生了不少成效的。这时期内，我中心区后方被袭击的情形，各地皆有，区村干部被杀事件亦复不少，如方城县长即被敌绑赴南阳惨遭杀戮。敌谣言攻势亦收效很大，许多知识分子尚不敢踊跃入学，我“军大”搬到××，数月来仅×人入学，证明该地特务控制甚强。各地均有一股或数股反动武装，经常在边区或在我区穿插游击，如杞太淮等地之郭馨波、临汝之姚宝安、豫南之张旭东等便是这类反动武装的代表。敌我交界地区人民生活异常痛苦，一部分人民对我仍持观望态度，我区之流动性仍然存在，民主政令之推行仍然障碍很多。

（二）河南地区特点

河南地区出兵出粮，人民斗争性坚强，如经政治教育与组织训练，加以改造和提高，革命的效果必大；可造成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但我党足迹遍全国，土匪恶霸之猖獗与野蛮，又恐无逾河南者。豫西的鲁山、临汝、伊阳、宝丰、禹县、郏县等地可为代表。这些地方过去是白狼一刘镇华、樊钟秀、孙殿英的老巢，确有拉队伍、搞会门、打黑枪的传统。××驻地曾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南下干部数起在驻地横遭杀害，区村干部被暗杀事件，亦层出不穷，单人不敢独行，单人带枪更易招致土匪暗算，土匪的野蛮强横，实为他处所罕见。我们在具体研究了几个谋杀案后，了解了此种谋杀，多半是地主作后台，发动流氓退伍兵作凶手，有组织的干的，土匪、特务、大恶霸一般是三位一体。他们说：“八路军要粮要款要伕要丁，经过我一定负责办到，如直接动员群众翻我的底，则坚决同河北人斗争到底，枪打出头鸟，任何人先出头给八路办事，一定杀全家。”他们也确能口到手到，他们便用此种残暴的黑杀手段，控制基本群众不敢起来，不敢同我接近。我们以前的急性土改也确实曾便利了这般地主恶霸流氓的活动，我们左的偏向脱离了群众，地主恶霸的威胁黑杀，又控制了群众。此种情形，不仅豫西地区为然，桐柏、陕南、宛东、宛西，及豫皖苏各地，亦有类似情况。河南内地敌县区政权保安团队虽已被我摧毁，敌正规军虽已被我消灭撵走，但这一基层恶势力如不打垮，一切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办法，均将变成他们镇压群众的工具。这些恶势力有充分的封建斗争的经验，他们更善于应付我军，有的一到即来承包战勤，有的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来当乡保长，他们懂得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暗杀结合起来，每一暗杀事件，大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或者事先知情不讲，我们干部无经验，很容易被他们表面应付所迷惑，国民党的挺进武装与特务之能深入我中心地区活动，便主要依靠这一基础，我们估计如匪正规军进攻，此辈恶势力有极大可能组织暴动来响应。河南中上层人物，最熟悉改朝不换国的那一套，即拥你为王，下面得承认其统治地位，我们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先制服他们，要制服他们，必须发动群众。创造中原解放区的第一阶段，必须首先懂得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充分了解河南的地方知识，和地方斗争的知识，才能对症下药，收到实效。但我们南下的干部，只学会了老解放区那套正规的由上而下的动员办法。对河南是武装斗争又要和平交往，是公开斗争又是秘密斗争的一套，则颇不熟悉，必须重新教育，锻炼出一套适合河南新区的本领，才能根据河南的特点，解决河南地区的问题。

（三）中原党内部情况（略）

（四）关于中央新区政策的执行

自中原局“六六指示”发出后，走马点火、点火抄家，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粮等等急性土改办法已迅速纠正，对工商业的破坏行为业已停止，混乱的社会秩序，业已日趋安定。但根据我们所得材料，各地对“六六指示”的了解与执行，尚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对停止土改实行双减这一新区基本政策，亦仍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抵触。对在崭新区（即我军初到地区，或未进行土改点火地区）实行“六六指示”，大家毫无异议，一致表示赞成。崭新区外，除某某地区因环境动荡，对“停止土改实行双减”认识较明确执行尚坚决外，其他则或多或少尚有抵触。他们的理由及共同论点是：第一，双减不能满足贫雇要求。第二，坚持土改区的土地确已分配，而群众又要求分地。但我们进一步追问，则又谁也拿不出一个区一个村真正实行了土改的材料出来证明。第三，南下干部极大部分是搞土改有经验，搞双减无经验。区乡村干部极大多数是近两三年土改中产生干部，部分干部虽然曾搞过双减，但在去年整党中带过地富帽子，现在搞双减又怕将来整党挨斗。第四，根据中央以前指示，在环境安定、群众觉悟、干部准备三条件具备时可进行土改，因此他们分析：论环境我已有安定的腹心区，论干部我已较前为多，且有土改经验，至于群众觉悟则可以提高。根据这种理由，有的便提出下列布署：一、凡属梅花形的几个土改点或土改区，则采取消灭中间空白村，用土改去打成一片。（略）二、凡属比较安定地区，例如区党委或分区所在地，一律采用土改方针。这是由于他们对过早的急性土改所造成的少数勇敢分子孤立突出，工商凋敝、征粮困难、土匪蜂起、人民失业等等的危害性仍熟视无睹或认识不足，同时又对已实行土改地区，究竟群众的发动如何？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得到土地利益？又缺乏真正的调查研究，使我们至今还无确实材料。在各地报告上亦无人能负责答复，这还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这种对新区政策上的抵触是各有其程度上的不同，但皆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则是共同的。

（五）政策检讨上的教训

根据上述情况，及几个月来的经验，我们研究出下面的几点教训：

一、一个政策的执行和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从停止土改转到双减及合理负担政策，中原党即缺乏研究中央新区政策的精神，更未能很好的去具体研究当地情况进一步把中央的总政策与当地具体实际密切结合，然后根据当地各种知识，通过群众意见去订出适合当时当地人民要求的工作方针，而是仅凭主观办事。不仅坚持土改举不出真凭实据，即转到双减与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经验，在认识上亦很模糊。这不仅可以看出某些同志对过去的左尚有留恋，同时也检查出某些同志完全从右的方面去认识新区政策。例如有的同志把统一战线认为是“发动群众的策略阶段”，意思即搞统战不发动群众，有的同志在统战的美名下，竟写信给地主要他回家“造福桑梓”，有的甚至去组织地主的“和平救国会”，有的同志把暂时利用旧保甲，解释为单纯的劝旧保甲廉洁奉公等等，都是典型的例证。我们估计中原党内左右倾思想同时存在，但目前左还是主要的。故在掌握政策上常是左右摇摆不定。几个月来的

事实，教训了我们：一个政策的转变，首先非有系统的说明不可，更非根据下层的调查研究、从理论上实际上系统的说明和系统的教育不可，但在这方面，我们却是做得很差的，所以在纠正与领导这一政策转变上，仍难于贯彻，这是我们今后应特别注意和努力的。

二、各地把土改、把消灭封建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以为只要我一举手一动足，便可以成功。同时也不从整个战略利益，缺少从全局来看问题。对中原现有局势，在政策上要求："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及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势力，因而需要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这一层是未加考虑或考虑不够；对××万人马的军需供应问题的解决，不能不需要较安定的社会秩序这一层，也是不加考虑或考虑不够的；混乱的社会秩序，最不利于战争进行；生产工作最为人民所拥护，这些方面也是不加考虑或考虑不够的。旧的"土改加枪杆子"的观点，似乎在某些同志思想中，还残存着，甚至妨碍了他们对新区的认识。

三、对中央政策，各地均有断章取义，或利用其适合自己口胃的部分，作为自己掩护阵地。他们口头上同意上级指示，却又不把上级指示切实研究并带到群众中去查勘一下究竟如何是好，才最后决定方针办法。例如中央"五二五指示"指出江淮河汉地区绝大部分不能进行土改。中原局"六六指示"对土改已成为一片的地方可有保留的指示，各地即断章取义的利用这一点去扩大土改面，去划土改区，而并不是根据确实的调查研究，切实的知道某地的真分假分来决定。

四、某些同志总认为进比退好，快比慢好，他们认为停止土改实行双减，是退了一步。他们不了解过去的急性土改正是领导者离开群众跑得太远，现在要不脱离群众，就不能不退到群众原有阵地，与群众重新结合之后，然后再率领群众真正前进。在革命的道路上行进，离开了群众队伍来认识前进和后退，显然是无意义的。

五、是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行政作风相当严重，豫皖苏干部中相当普遍的流传着这样的论调："讨论土改派土改，派了土改催土改，催了土改缴土改"。在人民中则有过这样的反映："要我分地，请先把棺材准备好"，这些都是最中时弊的群众舆论，这也是群众工作中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行政作风的典型。我们深感形式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由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方式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普遍地在各地区存在的，因而也就普遍的障碍了我们党与群众的结合。当前群众的最大利益，普遍要求，是肃清土匪，打击政治上首恶，合理负担，获得初步解放。我们只有从群众切身利益迫切要求出发，从启发群众自觉自愿出发去发动群众；我们只有依靠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方式去发动群众，与群众呼吸相通，这才是真正的群众工作路线，但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群众工作路线。我们认为这一基本问题不解决，固然会使很好的一个土改法，一变而为原始的农民破坏运动，已令人吃惊，如果顺此路线搞双减，也难免不是："讨论双减派双减，派了双减催双减，催了双减交双减。"使很好的一个双减政策，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达不到应有的要求。

（六）今后的方针

一、今冬明春的群众运动如何发动，事关中原全局。我们正搜集材料，研究群运的方针。（下略）

二、坚决坚持中央新区政策和"六六指示"，坚决实行双减。（略）在我控制的中心地

区，首先着重发动政治民主运动，打击首要恶霸分子，厉行剿匪，实行合理负担，提倡生产，为群众做几件有益的事情，在双减条件业已具备时，然后才有计划有步骤的进入双减，不能机械的一律去“派双减”。

在许多接敌区还可不进行双减，而着重于对敌斗争，在这些地区，要使游击战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利用两面派与控制两面派相结合，争取地富左翼，中立中间阶层，团结知识分子，打击最反动的首恶，同时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在这些地区，以组织武工队，游击队，肃清土匪保护人民安全，减轻人民负担，团结大多数群众为主要任务。

在土改区责令各地切实调查研究，在这些地区以保持群众既得利益为原则，实行调整土改或改为双减，甚至双减也暂缓实行。既不准损害群众既得利益，亦不准主观的去扩大土改面。对于违反中央新区政策者，则坚决以纪律制裁。

三、深刻的群工教育，是群众运动成败的关键，各级党如不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要正确的领导群众运动，便成为不可能。我们认为无论土改也好，双减也好，或初步打击恶霸的群众运动也好，如果没有耐心艰苦的群众工作作风，如果不懂得如何下手去接近群众，如何去启发与等待群众觉悟，如何去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如何制定适合群众要求的斗争口号斗争纲领，如何去组织、领导与掌握群众斗争，如何去总结斗争经验，以这些经验去教育干部与群众，去提高干部与群众的觉悟程度，这些群众工作的基本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群工干部来说，都还有重新再教育的必要。

四、中原局办好中原通讯，通过党刊来传达与解释党的各种政策，教育党内干部。并用力办好党报，作为公开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阵地。各区党委则办整党班，地委级则办群工干部训练班，以此来说明党的政策，进行群众教育。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克服干部的各种偏向，更要强调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游击习气，分散的地方主义、山头宗派等等恶劣现象，以达到全党执行政策上纪律上的统一，使党的阵营和面貌为之一新，使党的各种政策，能正确的贯彻到群众中去。

五、逐步的改造政权，逐步的提高民主政权及群众团体在群众中威信。在新区初建的区乡行政机构，及工农团体，客观上均免不了带着维持会性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两面派作用，我们不讳言这一特点，也要懂得这一特点。但我们必须不放松一切有利条件与机会，逐步的去加以改造，要在群众中去发现真正的积极分子，很好的教育与培养他们，并逐渐的把他们提到领导地位上来，只有这样，革命的行政机构、和革命的人民团体，才能真正出现。

（七）其他各项工作的概述（略）

陈　毅

九月×日

（原载《中原通讯》1948年第2期）

中央军委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

据报锦州战役中有一个纵队纪律最好，长春接收中有一个独立师纪律最好，其他各部的纪律则有较好者，有较坏者，有最坏者。你们在结束沈阳、营口作战进行全军整训，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时，希望你们对纪律问题专门讨论一次，公开奖励最好者，批评最坏者，并做出整顿纪律的明确决议，然后要各纵委、师委对于此项问题开会检讨一次，并做出专门的决议，经你们审查批准，报告中央军委审阅，全国各野战军及地方军的纪律状况，皆有最好较好较坏最坏四种，均望于整训时照此办理。我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前委（在东北是军委分会）、各纵委、各师委、各军区、各军分区，均须开会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及整顿纪律问题，均须做出关于此两项问题的简明扼要的决议，两项检讨应分别开会，不要混在一次会上检讨，须写出两个决议，不要将两项问题写在一个决议上。此两项决议须利用秋冬两季（现在至明年三月）作战间隙有较长时间休整的时机完成之。中央军委在收齐这些决议以后将加以审阅，以其情况通告全军。如有某一个纵委、师委，某一个军区、军分区没有开会检讨，没有做出决议，必须补开、补做，以此定为一项纪律。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一项问题（这里所说的无纪律问题是指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将军队看成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财产，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前已多次通知，现在重复说一遍。关于整顿纪律问题（这里所说的纪律问题是指对人民，对友军，对俘虏的关系不好，违反了党的政策，乱抓物资，乱抢武器弹药，乱抢俘虏兵，缴获归私不归公，违反了纪律）现在通知你们，望一体遵办。现在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的时候。中央规定的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这一光荣任务，有提早一年完成的可能，全国人民正在殷切盼望我党我军去解放他们。希望我全体同志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使我党我军能够更加成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务，是所切盼。

---

* 这是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林、罗以及全军各前委、各军区、分区、纵委、师委的一个电报

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罗　荣　桓

这次师以上干部会议，是全军最大的一次，过去也开过干部会议，但没有这一次到的人数多，今后有一个时期内，是不容易召集这样大的干部会议了。昨天前天林司令传达了中央二中全会的决议，我要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来讲一讲。我们要在这个会议上把反无政府无纪律的问题做出决定，为什么呢？

一、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去年冬季军队即要做出这样决定，因为我们未得到适当机会，不可能召集干部会议，把时间拖长了。

二、我们本身也需要做出决定，教育全军，而且在我们军队南下执行任务中，更需要提出反无政府无纪律问题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次干部会中把中央二中全会的决议及反无政府无纪律的问题讨论一下，而且做出决定。

我的报告，大致上提出四段，作为同志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参考。

第一，从抗日民族战争过渡到人民解放战争阶段上来，在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执行了胜利的过渡，同时在短短不长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又胜利的进入了进军，把解放区扩成一片。目前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我们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军事上的指挥，更为迫切需要，如不这样，那我们在事实上也证明过去不这样做，是不能取得这个胜利的。克服无政府无纪律这是一个基本的胜利条件，我们应完全拥护中央屡次所指出的党内五种恶劣作风要从领导上来反对，这五种恶劣作风，大家也看到了，也讨论过了，粗率的处理问题，表现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告也是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粗枝大叶的处理问题，对中央文件不重视，不按规定办事，独出心裁，这都首先表现在领导作风上，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是不允许的，所以要反对五种恶劣作风。

第二，从东北人民解放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作过斗争的，如果说没有作过斗争，那也不合乎事实，不作斗争，就不可能有统一指挥，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这是给了我们体会的。但是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是不够的，更没有象中央讲的全面的提出问题击中要害。

我们回忆一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是由抗日结束后来自华北山东中原各个地区的，他的干

部来自更多方面，当时情况我们看到是各有一套班子，进入东北后，存在着自立门户现象相当严重，有的想创造新的山头，有的还想搞码头，同时在进入东北初期，东北党的领导上发生了政治方针的争论，争论什么呢？从敌我力量对比不同出发，有的估计敌强我弱，有的反过来估计敌弱我强，所以有政治上方针上的争论，产生了究竟以和平为主，还是以战争为基础，还是幻想和平，还是进行战争，还是先控制城市，还是先依靠农村，这都是分析敌我力量不同所产生的。认为敌人力量弱，则幻想和平即多了些，过于相信了和平，对和平发生了幻想，因之就认为以夺取城市控制城市为主了，而那时实际上是敌人强我们弱，我们从山东华北来到东北，是从战场上转下来，没有经过休整，有的是把武器也放下来了，到东北来补好武器，而东北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只是在红军那一时期的掩护，国民党却无论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强过我们，且伪满的一套都存在，伪满这一套组织都是适合于国民党，而不适合于我们的，我们是处于劣势，我们应以准备战争为基础，要切切实实的准备战争，那时讲和平根本不可能以我们为主的，只有准备长期的战争，那当然我们要把城市放弃，尤其是中长路沿线城市，我们应依靠农村为我们的立足点，包围城市。对和平发生幻想的首先以城市为主，准备长期战争的则要首先依靠农村，这是明显的两个不同方针的争执。因而发生在组织力量上也有争论，究竟还是为了照顾山头，还是克服山头，有的主张平均主义的照顾，那种照顾法，不仅山头愈照顾愈多，而且又出现了码头。我们是为了克服山头，而不是为了山头林立，山头林立不用敌人打，自己就搞垮了。

这个争论是政治上组织原则上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要把不正确的搞掉，把正确的建立起来，事实上错误东西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损害，虽只是半年时间不正确的占上风，不正确当道，撤退长春我们到了哈尔滨，那时思想多混乱，全军无所措，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也就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东北党的领导不统一，必然要产生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只有当党领导上统一起来了，一致了，正确的东西拿出来了，才能改变。那时有些人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收缴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主力补充主力，在敌人进攻下面，就散的散了，叛的叛变了，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害，给了我们斗争局面很大的困难。

只有当东北局一场争论，得出了一定结论，东北局领导基本上取得一致了，真正贯彻了毛主席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战略指示，才把全党全军团结起来，我们有了力量，才阻止和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建立了统一的集中的领导核心，所以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是领导上的方针没有搞对造成的，领导上方针没有搞对，更可能促成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如果方针搞对了，则是可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过去的历史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东北战争也证明了的。

有了正确的方针正确的领导还不能说所有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都能克服，东北局的领导改正了错误，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东北局自七七会议以后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使东北的分散局面不长，冀察热辽长一些，南北满很快连系起来了，夏季攻势后很快的打通了东西南北满的连系，并且依靠了城市铁道交通的便利，使我们完全可能走向统一集中，给了我们有克服无政府无纪律很好的客观条件。但是不是说有了东北局的正确领导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是否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就能全部克服了呢？并没有，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表现在军事后方战勤，对前线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中的各自为政现象，各军区各纵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门江，西北到哈尔滨、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各有生产的一套，做投机生意，

黄金黑金，包庇人家，各自生财有道，是很严重的。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执行不通的，特别是调枪马武器搞不通，如一九四七年收缴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拿不出来，自己私相授受，却是可以的。又表现在对上虚报多领少缴，是有事实的虚报很多，八纵队到四平明明只有二万八千人，而他们后勤总是报四万八千。向上领是多报多领，我们向下要的，是少报少缴。

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了某些克服，但还不是很好贯彻，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到。我们军队产生无政府无纪律，一是经验主义，只相信自己的一套，对于统一集中是没有信心的，一是本位主义，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独立自主，有很多的根源，习气已相当浓厚，只要有空隙，本位主义就来了，在锦州作战稍为松一松口，就搞得很乱，以后要调汽车也调不出来，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本位主义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之反无政府无纪律不能贯彻下去。

第三，中央提出反对党内的五种恶劣作风，又严格批评了我们不做综合报告，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推动，提高了我们反无政府无纪律的认识，使我们自上而下的进行这一检讨，从领导上来检讨这一问题，对于某些个别领导干部，军区，纵师等单位，我们也抓得紧了。有的事前不请示的，如沈阳附近处理敌军五三师起义的问题，辽西战场上私自决定没收敌人财物的问题；事后不报告的如紫荆山打下来又掉了，爱面子隐瞒起来到又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撤消某些指挥机构，拖延不执行，避免战斗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迟迟对飞机的控制等这些问题，启发了自我批评，有的已做出了结论，如对敌军五三师起义问题，做了结论，当事同志写了声明书；私自没收俘虏财物的军党委做了决定，军分会同意了这个决定；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做了检讨。但还有个别同志还没有自我检讨，希望这次大会上还有同志没有做自我检讨的，很好的做一番自我检讨。目前野战军、兵团、军师对请示报告制度，一般的有了建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减少中，但现在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已经做够了吗？还不够，必须指出还存在某些不好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有害的，我可以指出几种来：现在有人认为统一集中太多，独立自主太少了，妨害了个人发展，妨碍了自己前途。这种议论根本不对，今天不是统一集中太多，即是多一些也是必要的，过去不统一集中现象存在太多，必须强调统一集中。妨碍个人发展的说法更是错误。反映在干部工作中有不少干部不愿做非指挥员的工作，做也不愿做副职，认为非指挥员或副职，没有排场门面，充分表现个人主义的想法，在我们某些干部思想里是没有解决的。还有一种看法说在战场上缴获分配，服从统一集中，即要吃亏，要自己不吃亏先抓一把再说，以后去检讨受批评，这在我们照顾部队迫切需要上在处理物资上或有毛病，但这样想法是不对的，统一集中符合自己需要即赞成，不即不赞成，这是本位主义思想。所以必须继续揭发指出这些问题加以反对。

第四，为了接受二中全会决议和执行南下任务，我们必须继续贯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求得更好的团结自己，服从统一领导的指挥，同时还应指出南下胜利情况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生长，比如我们南下离开老解放区，进入新区，国民党统治区没有群众基础的，有也是很弱，有些地区灾情严重些，大军进入，供应问题会碰到困难，更需要我们执行统一集中政策，防止乱抓乱要，不要使我们南下时首先在群众面前打个败仗。

渡过长江解放几省任务，不外采用北平，天津，绥远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都是以战斗为基础的，不是战斗就不会出现，也不允许我们在长江以南存在的。绥远的方式，也是战争胜利来的，是为了继续战斗，便于我们各个击倒。是来自战斗为了战斗，离开战斗是不可能

存在，不允许存在的。这里就需要防止偏向损害战斗意志，比如轻敌思想在我们仍是要严重注意的，我们解放全东北，解放平津，装备好，打这么多胜仗，不好好说清楚，很容易发生轻敌观念，轻敌观念会损害战斗意志，事实上已有了表现，打安阳、新乡部队，自己规定只要两天时间，这是看不起敌人。林司令讲了我们所遇到的敌人首先是桂系，桂系是狡猾的有战斗力的，不要损害自己战斗意志，到那时吃亏。还有是缺乏最后胜利勇气，时事学习中说："要和平为什么还提八条？"这还是干部里提的，这是失去最后胜利勇气，失掉立场。他认为和平是又来一个国共合作，这是最有损于我们战斗意志的。所以我们南下解放几省的斗争方式有三种，基本上是以战斗为主的，防止损害战斗意志，要很大警惕，不管是轻敌，尤其是缺乏最后胜利勇气更不允许，要在部队里继续教育，我们要以战斗为主，但也要结合策略灵活运用，北平、绥远方式的解决问题，某些干部怕麻烦，认为不如打好，这也发生，这也是偏向。

总之南下斗争方式没有在思想上弄清楚，我们可能会犯错误，也可能出现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还有当把敌人力量打垮之后，我们还要相当的分散兵力去接管城市，去下乡发动群众。这种分兵是在全国胜利形势之下的分兵，我们先接管城市，依靠城市去领导乡村，这就不能强调分散主义独立自主权利，全国胜利形势到来，要集中统一有计划的建设国家，不能破坏统一，不在思想上搞清楚，又会犯独立自主各自为政的现象。所以南下解放几省胜利的出现，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也可能出现，各级党委必须把反无政府无纪律问题继续贯彻下去，如何搞法，我提出五点：

一、学习中央二中全会决议，要逐段逐句的学习，学习进入新区接管城市农村的政策，首先应当是团以上的干部学习，在行动空隙中组织学习，主要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了才有条件使整个部队由战斗队同时可变成为工作队。在全军中达到这样要求：使每一个连队能够做一个村工作，一个营能做一个区工作，一个团能担负一个县的工作，一个师能担负一个分区专署的工作，一个军接管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兵团担负一个省区的工作任务，这样使我们能变战斗队为工作队任务的完成。贯彻反无政府无纪律斗争，只有全军政策水准提高一步，才有保证，懂得政策，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才可以减少。

二、检讨我们过去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使以后更加加强起来。这点工作很重要的。一般的各级党委都能集体的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能做到这一步的也有。一般的做到的，也是表面的，有的不是真正做到，党委中间存在思想分歧不一致，有些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议上去讨论，存在个人心里，有些问题不在会议上讲，而在会后讲，互相攻击情况还是有的。这是说明我们党委制存在不健全现象。有些党委个人解决问题，还不善于团结全体党委同志共同解决问题，有意见不一致，也不善于在会前会后互相了解，而存在隔阂现象，在某些军中相当严重。昨天林司令传达二中全会决议，讲团结问题。林司令讲得很透彻，首先要求党委自己的团结搞好，才能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在底下才有威信，现在有些党委首先团结未搞好，底下就有了空隙，这是破坏党委领导威信的。有些同志把党委分工变成分割，强调自己分工，单独去解决问题决定问题，引起党委同志不满意，虽然事后有某些改正，但已给了底下漏洞。党委自己不团结，便给了底下师里自高自大，不听指挥，党委说话没有力量，敢于说话的也不敢说话了，于是底下无政府无纪律发生了。从师来看，凡是师的领导不集中不团结，那么团里可以公开不执行命令。师委集中统一讨论问题，那么师党委就有力量。所以各级党委要很好的检讨集体领导，有问题提到党委讨论，不同意见允许争论，会议前善于彼此

交换意见，找到共同思想共同语言，这样党委即能变成为有力量的党委了。

三、克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不善于把自己经验提高一步变为普遍的东西，报告制度中看到纵师委都做了报告，总的印象是现象统统罗列，没有加以综合分析，没有抽出主要的经验，也做了许多反无政府无纪律的决议案，但也是罗列现象，不去总结，有的还看为是额外负担，只要交了卷。这次反无政府无纪律决议案，有的不好的要退回重做，一定要总结起来，手工业方式不许再存在下去，这样才能使我们领导提高工作、搞好工作。

四、昨天林司令讲了防止骄傲问题，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几次说：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功绩看得太过份，今后任务更加严重，中国革命还只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基础，进了洋房子，没有文化的人还要有文化，把过去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固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数了一大堆账，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还不对他信任，今天是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首先不要把过去功绩过份强调，了不起了争功，一定要一个位子，没有表扬，不满埋怨，这种情绪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及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有党性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他是戈尔洛夫是夸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的包袱是"功臣自满"，这完全是可以解下来的，革命工作还多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包袱太重，走不动，过长江过不去掉下淹死了。所以防止骄傲自满非常重要。

五、我们在东北建军中特出的是敢于批评，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后更需要，能使用这武器，他的工作就能一步步前进，不能使用这武器，他就不能前进一步，过去有的同志对批评问题有些恼火，不大满意，有的公开提出要以后批评少些多表扬一些。我认为批评是主要的，尤其是领导干部，经过内战，抗战，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有了金字招牌，什么不在乎，批评就更重要。

要继续贯彻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要很好的贯彻执行二中全会决议，在反无政府无纪律斗争中要提倡干部很好学习，很好建立党委的集体领导，首先求得党委自己团结，要克服手工业的方式，善于总结自己经验，要防止骄傲，要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我们南下任务不会犯错误，很好的贯彻我们南下任务。

接管沈阳的经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沈阳军管会人员进城快，接管工作尚称顺利，兹将几点主要经验简述如下：

（一）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军管会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

1．各按系统：军管会下辖九个单位：

甲、经济处：接收资源委员会、生产管理局、中纺公司等"国营"工厂。

乙、财政处：接收物资调剂局、银行、税局等不属市管的财政系统。

丙、后勤处：接收包括军工、军需等联勤系统之第三补给区。

丁、铁路处：接收沈阳局、中长局、东北运输总局等。

戊、政务处：接收政务委员会、各省流亡政府、国立、省立学校与文化团体及航务、水利等不属于市的机关。

己、办公室：是秘书处性质。

庚、市政府：接收只属于市政府的各局、市政企业、广播电台、市级学校及文化机关。

辛、公安局：接收警察、特务系统、党团系统。

壬、卫戍司令部：接收"剿总"等军事机关。

依现有经验看来，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四个处，即：外交处，对付外交事项。军事处：接收航空、装甲等部队机关。社会处：接管国民党组织及民运团体。文化处：接收报纸、刊物、印厂、电影院、广播台等。

2．自上而下：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各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负责人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与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

3．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东北币十万元（等于四十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在避免紊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财、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

4．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与支配权。一律不准搬动，各部门不对原来（如铁道部、后勤部等）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有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此外，在入城之前，应连续广播各种政策办法（此条很重要），并需预印布告、信笺、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军管会机关，应放在食宿交通方便之适当地点，充分利用电话与各方联络。现

在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法，能够防乱与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

（二）怎样才能迅速恢复秩序，比较稳当而无多大波动？这有五个关键问题要解决：

1．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就没有电灯、自来水、电话等，电车与火车也无法开动，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十一月三日先解决了抚顺送电，群众甚为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

2．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隐藏和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沈阳各地一个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为吸引粮食入城，定价高于外地，二十六天来，粮源不绝，物价无大波动。粮价大体尚超出我百货公司收买价。对金元券处理，则先观望了四天，当金元券跌至敌一我一百五十元时，即挂牌以一比一百的比价收兑一星期，使之自动向蒋占区流出。对敌之九省券，亦按我一敌三千之比价，收兑一星期。两者共兑出本币二亿。沈阳解放后一个星期内，能开市的买卖，大体已开市，市面很稳定。

3．警察必须收缴枪支，但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大部可留，其他刑事警与武装警察队等，则于二十天后集中受训，也不宜过早遣散。

4．稳定人心，传布政策。这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与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就苛求内容生动，如何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一切布告，必须逐字逐句斟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报社与对外报导委员会，应各派一人在头半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密切联系。初期出报，排字、校对都用原人，我只派五六干部，故沈阳在解放后第三日即出报。

5．工资问题需妥善解决。沈阳（连抚顺、本溪）有公教职员约十五万人，如不注意工资问题，则人心不定。但工资问题不能一下合理解决，我于入城后五天，首先普发生活维持费（兼有使货币占领市场之作用），十一月份发临时工薪。沈阳系围城，解放前粮食奇贵，故工资标准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目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八十斤至四百斤。因此围城时提高很多，故一般已满意。高级技术人员工资应高一些。对国民党欠薪，则置之不理，有特殊情况者，可予必要救济。

此外，这次卫戍工作的缺点，在于卫戍机构本身不健全，没有建制部队，入城卫戍部队是临时指定的，最初几天，卫戍司令部命令不能普遍迅速下达，以致街上通行都受阻，手中又无机动部队，不能应付各接收系统的紧急需要。依沈阳经验看，除一般卫戍部队外，卫戍司令部尚需有一个半团的机动兵力，随时派出保护接收了的工厂、机关。卫戍部队应是单一建制、较有训练、有纪律教育的部队担任。

（三）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这两项工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治安秩序。如沈阳这样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敌之后方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乃至我历次放出归俘也不少，加以战败、突围、围城，散兵极多。一进城，首先碰到散兵游勇的收容处理问题。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如何往外分散处理。现在感到应先准备好几个解放团的架子，才便于收容。

弹药疏散，是入城后才碰到的问题，事先更无准备。沈阳原处在作战情况下，又是补给基地，不少弹药已经装车待运，各弹药仓库也均有铁路叉道可通，有许多弹药在仓库附近未卸车头，最初几天，敌机轰炸目标，首先就是这些地方。我们逐渐发现后，组三人委员会，动员很大人力，连夜疏散，力争搬动数里或数十里，幸而保存了这批弹药未受损失。如果重要弹药仓库被炸，沈阳可能半城被毁。现在看来，入城时须有充分铁路人员与保护车站的武装，以保证交通与疏散。

（四）军管会内部要尽力减少扯后腿抵消精力之事。如发生纠纷，军管会各负责人应坚持接收原则，秉公办理，以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或争工厂等纠纷。这次做到了一般未发生这些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军管会本身必须有坚持原则、不偏不私的模范行为。

（五）对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先有充分精神准备。军管会的首脑要有足够时间来考虑研究重大问题。此次外交、粮食、金融、捕人杀人等重大问题，军管会多少都有精神准备，但外交仍出乱子。

（六）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犯纪律者是个别分子。但对苦战之师，应在吃住方面，主动照顾。

（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觉，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积累有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存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中央对新解放大中城市管制经验的通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一方面可成立委任式的临时市政府，另一方面，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行之。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行之不便需修改或废弃者，可以军管会命令改变或取消之；行之取得经验而须改进者，或即以军管会命令加以补充，或留待将来在法令上改进。此种军管时期，愈到大城市，愈因其复杂，愈应延长，有些地方将来会在战争彻底胜利后方能取消，邻近前线的城市（如包头、汴、郑等）军管制亦不应过早取消，而在我包围甚久的中小城市如临汾、安阳、临沂等，便不需要实行军管制很久，即可建立民主秩序，恢复解放区一般城市的常态。因此，望你们对于所管辖的新解放城市，加以分别的具体研究，暂不忙取消各城市的军管制，而应对军管制的执行经过及其结果，加以总结报告中央。凡对十万人口以上的新解放城市及前线附近城市，取消军管制，必须经中央局、分局和军区呈报中央批准后，方得实施。中央正在草拟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及在军管期间的城市各项政策，各局、各分局、各前委（××××各前委除外），望速将你们对此的经验总结，限十一月内电告中央参考。

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农村政权问题给中原局电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

新区在减租减息阶段，一方面，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如果在县、区、乡即吸收开明士绅参加成立人民代表会议，就会模糊农民的阶级意识，妨碍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另一方面，群众斗争又尚未进入彻底消灭封建的阶段，如果剥夺地主与旧富农之选举与被选举权，则又不妥。因此，在新区暂不成立县、区、乡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应先自上而下地委派县、区、乡三级行政人员，先组织农民协会，并由农民协会及其所召集之农民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作为政权的群众基础。及至群众业已发动起来，农民协会已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人、学生、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也业已相继组织起来，即可成立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城市中，则首先成立各界代表会，作为市政府的群众基础。待工会、近郊农会及青年、学生、妇女等团体组织好后，再成立市临时人民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一九四七年冬的土地改革中，各地已有许多县区村建立了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并获得许多宝贵的成绩和经验，如晋绥之崞县和华北之平山。这些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之代表，大多是由各村群众大会直接选派出来，大村每村一人，小村数村合选一人，临时可以撤换。这种代表确实具有充分的群众性，会议也开得很活跃，讨论和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土地改革中确实起了不少的作用，如崞县一区代表会议对那样复杂的政策问题也解决得很好。因此，凡在土地改革中已建立了这种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并获有成绩的地方，不要以为土地改革结束而把它搁置起来，必须继续保持并加以改进和发展，必须把拥军、战勤、负担、生产等重要工作都拿到代表会议去讨论和决定，而不要只由几个人去决定，仍旧回到过去那种包办代替的方式，以便经常联系人民，吸取更多的经验，使人民代表会议不仅善于解决土地斗争中的各种问题，而且在拥军、战勤、负担、生产等经常工作中也同样有其积极的作用。至今尚未建立起这种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亦应按照上述的经验，把它建立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国革命正在迅速胜利地发展，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大银行及对外贸易等，均已经或将要归我方政府所掌握，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实行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否则决不能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接收沈阳、郑州及其他城市工作的经验，新提拔的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懂得工商业技术的干部，对于接管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是很能干和很积极热情的，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而农村工作干部及缺少工商业知识的干部，则对于接管大城市和大的工商业，就有很多困难。为此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的培养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为了迅速完成这项任务，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督促各城市党委及工会党组，大大加强同改善各产业中的工会工作与党的工作，从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细心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组织才能和办事才能的优秀分子。开办职工学校或速成的训练班，给他们以短期的普遍的政治训练及组织纪律训练，和城市政策教育等，然后依照情况，并在自愿条件下征调他们到新解放区工作去。在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脱离生产后，他们的家庭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凡党政军经机关因特殊需要，而征调参加受训或担负无工资工作的脱离生产的产业工人与职员干部，某家属生活优待又不能依靠农村代耕制度来解决者，须按其困难程度，发给其家属以其工资或薪水的若干成，以至全部工资或薪水，以解决其家庭困难，而他本人则按供给制的干部等待遇。如果他以后在新的工作岗位取得新的工资或薪水不少于他原有的工资或薪水时，即取消这种家庭津贴。这些家庭津贴或由企业机关发给，或由地方政府发给均可，但均须由国库开支。在目前必须不吝啬地发给这种必要的家庭津贴，才能成百成千的训练培养和提拔优秀的工人和职员干部，到党的政府的军队的特别是经济的各种工作岗位上去，这在目前党的政治任务与组织任务上，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望各局加以严重的注意，并将你们的计划和办理的情形及其中的经验，随时报告中央。

中央关于私营工厂复工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

（一）关于私人工厂工人要求复工，发欠薪，按旧有习惯发过年费或年终花红，确实不能复工者发遣散费问题，应肯定工人的这些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同意按你们所提的办法处理。即要资方复工，暂维持旧劳动条件，不得降低，或借给工人若干过年费；发工资，分红则按原有的实际工资发给。但应严重警惕资本家在恢复生产中的消极怠工。对于故意怠工的资本家，应予以必要的、适当的处罚。在召集厂主座谈时，应作如下宣布：

１、各厂均须尽可能迅速复工，不得故意拖延。其因特殊原因确实不能复工者，应向政府报告，经调查属实批准后，方得停业。如果厂主确实尽全力恢复生产，但确有困难，不能自行解决者，则政府将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必要的帮助，如果厂主不积极设法复工，而故意消极怠工，则政府将予以应得的处罚。

２、不得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及其他待遇。过年费、年终花红等，按旧习惯发给。如有必要改变工资标准或其他待遇，应经劳资双方协议，并经政府批准。经政府批准停工者，应发给遣散费。

（二）在厂主请求停工时，政府应派员确实调查，并召集职员及工人的充分的代表来共同审查资本家停工的理由是否充足，研究能否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如职工证明可以复工，困难可以克服，则应令资本家迅速复工。如资本家不听说服，不服从政府命令复工，则与工人、职员研究是否可由政府接管，由职工组织复工。如不可能，则应继续研究。如果大家认为无法复工，政府亦无力量帮助及接管复工，则准许暂行停工。

中央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三月）

关于处理旧职员电悉。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对于企业机关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的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设法清除那些坚决的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而依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乾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住高级位置，领取高薪，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显明的降低，则应适当的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这种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应如此处理。只有如此处理后，才能使企业内部安定团结，进行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这种改革。此外，一般职员亦有许多旧思想和旧作风，须要改造，但在进行上述改革之前必须准备好充分的群众条件，必须先在群众中宣传，提高群众觉悟，组织群众审查和评议，取得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但又要避免群众中的报复与私人挟嫌等，不使这种改革走入歧途或过分。这是你们现在就必须立即准备和着手来作的，在作法中，又应有适当的步骤，不可冒昧从事。又企业中的旧职员，一般都应受训（政治训练），训练班可由本企业开办，亦可由企业高级机关或由市政府开办，把那些应该洗刷的人员，首先调离本企业到训练班受训，然后根据训练后情形，或者开除，或者分配另外工作，其余一般受训职员，则仍回本企业工作。以上是初步改造企业中旧职员必须进行的若干步骤。

（二）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则须要采取另外的改造办法，也可以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因为除掉少数市政上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我们一般的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不打乱是错误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地集中训练，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学或华大、军大。有些年老或资格太高不能进普通训练班者，则组织特别训练班；但对这些人的训练班，须由华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别创办，不宜进华大、军大或人民革命大学。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张几个城市对调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县去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

17

3

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的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在我们的企业中，是实行薪水制，但在我们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除警察须特定待遇标准外，则还不能实行薪水制，还必须实行供给制若干时，故对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司法、军事、警察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只能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超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标准是不妥的。但在实行供给制后；对他们的家属，确实困难者，原则上按我们家属待遇，给以津贴；家有积蓄，不要津贴者，则可不给或少给津贴。但有特殊技术的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者，则须给以高薪，继续任用。你们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过去和现在，照原薪发给一月或二月薪水是可以作的；但向他们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错误的。对于旧政府机关的职员的处理，须要与企业机关的职员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你们来电所提办法，没有这种区别是不妥的。估计依照上述办法来处理旧政府机关的职员，是会有反抗和不满的，你们应该预先有准备，并须使自己所采取的步骤，力求适当，但对这种反抗和不满，不应害怕，而必须坚持这样去作。又估计依照上述作法，会有一大批旧职员不愿在我们政府机关工作，但除开十分不愿工作，不愿受训者外，我们应采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员的态度，决不可轻率的把他们开除赶走了事，而应细心地和他们讨论如何改造思想作风，为人民服务，及解决他们家庭困难的办法，以便能争取大批旧职员为我们政府工作。上述两类办法，望你们加以考虑。如有困难或新的意见，望即电告。如认为可行，望即根据以上原则，拟定具体办法，由华北政府及市政府实施。

中央对《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中央同意，望即发布。

（二）根据平津经验，军管会能很好的接收城市及工厂和资产，但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故军管会在接收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的机关管理和经营。例如将市政工业及其他若干工商业交市政府管理经营，其他工商业，则组织若干公司来负责经营，否则很难开工营业，即是勉强开工，亦难长期维持。

（三）根据平津经验，新解放的城市，照旧收税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旧的税收人员因在群众中种下很大的恶感，群众不信任，故由旧人员去收税普遍遭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后来委任我军人员任税收局长并由我军人员带领旧人物去收税，发给我人民政府税收局的收条，人民才踊跃交税，这一经验望记取。

（四）城市解放后，许多房客不交房租，房东亦不敢收房租，因此人心长期不安，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对此不应缄默长期不表示态度，应正式宣布除官僚资本之房屋应予没收外，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房客应继续交纳房租，租金多少应由房客与房东议定，有纠纷者应由政府或人民法庭调解仲裁解决之。

（五）城市解放后，常有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有些工人店员在老板恐慌情绪下分了店铺和作坊，我们有些区委和支部亦任意处理劳资纠纷。因此在城市中常造成若干劳资斗争中的无政府状态，破坏我们的政策，故在城市解放后，应重新发表新华社的二七社论及其他若干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并需规定每一城市的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需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军管会及党的市委则须派得力干部去指导总工会及劳动局的工作，使其能有效率地解决一切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要求问题，同时并须告戒支部和区委及其他机关，不要不经请示任意处理劳资问题。

（六）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大多有大批冗员及官僚制度，例如工厂中的警卫科厂警等，工人职员十分不满，要求迅速改革，而这些人员和机构也可以迅速改革，故在确立工厂管理后，应即发动工人迅速改革这些制度，以利生产。

中　央

1949年4月25日

〔附〕 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我军渡江南进，江南各城市即将解放，特根据中央各种指示的原则与各地接管城市的经验，拟定下列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

1、对新收复的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军管会的基本任务为：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肃清反动武装的残余势力，恢复并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建立革命政权；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的执行与有秩序的进行各种接管工作；协助工人职员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在上述基本任务大体完成，城市秩序安定，一切市政机关建立并经过上级之批准以后，始得取消军管制。

2、在军管会领导下可委任市长并成立市政府。凡我党我军既定之各项政策，应以市政府名义公布；但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则可以军管会的命令行之。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各按系统，整套接收。在军管会下要有足够的经过专门训练，纪律良好，有相当城市知识的专门警备部队和公安武装，以便看守工厂、仓库、机关、公共建筑物，和巡逻街道，防止特务破坏与市民偷窃。（同时各接收系统亦应各自配备看管工厂仓库之专门部队）。各部接收工作人员应随同部队迅速入城，并事先准备好工作需要的运输工具与食粮之供给。对城市人民的粮食与煤炭的供给，亦须预作必要的准备。军管会入城后应首先注意恢复电力供给（使一切市政工业能够继续工作），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使商人敢于开市做生意），迅速恢复交通秩序（可利用旧有警察徒手站岗维持交通），迅速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并注意防火消防工作与城市卫生工作。对一切接管之工厂，应按原职原薪立即复工。这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的基本环节。我们对一切新收复的城市，必须做到接收得好和管理得好，并必须“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二中全会决议）

3、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纪律的好坏，特别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定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因此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一切接管机关从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干部直到勤杂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一切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下列入城守则：

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配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

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

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

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

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逮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

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

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外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方法。禁止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

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内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或练习射击时，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

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众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

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

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资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4、我军进入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以便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当我军进入江南初期，必须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及对各城市进行系统的接管工作，而尚不能进行有系统全面的社会改革。因此我们在接管江南各城市时，应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以便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并必须实行以下各项政策：

第一、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图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必须一律接管。我们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时应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同时必须严格的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机构。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方面可以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如果仅有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的接收，而无自下而上工人职员的审查和检举相配合是接收不好的，对于接管来的企业的原有人员（包括厂长、局长、监工、

工程师及其他职员），除个别破坏分子必须逮捕处分外，应一律留用，并令其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生产，而不应干涉或代替其职务。如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或原有负责人劣迹昭著非撤换不可者，亦应从本企业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可委第二或第三级负责人代理）。对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变或废除。对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亦应暂时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需要加以改良者，旧人员中有需要加以调整者，均须在情况了解后，再作必要与适当的处理。

第二、对私人经营的企业（如工厂、公司、商店、仓库、货栈……等等）及一切民族工商业的财产，应一律保护不受侵犯。私人工商业中如有股权不明或部分股东确为重要战犯或为官僚资本者，应一律暂缓处理。但可先行登记加以监督，防止转移资金货物。对私营企业应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一方面要教育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工人失业；另方面要严重警惕资本家故意消极怠工，或借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及其他待遇。如劳资间有纠纷时，可由军管会召集双方调解或仲裁之。必须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富消灭封建的办法错误的应用到城市。同时对故意消极怠工的资本家，应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罚。

第三、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应由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具体办法应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对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处理之。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应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须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可以分别录用。江南各大城市解放后对保甲人员可暂时利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持。其办法可按照中央机关暂时利用旧保甲长的通知具体处理。

第四、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要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应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其余暂时照旧。例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第五、应建立各界代表会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各界代表会的组织和职责应遵照中央关于成立各界代表会的指示原则进行。

第六、我军进入江南应确定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票为本币。对伪币金元券应采取排挤方针，辅之以限额收兑。人民票与金元券的比值及限额收兑的具体办法，应视当时情况规定之。

第七、我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应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以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但一般标语口号，必须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始可张贴。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应一律没收接管。对各个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也可以没收接管。其反动政策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可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应全部接收。

对大城市广播电台及广播人员的政策，应遵照中央指示的原则办理。

第八、对国民党监狱，在押人犯，须经过审查分别处理。对革命分子应立即欢迎其出狱，对重大刑事案犯如盗匪犯、杀人犯……等，仍宜拘禁听候处理。对国民党的司法机关的接管，应照中央关于接管平津司法机关指示原则办理。

第九、对新收复城市的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该一律暂时照旧征收。除少数苛捐杂税（如防共捐、戡乱税等），应即停止征收外，对一般旧有税收、税率及税则，应待调查研究后再行改革。在我税收干部缺乏条件下，除对个别为人民所痛恨的旧税务人员应加处分外，对一般旧税务人员亦可暂时利用，以便逐渐训练改造或待将来再行调换。

第十、必须组织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并在此委员会下设立公共房产管理处，统一管理与分配城市中一切公共房屋，不许任何例外。一切公共房屋连同房屋中的家具、设备、衣被、草木等在内，不论有无机关或个人居住和已否分配，一律归房产管理委员会接收和保管，并进行登记造具清册成为国家财产。对各城市公共房屋的具体处理办法应遵照中央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决定的规定。对私人房屋暂采一律照旧缴纳房租的办法，以后房租亦应暂由房客与房东协议规定之。

第十一、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未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切实保护。对教堂及一般外侨亦应采取保护方针。如外侨有犯罪行为应依法处理。但除现行犯外，必须先报华东军区，重要者则必须转呈中央批准始得逮捕与执行。对外人所办文化教育机关及其他事业的处理，均须遵照中央外交工作指示原则执行，且必须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

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①]的信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②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5月1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

①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

②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

中共中央复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电悉，同意你们关于招待和欢迎民主人士的布置，此外望注意：

（甲）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的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乙）此间曾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过以下工作：（1）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已报告过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2）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过我党新年献词；主席八条文告（他们致东北民主人士两个电报，即由此产生）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我们有负责同志参加。（3）他们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谈话交换意见。（4）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5）组织参观。（6）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每人赠一册）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新闻）。（7）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8）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有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以上各项工作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9）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

这些经验，供你们参考，可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加以运用。

（丙）上述方针，应在干部会议上明确地传达与讨论，使大家都能掌握其精神，主动地向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宣传又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另方面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无纪律无组织状态。

〔附〕 林彪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在二十六日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在北平开这样大规模的、这样隆重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意义很重大。今天到会的，有由国民党区经过种种困难来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团体与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也有全国总工会、解放区农民、全国学生团体、全国妇女团体与少数民族的代表。这说明中国革命已接近于最后胜利，说明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伟大与团结。从国民党区来的诸位

先生，过去长期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进行过民主斗争，坚持与扩大了国民党区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区民主运动对于解放区军民的战争与斗争是一个有力的配合。我们对于由国民党区与各解放区来此的民主人士，表示钦佩与热烈的欢迎。

诸位和全中国人民今天最关心的问题是和平问题。关于这一个问题，许多先生发表过许多好意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正在为了实现全中国真正的和平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取得真正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向无和平诚意，尽人皆知。两年又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这次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上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但他们失败之快，则出我们意料之外。在东北，去年秋冬季作战五十二天之内，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十七万。在淮海战场上，我们在六十五天内消灭了敌军六十万。华北的解放，也比我们的预料要快。国民党反动派今天在军事上不但已无进攻力量，也没有系统的防御力量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已四分五裂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伪装起"和平"来。他们企图以此欺骗全国人民，停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进行反攻。并且企图在民主阵营内组织所谓"反对派"，以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因此，他们所争取的"和平"，是为了维持反动势力的利益，是为了战犯们的利益，对全国人民是不利的。但是，在全国人民觉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的今天，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是不能成功的。所谓"反对派"的阴谋，也同样要失败。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多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用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当然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继东北全部解放之后，在华北又取得张家口、新保安和天津的胜利，加上北平城内外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傅作义将军之认清形势，未作无谓的抵抗。

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我们欢迎诸位先进帮助我们在长江以南实现北平方式的和平。在今天蒋介石的主力已全部歼灭，剩下的力量已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全国大规模战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长江以南，已不可能有巨大规模的战争。在已经解放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五大解放区，已经开始或准备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在不久将来，在长江以南，实行了真正和平之后，也将很快地开始建设。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利于人民的建设。破坏是为了扫除建设的障碍，是革命过程中所必须的而又是不得已的手段。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破坏旧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团结了全中国人民，不久将来即可以解放全中国。今后，更将与全国各民主阶层、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全国人民一道，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从事全

国规模的建设。由于解放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目前建设的首要任务，仍是努力支援前线，同时应尽可能改进人民的生活，并为以后系统的、全国性的建设打下基础。各位过去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有很多的贡献，希望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能有更大的贡献。敬祝诸位健康。

（新华社北平1949年1月27日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抵解放区民主人士电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淑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此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励，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覆，敬表欢迎。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附〕　抵解放区民主人士电贺解放军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先生，并转全体战友均鉴：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二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逋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荡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

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　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　晗、许广平、楚图南、丘　哲、韩兆鹗、许宝驹、田　汉、洪　深、侯外庐、沈兹九、宦　乡、杨　刚、曹孟君、李文宜、罗淑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　颖、安　娥、吴茂荪、何　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　震、沈　强、王蕴如。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中央关于揭破国民党和谈欺骗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

美国政府指挥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打击下，已起分化，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果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已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对时局声明，我党发言人又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望各地迅即将李、沈、马、郭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至于战争罪犯名单，十二月二十五日某权威人士发言中，，所提的四十三人仅是第一批，我们现正准备提一个比较完全的名单（亦非全部），共约一百名左右，日内即发给你们，望你们先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中酝酿，透过各民主人士提出较完全的名单，并不限于一百名，只要是人民公认为战犯者，不论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均可以提，并迅速电告我们，以凭决定，是为至要。

蒋介石"引退"真相[*]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二日电**〕国民党政府伪总统蒋介石在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而把职务"依据宪法"交给伪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是美国政府久已内定在必要时机代替蒋介石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支持他当了伪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曾用各种方式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到幕后去。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杜鲁门曾于去年十二月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宣布辞职。蒋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介石所发的"引退"文告中说了一句"李代总统"，随即由中央社更正为"李副总统"，以免人们关于蒋介石的"总统"地位继续存在一点发生任何误会。蒋介石在"离职"以前对于继续反革命战争作了新的安排，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十九日作出"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荒谬决议的同时，通知驻南京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际权力仍然操在蒋系和蒋介石本人手里。一切迹象，都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有任何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和平的诚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附〕 蒋贼在幕后发号施令

表面上宣告"引退"的第一号战争罪犯蒋介石，仍然在幕后发号施令。本社在一开始即加以指明的这个事实，现在连美帝国主义的通讯社也无法加以掩饰了。合众社南京十九日消息说："蒋介石现在居住的奉化溪口镇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总统总部，这个地方有着分裂了的中国"国民党"首都第三部分的外观（南京和广州是其他两部分），来来往往的电报电话很多，它们把报告带进来，把命令送出去。在蒋介石退休的头三个星期电报设备还没有装好的时候，两架专机在溪口与南京、上海、广州间穿梭地来往，担任一部分忙碌的交通。不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久前南京把一个强有力的收发报机送来了溪口，专机的往返也就取消了。他除了以“党总裁”的资格控制国民党之外，还保持着他的军事权力。他经常以电报、电话和南京的国防部联系，收到军事形势报告，并发布命令指挥重要的军队布署和军事任命，譬如说新训练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降落伞部队的军长、师长，就是由他遴选的。不久前国防部提名一个将军担任厦门的警备司令，国防部把这个提名送到溪口请蒋批准，但是他拒绝了这个提名，而选择了另外一个将军担任（这两个将军的名字还不能发表）。蒋介石对中央银行也保持着兴趣，有几次他用电话命令上海中央银行的行长把黄金与白银运往较安全的地方。”另据同日美联社南京消息说：“自蒋氏‘退隐地’抵达南京的消息称：‘委员长’对于政府的控制权未能放手不管。他们说由于他越来越感烦燥，他的活动正在逐渐增加。这些活动包括每日藉电话与要人们——军事、政治与经济官员们（他们在技术上是受李宗仁的指挥，但个人仍忠于‘委员长’）谈话。”合众社和美联社的这些报道，显然反映着一部分积极支持李宗仁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观点，首先是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的观点。美国人在这里警告蒋介石应该谨守美国为他预定的防线，而不要跑得太远，以免根本破坏了李宗仁与他的分工。

（新华社陕北1949年2月21日电）

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一九四九年四月）

毛　泽　东

一　四月十六日给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报

（一）总前委十五日九时电悉。

（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①，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

（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四月二十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四月二十二日改至四月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②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渡江战役的三份电报。

①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

②汤恩伯，当时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二 四月十七日给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报

谈判至十五日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十六日九时电问你们是否可以由二十二日渡江改为二十五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二十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以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二十五日。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二十二日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三 四月十八日给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的电报

（一）总前委十七日一时、十七日十五时两电，粟张十七日十三时电，刘张李十七日二十一时电，均已收到阅悉。

（二）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需的，我们早已同意了。

（三）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锡联、谢富治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时轮、郭化若九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四兵团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建安、谭启龙七兵团，杨勇、苏振华五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

（四）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关于具体实现八项原则毛主席电复李宗仁

南京李德隣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附〕　李宗仁致毛主席电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誓。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詧。弟李宗仁卯阳印。

新华社按：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

（新华社北平1949年4月9日电）

〔附〕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

新华社北平二十一日电：经过半个月谈判，四月十五日由中共代表团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

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 “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至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

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

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1949年4月15日）

抗 议 英 舰 暴 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新华社社论

当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怒潮已经席卷长江以南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态度。恰当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拒绝和平协定的时候，英国军舰四艘在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竟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与国民党军舰共同炮击人民解放军，致我忠勇为国健儿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众。这件事现已震动中外，不但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愤怒，而且引起了除极少数帝国主义死硬派分子以外大多数英国人民的抗议。英国人民不懂得，何以在中国国内战争的紧急时期，英国政府突然命令它的军舰侵入中国内河，而且侵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水上防线。英国人民提出了正义的要求：立即将英国武装力量全部撤出中国。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必须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赔偿、惩凶和道歉。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狂妄地宣称“英国军舰有权进入长江”，英国保守党的报纸更狂妄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抵抗英国军舰的侵略是对于英国的“侵略”。但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们必须懂得：中国现在不是一九二六年英舰炮轰万县的时候了，不是一九二七年英美等国联合炮轰南京的时候了，长江已经属于中国人民及其人民解放军，而不再属于奴颜婢膝者的卖国者了。英国保守党分子说得对，这在几年前确是“不能想象”的事。英国的侵略者的军事力量必须退出中国。平时站在英国前面侵略中国并干涉中国内战，而在这次却让英国站在前面的美国侵略势力，首先是它驻在中国领水领土上的海陆空军，必须退出中国。总之，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首先是它们驻在中国领水领土上的海陆空军，都必须退出中国；只有这样，它们才有以平等地位与中国建立通商和外交关系的可能。外国人可以在获得中国人民政府允许和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以和中国人民平等的地位，在中国从事各种善良的业务，却不允许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的特权。

（新华社1949年4月24日）

〔附〕 国民党勾结英舰联合向我进攻阻挠我军渡江

在镇江江阴段的渡江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曾于二十日及二十一日战胜英国帝国主义和国

民党的大队军舰的联合进攻，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极大注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二十日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除和国民党陆军作战外，还要和国民党的海军作战。二十日上午，有两艘敌舰由东向西开来，向我泰兴县西北扬中县正北名叫口岸的北岸桥头阵地发炮，其目的是阻我向中心洲进攻及展开船只渡江。我军炮兵当即奋勇还击，敌舰一艘被毁，不久下沉。另一艘负伤，向西驶至镇江附近大部下沉。此时又有一艘敌舰从镇江方面向东开进，至口岸附近向我阵地发炮，我再还击，又将该舰击伤，该舰后向下游驶去。二十一日上午，又由东面来了两舰，一大一小。此时我即首先发炮，使其不敢追近，又将该两舰击伤，狼狈向来路江阴方面逃去。由于这一次向敌舰作战胜利，方才将敌舰阻我渡江之计划打破，二十一日下午方得大举渡江。当我军和上述五艘敌舰作战时，江中尚泊有几艘敌舰和上述五舰相距不远，亦参加战斗，惟畏我炮火，不甚积极，直到二十一日夜间，我军还以为上述各舰都是国民党的军舰。到了二十二日，从各方面收集情报，方才知道上述诸舰中，竟有四艘是英国军舰。四艘英舰中，有三艘在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大概是逃往上海。另一艘英舰现搁浅于镇江附近不远的江中。要待我军占领镇江后才能将详细情形查清楚。在和上述诸舰作战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阵地及武器被毁一部。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同胞，现当日暮途穷之际，又复勾结英帝国主义的大队海军深入长江，图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种卖国残民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新华社长江前线1949年4月22日电）

向全国进军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毛 泽 东

（一）粟裕、张震二十二日十三时电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①]、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②]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③]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六）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野战军的电报。

① 永州，即今湖南零陵的旧称。

② 白崇禧，桂系军阀首领，当时是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

③ 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告“引退”，但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其残余力量从事内战。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邓　小　平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

* 这是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的前一部分。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

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二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象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逃敌*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月）

毛 泽 东

一 七月十六日给林彪、邓子恢、肖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报

（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①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部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部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柳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部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挥我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

① 宋希濂，当时是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当时是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二　九月八日给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并告林彪、邓子恢的电报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

（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藏江、宝庆①、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三　九月十二日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的电报

（一）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

---

① 宝庆，即今湖南邵阳市的旧称。

（二）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1]、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四　十月十二日给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方方、邓华、赖传珠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

（一）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二）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部不能向贵州退却。

（三）二野五兵团请令其速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1] 叙府，即叙州府，今四川宜宾的旧称。

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新华社社论

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的重要阴谋之一，是繁殖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骚动，扰乱社会秩序，阻塞城乡交通，牵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南进，并破坏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阎匪锡山的所谓“战时施政方针”，提出要“实行军政配合，加强省县职权，发展民众武装，进行敌后游击，贯彻总体战”。这里所谓“民众武装”，便是政治土匪，所谓“敌后游击”，便是对人民祖国进行骚扰破坏；所谓“军政配合”、“贯彻总体战”，便是要是这种特务性的土匪武装与残留的地方反动政权、反动势力勾结起来，以政治欺骗和武装捣乱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祸国殃民的罪谋。在这种阴谋策划下，国民党匪帮对于已解放的地区，便派遣和预置特务匪徒，勾结当地的反革命的恶霸地主，收罗被击溃的散兵残匪，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落后群众，举行武装暴动；而在尚未解放的地区，则正在动员一切卖国奸贼、军阀官僚和其他社会渣滓，并依仗政治权力，组织所谓“反共自卫救国军”之类的土匪武装，准备待机反抗人民解放军。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种特务土匪武装寄与极大的希望，给予金钱和军火的接济。中外反动派妄图凭藉这种土匪武装，进行垂死挣扎，并准备使之与外国干涉者武装互相勾结，图谋复辟。中外反动派的这个如意算盘无疑地是要破产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既然能够歼灭美帝国主义全力支助下的五百七十万国民党匪军，推翻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当然不难彻底肃清中外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武装，巩固人民祖国的革命秩序。然而由于这种政治土匪与地方反动势力相结合，而且有着外国干涉者的援助，所以他们便特别猖獗，特别凶残，已经并将继续给予祖国人民以极其重大的危害。如果我们因为主力前线的胜利，而骄傲自大，麻木不仁，轻视这一重要的武装敌人，对于他们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这辈小丑不值介意，听其自由发展和活动，那么我们将会犯重大的错误！许多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因为抱着一种盲目的太平观念，丧失阶级警觉，没有注意及时扑灭土匪，以致使党和人民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难道还不足以教育我们吗？

现在，许多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在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十二年的残酷剥削和兵燹之灾以后，迫切的要求社会秩序的安定，城乡贸易的畅通，经济生活的恢复正常，以便迅速的治好战争破坏的创伤，重整自己的家业。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地制造的特务土匪的骚扰作乱，烧杀淫掠，却使人民的要求无法实现。在人民解放军消灭或击溃国民党匪军，解放广大的城市和乡村以后，如果许多地方实际上仍为特务土匪和反动势力所控制，则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无法推行，旧的反动政权不能改造，人民的负担很难减轻和公

平，救灾治水等急要之举也受到阻碍，一切革命工作无法展开，城乡关系不能沟通，人民币不能占领广大的市场，经济生活无法恢复，城市将被孤立，农村将被窒息。因此，在解脱国民党暴政的压迫之后，特务土匪便是人民当前最主要的和最可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则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因此，发动大批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学生下乡，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动员广大农民，肃清土匪特务，推翻反革命恶霸分子的统治，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并进而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便必然应该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许多地方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凡是新解放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集中全力进行剿匪反恶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这几乎已经成为斗争发展必经的过程，谁要是不及时地抓紧这一环节，便难免要走弯路，而且终究要回过头来重新做起。

要求剿匪收到功效，第一，必须抓紧时机，建立统一领导，有计划的配备力量，确实掌握情况，展开全面的而又有重点的清剿，不怕疲劳，不畏艰苦，长途奔袭，连续追歼，务期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在刚才新解放的地区，我解放大军锋势所向，国民党匪帮望风溃逃，往往有许多匪军散兵游勇、地方反动团队、敌伪政权人员、反革命特务分子流窜四方，如果不加扑灭，很快便会散而复聚，与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结合，盘踞作乱。因此，应该乘敌昏迷混乱、立足未定的时候，及早进行清剿，彻底消灭残匪势力，以免养痈贻患。在一切实行剿匪的地区，必须做到肃清潜匪，收尽匪枪，捕尽匪首，瓦解匪众，摧毁匪特指挥机关，解散土匪特务所利用的会门，打倒通匪窝匪的反动恶霸。剿匪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如果因情况关系已经打了击溃战，就应继续追歼兜捕，把它消灭干净。剿匪不能仅仅以收缴土匪的人枪数字为考核成绩的唯一或主要标准；而应该做到彻底肃清匪患，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在乡村里是反动的恶霸地主，在政治上初步地发动群众。因此，剿匪斗争不只是军事行动，而且应该又是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剿匪必须城乡结合，全面展开，而又有重点地进行，以免土匪特务利用空隙，流窜城市与乡村之间，这县与那县之间，潜形匿迹，此起彼伏，而我们则可首先彻底肃清一块地区做为依托，稳步前进，而又能四处张网捕捉。

第二，必须发动群众，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组织剿匪反恶霸的统一战线，使这个斗争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担任剿匪任务的武装部队，必须进行短期的政治和政策教育，确立为民除害、为民服务的决心，学会党的基本政策，成为顽强的战斗队而又是能干的工作队。而与武装部队一同下乡工作的党政干部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及革命的工人、学生，则除了学习政治和政策以外，还必须了解一些普通的军事知识，人各武装，人皆为兵。这两支力量汇合起来，就能组织强大的武装工作队，一面展开猛烈的军事活动，坚决地主动地清剿土匪，掩护群众工作；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反匪反恶霸斗争，摧毁反革命统治势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力量支援剿匪的军事行动。在组织剿匪反恶霸斗争中，又必须与当时当地群众其他迫切要求结合，注意为群众兴利除弊。例如，目前许多新解放区，都必须注意救灾治水，整顿战争勤务，反对旧乡保长摊派不公，减轻人民负担，帮助群众秋收生产，和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等等。必须切实关心和解决关系群众切身生活利益的问题，并在进行这些工作之中，教育和引导群众认识只有肃清土匪，打倒反动势力，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这样，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参加剿匪反恶霸的斗争，报告匪情，检举特务，瓦解匪众，这一斗争便容易收到成效。

第三，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确实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

则，打击和瓦解土匪，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对付武装的土匪特务，一定要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予以沉重打击，显示出我们的力量，才能迫使敌人瓦解和投降。但与军事行动同时，必须展开政治攻势。首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目前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土匪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祸害，充当土匪毫无出路，若不及早回头，必致身败名裂，说明人民政府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自新土匪和土匪家属，利用各种形式，对土匪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对于土匪分子，必须区分首从，采取宽大与镇压结合的办法。对于作恶多端，死不改悔分子，予以坚决镇压；但对那些作恶不多的胁从分子，应予自新机会，而对那些立功自赎的分子，则可予以宽大待遇。决不可实行片面的无原则的宽大，致使敌人误认我们软弱可欺，助长土匪凶焰。也决不可实行片面的无原则的镇压，以致不但不能瓦解匪众、孤立首恶，甚至反而促成敌人内部团结，与人民坚决对抗。所谓镇压，也决不是一律格杀勿论。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都应建立法庭、监狱，以便按照罪恶大小，分别判处徒刑、苦役，唯罪大恶极者才予以处决。无论宽大或镇压，都应尽可能地召开群众大会。至少也要布告示众，用以教育群众，瓦解敌人。

（原载1949年8月7日《人民日报》）

中央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二万七千余人，引起很大波动，北平和平解决后遣散傅部军官一万七千人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现在仍须由我负担解决，所有这些经验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

二、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须会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

三、对已解放城市，如京沪汉长沙兰州等，及将解放城市如广州重庆迪化台湾等，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应予以留用。但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四、一切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特别是企业机构，均须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闲杂人员及庞大的机关，应加以精简，但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薪水低的可少打折扣）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尽先录用，望即遵照执行。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

张　闻　天

一、东北经济

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尚有小部分自然经济，因意义不大故略）。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地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

二、国营经济

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东北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比较中国的其他地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铁路、电气业、煤矿、铁矿、航运、邮电、金矿及其他各种矿山、林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造纸业、盐业，以及银行、对外贸易、国营农场、大的贸易公司等，无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国营经济，在东北的总生产量虽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的这种领导地位更加明显。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

* 这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文件，经东北局通过后，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报中央。中央指出这个文件“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等重要提法。毛泽东肯定了这些修改意见，认为“修改得很好”。十一月六日，中央发回东北局征求对修改稿的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复电同意中央修改稿。这里刊载的是中央修改稿，个别地方参照张闻天的原稿和他对中央修改稿提出的意见作了校订。

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尤其是工业中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应当如此。我们必须节衣缩食，用一切方法挤出资金来，以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任何轻视或忽视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的观点，任何把恢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果不去有意识地掌握这一国家经济的命脉，不去用一切可能的和正当的方法并在一切方面强化这一经济力量，它将会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至最后的失败。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普通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国营经济在目前还有很多缺点，除开战争状态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与困难而外，目前我们还很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事业，有不少的经济单位是管理得极坏的，以至经常赔本。此外，由国家有计划地合理地去集中统一管理一切国家企业也还不够，许多企业仍然是各自为政地去独立经营，在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就更加造成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混乱。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路线还不够具体与明确，有许多同志还常常用一种旧的资本主义的办法，或者用官僚资本主义的办法去经营与管理国营经济，因而就使国营经济不能很好地领导市场，领导整个国民经济，服务于人民大众。因此，我们必须用心学习管理经济，必须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一切国营经济。一切国家经济机关，必须在统一的法律、制度和计划之下，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的指挥之下，去进行经营管理，首先消灭自己的无政府状态，并与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斗争。为此，就必须由国家颁布严格的法律，规定严格的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关，并按各个产业系统，实行适当的分工，建立各种公司与托拉斯，在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分别的经营。原料的供给，工人、职员的雇请，成品的运销，流动资金的调剂等，都应建立专门机关统一管理，并须适当地规定各个地区各个时期收买原料和推销商品的统一的价格政策，不许各个国营企业用不同的价格到市场上去竞争。国家银行必须普遍发展其促进生产、稳定市场的社会业务。除国家总的银行外，还必须建立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储蓄等各种专业银行，去分别进行各方面的银行业务。如此，就会使所有的国营企业，在统一的计划之下去经营。如果再经过合作系统，去结合广大的小生产者，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并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一部分私人资本也吸收在国营经济体系之内，就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有可能把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加以组织，使它成为有计划的经济，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慌。

三、合作社经济

东北的合作社经济，在生产与供销（消费）方面已经开始，但还只是在开始。

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即毛主席所说的“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①它们在东北农村中虽较普遍，但其中的问

①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题还很多。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但为数极少。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在城市中虽有，但大部等于合股小商店，并未真正起合作社作用、在乡村中则还很少。

我们认为，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这种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的习惯，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只有生产合作社，而没有供销合作社，则在小生产者与国家中间，还缺乏一条经济的桥梁和一根经济的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反之，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城市中普遍地有了供销合作社，国家就可以经过这种合作社去和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起来。国营经济生产的日用必需品及手工工具、农业用具等，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合理地分配给小生产者；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各种生产品和原料，国家也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去有计划地收买，然后由国家配给各工厂，或出卖，或出口。这样，国营经济可以得到丰富的原料、粮食与各种生产品的供给，掌握着充足的物资，去进行生产分配与出口，去同各种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作斗争，而小生产者又可有计划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用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用的各种必需品，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国家同小生产者经过供销合作社的这种经济结合，自然更会刺激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就能进一步地推进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很明显，如果没有广大的供销合作社为桥梁和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行有力的领导，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建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去领导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无法施行对于国民经济的领导。

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就是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将来的集体农场等。而目前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没有这种供销合作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上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因为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依赖市场的，他们在过去不能不依赖残酷剥削他们的商人，而今天他们就可以也有权利指望依赖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剥削他们的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他们的小商品生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这方面给予他们满意的帮助和领导，他们自然会跟无产阶级一道前进，否则只有去依赖商人，并跟着资产阶级前进。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个中心环节，依靠供销合作社作为我们目前的主要手段，去推进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事业，并在经济上实现对他们的领导。

由于国家政权在东北比较集中，交通便利，人民日用必需品如油、盐、布、煤、木材、火柴、部分粮食等，主要地是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普遍地建立供销合作社的物质条件，是十分有利的。供销合作社应当是城市和乡村的一切劳动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经济组织。它的

任务，应该是以尽可能公道的价格供给社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工具、原料）与生活资料（例如粮食、煤炭、油、盐、布匹等），收买社员所生产的商品（例如农民多余的粮食、棉花，手工业者的成品），再运销出去或卖给国家，免去了商人的中间剥削，从而在经济上为社员服务，保护社员的利益。它必须直接地向国家经济机关及其他生产机关定货，运输到一切社员所需用的地方，卖给社员，又将收买来的各种原料，直接卖给国家经济机关或卖给消费者，而不要经过商人的手，即在广大范围内，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担负社会分配的任务，代替投机操纵的商人。因此供销合作社，决不应当照商人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决不应当贱买贵卖，单纯地以赢利及分红为目的，而必须尽可能地作到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出卖必需品给社员，又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小生产者的生产品。这样，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及劳动人民巩固地组织到供销合作社中来，否则它就决不能普遍地组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为了使供销合作社能够巩固地组织千百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为了使供销合作社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供给社员必需品，及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小生产者的生产品，除开合作社自己的组织与经营的合理化及克勤克俭而外，国家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优待和帮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必须使供销合作社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之下来进行经营，避免合作社与国家经济机关及合作社与合作社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供销合作社为了在千百万劳动人民中执行自己这一伟大的经济任务，必须制订自己的统一的章程，规定自己的任务、经营业务的方针、社员的权利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和义务，以及组织的范围和系统等。政府亦须制订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严格保护合作社的财产，保障合作社章程的实行，规定国家税收及经济运输等机关对于合作社的优待，取缔冒名合作社去进行投机操纵剥削人民的一切行为。这种供销合作社，必须有从上至下的系统的组织，有全东北的总社，及各地方的省社、县社、市社、区社、村社和工厂机关学校中的支社，及某些专业的总社和分社，例如盐业、渔业合作社等。在合作社内部，必须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召开定期的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委员会，由各级委员会任命各级合作社的经理及其他重要办事人，并须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合作社的成立，必须经上级组织的批准，业务的经营则在统一的计划之下进行。我们党则在这种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建立健全的党组，并应创办合作社运动讲习会，培养大批有能力的干部，给以足够的训练，来作为这种合作社的骨干。必须有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并清楚地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精通合作社业务和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干部，去领导这种合作社，才能系统地执行无产阶级对于合作社的正确领导路线，把合作社普遍办好，完成上面所指出的伟大社会任务与国家任务，否则这种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供销合作社健全地组织起来以后，国家贸易公司的许多商店，就可由合作社来代替，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商店就可以实行一种适当的分工，并可根据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商店的统一计算，了解各地市场的需要和市场的条件，国家和合作社就可以根据市场的确实需要和条件，去计划和指导各种生产事业，就可以使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和条件，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和经济危机。但是要办好这种合作社，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必须是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去进行。

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它在经济战线上就会是孤立无援的。国营经济只有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并领导

与帮助合作社经济，才能有可靠的经济上的同盟军，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吸引到自己一方面，去和各种私人的投机操纵的行为作斗争，同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破坏活动作斗争，使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取得优势。而合作社经济也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而大家富裕起来；才能使他们在将来从国营经济方面得到各种机器，而进一步地实现生产的集体化（合作化）；才能使他们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特别显著的类型如下：（一）出租制：国家把自己现时还无力开发的林场、农场、渔场以至矿场，出租给资本家开发，同资本家订立一定年限的合同，规定双方有利的条件，资本家负责开发、取得利润，国家给资本家以一定的便利条件，并从资本家方面取得一定的租额。（二）加工制：国家配给资本家以原料，订立加工合同，资本家为国家制造成品交给国家，资本家得到一定的利润。（三）定货制：国家向资本家定购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成品，资本家从此获得一定利润。（四）代卖制：国家给一定的私人商店或公司以成品，由该商店或该公司推销，资本家从中挣得一定的商业利润。在城市和乡村供销合作社大大发展之后，这种代卖制的需要，就会大大减少。现在东北加工制的形式比较发展，其余的形式还在开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经济所需要的资本，一般的不是一个小资本家的资本所能承担，而必须是许多资本家的合资或合股，这可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

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特别是在开始时，还应给以有利的条件，并保证其原料、粮食等的供给以及运输的便利。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少，还只是被迫地、自发地、无目的地做了一些，我们还缺乏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干部的思想上克服许多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对于现在发展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常常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过分迁就私人资本家的态度，而对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则往往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特别对于出租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宁愿把天然富源荒弃着，不愿给资本家开发，怕国家受损失赔本。他们还不了解：把一切富源开发出来，增加社会的财富，即使用的是私人资本，仍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利的，虽然资本家取得了一定的利润。在国家无力经营的地方，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如果采取排斥私资的政策，那就是错误的。

五、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由于战争的关系，目前私人资本主义偏于商业投机及部分军需民用的小机器工业及小手工业方面。较大的私人资本，则一般是向着分散，而不是向着集中。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战争与人民服务。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即是：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商业投机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对国计民生十分有害的商业投机资本，是有极大的膨胀的，几乎全部的银行资本都成为商业投机资本。在城市中的商业资本，常常占到总资本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对于社会上这样强大的商业投机资本，不能不采取坚决的办法，迫其转入工农业生产方面。其办法除由国家宣布法律禁止一切操纵国民生计的经济外，必须发展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在广大的范围内去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使商业资本无高额利润可图，才能迫使其向生产方面转移。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就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

但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所以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任务。只有正确地坚持这种斗争，才能使私人资本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减少它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但是这种斗争是一种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而且主要地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这种斗争。

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社经济，其比重今天还不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轻视它的作用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在小商品经济中有着深厚的根源。因为小商品经济，照列宁的说法，是每日每时生长着资本主义的[①]，它在将来还会要发展。因此如果我们放任私人资本主义自流地发展，则私人资本会经过自由贸易去联合小生产者，而发展生产与交换中的商品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活动与投机操纵，来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为了使私人资本不起这种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要使它成为

---

① 列宁的原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9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国营经济在组织小生产者的合作事业中的一个帮手，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至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在我们的管制与监督之下如何去投资发财，那是用不到我们去给他们一个个操心的。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有更多更丰富的经验。相反地，在合理生产的技术方面，在经济核算方面，我们还应好好地向资本家学习。

六、小商品经济

这种经济主要地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它在数量上还占优势。斯大林说："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象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接着斯大林解释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的原因时，又说："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用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①

显然的，这种小商品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也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这已经在东欧的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得到了证明，而且在经过比东欧各国更长的过渡时期以后，也将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得到证明。但正是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

我们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现在要用一切方法去巩固他们的私有权，在他们个体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象我们在前面所说，根据于小生产者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把他们组织在各种合作社里，不但不应动摇他们的财产私有权，不但不违反他们发家致富的要求，而且正是为了使他们更能迅速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发家致富。这种合作，对于小生产者本身是很有利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

第一、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以他们的个体私有经济为基础，是以落后的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它还不是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场。要使中国的农业走向社会主义，当然必须实行集体农场制度。但是，这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做不到的。这必须经过许多准备步骤，主要地是由国家供给新式的农业机器，并为农民所乐于采用，方能做得到。

第二、因为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根据于"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两利原则，因而在合作的小生产者内部，是必然会由于勤劳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贫富不齐的现象。

第三、因为这种合作社是根据于自愿原则，小生产者可以而且应该有完全的自由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因而除已经组织起来的小生产者外，独立的无组织的小生产者的存在，也是必然的，而且甚至会是很多的。

由于以上情况，因而在发展小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在农民小生产者内部的某种程度的分

---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48—449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化，将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少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今后将会上升而为富农或小资本家，另一部分农民小生产者，则会下降而为贫农雇农、为半雇佣或全雇佣的劳动者。这是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用不到害怕的。只要我们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并且能够经过发展合作社的道路，使大多数农民小生产者都上升为富裕的农民，或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不去重抄旧资本主义时代少数人上升为富农资本家、大多数人陷于穷困与破产的悲惨境地的老路。但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过程，充分发扬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才能取得确定的胜利。

在小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将必然会发生在农民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与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将要用一切方法，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供销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内，使之与国营经济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利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将在一切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的残余的协助之下，用一切力量去争取农民小生产者，使之向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农民小生产者呢？他们是劳动者，因而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他们是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向合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但农民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小部分生产品的出卖者，因而带有或多或少的小商人的投机性，这就造成了资本家商人争取他们并与他们合作，来反对国家对于商品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与监督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危险性，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并加以防止的。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而且也在于小生产者的商品经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于使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从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中孤立起来，并使农民小生产者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要做到这一点，特别要使农民小生产者在经济上也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把他们组织到合作社之后，小生产者们原有的那些弱点，例如无组织性、散漫性、动摇性、投机性、极端自私性、偏狭性等，还会在合作社内部同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行或大或小的对抗。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坚定性，如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团内部缺乏铁的纪律，而向着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投降，那么合作社也就会要变质，而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显然，资产阶级是会利用一切方法使合作社变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的阶级斗争，在合作社内部还会长期地存在。

所以，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各种弱点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教育，并加以克服，实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这种斗争，不但在合作社内，而且在国营经济内，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内，是同样存在着的。而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这些弱点，如果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那是一定会失败的，只有采取毛主席所指出的“耐心说服，典型示范”④的办法，才能生效。这也就是斗争的困难与曲折之所在。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有极大的容忍性。但是我们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胜利与国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其他各种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因素，还是会保证中国人民在这一斗争中的最后胜利，使小商品经济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根据其切身经验，会最后地了解到：只有合作社化，只有把合作社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才能使小生产者免于分化，免于少数人上升为资本家，而大多数人沦入贫穷与破产的境地。也只有如此，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并使这种小生产者的私人利

---

④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6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益，服从于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七、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

以上所述，就是东北经济构成的具体内容。一般的说来，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份，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条路线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须力争其实现的。只有实行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反之，我们如果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的要求表示无原则的让步，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投降，那我们就不可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加强反而削弱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而在实际上则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时，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将因为缺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不能巩固与持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必然将会因此蜕化而为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而这在实际上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条路线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有意识地在我们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

我们只有根据这一条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才能制订出明确的经济建设计划，减少盲目性，减少自发性，少走弯路。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具有明确的计划性，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与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

（原载《文献与研究》1983年第1期）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有关信件和批语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月）

毛泽东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少奇同志：

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　泽　东

10月26日

周 恩 来 同 志 的 批 语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

毛主席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登报纸。如须先在中央印出传观，似可先给东北一电。

周　恩　来

30日

刘少奇同志给有关同志的信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这个文件是东北局发来请中央审查的。已作了一些修改。中央准备把这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此件还须征求东北局意见后才能向全国发出，特印发各同志，请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再加修改。各同志意见请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送交我。是为至盼！

刘 少 奇

10月31日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

东北局：

你们发来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很好，我们已加以初步的修改，我们在征求华北局同志的意见及你们的意见后，再作若干修改。现特将修改后的全文发给你们，望你们即加研究，并将你们的意见从速再次电告，以便我们再加修改后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只印小册子（亦不要加上党内文件字样，不作秘密文件），而不要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你们意见如何？望即告。

中 央

11月6日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陈 云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①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大纲草案②已经发出去，但这是一个草案，是一种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还要请大家讨论。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解放军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委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共同合作。财经委员会本身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③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整个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大纲草案，我不一一介绍了，这里只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是组织机构问题。财经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下属十三个处、行、署、会④。

有些事情还没有定。如盐务暂属财政，还有渔业、烟酒需要进一步考虑。这是一个草案，请大家讨论。

工业部门分得很多。在中国，过去曾经笼统叫过农工商部，然后分成交通部、实业部或工商部。现在除了铁道、交通之外，又分了燃料、金属，纺织及其他工业四个处。分得细的原因是在各有专职，因为工业重要。

这六局、十三处是否一天就建立起来？全国性计划是不是可以一天弄成？不成，这要逐

---

* 1940年，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中央财经工作的统帅部，其紧急性不亚于军事问题。这是陈云在周恩来召集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当时陈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步地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工作则是要一步一步地来。

其次，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而大纲的最后面，仍把地方经济放在必要的地位，各大区、各省及各大城市都有财经委员会，这岂非矛盾？我们的回答是，有矛盾。但是，因为现在是军事时期，同时中国地方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统一集中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比如火车现在已经统一管理。又如对外贸易，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又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必须统一。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事业不能集中或不能过分集中，最大的是三百多万军队，有两百多万在前方，给养能不能由后方统一供给？不行。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比如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匹布做衣服，三百万人就要三百万匹布，只能由前方解决。这些事带有很大的地方性。野战军吃、穿、工作、打仗一起搞，这需要统一，但不能过分集中。这一段时间还不会短。要等打完仗，交通恢复以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解决。有些事，中央现在管不了，只得让地方上先管着。如招商局⑤现在由陈毅⑥他们管着，中央一时管不到，先托他们管，所有权属中央，将来需要时，一个命令，全部由中央接过来就是了。

总之，这个财经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工作要慢慢地来，地方机构还保留相当的地位。

注　释

① 军委会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

② 指1949年5月31日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

③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新中国成立前，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等职。三十年代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④ 见刘少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铁道部沿用军委会铁道部名称，称部而不称处。

⑤ 招商局是1872年成立的中国轮船航运企业。1948年时共有船舶四百六十余艘，约三十三万吨。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光荣起义，回归祖国怀抱。

⑥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刘 少 奇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二十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共产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零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共产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份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

* 这是一份党内报告的节录。其中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府的一些具体设想，后来又有一些变动。

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份。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需要解释的。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这是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烟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种伟大的进步，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在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董必武主席对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那时看胜利形势的开展，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所以当时想像的新政协是小规模的，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草拟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发出之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成和拥护，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上海、平津及其他各地，陆续来到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来解放区的人更多了。今年六月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有二十三个单位参加，代表一百三十四人，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筹备会已通过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的：计有四十五个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学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中的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各种宗教的代表等；此外还有特别邀请的代表。计党派代表一四二人，区域代表一〇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代表二〇五人，四十五个单位共出代表五百一十八人。筹备会并且决定十个代表以上的单位有两个候补代表、十个代表以下的单位有一个候补代表列席。前者计三十三个单位，后者十二个单位，这样又增加了七十多人列席。特别邀请的代表，尚未最后确定，大体估计，当不会超过七十人。如此计算、新政协代表将在六百人以上，七百人以内。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的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具有某一方面代表性的人物都可包罗在内，代表数目是很广大的；质量也是相当整齐的。以旧政协来比，旧政协不但人数少，分子却极复杂；不但没有人民团体代表参加，政党代表亦不齐全，其中还有最反动的蒋介石集团在内。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由本单位提出后，还要在筹备会中由大家协商。大体上讲：质量是好的。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如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会议，并且有执行机构和日常办事的机构；所以它的组织法草案中规定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时，设立全国委员会；主持经常会务的是全国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在地方视需要经过协商也可以成立地方委员会。

人民政协的职权，概括言之，可说是极大而且很特殊。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表现在它可以制定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一纲领有宪法的性质；它可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它可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说它特殊，因为它的全体会议在选出全国委员会后，它和国家政权机构就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组织。它还要保证执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及其自身的决议，这是中国革命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

二、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中国新的政权机构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特别是在县以上的政权机构中，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并且有职有权。

二中全会决议的第八段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九段又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给以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之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

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里把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三个敌人说得清清楚楚。我引证以上的文件，就是想说明现在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党的中央已把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规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那末，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

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及民主爱国人士，这些分子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而自己不去行动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是搞些什么的；有在革命高涨时他轰轰烈烈地干，很积极，而当革命低潮时便表现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觉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参加革命阵营的。

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成的反动统治，消灭乾净。这个“底”不是共产主义的底，而是新民主主义开始建设的“底”。

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扫荡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对于一切民主人士是要有原则地有步骤地去争取他们。所谓原则，目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凡赞成三反的人，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所谓有步骤，丝毫不是丧失革命立场、而是把我们革命观点中最基本的及最一般的原则提出来，凡同意这种原则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像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不用战争用和平谈判解决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现在长沙也解放了。这是很好的：人民少受些痛苦，地方少受些破坏，花较小的代价，争取了胜利。开始时固然有些麻烦，不痛快。但干革命事业有时干得很痛快，也有时干得不很痛快。革命不一定是为了干得痛快，只要能达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目的便好。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发出以后，赞成这个号召的各党派，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我党的领导，对和平的幻想，对英美的依赖，对苏联的怀疑等等问题很多。随着军事的胜利，我党中央政策的正确，各党派都承认中共的领导。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字于他们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件，我军迅速渡江，在沪港抱和平幻想的人都也觉悟了。毛主席七一文告发表后，对英美和对苏联的认识都和以前不同了。美帝“白皮书”发表之后，各党派、各民主人士都表明态度，说自己与美帝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无关。现在我党的政治主张，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公开提出反对的意见。从旧的、因袭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到接受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即使是个别的观点，等于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因此争取团结是要有步骤的。对于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要耐心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给他们以工作岗位，甚至有些为人民事业立过功的人位置还会比我们高些；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特别受优待。如以前发表各民主党派之共同文件，有我党和其他党派列名；而我党只有毛主席一人署名为首，其后列各民主党派领袖的名字。难道说我党中央书记处各书记同志的声望地位比不上其他党派领袖吗？无疑问的是比得上的。但他们没有列名。又如这次政协会议代表，我党许多领导同志没有提名参加，因政协规定代表一定要出席，而许多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出席也就不能提名；还有更多的同志可以当代表、因为代表名额的限制和

工作关系没有提名作代表；有些同志出在某一单位可以当代表，而出在另一单位，却只能当候补代表；在党内，还有些同志的革命资历不深，因所属单位（如人民团体）不同，必须要他当代表，而资历较深不属于那种单位的却不能当代表。这些事例，如果不从整个革命形势来看，单从个人资格地位出发去看，那是想不通的。又如许多民主人士被招待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有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特别受优待，住较漂亮的房子，吃特灶，我们许多同志干了多年革命工作，住的吃的都很蹩脚。这事例一样只有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全盘利益来考虑，才能想得通。

我们的同志有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从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舒服。这些话初听好像有点道理，实际是极错误的。说这样话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无条件的。不讲条件而担负革命的任务，革命才是光荣，不革命自然没有那种光荣，反革命更是光荣的反面，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罪恶。早革命则早享受光荣的称号，迟革命则享受光荣的称号也就因之而迟。革命胜利之前有困难，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说绝对没有困难。没有民主人士陆续参加革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把革命的光荣降低到与不革命，甚至与反革命相比，这样错误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单纯计较地位和享受，这是把革命的观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要改变社会制度，个人生活的提高，一般说要在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才能达到。单从个人出发去想问题，我们的脑筋想个人问题的时间费得多，想社会问题的时间就费得少了。这会障碍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妨碍革命工作的推进。这一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来与民主人士相处是很困难的。我现在想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争，很快便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还不是彻底的胜利，还需要巩固这个胜利。我军所到达的大城市，明显的官僚资本都被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了。但是四大家族等官僚资本主义分子，逃到国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那就要和解决帝国主义问题一起解决。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势力至少也得要三年至五年，才能解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在我们势力范围内，我们已做到了。但是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势力，目前还做不到，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一个代替的东西。例如开滦煤矿，中国虽有点股子，实际完全是英帝国主义者经营的，有五万多工人，有二十万人在那里依靠开矿为生活。我们现在还没有打算动它，并且还要维持它，使它能继续生产。因为没有准备好随便动一下，就会闹出乱子来，社会便不能安定。又如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毫无疑问那是很反动的，我们目前还只取消了它们最反动的部分，不准在学校内传教，还不打算从基本上来改造那些学校。关于各大学的课程改革也是这样。革命要想彻底，有些工作是要慢慢来的。三反的任务，仅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宣告结束，所以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都要联合起来继续干，我们联系得愈广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这些错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领受过去的教训。对于民主人士必须给以适当的物质上的优待。不然，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他们做不到，就不来直接参加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是有条件的。他们不参加革命，就减弱了

革命阵营的势力。这是政治影响、政治力量的问题，不能够用一、二、三、四的数目字来计算的。

就经济建设方面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私人资本主义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要小，但它有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陪伴着，小生产的基础上是无昼无夜不间断的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虽不强大，在国民经济中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一定要使它发展，才能使社会生产更快的发展起来。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在现时国家政权中，不能没有他们的位置。做社会革命工作，决不能拿一个生活标准的简单模型去合，合乎我们模型的才要，不合的便不要，尺度应该放宽些。也不能说我们和民主人士分开工作，各搞一套。只有争取民主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正确的方针。不争取民主人士和我们合作，即不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就违背了党的方针。

今天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它经过共产党来实现它的领导。现在我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都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偶然的。领导而能得到被领导者的拥护，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第二要照顾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才能使他们感觉有骨有肉，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第三还要有我党同志忘我精神，坚决行动，以身作则，争取胜利。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对于反革命分子投入革命阵营的态度

过去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是欢迎的。今天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明天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也是欢迎的。我们争取这些人便能减少革命的阻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把反革命集团孤立到最小的一点，因而更便于肃清它。

从阶级感情出发，对反革命分子屠杀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完全对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反革命立场的时候，（这当然要有具体事实的表现，而且这里表现是我们花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的。）我们除批判他过去的错误以外，就要进而团结他们，才是符合于革命利益和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一点，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然好些问题便想不通。有些过去屠杀很多人的反革命者，今天他悔悟了，他愿参加革命阵营里来，已经为人民立了功，我们怎能拒绝他们呢？又如傅作义程潜等，都和我们打过大仗，这当然不好。但北平和长沙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他们立了功，人民愿意他们这样干，他们这样干了；这些人可能在今后的政府中获得较高的位置。如果我们要追究过去，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我们便虚了脚，我们没有道理，人民将不原谅我们，我们的圈子便会缩到很小。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因为他们今天参加革命的光荣，就涂消他们过去反革命的事实，过去的事实，让历史去评判，用不着我们去追究了；对待他们应当和对待一直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有基本的区别。对待他们要宽大，对待坚决反革命分子就要严厉。

四、对民主分子的态度

团结民主人士，是人民革命的需要。但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是一定有若干距离的；这些距离表现在政治主张上，生活习惯上，工作作风上，及思想意识上。因此，对待民主分子的态度，不只是要团结，而且要有批评有斗争，才团结得更好。

分析一下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哪些距离是可以接近，哪些距离是不容易接近的呢？

政治上的距离，是较易接近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符合于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他们也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他们也时有被压迫的感觉，特别是美帝所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对他们是压迫的，只要他们愿意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我们首先要争取这一点；这一点不能接近，便不能合作。工作作风的接近，就要慢些。生活习惯方面某种程度的接近亦非全无可能，同样要慢慢来。思想意识方面的接近，有些要更慢，有些简直不可能。本来政治主张也属于思想意识的范围，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意识是更广泛，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等等在内，这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不同，产生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思想意识。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求得和他们相同，在另一问题或另一点上他们和我们有分歧。有些问题甚至他们毕生也不能和我们一致的，这倒不必勉强要求一致。

认识了这些距离，我们在团结他们时对他们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

只有批评与斗争才能推进团结，才能使团结巩固起来。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这一原则要我党同志适当灵活地运用，无论如何，不能把党内斗争方式拿来呆板地应用。我们和民主人士阶级立场根本上是不同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和他们在一定时期政治上的一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在政权机构中，既要与许多民主分子合作，就应该有适当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如在上面领导，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他才能做的事情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不听，我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的。在政协筹备会以前，我们和民主人士谈了许多问题，如对英美态度，与苏联的关系，中间路线及土改问题等；经过详细的三番五次的解释以后，他们大体上赞同我们的意见了。其中可能还有个别人士对个别问题不很了然和释然，抱沉默的态度；一般的总算解决了。我们要善于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懂的道理，甚至于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以消化。这样做工作是相当麻烦的，但是革命就要不怕麻烦。我们对于同级的人，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要考虑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尺度，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于下级，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不要抹杀他们的意见，对的我们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说。

对于民主分子，我们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是不好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迁就他们，随声附和也是不好的。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与斗争。慢慢

改造他们，不要着急。要诚恳坦白，谨慎谦虚。出发点是团结，最终的目的也是团结。是否有团结不了的人？个别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用了一切团结的方法，还团结不了他，那他也就慢慢地孤立起来了。他孤立了还不觉悟，那就只好由他去受群众的评判。

五、党内团结

华北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从过去的经验、我想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党员首先要团结，才能做到和民主人士的团结。过去我们政府工作中党员间是有不团结的现象的，特别是负一部门领导责任的党员间有些不团结的现象。这种不团结并不是因为有原则主张不同，而是因为工作作风的不一致。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作风趋于一致呢？某种程度的一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工作作风不是不可改变的，不好的作风只要大家指出来，谁也不会去维护它；好的作风谁也不能说不好，我们共产党员是服从真理的。问题要摆在桌面上来说，开会来谈，不要背后随便讲，而开会时不讲，或是阳奉阴违，都是不好的。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这里顺便讲一下态度问题，同级工作者大家相互批评，不应把态度问题当成为原则问题，因为甲说乙的态度不好，乙也可说甲的态度不好，互相间在党内研讨一下，彼此改正就是了。但态度问题有时是原则问题，例如领导工作者态度不好，以致不能很好地推动工作，或在群众工作上，影响了与群众的联系；这样态度问题便成为原则问题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只有党内团结，才能更好地团结民主人士。各部门同志要很好地检查党内团结问题。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周 恩 来

现在我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人选的协商情况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向到会的代表做一个报告。

为什么要做报告呢？因为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使大家对上面说的几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全貌的了解，以便能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第一，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政协这个名称有一个改变。原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修改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

从新政协发起到现在，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磋商国是，并决定如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很快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在上海、北平和海外的各人民团体、华侨人士的响应，使我们很高兴，于是使邀请各单位参加并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没有想到象今天有这么广大的解放地区和在交通这样便利的情况下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这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的缘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崩溃了。在全国革命战争中，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已经改观了。

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它不得不更加谨慎。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种谨慎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以目前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的要求为主要根据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得很清楚，参加会议成员的条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做的报告。

件应该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我们邀请代表就根据这个政治标准。

我们既然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中当然不能包括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即反对新民主主义而拥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全国人民，而为全国人民所信托。这就是确定代表时的严肃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此外，政协代表中还包括从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并投向革命阵营的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确定代表人选时的广泛性和灵活性。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①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②先生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③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④先生，张难先⑤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⑥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⑦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⑧、邵力子⑨等先生。程潜⑩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⑪将军，曾泽生⑫将军，张轸⑬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⑭、梅兰芳⑮程砚秋⑯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⑰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几个问题。（一）党派的标准。

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⑱，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⑲，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⑳、民主青年同盟㉑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除了这十四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㉒，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㉓，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列入特邀单位。又如民社党革新派㉔，我们劝他们加入民盟㉕。当然这样做还要看这两个组织自己的意见。和这类似的其他个别人，也被邀请参加，如汪世铭㉖先生。（二）个人参加的，我们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三）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要求各代表看名单时，不要连起来比较看，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青年学生的代表，虽然不能与其他代表来比，但他们在中国学生当中却有代表性。还有一些情况，有些人在这一个单位可能是正式代表，但在另一单位却是候补代表。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差别只是个表决权的问题，但是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四）代表名单的产生是经过各方面反复协商的。这样能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尊重。（五）参加的代表，一般的都请他们到会，不要只是列名，否则就不能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不过也有个别特殊情形经过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先生。现在的名单一共是六百五十五人，特别邀请的名单中或者还可能增加若干人，将来代表的总数，可能超过六百六十人，当然也可能就是六百六十人。

即将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确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从代表性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代表性。但是仍有许多有代表性的人，象彭德怀同志等，因为他们不能来，所以没有邀请。至于个别的遗漏，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觉得筹备会常委会对于这一工作，一般地说已经尽了责任。

第二，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这个草案已经在几天前送达各位代表。现在讲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㉗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大革命运动，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最近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形成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组织。可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假如没有一百多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积累，尤其是三十多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便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济济一堂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那时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孙中山先生合作了。不幸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走上反动的道路，造成了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深入农村，发动了土地革命。后来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多次号召组织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所以在革命的后三个阶段内，统一

战线没有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但这一政策始终贯彻于四个阶段，直到现在革命战争快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召开这个会。肯定地说，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它绝对不同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个长期性的组织。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赞成的。

政协组织所包含的成分，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也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奋斗的目标。凡是同意这个目标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我们都欢迎他们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团结起来，并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最近召开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后将设立全国委员会，领导实行全体会议的决议。另外在全国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和省会，根据需要设立地方委员会。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我们要通过这个组织来进行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范围太大，不容易经常召集，所以只好拟定三年召开一次。至于地方委员会，可以适当多开一些。

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行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现在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便是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便是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地方委员会的情形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建设新中国，必须经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只打算写出人民政协的组织和任务，而不在工作方法方面详细列举，以免束缚工作的进行。希望各单位对这个草案讨论后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决定。

第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这个组织法草案首先表明国家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现在只须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国名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既然国名重新定了，是重新纪元呢，还是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族[28]、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当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不错，这些地方是有少数民族的，但是他们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满族以外的民族进行欺骗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了这样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深了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政策，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陈嘉庚[29]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的确是比较少，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原因是有好些少数民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放，不容易找到代表来。内蒙古是解放了的，它便有了双重的代表，少数民族方面的代表和区域代表。

关于政权制度方面，大家已经同意采用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和会议名称的区别就在这里。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关于普选，本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许多不是普遍选举的现象，例如根据阶级、民族、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性别等给普选加以种种限制。这种选举我们不要，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关于直接选举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直接选举目前实在不容易办到。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的形势和要求。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依照目前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也是做不到的，许多地方只能用举手或投豆的方式。由于有上述种种的情况，我们只能强调提出普选一点，其他各项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单就普选一点，三年后能不能真正做到，还是一个难题。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逐步由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普选。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30]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分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而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他们幕后分侵略殖民地的赃，分剥削本国劳动人民所得的赃，争夺不休。而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都搞过议会制、总统制等方式，结果换来了封建买办的专政。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座的陈叔通[31]老先生、沈钧儒[32]老先生，都曾亲自体验过。到了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国才找到一条好路，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又不同了，那时，大家为民主拼命奔走，也仅仅得出了一个伪宪法[33]，真正的民主是没有的。这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经验教训。

现在，根据我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系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而对工作的经常指导，又是集中在由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主席身上。主席下面的组织，首先是政务院，其他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这个数目看起来很不少。清朝只有六个部，后来又分为八九个部，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也只有八九个部，但每个部下面却设有许多机关，有些机关连部长也管不了，直接由最高当局来指挥，造成官场上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现象。这种情形，我们新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政务院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事实上苏联今天有六十个部，比我们更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模仿苏联，一切还是由本身的需要出发。

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其次是文化教育。这样做法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呢？根据过去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来说，是不会的，而且还可以把工作推行得既快又好。政务院下面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监察制度，监察行政部门，如公务人员是否执行了政府的决议和政策，是否有贪污腐化等情形。

军事方面，我们估计国内解放战争还要打一年左右，才能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反动派。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继续存在，同时将来也要领导巩固国防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这不用多做解释。

至于地方的统一制度，目前因为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它的组织如何，只好留给将来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现在报告已经完了，请诸位根据这三个文件，多加考虑，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来共同商讨。

注　释

① 孙夫人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人。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在广州、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

② 陶孟和（一八八八——一九六〇），天津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③ 钱昌照，一八九九年生，江苏常熟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七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主任委员、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等职。

④ 萨镇冰（一八五九——一九五二），福建福州人。曾任清末海军统制、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等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⑤ 张难先（一八七四——一九六八），湖北沔阳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民政厅长和国民参政员等职。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⑥ 陈瑾昆（一八八七——一九五九），湖南常德人。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从北平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⑦ 颜惠庆（一八七七——一九五〇），上海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和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驻苏大使。一九四九年春，为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曾往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商谈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⑧ 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职。一九四六年任国民党军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谈判的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⑨ 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驻苏联大使等职。一九四九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⑩ 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湖南宣布起义。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⑪ 吴奇伟（一九〇一——一九五三），广东大埔人。曾任国民党第四、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五月在粤东、闽西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⑫ 曾泽生（一九〇二——一九七三），云南永善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长春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⑬ 张轸（一八九四——一九八一），河南罗山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第五绥靖区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武昌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副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⑭ 周信芳（一八九五——一九七五），浙江慈溪人。京剧表演艺术家，艺名麒麟童，京剧“麒派”艺术的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⑮梅兰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梅派”艺术的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⑯程砚秋（一九〇四——一九五八），北京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⑰ 戎冠秀，生于一八八七年，河北平山人。抗日战争时期任村妇女救国会主任，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上获得“子弟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⑱ 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社，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成立。后为纪念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改称现名。其主要成员是文教、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同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

⑲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爱国民主党派之一。一九四七年由台湾省籍的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统一祖国而努力。

⑳ 青年救国会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团结各界青年一致抗日的青年群众组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又在延安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领导全国青年工作的机关。以后各解放区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于一九四〇年后并入。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等工作。

㉑ 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抗日战争后期（一九四五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以新民主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先进青年的地下组织。成员主要是学生及部分职业青年。任务是团结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美反蒋斗争。解放后，大部分盟员转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㉒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成立于一九四八年春。主要由国民党内一部分不满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人结合而成。主要负责人有许闻天、邓昊民等，曾参加过一些反蒋活动。一九四九年秋自行宣告解散。

㉓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主要成员是原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分子。一九四八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

㉔ 民社党革新派，成立于一九四七年五月。由反对张君励的民社党党员所组成。政治主张鼓吹中间路线。一九四九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期间，其上层个别领导人如汪世铭、沙彦楷因曾参加反蒋反美民主活动，被允许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组织于同年宣告解散。

㉕ 民主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一九四一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今名。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

㉖ 汪世铭（一八九六——一九七七），安徽桐城人。原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之一。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拥护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五一号召。一九四九年九月，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㉗ 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指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下被迫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为了区别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故称“旧政协”。

㉘ 夷通彝，夷族即彝族。

㉙ 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福建同安集美镇（今属厦门市）人。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曾到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五十六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是我国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

㉛ 陈叔通（一八七六——一九六六），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后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

㉜ 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末曾考中进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㉝ 伪宪法　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章　参加单位及代表

第二条　凡赞成本组织法第一条之规定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个人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邀请者，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并得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由上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定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协商定之。

第四条　凡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各参加单位及代表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凡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或人民团体，对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时，除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负责遵行不得违反外，其不同意见得保留之，以待下届会议提出讨论；如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有声请退出中国人民政协的自由。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或代表或全国委员会委员，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委员会视其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予以警告，撤换代表，撤销委员资格或撤销参加单位等处分。由全国

委员会所给予的处分，如被处分者不服，得向下届全体会议提出申诉。

第三章　全体会议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召集之。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左：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须有参加代表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主席团，由全体会议选举之。主席团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秘书长一人，由全体会议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团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得设各种委员会，其组织办法另定之。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议事规则，由主席团制定之。

第四章　全国委员会

第十三条　在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全国委员会。其职权如左：

一、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二、协商并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三、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

四、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

五、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

六、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七、协商并处理其他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之；其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之。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条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地方委员会

第十八条 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决议，得设立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为该地方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协商并保证实行决议的机关。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组织法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后施行。

（新华社北京2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第三条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第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第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第二章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五十六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之。

第七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行使下列的职权：

一、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

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

三、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四、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

五、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

六、批准或修改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七、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

八、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九、任免下列各项政府人员：

（甲）任免政务院的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各部的部长、副部长，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署的署长、副署

长及银行的行长、副行长。

（乙）依据政务院的提议，任免或批准任免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

（丙）任免驻外国的大使、公使和全权代表。

（丁）任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

（戊）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

十、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第九条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执行职务。

第十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两个月举行一次，由主席负责召集。主席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请求，或政务院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须有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十一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办公厅，并根据需要，得设其他附属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三章 政务院

第十三条 政务院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一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一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之。政务委员得兼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各部的部长。

第十四条 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政务院根据并为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行使下列职权：

一、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二、废除或修改各委、部、会、院、署、行和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务院的决议、命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议案。

四、联系、统一并指导各委、部、会、院、署、行及所属其他机关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一般工作。

五、领导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

六、任免或批准任免第七条第九款乙项规定以外的各县市以上的主要行政人员。

第十六条 政务院总理主持政务院全院事宜。政务院副总理和秘书长协助总理执行职务。

第十七条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周举行一次，由总理负责召集。总理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务委员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政务院的会议，须有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政务院的决议和命令，以总理单独签署行之，或由总理签署外并由有关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副署行之。

第十八条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下列各部、会、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

内务部；
外交部；
情报总署；
公安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贸易部；
海关总署；
重工业部；
燃料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食品工业部；
轻工业部（不属上述四部门之工业）；
铁道部；
邮电部；
交通部；
农业部；
林垦部；
水利部；
劳动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科学院；
新闻总署；
出版总署；
卫生部；
司法部；
法制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华侨事务委员会。

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

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

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

为进行工作，各负指导责任的委员会得对其所属各部、会、院、署、行和下级机关，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

第十九条 各部、会、院、署、行，在自己的权限内，得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第二十条 政务院设秘书厅，办理日常事务，并管理文书档案和印铸等事宜。

第二十一条 政务院及各委、部、会、院、署、行、厅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二十二条 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

第四章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五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其管理和指挥系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六章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及解释权

第三十一条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属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组织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　　言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权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徵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使其能够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时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五条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第十七条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十九条 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二十一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第二十五条 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

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第三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

第三十五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三十六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

2

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四十条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五条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第四十八条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

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遵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塵、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今天已经闭幕。这个会议的主要工作有三类：一是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二是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三是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方法，制定了国旗。这个会议的伟大成就，会上各位代表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多。这里我们对会议所通过的三个文件说一些意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这个共同纲领规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我们新生的中国，订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它保障了全中国人民广大范围的民主权利，也规定了人人必须遵守的若干义务。这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现在已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所一致接受，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这个蓝图，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理想。事实上它已经不只是一个理想，因为中国人民很久以来，特别是从抗日战争以来，就已在按照它的基本轮廓动手从事建筑，而且已经获得胜利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了。有了这个历史的基础，有了全国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有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一致支持，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忠贞保障，我们相信这个纲领一定能在最近数年内完满地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基本特点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见该法总纲第一、二两章）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政权。因为旧民主主义政权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是压迫广大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办法，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分赃肥私；同时也是为了便利于统治阶级玩弄政治手腕，欺骗和压榨劳动人民。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也

不完全相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政权。苏联是一个已经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东欧各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则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参加。但是，在属于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为领导力量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几点上，中国现在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却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相同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中，“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政府。”（见共同纲领第十二条和第十五条）这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所绝对不可比拟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的完成。这个统一战线具有广大的代表性，其组织成份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但又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一切反动分子不被允许参加。结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宗旨，已在该法的总则表明，就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这个统一战线内部实行高度民主，凡参加单位对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得保留至下届会议提出讨论，而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且有声请退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具有严格纪律，凡参加单位及代表对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分别予以处分。这个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地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它将由全体会议产生全国委员会，并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设立地方委员会，继续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二十八年来一向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次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即曾与孙中山先生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因而能够推动中国人民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举行胜利的北伐战争。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曲折发展，现在才在新的形势下，结成新的空前强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新的统一战线，有着中国共产党的被众所公认的领导地位，有着中国人民的空前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监督，而又有着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组织法作为共同信守遵行的章则，这就足以充分地保证它的巩固和健全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完成了很好的工作。它为全国人民制定了国家的根本大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放在我们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周围，不折不扣地执行共同纲领和大会其他决议，使他们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是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忠实地履行这些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迅速地而又有步骤地成为国家的现实。是协助政府，把革命进行到底，肃清公开的和隐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治愈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使我们新中国富强起来。是爱护我们新生的祖国，加强人民民主政府的力量，和以苏联为首的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以保障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单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所任命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连同十月一日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任命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部名单如下：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五人）：

朱　德（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刘少奇（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彭德怀（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程　潜（起义将领）

委　员（二十二人）：

贺　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

刘伯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陈　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司令员）

林　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徐向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聂荣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

高　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粟　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张云逸（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副司令员）

邓小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李先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饶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邓子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罗瑞卿（公安部长）

萨镇冰（海军耆宿）

张治中（国民党民主派）

傅作义（起义将领）
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龙　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刘　斐（国民党民主派）
总参谋长：徐向前
副总参谋长：聂荣臻

（新华社北京1949年10月19日）

新中国的外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周恩来

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则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做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整理，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今天整个世界还有阶级存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家机器在今天还必须重用，这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国家机器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个民族或是多民族的国家里，总有一个阶级掌握领导权。我们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现在联合其他阶级来掌握国家这个机器，对内统治反动派，统治过去压迫和剥削我们的阶级，反对地主压迫农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对外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我们的国家。所以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武器。

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今天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军队，全国解放了，军队经过整编，还得作为捍卫国家的力量。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之前，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

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就联合这方面说，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先说对帝国主义，刘少奇同志在苏联十月革命三

* 这是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引用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在黄河以西打游击时说过的话：我们对帝国主义在全盘战略上应该藐视它，但在具体战斗的战术上应该重视它。这两句话是非常合乎科学的。我们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应当藐视。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打倒了三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被打倒了三个，削弱了两个，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孤立，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壮大起来，在东欧也产生了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说明了真理，从两个世界对照来看，难道我们还不能肯定说帝国主义终将死亡吗？读一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在三十多年前已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三四十年来，就看到了这种情势，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美国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物质上的损失是不大的，但战后在政治上的损失非常之大。一九四六年起，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很快地衰落下去了。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后不到四五年，在国内外的威信就很快地降低了，所以我们说它是纸老虎，我们有理由藐视它。

拿五四运动到现在的三十年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年相比是短的。再拿日本投降以后的四年同前两段时间来比更是短的。这说明我们的革命愈接近胜利，就发展得愈快。从一八四三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到一九〇三年，经过六十年产生了列宁主义。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仅十四年的功夫，列宁主义在苏联就胜利了。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三十二年，中国革命就胜利了。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从“五四”到现在三十年来，我们的星星之火已经成了燎原之势，烧遍了全中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看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这是战略的一方面。

不过从战术上来讲，我们要促使帝国主义死亡，就不能轻视它。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二十二年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建军的时候，就有胜利的信心，但是要达到使敌人死亡的目的，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的。这条路并不简单，外交斗争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有病，它是想尽方法要活的，因为其体内尚有未衰的因素，有新生的血球存在，它必定要挣扎，所以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他们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他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

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的年轻同志，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我们打硬仗，必须要仔细，不要害怕。工作是做出来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必须磨炼自己。对外必须要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都可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另外，联合一方面，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国家承认我们，加上阿尔巴尼亚，共有十个国家。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要来承认我们。加上印尼、越南等，便要有十几个国家了。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与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

我们要轻视帝国主义，但不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再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光用军队把敌人打败还要用军队把中国建设起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朱　德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胜利年，全国只剩下了西藏、台湾、海南岛没有解放。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统一。今年我们要向西藏进军。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道路远，地面大，少数民族多，需要很好地努力。西藏虽然生产不发达，但物产丰富，所以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我们必须解放它。我们还要解放台湾、海南岛。

除此之外，在全国范围，其他各地都已平静，将要开展大生产，特别是铁道的建设。农业、工业生产也都要恢复。我们有很大的军队，除一部分部队担负战斗任务外，要用一部分力量参加生产，最好是用在修铁道上。这样，铁道部的任务不仅可以完成，并且可以超额完成。

一九四九年我们抢修铁路的成绩很大，把津浦、陇海、粤汉、平汉等路修通了。敌人估计我们非十年八年不能修通，我们一年就把它修起来了，总计修了八千二百七十八公里铁路。军队和人民很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出的"打到哪里，修到哪里"的口号兑现了，保证了军事运输，又完成了货运、客运任务。这是铁路职工、铁道兵团的成绩。

各级党组织、地方政府也出了很大的力，他们送物资、运材料，把道木、铁轨送到路上。铁路职工包括工程师都出了很大的力，又很好地团结起来了。过去各路都有派别，互不通气，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做事。特别是我们组织了铁道兵团，几个月以后，解放军战士就成了熟练的工人，不但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将来要扩大这个组织。铁道兵团的指战员和作战一样，积极、勇敢、拼命地干，以顽强战斗的精神完成抢修任务。所以铁道兵团对解放战争与经济建设事业的贡献很大。我们不光用军队把敌人打败，还要用军队把中国建设起来。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大大不同，他们把自己的一切无代价地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去年，因遭到战争的破坏，又因中国铁路过去多是帝国主义修的，规格不统一，行车也不快。经过去年的修补，把铁路正规化了。今年要做得更好，要求提高行车速度和密度，至少要赶上敌伪时代，并且应超过它。工厂要多修制车皮。

* 这是朱德在全国铁路工程计划联席会议、全国铁路政工会议、全国铁路青年团分团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

我曾参观了好几个修车厂，规模都很大，他们开工不足，这是很可惜的。今年我们要有计划地买点马口铁，帮助他们开足工。目前中国的家务中铁路是很大的，要很好发展这个家务，去帮助建设别的家务。

为了完成今后铁道建设任务，我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要学会经济核算。过去我们是只求完成任务，不计工也不算帐，今后不成了。施工中要做到节省工料，降低成本。这一项去年我们已初步做到了，今年应该继续努力，想各种办法降低成本，把铁道建设起来，给国家建立家务，为国家打算，不浪费一点人力物力。

第二，依靠工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团结其他阶级，虚心学习技术。工人、铁道兵团的士兵们，要很好地去团结技术人员，要向工程师、专家们学习技术，掌握技术，提高自己。因为在新的时代里，技术将决定一切，技术高就做得快，差一点就不能解决问题。

第三，工程师、专家到现场去指导工作，并向群众学习。资本主义时代，工程师不能和工人搞在一起，而今天我们把它打破了。工程师、专家亲自到现场去领着工人干，效率就高，不合规格的马上改正，避免发生错误。同时，也可在工人群众中学到新的东西，使自己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提高了理论，充实了自己。

第四，向苏联学习。苏联的工程师、专家有很多是工人出身，他们不仅有三十多年的实际技术经验，而且有丰富的专门知识，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

如果把这四件事情做好，今年的任务就能顺利完成。大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铁路建设好。

〔附录〕 “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

为了便于阅读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我们辑录了《“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这份《笔名别名录》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同时，将“部分组织代号”和“共产国际代表或苏联顾问化名”附后。

卜世畸　士畸、达真、道明、卜涛明、卜士吉

于方舟　于兰渚、于绍舜、于绍尧、芳洲

于右任　伯循、骚心、刘学俗、大风、剥果、神洲旧主、太平老人、关西徐子、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敬铭

于树德　永滋、陈东

马君武　马和、马同、贵公、欧化

马相伯　马良、建常、华封老人、马斯臧、马志德、钦善、绍良、马湘伯、马芗伯、求在我者

马叙伦　夷初、啸天生、彝初、石翁、寒香、石屋老人

马　骏　二九、马天安、马遁泉、马准台、念九

方志敏　祥松、云母文、方远镇、志敏、汪祖海、李祺祥

方　方　方思琮、王大钟、稺华、星星、野草

王一飞　王亦飞、王伊维

王云五　岫庐、之瑞、龙倦飞

王光祈　若愚、润玙

王仲一　王震异、王振一、王振翼

王尽美　王瑞俊、灼斋、烬美、烬梅、王济美、拙斋、梅、锐进、烬煤、勺斋、尽美

王克全　王十人

王　佐　王云辉、王南斗

王若飞　王运生、继仁、王度、岳飞、雷音、黄敬斋、黄敬龄、涅、穆泽夫、若飞、涅姆采夫

王　明　陈绍禹、韶玉、慕石、兆雨、风康、石、慕、玉、泰山、绍玉、诏玉、绍予、绍虞、克老白夫、马马维奇、波波维奇

王首道　王一芬

王荷波　柳季科夫、灼华、汪一喜、满玉纲、彼得洛夫、王功

王揖唐　王赓、志洋、慎吾、什公、王逸塘、揖唐、王一堂

王稼祥　嘉祥、稼蔷、稼啬、王振生、家祥、家肃、家著、家隶

韦拔群　秉吉、秉乾、韦萃、拔群
毛泽东　允滋、二十八画生、润之、李得胜、杨子任、泽东、子任、润、咏芝、马任、自任、杨先生、石山、事任、国彬、赵东
毛泽民　周彬、建业、润莲、泽铭
毛泽覃　润菊、毛覃
乌兰夫　云泽、陈云章
邓小平　邓希贤、邓斌、阚家麟
邓中夏　邓康、仲澥、中夏、施义、重远、邓安石、心美、大壑、邓仲懈、仲獬、邓忠、老杨、老葛、邓兰汀、邓隆顺、邓隆渤、增昌、寿生、杨富贵
邓　发　邓元钊、八仔、方林、易林、方村、元钊
邓　拓　邓云特、子健、马南邨、左海、高密、向阳生、殷洲、于遂安、鸥子、晓晶、邓拓洲、丁丙根、曼公、温州、萧斯、卜无忌
邓恩铭　黄伯云、邓恩明、邓尧钦、邓建勋、沼君、恩铭、仲尧、丁友民、廖贵松、黄仲云
邓　培　邓少山、钰云、少山、配、唐风鸣、邓少铭
邓颖超　壹、逸豪、伍美、邓文淑、邓湘君、小超、五妹、李扬逸
邓演达　择生、策成、仲密
孔　原　田夫、陈铁铮、陈坤、陈堃远、石心、陈坤元、中代、老白、铁卒、陈子坚、石林、子坚、迪生、石宜林、石玉林、陈铁英、陈国藩、陈为民、陈开远
尹　宽　石人、硕夫、石夫、商吉士、硕甫
兰公武　志先、知非
冯玉祥　焕章、基善
冯白驹　裕球、继周、布文、公孙
冯雪峰　文英、丹仁、何丹仁、易水、李易水、维山、画室、洛扬、乐扬、成文英、吕克玉、雪峰
古大存　古永鑫、斛咸
古应芬　勷勤、襄芹、湘芹
左　权　左自林、左纪权、权
左舜生　学训、仲平、谔公、黑头、阿斗
艾思奇　李生萱、李东明、萱、小么、店小二、李崇基
卢福坦　老山东、韩振明、李玉峰、鲁深
田波扬　佐储、佐渠、易水
叶　挺　希夷、西平
叶恭绰　誉虎、裕甫、玉甫、玉虎、玉父、遐庵、遐翁、矩园
叶楚伧　小凤、单叶、龙公
包惠僧　惠仙、包道享、鲍一德、包晦生、亦愚、包一宇、栖梧老人、一满、怀琛、慧僧、僧、
江亢虎　绍铨、天我
江　青　李云鹤、李云鹏、兰蘋、李进、大海、峻岭、琅玡台、张淑贞、兰喷、江晴、青云
江浩　江著源、江文浩、江著元、江竹元

庄文恭　韩慕涛、韩白骅
刘长胜　王相保、罗英、卯金、永生、金卯
刘天章　云汉、刘望、天章、王慎修
刘少奇　老戴、赵之启、肇启、胡服、K·V·、之启、莫文华、刘作黄、尚陶、赵启、戴先生、刘绍选、刘渭璜、刘绍基、刘卫黄、刘士奇、C·T、刘祥、凯风、周先生、仲篪、邵琪、陶尚行、少奇、刘校长、开风、三敬、吕文、华云、刘光明、刘仁、虎伏、刘士其、能、刘绍箕、实、赵子琪
刘仁静　养初、列尔士、刘镜园、仁静、敬云、竟人、人俊、澄宇、尼铎、子云、刘一宇、刘亦宇、镜园、聂里奚、刘宇
刘半农　刘复
刘尔崧　刘海、季岳
刘师复　师复、思复、刘光汉
刘　华　剑华、刘炽荣、刘剑华、可夫
刘志丹　志丹、刘景桂、景桂、刘子丹
刘伯庄　伯庄
刘伯坚　刘永福、刘永固、刘铸、刘铁侠、刘大冶、毅伯、大冶、润吾、伯坚
刘伯垂　刘芬、伯垂、刘剑米
刘绍周　刘泽荣、廖超
刘　晓　王明汉、刘巽斋、刘镜清、林庚汉
刘清扬　念五、念吾、清扬
刘愿庵　孝友、坚予
关向应　小关、向应、少先队员、关仲冰、李世珍、西一、应禀、致祥
安体诚　存斋、存真
许德珩　楚僧、许楚生、楚生
匡互生　互孙、匡日休、务逊
吉鸿昌　世五、恒立
朱少连　汉英、孝廉、孝芳、天资、天池
朱执信　朱大符、大符、去非、蛰伸、县解、前进、琴生、民意、无名、和中、蜇存、朱秋谷
朱自清　佩弦、朱自华、知白、白晖、白水
朱理治　玉砻、朱铭勋、煌岗、王岗、李迅
朱谦之　AA、谦之
朱　德　王楷、玉阶、朱玉阶、朱校董、刘玉、朱存铭、达第诺夫、朱代珍、朱健德
任卓宣　任旭、叶青、捉掀、卓宣
任弼时　任培国、陈林、史林、阔世、弼时、彭德生、辟世、胡少甫、辟古、P·S、史村、诗圃、布林斯基、避世、辟适、辟迈、弼实、伯棠
向忠发　忠发、特生、余达强、仲发、独用、科发、杨特生、之夫、许白英、拜发、独中
向警予　振宇、易夏氏、俊贤、警余
华　岗　少峰、华少峰、华西园、华石甫、刘少陵

孙中山　中山、孙文、日新、帝象、载之、逸仙、中山樵、高野、德明、孙逸仙、高野长雄
高洋一学生、南洋小学生
孙伏园　孙福源、伏、伏庐、伏园、松年、柏生、桐柏
孙治方　薛萼果、宋亮
孙　科　哲生
孙洪伊　伯兰、孙丹林
阮永钊　永钊
阮啸仙　阮比力、熙朝、瑞宗、晁曦、啸仙、啸、小山、三、哨、哨仙、小仙、啸僊、王宏、
王宠、笑仙、福康、晓山、晓仙
汪寿华　何纪元、何绍元、何今亮、何松林、孔伯生、宋林、松龄、何景亮、何介尘
汪泽楷　裸体
汪精卫　兆铭、汪兆铭、扑满、季新、季辛、枝头抢香者、季恂、精卫、民意、守约、王柏
荪
沈尹默　尹默、君默、君墨、尻嘿、秋明、秋明室主
沈玄庐　沈定一、玄庐、定一、宗传、叔言、剑侯、沈子丞
沈钧儒　衡山、秉甫
沈泽民　沈德济、泽民、则名、吉生、西则人、成则人、罗美、李明扬、明心
宋庆龄　林泰、庆琳
宋任穷　任勤、王秉璋
苏兆征　李光、苏吉、兆征
严　复　几道、又陵、宗光、幼陵、体乾、天演宗哲学家、尊疑尺盦
李大钊　李守常、守常、李钊、孤松、剑影、明明、冥冥、常、钊、大钊、S·C·生、L
·S·C生、L·C·C生、猎夫、琴华、T·C·L、伐申、辛亥、秀昌、寿昌、
龟年、T·C·生、志钊、耆年、严明、S·日生、明明朋、彬彬、T·E·生、英
英、TSC生、兀SE生、算算
李　中　李声澥、李印霞
李汉俊　李书诗、海镜、厂晶、汉俊、漱石、海晶、汗、李人杰、人杰、先进、均
李立三　李隆郅、李隆至、能至、隆郅、李成、秦进有、伯山、柏山、李敏然、李明、立三、
柏生、敏丝、介主、维国、唯真、李农致、阿三、维、李农志、苍木、柏三、H·
M、李诚
李石曾　石曾、李煜瀛、真民、真、石僧、扩武
李　达　鹤、李鹤鸣、江春、胡炎、立达、H·M、鹤鸣、李特、达、李永锡、平凡
李兆麟　张寿篯、李操兰
李启汉　李森、士林、志生、启汉
李求实　秋士、李伟森、求实、李北平、伟生、李国玮、南平、卓如
李伯刚　李汉石、舒淑贞、李书渠、S·C、须除、书渠、钢鞭、李海士、默雅
李峙山　山、李毅韬、峙山、施山、施珊、珊
李硕勋　硕壎、硕勋、李陶、石心
李维汉　罗迈、和生、和笙、罗曼、松、维汉

李富春　大盛、林大盛、富春、李一秋
李葆华　赵升阳、赵振声、杨震
李　璜　幼春、学纯、幼椿
李震瀛　震因、震瀛、李大汉、李泊智、振因、李宝森、大汉、泊之、二八、泊智、李晨因、震银
李慰农　李味农、尔珍、王伦、锄头
杜国庠　林伯修、伯川、林素庵、守素、杜惑、吴啸仙、吴念慈、林伯、伯修
杨之华　杨章、文尹、文君、之华、芝华、杜宁、杨其珊、小华
杨杏佛　杨铨、杏佛、死龙、杨衡甫
杨　度　晳子、虎公，虎禅师、九九、虎禅、学佛
杨尚昆　尚昆、杨善崑、哲生、张昆、李萱夫
杨明斋　杨好德、杨独东、明斋
杨贤江　英父、英甫、李浩吾、公朴、杨英父、姚应夫、李膺扬、李谊、李洪康、K、柳岛生、叶公朴、洪康、祝康、雁江、江一、江天、健夫、牛犇、曲他、江、YK、李服膺、杨庚甫、慕颜、贤江、李康
杨　殷　梦戆、梦、杨典乐、孟揆、梦揆
杨匏安　锦焘、匏庵、匏安、杨朝官、王纯一、陈君复
杨闇公　闇公、尚述、杨尚述、杨暗公
杨靖宇　马尚德、顺德、骥生、张贯一、乃超、润生、马顺清、马润生、张冠一
肖　三　天光、埃弥、子暲、植蕃、子琼、肖了开、肖爱梅
肖子曻　肖瑜、肖旭东、子昇
肖楚女　匪石、楚女、丑侣、野马、肖楚侣、抽玉、楚、玉、女、肖秋、树烈、秋、陋侣、楚汝、醜侣、初遇、丑女、楚侣、学秋
吴玉章　永珊、树人、岳平洋、平洋、岳镇东、镇东、震东、约瑟夫、布列宁、王荣、玉章
吴汝明　雨溟、吴雨铭、王玉升、吴汝铭、吴禹铭
吴亮平　良平、黎平、吴黎平、亮萍、理屏
吴稚晖　稚晖、朏盦、吴敬恒、吴朓、敬恒、燃料、燃、夷
吴　虞　吴又陵、又陵
何克全　凯丰、何凯丰、凯风
何叔衡　启璇、玉衡琥璜、瞻岵、老武
何孟雄　廖嘉群、陈方、何孟宏、廖从群、江四、何定礼、何国正、刘小山、孟安、何梦雄
余　飞　茂怀、金友林、愈飞、余慕怀
余泽鸿　少影、笑影、泽鸿、晓野、世恩、因心
邹　鲁　邹海滨、海滨、邹澄生、亚苏、澄斋
陆　沉　芦斌、卢嵩、吉珊、庄籍生
陆定一　定一、定、郑位、D·Y
陈为人　为人、陈蔚英、陈洪涛、陈涛、张明、张敏、张道立、张道惠、张惠高、陈维仁、张道为
陈　云　史平、施平、金生、廖陈云、怀民、怀、民、陈亨、李介生、先生、成云、黄苏、

廖陈氏、廖仲仁、陈际云、廖程云、麻云、廖承云、廉臣、陈明

陈公培　无名、吴明、吴寿康、陈伯璋

陈启修　惺农、豹隐、启修、辛修、莘农

陈伯达　陈尚友、伯达、王文殊、王通、史达、陈万里、陈志梅、陈建相、尚友、周金、典突、梅庄

陈乔年　罗热

陈延年　林木、陈友生、陈遐延、陈东

陈炯明　陆安、竞存、捷、赞三、月楼

陈独秀　CC生白、CC生、三爱、双林、水、只眼、记者、由己、庆同、仲、仲甫、仲瘦、众甫、邬儿、陈由己、陈仲、陈仲子、陈仲甫、陈铎生、苏子谷、实、实同、实庵、春水、顽石、乾生、重辅、致中、独秀山民、独秀山人、撤翁、熙州仲子、T·S·CHEN、T·S、方恒甫、老辅、陈庆同、陈仲山、仲子、仲实、独秀、常乃惪、看云楼、虬儿、灵福、翁实、笑庵、熙州种子

陈望道　一介、一个义乌人、V·D、不齐、任重、毕铭、齐明、东皋、张华、晓、《用字新例》同人、佛突、融、南、陈参一、春华、春华女士、南山、道、望道、雪帆、瑰琦、靡凡、陈晓风

陈潭秋　孙杰、徐杰、澄、潭秋、擞荪、宗琇、陈澄、云先、徐夹、文生、文光、吴觉民、余杰、林浦

陈　毅　仲宏、世俊、曲秋、仲弘、陈仲子、用章、绛夫、缔夫、横槊客

邵力子　力子、闻泰、仲辉、风寿

邵元冲　邵庸舒、邵翼如、中子、玄圃、玄中

邵飘萍　振青、阿平、邵振青、飘萍、萍、阿萍、邵新成、素昧平生

张太雷　大、大雷、之椿、太、太雷、张曾让、张复、张孝曾、张春木、张椿、年椿、春之、椿年、泰来、春木、马托春木、木、张太来、孝曾、春、春年、雷、泰雷

张申府　R、赤、赤子、见素、申夫、申府、申甫、刘尚、张弓、张亦、张崧年、张耪

张伯简　红鸿、雅青、晓旭、伯简

张君劢　嘉森、立斋、世界室主人、张嘉森、士林、君劢

张昆弟　芝圃、张守诚

张国恩　眉轩、张梅先、张眉先、张眉宣、张眉轩

张国焘　克仁、特立、张彪、恺荫、张特立、天师、国焘、涛、凯音、特、国涛、张克仁、李其岑

张闻天　思美、洛甫、歌特、洛夫、刘云、罗浮、张平之、美、平江、罗夫、张普、赵天、三爱、刘梦云、科德、闻天

张金保　张日辉、余冬生、张毅

张春桥　张一千、张兴、张国栋、春桥、狄克、克、水晶、钱水晶、罗之华、蒲西

张秋人　秋人、丘人、张友表、张慕寒、慕翰、张慕韩、张国华、秋莼

张浩　张皓、林育英、林仲丹、林毓英、李福生、仲丹、林仲楠、祚培、林武、林春山、李复之、陈子贞、张志山、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洗

张　继　张溥、溥泉、自然生、黄帝子孙之一个人

张琴秋　张梧、张凤生
张静江　张人杰、张静记、卧禅、增澄、饮光
张慕陶　张金刃、张金人、张今人、金刃、金钊
张　澜　表方
庞人铨　受淳、龙厂、龙庵
郑超麟　连、丝连、马道甫、舒严、超麟、林超真、曹真、则连、王绳祖
林　森　长仁、子超、天波、青艺老人
林　彪　林育蓉、林毓容
林伯渠　伯渠、邃园、林祖涵
林育南　林毓兰、向拂、李少堂、李敬塘、根、香浦、湘浦、铁峦、相拂、相佛、林根、若愚、石溪、育南
茅　盾　沈雁冰、P生、M、MD、小凡、方、山石、子渔、方保宗、方璧、文直、文、孔常、风、记者、韦、元枚、玄、止敬、玄珠、玄殊、矛盾、四珍、兰、冬芬、未名、未明、丙生、丙申、华、冯夷、冯虚、冯虚女士、石萌、石崩、叶明、东方未明、朱璟、吉卜西、仲、仲方、仲子、仲芳、何典、伯元、江、形天、阳秋、牟尼、沈玄英、沈余、沈仲方、沈明甫、沈德鸿、沈鸿、希、余声、希真、连琐、芬、芬君、明、明心、盾、冰、曲子、来复、甫、民、赤诚、克、德、直、威、郎损、洪丹、珠、味茗、铭、波、敬、秋生、惕、逃墨馆主、惕若、高子荪、终葵、曼、谢芬、韦兴、微明、施华洛、陶然、惠、横波、蒲、蒲牢、保宗、佩韦、雁冰、雁宾、亮、晓、履霜
易礼容　润生、韵珊、史恒、文壮游
罗　明　罗冥、罗善本
罗亦农　罗觉、觉、善扬、慎斋、振纲、亦农、林子谷、布哈诺夫、罗一农、李汉樵
罗绮园　易元、王世义
罗家伦　志希、罗毅
罗章龙　直君、珍君、沧、海、景云、虎、纵宇、文虎、宇云、沧海、罗仲言、仲言、章龙、柏格森、罗璈阶、张尊、LeoD
罗登贤　罗举、达平、光生、罗广、登贤、广、何永生、罗奕
罗荣桓　罗慎镇、罗雅怀、罗宗人
周作人　独应、仲密、周逵、启明、岂明、启孟、知堂、朴士、起孟、喜奎、槐寿、萍云女士、碧罗女士
周世钊　惇元、敦元、东园
周佛海　无懈
周建人　乔峰
周恩来　大美、少山、五、飞、飞飞、伍豪、陈广、恩来、周翔、翔宇、胡公、伍、冠生、非非、胡必成、大鸾、维思、赵来、林庚汉、汪洋、羊羽、西游
周逸群　立凤、易穷、一穷、左应龙、一群、黔铁
居　正　狱崧、觉生、梅川居士、之骏、梅川、药石、东辟
经亨颐　子渊、颐渊、石禅、听秋、长松山房主人

施存统　方国昌、国昌、施复亮、光亮、存统、伏量、复亮、施光亮、C·T
施　洋　施伯高、万里、吉超、伯高、施白皋
恽代英　F·M、子毅、代英、英、但一、稚宜、遽轩、天逸、D·Y、王作林、且、逸、但、子怡、且一、毅、洗梁、H·Y
闻一多　闻家骅、一多、多
宣中华　宣钟华、宣才文、伊凡
宣侠父　石雁
柯庆施　柯怪君、柯乃康、何乃康、柯尚惠
柏文蔚　烈武
柳亚子　人权、亚卢、亚子、安如、柳弃疾、慰高、中国少年之少年、弃疾子、青兕、春蚕、南史、唐隐芝、唐瑛、愤民、稼轩
柳直荀　柳克明、直荀、刘克明、刘克谦、直笋、高方、存厚堂
项　英　项德隆、江俊、江钧、德龙、钧、德发、夏英、得龙
赵一曼　李坤泰、李一超、李淑宁
赵醒侬　性和、赵干、赵兴隆、干、赶、醒侬、心农、邵兴隆
赵世炎　士炎、乐、乐生、列父、世炎、陆敬、罗敬、阿拉金、国富、因、识因、言、施英、琴荪、Iefen、大通、士寅、炎、列甫、知因、琴、赵世贤、施炎、夏仁章、英、东生
胡　适　天风、冬心、适、适之、适广、适盦、自胜生、铁、铁儿、胡天、胡适之、胡洪骍、骍、斯自胜生、蝶儿、笑、希疆、嗣糜、洪骍、之
胡　风　马荒、孟林、张光人、谷非、高荒
胡均鹤　胡钺、陈炳和、均和
胡汉民　展堂、不匮室主、胡衍鸿、胡衍鹤、民意、去非、辨奸
胡鄂公　南湖、新三、胡南湖
胡愈之　学愚、化鲁
饶漱石　阿四、阿施、梁朴、小姚、梁甫、思补、老宋
俞秀松　王寿成、纳利马诺夫、秀松、寿松、柏青、王筹成
柔　石　赵少雄、赵平福、赵平复、赵璜、金桥
贺　龙　文常、云卿、云清、王国珍
贺　昌　其颖、贺颖、伯聪、昌、晨
贺　果　佩饮、培真
高一涵　涵庐、一涵
高君宇　尚德、天辛、红越、纪清修、君宇、锡三、高尚德、澄宇、江清修、江越、锡山、高静宇
高语罕　王灵皋、语罕、王灵均
郭沫若　麦克昂、尚武、石沱、杜荃、郭开贞、易坎人、吴诚、鼎堂、文豹、定甫、竹君主、人、汾易主人、杜衍、杜顽庶、杜衍、坎人、石沱生、开贞、夏社、谷人、郭鼎堂、沫若、戎马书生、安娜、高汝鸿、爱牟、江耦、龙子、克拉克、高浩然、羊易之、林守仁、杨伯勉、白圭、佐滕和夫

郭　亮　靖箔、李材君
郭隆真　郭林一、石衫、石珊、林一、林逸、郭淑善、郭嵌
聂荣臻　向上、云臻
耿济之　耿匡、C·Z、狄谟、孟邕、蒙生
袁达时　袁大石、袁大时、袁笃实
袁玉冰　冰冰、孟冰、志仁、玉冰、亦生、培南女士
袁振英　震瀛、无梦青年、觉情和尚、黄龙道友、仲斌旦郎、震寰
贾拓夫　贾绍亭、贾元、托夫、关锋、贾红光
夏　曦　夏蘷伯、劳侠、李家瑞、夏希、蔓伯、夏罗伯
顾作霖　冬荣、作霖
顾顺章　化广奇、黎明、顾凤鸣、张华
奚佐尧　李左人、奚祖耀、奚冠一
钱玄同　浑然、玄同、疑古、王敬轩、金心异、钱夏、疑古玄同、师黄、德潜、逸谷
钱亦石　亦石、钱啸秋、钱介磐、沙白、谷孙
徐　冰　邢西萍、邢萍舟
徐向前　象谦、徐祥谦
徐特立　徐懋恂、徐立华
徐彬如　徐文雅
徐梅坤　徐行之
徐　谦　季龙、黄山樵客
徐锡根　西更、冯琦、锡根、冯戎
殷　夫　白莽、徐文雄、之白、徐柏庭、沙菲、徐殷夫、任夫、洛夫
陶行知　文浚、知行、何日平、不除庭草斋夫
梁冰弦　两极、海隅孤客
梁启超　饮冰室主人、梁任公、卓如、沧江、中国之新民、梁任甫
梁漱溟　漱溟、焕鼎
章士钊　行严、秋桐、孤桐、黄中黄、青桐、烂柯山人、士钊、支那汉族黄中黄、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章邱生、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无邪
章汉夫　阿四、谢启泰、汉章、史通、汉、夫
康　生　赵云、赵容、张云、张耘、张宗可、张少卿、张沄、张裕先、谢康、骆驼、张文清、祛生、赵荣、赵蓉、张震、张绍卿、张叔平、张旻、仲康
康有为　广厦、长素、更生、祖诒
阎锡山　百川、伯川、龙池
谌小岑　小小以、施以、谌伊勋
曹典琦　典琦
黄火青　黄民孚、黄一青
黄公略　黄汉魂、黄石、家启
黄日葵　一葵、野葵
黄　平　黄文治、黄有恒、黄国治、沃罗夫斯基

黄　道　一鸣、黄端章、黄文卿、陈松寿
黄　爱　黄正品、建中、爱爱
黄绍竑　绍雄、季宽
黄凌霜　黄兼生、天俊、黄文山、凌霜、超海、兼生
盛　岳　盛忠亮、伐樵、沈越、密茨、华侨
常乃德　燕生、惠之、平生、凡民、常乃瑛、常乃真
续范亭　培模、恕人
童长荣　灿华、张长荣、昌勇、张树华
曾　山　曾珊
曾中生　曾钟圣
曾洪易　洪易、曾宏毅
曾　琦　昭琮、锡瑛、慕韩、愚公、移山
谢子长　谢世元、谢德元、子长、浩如、秋阳
谢觉哉　觉斋、焕南、飞飞、见心、敦夫、马彬
谢唯进　用常、允常
谢维俊　谢唯俊、谢蔚青、废若、非若
谢　持　持、振心、振新、铭三、朱惠生、愚守、慧生
彭泽湘　祖康、若愚、彭岳渔
彭礼和　彭子均
彭述之　述之、张次南、彼得罗夫、陶伯、区白、南冠、犀照
彭清泉　潘心源、潘星元
彭　真　高先生、老魏、傅茂公、傅懋功、傅懋恭、春雷
彭雪枫　彭守道、彭雨峰、彭修道
彭　湃　P·P、子安、王子安、孟安、何海、海、汉育、天泉
彭德怀　彭得华、石穿、清宗
彭　璜　荫柏、殷柏
博　古　秦邦宪、卜古
韩麟符　致祥、麟符
覃　振　大让、理鸣、道让
蒋介石　蒋伟记、蒋直卿、瑞元、周泰、蒋志清、蒋中正
蒋先云　巫山、湘耘、李英
蒋光慈　蒋光赤、蒋宣恒、蒋侠僧、蒋资川、华西里、侠生
董必武　董用威、贤琮、洁畲、璧伍、碧梧
董锄平　董冰如、锄平
傅斯年　孟真
鲁　迅　周树人、夏剑生、树人、庚辰、自树、索子、索士、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迅、神飞、庚言、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雪之、敖者、宴之敖者、凡、俟堂、L·S、冥昭、杜斐、褚冠、L、褚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E L、E L E F、许遐、隋洛文、洛文、令斐、豫才、豫、飞、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乐贲、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

瑟、干、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干、罗怃、动轩、周动轩、何丰、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干、家干、荀继、史癖、尤刚、符灵、余铭、无艮、子明、直、白在宣、敬一尊、一尊、张承禄、庚、赵令仪、倪朔尔、栾廷克、张禄如、邓当世、宓子章、翁隼、孟孤、士繇、韦士繇、黄凯音、崇巽、常庚、燕客、白道、梦文、曼雪、公汗、董季荷、霍冲、杜德机、莫朕、中头、史贲、康伯度、朔尔、焉于、茹菲、华圉、越侨、张沛、仲度、苗挺、及锋、集、直入、乐雯、阿法、且介、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中国教育社、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旅沪一记者、编者、旅沪记者、元期、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铁木艺术社、译文社同人、戒马书生、唐元期、同裕斋、石介、黄棘本、鲁古

鲁　易　鲁其昌

詹大悲　大悲、詹瀚、质存、宜存

廖仲恺　恩煦、夷白、屠富、渊实

廖焕星　雯初

廖承志　何柳华、何郁华、何承志

谭平山　诚斋、谭鸣谦、聘三、平山

谭延闿　祖安、无畏、组庵、祖盦、慈畏

谭植棠　谭天、昌泰、仙搓

蔡元培　孑民、民友、仲申、鹤廎、鹤卿、蔡民友、蔡仲申、蔡振、蔡鹤廎、崔廎、周子余、会稽山人、蔡阿培、锷青

蔡和森　H·S、和生、和森、蔡林彬、苏方、和仙、泽膺、润寰、篰仙

熊　雄　中和、披素、祖福、累士、其光

潘问友　问友、潘冬舟

潘汉年　小开、小K、小孩、健行、胡星

颜昌颐　昌颐、燮甫

滕代远　李光、李广

薛撼岳　石逸、石遗

薄一波　薄书存、张云璞

戴季陶　小恒记、天仇、季陶、选堂、戴传贤、戴良弼、孝园

戴　笠　雨农、春风、徵兰

魏野畴　金士、明轩、魏子云、魏凤标、魏金、野畴、畴、韦金、金士铎、野俦、魏惜言、言、惜言

魏拯民　关有雄、伯张、冯康、魏民生、张达、魏明胜、魏锄耕、李新良、关长维

瞿秋白　秋白、双林、巨缘、屈维它、维它、史维它、它、何苦、史铁儿、S、T、R、易嘉、司马今、JK、董龙、陈笑峰、维宁、肖参、陈节、宜宾、商霆、爽、商廷发、范易嘉、宁华、瞿双、阿双、霜、林其祥、秋蘖、瞿森、双莫、干、陶畏巨、宿心、M君、美夫、秋康、屈章、Douton、启凡、林复、CTP、Smakin、Y·T、史维、易陈风、范易、易嘉、范易嘉、文尹、A、T、T、范亢、宋阳、向茄、向茹、静华、魏凝、惟宁、维宁、疑仌、乐雯、何家干、子明、余铭、洛文、何凝、疑冰、

陈逵、商廷、史步昌、史杰、林祺祥、阿林、王莫吉、Menin、何璞、布浪得尔、杨霞青、宋杨、斯特拉霍夫、黄龙、隋洛文、同人、笑峰、韦护、犬耕、施蒂而、瞿爽、铁梅、瓠舟、铁柏、涤梅、熊伯、雄魄、瞿懋林、狄康、S·M·A、文易、K、J、N、Sma、肖劳、双、子源、之夫、梅影、梅影山人、陈陆、庆白、双太后、凡、易军、林森、爽霜、易陈儿、尚长、一天、何疑、何君

附一：部分组织代号

中国共产党	CCP
共产党	CP、大学
中共中央	吴世荣、安中原、共嘉、中兄、钟兄、钟英、张万和、郑容、曾迈、总校、李承宣
中央局	总校教务处
中央书记	总校长
社会主义青年团	SY
共产主义青年团	CY、中学
团中央	青哥
京　区	白和
沪　区	胡棣蔚、胡枢蔚、谢勃
粤　区	广东渠、管东渠、粤渠、杨澄
湘　区	石渠、湘渠

附二：共产国际代表或苏联顾问化名

经维斯基	吴廷康、伍廷康、魏琴、卫金、V
马　林	孙铎、马力、马灵、马伦、乐文松、菲力普斯、森多德、安德列森、斯列夫利特、希夫廖特、倪恭卿、西蒙博士、布罗维尔、菲力浦
鲍罗廷	格鲁森贝格、万育欣、基里尔、鲍格、布兰特温、乔治·布朗、B
加　仑	瓦·康·布留赫尔、K
罗明纳兹	D
米　夫	亚·米·福尔图斯、弗尔曼
李　德	奥托·布劳恩、卡尔·瓦格尔、艾伯特·利斯特、奥托·斯特恩、华夫

（资料来源：张静如等编《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陈玉堂编《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

（肖甡辑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18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编
页数=606
SS号=10273520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